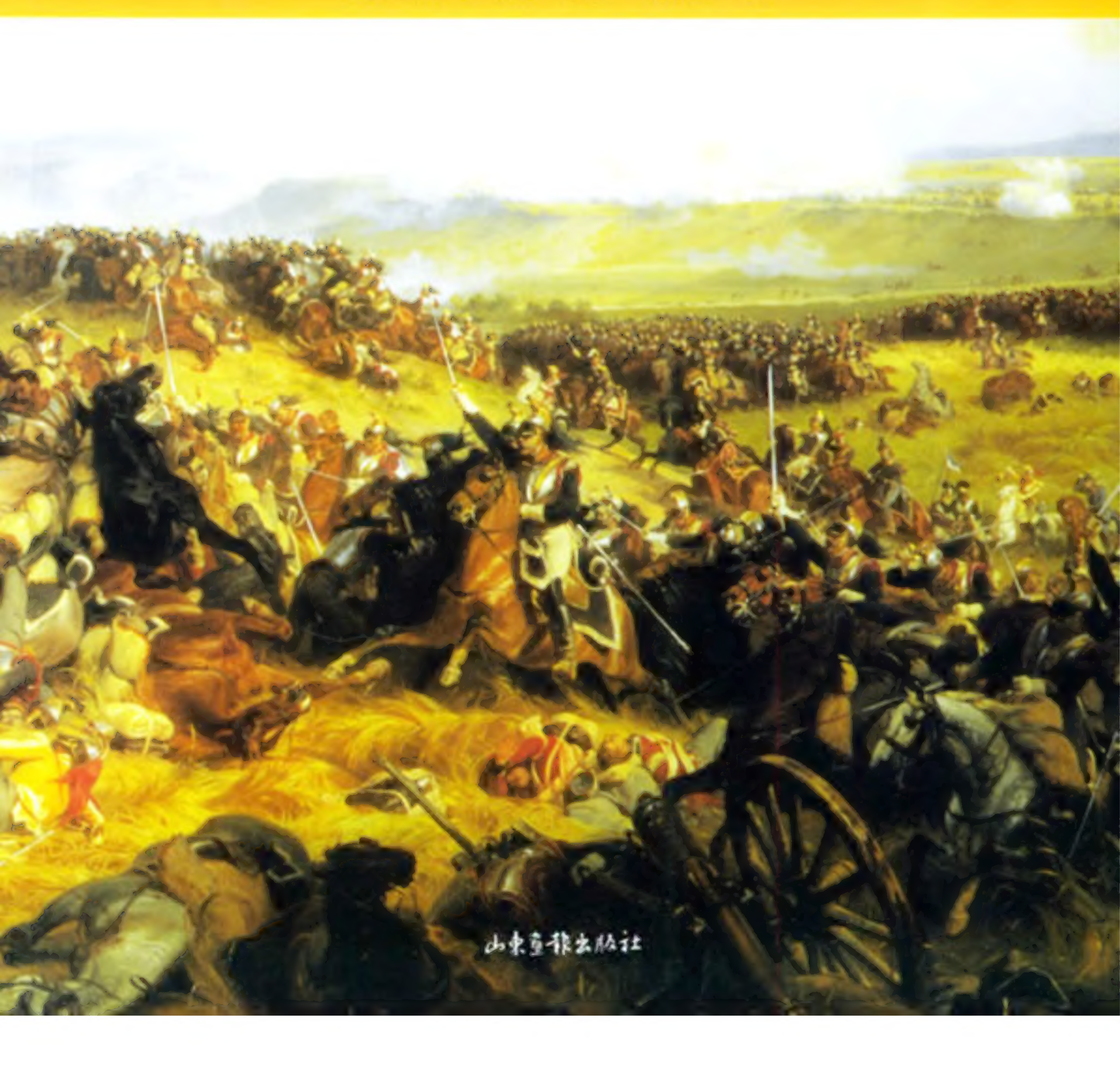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WARFARE

剑桥插图战争史

[美] 杰弗里·帕克 等著　　傅景川 等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中文版序言

由我策划和编辑的《剑桥插图战争史》将要与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读者见面了，这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但是，我担心有些读者在发现书中内容基本局限于西方战争之后会感到失望。坦率地说，他们一定会认为，战争的中国模式在重要性和趣味性方面并不亚于西方。

例如，在第一章，维克托·戴维斯·汉森对公元前7～前5世纪希腊高山地带争夺霸权的城邦战争进行了出色的描述和分析。对于每一个城邦来说，战争之伟力取决于农民，包括他们拥有的令人生畏的武器和使他们定期参战的硕大装甲防护。古希腊的战争是以无数短促而充满血腥杀戮的战斗为标志的步兵战，咧着嘴挺进的重装甲步兵方阵，先是迎面用矛对刺，然后用重剑砍下敌人四肢或切开其腹部。古希腊的战争规则被这些交战者视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大多数战争都在一个下午解决问题——这反映了组成方阵的富裕农民的价值观。随着时间的推移，强大的城邦吞并了弱小的，出现了称雄一时的霸主，军队的规模也随之扩大，并由此产生了一些新的战斗人员——从穷人中征募而来的弓箭手和由富裕农民组成的骑兵。但是用青铜包装起来的持矛兵，仍是具有决定性的作战因素。古希腊重装甲步兵这一文化景观其丰富的战略和战术意蕴，由于诸如色诺芬(公元前428～前354年)——索克莱蒂斯的门徒，一支上万人雇佣军的统帅，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小说家和第一位军事科学家等——之类著述家的出现而熠熠生辉。

汉森的生动描述主要是来源于他的一本著作《战争的西方模式》，此书出版于1989年。就在此后的第二年，见解独出的马克·刘易斯出版了他对发展历程具有惊人相似性的同一时期的东亚地区军事进行研究的成果——《早期中国约定俗成的暴力》。该书考察了公元前7至前5世纪中国北部和南部边疆地区步兵的兴起。在这些地区，许多诸侯为获取霸权纷争不断，参战各方的政治基础都基于血统或门第，参战者的职位是由他们的世袭地位及其在战争中的表现来决定的。随着强国对弱国的吞并，野战步兵的规模迅速扩大——也许是成十倍的扩大——中国逐渐处于少数的诸侯国的控制、管辖之下。在崇尚军事技术的“战国”时期，战争冲突连绵不断——在公元前722至前414年间发生的504次诸侯战争中，至少有110个诸侯国被灭亡——由此出现了几篇关于战略和战术问题的专题论文，其中最值得称颂的是《孙子兵法》和与之齐名、由墨子所著的关于防御工事方面的论文。

应该承认，差别是存在的。在古希腊，注重的是公民选举——城邦中常拥有好几位将军——以至像地米斯托克利那样经公民大会审查举荐的将领，也只能够任职一年。与之不同，中国产生了新类型的军事指挥者，一个将军可能由于掌握了军事技术(这是受孙子和其他军事著述者的教诲)而成为专门指挥家。然而，最终结果是非常一致的。中国300年间几乎没有中断过战争，其结果是使纷争的七国合并成一个大国——整个“中央帝国”在公元前221年第一次实现了统一。秦始

皇即中国第一个皇帝，下令模仿其凯旋而归的勇士来复制一支彩陶军队去守卫他的陵墓。与之相对照，古希腊城邦间的相互残杀造成彼此国力的衰竭，也终于导致公元前338年希腊联军彻底败在马其顿的菲利浦手下。与此同时，菲利浦将被征服的希腊各邦合并成由自己统治的联邦，继而组织起一支用于征服波斯的联合重装甲部队——经过他儿子亚历山大的努力，这一艰苦而富于冒险的宏伟事业终于得以成就，亚历山大也因此成为欧洲历史上第一个皇帝——依靠庞大军队建立帝业的始作俑者。

以上两次“军事革命”的众多相似之处是显而易见的。还可以举一个微观一些的例子，以上两个社会——古代世界仅有的那样两个社会——就已经发现的训练方式而言，古希腊重装甲步兵和中国武士并肩同步进入实战。然而，为什么这部书只谈及前者呢?这里，我提出三点理由作为辩解。首先，对各个历史时期所有的社会——无论阿兹台克人和莫卧儿人，还是中国和欧洲——都予以同样关注的“战争史”，其广泛多样的内容是一单卷本的图书所无法包容的。其次，在让西方的勇士和军界名流分享关注和荣誉的同时，仅仅对非洲、亚洲和美洲的军事和海军传统轻描淡写地说上几句好话，那将是不可原谅的歪曲。再次，作为以下引介的补充性解释，不管是进步或是灾难，战争的西方模式已经主导了整个世界。在19、20世纪，包括中国在内，以悠久文化著称的几个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在坚持不懈地抵抗西方的武装，而像日本那样的少数几个国家却通过谨慎的模仿和适应，则取得了成功。到20世纪最后十年，无论是向好的方面还是向坏的方面发展，自公元前5世纪以来已经融入西方社会的战争艺术，使其他所有的竞争者都相形见绌。西方战争艺术这种主导地位的形成和发展及其成功的秘密，是值得人们认真考察和分析的。

杰弗里·帕克

1998年8月4日

说 明

编者对许多朋友都怀着一份感激。由于这本书的初稿是由许多作者共同完成的，这就要求进行大量的调整和修改，以确保每一章之间都能互相补充而不是彼此重复。因此，我首先想感谢一起写作的各位作者，他们慷慨仁慈地接受了超过任何学者所能忍受的编辑上的删改，而且给了我无法估量的协助和鼓励。然后，我衷心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彼得·理查兹博士的热心支持与点拨，他首先向我提出了关于此书的想法，没有他的宝贵建议和敏锐判断，就不会有此书的问世。最后我们衷心感谢那些给我们提供了宝贵建议和参考意见的朋友们：约恩·苏米达，他从一开始就给我提供了相当精彩的建议；米歇尔·霍华德和唐纳德·卡根先生，感谢他们审阅了本书全部初稿；我还想感谢各位同事，他们给予个别作者的协助将在后文特别致以谢忱。

杰弗里·帕克
于耶鲁大学

目 录

谨向为我们确定迫切需要的标准的米歇尔·霍华德和威廉·麦克尼尔致以诚挚谢意（图片为：正在操练滑膛炮的美国内战时期的联邦军）。

引介 西方战争方式

武器革新一直是西方战争史的特征之一。单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就使士兵得到了关于利用掩体、坦克作战、空中作战及搜索的入门知识。它还初次使用了可怕的新式武器——毒气。但较为有效的反毒武器也很快被研制出来,战争于是继续升级。这里是一个德国士兵在一次毒气进攻中戴着一种盒式防毒面罩把食物送往掩蔽壕。

不同的文化产生不同的战争方式。土地肥沃但人力缺乏的社会比较倾向于一种仪式化的战争:其中,实际参加作战的是少数"精英",但他们的命运却决定着国家中每一个人的命运。阿兹特克的"鲜花战争"和印度尼西亚岛人们的"掠夺战争"相对来说较少带来流血事件,因为他们的目标在于俘掳人口而不是扩张土地;在于通过战争获得更多的人力,而不是让他们白白死于流血的冲突之中。中国也是如此,战略的目标在于不战而胜。最受人尊敬的军事理论家孙武(其著作写于公元前4世纪)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虽然他的著作在其它部分主要阐述如何通过战斗获取胜利)。许多非西方国家的军事传统表现出了强大的继承性。例如,甚至直到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家还在研究印度尼西亚伊里安查亚高地人们的战争,他们仍像其祖先一样以一种仪式化的方式来解决争端。不过在那时,绝大多数军事文化已经被西方——欧洲类型和美洲的前欧洲殖民地区的类型所改造而转型了。

同样也以历史悠久而自骄的西方作战方式主要体现于五个基础原则。首先,西方武装力量通常总是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用技术上的先进来弥补数量上的劣势。但这并非说,西方拥有完全的技术优势——直到17世纪早期火枪齐射技术和战场火炮的出现为止,整个亚洲的马上箭手和他们所使用的弯弓一直被证明要比任何西式武器的威力都大得多——但是,除了很少的例外,亚洲的马上弓箭手并不直接对西方构成威胁,就算能够,这种威胁也不持久。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的先进技术都源自西方,许多重要的革新,如马蹬和火炮都源自东方的对手。

现在,一般国家从外部借鉴的之所以通常主要是军事技术,实在是因为由这方面的失败带来的恶果可能非常迅速而且足以致命。不过,看起来西方一直对接受新技术异常敏感,不管这种新技术是来自它自己的发明家还是来自外部。技术的革新以及同等重要的对这种革新的迅速反应能力,很快便成了西方军事文化的特性。事实上,历史证明,自从公元前5世纪的波斯战争以来,很少有哪个时期,西方所召集的部队在战斗潜能上不优于它近处的对手。

技术和纪律的重要性

然而,单单"技术优势"本身很少能确保作战的胜利。正如瑞士军事作家安托万·亨利·约米尼在19世纪早期所说的那样:"武器装备的先进可能增加作战获胜的机会,但赢得战争的却并非武器本身。"甚至直到20世纪,战争的结局也较少决定于技术而更多地由其它因素来决定:周密的作战计划、成功的奇兵突袭、雄厚的经济基础,最重要的是严格的军事纪律。尽管其它因素也都起着相应的作用,但长期以来,西方一直把军事纪律视为将分散的个体转化为统一的作战整体

注:本书旁码为原书页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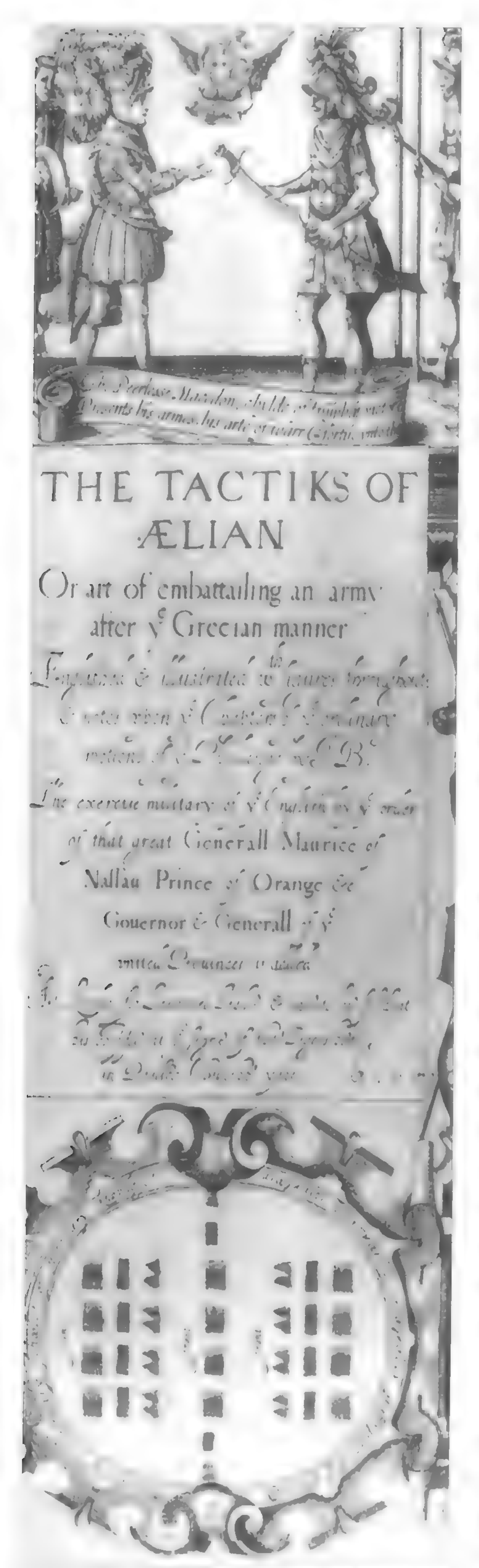
中的组成部分所仰赖的首要手段，而没有过分强调血缘关系、宗教或爱国主义的作用。直到18世纪，许多士兵都是从同一地区招募而来并像一个扩展的大家庭一样集中听命于他们的地方领袖。虽然对16、17世纪绝大部分北欧国家来说，“新教运动”证明了一种颇有潜力的重整旗鼓的呼吁，而且，“你的国家需要你”和诸如此类的口号直到今天仍是部队招募工作的有效动力。但在西方，所有这些因素若与军事操练和长期兵役这两个孪生兄弟中的纪律性相比，都显得黯然失色。

只有两大文明发明了步兵操练：中国和欧洲，而且都进行了两次。第一次是公元前5世纪在北中国和希腊，第二次是在16世纪末。此期代表人物——中华帝国的戚继光和荷兰共和国拿骚的莫里斯都明确主张恢复传统做法。在西方国家，行军和队列训练成为军队生活一个永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对于一个1970年的英国卫兵来说，即使受不了这种训练的艰苦，但也必须参加)。

甚至是5世纪时那些初为农夫、后为战士的古希腊重装甲步兵也以纪律性极强的方阵形式出战以达到最佳的作战效果，因为军纪中最关键的因素就是，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面对强敌时都能坚定不移且不屈服于内心的慌乱、恐惧和盲目的冲动。无论是实战还是训练，经常的团体活动都能人为地创造出一种血缘纽带的效果——为了提高军队的凝聚力并进一步增强作战效果，其中有些如古罗马的军团大队、连、排等，都通过加强军队内部亲密的伙伴关系而得到巩固。

应该再次予以强调，作战中最具决定性的优势在于弥补数量劣势的能力。因为历史上不管是保护欧洲免于外来侵略(如公元前479年在普拉蒂亚，955年在拉茨菲尔德，1683年在维也纳)，还是征服阿兹特克、印加和莫卧儿帝国，西方军队在数量上向来都处于劣势，其间差距至少是一到两倍，而且常常更为悬殊。若非严明的军纪和先进的技术作保障，这些奇迹绝不可能发生。同样，若非因为强于对手的军纪，甚至是公元前4世纪的亚历山大大帝也几乎无法用他的6万名希腊和马其顿人的联军去摧毁波斯帝国的军队，因为在敌人的部队中可能招纳了更多的希腊士兵(他们拥有与亚历山大部队同样的作战装备)！

从另一角度讲，军纪对西方军队也尤其重要。西方的战争正常情况下总是通过步兵来赢得胜利，少有例外。继古希腊重装甲步兵和罗马军团的长期占主导地位之后，继之而来的又是徒步作战占支配地位的1000年(当然这些徒步作战的士兵也是承受无数次围攻的首当其冲者)。射击武器——先是弓箭，后是火炮——仅仅强化了这一倾向。然而，对步兵们来说，毫不退缩地抵抗一次骑兵部队的猛烈



进攻总是需要艰苦的训练、强大的凝聚力以及超人的自制能力。海战亦是如此，无论是在战舰上与入侵的敌军搏斗，还是忍受船外连续的炮击，纪律和训练显然都是最关键的。

西方军事传统的继承性

巩固确切地说是强化以上这些因素，在军事理论中有一种突出的继承性。首先，弗莱维厄斯·雷纳图斯·维吉提乌斯的《军事问题》（约编著于390年左右，50年后最后修订成本）一书的故事，可能为此提供了一个最好的例子。8世纪早期，位于前罗马帝国西北边缘的北翁布里亚学者比得拥有此书的一册抄本。9世纪时加罗林统治者洛泰尔一世委托人编写了此书节本，以帮助自己发明一种成功的战略来抵抗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入侵。而在1147年，安茹的杰弗里·普兰塔奇纳特家伯爵陷于围困中时，由于阅读了维吉提乌斯的这本书而发明并使用了一种引火装置。13世纪末至16世纪初，此书被译成了多种语言（法语、意大利语、英语、德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甚至希伯来语）。保存下来的中世纪的大量手稿进一步证明，《军事问题》一书长期保持着它受人欢迎的地位，其中有些被缩写成袖珍本以备战场上使用。甚至到18世纪中期，年轻的乔治·华盛顿也拥有一本，他还对它作了详细批注。

其它经典性的军事著作也经久不衰地受到欢迎并发挥着影响。公元1594年，拿骚的莫里斯和他在荷兰的侄子们阅读了埃利亚的《战术》（约著于公元100年）中对于罗马军队作战时投枪和投石器使用技巧的描述后受到启示，完成了对于火枪群射技术最具关键性的革新，并在以后10年中把罗马军团施行的军事操练模式引入自己的军队。19世纪时拿破仑三世和赫尔穆特·冯·毛奇都翻译了早在2000年前写成的尤利乌斯·恺撒的《战争史》，而艾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伯爵和他在普鲁士参谋本部中的后继者们在毁灭法国的那场“下次战争”中，显然模仿了该书中取得惊人成功的包围战术。据罗马作家记载，这种战术在公元前216年的坎尼战争中由汉尼拔所创，1914年，这种战术几乎再次被成功运用。更近一些时候，乔治·C·马歇尔将军也发表评论说，“一个士兵的军事教育应从阅读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开始”，而此书约写于2500年前。

这些惊人的连续性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古代理论家和现代的战争实践者们不仅都有对传统的喜爱，都确信过去的教训能够而且应当影响当代的实践，而且他们都拥有同一种愿望，即乐于接受四面八方的思想。宗教和意识形态上的限制很少能干扰西方对战争的讨论和实践。一方面，“战争法则”已作为一

个最普遍的术语被加以使用，它通常并没有有效的强化机制；另一方面，从柏拉图时的大学直到今天的现代军事学院——宗教的和世俗的——通常都没有严格的新闻监察机构，军事知识从而得以完全的系统化，一些主要的核心思想也因此而保持了惊人的连续性。这些连续性不仅包括对技术优势和纪律优势的不断强调，而且包括一种以赢得敌人无条件投降的决定性胜利为中心的战争观念。正如19世纪早期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他的《战争论》中所表述的："直接歼灭敌人武装力量必须被置于首先考虑的位置"，因为"摧毁敌人的战斗力是凌驾于一切目标之上的作战原则"。然而另外一些理论家也强调用另一种可赢得全局的战略来取代前者：消耗策略。关于此，西方军事史也提供了丰富的实例：罗马的菲比阿斯·丘克塔特（"拖延者"）靠着拖延时间、制造小的战争"磨擦"并依赖比敌人丰富的资源优势，最终扭转了坎尼战争的战局；16世纪服役于西班牙的阿尔巴公爵，甚至还有在美国内战的最后阶段（公元1864～1865年）与罗伯特·E·李将军较量的尤利塞斯·S·格兰特将军使用的也是这种策略。

二战双方都被寻找一种能够确保其所向无敌的神奇武器"的念头所困扰。德国发明出一种液体石油弹道导弹，但尽管消耗了巨大的财力（基于一种莫名的恐惧，协约国一方也在进行类似的研究），第一次发射出去的"复仇武器2号"（V-2火箭）却只在1944年9月轰炸了伦敦。不久以后，瓦尔特·多恩贝格尔（设计的领导者）和维尔纳·冯·布劳恩博士（主要设计师）还因此而接到了希特勒发来的贺电和一枚爵士十字勋章（照片中，庆宴上的两个人都佩戴着这枚勋章）。然而，尽管德军发射出去的这种火箭数量高达3000枚，却并未稍稍延缓其败亡

然而，无论是通过战斗、围攻，还是消耗，西方战略压倒一切的首要目标几乎都是彻底击败和摧毁敌军，这与其它许多国家完全相反。古希腊重装甲步兵和罗马军团士兵的残暴无情曾遭到许多经典作家的谴责。近代社会，"独木舟传奇"一词也仍然倡导"没有怜悯之情"的战争观念，而且它已成为欧洲海外战争的固定手法。所以，新英格兰南部的纳拉甘塞茨猛烈反对这种西方的作战方式："那简直太疯狂了。"1638年，有人直率地告诉一位英国军官："这种作战方式让太多的人惨遭屠杀。"那位英国军官未加否认，他也这样思量着：印度人"可能打七年仗也不会杀死七个人"。1788年的西非战争在欧洲观察家眼中正是如此。当地将军们确认"他们作战的惟一目的就是俘获奴隶。因为若得不到奴隶，他们便不可能为欧洲赢得任何利益，而若不战斗，他们便得不到奴隶"。很清楚，那些单为俘获奴隶而不是为彻底消灭敌人而作战的人们，就像在他们之前的美洲、东南亚及西伯利亚的土著居民一样，面对欧洲人用来对付他们的陌生的"毁灭战术"，只能是惊慌失措。

左页图：埃利亚的《战术》写于约公元前100年，描述了罗马和马其顿人的军事训练。当1616年约翰·宾汉姆出版此书的英文译本时，他在军事操练的内容中增加了荷兰共和国领袖拿骚的莫里斯所著的一部分。这是合理的，因为荷兰军队的军事转型主要是由于对埃利亚的《战术》和其它经典著作的阅读。不大合理的是宾汉姆置于卷头插图顶上的一幕情景：亚历山大大帝（站在右首的"无敌"马希登）正手持着那柄象征他的军事天才和霸权的宝剑递交给莫里斯

挑战——回应动力学

但西方军事强权的持续扩张并非仅依靠技术、纪律和侵略性军事传统这三种因素。其它许多军事国家（如中国和日本）也同样积极地鼓励技术革新和纪律训

练。孙子早就在他的教导中预言了后来由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提出的许多主张，但在两个至关重要的方面，西方不同于别的国家。首先，西方具有独一无二的变革能力和在必要的时候保持其作战传统的能力；其次，它有为那些变革提供金钱支持的能力。

在那些仅被某一种绝对权威所统治的地区，比如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或莫卧儿王朝时期的印度，由于他们较少面临生死攸关的挑战，所以军事传统的演变非常缓慢——如果不是根本不变的话；但在众所觊觎的地区，军事革新的需要就变得极为迫切了。必须承认，当一个国家发展程度较低，并保持着落后的政治、经济体系和结构时，挑战和回应挑战之间所构成的张力太小，很少能引起迅速而显著的变化，但在各国争夺频繁且激烈的地区，挑战和回应会相辅相成，形成自足发展。

6

这种机制可与一种叫做“间歇平衡”的生物学模式相比较。在这种模式中，发展的进程是这样的：长期的缓慢增长中不时插入一段突发性的变化。所以，14世纪，当步兵的重要性已缓慢而稳固地发展了很长一段历史之后，瑞士矛兵和英国骑士突然戏剧性地变成了重要角色。接着，经过大约一个世纪的实验之后，15世纪30年代，火药大炮开始了围攻作战技术上的革命。又经过约一个世纪，随着持续不断而且代价高昂的实验，一种新的被称为大炮堡垒的防御技术把战争的状况又拉回平衡。每一次革新都将旧的平衡均势完全打破，继之就是一段迅速转型和调整的时期。

在西方，协约国以高昂的代价研制出原子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担心德国已经开始了核武器的研究。但直到德国失败，他们才收获到第一枚果实：1945年7月第一枚原子弹试制成功。同时，试验部队利用一些复制品教会全体人员掌握了如何使用它们的知识（照片显示的是放置在一架B-29飞机炸弹仓中的一枚原子弹）。与德国的V-2火箭不同，这项研究带来的结果举世瞩目。1945年8月6日，第一枚原子弹降落在日本广岛，三天之后，第二枚原子弹又投向长崎，次日，日本便宣布无条件投降

然而，发展新的作战技巧和策略不只需要作战技术的改变。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以维持其技术优势为基础的军事体制显然需要花费高昂的代价，而威力主要依赖于大量人力的劳动力密集型体制只需社会动员起大量以传统武器装备的成年男性就足够了——这可能只需很短的时间（有时，就像日本和欧洲中世纪早期的情况那样，一些相当古老的武器，如剑，就像亚瑟王的神剑一样可以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使用）。战争带来的财政上的负担可能延至以后好几代人。与之形成对比，一个资金密集型的军事体制则要求为士兵准备全副的武器和装备，它虽然花费很大，却容易很快变得落伍。不过确切地说，它有其吸引力：虽然需要较高的初期成本，但后期的保养费用却很低廉。比如，哈勒赫城堡是爱德华一世时在威尔斯的那些坚固要塞中的一个堡垒，它的修建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但后期保养费用却很低廉，直到1294年它还以仅仅37个战士的兵力就成功抵挡了敌人的进攻。这位国王的战略眼光也预示了“曼哈顿工程”的远景。在这一工程中虽然成百万美元被用于生产核武器，但在1945年8月2日，仅用两架飞机将之运出，就即刻导致了日本帝国及其在整个东南亚仍全副武装着的成百万军队的无条件投降。

引进火药武器之后，每场战争的费用都证明是比过去大大增加了，军用金属的价格也涨到了惟有一个集权化政府才有力量去支付战争的程度。发明集权化这种方式以应付如此昂贵的战争形式，显然使西方国家的权力更得到加强。每一次

规模和武器装备上的新变化都要求努力到藩属国去掠夺新的资源，同时还需要一套扩大的官僚体制去对付它们。长期的财政压力常引起被掠夺者的反抗，但它也能导致宗主国对藩属国控制的增强——并因此而巩固了内部权力——使进一步的军事革新和发展成为可能。在为攫取和扩大军事霸权而发动的战争中，这一点尤为真实。这种战争要求从中央筹备军资和军需品并稳固地转向更广大的范围，因为它同时也促成了更高的税收、更庞大的借贷以及更强的集权化。西方国家的军事活动和政府形式因此而变得密不可分：国家发动战争，同时战争又缔造国家。若用另一种生物学方式来比喻，将提醒我们想起DNA分子中两条蛋白质链螺旋上升时在其各个不同分立点上相互作用的双重结构。

这些复杂的问题提醒我们考虑到，模仿西方战争方式应包括各个层面上的吸收和借鉴，仅仅武器上的模仿绝对不够，它同时要求模仿整个社会和经济结构作为革新和迅速对革新做出回应之能力的基础。"西方战争"依赖的士兵通常是社会中最保守的成员，但他们具有这样一种能力：既能适应变化的需要，又能满足从来自不同（通常是更底层）社会背景的"发明者"身上吸取指导的需要。对国家而言，它也应具备一种先决能力：迅速、大量并通常是长期地动员财富，以便使在冲突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技术劣势很快得到补救。自然，经济发展水平越低，作战备用资金也越不容易筹集——甚至在西方国家也是如此。所以，1904年，虽然法国投入预算的36%来扩充军备，而德国只投入了20%，但在实际上，这却意味着法国在仅以3800万法郎的投入与德国的9900亿法郎的投入相对抗。为了达到对手军备投资数目的一半，法国投入的资金与国民预算的比率竟是对手的两倍。这种形势一直持续到了下一个十年。它很好地解释了法国在1914年爆发的大战中为什么发现自己竟处于如此软弱的劣势之中，尤其是在炮术方面。

7

然而，16世纪以来，巧立名目的税收和其它一些不断掠取财富的手段在供养战争的重要性方面远远不如信贷动员技巧的发展——比如国家银行、钞票、信用状及公债等——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以它当时的收入来支持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但建立并进而保持充分的信贷基金显然不太可能，在那勾起人们无限回忆的18世纪，英国的政治经济家查尔斯·达韦南特曾说：

> 在所有仅存在于人们思想领域的事物中，没有什么比信贷这种东西更虚幻、更美好了。它绝不能被任何强力控制，它只悬在人们的观念中。它依赖于我们的希望或恐惧的激情，它常常是不经意地来，没理由地走。而一旦失去，便很难恢复。

8

但是，至少在18世纪的英格兰，"信贷"几乎是无所不在的。据那个时代的估计，所有贸易往来的2/3是用信贷而不是用现金支付的。到1782年止，单英格兰银行每年交易账单的总值就已达到200万美元以上——若算出它可获得的货币利息，那简直高得令人眩晕。

然而，激活信贷支付战争不仅依赖于广泛的个人贷款，而且依赖于各财阀和战争发起者之间的共同利益。因为公众贷款不仅要找到心甘情愿的贷主，还得找到愿意而且有能力最终偿还的纳税人。在英国，1689年后的100年中，国家年均

税收总值增长了六倍。正像一个比较清醒的国会议员所评论的：

任何一位绅士请看一眼我们桌上的财务报告书吧。在那儿他将注意到我们的税收状况已膨胀到了多大的规模、多大的数目……那太可怕了，就是看一眼目录也让人恐惧，因为在挨着的好几栏中，我们看到的只有税、税、税……

不过绝大多数自己也纳税的国会议员接受了必须缴纳这些税收的事实；国内大多数人亦如此。到1783年，当那场失败的对美战争走向结束之时，大英帝国的国债已累积到2.45亿英镑，几乎与二十多年的税收总值相抵。然而，对于许多种类的贷款，国家仅以3%的低薄利率攫取性地偿付。在西方作战方式中，"谁来支付战争？"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等同于"谁来作战？为什么？"这一问题。而且，在战时组织长期信贷（并因此呈现出一个安全而精密的资本市场）并把短期借债转变为长期借债的能力，也正是西方一件重要的秘密武器。

资金问题也使许多国家在采取西方作战方式时受到限制。主要因为跟上技术变革的步伐并保持以大量财富对技术进行有效利用，都需要大量的成本，只有较少的国家能在这条跑道上长期坚持下来。有些国家显然太小（如1660年后的丹麦）或太分散（如1667年后的波兰），另有一些国家（像瑞典、瑞士或比利时——更少成功）则选择了中立态度。而其他一些国家，尤其是经济落后的地区，其军事力量仍主要致力于围堵并对付国内的威胁。相反，事实虽然证明并非所有西方国家都能采取西方作战方式，但在某些非西方国家却能做到这一点，日本即为此提供了最典型的例子。由于严格的纪律、灵活的理论和一个精密成熟的财政体系这三者的重要结合，使日本先在16世纪后在19世纪获得了宝贵的军事技术，并同时投入了高昂的费用对这些技术加以利用。这是日本赶上（若不是超过的话）它所有竞争对手所必需的条件。

9

支配全球的军事传统

这些发展的重大意义远远超出了它的发源地，因为侵略——武力掠夺——在"西方的崛起"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在过去2500年的绝大部分时期，不是更为丰富的资源或更崇高的道德价值观，也不是无可匹敌的军事天才或直到19世纪才出现的发达的经济结构，不是这一切，而是陆海军的绝对军事优势为西方的扩张奠定了根基。这种军事优势意味着西方很少为成功的侵略付出过痛苦的代价。来自亚非国家的军队很少能成功地开进欧洲本土，当然也有例外——薛西斯、汉尼拔、阿蒂拉、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但他们都只获得了短暂的成功。没有一个能从整体上摧毁他的这个西方的对手。相反，西方军队虽在数量上居劣势，却能击败波斯人和迦太基人的入侵并进而灭绝他们的国家，甚至伊斯兰的军队也从未成功地以西方方式在欧洲分割他们的"势力范围"。然而，另一方面，时光的流逝、军事力量的重新平衡促进了西方的扩张。正如荷兰势力在印度尼西亚的奠基人之一简·彼德松·科恩在1614年所观察到的那样：

> 亚洲的贸易活动应在我们武器的保护和帮助之下进行和维持，并且那些武器必须由贸易获得的利润来支付。所以，贸易没有战争不可能维持，战争没有贸易也无力进行。

到1650年，这些言论之后的又一个时代，西方已经在四个区域取得了军事上的——并因此也取得了经济上的——完全控制：南美洲、中美洲和东北美洲、西伯利亚、附属撒哈拉的沿海地区，以及菲律宾的许多地区。此外，西方船只也随意航行在七大海域，在绝大多数海域中，西方已能调整并在某些情况下控制商业对手的海运贸易。

到1800年为止，西方国家已控制了世界陆地表面35%的地区；到1914年，这个数字已增至85%——仅在1878年到1914年之间就获得了100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虽然其直接控制地区的面积急剧收缩，但西方军队仍能或多或少地直接插手它所选择的陆地或海洋地区，这一能力为保护其附属国家的经济利益和维持全球的势力均衡提供了帮助。这一能力曾在萨拉米斯战役（公元前480年）和拉茨菲尔德战役（公元955年）中保护了西方，也曾在特诺奇蒂特兰战役（公元1519～1521年）和普拉西战役（公元1757年）中扩张了西方霸权。今天，或好或坏，它仍然在世界上维持着其支配地位，没有它，“西方的崛起”是不可能的。

希腊方阵　这一幕取自小亚细亚桑索斯的涅雷德纪念碑（约公元前400年）

第一部分　密集型步兵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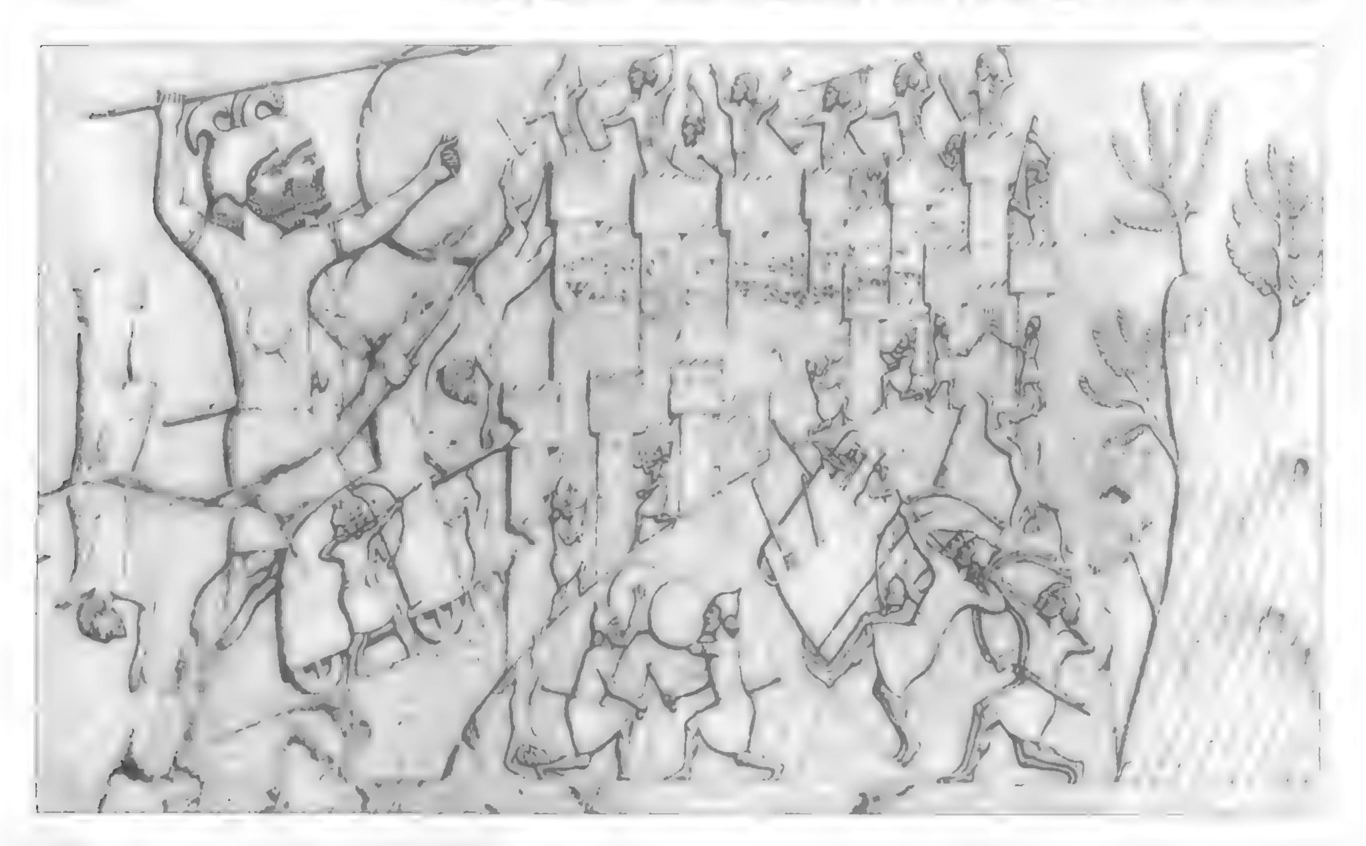
第一章 步兵的起源

公元前3000年纪早期，埃及和近东地区精耕和灌溉农业的成功发展，改变了它们的作战文明，这种文明以前表现为各游牧部落之间的不断冲突。水压工程改进了农业技术和苏美尔、乌尔、巴比伦、亚述、尼姆鲁德及埃及的规划经济，为军队、后勤和防御工事的修建准备了必要的资本。

远比上述进步更重要的是，精耕农业在人们心中注入了一种扩张版图的冲动。不断增多却被固定在土地上的人们，在寻求更为高效的方法以保护并获取更为高产的土地。而且，近东地区也为大量流动军队的生存提供了理想的场所：漫长的生长季节，温暖的气候，延伸至天边的平原间横陈着一些可供随意取水使用的小河；绿毡铺就的山脉，湿地、冰、雪和阵雨——大规模明确军事活动的祸根——一切都已具备。

这是北部伊拉克豪尔萨巴德王宫中关于桑尔冈二世的战争浮雕。它描绘亚述的持矛士兵、持剑士兵和弓箭手所发起的多面进攻情形，该作品很好地抓住了早期近东各帝国表现出来的对围攻术的熟练掌握。

苏美尔人、赫梯人和埃及人农业生产的过剩，把相当大一部分终日为种植庄稼所累的人们解放出来，他们开始转向用金属制造武器并饲养马匹以驾驭他们的四轮车。然而，仅仅是新的铜金属、锋利的武器和马匹的增加并不能如它们自身的发展那样戏剧性地导致战争，同样重要的是，必须形成一种新的以“宫廷”为中心的社会和经济的复杂结合体。“宫廷”应是这样一种机构：它产生出一些承担着特殊军事、宗教和政治责任——准确地说就是任何大规模战争所需的先决条件——的领主。赫梯人、埃及人和亚述人首先拥有了聚集大量兵力的能力，他们能



够而且渴望在战斗中消灭成千上万的敌人，他们渴望遵照他们威严的宗教或政治领袖的命令或许可来彻底消灭其它各国文明。所以，早期亚述的统治者提格拉帕拉萨（公元前100年）在后来的史诗中大肆宣扬他是如何摧毁胡努沙的：

……我在山间吹散他们的勇士，像一阵风，割下他们的头，像一群羔羊。我使他们的血流于低谷和山岗……那个城市被我俘获，我掠夺他们的众神，卷走他们的食物和财产，又以烈火烧毁他们的城池。那些砖在建造前一直占据着整个城市的土地，在我的剑下废弃和毁灭。我把它们践踏成一片废墟，然后在上面种植我自己的庄稼。

虽然青铜时代和（后来的）亚述人及波斯军队创造了残忍的屠戮制度——这常常是整个希腊、罗马甚至现代社会都无法匹敌的——但这些军事社会组织都有其固有的局限性。比如，对弓箭、投石器、战马及马车的过分依赖需要一些专门技术，由此就创造出了一个专门的军事阶层。近东社会对大量的建设——和破坏——防御工事的爱好使资源枯竭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众所周知，《圣经》中关于约书亚攻陷耶利哥城的描写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关于人类的屠杀潜能的思考：

13

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各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

现存最早的古希腊重装甲步兵的甲胄，发现于伯罗奔尼撒北部阿尔戈斯的一个坟墓中。无数的青铜头盔、护胸甲、胫甲、剑和矛尖在私人坟墓和圣殿中得以保存下来，但木制的盾和矛柄几乎都遗失了，我们仅能从文学艺术作品和极少数幸存的青铜、兽皮和铁制器物中了解它们的外观和用途。

最重要的是：青铜社会大都权威至上，而且有着非常严格的等级制度：发动、指挥及结束战争的权力掌握在少数特权阶层手中，常常仅一个统治者就可以宣告将千万人置身于他的奴役之下。一个权威人物的死去，以及继之而来为他的统治权展开的争夺战、敌对王朝之间的宿怨，所有这一切都可能激起千万人起来厮杀——他们或被消灭或被奴役。有时这种厮杀甚至并不为战斗中的绝大多数人带来任何社会的或经济的利益。在相同的时尚下，当那些被精选出来拥有专长和权威足以发动战争的少数人死去或离开时，整个社会的作战潜力便可能受到严重的削弱，甚至使该社会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难怪各种王朝年鉴、象形文字和近东石雕中会如此频繁地出现那些俘虏、虐待、对敌人执行"最后审判"以及摧毁其堡垒的情景。古代的近东，既没有什么固定的军事原则，也没有任何约定俗成的战争仪式，能限制那些战斗者自身之间的战争，并因此而缓和这些王国的毁灭趋势。

古希腊城邦的自耕农

14

战争引起了希腊社会的第二次转型，这同时也是农业耕作方式演变的结果。公元前3000年纪和公元前2000年纪，希腊的耕作沿袭了东方模式，仍保持着官方经营。希腊本岛的迈锡尼社会（公元前1600～前1200年）在很大程度上与地中海和亚洲的君主制国家相类似——因此几乎没有提供任何战争实验的机会，更不用说发布军事计划和向除极少数人之外的人民灌输战争责任意识了。但战争一旦从

集权主义的宫廷控制中解放出来——如果我们敢于在一个进行组织化屠杀的社会背景下使用此词的话——成为个体权力可以控制的东西，它便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模式向前演变。为了了解西方战争方式的起源、复杂冶金术的发明、优良的军纪、挑战和回应挑战的天赋，以及一个广泛而共同的军事传统的产生，就应当去考察希腊半岛上迈锡尼宫殿的倒塌，以及随后而来的整个欧洲中世纪（公元前1100～前800年）的情况。

公元前8世纪始，由平等的财产所有者形成的组织出现了，即城邦（城市国家）。正如现在所意识到的，城邦文化是西方军事实践的源头。这种军事实践诞生之时在很大程度上常与道德热情相冲突，而不是受制于宗教的困扰。它们通常以阵地战中的决定性较量为中心，而非纯粹在数量上摆出一副好战架势，或单靠器械师和后勤学家的专业知识轻易取胜。初时，希腊城邦极端沙文主义地自诩，他们的城邦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机构，同过去以宫廷为基础的文化截然相反。早期希腊诗人福希利德自信地写道："哪怕是一个海岬的小城邦也能胜过循规蹈矩的愚蠢的尼尼微。"另一位前6世纪的诗人阿尔凯乌斯也发表同样"纳粹主义的论调"说："缔造一个城邦的不是房顶牢固的屋子，也不是坚石堆砌的城墙，甚至也不是发达的运河或造船厂，而是那些勇于迎接挑战的人民。"

15

发生于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的希腊文化复兴及集体制向私有制转变的关键，是农业生产和相应的战争方式的急剧变化。在人口压力下，希腊转向家庭经营私人拥有的土地制。这样，一方面，精耕方式保证了粮食的供应，而另一方面，又使农业津贴不再受制于最高官方权力的干涉。简而言之，如今再没有什么"最高权力"，取而代之的是，为了保护并巩固这群新出现的农民，一种具有广泛基础的寡头政治和一种财产平等的文化精神被建立起来。在整个希腊语世界超过1000个以上的城邦中，出现了一个投票公民阶层。

幸存下来的一个最早的希腊方阵的刻像。它被刻在7世纪晚期一个科林斯花瓶上。希腊传统的农民战士（在绝大多数城邦中占成年男人的30%～50%）因其弧形盾"Hoplon"而被人称为"躲在盾牌后的重装甲步兵"。他们绝大多数但并非所有的人都居住在本地，通常他们有一块大约十亩的耕地，外加一个帮做家务的奴隶。

在这种土地所有制气候下出现了重装甲步兵（Hoplite）。公元前4世纪的历史学家色诺芬在他的《经济论》中，强调了自耕农与作战方阵之间的这种联系："耕作让人学会去帮助别人。而对敌作战也正如在地里劳动一样，别人的帮助同样是必需的。"在公元前7世纪和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大部分地区，越来越是自耕农自己而不是闲适贵族、世袭君主，也不是受雇佣的罪犯或政治阴谋集团，在制定他们的法律、种植他们的粮食并为他们的城市亲自战斗。

从某种意义上讲，两个世纪中（公元前700～前500年），希腊方阵都遵循着悠久的土地制习俗和既定的军事仪式，整场战争仅限于包裹在青铜装备下的持矛方阵之间短短一个下午的交战。冲突激化时——公元前5世纪以前，几乎罕有超越边疆的领土争端——城邦会一致同意通过他们装甲队伍的迅速作战来解决问题。盔甲由每个战士——土地主自己购买，这种盔甲大约要消耗75磅木材和金属，它们包括：胫甲（即胫部的青铜保护装备）、头盔、凹面的圆形盾、护胸甲、双锋矛和较短的佩剑。

希腊土地制下孤立、封闭的重装甲步兵只是一个步行着的无助的靶子，他很容易陷入敌人的暗算，敌人很容易就能将他切断，尤其当他在一条山路上冒险进入险恶地形中时。或者也许更糟，他有可能完全暴露在敌人的骑兵或投弹部队的攻击之下而被俘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步兵本质上就很不适合希腊的自然地形和地貌。但绝大多数希腊农民既不愿独自作战，也不愿离开他们所心爱的平坦的庄稼地，更遑论去对抗那些骑在马上的权贵或在山间与那些显然比他们卑下的无地散兵们作战。相反，他们依据那种占统治地位的土地制选择了他们的农业战争形式，将自己布置在方阵这种防范严密的队伍中，农民与农民在土地上为土地而战。整支全副甲胄的队伍高举着盾，前三列长矛挥出，不管是轻装部队还是敌人的骑兵都无法战胜这密林般的方阵。"那是一种令人肃然起敬并毛骨悚然的情景"。公元1世纪斯巴达方阵的传记作家普卢塔赫如此说，"他们以无隙可乘的阵形向敌阵挺进，没有丝毫犹豫，平静而快乐地步入险境之中"。他的描述取自数世纪之前的资料。

16

当重装甲步兵以敞开的队形（上）接近敌军时，横列关闭，盾牌横挡，于是无数的青铜和木头（下）组成一堵固若金汤的防护之墙。绝大多数方阵深度在8人到16人之间不等，看起来就像一个一个的矩形。当军队人数增加至1万或3万人时，方阵长度也从好几百码增至一两英里。

一旦希腊战争仅被限制于重装甲步兵间的战斗，那么不管是富裕阶层还是平民在战场上都退居次要地位了——迅速增长的自耕农独立拥有财产，他们职业性地参加战争，以促成有利于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法规的建立。如果乡村仅是身着皮衣的自耕农所耕作的一个个完全同样的农场的一件大补缀品，那么方阵也是许多武装一致的战士所组成的一块大方格。正如希腊城邦的精耕农业吞没了本来属于战马的辽阔天地，同样，重装甲步兵如今也取代了骑马的战士。色诺芬的话反映了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在重装甲步兵中普遍盛行的思想观念，他讥笑说："只有那些最虚弱、最缺乏荣誉感的人才会去骑马。"

色诺芬又有一次提醒他那1万名实用主义的重装甲步兵说："战场上没有人会因为被马踢跤而丧命，只有战斗中敢作敢为的人才是真正的男人。"从某种真实的意义上说，在即将来临的1000年中，骑兵权贵在西方战争中一直是附属于步兵的。

当希腊财产主经投票决定向外侵犯后，当地各乡村和家族集团都迅速聚集，加入城邦方阵。从山间的跋涉、实际的战斗到返回家乡，通常不超过三天，对后勤工作的需要，直到公元前5世纪才开始被引起注意。另外战斗本身也同样很简

科林斯式的头盔仅用一面青铜制成，早期面部裸露的头盔很快被它所取代。这种头盔扩大了脸颊部分、增加了鼻部护甲，保护更周到。所以自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中期，它一直是标准的头盔样式。重装甲步兵的甲胄源于北部伯罗奔尼撒，并由阿尔戈斯和科林斯的早期统治者们不断改进。当重装甲步兵的优势已尽人皆知时，绝大多数希腊人反而把盾牌和头盔分别视为阿尔戈斯人和科林斯人的发明

单：进攻者把敌人引出来后——通常是砍伐敌人的树林或毁坏其葡萄园——双方便方阵相向。对于战斗中的领袖军官，“战斗先驱”是一个比“将军”更恰切的词语，他身居队伍最前列，其使命是做全阵的战斗表率，并战死于他的同伴眼前。诗人阿尔基罗库斯于公元前7世纪说：“我讨厌那些叉开长腿、性情暴烈的军官，他总是在修得干干净净的头发和下巴下面装腔作势，给我一个矮个的站得端端正正的人、一个充满热情的人、一个绝不会在他站立之处颤抖的人。”一般在将军作一番简短训辞后，两方便开始交战，用诗人提尔泰奥斯的话说便是：“脚与脚相踏，盾与盾相持，盔与盔相碰。”

18

对于那位重装甲步兵先驱来说，这场特殊比试的关键是在敌阵中杀出一道缺口，使他的同伴们得以紧随其后向敌人推进，在敌人阵中播下混乱的种子，使他们几乎无法看清也无法听清，从而陷入巨大的恐慌之中。古代作家们常着重描写战斗中的骚动、混乱和混战中凝血的伤口。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个时代的希腊战争景象极其恐怖，它绝不仅仅是方阵队列之间有秩序的进攻。的确，修昔底德也曾说过“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发生于公元前424年的德利姆战斗中，雅典人在包围之下陷入了一片混乱，他们因彼此错认而互相残杀”。后来，在西西里，他们也是秩序大乱，终于战场上到处都是厮杀声，朋友与朋友、公民与公民不仅互相惊吓而且互相攻击，简直无法将他们彼此分开。

团结和纪律

在喧嚣的重装甲步兵战场上，战术和谋略都不重要，团结和纪律才是一切。战斗似乎消除了对后备、战术转换、诡计和策略的需要，甚至在公元前4世纪，色诺芬还直接说道：“战术仅是军队指挥中一个极小的部分。”相应地，在重装甲步兵的全盛时期，甚至一个土地法规的制定就可盖过那些只会导致失败的计谋甚或是方阵外一个人的夸夸其谈。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之前的这种公开相向的战争形式下，希腊城邦在战斗中常常两败俱伤，但军备的保养开销一直很低。所有方阵中的武器都是相同的，所以它们可以循环使用，而且这些武器既实用又便于修理。没有纯粹的军官部队，各方在一场阵地战中的伤亡率都保持在10%左右，更高的要求则不易达到。军事操练和作战本身所花的时间短到可以被忽略的程度。后期希腊战争中高昂的代价，历时弥久的围攻及全面修建的防御工事，这些特征在此时还只是极零星地出现。

历史学家们有时看起来似乎并不情愿去欣赏这种战争自发的土地制性质：他们认为，希腊城邦的耕作程式和乡村社

古典时期的军事伤亡

古代武器——矛、剑、投枪、弓箭和投石器——的致命结果来源于它们极快的攻击速度和极强的穿透力同时也因为它们能轻松刺进人体未加保护的部分.比如直到17世纪后期，近东弓箭手还比欧洲使用射击武器的士兵更令人丧胆，而铁尖枪也比早期步枪更易于发现并击中目标。

然而重装甲步兵的死亡率通常只占双方作战总人数的20%(胜方5%，败方15%)，原因在于重装甲步兵防护严密的甲胄。它用青铜铸造，较之虽然坚固但却过于沉重的铁更适用，因它具有较强的可锻性，投掷起来更轻巧而且不易生锈。青铜甲胄为身体提供了半寸厚的保护层，要想刺穿用此材料所制的胸甲和头盔——当穿着它的士兵仍然站立时——所需的冲击力是任何古代武器都难以达到的。

如果一个步兵能在战斗中保持站立的姿态(20磅重的盾牌，30~40磅重的护胸甲，再加上共重10~20磅重的头盔、胫甲、剑和矛，对他来说是个很艰苦的任务)那么胸部和心脏便很少面临危险，挡在上部和前方的巨大的三尺盾牌使任何与它撞击的兵器减弱了自身的冲击力。意外常常是来自裸露于外的身体部分，尤其是腹股之间、脸部以及胳膊和腿，不过胳膊和腿部的危险相对较小。古希腊的诗歌和瓶画正是集中表现了这些伤亡。刺向上方的剑可能割断一条大动脉，使一个重装甲步兵在短短几秒钟内就流血致死，或者至少它会在某处开一道伤口，埋下感染和化脓的危险。最后，若用剑或者铜制成的枪托顶端在一个倒下的战士身上补上一下，则能刺穿他的甲胄，正像一些残留下来的护胸甲和头盔上的破洞所证明的那样。

但最大的伤亡来自彼此之间的践踏。古代战场上的步兵在进攻或撤退时，某些士兵被强大的人群撞倒，无数只脚践踏其上，巨大的惊恐当中，他们的头盖骨、胸部及四肢极易遭受严重的复合性骨折。

埃及纳（前480年）阿斐亚庙中三角石墙上所描绘的这名倒下去的战士，表现了重装甲步兵战斗中的英雄主义风尚。单是敌人和伙伴们的践踏常常就足以把他吓呆并使他严重受伤，所以，合格的重装甲步兵应是这样的：在任何情况下，每个被击倒的垂死者都不会放弃他的盾牌——它是保持方阵团结的心理和身体的关键。

重装甲步兵战争在艺术中被高度理想化了，就如图中一个公元前100年的科林斯花瓶上所描绘的那样。步兵不是以沉重、肮脏、笨拙的形象出现，而是表现为“夸张的裸体”，以展现他们年轻的肌肉和强健的体魄。同时，两三个并肩而立的重装甲步兵常被用来代表整个方阵的巨大阵容，这种阵列之深之广是用任何现实主义的笔法都难以描绘的

会学无视正在出现的色彩斑斓的希腊社会图景及其对战争的要求和限制，这令人吃惊。但是，希腊人自己却不断地通过他们的文学、哲学、瓶画、雕刻和公众纪念物不停地宣扬这些方式——一切都在不断强调重装甲步兵的勇敢并都一致夸耀着他的武器和甲胄，在朋友和家人面前标榜他在战斗中的极大牺牲——这一切都暗示着投弹士兵、轻装骑兵甚至较富裕的骑兵队伍的缩减和衰微。

上述这些种类的战士不一定都抱着排它性极强的土地制观念，他们并非像一般重装甲步兵那样，作战目的是为了维护现存的财产所有结构、投票议会对土地的控制以及自己对土地的依赖——他们并非为了这一切作战。贫穷的人们和杰出人物都更钟情于投弹武器和战马、埋伏和追击、遭遇战和围攻术——在这些战斗中，超凡能力是不能简单地通过一个小时内强健肌肉和坚定信心的炫耀就可以妄下定论的。

但这些占少数的非重装甲步兵却遭到人们的蔑视。公元1世纪，地理学家斯

特拉波声称他在一根古代柱子上看到了一段碑文，内容是关于早期希腊战争中禁止使用所有投弹武器的。有一个斯巴达重装甲步兵因敌人使用冷箭而受致命之伤，他死前的一段抱怨很有名："死并不足惜，除非是死在一个骑着马的懦弱家伙的箭下。"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在公元前2世纪充满深情地缅怀道：过去的希腊人

> 不会选择使用欺骗手段去打败他们的敌人，反而认为，若非是把敌人引至公开地点然后杀掉他，就没有任何荣耀可言，即便战胜也于心不安。因此，双方有约：互相之间不用暗器或投弹武器。他们确信：只有面对面的短兵相接，才是战争胜负的惟一裁决方式。为了这些原因，他们得提前向对方宣告开战，通知自己进攻的时间，甚至告诉敌人自己的陈兵地点。

在以重装甲步兵为中心的古典时期，即公元前700～前431年，全面的物质繁荣和希腊城邦文化的稳定演化，在很大程度上妨碍着对战争加以谨慎限制。公民们没有不切实际地（因而也是注定失败地）想去制止战争，相反，他们为了频繁而不可避免的冲突和战场上的荣誉，制定了许多典章仪式——希腊社会各方面都不必为这种仪式化战争付出什么真正的代价。这种社会在城邦的最初两三个世纪稳定地维护着它们的土地制结构。总体上讲，希腊的城邦文化不同于古代近东文化，其繁荣，确切地说是因为组织化的杀戮和军事防御花费一直都被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公元前5世纪末评论希腊早期时代说：

> 没有一场战争是为了争夺领土，或至少是为了争夺霸权而发动的。在希腊，边界争端常常发生，但没有任何人为了征服外国而发兵远征。确实，没有一个城邦隶属于另一城邦之下而受其控制，所以，这些希腊城邦不可能结为一体联合远征，相反，此时的战争仅仅由敌对邻邦之间的一些地区性作战构成。

轻装弓箭手如散兵常常遭到重装甲步兵的蔑视，他们被看成无地的穷鬼，既没有青铜的甲胄，也不能对战斗给以任何投资。然而，随着重装甲步兵垄断地位的衰落，由埃皮克特描绘在一面6世纪雅典盘子上的这种弓箭手变得越来越重要，在防止偷袭、拦截骑兵突围以及在险恶地形中抵挡敌军奇袭方面，他们起着最为关键的作用

公元前5世纪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

东方迎战西方

历史关于波斯战争（公元前490年，公元前480～前473年）之前的希腊战争记载简单且不完全，只能把各方面的信息——吟唱诗歌、挽歌和后世历史学家、哲人、古物收集者的思考以及遗留下来的武器和甲胄的残片——拼凑起来形成认识。与之相反，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的步兵及海军作战都被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色诺芬等人在他们的伟大著作中完好地记录下来。例如：从希罗多德的历史

画面表现的是波斯骑兵迎战希腊步兵，它来自公元前4世纪的一块宝贵的刻石。波斯战争中的希腊人其实不像此处所描绘的那样身体裸露，他们布阵严密，甲胄防身，以长8～9尺的矛加以武装，擅长短兵相接的作战，而且由于拥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他们比波斯军队更具优势。这些波斯骑兵骑着比驴驹大不了多少的马，既无马镫又无盔甲，而且语言不通，领导涣散，战术也很贫乏。

书中，我们知道波斯人作战时进攻迅急，完全不同于前两个世纪的希腊战争。

公元前490年，由野心勃勃的大流士一世所发起的初步进攻尝试在马拉松的雅典人面前经受了重大考验。波斯人在此地将全部赌注仅仅押在一支步兵上面，他们奉命去进攻已被层层封锁的阿提克沿海平原。希腊人在此地取得了胜利，它奠定了一个此后300年间没有在实质上发生改变的东西对抗的模式：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不管拥有多大的兵力，如果东方步兵居然愚蠢到去进攻西方全副甲胄、纪律严明的持枪方阵的话，必然会惨遭失败。然而，虽然后来的雅典文学中对“马拉松人”极尽夸耀和赞美之辞，但东方人的大规模进攻也只不过是延迟了十年。公元前480年，大流士的儿子、他的王位继承人薛西斯卷土重来，情形完全改变，希腊人面临的挑战空前严峻。入侵者远比往日成熟精良，作战准备也远比往日充分。正如当时的戏剧作家埃斯库罗斯所评论的那样：“东方人追求的不是小小的阵地战，他们今天的计划是将希腊完全置于他们的奴役之下。”

公元前480年薛西斯的军队进攻希腊时，并不像一支远征的装甲兵部队，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包括成千上万人的多种语言的“旅居者的城市”，它慢慢地向南部希腊打通它的道路。通过有条件的投降或和解等手段，他们吞掉了许多希腊城邦。拥有一支巨大舰队的波斯人无意进行那种小打小闹的步兵战，他们嘲笑把希腊化战争仅限于陆地作战的所谓“希腊人法则”。波斯将军马多尼马斯沉思说：“这些希腊人以彼此习惯的最愚蠢的方式作战。他们一旦互相宣战，就找出一片最公开的平坦场地，然后在那儿陈兵拼杀。即使是胜利的一方，伤亡也极惨重，更不必提那被尽数歼灭的失败的一方了。其实很简单，既然他们都讲希腊语，那么不妨互派使者和谈判代表，以任何其它的方式去解决纷争而不必通过厮杀。”相反，

希腊人的胜利

公元前499年，雅典和埃雷特里亚地区支持小亚细亚讲希腊语的部分城市起来反抗波斯统治，波斯王大流士一世震怒之下出兵远征希腊本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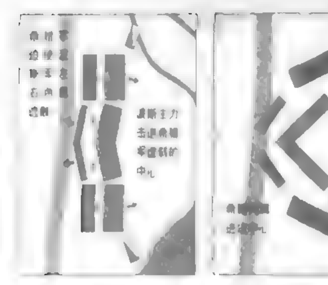
波斯军于马拉松登陆之后无法继续前往雅典，因为雅典人和他们的盟军占据高地，封锁了道路。波斯军的主力部队进攻希腊，同时派遣一支打击部队自海路进攻雅典——包括绝大部分的骑兵和一些步兵，以免他们转回保卫他们的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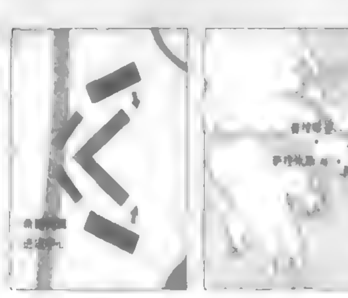
居于数量劣势的希腊军为了拉长战线以迎战波斯军，使中心布置空虚但两翼充实。当他们进入波斯骑兵范围之中时，希腊人发起进攻。他们击溃了波斯军的左右翼，这些主要由招募士兵组成的败军逃回他们的大本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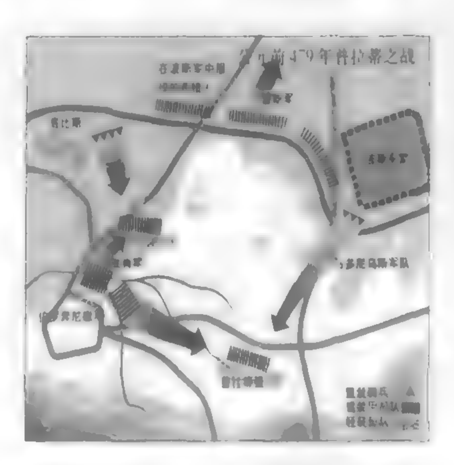
希腊军队的侧翼并未乘胜追击，而是转向溃散的波斯军中心。他们仅以192人的牺牲就消灭了6400名波斯军，很多人在逃往船上时淹死水中。雅典人还俘获波斯战船7艘。然后，他们转回自己的城市以防波斯军的打击部队登陆。没有了舰队，入侵者便被切断成两半。但当年春天，占据着塞萨利亚的波斯将军马多尼乌斯还是率领着亚细亚的2.5万名步兵和5000名骑兵向南进攻。另外，他在希腊的同盟底比斯人又提供给他一支相当规模的部队，包括1.3万人的步兵和5000人的骑兵。而希腊军4万多名重装甲步兵在7000名轻装骑兵支持下，在普拉蒂亚严阵以待。几天内，双方都在谋算着占据有利位置并反复打击对方的供应线。

几天后，马多尼乌斯发动了一次倾力出动的全面进攻，但他那支被斯巴达重装甲步兵击溃的军队已不可能继续获得战斗初期的意外胜利，溃退中仅有3000人幸存下来。

10年以后，大流士王之子薛西斯对希腊发起第二次入侵。在此之前，他必须除掉由地米斯托克利领导的一支驻雅典的希腊盟军舰队。波斯人侦察到此舰队被困于雅典萨拉米斯岛之间的狭窄海峡。于是，黑夜之前，他们封锁了海峡入口。第二天，当波斯主力进入东部海峡的狭部时，遭到了由雅典及其同盟伯罗奔尼撒、埃伊纳、迈加拉和萨罗尼科斯湾各城市组成的联合海军的有力痛击。进攻失败，波斯军也被困于海峡的狭窄海域之内，无法施展其数量优势。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他们失去战船200艘，而希腊人仅损失战船40艘。







波斯人致力于对土地的完全征服，而且他们对希腊人的挑战很明显地表现在许多方面：兵力、海员、战术、防御、撤军、诡计、谋略、统率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必需的，而且相当迫切。一夜之间，波斯人进入了希腊战争的最重大行动之中。

在温泉关（前480年）发生的一次保卫北方边疆通路的战斗中，波斯军漂亮地消灭了一支斯巴达先遣队。他们砍下国王莱昂尼达斯的脑袋，把它钉在一根柱子上。当薛西斯通过希腊中部进入一片隔绝的雅典区域时，一支雅典人的舰队消灭了前进中的东方海军。在这种全局战争的新领域，一些希腊人不仅被迫对他们传统的作战方式进行重新定义，而且也被迫改变了他们对于城邦本身的观念。城邦不仅仅由物质的城墙组成，也不仅仅是一座卫城或农民们用篱笆圈起来的土地，终究城邦应是"人"自身。人意味着一切。各阶层居民都可以通过撤退先求逃生，以后再以复仇者的身份回来并出现在海洋和陆地上。雅典的那些保守党曾号召农民们去进行那种旧式的重装甲步兵战斗，以保卫城市本身和农村的土地制声望。这不仅仅是一种误导，简直近乎疯狂，雅典人因此而把他们的城邦丢给入侵者，他们撤退到附近的自由地带，依靠战船组成的大墙，把波斯军从相邻的萨拉米斯岛赶了出去。不管后来反动的雅典哲学家们如何抱怨，比如说海战是"非英雄主义"的（萨拉米斯大捷的一个世纪之后，反民主的柏拉图认为雅典人的胜利使作为人的希腊人更加败坏），但是所有希腊人都知道在萨拉米斯战役中摧毁薛西斯的舰队这件事彻底消灭了波斯人的士气，并于次年春天在普拉蒂亚为那个时代的结束打了最后一仗。

佩里克莱斯被描绘成头戴科林斯式的重装甲步兵头盔的形象，但事实上，没有哪个雅典人在把军队由土地制步兵转向都市海军方面比他做得更多。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初几年，他强行撤往雅典的战略清楚表明了，这个城市的希望依赖于它在比雷埃夫斯港的海军力量，而不仅仅是雅典平原上对斯巴达入侵者一次大张旗鼓的兵力摊牌。

突然没有了舰队，公元前479年春天，波斯入侵者才发现自己的部队已被隔断。他们处在一个越来越难于防守的位置，因为大量重装甲步兵从中部和南部希腊向此集结，在雅典的维奥蒂亚边界一个叫普拉蒂亚的小村庄附近组成了一支庞大的军队用以进行最终决战。用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话说：斯巴达人的纪律和令战争"流血成河"的"多利亚矛"的威力，加上雅典人的热情和希腊全体步兵的支持（古典时期的希腊自此之后再也没有出兵去迎战数目达7万人的对手）最终击败了波斯军，并大肆屠杀逃亡中的幸存者。

波斯战争的影响

在波斯入侵和失败的余波中，正像任何社会文化大动荡之后一样，一场有意识向正常轨道回归的倾向在希腊战争中开始了。虽然我们重新听到一些城邦之间由于边界之争又以旧日的方式发生了一系列步兵战争：如迪佩亚之战（公元471年）、塔纳格拉之战、伊努普塔之战（公元457年）及科罗里西之战（公元447年），都是像过去那样一小时就结束了的战争，但波斯战争的经历却像投入池塘的石子，在希腊重装甲步兵中激起了涟漪，对薛西斯胜利的各种教训也缓慢地波及了整个希腊城邦。新的社会现实中有两个重要现象有助于理解城邦作战时代的突然终结。

首先，战争中有两个城邦即斯巴达和雅典表现最为杰出，他们在众城邦中获得了崇高的声望。这两个城邦势力都非常强大——且正好互相对峙——都有能力无视土地制战争的古老法则。在将近20万名奴隶或耕种着美塞尼亚和拉哥尼亚土地的契约奴的供养下，斯巴达每年派进战场的士兵都是职业化的重装甲步兵，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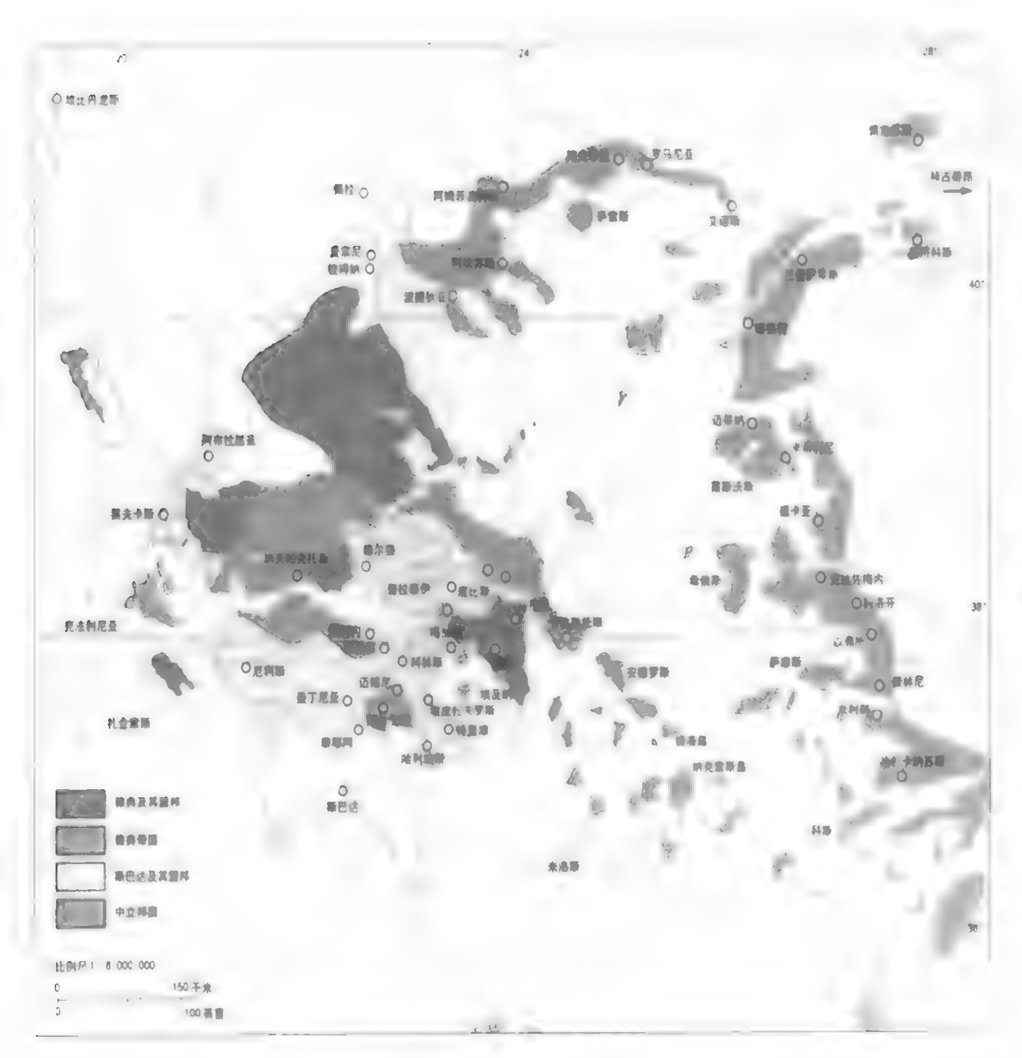
们不必被自由农业加于自耕农身上的束缚所限制。有一次，斯巴达王阿耶西劳斯让伯罗奔尼撒的联军战士按各自的职业站起来——他们当中有陶工、铁匠、木工、泥瓦匠及其它所有行业的人们。到最后，只剩小部分斯巴达人仍然坐着，他们就是那些除了参加作战之外什么也不干的人。"你们看，男子汉们，"阿耶西劳斯嘲讽说，"我们派到战场上的真正战士比你们要多多少！"普卢塔赫的记载也表明斯巴达人善于自我吹嘘："不必考虑战场，单看我们本身，就能知道我们可以轻松地去拥有那些土地。"

处于民主上升中的雅典人也不安于那种传统的仅由华胄披身的士兵们去愚蠢厮杀的人为的战斗。波斯撤军使雅典人警觉起来，他们开始不断地扩大舰队。由于被雅典各附属国一年一度的贡物所滋养，雅典舰队变成了对岸各希腊附属国的一个"慈祥"警察。就像斯巴达一样，帝王般的雅典也看不出有任何必要把战争仅限于一个短暂的夏日午后，或冒着丧失所有步兵的危险去保护阿提卡的那些耕地，即使她曾在薛西斯阵前成功撤退并在后来的海上反击中获得了胜利。

其次，波斯战争中的非重装甲步兵部队也成功地在希腊人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战船、轻装部队及骑兵已在许多战场和各种地形中参与作战。这再次表明：当重装甲步兵方阵面临任何不愿（很明智）与它进行正面较量的对手时，它将变得多么虚弱和不足。

27

对希腊城邦来说，问题不只在于应该调遣各种不同的分遣队加入战场，而是



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雅典拥有一个巨大的海上帝国和一些重要盟邦，这确保了它有一支令人生畏的海军及充足的兵力和丰富的资金来源。然而，斯巴达和底比斯派出了最精锐的重装甲步兵部队进入希腊，他们从南北两面将雅典包围。僵局一直持续着，直到雅典因在维奥蒂亚、伯罗奔尼撒半岛和西西里的调停失败而精疲力竭。这使斯巴达得到一支强有力的海军，它更削弱了已趋衰落的雅典海上帝国。

修昔底德是一个贵族地主、将军和历史学家，他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更深刻地看出伯罗奔尼撒战争已永远结束了希腊战争的传统程式。

如何对付使用这些部队时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社会挑战。陆军的重要地位和旧日独有的土地制战争形式——正是希腊城邦的组织形式和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向桨手、散兵或牧民们妥协了。拥有最高权力的是耕作者，而那些拥有武器的人只是平民。

因而，发生了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那场伯罗奔尼撒战争不是在一个下午的厮杀之后就决出胜负，也不是只在一个夏季之后就宣告收兵。战争持续了27年。理由很简单，雅典人把他们的乡村丢给了斯巴达入侵者，他们不肯与那些技艺非凡的斯巴达重装甲兵打阵地战。谈到那些被迫艰苦跋涉进入城内的农民重装甲步兵们，修昔底德的评论相当动情："绝大多数雅典人和他们的家人在自己的农场上过着宁静的生活，他们现在当然一点也不情愿迁往别处，因为他们在波斯入侵后的废墟上重建了自己的家园，他们已深尝了离开故土的痛苦和不幸。"

相反，一旦雅典遭到围攻，它就不断地向比雷埃夫斯港口运送食品和物资，集中全力派遣它最精良的舰队去巩固它的海上帝国，并防止伯罗奔尼撒的部队渗入进来。而在斯巴达这方面，它却尴尬地发现旧日劫掠庄稼地的战略已陷于徒劳，它在阿提卡的重装甲步兵既无法把雅典军队引诱出来作战，也无法轻易地破坏那座城市。因此，交战双方都转向爱琴海世界和小亚细亚各附属战场。在后者那些发生于公元前421～前404年的代表性战争中，雅典在复合性海上作战中讽刺性地使用了它的重装甲步兵，而斯巴达及其同盟则及时地建立了一支强大的舰队。整个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旧式战役仅发生过三次，雇佣兵、轻装散兵、海军和围攻

海军的费用

军用船只仅为极少数希腊城邦带来显著好处，如科林斯、叙拉古和科西拉等，这些城邦中的财富和革新的技术足以掌握和使用这些船只。战船可以在敌军背后载着重装甲步兵登陆，并在必要之时发起进攻或对贸易实行保护。大洋彼岸富足却疏于防卫的国家，尤其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和公元前4世纪，总是遭到袭击和掠夺，有时甚至被彻底征服，大量的财富每年以进贡的形式源源外流。然而无论是出于社会财政还是技术方面的考虑，在整个希腊战争中，海军都给步兵带来帮助。在大多数希腊城邦中，拥有土地的农民组成了声望显赫的希腊方阵，贫穷无地的士兵则被送入散兵队或投弹部队，安置在外围作战。

然而，公元前5世纪，在海军扩展过程中，一些没有财产的自由民被招募起来到海上去划商船或者战船。这些人员通常训练有素而且勇敢可靠，令人震惊的萨拉米斯大捷后的数十年中，希腊捣毁对岸波斯大帝国的无数次战斗都证实了这一点。到公元前5世纪后期，雅典一支由200艘以上的战船组成的舰队中，已拥有超过4万人的桨手。雅典贫民从海军扩建中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和稳定的收入来源，他们进而期望在城邦政治中提高自己的地位，这种不安在雅典终于演化为激进的民主形

波斯人入侵前，地米斯托克利精心建设了雅典舰队，而且说服不情愿的希腊人把所有船只下注在萨拉米斯和希腊本岛之间狭窄海域上一次决定性的战斗之中。经他改进的这支舰队全部由无地贫民组成，既无重装甲步兵也无城市贵族，但当它逐渐流行并大受欢迎时，绝大多数雅典人才渐渐意识到：它挽救了民主，改变了雅典社会的进程，而且为雅典海上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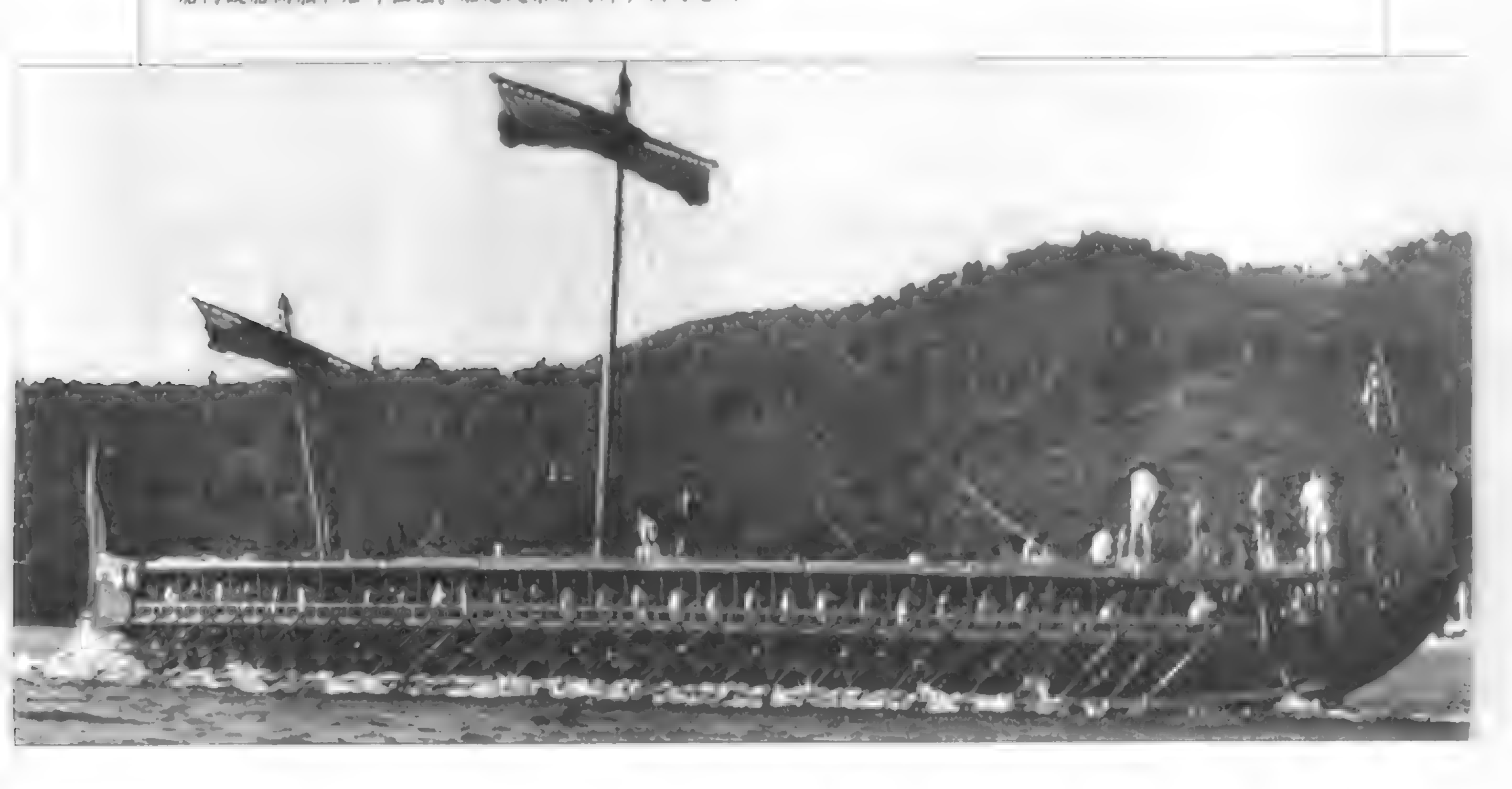
器械师填补了往日的空白。各方面的部队都花费了巨额的代价——对双方来说都是灾难性的——然而，任何一支部队都不可能单靠自身在战场上对敌人的一次打击或羞辱而终止战争。

战略问题变得非常突出，因为雅典人居然对斯巴达领土做出了互相矛盾的侦察。最悲惨的是在西西里岛的叙拉古战役（公元前415～前413年）发生之前，他们已在1000英里之外的屡次失败中丧失了整支由4万人组成的远征军。修昔底德概述了希腊那次彻底的军事灭绝经历，他写道："所有的雅典人在所有地区都遭到

式：废除财产限制，保证贫民和无地的水手也拥有广泛的公民权。但保守主义的哲学家们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对这种公民权的泛滥极为不满，他们把希腊海军对波斯人的萨拉米斯大捷看成是人心浮动、文化堕落和步兵士气败坏的开端。

希腊舰队军费极其高昂，完全超出了土地制对土地花费的限制。军饷的发放、战船的持续保养以及船坞的建设都要求希腊海军找到新的收入来源，为自身的存在寻找到正当的理由。然而，商业活动与城邦土地制形成基础天生对立，几乎没有哪个城邦能承受供养海军的巨大负担。经过漫长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和[illegible]以及雅典帝国的灭亡，再也没有一个城邦去考虑什么大规模的舰队，因为装备战船不像装备公民，它需要政府来负担，这便意味着政府即将侵入传统公民的个人世界

古希腊战船（这里是一个20世纪的复制结构：奥林匹亚斯号）的巨大威力来源于船上互相垂直的三列桨手，约有170人。它相当轻快，时速可达10海里，能够如箭一般节节射出。战船由经验丰富的老兵领航，船头装有金属撞角，当战船突入敌阵时它能发挥出真正巨大的威力。桨手能用自己手中的船桨卷下敌船上的桨，并能使船向敌船侧舷和后部猛撞。船总是紧靠海岸，因为它们简易的船帆和脆弱的船舵在狂暴的海风中摇撼，使船没法立稳。船员们吃住都在岸上，休战时他们把底部平滑的船和滑车拖到岸上晾干。古时每一次海战都在陆地视力所见的范围内发生，步兵们等候在岸上为他们水手的胜利呐喊欢呼，并时刻准备着去把他们从水中救上来或者去倾倒的敌船上砍杀敌人。



了痛击，他们遭受了一切巨大的苦难，他们遭到了歼灭。就像俗语所说的那样，他们的舰队遭到彻底消灭，还有他们的陆军——一切都不复存在。许多人中只有那么可怜的几个返回家乡。”斯巴达方面则更实事求是更系统化地派兵加强防守阿提卡，以迫使雅典军队弃城逃亡，并进而摧毁当地贸易。他们还向雅典进贡的爱琴海各盟国稳定地施加压力以刺激它们，因为它们是该城资金和军用储备的补给来源。

难怪30年后即公元前404年战争结束时，雅典国力耗竭，精疲力尽，而斯巴达和她的同盟也不再有任何资格继续控制希腊霸权。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余烬之中，旧日城邦间土地制上的厮杀终结了。现在，战争意味着在新的水平上和更广泛意义上的冲突，它花费更高，伤亡也更大了。

进入4世纪

对用步兵队伍相互厮杀的爱好在下一个世纪并未被完全遗忘。尽管现代学者们做了许多努力以探询公元前4世纪重装甲步兵方阵的战术演化情况——后备、声东击西、谋略——但方阵内部战士互相残杀的情况的确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就像在奈迈阿（公元前394年）、科罗里亚（公元前394年）、留克特拉（公元前371年）及曼丁尼亚（公元前362年）发生在重装甲步兵“恐龙”之间的反击战所证实的那样。的确，甚至是留克特拉战役（公元前371年）中的一名重装甲步兵，若置身于300年前由他祖先们所创造的海锡亚战斗行列中时，也依然会倍感亲切——因为在武器、战斗方式以及作战态度方面彼此都很相似。对于科罗里亚第二次战役中斯巴达和底比斯重装甲步兵之间那种恐怖的旧式战斗，当时的目击者色诺芬（下面将看到）明确批判了它对固定模式的因循：“他们挑起冲突，进攻、战斗、厮杀，然后死去。”

改变了形式而且改变很剧烈的不是战役，而是战争。今天的战争由散兵侦察、高地防守、有目标的袭击、海上进攻包围战以及反堡垒战组成。对抢夺战利品和捕获俘虏的热衷也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即战争已经开始作为城邦资本的来源和城邦预算中的一个项目。这种混乱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一旦希腊重新进入公元前5世纪～前4世纪主要地中海国家的行列，它那奇妙的错谬物城邦——由一个享受特权的三位一体的阶层所统治：小有财产的粮食生产者／重装甲步兵／法律制定者——就成为一个封闭的体系，它不肯接纳非土地财富及天才的外国人和那些拥有土地的士兵方阵之外的作战者，但“妖怪”现在跑出了瓶外：作为土地制城邦保护机制的西方战争，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远比以往更复杂也更具杀伤力的阶段，一个已跳出了社会的限制但仍然由希腊人革新和迅速回应的由天才人物所推动的阶段。

色诺芬：战略理论的开端

西方作战实践的优势来源于它自身的某些传统：自由的言论、不羁的调查、持续的论争、相对自由的政府检查和宗教机构。独立的军事科学遗产来自希腊。

公元前7～前5世纪的土地重装甲步兵观念越来越窒息军事上的革新能力，但公元前5世纪下半期，战争变得更加复杂，而成千上万屠杀“俘虏”的科学逐渐成为希腊智力方面的主流传统。伯罗奔尼撒战争余波中旧的土地制城邦的腐败，使另一种从新型部队和新型技术的出现成为可能——它们都从貌似虔诚的农业结构中解脱了出来。后勤学、露营法、围攻术以及对夺来的土地实行永久占有和管理，成了希腊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公元前5世纪后期，希腊人的智力热情被那些纯粹教学法和实用主义的哲学家及雄辩家们所支配。他们致力于把辩证法、语言学、归纳推理等理论具体应用于实践性主题之中：如农业、药物学、自然科学和政治等——当然还有战争。军事研究也成为这种系统化、理性化学习方法的一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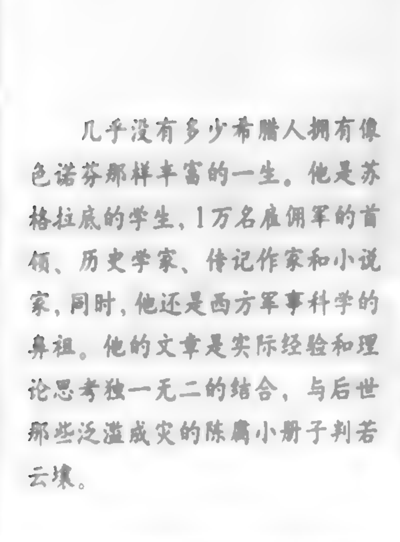
色诺芬（公元前428～前354年）是哲学教学与战场经验相结合的典范。就某种意义上讲，他是作为西方军事智力传统的奠基人屹立在历史之中的。作为一名身经百战的老兵和苏格拉底的追随者，色诺芬写了很多小册子，像《骑兵指挥官》、《关于骑兵》等。而且，在他的《苏格拉底回忆录》、《经济论》和《居鲁士的教育》中，他还讨论了许多关于指挥术、战术和谋略等方面的问题。

道德因素贯穿于他的全部作品中，他对当时希腊发动战争做了隐晦的批评，并提出了最初的有时过于激进的改革建议。色诺芬本人并未被公众广泛了解，但他的作品清楚表达了他对城邦领袖和职业雇佣军领袖们的愤怒之情。

色诺芬的同时代人，更为实用主义的战术学家埃涅阿斯（公元前360年）也留下了他的作品。他的《军事准备》一书是一部传统巨著，已经散失。但幸存的一章《如何在围攻下生存》，囊括了关于如何有效利用雇佣军、如何组织突围，以及如何制定和实施撤退计划等从最日常（口令、起床号、密码、隧道、火信）到更广泛的问题。

不幸的是，几乎所有后来的军事思想家们都只留传下了一个名字。他们拥有无数用来对付方阵、弹道、防御工事以及围攻术的非常实用的方法，但都遗失了。无论如何，他们毕竟为代代相传的实用性军事研究奠定了雏形。

到罗马时代和欧洲中世纪时期，更多迂腐的军事理论作者追随而上。对这些人来说，古希腊文本和他们能弄到的拉丁文抄本是他们关于作战计划和组织最经常的个人体验。而且，只有在他们学院的一些大部头著作中才能寻到大部分初期希腊著作的一点踪迹。



几乎没有多少希腊人拥有像色诺芬那样丰富的一生。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1万名雇佣军的首领、历史学家、传记作家和小说家，同时，他还是西方军事科学的鼻祖。他的文章是实际经验和理论思考独一无二的结合，与后世那些泛滥成灾的陈腐小册子判若云壤。

公民战士与诸神及英雄

重装甲步兵作战的独特性在许多象征物、雕像及繁琐的装饰艺术中都被大量强调。几乎每个希腊寺庙都隐晦地以神话形式表现着希腊的方阵作战。门顶雕塑、壁缘饰带以及供奉塑像中的半神半人或奥林匹亚诸神等都是以类似于重装甲步兵的形象出现。制陶艺术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花瓶上几乎很少描绘弓箭手或桨手。史诗中几乎所有的英雄角色都被演绎成传统的重装甲步兵形象，尽管它们允许夸张化的裸体。同时，市场和店铺中也有一些场面令人潸然泪下，如马拉松大捷的画面就勾起了顾客对雅典步兵卓越风采的无限回忆。

重装甲步兵在潘海勒尼克的一些圣殿中也反复出现像奥林匹亚、德尔斐、伊斯米亚和奈迈阿等神殿。在那些地方，大多数还愿时用的供物都是步兵的武器和甲胄，甚至乡间的一次漫步也能使你看到古代战争遗留下来的战利品，它们被杰出地表现在来自被俘重装甲步兵的武器雕像之中。另外，几乎所有葬礼演说辞都是针对步兵特性的，甚至在所有城邦中最具民主精神且最靠近海洋的雅典，演说家们也常常通过隐喻或含蓄的暗示把牺牲的城邦战士——骑兵、散兵、桨手——改变成殉国的重装甲步兵形象。另外，悲喜剧通常都注重描绘方阵和重装甲步兵的战斗，而一切其它形式的战斗都遭到贬抑。

结果便是每当希腊市民购物、献祭、瞻仰公众纪念碑或信手拿起一件小玩物时，每当他参加一个集会或坐到剧院的长椅上时，那些无所不在的文字或图片信息便开始对他进行轮番轰炸，毫不间断地提醒他：是步兵方阵，而不是骑兵，不是舰队，也不是乌合的散兵保卫了希腊城邦。于是，重装甲步兵作战的独特"规矩"和与之伴随的土地制模式，几乎未曾面临希腊城邦有地无地公民的任何诘问，共同走过了漫长的三个世纪。

这只小枭(雅典的一种夜娥——这里看到的画面来自一只5世纪的茶杯)的面部形象类似重装甲步兵的头盔，它被认为是戴着羽毛的雅典娜的化身。雅典娜是希腊城堡、军营和城邦的保护神，也是智慧女神，但她却被塑造成人的形象，手执一块狰狞可怖的重装甲步兵的盾牌，佩戴着毒蛇项圈，它似乎随时准备张开口来咬人。

阿喀琉斯和埃贾克斯（上图）是8世纪史诗中的两个英雄，出现在一个6世纪花瓶上，看起来他们就像当时的重装甲步兵战士。德尔斐的西弗尼亚斯财政部有一条壁缘饰带（下图），表现的内容是阿波罗、阿特米斯和阿里斯正与颤抖的垂死巨人们交战。他们好像与6世纪希腊方阵中的重装甲步兵安全一样，虽然他们来自遥远的神话。

第二章 从古希腊方阵到古罗马军团

日趋衰弱的希腊各城邦勇敢努力——但更经常悲剧性地告终——综合新的作战方法，即使那些方法与旧日成熟的重装甲步兵战斗和土地战争的传统仪规完全相反。虽然政治领袖们还在缅怀着那古老的方式，但却必须面对新的军事现实。4世纪时，演说家德摩斯梯尼警告他那些自满的听众说："没有任何东西比军事艺术方面的革命和改进更加频繁，我从过去的时代知道了这一点。""斯巴达人就像任何其他人一样，宁愿在炎热的夏天花上四五个月的时间拖着他们的重装甲步兵和城市民团去侵占和掠夺敌邦的领土，然后再返回本地。他们是如此落伍——或者说如此善良的公民——以致他们从来也不知道用钱去向别人买好处。但他们的战斗是公平的，而且光明磊落。"

如今，社会地位已基本上与战场分离开来。不管是富裕的、一般的，还是贫穷的希腊人都可能去骑马、掷枪或弄矛，他们可能是在雇佣杀手，也可能是不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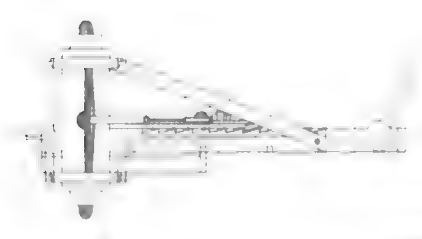
情愿的民团民兵。“农民＝步兵”这样一个等式消失了。色诺芬在他的《方式与方法》中抱怨说，在雅典，方阵由于太多地招募城市外来居民进入他们的步兵队伍而正在失去它往日的尊荣。他忠告说：“如果我们的公民自己彼此依靠、互相扶持，而不再与那些组成外来人口大部分的吕底亚人、弗里吉亚人、叙利亚人和各种野蛮人混杂在一起，城邦也会更得益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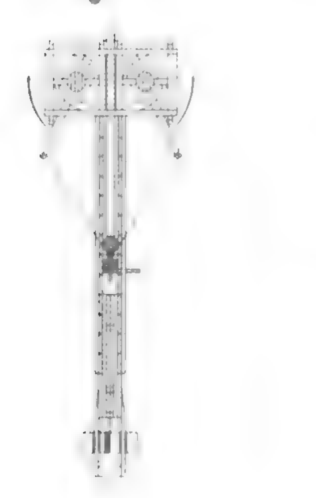
在公元4世纪这个扩张的、英勇的新时代，希腊战争的主要问题是军费开支。扭转弹弩、雇佣散兵、常备海军、娴熟的弓箭手、投石兵、环索兵和各种情况下应付各种军事挑战的能力，这一切都需要经费。而另一面，地中海地区各战场的大冲突逐步发展至每年一次，这又必然使希腊军费的最重要来源税收——货品、农业、农村的平静时代——继续走向崩溃。

战争变得过分昂贵

于是，许多城邦发现它们自己正处于两难之境：他们既不能听凭自己的领土被骚扰被掠夺，又无力支付一支常备军队以保障城邦的安宁。色诺芬看到，纷争

曼丁尼亚平原是最后几次真正的重装甲步兵的战场（前362年）。在这个平原上居住着两个小小的敌邦：泰耶阿和曼丁尼亚，但是它理想的地形和介于阿尔戈斯、斯巴达两个敌对城邦之间的重要战略地位，使这里成为古代数次大型战役争夺的焦点





非扭捻型及后来的扭捻型投石器(像这个，约在公元前270年发明)可能配有各种速度和射程都非常惊人的弹丸，然而，由于防御工事为了对付大炮的威力而被建筑得越来越紧固，造价也越来越昂贵，这些投石器的作用便只是使战争变得更加复杂。

城邦之间的复杂化的战争对大多数城邦的国库来说，已变得过于昂贵，所以，交战有时更要求注重实效而不仅仅是讲究一种英雄主义姿态："也许有人会问我"，他沉思道，"即使一个城邦受了冤屈，她也得和侵略者和平苟安吗？不，当然不是，但我说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不去先开罪激怒他人的话，那么我们与敌人面对时将会有更好的运气。"

在那场并非决定性的曼丁尼亚战役（公元前362年发生于底比斯和斯巴达人之间）之后，重装甲步兵很少去打那种意义重大的阵地战——那时的方阵交战甚至已不再能够决定战争的最后输赢。的确，曼丁尼亚战役中斯巴达和底比斯重装甲步兵的最后对垒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色诺芬在他希腊历史一书的末尾评论道，战争结束后，"双方都未变得更富有或额外得到半点儿领土或占领一个城邦，影响也并未稍微扩大。事实上，战争之后，希腊内部的混乱无序比以往更甚"。毕竟，一旦脱去身上保护着它的土地制仪规，希腊方阵自身的战术问题就完全暴露出来：追击中显然过于笨重的装备，很不适于去摧毁战场上种类越来越多的敌方部队。如果说方阵作战不再能获得决定性成果，那么城邦所雇的其它军种却能够做到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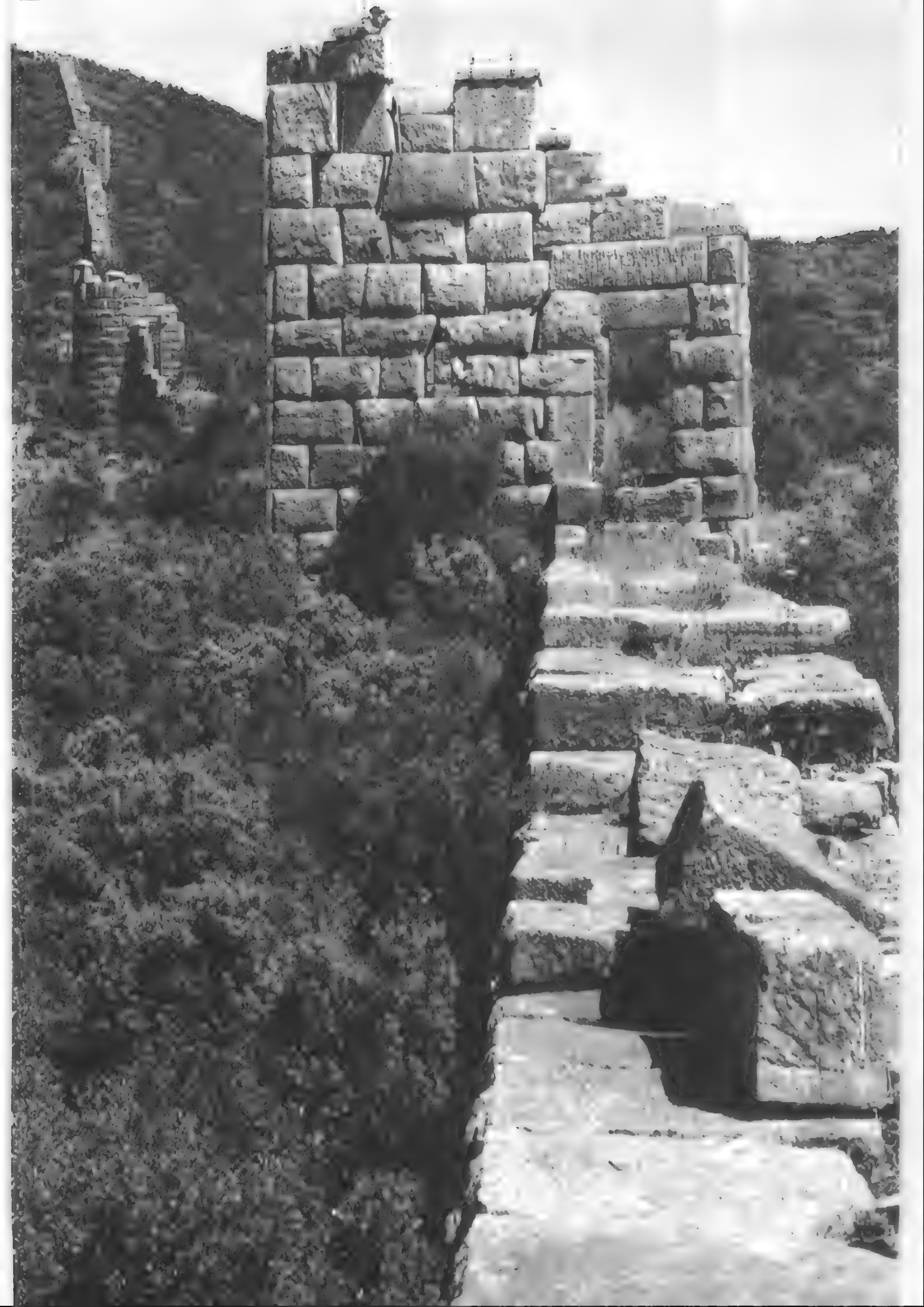
于是，旧日循规蹈矩的战争方式被那些勇敢骄傲的雇佣军首领和巡回雇佣军以及无视希腊城邦作战程式的冒险者们创造的方式所取代。伊索克拉底是公元前4世纪的一位雅典演说家，他抱怨他的同胞们不再从那些业余政治家中选举军事首领，却转向那些靠不住的职业政客。"那些在许多重要问题上能使我们甘心顺从他建议的人物，我们并不把他选为我们的将领，就好像我们不信任他们的智力似的；但对于不管出于自己还是城邦利益都没人去理睬的那些人，我们却赋予他无上的权威，把他推举上战场。"各主要交战国——雅典、斯巴达、底比斯、阿尔戈斯、科林斯、色萨利和西西里——用尽了各种手段，如雇佣同盟、反同盟、诡计、阴谋等，以维持4世纪上半期以来已被摧垮但依然艰难存在着的力量平衡，同时忧心忡忡地关注着北方马其顿所带来的新威胁。

方阵新设计

对页图：公元前370年左右，在伯罗奔尼撒的梅西纳建造了一座5英里长的防御工事，目的是保护这个刚从其宿敌斯巴达政权下独立出来的城市。如此广阔的范围内常常围有未开发的土地，难民们可来此寻找住所和饲养牲畜的牧场。这种精巧的设计和倾注其上的巨额投资使防卫者有一种沾沾自喜的安全感，他们因此而认为根本不必冒险越过固若金汤的城墙去那边战场上与敌人拼命。

很不幸，希腊各城邦所面临的马其顿王菲利浦二世既不是一个迂腐的重装甲步兵的战争领袖，更不是一个狡猾有余却力量不足、只够建立或掠取短短几年希腊霸权的强盗。相反，二十多年以来（公元前359～前338年），菲利浦极为谨慎也极其隐秘地精心建设了一支庞大的新式军队，它在军队的补给、领导和组织方面都迥异于过去希腊式的做法。

在他纪律严格的职业"步兵同盟"——据当时评论说是"所有马其顿人中规模最大、力量最强的"——之外，菲利浦又加上了"骑兵同盟"（"高等妓女"），这是把守坚固山头的一支杰出的贵族重装骑兵。另一支装备可能较轻一些的步兵分遣队"持盾兵同盟"（轻步兵中的持盾兵）紧靠着方阵占据了马其顿阵列的中心位置。持盾兵通常是紧随于骑兵强攻之后的第一批步兵队伍，因此它在初期的骑兵进攻和接下来的方阵交战之间起着关键的纽带作用。职业化的轻装步兵、投石兵、弓箭手和投枪手等，使整个复合性军事团体达到了极完满的境地，它能够发动高



在马其顿方阵内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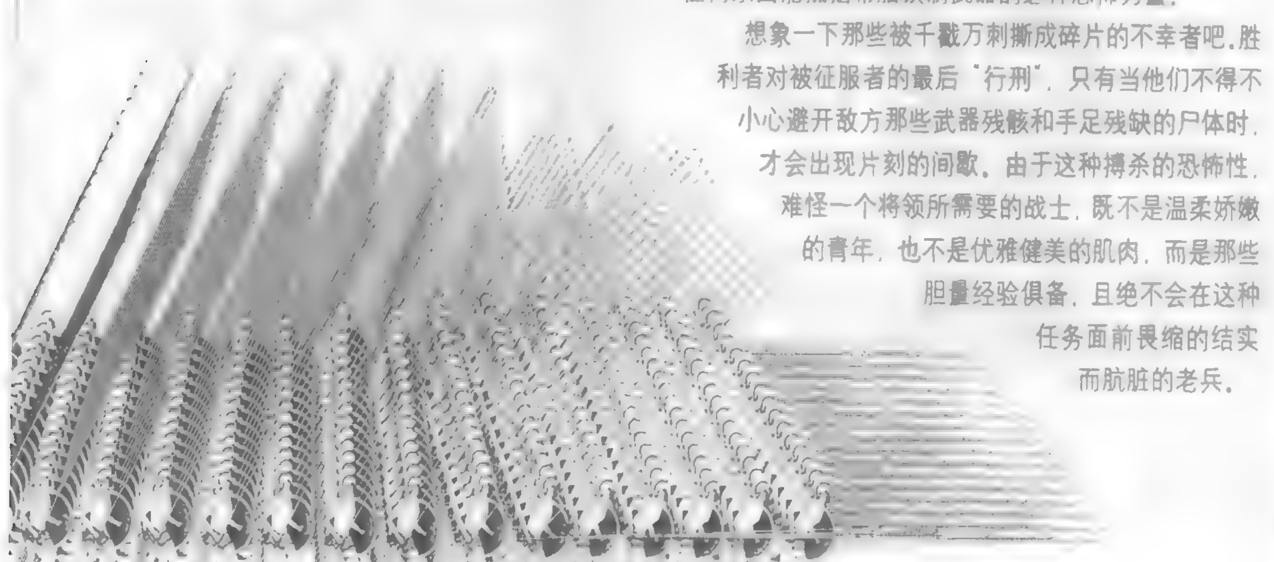
马其顿人的盾直径不过两尺，比古希腊重装甲步兵的要小一尺。盾悬于颈部，这就使步兵们能够用两只手去控制巨大的矛，并且彼此的身体能紧靠在一起。通常在方阵行列中，每个战士拥有三尺见方的空间来施展武器，标准纵深是8人或16人。古希腊重装甲步兵的累赘装备在互相保护上大费心思，但马其顿人却是为了进攻的目的而对装备严加选择：士兵生存的关键不是他们的装备(大小和重量已有相当程度的减轻)，也不是他们后方的同伴，而是是否安全地呆在任何敌人也休想突破的巨大矛阵中。马其顿方阵比它的古希腊"前辈"更易被攻破，但进攻的威力却远远凌厉于前者。

阵中前五列矛枪在初期的交战中都与敌军直接交锋，无数支矛互相撞击，组成一堵矛的墙，鱼叉般地攻向敌人并且——像鬃毛那样——将敌人的进攻有力地反弹回去。后面和中间的人也不空闲，它们举起盾挡住射来的弓箭，用枪托上的尖顶把敌人刺翻在地，并用肩膀向前推进到前排士兵阵中。后方士兵在作战时，无数支摇动着的枪托也会在混乱中对敌人造成不可避免的伤害。而战阵的前方，正如利维在写作时所讲到的那样，每个罗马人都被逼处于十支矛尖的攻击之下，作为靶子的敌方士兵对那些矛尖来说简直是"供不应求"。因此，每个士兵端平自己的矛，在来回刺杀中寻找到最关键的空间就变得至关重要。进攻者应该努力在无数矛尖的缝隙之中找到一个楔子。如果矛太重，向前推进时敌人阻力太大，几分钟之内就会精疲力尽。很少——如果有的话——有士兵去想他实际刺中了谁，刺中了多少敌人，能前进就是成功，而失败则将伴随着恐惧心理加深所引起的弥漫全阵的麻痹和反应迟钝而降临。

如果第一阵列的持矛士兵败下阵去，如果敌人持剑突入方阵内部，或者情况更坏，他们已从方阵较空虚的一侧冲进来，那么，灾难就降临了，他们必死无疑。辅助性的武器匕首——正像矛长得愚蠢一样——它也短得荒谬，几乎不能给马其顿士兵提供任何安全保护，而持矛士兵本身也无法转过身来抵抗已攻至近身处的敌人。但对方阵来说，不光彩地弃矛后逃只能使已打开的缺口变得更大。同时，一个身体紧压另一个身体时，这种屈辱的逃跑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一旦进入方阵内部，敌人便开始持剑进行大肆杀戮。他们割开那些方阵士兵的腹部或腹股沟处，切下进入圈套的魂飞魄散者的四肢，直到整个方阵分崩溃散，血尸遍地。有的士兵已被切腹取肠，却仍试图抓紧他们的武器。方阵士兵很少能听到终止前进的命令，归根结底，他们的作战行动主要依据于接触、感觉、来自敌人的压力程度，同时还有呐喊声和阵中流传的谣言。因为灰尘、血泊和扭曲的尸体所组成的海洋很快便弄瞎了内部士兵的眼睛，麻痹了他们的听觉，使他们根本无法对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然而，如果勇敢的士兵们能够保持那道密不透风的矛尖之墙，同时由后面的同伴帮助他们往前推进，那么被屠杀就将是另外一方了。确实，一旦方阵顺利展开动作，长矛顺利开始了它们的进攻，那么便没有任何东西能抵挡希腊铁制武器的这种恐怖力量。

想象一下那些被千戳万刺撕成碎片的不幸者吧。胜利者对被征服者的最后"行刑"，只有当他们不得不小心避开敌方那些武器残骸和手足残缺的尸体时，才会出现片刻的间歇。由于这种搏杀的恐怖性，难怪一个将领所需要的战士，既不是温柔娇嫩的青年，也不是优雅健美的肌肉，而是那些胆量经验俱备，且绝不会在这种任务面前畏缩的结实而肮脏的老兵。



效的初步攻击并在紧急时刻提供后备支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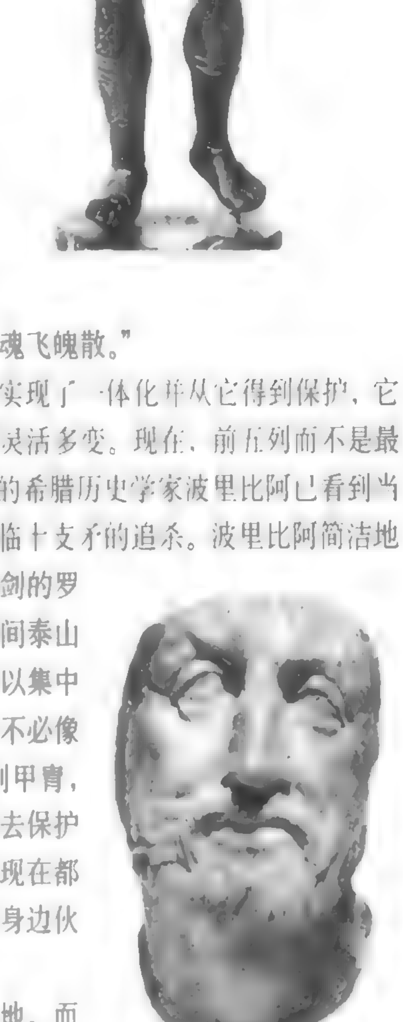
这些马其顿分遣队并非游离于整个部队之外的部分，而是武器方面多样化和复杂化的表现。他们组成一曲和谐的“交响乐”，而不是仅由职业化装备士兵组成的一串“不谐和音”。希腊式方阵在菲利浦手中彻底恢复了名誉并获得新的重要地位，但他也使方阵演变加速，脱离了土地制的根基。公元前4世纪，雅典将军伊菲克拉特斯已预见到了这种多方面的军事革新，他用传统的希腊方式把新式军队比喻成人体的各部分：轻装部队好比人手，骑兵像脚，步兵方阵恰像胸部和护胸甲，而将军则像人体中的头。

左雕像为一名马其顿步兵，甚至可能是一位将军。时间大约是公元前300年。他穿的是较轻的皮质甲胄，不像重装甲步兵显得那么累赘。他可以做更远的行军，并在方阵中操纵一种更厉害的武器——他的矛枪。在马其顿方阵前几列，士兵们用矛尖(左中图)刺穿进攻者，并迫使敌军后退。而后面几列士兵则用枪托末端(左外图)刺伤那些绕到方阵后部的敌人。

菲利浦在军队的组织和技术上都对西方军事史做出了同样重要的贡献，起初，他的马其顿方阵在装备和技术上都与古希腊城邦传统的重装甲步兵阵势没有太多的区别。例如，矛仍保持使用，不过长度增到8至14英尺，需要用两只手去驾驭和对付它。圆形盾缩小了一些，同时胫甲、绝大多数护胸甲和沉重的头饰也被皮质的或复合材料取代，也有的完全被抛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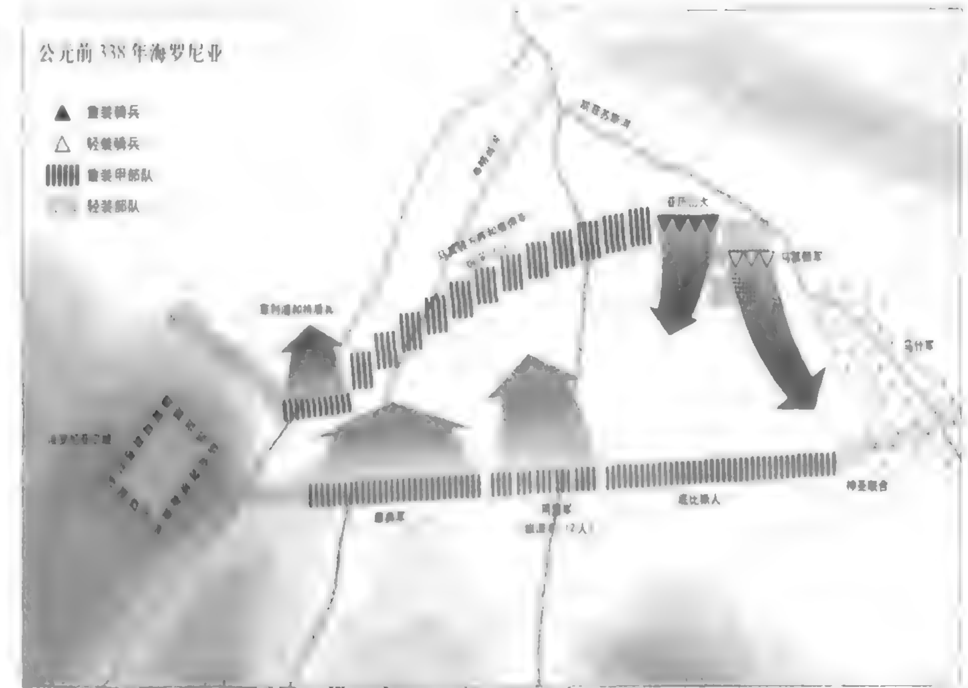
但密集型作战的中心思想仍占据着绝对优势。罗马时代的军事理论家奥纳山大评论马其顿方阵说：“华丽的装备使行进中的队伍显得危险万分，单是那可怕的景象就使敌人魂飞魄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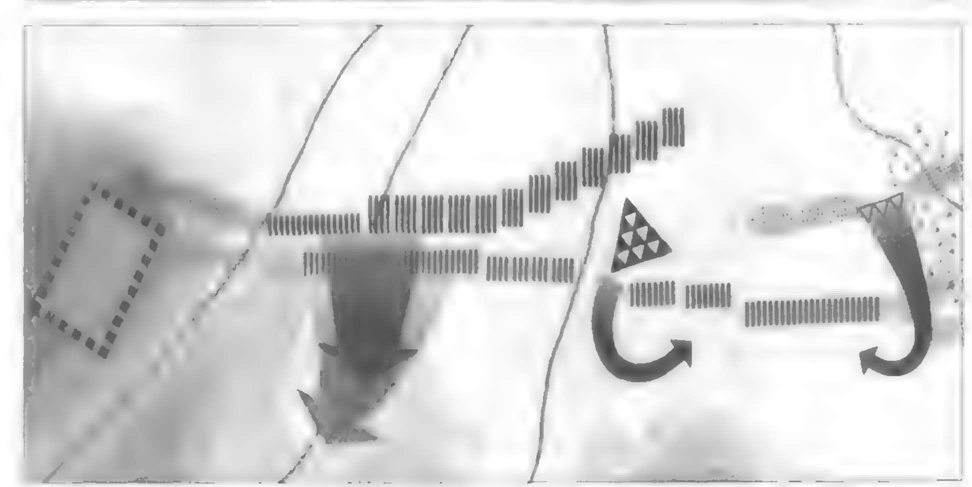
的确，由于菲利浦的持矛方阵与各类部队实现了一体化并从它得到保护，它具有了更大的威力且比传统重装甲步兵阵法更灵活多变。现在，前五列而不是最初的前三列，都能够打击敌人。公元前2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已看到当面对那种“矛的风暴”时，一个人可能同时面临十支矛的追杀。波里比阿简洁地下结论说：“没有任何东西能承受这种方阵。持剑的罗马人自己不可能砍倒一个人，也不可能冲破瞬间泰山压顶的十支矛锋。”毕竟，马其顿方阵的士兵可以集中全部的注意力去驾驭他那支令人胆寒的矛，而不必像旧日希腊重装甲步兵那样穿着沉重无比的全副甲胄，同时他也不必拿一只硕大无比的盾牌时刻考虑去保护他右边的伙伴。进攻、挥矛，各种向前的动作现在都至关重要；而防御、巨大的盾牌，以及笼罩在身边伙伴脸部的忧虑则无足轻重。



马其顿王菲利浦二世的一个小的半身象牙雕像。它发现于北部希腊维尔吉纳皇家坟墓中的一个陪葬纹章上(公元前4世纪晚期)。学者们越来越把其子亚历山大军事上的成功追溯至菲利浦早期对战术、战略及后勤管理的改造与革新上。

马其顿人的目标是不断向前进军和吞并土地，而不只是保卫他们的边界。新式的马其顿方阵有着相当





公元前338年8月2日、菲利浦二世向北进军、在北部希腊的海罗尼亚小平原上与希腊盟军遭遇。菲利浦首先进攻、尔后突然撤回。雅典军大肆追击、中心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破绽。亚历山大接到暗示率兵攻入雅典军中心并包抄雅典右翼、菲利浦于是转而重新进攻雅典军。雅典人发现右翼遇到暗算、一片恐慌。海罗尼亚于是上演了希腊重装甲步兵方阵的最终结局：被"神圣联合"所毁灭。不难看出、在耻辱中逃回雅典的狄奥西尼人的抵抗只能是徒劳了。

的准确度和杀伤力，所以，一旦目标被发现并被骑兵攻击和辅助分遣队处于挨打境地，马上就会遭到这种方阵的一阵迎头痛击。接下来，凌厉如锤子的骑兵进攻又把敌人逼回矛锋如林、坚如铁钻的长达数英里的方阵之中。

虽然这种密集的步兵队伍就像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所解释的那样，总得小心翼翼地确保自身是呆在齐整的平坦地面上，并要尽力避过沟渠、峡谷、树木、山脉以及河流等，所有这些都可能阻碍方阵的行动，并打破方阵的队形。但步兵和骑兵之间的这种和谐一致在西方战争史上标志着一次全新的飞跃，其影响远远超过了军事上最为革新的公元前4世纪时期的那些战术观念。

马其顿人制权

菲利浦也为西方战争带来一种新的战争观念。诚然，真正的两军对峙的作战仍然意味着正面的攻击并继续像古希腊方阵那样以相同的英勇精神去作战。密集的步兵奔跑厮杀、以矛尖对敌，依然是一生团结在方阵行列中的马其顿人最喜爱

的信条，但是战争越来越超越了个人的勇气、胆量和体力。

面目狰狞的马其顿人也不再为了领土的争夺而去互相厮杀，相反，战争已完全变成野心勃勃的城邦政治家精心设计的一种工具。菲利浦旨在征服和吞并的破坏主义是频繁的社会动荡和文化剧变的动因，而不是保护现存土地社会的一种保守的希腊式机制，他的士兵也是由过去的重装甲士兵脱胎而出的完全不同的战士。在描写他的喜剧作品《菲利浦》中，剧作家姆内西玛克斯对典型的马其顿方阵的士兵大肆吹嘘：

为纪念“神圣联合”英勇不屈的精神，战争结束后菲利浦允许他们在埋葬从战场带回的尸体之处，竖起一头石狮　现代的发掘者们已从这块纪念碑下挖出了254具尸体的残骸

你可知道你将与何种男人交战？
我们以利剑为餐
喝下的酒是火把正在怒燃
他们取来折断的镖作我们饭后的甜点
还有折断的矛杆
我们的枕头是护胸甲，以及盾牌，
而脚边还躺着一些环索和弓箭
我们的头顶，戴着的是弹弓编织的花冠

菲利浦对那些由自耕农重装甲步兵组织起来的希腊独立城邦的刻骨敌意众所周知。这可用来解释公元前4世纪在希腊城邦的那次保守主义的演说中关于他的描绘为何如此夸张。德摩斯梯尼把他描绘成一个瘸腿的且只有一只眼睛的怪物，“如此醉心于冒险……以致为了扩大他的帝国，在对敌厮杀中把自己弄得体无完肤”——一个时刻准备以一切手段作战的可怕超人。德摩斯梯尼警告雅典人说：

39

你们听说菲利浦势不可挡，那并非因为他率领的重装甲步兵方阵，而是因为他拥有散兵、骑兵部队、弓箭部队、雇佣兵等等，既然依靠的是这些力量，他攻击的就是一个内部互相厮杀的民族，而且，在这个民族中，由于互不信任，没有一个人公开宣布为他的祖国而战，他于是便调用大炮布置围攻，不用我再告诉你们，对菲利浦而言并没有冬夏之别，他没有一个季节会呆着不活动。

在海罗尼亚（公元前338年），菲利浦和他18岁的儿子亚历山大击溃了底比斯和雅典的方阵部队，并随之粉碎了希腊人的民族抵抗。当心不要把这一转折性的胜利仅仅归功于马其顿人优越的技术、技巧和战术的革新；使希腊人阵线的凝聚力遭到致命削弱的，是在左翼野心勃勃地发动进攻的雅典军队内部的恐慌和崩溃。当平原对面的右翼同盟底比斯人仍顽强地抵抗着亚历山大骑兵的进攻时，雅典人几乎是一窝蜂地仓惶拥过马其顿人的阵营。

与之相反，马其顿人的军纪、骑兵和步兵超常的和谐以及对战场指挥和分遣队调遣的绝对服从——而不是他们的长矛和菲利浦伪装的撤退——导致了北方人的凯旋。战争的结果是底比斯人在战场上被尽数歼灭。而他们由150对同性恋人组成的杰出部队“神圣联合”则像一只壮烈负伤的壮鹿败下阵来。后来他们被埋

于那头石狮下面（上页图）。这头石狮如今仍耸立在一条现代铁路旁边。关于在海罗尼亚的这次雅典步兵也是最后一代自由重装甲步兵的惨遭屠戮，有这样一段墓志铭痛切地说道：

时光，诉说一切故事的女神
我们所有受难之人的使者
如此努力为拯救希腊的神圣联盟
我们牺牲在著名的维奥蒂亚平原

西方迎战东方

公元前4世纪的亚历山大石棺表现了亚历山大已突入波斯阵营。这个高踞马上的国王头戴狮子皮的饰物，姿态英勇非凡。可以看出，亚历山大费尽心机想把自己装点成一个半神半人的英雄的化身。

希腊人从马拉松和普拉蒂亚战役的经验中已了解到了波斯军的不堪一击。公元前401年，居鲁士二世所属的号称"一万"的希腊雇佣军，气势汹汹地要求希腊归还波斯王位，此事再次显明了这一点，虽然在库纳沙战役中他们在雇主死去之后只好被迫撤退。公元前390年，一支斯巴达军受遣把波斯军引出小亚细亚，他们发现自己竟能够轻而易举地击败任何波斯步兵。希腊人对东方远征军的主要担忧，是波斯人从他们自己国家购买的无所不在的雇佣军。例如，当一位希腊城邦使者安条克有一次出使亚洲返回时（公元前376年），他嘲笑地说，他"看到了波斯国王的面包师、厨师、调酒师以及众多的看门人，但能与希腊人作战的典型男人，他仔细找过了，却一个也找不到"。

对东方的胜利征服铭刻在好几代希腊人的脑海中。毕竟，如果他们自己经济增长困难，或者他们对爱琴海对岸亚洲地区的帝国控制持续衰弱的话，波斯帝国的滚滚财富对希腊政治家们便具有特殊的诱惑力。但这种谋算的成功必须抛弃古希腊重装甲步兵自耕农的陈旧思想，并同时在另一方面从希腊各城邦中组织起一支完整的后勤系统和一支忠诚、团结的军队。这支军队应是社会和军事的一种融合，无论在何种地形中，无论是面临何种敌军部队，都应有获得远距离供应的能力。正由于此，公元前4世纪的斯巴达王阿耶西劳斯应后悔自己在希腊内部连年争战，却让真正的敌人波斯静享安逸，"如果我们继续去破坏那些希腊城邦，我们会发现自己错了。我们应当谨慎，确保我们仍有足够的男人去对付那些野蛮的征服者。"

菲利浦被暗杀后（公元前336年），他20岁的儿子亚历山大开始实践他父亲的入侵波斯计划。他在赫勒斯附近的格拉尼库斯取得了一次胜利（公元前334年）。虽然不存在什么典型的"亚历山大式"战争，也没有什么一定的事前谋划能解释这位将领在战术上所取得的胜利；但在对格拉尼库斯发动的第一次猛烈攻击中，亚历山大建立了一种模式，使人们看出他必将在接下来的三次战役——伊苏斯战役（公元前333年）、高加米拉战役和海达斯佩斯战役（公元前326年）——中大获全胜。

这一模式包括：（1）对当地恶劣地貌的卓越适应能力——他所有的战斗都在河岸上或靠近河边的地方进行；（2）部队的领导常使用几名令人胆寒的先驱——

希腊化时期的战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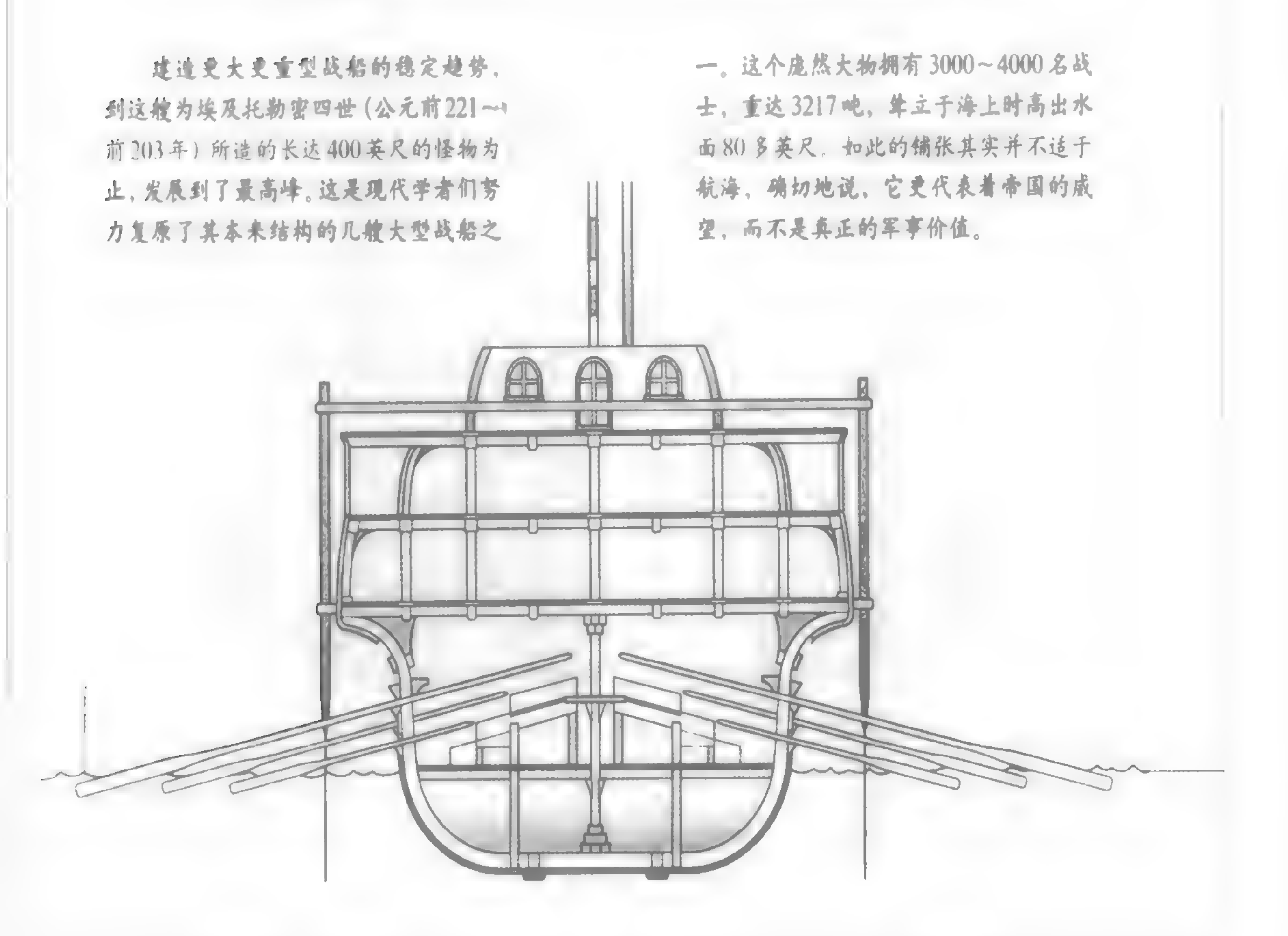
希腊化时期的军事装备和设计被夸耀和铺张之风所支配，与此同时战船规模也变得极为庞大。到公元前4世纪晚期，拥有五排桨的大战船已极为普遍。有的船甚至装有7支、8支，最多时甚至达到40支桨，往往是2至10人操作一只桨，组成2或3排划手。

但这种令人胆寒也因此而威名赫赫的无畏战舰在复合性战争中却几乎毫无价值，只有在攻击半岛要塞的临海一翼和那种发生在封闭海湾内的大规模海战中，它们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几乎是在追求这种巨型战船之风盛行的同时，一种恰好相反的追求高效的趋势也在发展。事实证明，仅有50个或更少的成对桨手所操纵的轻型战舰，即所谓的“鲨鱼”和“一个半”（既依靠船又依靠桨手，船上人员同时又是搭乘步兵），在追捕地中海海盗和保护商船时，远比那种巨型战船要灵巧和有效。

一些海运贸易中心像罗得岛等，有效地掌握了这种复合型设计，以便桨手们在情况必要之时可变成陆军士兵，在罗马之前希腊化时期的普遍僵局中，许多小岛国利用这种灵活善变的战船保护自己免于海盗骚扰或可能发生的暴君统治，并有一些小国因此而建立起了自己的自治政权。

建造更大更重型战船的稳定趋势，到这艘为埃及托勒密四世（公元前221～前203年）所造的长达400英尺的怪物为止，发展到了最高峰。这是现代学者们努力复原了其本来结构的几艘大型战船之一。这个庞然大物拥有3000～4000名战士，重达3217吨，耸立于海上时高出水面80多英尺，如此的铺张其实并不适于航海，确切地说，它更代表着帝国的威望，而不是真正的军事价值。



波斯骑兵　骑兵同盟
希腊组成的雇佣军　轻装骑兵
波斯省长们　持盾兵
弓箭手　方阵
投枪手　亚历山大

在格拉尼库斯河战役(公元前334年)中，亚历山大以他的右翼轻装部队展开攻势。波斯人转过来抵挡，但亚历山大的进攻使他们陷于混乱，与此同时亚历山大的骑兵早已计划好了整条路线。波斯军中的希腊雇佣军被甩在后面，任凭马其顿方阵和四周骑兵大肆宰割。

几乎总是自杀性的——在骑兵同盟的前面鼓舞士气；(3) 以把头昏脑胀的敌人逼到方阵矛下为目标，使用骑兵向敌阵中某一个点发动激烈的强攻；(4) 安排一支特殊的部队先以声东击西的方法迅速占领关键之地；(5) 接着在战场中追杀和消灭敌人部队。这一模式反映了亚历山大灭绝而不仅仅是打败敌军的强烈欲望。

例如在格拉尼库斯，亚历山大发现波斯军不明智地将轻骑部队置于他们的希腊雇佣军之前，他往往不顾自己部队横渡涨水河流时所必须面临的表面劣势，集中兵力去攻击敌人的左线中心。为了防止敌人恰好在他们进攻的地点集结重兵，亚历山大派出一支先遣队——自杀性的——马其顿骑兵进一步打击波斯左线。敌人下意识中做出错误判断，往左线派出加强部队，而亚历山大自己突然在格拉尼库斯出现，率重型骑兵自斜面攻上。敌军骑兵开始动摇，激烈的混战后他们慢慢让开一条路。普鲁塔赫叙述说，在那次面对面的短兵相接中，亚历山大大帝差点丧命，他那华丽的盾牌和头上白色的羽毛引来了无数射弹的攻击，一支投枪刺入了他的护胸甲，而一把战斧几乎将他的头盔劈裂。

马其顿方阵和持盾士兵迅速跟进，渡河上岸，摧毁——就像持矛军队昔日所做的那样——混乱中的敌军骑兵。由于波斯的骑兵前锋已被击溃，后面的希腊雇佣军方阵很快便为胜利的马其顿骑兵所包围，剩下的事情就是将已注定灭亡的希腊雇佣军引入向前推进的步兵之中。整支希腊雇佣军或死或降，马其顿士兵倒下的数目不到200人，而波斯人和希腊雇佣军却死去1万人，这便难怪亚历山大麾下的马其顿人——贵族、农民甚至包括许多恶棍——都情愿跟随他们的这位首领长途深入到富裕的亚细亚腹地了。

尽管这些战场杰作如此富于戏剧性，尽管亚历山大表现了他致力查清敌人兵力而不仅是调查敌人领土的重要策略，但在持续近3600天的战争中，大型战役的时间总共却不足一个星期。所以，同时记住那些很少被宣扬的围攻战以及一些小冲突和军事行动才是合理而明智的，它们同样是马其顿对亚洲文明长达十年巨大破坏的一个组成部分。亚历山大的个人勇气，包括他冲入敌军的英雄作派——几乎是自杀性的——都具有相当的欺骗性。他远非性急之人，而是一个精于算计的教练的后勤学家。他神秘地杀害了那些招募来的革新技师、称职的航信士官以及许多忠诚可靠的谋士。通过这一行动，亚历山大实际上创立了西方军事组织的主要原则，并相当系统化相当精明地解除了东方帝国的武装。

马其顿人不像早期的希腊人和当时的波斯人，他们通常自行携带供给和装备。没有长长的押送行李车、女人及牲畜的队列。“当菲利浦组织他的第一支军队时，”弗龙蒂努斯写道，“他命令任何人都不许使用马车，他只允许每个骑兵带一个仆役，但对于步兵，每十个人只许使用一个仆役，以负责搬送一些碾磨装备和绳子等。当军队夏季出征时，便勒令每个人背负30天所用给养。”通常，地方官员都被强迫提前储存粮食，以便亚历山大狡猾而敏捷的部队能够在各地之间跳来跳去。罗马时代的军事雄辩家波里亚努斯写道：菲利蒲让马其顿人背着武器，同时带着头盔、胫甲、矛、供需品以及日常用具，每天行军300斯达地（大约34英里）。没有通盘考查和稳定的食物供应，就没有战斗的胜利。以前，军用市场上许多装备都有悖于马其顿士兵关于速度、急攻和迅速休整的主要原则。马其顿军队的行军方式正与其进攻方式相互呼应。

这是公元前3世纪一个肮脏的雇佣军杀手的赤陶雕像，它很好地抓住了希腊传统对于雇佣士兵的蔑视心理。雕像充满了假面具般的戏剧式夸张，很大程度上遮蔽了真相。我们可把他想象为希腊化方阵战士的夸张形象。

有趣的是，上述后勤组织也被应用在一些无需持续行军的“久坐战”中。在马其顿的各城邦变迁或“城邦堡垒”中，官僚主义是显而易见的。亚历山大袭取了三个大城市，哈利卡纳苏斯（公元前334年）、推罗（公元前332年）和加沙（公元前332年）。这几个城市被认为几乎是不可能攻破的堡垒，但由于马其顿人掌握的工程学，由于他们的耐心以及射弹部队、海军分遣队和改良火炮的使用，它们都遭到了毁坏。相似地，为反对巴克特里亚山区的西亚人和阿富汗地区的山地居民散兵队和那些擅骑者的不断反叛，他也发动了许多小型的袭击和惩罚性的征讨。在这些战役中，他构筑了一整套的边疆要塞，马其顿重装骑兵可以从这些地方突围，甩开叛乱者，直到亚历山大用现金或效忠的许诺摆脱波斯帝国边境的那些波斯省长。这种灵活多变超出了前两个世纪中任何希腊城邦所能想象的程度——尽管75年前马其顿那支号称“一万”的部队在波斯绝望进军的惨痛情景在人们心中仍然记忆犹新。

恶魔军队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因狂饮过度而死于醉酒之中，他所继承和征服的土地被战场上和回到希腊本土的那些资历深厚的将领瓜分。忠实的老年将领像波狄卡斯、克拉特罗斯及尤门等很快地被清除出去，而另外那些幸存下来的部下取而代之，获得了分配给他们各自的势力范围。安提佩特控制了马其顿和希腊，托勒密接管埃及，安提柯占据了小亚细亚，塞琉古继承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东方直到印度的土地，利西马科斯继续保有色雷斯和黑海周围的土地。塞琉古后来在普斯战争（公元前301年）中对安提柯的胜利证明，没有任何一个手下可以完全继承亚历山大的遗产。因此，以后的整整一个半世纪，各个敌对的马其顿王国为了重建亚历山大昙花一现的大帝国，在整个希腊和亚洲世界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但全都毫无结果。

对军事历史学家们来说，“后继者”们之间的争战表现出一种不可抵抗的魅力：矛的长度增加到20英尺以上，大象也时常有规律地在战争中露面，进攻城市时使用的是所向披靡的进攻器械。波斯霸权衰落之后源源流来的财富引起了一场无可避免的军备竞赛，希腊的工艺和哲学天才也被用于新的军事科学，有组织的杀人本身便可成为一种希腊艺术形式。整个希腊化时期，从未间断的技术上的改进使防御工事和火炮变得越来越优良，但在持续的辩论中，方阵作战的适当角色却被重新定义。如当安提柯·贡那特（公元前320～前239年）被人问到该如何打击敌人时，他非常简洁地实用主义地回答：“任何看起来有用的方式。”

没有任何事物比马其顿人的方阵更令人毛骨悚然。曾于公元前168年在彼得纳遭遇过方阵士兵的罗马将军埃米鲁斯·保罗斯整整一生都陷在那种恐怖回忆之中：“他回想着当时武器林立的前线那种令人胆寒的情景，再次被带入到恐惧和震惊之中。”普鲁塔赫说：“他以前的任何所见都不能与之匹敌。”很久以后保罗斯还常常回忆起那种景象和自己对它的反应。关于马其顿人五花八门的“军需库”，任何敌人也不能够忽视其存在——轻重骑兵、轻装步兵、散兵、投石环索兵、弓箭手以及大象——这些东西对许多患有自大狂的希腊式将军来说只可能在理论中被

带上战场。但是，希腊式实战在战术及战略层面却无法摆脱它的一些固有弱点。

到公元前3世纪为止，绝大多数方阵都由雇佣兵组成，仅剩的一点衰落的土地团结意识和旧日希腊军队的激情都已消逝无踪。例如，伊庇鲁斯王皮洛士曾对他的军官们宣告说："选出你们的伟大男人吧！我要令他们勇敢无畏。"但后继者们的这些更庞大的雇佣兵队伍，已不是过去几十年中菲利浦和亚历山大那些精干的军队。现在的军队需求大量非战人员：行李运送者、器械师、妻子、孩子、奴隶和市场。如此常常过于随便地依赖后勤和社会因素，组织也缺乏效率，非战人员的草率选择既限制了大规模希腊化军队打击敌人的距离，也限制了他们的战略选择。与此同时，占领和征服土地也越来越只是个金钱的问题，而不是民族利益、勇气和当地公民爱国精神的问题，更不必提对某个人或某种观念保持忠诚了。

更重要的是，当矛的长度逐渐增加至20英尺或更多时，方阵自身也越来越难以控制——成了一个扶手椅中的战术家所做的一个困惑的噩梦。但恰恰就在笨重的马其顿步兵需要与其它部队更深的一体化时，亚历山大统治时期的骑兵"交响"传统却被忽略了。它的侧翼应更多而不是更少地借助骑兵来提供保护。

大象和当地的雇佣军骑兵队也并非解决上述问题的答案，后来的将领们简单地把已失落的亚历山大天才和购买的人力及野兽般残忍的武器相提并论。然而没有上天的恩赐，仅仅靠数量的增加只能令方阵比以前更加脆弱："马其顿结构有时几乎没有什么用处，有时则干脆完全无用。因为一个方阵士兵既不能在更小单位中作战，也不可能自身去单独作战——然而罗马结构却特别圆满。"波里比阿如此说道。

44

罗马军团中士兵的开放排列，使士兵们可以把投枪掷向一个集中点，然后再以剑和盾进攻已受伤并陷于混乱中的方阵士兵(下)。这种排列的灵活性使罗马人可随时集中或分散兵力实施进攻，而旧式方阵却是无法对敌人使用的不同手段做出应变的呆板的防御之墙。

罗马军团的起源

正在出现的罗马战争方式与纷乱混杂的希腊化作战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居于意大利半岛的埃特鲁斯坎人方阵，其结构原本借自希腊。的确，在后来的整个历史中，罗马一直保持着对方阵的迷恋。它常常将许多军团聚合起来，以达到更大的作战目的。但是赋予罗马步兵以新的决定性素质的，是它的可变性和流动性，而不是脱去盔甲、身体裸露的轻装士兵或士兵们使用的短剑及矛。波里比阿在比较罗马军团与希腊方阵时说："罗马军团适于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和为任何目的而作战。"

其实很难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去谈论"罗马军队"，毕竟，罗马军事历史已经过了近一千年的持续演变：从公元前4世纪共和国政治的一种工具到8个世纪以后的个人集权扩张主义；从意大利义勇军的核心力量到募自整个地中海地区的职业雇佣军。但是，军团的这种起源发生在公元前4到3世纪的意大利。当罗马逐渐扩展至整个意大利半岛时，它发现需要调整自己的军队以对付它北面、东面和南面的各种不同军队。此时，罗马军团的局限性便显得尤为突出了。

45

作为罗马作战范围之广泛和军团士兵经验之丰富的一个例子，利维叙述了常被谈起的公民战士斯普里乌斯·利古斯提努斯的故事。在他22年的军旅生涯中（公元前220～前168年），这位50岁的士兵、8个孩子的父亲，在希腊打击过马其顿的方阵，在西班牙作过战，后又返回希腊与埃托利亚人打仗，接着在意大利继续

雕刻上的一个罗马军团的士兵挥舞着罗马短剑(gladius)。当短剑被一名技艺精熟的军团士兵用于砍杀和进攻时，它能够发挥出巨大的威力。正常情况下，这种击杀不能刺穿铁的或青铜制成的甲胄，但切断人体的四肢却极其容易。例如，利维叙述了马其顿人与罗马这些持剑士兵遭遇时怎样被对方蹂躏。由于经常为希腊人的长矛所伤，他们在生理和心理上都被罗马人这种致人死命的短剑击溃了。利维暗示说，那简直就是一次血浴："身体被西班牙剑砍成了残废，胳臂被沿着肩膀切下来，脑袋离开了身体，脖子被完全割断，内脏裸露在外面，还有其它许多场面令人作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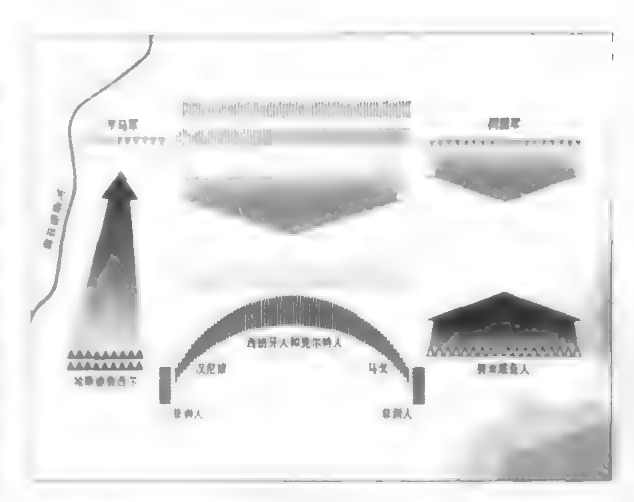
服役，然后再次前往西班牙，斯普里乌斯以利维那样富于宣泄的口气宣称说：

> 这些年来我曾四次做过意大利营的百夫长首领，三十四次因作战勇敢而受到指挥官的嘉奖，我还被授予6枚市民徽章（因为救了一个同伴的生命）

罗马方阵的阵队结构逐渐分裂成较小的战术单位，被称为中队（"小撮"）。在这种更趋迅急性和流动性的队伍中，罗马步兵放弃了矛和长的圆形盾而钟情于表面弯曲的长方形的盾和投枪，以及较短的双刃剑——"善于刺杀。它的两刃都能十分有效地切割，因为它的刀口十分坚韧"，波里比阿说。到公元前2世纪罗马人会战希腊人时，由斯普里乌斯那样的人所组成的一个军团已拥有4200名步兵和300名骑兵，这些士兵被分成由每阵10个中队组成的三条前后相继的阵列，每个中队与它相对应的中队彼此拉开，间距相当于它自身的宽度。每条阵列的10个独立作战中队——至少与敌人冲突之前——两侧和前后都有自由的活动空间。从一种组织层面上，罗马步兵以百人队为一个作战单位组织进军团，分别由一个经验丰富的百夫长率领，这个组织大约由60到70个意大利农民构成。每一个中队之中有两个百人队，一个聚集在另一个的后方。在传统的罗马阵形部署中，可以想象，那由步兵集结的矩形所构成的三条前后相继的阵列，就像一个一两英里长的跳棋盘（梅花形），每个中队都正好可以插入前条阵列的空隙处。

公元前216年的坎尼之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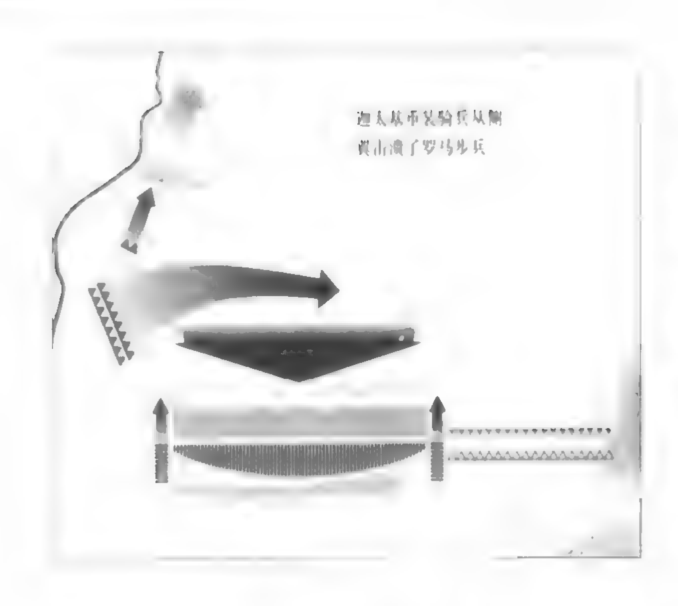
2000年来，没有哪一场战争像汉尼拔入侵意大利期间（公元前218～前203年）迦太基人所发动的那场最血腥的坎尼战役那样，在西方军事思想史上创造了一段如此令人迷醉的时期。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那些企望弄清迦太基人如何可能包围并毁灭整个敌军的军事理论家和谋略家们，对这场战役做了深入的研究。坎尼战役的魅力在于迦太基人仅仅通过一次铁锤般的打击，就对敌人予以全部歼灭。这一辉煌胜利得自汉尼拔战术的灵活多变、来自整个地中海世界各处的轻装士兵、骑兵、投弹兵，以及参差不齐的步兵，都被他机敏地成功运用。同时胜利也得自他不顾敌军数量的绝对优势而做出的打击敌军心脏的英明决定，从而使得他的两翼得以延展并吞掉了惊慌失措的罗马军队。



经过提契努斯（公元前218年）、特雷比亚（公元前218年）和特拉西梅诺湖（公元前217年等一系列不断升级的失败之后，罗马元老院在孤注一掷中试图寻找各种途径在北欧和西欧人以及当地意大利人面前剪除汉尼拔——他们重兵集结进攻汉尼拔的部队。但罗马人不知自己正面临着他们战争史上的一次最不寻常的情况，他们的对手是一位真正的战术天才，他能在短短一个下午的时间之内利用埋伏、诡计和简单的战术转换就使罗马人的数量优势和组织优势全归枉然。更糟糕的是，汉尼拔的军队对罗马军团的赫赫声望不仅不屑一顾，反而是整个古代历史中极少数乐意与西方放开一战的外邦人之一。汉尼拔希望在战场上彻底打破罗马军团，作为它羞辱罗马军队的无敌称号并逐步系统化地瓦解意大利同盟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战斗发生当天的早晨，罗马人不明智地一反往日个性——把众多中队集结在狭窄的坎尼平原上，几乎就像希腊方阵一样，并企图在这种情况下单靠他们的绝对数量优势（8万人）轻松开进迦太基人的腹心地带。经过一连串失败的打击之后，丧失了正常判断能力的罗马指挥官如此下注：庞大的罗马兵团是不会被仅有深奥的军事知识的对手巧胜的。简言之，坎尼是古代世界正常军事范例的一次凄惨的反证：现在的情况是，西方军队的数量远胜于它的敌人，依靠的又是部署虽然不太智慧但却非常野蛮的力量——而对面的非西方部队却试图以内部的协作和战略在数量远超过自己的敌人手下寻求生存。汉尼拔才华横溢，他调整了作战计划以对付罗马人的野蛮战术。在罗马人的疯狂进攻达到顶点时，他和他的兄弟马戈与不可靠的高卢人和西班牙人一起安营扎寨，希望自己的存在能够稳住这些不可靠的军队，使他们在罗马人逼近的威胁下暂时支撑，从而得到足够的时间逐步撤退。汉尼拔和其盟军的关键任务是拖延时间，让两翼的迦太基步兵和后方及侧翼呈条状分布的骑兵队对整个庞大的军团实行包围，从而在它出击敌人心脏之前就使它的前部压力得到释放。

汉尼拔的骑兵从侧翼和后方发起攻击，投弹部队同时从四面八方射出密集的弹丸，罗马人一看四周全是敌人，即刻大乱，这刚好及时拖延了罗马人的进攻。当汉尼拔用北非和欧洲的非主力军组成的那道薄墙还紧紧阻挡着潮水般涌现的罗马步兵时，封锁已很快按计划完成。



罗马前方进攻失败，军团凝聚力溃散，陷入巨大的惊慌。8万名武装极其精良的野兽被诱进圈套并被团团包围住，包围圈里的罗马军团手足无措，因为当时意大利最大的城市也没有这么多人。绝大多数罗马人和自己的同伙挤在一起，甚至连接近敌人以施展他们锋利武器的机会也没有。

那个8月中剩下来的时间里，坎尼变成了世界末日大决战的凄惨战场，直到20世纪也没有哪场战争能与它相比。5万名意大利人在一个下午的时间内被全部诱杀——每分钟被杀人数超过100——这种战果本身在后勤学上也是个大问题。我们的文字资料（阿庇安、利维、普卢塔赫、波里比阿）把那个长长的午后描绘成了一个恐怖的大屠场，从不曾有数目如此巨大的罗马人——领事、前领事、护民官（战争结束后，汉尼拔将从他们身上搜集到无数蒲士耳的金戒指）——被如此困住而毫无逃生的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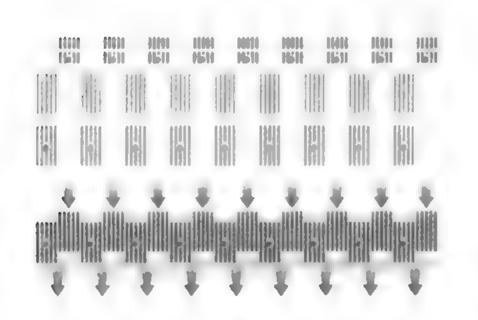
在那个夏季平原上，千千万万穿着战靴的脚掀起漫天尘烟，密集的枪林弹雨射向一片无法动弹的活靶子，军团士兵头上所饰的无数支羽毛在夏日的狂风中飘摇。难怪阿庇安描述说罗马人简直"无法看清敌人"。岂止如此，在内部受伤士兵狂乱的尖叫和外面各种陌生方言刺耳的喊叫声中，他们也不可能听清敌人的任何动静。

这场战役对罗马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了对此有一个概念，我们必须简短考虑一下战斗的事后叙述。利维说发现的尸体"头埋在地下，显然他们曾为自己挖地洞寻求逃生，但后来泥土塞满了他们的嘴，最后自己窒息而死"。但利维也记述了一些英勇的罗马战士，他们从一个死去的罗马军团士兵身体下救出一个还活着的努米底亚人，发现他的耳朵和鼻子都被那个愤怒的罗马人咬掉了。这个罗马人已失去了任何可用来作战的武器——除了自己的牙齿——加上他抵抗到死的意志。按照古代传统，胜利的军事指挥官汉尼拔彻底清查了整个战场。据说他自己对这种全然灭绝的大屠杀也感到了震惊，虽然是他亲自赐给他那些士兵们以自由，让他们去洗劫死尸并对伤残者们执行最后裁决的。8月的炎暑使他们必须立刻拆卸开正在发胀的尸体并迅速处理掉散发着臭气的腐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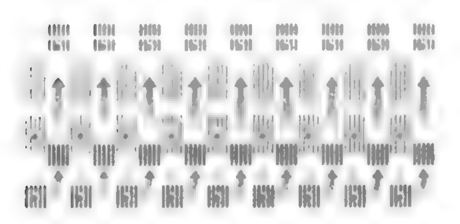
然而，所有这一切，也是汉尼拔自身大灾难临近的反光。14年后在扎马（公元前202年），另一个军事天才西皮奥，这次是个罗马人，将在迦太基人周围创造出他自己的包围圈，这一包围圈由14年前坎尼战争留下的孤儿组成，2万名迦太基人向罗马人偿还了血债。

罗马作战体系

1.轻装骑兵或散兵尽力探清敌情并搅乱敌军，然后撤回各自的阵列：第一阵列（hastati）、第二阵列（principes）和第三阵列(triarii)。



2.现在，第一阵列（hastati)后方的各百人队起身向前，插入前方百人队的缝隙之间，形成一个密不透风的整体。他们射出飞镖，并持剑举盾攻入敌阵。



3.第一阵列（hastati）再次分成前后两列独立的百人队，穿过还在前进中的第二阵列（principes），退至后部。撤退时始终从第二阵列（principes）间的空隙穿过，从而始终保持最前方的密不透风。

47

轻装骑兵　第一列阵

第三列阵　后[illegible]百人队

第二列阵　前[illegible]百人队

轻装部队和骑马者（轻装骑兵）发动最初的散兵攻击之后，第一阵列10个中队（过去被错误地称为“持矛兵”）推进到离敌人50到100码之内，然后在离敌军只有30码的时候开始向敌人发起冲锋，射出他们的镖枪。在剑和盾的掩护之下，这些士兵尾随着他们射出的飞镖闯入不知所措的敌军，在那些刚被他们击倒的敌人的口袋里疯狂地翻寻。这种最早期空中射网的恐怖程度不亚于传统重装甲步兵长矛阵的屠杀，用短剑而不再用长矛更加肆无忌惮地砍下敌人那些暴露在外的手足四肢。此时，第二阵列（“领导者”）迅速跟上。他们也可能帮助第一阵列杀进敌人阵线，或者——如果敌人实在难以对付——充当一个相对独立的后备部队，发动第二次的进攻高潮。当第一阵列的10支中队精疲力竭地退回他们自己的空隙中时，他们便以更疯狂的砍杀和更凌厉的剑锋向敌军发起第二次的进攻。

这第二阵列（“领导者”）是罗马军团中最粗野最精锐的战士，通常能击破敌阵的阵角。就算他们失败，最后一条阵列也正全副武装，剑盾在手，待在后部蹲伏静等。这磐石般的10支中队时刻关注着两侧传来的任何动静，所以有这样一句可怕的谚语：“轮到第三阵列了。”如果军团真的情形危急，被打败退下阵来的第一阵列和“领导者”在孤注一掷中也可以彼此分开，渗透进起保护作用的第三阵列之中，好像用栅栏紧密圈围起来的营地——“胜利者的憩息所，失败者的避难处”。然而，更经常的情况是，即使军团处在胜利的自豪之中，第三阵列也总是异常心动地向前推进，给那些掉队的敌人或崩溃的敌阵以最后的致命痛击。而敌人现在是“在最强烈的恐怖中发现又一群数目更大的新军突然从地里冒了出来”。就像在古希腊方阵中，看到外邦骑兵和轻装盟军突然出现并席卷整个侧翼时心中的感受那样。

适应一切情况的军队

很显然，早期罗马军团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其协作性和适应能力，而二者都来自后援兵力储备和兵力部署的快速变化。罗马步兵达到了希腊方阵所没有的高度进攻性，其雷雨般的镖枪阵令所有敌人在劫难逃，杀伤力远远优于投石环索兵的弹丸和弓箭手的箭。一旦杀进手足无措的敌阵内部，只用短剑就能使敌军方阵的作用大为削弱，如果中队在敌人冲锋的压力之下聚集起来，必须以剑锋的威力冲开敌人的坚固阵线的话，那么高高的长圆形盾又使他们能够以相似于希腊方阵的方式向前进攻，同时后面的持矛战士则使军团免于溃散。如此前后一夹击，便能彻底搅乱敌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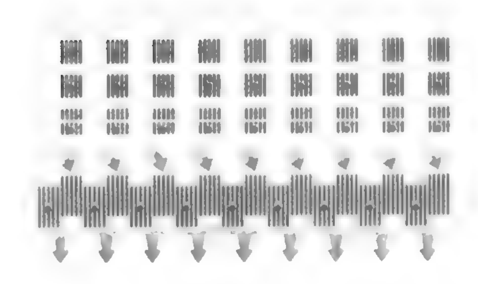
在战术层面上，一些下级军官有效地控制着时间和空间的安排。他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和训练的军事人才，能够使进攻中的三次高潮完全和谐一致，并能在情况危急之时巧妙部署军团的30个中队以取得最大的紧凑性和伸缩性。如此众多小型且具有可变性的战斗单位使真

正的联合成为可能。它们可自由选择各种不同战术：保持在中部活动，或侧面打击、佯攻、撤退以及围攻等等。在搏杀达到最高潮之时，军团的所有中队甚至可以在水平方向上并拢，同时三个阵列也可在垂直方向上连成一个整体，此时军团便变化成一种类似希腊方阵的组织。通过密集向前推进的盾牌，军团获得了更加巨大的战斗力。开阔平坦的地形对罗马军团的统一性并不像对以前的希腊方阵那样具有绝对的关键性，因为中队的战士需要绕过障碍时，可以相当容易地彼此拉开距离。实质上，对笨拙的敌军可能造成阻碍的恶劣地面环境常常更受欢迎。这样，罗马军团的武装优势和队形这种潜在的高度可变性，使它对任何一种类型的军队的战术挑战都能做出迅速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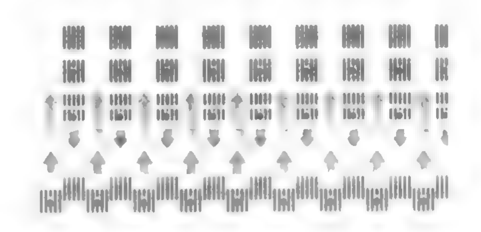
只有两种情形能够置罗马军团于死地。首先，如果军团在平坦狭窄的地形中被钳于敌人两翼山谷或峡谷中，中队不可能独立地流动作战，而只好聚成一团。身边没有用武之地，军团士兵也就失去了他的开放空间和使用优势短剑的关键能力，他们只能像以前被自己征服的方阵士兵一样，被挤压在一个漏斗里面承受敌人的重兵打击。士兵们惟有听天由命地待在各自阵列中，对前面同伙们即将到来的覆没束手无策。

同样致命的是另一种几乎完全相反的情形：没有尽头也没有树木的开阔平原。由于没有真正的重装骑兵部队，只有一些脆弱的轻装骑兵，军团便极可能被广阔得一望无际的地形所吞噬，并不断受到那些不可能抓到更遑论让军团当成靶子的游牧民族骑兵和弓箭手们的袭击和骚扰。发生于卡雷的克拉苏之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被无休止的空袭所灭绝比在一支纵队枪下被捣毁要来得慢一些，但同样都难逃厄运。

罗马军团代表了西方现存军事技术成就的完美顶点。它取用了早期希腊小型冲突和决定性大战役的作战传统，并配合以从马其顿军队继承下来的一体化和多样性的遗产。功利的罗马人找到了力量和优雅之间的奇妙平衡。由于他们无以伦比的精巧复杂的政府机构的援助，加上迅速扩大的市场经济带来的巨大资本，罗马军团被充分赋予了发动战争所需的一切条件——道路、营房、医院、武器、盔甲和补给部队、养老金、薪金、医疗部队、军官——如此纷繁精巧的作战组织，简直就像一个庞大的官僚企业。如果需要，为它而设计军团的目的是为了对付远超出意大利本土之外的挑战。最后一代罗马共和国人在他们的幻想中留下遗嘱，企望这一创造能够一直存留到500年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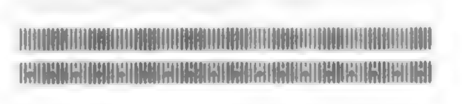


4.第二阵列（principes）后排的百人队以和先前第一阵列（hastati）同样的方式向前移动。加入前排百人队，恰在第一阵列散开的那一时刻形成又一条固若金汤的前线。这样，军团士兵便毫无延误地马上组织起了进攻的第二次浪潮。



5.第二阵列（principes）若疲倦，则他们也按次穿过前进中的第三列持矛士兵退至后排。这些持矛战士们此时已合并成了第三条阵线以保证战斗继续进行而毫不松懈。至此，敌人已暴露在三条战线之下，连续承受了镖、剑、矛的轮番打击。

48



6.现在，第三阵列（triarii）已消灭了敌人，保护部队逐步撤退。假若敌人实在特别顽强，那它也许又开始了第二轮三重阵列的进攻。请注意，百人队能根据敌军部队的性质自由合拢或者散开。

49

第三章　罗马战争方式

50

着实令人难以置信，公元3世纪，罗马同时向东对希腊和马其顿，向西向南对迦太基扩张它巨大的商业和军事势力，超出了现今突尼斯的腓尼基殖民地。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前261年，为争夺西西里；公元前218～前201年，为争夺意大利和西班牙；公元前149～前146年，为争夺迦太基本土）是对地中海中心地区的一次争夺。这三次战争对迦太基的凄惨破坏达到了顶点。罗马优势的军事组织和基础设施在所有这些交锋中一再显示出："只要在意大利内部或附近战场作战，那些组成罗马军团的小自耕农就能克服糟糕的指挥和贫乏的战术赢得战争的胜利，即使是在他们重要战役失利的情况下。

一支地中海部队的出现

然而，公元前2世纪晚期至公元前1世纪早期，罗马军队面临着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海外扩张超出了传统军事力量所能承受的限度。北面西面对日耳曼民族（西姆布赖人和安布隆人，公元前113～前102年），南面对非洲努米底亚的茹格沙（公元前112～前106年），东面对黑海地区米特拉达悌（公元前96～前82年）的不停征战，要求罗马要么重建共和国军团，要么就中止在所有那些地区的进一步插入。罗马的战争如今已经跨越了整个地中海地区，时间上也跨越整个年度。经过夏天的一系列战斗之后，军团士兵几乎不可能返回自己的家乡和土地，防守、壁垒、要塞、港口及整条战线都要求永久驻扎的职业军队。他们必须掌握战场作战之外的各种技术，比如修筑工事、围攻术和地方管治等。历史学家塔西佗后来评论公元1世纪早期罗马军团在日耳曼前线的活动说："他们抱怨工作太艰难，尤其是建筑壁垒、开挖战壕、喂养战马、收集木材和柴火，以及所有其它必要或令人终日劳碌的营地劳动。"

军团常被召到各省去修建一些没有什么意义的基础设施。对于他们在埃及的永久驻军后来的活动，4世纪一个不知名的罗马历史学家发现："在埃及各城市的许多方面，还可看见由普罗伯斯国王的军事劳动力修建的各种公共设施……他们建设了桥梁、寺院、门廊和长方形教堂。所有这一切都是士兵们的劳动。他们还疏浚河口，排干大量沼泽，把它们改造成良田。既然罗马士兵需要承担职业杀人者、建筑工人及专门卫兵的多重角色，他们就需要更高级的训练和组织。简言之，到后期共和时代为止，延续了数世纪的整个罗马军事传统——业余自耕农义勇兵自备武装和盔甲，按区域组织起来，由地方军官率领——这一切都完全不够了。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国内的小自耕农在遥远的战场上饱尝了离乡之苦，然而罗马在海外的不断吞并——这也是军团士兵自己劳动的成果——导致大量的非土地资本如奴隶、金钱、粮食以及奢侈品等源源流入意大利。但这些战利品通常

51

自然归属那些本来已够富裕的元老院元老和骑兵队将领身上。他们越来越多地投资于那些更大规模、更专门化并常常是位于海外的不动产——即如今已由罗马执政官控制并由大量奴隶工作的声望显赫的意大利贵族领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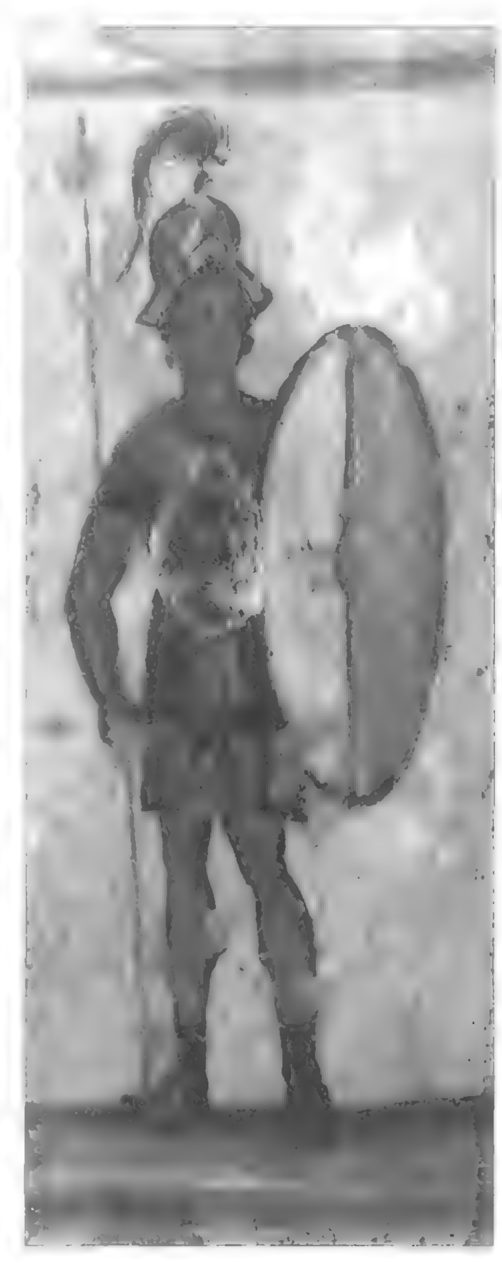
由于这种循环的因果关系，产生了利用外来资本的集体农业（大农庄），它导致意大利乡村的人口逐渐下降——而凭借强大人力资源保证罗马海外利益的旧式罗马军队正是以这些人口作为补充的基础。公元2世纪的一个罗马历史学家阿庇安对于共和国后期的这种两难处境做出了精彩而准确的描绘。他说：

富人们越来越占有了未分配土地的更大部分，岁月的流逝使他们越来越大胆地相信所有这一切永不会失去——一半通过劝诱或者说服之后再购买，一半通过强迫，他们吞并了相邻一带土地和贫穷邻居的小块菜地，并开始使用奴隶作为农夫或牧人，不仅种植庄园，而且种植更广大的土地，以免自由劳动力被征入军队。同时，对这些奴隶的所有权使他们获得了成倍增加的劳力，因为这些奴隶和他们的子孙后代都不必去服兵役。这样，某些权势人物便变得极端富有，整个国家产生出大量的奴隶劳动者。与此同时，意大利自由人口却在数量和力量上都减小了。贫穷、税收和兵役沉重地压迫着他们。如果有的小自耕农犯了罪却被准予缓刑，他们便只能无所事事地打发时间，因为富人霸占了土地，他们只雇佣奴隶种地却不要自由民。

这种内在矛盾有点像公元前4世纪希腊城邦成熟时期所面临的情况。那时，地中海地区的一个突出的侧面也暴露了一些传统希腊观念的局限性：公民只限于当地自耕农，发动战争只依靠拥有土地的义勇兵团所组成的数目庞大的步兵。诚然，向职业军团和一个吸收各民族的大型城市国家转变，是罗马大帝国复杂的经济和军事体系将得以成功运行的先决条件，但完全能预料，它也导致了农业罗马岛国的终结和罗马一切军事传统和市民传统的发端。从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这一社会—军事困境自始至终都反复困扰着西方：海外流动部队的成功总会导致国内稳固社会秩序的理想政治前景面临困难，甚至遭到破坏。

罗马军事中自耕农义勇步兵向职业军团的最后过渡，在罗马将军盖尤斯·马里乌斯（公元前157~前86年）一生的经历中得到了极好阐释。在北非的茹格沙追击战（公元前107~前105年）中，马里乌斯显然回避了罗马步兵部队财产拥有权的问题，而且由于需要更大数量的兵力，他还使用政府支出来装备他的军团士兵。他还使为期16年，而不是无限期的兵役制逐步制度化。这样，罗马公民的征募就将在很大程度上与地位或财富分离，就像希腊化时期的军队一样，以此保证罗马军队拥有巨大的潜在兵力，并使部队在生计和退役保障上仅仰赖于政府。因此，职业化的军团士兵表面看来是欢迎而并非不屑于军团在海外连年不休"工作"的。维吉提乌斯记述说，现如今征兵只要这样的人："他拥有警觉的眼睛、高昂的头、宽阔的胸膛、强健的

亚历山大的后继者们派出的军队在组织和装备上越来越遵循罗马军队的模式。这幅来自小亚细亚西部的公元前2世纪的墓画，描绘的是一个在埃及托勒密二世军中服役的安纳托利亚雇佣军。他戴着青铜头盔、身穿鳞状甲胄、手持埃及国王托勒密军队中使用的盾（thureos）。所有这些，反映出地中海地区试图在一切可能的方面赶超优势的罗马武器和军事组织的倾向。



52

53

肩膀、有力的胳膊、修长的手指、平坦适中的腹部、窄窄的臀部、以及坚硬而不肥胖的锁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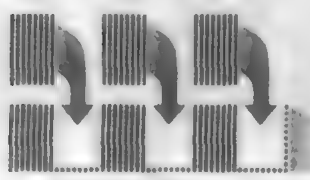
但是马里乌斯在提早结束罗马业余民团的土地制传统中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职业军队恰似后来几个世纪所证实的那样，可能很容易将对国家的效忠转向某一位将军个人。这个将军率领他们作战，发给他们薪金，为他们提供装备，准许他们抢劫，以及（最重要的）保证他们退役后的生活津贴。和平时期军团迅速解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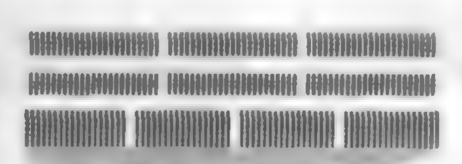
大队的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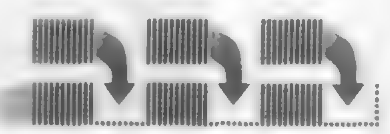
两个百人队组成一个第一阵列的中队

经马里乌斯的改革之后，大队取代中队成为罗马军团主要的战术单元和组织单位。在尤利斯·恺撒的早期部队关于高卢战役（公元前58年）的作战计划中，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组织上的“弹性”意识。四个军团（约2万人）组成罗马主力部队，2000名西班牙和高卢骑兵在两翼从侧面打击敌人，另外还有2000~3000名轻装散兵和投掷部队在前线进攻。军团一个紧挨着一个整齐地排列，每个军团都以现在已熟悉的三重进攻阵列组成。军团前部有四个大队，其百人队纵深为8人，中部和后方各三个大队，百人队纵深为6人。两个8人深的百人队背靠背形成一个中队。三个这样的中队组成一个军团大队。所有的大队都以投枪、短剑和长盾统一武装。这时，旧式的第三阵列（triarii）实质上已作为一种独一无二的军队消失了。指挥官现在领导的是一支庞大的统一军队（每大队480人），这个军队可以部署成熟悉的三重阵列，也可以根据地形或敌兵的性质，以指挥官本人认为需要的任何方式来安排队列。

两个较小的百人阵组成一个第二或第三阵列的中队


三个中队组成一个第一阵列的大队


由数个大队排成的三条阵列组成一个军团


每三个中队组成一个位于第二或第三阵列的大队

骑兵　四个军团　骑兵

散兵　投石兵　弓箭手

对增长的大批罗马人来说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回到土地上去劳动，相反，它意味着都市失业的幽灵重现，意味着注定的贫困和一无所有，而且他们连一个共同的乡村背景都不具备，更何谈为保护意大利领土而效忠呢？军团的凝聚力仅仅是工作本身——并与之伴随着的更卑鄙的追求金钱、名誉和冒险乐趣的欲望。塞维留·亚历山大大帝在他的推测中对后期罗马军团士兵的思想意识进行了总结："你不必害怕那个士兵，即使他衣着华丽，武器精良，脚上套着结实的靴子，腹部隆起，鼓鼓囊囊的腰带中还别着一些别的玩艺儿。"

没有任何人比盖尤斯·马里乌斯（公元前157～前86年）更迅速地改变了罗马军队的面貌。他取消了士兵的财产权，以大队为单位重组军团，改进了后勤管理和军事控制制度，并使军队职业化为一支效忠其将领甚于效忠其国家的永久性工具。这些激进的变革措施，一方面加速了罗马对地中海地区的吞并，另一方面却造成了巨大的负担：税收、对政治的不断干预，加上一支臃肿的危险的雇佣军队。这一军事和政治间的危机绝不可能得到解决，它最终导致了罗马社会自身的衰弱。

为了应付各种地形和地貌环境所提出的挑战，马里乌斯也发起了一系列后勤学和战术方面的改革。虽然这从严格意义上讲已显得有点迟到。军团大队（通常由480人组成）逐渐演化为军团基本的战术单元，而军团现在也大部分限制在10个大队的规模，共包括4800名士兵。过去的军团大队不过是由3个中队拼成的松散组织，每个中队虽然都从那个"三重进攻阵列"中抽出来相对独立，但却彼此不分离。然而，经马里乌斯的改革之后，大队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一个自足的小型军团，一个真正的作战组织，而不只是征兵登记册中一个堂而皇之的大标题。大队的三个中队从前后左右合并起来，因此可作为单一整体作战：旧时的第一阵列、第二阵列和后面的第三阵列各抽出一个中队组合成一个新的大队。于是，独立的大队而不是中队便重新组成了新型的"三重进攻阵列"：前面四个大队，中间和后面各三个大队。

有了这种新建的大队，军团的10个（不是以前的30个）作战单元都非常强大并富于灵活性。他们可以更好地集中兵力打击敌人阵营中的特定部位，同时，军队改革又确保它具备了更大的伸缩性。一个罗马将领不必在整个军团中都遵循三重进攻程序（容易被预知），相反他可以把进攻加以分化，率领一些大队转到两翼或后方。在那儿，大队自己也同样可以发动他们的分期进攻。军团指挥官现在可有更充足

来自特拉金军队中的一幕：部队搭乘着一艘战船。公元前3世纪60年代以前，罗马几乎没有什么航海作战的经验，而当它开始建设海军的时候，它并不是要掌握希腊传统中复杂的调兵技术和船只作战技术，它的战船只是海运步兵的一块跳板。它模仿了古希腊手划战船的传统并进行了一定的革新。这种小型的快速战船（"大乌鸦"）其实是一架带钩的起重机，有24只足，通过一个滑轮，它能被提起、旋转或降下。如此，罗马步兵可以轻松穿过敌船的阻碍。后来，船上有了一些加固的防御设施和一个鱼叉形的虎爪钩，这虎爪钩从船上一个投石器发射出来，可抓住敌船并死死将其缠住。罗马海军成功的关键，是修造了大量的战船并成功地组织起熟练而能干的船员

由于罗马军团具备很强的灵活性和组织性、又有新的商业阶层作为靠山，因此在公元前1世纪和公元1世纪这两个世纪中，罗马几乎在所有战场上都大获全胜。东方和南方那些拥有更发达文明、更悠久历史的帝国遇到了西方和北方基本还未开化的野蛮的欧洲强敌的进攻，并不得不屈服于这一强敌残酷的殖民统治之下

的信心了，因为这种独立作战部队不会再像过去的小中队那样，有一击之下就可能被分割歼灭。

随着这种军事上的日趋成熟，马里乌斯试图在各个方面使职业军团走向标准化。士兵们（现在得到一个绰号——“马里乌斯的骡子”）得自己携带武器，就像[54]两个多世纪以前的菲利浦的马其顿方阵士兵一样，士兵每天行军好几英里而无需任何食物补充和行李托运上的帮助。更重要的是：散兵（轻装步兵散兵：由各种低劣武器装备起来的罗马穷人）得到了标准化武器并被纳入军团正规装备的行列；任何非军团的轻装部队和投掷部队如今在需要的时候都可以被组成特别联盟。在这种合[55]并和统一中，第三阵列也舍弃了长矛而自己配以标准化的剑和投枪。马里乌斯把连接投枪枪柄和铁制枪头的一颗铆钉用木钉取代，使它的军事效能大大增加。因为现在一旦投枪失落地上或击中目标后，它便很容易被折断或者没法再用，这样能防止敌人抢到这些武器并把它们反掷回来。公元1世纪的历史学家瓦莱里乌斯·马克西姆斯认为，马里乌斯首先发明了一种具有长期使用价值的武器处置技巧：

在他以前没有任何将领做过这样的事，惟有他把那些战斗家们从盖犹斯·奥里利乌斯·斯考鲁斯的学校中召集而来并把一种更为精巧的关于如何躲避进攻和打击敌人的方法引进军团。他也因此创造出了技巧和勇气的完美结合，二者相得益彰——勇气补充技巧，技巧则教导勇气如何保护它自身。

马里乌斯更具象征性的举动是他重建了罗马军队的旗标，废除了以前各种带有强烈土地色彩的旗标，如狼、马、猪及一种人头牛身的怪物等，而统一以雄鹰的图案代替，尽管这面旗帜应代表罗马军队所有兵种的改革。因此，换句话说，马里乌斯巩固了新型军团的雇佣军性质，而削弱了它对土地的依赖性。

雇佣军队的兴起

苏拉是朱格达战争中马里乌斯手下的一个下级军官。为了最终结束那场针对那些反对罗马联盟的意大利城邦而发起的所谓的社交战争，苏拉和他的老上级（现在却是冤家）再次联合起来。他现在已得到罗马公民的一切正当权利，享有同等的机会加入罗马军队。罗马越来越多地把职业军团分配给将军个人掌管以备向国外调遣，如此，那些因战争成功所获得的声望使苏拉成为一位富有影响的人物并得到一支数千人的军队，这支军队效忠于他本人而不是罗马政府的元老院。从公元前88年至公元前78年——他死去那年——的十年间，苏拉的铁蹄一步步蹂躏了希腊和小亚细亚的绝大部分地区，并率领着他的六支军团进军罗马，以摧毁国内不满传统贵族特权的气焰嚣张的反对派。

最终结果是（当然这既归功于马里乌斯，也得感谢苏拉）：到公元前1世纪70年代时，罗马军队已彻底完成了职业化并牢固地嵌入国内政治之中，这种可怕的结合在后来的500年内基本保持不变。然而这一转型在军事上的益处和明显不足，都在后来一系列罗马统治受到的挑战之中暴露出来，它们是：由塞托留领导的西班牙军团叛乱（公元前180～前172年）；由斯巴达克率领的奴隶起义（公元前73～前71年），以及要求制定特别法规的自由海盗的活动（公元前67年）；同时还有亚洲米特拉达梯发起的新进攻（公元前74～前63年）以及对高卢（公元前58～前51年）的最后征服。

无论在哪一个战场上，罗马熟练的军事本领——实质上就是军团的职业化、训练有素和广泛部署——都胜过一切据数量优势且拥有巧妙战术，以及广泛部署在复杂地形中的敌军。惟有克拉苏向波斯人不幸的愚昧进军悲惨地结束于卡雷（公元前53年）。克拉苏的灾难如此惨重，也许直到公元9年在日耳曼森林中瓦鲁斯军团的大屠杀才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在公元前1世纪几乎从未停息的战争中，罗马战士无论与谁作战，无论是训练有素的角斗士、发动叛乱的军团士兵、海外雇佣军、东方的方

苏拉（左）（死于公元前79年），庞培（中）、（死于公元前48年）和恺撒（右）、（死于公元前44年）都极具讽刺性地蔑视共和政府，并对调遣全心效忠于自己的军团的能力有一种绝对的自信。由于他们三人都对军团的装备和战略战术上的改进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且事实证明他们是战争利益的天才管理者，因此他们成为后世地方海盗效法的偶像。这些海盗同样地收买雇佣军团、藐视帝国指令、迫使罗马接受他们所要求的权益。无数罗马人直接或间接因这三位大将的军团而死，其数量之大甚至超过罗马全部海外战争中所死去的人

阵，或是北欧部落的非正规军，其结果几乎总是相同：罗马军团在战场上取得最后胜利，敌军被大批屠杀，天才的对手遭到彻底消灭。然而矛盾的是，由于罗马战士的高超技能和顽强精神而增加的军团声望及丰厚的战利品，在这几十年间却并未使共和政府得以巩固，更不用说给个体的军团士兵带来什么好处了。相反，将军们本身像麦特鲁斯、卢库鲁斯、庞培、尤利乌斯·恺撒和克拉苏等人却利用其地方指挥权攫取了大量国家资本，从而收买越来越多的私人军队，保证了他们个人权力的进一步巩固。

所有这些大公们之所以更为成功，完全是因为他们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更有勇气去彻底颠覆一切公共服役制度中遗留下来的共和国观念，这种才能和勇气促使他们对军事命令和国外资本的使用进行检查，罗马连续三个世纪的国外进军因而在公元前1世纪时达到了颠峰。这时的罗马已具备了一套完整的军事装备，它既粉碎了国内的，同时也摧毁了国外的反对派。在吞并了地中海的绝大多数国家之后，军团开始转而回来吞食恰恰产生出了军团自身的那套组织。

从公元前49年恺撒横越鲁比肯开始，接下来的20年中军团之间的争战几乎从未休止。尽管在高卢那些艰苦的战争中（公元前58～前51年），恺撒的老兵们表现得最为成熟老练（如果不是最具有生气的话），但要在恺撒、庞培和他们各自的后继者所率领的军队中探寻出实质上的军事优势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尽管恺撒手下身经百战的军官和军团士兵在一系列辉煌的步兵作战中立下了赫赫军功：希腊的法塞勒斯之战（公元前48年击败庞培），安纳托利亚的泽拉之战（公元前47年，当恺撒战胜米特拉达悌之子法纳西斯的时候宣称“我来，我看到，我征服”的地方），突尼斯的萨索斯之战（公元前46年，战胜了已死的庞培将军的那些昔日部下），以及蒙达之战（公元前45年发生于西班牙，扫清了庞培同党的最后抵抗），然而恺撒的胜利仅仅是暂时的：公元前44年，这个独裁者遭到暗杀，庞培幸存的子孙和恺撒的继承人之间开始了一代又一代循环不休的刺杀活动，直到最后屋大维取得最后胜利，并于公元前27年僭取了第一个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恺撒”的称号。

57

国内战争取得胜利的核心通常在于后勤组织、兵员补充和政治宣传，而归根结底其关键在于掌握最雄厚的资本储备。从这个意义上看，屋大维比他同时代的其他任何篡权者都更深地意识到心理因素有多么重要。在意大利，屋大维竭力维护传统的罗马价值观念（绝大部分已丢失），并竭力把对手描绘成罗马秩序的敌人和里通外国企图暗中削弱意大利政府的丑恶奸细。这非常重要，屋大维看到了这一点。这样做的结果是罗马的贵族阶级，尤其是商业新贵族对屋大维所坚持的实用主义表示欢迎并向他提供支持。他的同党也清楚地明白，在由许多贪婪暴君所组成的那种良莠不齐的万神殿里，屋大维是最成功的，他别具一格地巩固了他的财政支持集团，召集起他的军队，并且抹掉了共和主义的最后一缕痕迹。

战争中的官僚政治

即位之初，无数军事问题包围着新上任的奥古斯都，这些问题远超过20年战争的屠杀和它所带来的财政困难。乖戾的罗马军队需要在一个核心的控制下进行重组并由政府基金提供常规支付，但是此前整整一个世纪中，将军们发现把军团

统率权让给政府就意味着他们个人野心的终结。因此，奥古斯都名义上把权力给予经选举重新组建起来的元老院，实际上却从他们手中攫取了执政权、裁判权和地方指挥权。军团现在宣誓效忠的其实是奥古斯都个人，但在表面上却表示效忠罗马政府，军事、政治问题因而缓和下来，但它绝未真正解决。这些明天的海盗仍将杀出他们通往罗马的道路，仍将努力拿到政府的“委任状”，然后在军团中所做的个人誓言的保护下染指政府国库以支付他们的部队供给。

奥古斯都·恺撒（公元前63年～公元14年），尤利乌斯·恺撒的养子，他消灭了任何恢复共和制的企图，成为第一个罗马皇帝（公元前27年～公元14年）。这位军团统帅的雕像至今仍矗立在罗马的集会广场上。雕像极好地抓住了罗马威严的帝国风度和罗马帝国政治军事之间不可分割的结合。奥古斯都之后，罗马政府的所有领袖都以对军队的控制程度来作为衡量自己权势的标准

历史学家迪奥·卡修斯（公元230年）描述了这种新型体制最终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公元193年佩尔蒂纳克斯皇帝死去那天：

> 发生了一件最耻辱的交易，它实在与罗马帝国的身份不相配，因为那里简直就是一个市场或拍卖场，罗马城市和整个罗马帝国都被当众拍卖了。卖方是杀害了他们皇帝的那些人，而买方则是萨尔匹西昂努斯和胡里亚努斯。每个士兵的价格被抬至2万塞斯特斯……胡里亚努斯最后不再是一点一点地抬高价码，而是一次抬高5000塞斯特斯，他高声宣布并以指头将价目打出，不然的话，很可能萨尔匹西昂努斯将是先出此价的人。士兵们被这个诱人的出价所诱惑，同时他们惧怕萨尔匹西昂努斯可能向佩尔蒂纳克斯施暴——一个由胡里亚努斯放进他们心中的想法——于是选择了胡里亚努斯，推他为皇帝。

迪奥·卡修斯继续说，这种对军团如此荒唐的贿赂，意味着军团永远不可能在眼前已得到的利益下满足。在奥古斯都的统治下，罗马各省的巨大资源加上法庭和内阁的专制体系很快便保护罗马从国内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重取军事霸权。其后两个世纪，各省的长期驻军约有25至30个军团，士兵约为12.5～15万，还有一支由骑兵、轻装部队、非常规步兵组成的约为35～37.5万的军队支持他们。这样，由国家所支付的士兵总数便可能已达到50万。在从苏格兰直到叙利亚的广大地区，这些士兵穿着相同样式的制服，以相同的方式行军，而且保护着相同样式的城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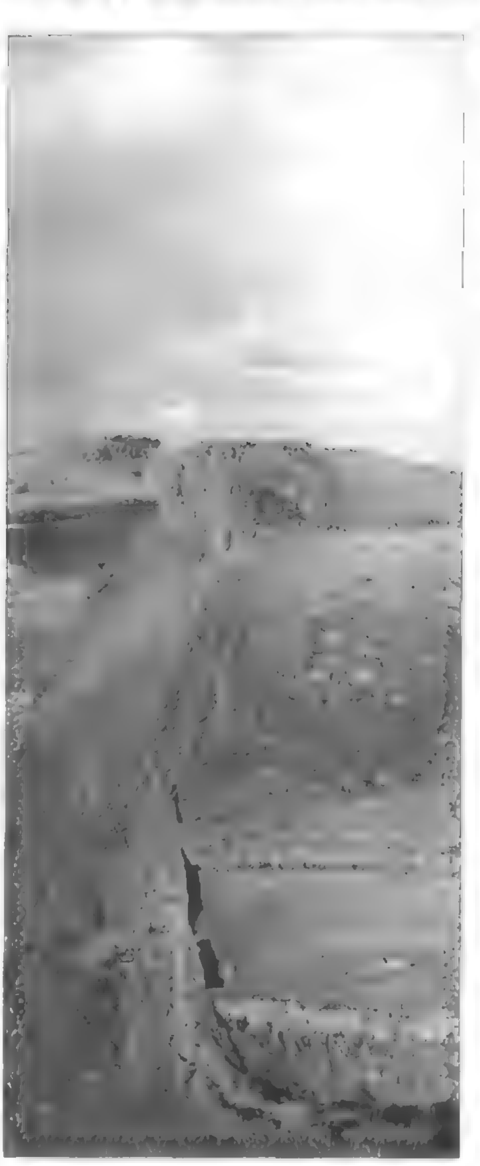
然而，所有这一切使军团充当了一种新的暧昧角色，它与过去军队干预政治的问题大不相同。在北方，他们控制了直到莱茵河和多瑙河的大部分地区，在东方吞并了犹地亚（公元6年）并与波斯人签定协约，在西方与西班牙和高卢媾和并在下列颠初步建立了统治。把埃及正式合并为帝国的一个省确保了其北非海岸，罗马的向外扩张到此终止。这样，军团尤其是东部军团便逐渐从过去三个世纪以来的一群侵略性的斗士，转变成为一股庞大而费用高昂的政治力量。例如在安蒂奥奇，罗马雄辩家弗龙托抱怨士兵们如今“每天把时间打发在给演员们的喝彩当中，他们更经常地泡在附近

客栈而不是呆在部队。战马由于无人照料而杂毛丛生，而它们的主人却把自己的每根毛拔得干干净净，很少看见哪一个士兵有毛茸茸的腿和胳膊。"由于部队长驻军营而很少行军作战，不可避免的恶果便是士气低落，这些带着许多非官方家属的军团士兵介入地方行政并常常巧取豪夺。据说哈德良有一次为军团的这一困境做出了简短的结论："缺乏活力是它的致命伤。"有时一些皇家士兵的来信，也反映出地方军团的社交能力更甚于它的作战能力。

胡里亚努斯致他父亲西本努斯的信，3月26日（公元107年）：我在这里的一切事情都很顺利，感谢萨拉皮斯，我舒舒服服地呆在这里。虽然别人成天忙于堆石头等许多任务，但目前为止我还未受过一点儿这类的苦。我让省长克劳迪乌斯·塞维留委任我担任了一个政府职员的职务。

边疆军团

由于帝国规模太大，地方主义迅速抬头：罗马的职业化部队本来就像一个多元化整体，但越来越多的地方军团完全不关心意大利和帝国的其他地区，所以他们只在当地居民中招募官兵而且只追求他们周围地区的稳定。这种做法足以解释为什么后来的革命叛乱通常都发生在边疆地区，为什么几个世纪中罗马一直不能创建一个大型的中心预备队以宏观配置整个帝国的资源并有效反对单一化的地区独立。



在帝国辽阔疆域的一个最偏远的边境，哈德良的城墙曲折穿过北英格兰73.5英里的地区，成为罗马不很稳固地占领过不列颠的一个历史证据。但公元120年之后，哈德良皇帝修建的这座防御工事抵御了北方凯尔特部落的袭击，保持了罗马帝国的安定。这道墙一直被派兵驻守并处于良好的修补之下，直到4世纪晚期。

尽管常规驻军的官僚主义和军队的政治化越来越甚，尽管对地方上其他罗马人一见之下就被杀掉的担忧越来越深，尽管要求偿付薪金和退役的呼声越来越强硬，但军团本身在帝国建立的头三个世纪却保持着战场上的辉煌胜利。约瑟夫斯——公元前1世纪犹太裔罗马历史学家——在一篇有名的常被别人引用的评论文章中论述罗马战场的优势时说：

一个人只要看一眼罗马军队，就会明白帝国之所以掌握在他们手中是因其刚勇而非幸运的恩赐。因为他们从不是等到战争爆发才去练习使用武器，也不会在和平的日子闲散地坐着而只到必要之时才让自己行动起来。相反，他们看起来好像生下时手中就握着武器；他们

从不会停止训练或坐等紧急情况突然来临……若有人说他们的演习就像无血的战争，那么也可以说，他们的战争就像流血的演习。这绝对没错。

近四百年后即5世纪时，罗马一本军事组织手册的作者维吉提乌斯仍然认为，良好的训练和基本功乃是罗马军队成功作战的根基："胜利的获得不只靠数量优势或内在的勇气，而更靠技巧和训练。我们很清楚，罗马人征服世界受惠于他们的军事训练、军营纪律以及战斗的实践。"

如此技艺精良的军队如何迎接罗马边境上的广泛挑战？罗马边防的战略是什么？到公元5世纪以来近五百年期间，罗马帝国对边境国家和民族的政策又是什么？一些历史学家仅把罗马帝国反对外来攻击的不断的军备竞赛看成是一种过激反应，认为那实在是以人力和物质代替了精深灵活的战略。另外一些学者甚至把500年的边境防御解释成一场巨大的伪造的"冷战"，认为边境上存在着的大量部队只不过是罗马经济的开发军，只不过是把资本从国外野蛮民族掠入罗马帝国的一种手段，同时为拉丁化社会日益加深的军事化进行自我辩护。

虽然从不曾有一个专为战略谋士们设立的罗马"战争学院"，但侵略性威胁却真实存在，士兵装备和军事基地的部署也都是高水准的。公元1世纪末以后，一代代罗马皇帝都是真正的军事战略家，他们越来越企图建立一个巨大而稳定的罗马文化圈，在这个罗马文化圈内，所有的人都享有罗马公民权同时随从罗马的风俗和习惯。克劳迪安王朝时代各个皇帝的战略——设立代理皇帝并对敌对领土发起进攻以示惩罚——从维斯帕西安（公元69～79年）开始被一种更深刻的防御性政策所代替，它避免远征作战而以永久性防御工事为特征——城墙、营房、要塞等。当戴克里先（公元284～305年）制定了边境修筑计划之后，流动性更大的后备役军队最终出现了。在君士坦丁和他的后继者们的统治之下，边疆地区可能会出于整体防御的考虑而暂时割让出去然后再重新夺回，并不一定死守着一条——代价越来越昂贵——已摇摇欲坠的战线。总之，防御越来越讲究实际意义。 60

简而言之，尽管罗马政治被军团干预，尽管有如此广大的领土需要保护并因此要增加大量税收，尽管永久性的军事卫戍部队内部存在腐败和混乱，但是在近五个世纪的岁月中，帝国军队努力保持了严明纪律和优良技术的传统并因此保持了希腊—罗马的战场优势。甚至到8世纪，东罗马帝国（或者拜占庭帝国）的军队还在使用约一千年前所创造的用来控制"马里乌斯的骡子"的那些命令和信号，虽然那时候东罗马使用的已是希腊语。另外，在西方，罗马的军事遗产也继续流传了800年。 61

罗马的永久性战争设施

罗马继承了古希腊技术、军事革新及其迅速回应的天赋，同时也继承了它的决断特质和英勇进攻的观念，并通过持之以恒的操练和严明的纪律将它们用于罗马帝国的标准化和官僚化建设。例如，希腊式方阵没有固定的纵深，没有统一的指挥程序，没有固定的招募法规，没有服役退役的标准期限，也没有一套完整的军事奖惩制度和军事进攻的基础理论。

相反，在罗马军队中军团通常保持固定的阵容，征募新兵也依照严格的程序控制被征者的社会背景、健康以及体重和身高情况。百夫长、护民官和会计官都很清楚自己的确切角色和自己的军事权限。

不管一支罗马部队在多瑙河还是在北非作战，他们总是建设同样的兵营，士兵也配以严格统一的武器和盔甲。粮食配给、邮件服务、卫生设备——一切无关紧要而在军队生活中常常被遗忘的地方——也都被周详地系统化，因此通常是充足的。罗马宽阔的道路对于甚至是大规模部队的运送也很方便，地方港口的堡垒和国家商船保护着漫长的海洋运输，不管是身在罗马的决策者，还是身在战场的作战将领，他们对于军团通过某地所需的时间、花费及需付出多大程度的努力等都有非常精确

前线医疗站中一个虚弱的军团伤员。在他后面，别的士兵正在排队等候重回战场的机会轮到他们。这是来自罗马特拉金队伍中的一幕。罗马人不像别的民族，他们认为表现自己的战斗伤亡并不是什么羞耻的事情。这里看到的这些接受治疗的伤兵的画面，并不意味着罗马人承认自己的虚弱，它其实是在确认自己先进的军事组织和对战场上士兵的周到关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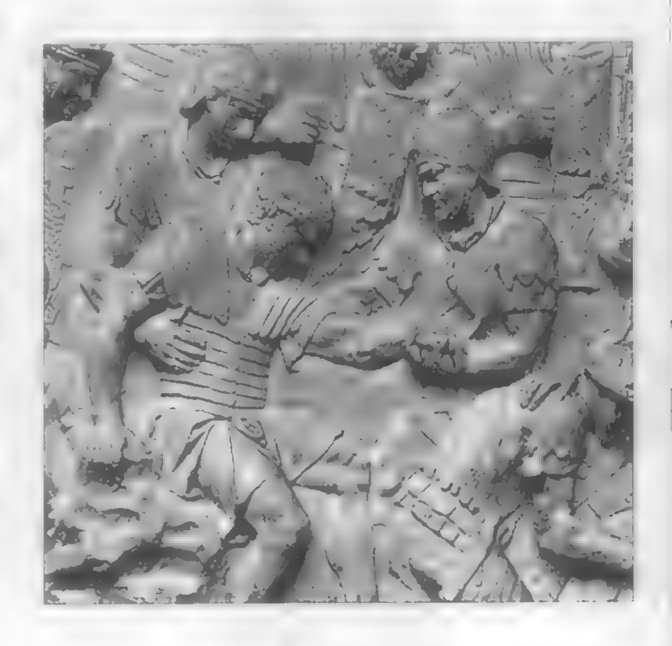
的了解。军事设施提供了如此巨大的支持，罗马军队的战斗效率自然大大增加。绝大多数军团士兵几乎比任何敌军部队都吃得更丰盛、住得更舒适、装备更精良，并且的确有着更强健的身体。这便使军团与地中海世界几乎所有的敌人交战时赋予它一种实质上的兵力优势。这样一套无所不包的基础战争设施使敌人仅靠数量是难以取胜的，恺撒在高卢战争中对占有绝对数量优势的敌军所取得的辉煌胜利证实了这一点。

心理因素被证明是非常关键的，罗马士兵总是很清楚作战的标准程序。他们知道哪支部队在首，哪支部队在后，也知道他们应如何进攻，知道前进或后退对战斗的整体结果意味着什么。当然，他们更知道什么时候该吃饭，什么时候该睡觉，以及他们生病、受伤或死亡的时候将得到怎样的照顾。裸身日耳曼人的狰狞面貌，北部边境严酷的暴风雪以及北非骑兵的怪异武器都不能使罗马战士胆怯。每个军团士兵都是如此自信，他们的作战方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紧急情况预备好了一切应对之法。

从战略层面上讲，官僚化也意味着个别的败退较少招致战场上的巨大灾难，坎尼血浴（公元前216年）、瓦鲁斯在德意志的毁灭（公元9年），甚至在卡雷发生的克拉苏战争（公元前53年）灾难中，都未产生大面积的恐慌，也未扑灭罗马的战斗力。相反，可怕的失败惊醒了他们，罗马战争机制很快转向重大改革：征募新兵，更新装备，重新起用经验成熟的老兵担任百夫长去监督征兵。这样做的结果几乎总能确保领导上的错误——罗马军队中常常出现这种情况，倘若那些领导来自政治领域的话——不会致军团于死命。几乎一切就像是在自动操作，以百夫长为基础构成的军团，几乎无须从上面领受什么指示去决定他们的吃饭、睡觉、集合行军或列队作战等行动。

不幸的是，公元前2～前1世纪，随着帝国的向外扩张和交通路线变窄，防御责任却增加了。公元1世纪时这些军事设施渐渐难司其责，而到公元3～4世纪已无法维持了。一旦意大利本身的人力资源不够补充军队，罗马军队的系统化也变得困难重重，军队开始招募非拉丁语地区士兵并开始采取各种地方政策以满足整个罗马帝国各种不同的地方需要，这便导致整个军团不知不觉而稳定地巴尔干化，老兵们退役时要求现金和土地，但由于罗马帝国早期的那种向外扩张已终止，土地变成了一种很有限的商品。因几个世纪以来连续赠予因年老病弱而退役的士兵以土地，使土地变得越来越贫乏，道路的修筑和保养也很昂贵，职业军团的固定部队加上器械师、辅助设备以及后勤人员等，都需要越来越多的薪俸以满足加速膨胀的资金需求。

到公元2～3世纪前，罗马防御所需的费用是在早已不胜负荷而趋向衰弱的乡村平民身上增加的税收，到公元4～5世纪，农民被彻底榨干，财政收入来源终于枯竭了，于是，罗马帝国巨大的战争机器在疲倦的摩擦声中慢慢走向停止。它那些永久性的军事设施依然原封不动地耸立在我们眼前，但其内在的生命血液——资本和人力——已永远干涸了。



第二部分　石堡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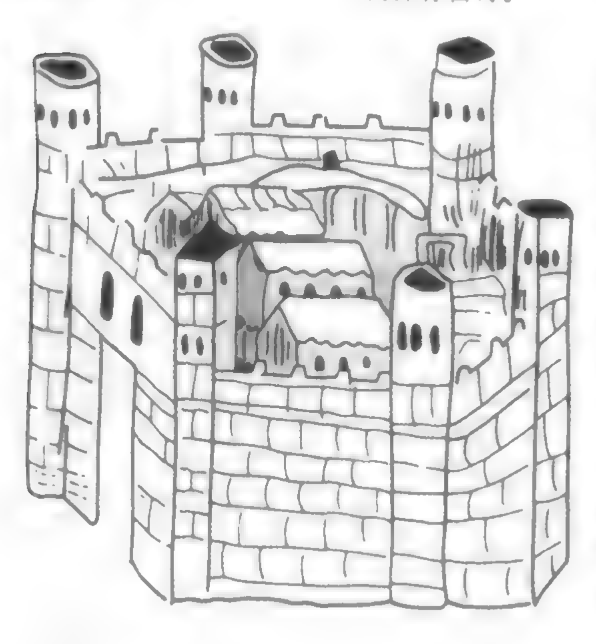
第四章　罗马防御工事

从戴克里先皇帝统治时代（公元285～305年）直到14世纪火药武器的发明时期，欧洲军事作战的组织、战略及战术，在实质上都表现出一种惊人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部分反映在罗马军事地形学的恒久而重要的影响中——设防城市中仍存的永久性设施、堡垒、港口以及3到5世纪时修筑的道路。5世纪中，帝国西半部的罗马统治逐渐瓦解后，后来政府中那些负责军事决策的人们既没有兴趣也没有办法去拆除那些罗马城墙。就像东方拜占庭的皇帝们一样，罗马—日耳曼的统治者们在控制和有效利用这些财富的手段方面，与后期的罗马皇帝们几乎没什么区别。这种连续性也反映了古代军事科学无与伦比的卓越性。决策者们可从一些书籍比如维吉提乌斯的《军事问题》中发现这一点，同时从刺激了军事技术交流与研究的西方和拜占庭帝国的大量接触中也能看到这种卓越性。

围攻战占据首要地位

后期罗马帝国的战略重点在于占据城市这个行政管理、宗教组织、产品制造及人口的中心，它们在3世纪罗马遭到外来入侵和被国内战争警醒之后加强了防御并得到重新建设，这种自我支持的防御网主要服务于两个目的。首先，每个堡垒都为那些威胁敌军前进和阻碍敌军供应线的流动部队提供庇护。第二，如果敌军选取了一座设防城镇进行围攻，它便成为主战场军队所赖以冲撞敌军的一块坚固的铁砧。罗马堡垒的数量之巨——和它们的战略位置——使它们极难被攻破，必须有大规模的部队（良好的围攻器械）还得懂得在一连数个月的露营生活中如何保存自身。

圣经中的城市拿鹤在这里由一个按照古老艺术传统加以设防的小镇来代表。它可能来自公元5世纪左右在亚历山大里亚发现的一本插图版圣经手稿。



451年阿提拉人入侵高卢失败，为罗马纵深防御战略的成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实例。好几个月，匈奴兵和他们的同盟军耗尽力量进攻罗马的堡垒城市，却只取得了极为有限的成功，尽管罗马并无一支援军。然后，当阿提拉人围攻奥尔良城时，罗马将军埃底乌斯率一支主要从高卢人中招募来的军队逼向敌人。匈奴兵在罗马人的追杀中撤退。在夏龙，穿过高卢一半地区时，阿提拉决定停下来战斗，但匈奴军大败而退，没有得到任何领土，人力和财物也比战争开始之时更加贫乏了。

围攻、救援（绝大多数围攻，不管有援军或无援军都失败了），接着是对围攻部队的战斗，或者更可能是一场阶段性撤退，这种三部曲构成了一种模式，一千年以来它在西方战争中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围攻显然成了最普遍的军事对抗方式，同时防御进攻的技巧和战术被广泛传播。一位5世纪时法兰克

地区的罗马将军、作家弗莱维乌斯·梅罗波德评论说，西哥特人在他们376年离开家乡越过多瑙河以后的两个世纪中学到了许多关于如何进行作战的知识。据梅罗波德说，曾与恺撒作战的“条顿族人”只有一个残酷的战争统帅，他在指挥艺术方面几乎毫无经验，但是，西哥特人却不再是一支“从野蛮之地来的民族”。他们“在战争中（与罗马）是旗鼓相当的敌人”，他们已学到了罗马帝国保卫军事重镇和镇中城堡的能力。他认为，实际上，他们甚至同时还学到了一些建筑堡垒的技术。

这是北部意大利的要塞阿奎莱亚，位于威尼斯东部。如后期罗马帝国的一幅路线图所描绘的，它很可能被使用于公元4世纪期间。这类图画经过了高度的艺术加工，因此与考古文件对比考察时，它与真正的防御工事很少相似，图画着重对当时所有居住区的设防加以代表性的强调。

扩大帝国军队的规模使后期的罗马皇帝能够以其驻守遍布国中的大量石头堡垒，同时维持一支后备部队以应付各种较大的外来入侵。后罗马帝国时期，在役的武装士兵远比尤利乌斯·恺撒和屋大维时期多得多。到公元300年之前，戴克里先下令建立一支超过43.5万人的常规军，430年左右时，东西部地区的联军数目达到了最高峰，可能有64.5万人。

除了“罗马”军事人员以外，西罗马帝国内的日耳曼人和其他许多不同民族的定居者也能聚起大量的军队。例如，由帝国政府安置在阿基坦的西哥特人可动员起2～2.5万人，此外，把意大利置于他们自己国王特奥多里科（也是罗马在此地区的统治者）统治之下的东哥特人、北非的汪达尔人，都能聚集起大规模的军队。同时，在高卢的许多法兰克统治者的联合部队，其力量也足以和西哥特人相匹敌。战场上作战军队的规模也很大，例如357年波斯战争时胡里安皇帝率领着一支6.5万人的军队，378年亚德里安堡战役中瓦伦斯统率着一支3～4万人的军队，而在夏龙战役中埃底乌斯那支大部分在高卢招募的军队数量也在4～5万人之间。

后罗马的军事组织

后期罗马帝国在军事组织方面表现出两方面的重大发展。当军队逐渐融合成社会的非军事机构，大部分士兵成为士兵—农民，同时有的成为士兵—镇民的时候，国内的人口便逐渐军事化了。4世纪晚期时军事化的“家居生活”已初步形成。《奥古斯都传记》的那些佚名作者引用了塞维留·亚历山大皇帝（公元222～235年在位）发布的诏书：

> 从敌人那里夺来的土地被分配给辅助部队的首领和士兵，并规定只有当其继承人也服兵役时，他们才能继续拥有这些土地，因为他（皇帝）说，如果战争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土地，那么他们将会付出更大的热情……当然，他同时还加给那些土地以牲畜和奴隶，供那些士兵们饲养和使用。

士兵变得越来越像农民，而农民变得越来越像士兵：在406年的一条法案中，霍诺留斯皇帝下令说：“奴隶们将为战争奉献他们自己……当然，我们尤其嘉奖那些在军队服役的士兵及盟邦和外国自由民的奴隶们，因为很显然这些奴隶正在与其主人一起对敌作战。

中世纪罗马的骑兵操练

虽然包围作战在后期罗马帝国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但战场军队也未被忽视，带着长矛的骑兵被严格训练，以使他们能够迅速下马作为持矛步兵徒步作战，而且当需要在马上作战时又能迅速翻身上鞍。步兵所穿的甲胄比早期军团士兵要少，行动起来非常迅速。4世纪末到5世纪的一些重要战争阐释了后期罗马战术的这种灵活性——例如穆萨(351年与马南提乌斯的战斗，他篡取了君士坦丁皇帝的皇位)战争中持矛者们都下马步行作战，夏龙战争中(451年，对匈奴的作战)帝国步兵与西哥特人和阿兰骑兵联合作战。阿米亚诺斯，一个职业军人，也是古罗马的一流历史学家，在他描绘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公元361年)时赞扬了这种灵活性："他尤其擅长骑马、掷投枪和射箭，此外他还熟知所有战术和步兵作战的各类武器。"

在中世纪初期，部队操练程式表现出了对足可取胜敌人的战术的深刻的洞察力。在东方和西方流传着公元450年流行于君士坦丁堡的维吉提乌斯所著的《军事问题》一书，它以最早幸存下来的版本为基础并被重新加以修订。虽然作者着重谈的是步兵操练(他相信骑兵武器并不需要什么革新)，但他确实对骑兵部队对于灵活战术的要求表现了特殊的注意力。整个中世纪都在追求这种灵活性，最后它在"龙骑兵"中开始固定下来。"龙骑兵"是16世纪的一个术语，最初是指被训练从事步行作战的骑兵战士。

下面一段文章由加洛林王朝国王洛泰尔二世宫廷中的一位教师兼学者拉班鲁斯·莫鲁斯从维吉提乌斯的作品中抄写并剪辑而成，它只是作品的一个梗概，仅包括着对"现代"最具重要性的一些东西。拉班鲁斯在其它章节中选择出骑兵新兵训练体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

许多木马冬天放在屋檐下，夏天置于露天里。起初，新兵们努力练习不带任何武器跃上马背，然后再练习带上盾和剑上马，最后他们手持着非常大的杆状武器也能上马。这种训练如此彻底，他们不仅学会从右边，还得学会从左边和后边上下马，除此之外，他们甚至还得学会带着已出鞘的剑直接上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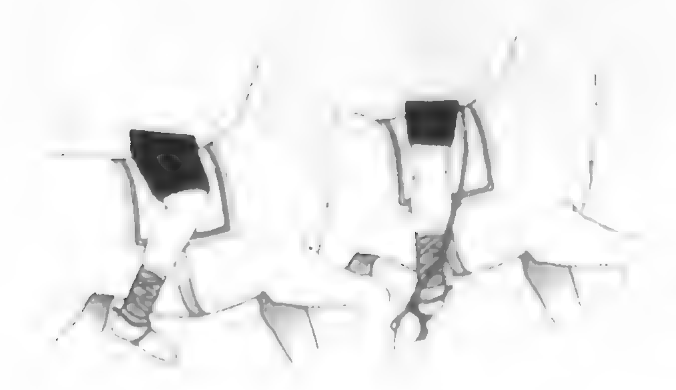
骑兵部队还得练习在马上作战。而对他们的马进行训练以适应战斗其重要性不亚于此。中世纪早期的这些军事训练形式，已预告了后来骑士比武大会的壮丽景观。查理曼的孙子尼塔尔描述了842年在凡尔登附近举行的

《Notitia Dignitatum》手稿是对后期罗马帝国(公元430年)战斗秩序仅存的描绘和再现。每一支罗马部队都以盾形徽章为象征。书中列举出了帝国内用骑兵队的那些指挥官们的装备。部队中士兵们的盾可能都是同样的设计，它们显示了中世纪时期的使用习惯。

一场令人难忘的练兵会

为了训练的目的，比赛常以下列方式来安排，作战的人们被部署在大家能够看得清的地方。整个部队……被分成规模相同的两支军队，他们从两头向前进攻，以全速冲向对方，然后(互相接触以前)一方转过身在盾的保护下佯装逃跑，然后那些假装撤退的人忽然反攻，追击者假装逃走。接着双方国王(德国人路易和“秃头”查理)和他们的年轻的小伙子一起大声呐喊，挥舞矛柄冲锋向前。现在，一组假装撤退，然后另一组做同样的事情。这种景象因其高贵的风度和严明的纪律而显得异常壮观，值得一看。

右图：一个骑兵，可能是德意志人，装备着矛、剑和盾(盾上有凸形浮雕图案，可能标志着他所属的部队)。这是公元700年左右一罗马石碑简陋的仿制品，发现于德意志的马格德堡附近。其罗马风格的头盔看起来很像6、7世纪时在瑞典坟墓中发现的仿制品。



左图：在有效利用马鞍以前，手持长矛从马上进攻敌人的威力很有限。由于强大的冲击力，当骑马者的长矛受到打击时，他只能以脚踝紧夹马腰(左)。早在700年时，马鞍传入西欧，但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没看出它有什么明显作用。骑马者的脚和腿离马的身体还太远(右)，而且马鞍的皮绳深勒进马的皮肤，人的脚尖也紧绷着伸向地面，腿则被扯向与马鞍相反方向而远离了马身。

隆巴德国王阿吉拉尔夫(公元590~615年)以打击力相当强的罗马式风格来装备他的侧翼部队。隆巴德人是由阿瓦尔人南迁至意大利的一支日耳曼民族。他们统治半岛北部1/3的地区达二百多年,紧紧依靠罗马军事组织的原则据守境内各处分布的由罗马人以前筑墙保护的城市。隆巴德王国结束于774年查理曼对其首都帕维亚的围攻。

又一代人之后,甚至那些与军事没有任何正式关系的自由平民也被号召参加地方防御。440年时,强迫罗马市民和行会成员承担军队的常规服役义务是不合法的,但是瓦伦蒂尼亚安皇帝下令说,即使这些享有较高特权的阶层也有义务参加民兵防御,他们应在“必要之时保护城墙和他们城市的大门”。那时候,传统招募制在罗马帝国的西半部已经终止了——大概是因为仅在自愿的基础上就能征到足够的兵力。在帝国西半部,军队中甚至也包括许多聚集起来在特别战场作战的志愿者——将军们私人武装的忠心耿耿的侍从队伍,以及那些从边境之外招募来的外国雇佣军。

帝国政策的这种重大转向是平民军事化的结果,也是帝国对外募兵的结果。帝国境外——常常很遥远——各种不同的人们受到鼓励在帝国西部安家:德意志人、阿兰人(来自南部俄罗斯顿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一个游牧民族)、萨尔马特人(来自南部俄罗斯的一个半游牧民族,也可能是过着田园生活的农耕民族),以及公元4世纪晚期和5世纪时在不列颠、高卢、意大利和西班牙服兵役的许多其他民族的人。正常情况下,帝国通常为这些移民提供住宅和税收总额的1/3。这些住宅通常是它们的主人扔下不要的。因此,4世纪晚期的一个宫廷诗人帕克塔斯·德雷帕尼乌斯为狄奥多西一世在383年签署条约把西哥特人安置于色雷斯而赞美说,因为“你收留了哥特人,为你的军队又增添了战士……并且为你的土地提供了农夫”。

在一些大人物手下,如公爵、伯爵之类的高级政府官员以及没有什么特殊政治地位的工商巨贾武装着一批私人随从,这是一支更精良的战斗团体。虽然自始至终帝国一直努力限制雇佣这种军队,但在罗马帝国后期和中世纪社会,这种私人武装的侍从大军已是无所不在。在这种军队服役的人们不论是直接服务于他们的主人,还是以某种形式在外参战,显然都是职业化的作战者,与那些农民—士兵和城市里按钟点值班的民兵们刚好相反。

这是墨洛温王朝希尔代里克的环形图章。他是法兰克人的王和图赖周围地区(现今比利时境内)的帝国军事首领。在图中,他身穿的是罗马式甲胄。图章用来帮助国王批署一些他读不懂但却需要王权承认的文件。虽然他不能读懂这些文件,但把它们用拉丁文译出来时他就能够理解。在国王的允许下,希尔代里克的儿子克洛维斯(公元481~511年)围绕除东南地区以外的整个高卢建立了一个自己的王国,并被罗马皇帝阿纳斯塔修斯授予领事的头衔。

罗马—日耳曼军队

5世纪中期当罗马帝国的正式招募机构已不再发挥作用时,西罗马军队并不只是简单地随之解体。实际上,直到6世纪早期,可由统一制服和印有“罗马”字样的旗帜辨认出来的军队仍在奥尔良西部地区继续运作,他们可能由地方政治领袖来领导。但是以前帝国军队组织的士兵、还有被称为“野蛮”民族的作战部队

的大部分士兵，现在都逐渐被吸收并加入了罗马—日耳曼人的军队组织中，而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后代的绝大多数——像那些生来自由或不自由的乡村人口——也逐渐成为农民—士兵。例如，西班牙的西哥特国王们无论何时组织一场大的战役，都要不顾其社会或王室身份征召一些外行人甚至圣职人员去充军，而且，他们还大量使用奴隶作战。事实证明，罗马移民在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海军队伍中的人员配备和统率方面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他们组成了来自北非的远征军的一个关键部分，（比如说）这在455年对罗马的劫掠中达到了顶峰。

在另外一些地方，为了进攻性目的，要求从乡村和城市居民中精选出来一群人——精选部队——履行兵役义务以加入长期的进攻性军事行动，这一要求超出了地区性防御的需要。这些从城镇和乡村选拔出来的战士组成了战场作战的士兵。在罗马—日耳曼后来政府的常规作战部队中，他们和王商巨贾尤其是国王的那些侍从部队同时为战争效力。在梅罗文吉亚人的高卢，毫无疑问还有其它地方，成年男性也必须参加普通海军服役以保卫他们居住的地区。这是一种“公共义务”，穷人甚至教会机构中那些没有行动自由的仆人也不能享受豁免权。同时，在那些被防御工事保护起来的城镇中，身体强壮的居民还要投入防御工作，就像在帝国统治下的情形那样。

乡村军事化人口的数量，都面临一个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居住在乡村中的身体健壮的成年男性数目的计算。这样算的话，16世纪的高卢可能有100万至200万年龄在15岁到50岁之间的男性可以服兵役和接受武装。不过对城市民兵的数量却可以做出更精确的估计，比如在高卢，尚可分辨出的有护城墙的城池约有100座，每座城平均围墙长度为1500码，以现有的技术推算，平均每个士兵负责约4英尺的城墙。这样，很简单就可以计算出，保护高卢的这些城池——且不论其它一些更小的防御中心——大约共需10万城市民兵。敌人的围攻部队在攻占以前西罗马帝国这些防守结实的城池时所经历的巨大困难表明，城市民兵一直保持着它的战斗力和良好的作战形式。

战场作战部队偶尔也规模巨大。例如585年勃艮第国王贡特拉姆（公元561～592年）调动了王国的常规部队以及他几乎所有的精锐民兵讨伐篡位者贡多瓦尔德，部队兵力可能达到了2万人；在他前一代的意大利东哥特的国王们与拜占庭帝国进行了一场持续二十多年的战争，在此期间他们布置的兵力经常超过1万人；而北非的汪达尔人很可能不加考虑地就把1.5万人送上战场。

在6世纪意大利帝国总部拉韦纳的大教堂，东罗马帝国皇帝贾斯蒂尼安一世和他最得意的将军贝利萨里乌斯通过一幅镶嵌图画向下凝望着。由贝利萨里乌斯付诸实施的贾斯蒂尼安的伟大战略抵挡了波斯人，平定了帝国边界并重新征服了大部分西方，然而贾斯蒂尼安却开始怀疑贝利萨里乌斯的忠诚，并将他召回东方

相反，拜占庭人控制的更为广大的地区，人口密度较罗马—日耳曼帝国更大，这样，503年东方皇帝阿纳斯塔修斯召集起来对抗波斯的5.2万军队在其规模大小上与他的前辈们所领导的那些部队肯定不相上下。而且，尽管接下来大约一代人的时期里不时有流行瘟疫冲击帝国，但贾斯蒂尼安皇帝（公元527～651年）的综合部队仍拥有接近一个世纪以前用以保护相同地区所用的兵力——17万人。例如，在530年至540年间，拜占庭帝国的两个最成功的将军贝利萨里乌斯和纳塞斯各统率着一批平均约有2万人的军队。7世纪时，在穆斯林入侵的警钟声里进行的改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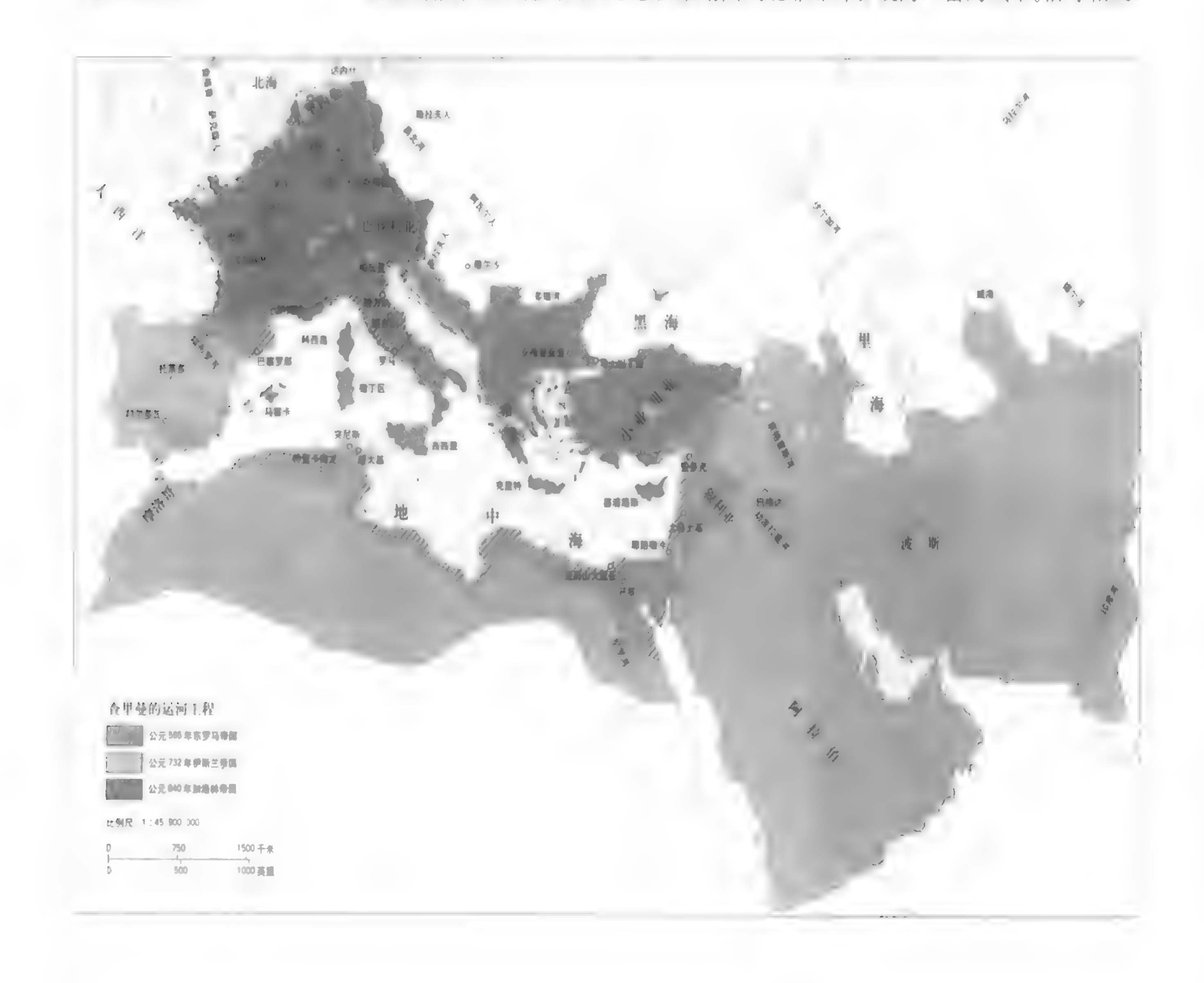
为这位皇帝留下了一支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约有2.5万人的作战部队。

从贾斯蒂尼安到查理曼

5世纪时在高卢、意大利、西班牙、北非和不列颠的罗马—日耳曼王国建立之后，战争一直间歇不断，这促使拜占庭皇帝梦想恢复对西部帝国的直接控制。拜占庭帝国重新征服西方的计划重点是非洲、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那些加强了防御的城市和军事要塞。因为君士坦丁堡确信，在那些地区，罗马人在数量上远远超出了汪达尔人、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的统治者，可以想象这些罗马人肯定愿意重新并入帝国并为这份荣誉而战。人们相信，占城市民兵绝大多数的“罗马人”将在任何必要的地方制服驻扎在城墙之内的那些日耳曼卫戍部队，并在拜占庭帝国的部队到来之时立即将城市移交给帝国。日耳曼统治者的军队将丧失他们的军事设施，供应源也被切断，于是他们在自己的王国中看起来将如“陌生人”一样，而且他们将不得不与拜占庭帝国的部队在战场上公开面对或者被迫做出某种和解。

起初拜占庭帝国的战略看起来很奏效：贝利萨里乌斯在特里卡梅龙战争中（公元535年）击败汪达尔人后，西罗马国王和整个王国都落入帝国手中，而且事实证明根本不必花费太多心思去策划围攻北非那许多设防严密的城市。恰好相反，

比较565年贾斯蒂尼安统治下达到顶峰的东罗马帝国疆域和渗入西欧最远处时的伊斯兰帝国的疆域(732年)以及840年达到巅峰时的查理曼帝国的疆域。



在拜占庭人已经攻取意大利大批重要城市的二十多年后，为恢复帝国对意大利的直接控制却不得不进行一系列的围攻作战。占领城市并不意味着最终收兵，贝利萨里乌斯的后继者纳塞斯发现，必须再经过一系列的战争才能彻底击败东哥特人的军队。552年在塔吉纳的胜利是这一系列战争的顶峰，敌军的一大部分被歼灭。此后，拜占庭帝国的军事重点转向东边的波斯帝国，并在628年最终遭到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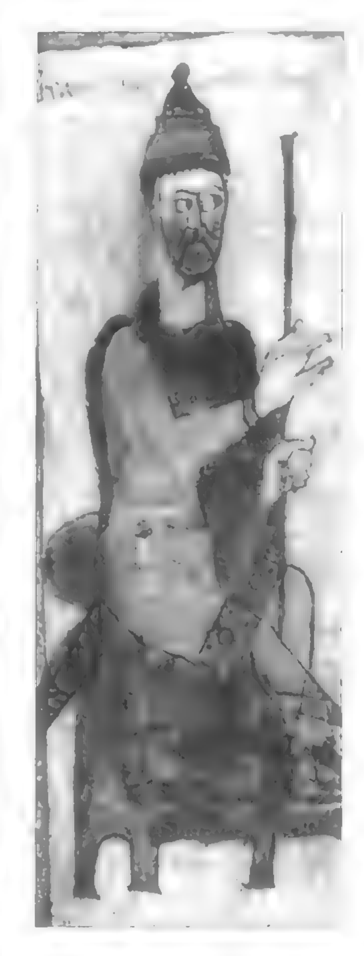
由拜占庭帝国在东方和西方同时发起的一个世纪的战争虽然取得了成功，但却急剧削弱了自己，并因此为7世纪和8世纪初穆斯林征服东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提供了条件。这样，西方世界的军事地图剧烈改版。拜占庭帝国政府由于丧失了绝大多数人口稠密且资源富足的省份而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它丢掉了叙利亚、圣地耶路撒冷以及埃及，同时还丢掉了北非和绝大部分意大利。贾斯蒂尼安重新征服的果实在意大利很快便萎缩得只剩下少数几个战略要地。此外，711年西班牙西哥特人的王国也惨遭毁灭，由一个穆斯林政府取而代之。同时，高卢遭到蹂躏，直到8世纪末至9世纪初加洛林人将权力之掌伸向阿基坦人。接着他们向前推进越过易北河，征服了北部意大利的隆巴德王国并长驱直入西班牙直到巴塞罗那。

7世纪和8世纪初的绝大部分时间，西方战争大体上保持着一种地方性。但法兰克的领袖查理·马特（死于公元742年）、丕平（死于公元768年）和查理曼（死于公元814年）在西方复兴了中央控制的军事体制。这些人和他们的后继者们在各方面进行了零星调整，以更好地支持远离家门、路途漫长的军事行动。各郡（罗马帝国的郡，不像古希腊的城邦）继续由一个伯爵来进行军事和行政管理，中央政府又制定了许多规则以保证拥有足够规模的军队。精选部队为进攻性极强的加洛林王朝军队提供了大量战士。对于拥有12个或更多庄园的富人，要向他们征集战马和甲胄；只拥有五个庄园的人必须服役参战，但自己准备的武器较少。若有人居住在作战战场附近，只有三四个庄园也可能被征召。财产极少或只有半个庄园的人们结合成总财产为五个庄园的一个团体，然后为精选部队提供一个士兵。

就像他们的梅罗文吉亚祖先一样，加洛林人也要求所有自由民宣誓效忠国王并在居住郡的点名簿中登记在册。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区别那些应加入地方防御部队和精选部队中服役的人，也是为了对那些外行而世俗的富贵私人武装（成千上万职业化的侍从部队）实现直接的中央控制。750年左右，显然有许多地方的领导人招募非自由民做他们的侍从，此时，所有曾被赋予"封臣"地位的这些侍从都必须对主人宣誓效忠。

查理曼统治着一个比拜占庭政府更大的地区，但它现在已因穆斯林的征服被切掉了一些。他曾经一度能为几场同时进行的重大战役聚集起15万人的兵力，而其中至少有3.5万人是重型武器装备的骑兵。3.5至4万人的特别部队虽不普遍但却不是完全没有。查理·马特、丕平和查理曼渐次从他们各自的地方建设起越来越大的远征部队并进入越来越远的地区，但查理曼的孙子们洛泰尔一世、德国人路易和"秃头"查理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倾向于在较受限制的战场上部署8000到1万人的小规模部队。应顺便提到的是，843年帝国在《凡尔登条约》的框架内被这三个孙子一分为三。

加洛林王朝时期的战略重点在于据守已经属于帝国的那些城市并努力攻取邻近城市。丕平一世征服阿基坦人就是依靠762年对布尔日的攻取，另外一个原因



查理曼（公元742~814年）768年就开始做法兰克国王，于公元800年的圣诞节那天由教皇加冕为罗马皇帝。他把法兰克国家的疆界大大拓展，向东横穿易北河和多瑙河，向南伸入意大利和西班牙，帝国在他儿子"虔敬者"路易手中时仍保持着统一，但被查理曼所恢复的西方中央集权，随着帝国在他三个子手中经过凡尔登条约一分为三而逐渐解体。

73

中世纪围攻技术

围攻战在军事活动中占据着支配地位，中世纪在围攻技术上对士兵设置重金奖励，整个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用于围攻工事的投石器械是非常沉重的弩炮，它由单个人控制，重约二吨，能把一个8磅重的石头射到500码外。有些更重的器械能掷更重的物体至更远之处——然而围攻部队的行李车所运送的更可能是轻型的弩炮，这种器械及其重量不超过当时车辆的最大承载容量1000磅，从装载车上卸下并被置于坚固的水平地面时，它能将3～4磅重的石头射出100码左右。更重的这类器械就只好在围攻地点直接制造或拆成许多部分，由行李车运至战场再加以重新装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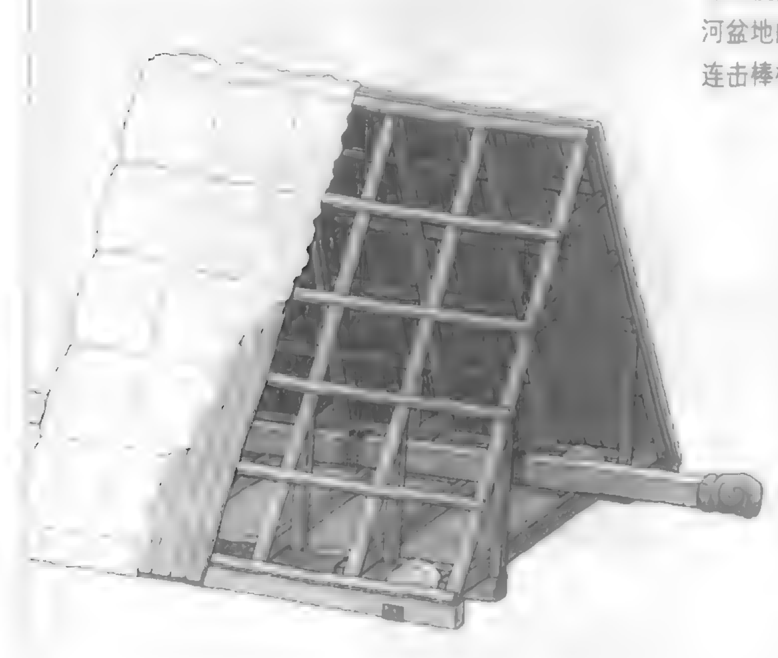
连击棒槌对一个围攻部队来说，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投石器械。作为8世纪一篇技术论文的《锁骨甲》描述了沿用于古代末期直到11世纪的这种连击棒槌：

前面做三根长为5腕尺的底木，中间几根底木长为4腕尺，后面一根底架长3腕尺。另外，还要有一些高一拃半、厚4尺的轮子。轮子做成圆形，中心穿一个孔。合上轮子，在顶部开一个接合处，并用一个楔子将轮固定，系上棒槌，再在它外面绕上绳子。棒槌表面护上皮革，并在顶上盖几块毛毡，毛毡上再铺皮革，然后在皮革上铺上4英寸厚的细沙，沙土盖以羊毛以免滑动，最后在顶上再铺几张皮革。柱子本身应带铰链，这样它在转动时就可以随意调整到所希望的方向。

由于西方已拥有几种制造燃烧弹的方法，保护棒槌免于火攻当然就成为一个当务之急。《锁骨甲》的作者们自己也找到了一种适应于毁坏连击棒槌防护顶的火攻方法，不过中世纪时代最有名的火攻代表是“希腊火”，它很可能是石油和松蜡的某种混合物。公元670年间君士坦丁堡的包围战中，拜占庭人利用它烧毁了阿拉伯人的船只。

弩炮利用缠绕的绳子或毛发的捻转而产生力量，这种围攻武器也表现了古代世界和中世纪时期围攻器械上的技术承接性。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弩炮一直是最基础的轻型大炮。

围攻战争的技术并非只为罗马帝国的那些后继国家所独占，例如在451年，连击棒槌就被匈奴人阿蒂拉的部队使用以攻破奥尔良城墙，而在626年，当来自多瑙河盆地的阿瓦尔人围攻君士坦丁堡时，他们不仅使用了连击棒槌，而且建造了许多的木头塔楼以打击城墙顶部。



左图：技术的连续性。虽然这种带着“保护房”的连击棒槌图片取自塞普蒂米乌斯·塞韦鲁斯(公元203年)拱形门上的一个浮雕，但其外形也同样适合引自8世纪的技术手册《锁骨甲》中的那段描绘。

中世纪战争中的泥土防御工事

8世纪初的历史学家比德相信，北英格兰的哈德良城墙和南苏格兰的安东宁城墙建于5世纪初期，是最先完全未靠罗马帮助而建设的防御工事，他对中世纪早期的一些统治者成功承担如此重大工程的能力的这种自信，很可能部分阻碍了他对737年完工的丹威克（右下图）的了解。不过，中世纪军事土垒工程精巧的后勤学的最佳表现，很可能还是793年查理曼在莱茵河和多瑙河之间修筑一条运河的尝试。

查理曼的水路已使他有可能在整个北海至黑海之间部署军队并通过水路为军队提供补给（整个中世纪时期，水上运输是远距离运送大量武器装备和供应的最迅速最有效的途径）。它不仅赋予查理曼在巴尔干地区以优势地位，而且使他能够将自己在黑海沿岸地区的势力影响一直投射至君士坦丁堡的大门口。

尽管查理曼的莱茵—多瑙河工程最终失败了，并且北海和黑海通过一条水路连接之梦直到1846年才实现，但这位国王的战略眼光，建造永久性后勤设施以及倡建一个如此值得纪念的工程的聪明才智，博得了历史的尊敬。许多文字资料加上考古学、地形学、土地测量学以及水文地理学的研究都在表明，在793年秋的大约10个星期间，查理曼投入了至少6000名工人挖掘一道经过缜密设计的运河——整个中世纪期间可找到许多罗马的勘查手册和其他一些有价值的古代技术手册，这条运河旨在把雷格尼茨河—美因河—莱茵河网一条可通航的支流雷察特河与多瑙河的一条支流阿特米尔河在魏森堡邻近地区连接起来，从此地到东方旧罗马城雷根斯堡和到南方的奥格斯堡的距离相等（45英里）。

运河遗迹表明，整个工程原计划为1英里长，90多

奥法堤（上）。与查理曼同时代的奥法（死于公元796年）是麦西亚国王。这道堤位于英格兰和威尔士之间，它从塞文河口向东北延伸了将近150英里，堤壁土墙高出地平面约25英尺，下临一条约6英尺的深沟，堤壁和深沟加起来平均宽度约为60英尺。8世纪时，堤壁至少某些部分上面建造了石墙，另外一些部分的顶部可能是木头的栅栏

闻名于奥法的丹威克很可能曾是一道巨大的土垒，在登马克把日德兰半岛从大陆上切割开来。土墙最初一段最引人注目的工程大约在737年竣工，而它的修建可能在10年前就开始了。

是他的对手们不堪忍受他一连串围攻而终于被迫屈服。公元774年经过一场漫长的围困之后，帕瓦亚人投降，隆巴德王国落入查理曼手中。801年查理曼制定了向西班牙进军的计划，经过持续将近两年的包围之后，巴塞罗那陷落。由于那些设防城市和周围郡县将是主要的战利品，因此最好的战争策略，小而言之应是作战战术，它意味着应把破坏减至最低程度。这些目标的战略内涵，在图尔人格雷戈里对高卢—罗马富豪阿里迪乌斯和梅罗文吉亚国王克洛维斯（死于公元511年）之间举行的一次众所周知的谈话记录中被清楚地表现出来，那时后者正在布置围攻防御坚固的城市阿维尼翁。

哦，陛下，如果我有此荣耀让您垂听我几句微不足道的建议，那也许会对您和您想要通过的地区有点用处。为什么……当您的敌人安坐在这个特别牢固的地方时，您为什么让您的部队在战场上厮杀呢？您灭绝当地居民、毁坏草地、砍掉葡萄树、放倒橄榄树，并毁坏了这个地区的一切果实，但您并没有胜过您的敌人。与其这样，不如派遣一位使者去敌方，迫使他们答应每年向您纳贡，这样，为了保

英尺宽，中心最深处有20英尺。工人们被期望以每小时0.4立方码的速度用人力将100万立方码的泥土运走。现代的估算（可能太高）表明，在十个星期的劳动过程中，每天必须向工地供应1200～1500吨小麦，1000～1200头公牛和2000～3000头猪，以便向每个工人提供约4000卡路里的热量。

这60000名工人仅仅组成了整个工程动员的总资源的一部分，例如，1500吨小麦将装满30辆马车，它们需要用60头公牛来拉，而每头公牛每天需要50磅饲料。1000头的公牛群和3000头猪不得不通过税收体制征收上来并赶至工地并关在栏内，天天喂养直到需要宰杀为止。战场上还需建设大量厨房，这又需要配备许多屠夫、厨师、面包师以及其他辅助人员，此外还有大量伐木工。伐木者不仅需要砍伐炊事所需的柴火，而且还要砍伐木材以支撑运河两岸的修建工程，而这种木材必须经木匠们加工后方可使用；工具修理离不开铁匠，而他们又需要木头或炭产生锻火；伐木工人和木匠们毫无疑问还得为工人们建造工棚并为厨房和铁匠们另外建造一些房子。而且，那6000名不太熟练的工人到秋天收割季节时还得抛下工作回家劳动。即使在使用农奴或奴隶的地区，也得有一种合适的体制把这些工人从他们通常的任务当中解脱出来，以使他们能去参加公共性的徭役。

运河工程的最终失败不是因为缺乏工人或供应，而是因为793年的那个秋天多得出奇的雨水。大雨冲毁了运河两边的河岸，并使挖掘常常很困难甚至不可能进行下去。但无论如何，运河的开挖让我们窥见了加洛林王朝的伟大战略。

查理曼大帝的运河工程给今天德国的格拉本留下了一个乡村池塘。

在这一地区他们就[illegible]
物。

阿里迪乌斯这段巧妙的建议，典型地反映了“野蛮人”的战争和古代军事科学论点之间的差异。亚历山大大帝进入亚洲之时曾告诫他的军队“不要毁灭他们正为之而战的地方”，阿里迪乌斯的建议正与亚历山大大帝的观点遥相呼应。

新城墙、旧根基

伴随着加洛林帝国的迅速崩溃，西欧出现的各民族国家的根基也暴露在受打击的范围之内。查理曼三个孙子之间签定的凡尔登条约奠定了法德两国的基础，外加一个从弗里西亚一直向南延伸至罗马的虚弱而毫无防范能力的中部王国。顺便提一句，它东西两面的邻居将为之争战上千年之久。英国在北欧入侵的严峻考验中诞生了，而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各王国在反击穆斯林的一系列小型战役中也逐渐合并起来，惟有意大利仍然只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概念。

西欧国家和拜占庭帝国都保持着守势，这便产生了广泛而复杂的组织问题。一个进攻型的国家可以在每年战季时召集部队，然后在战争结束后把士兵们遣送回家。相反，一个防守型的国家却需要组织起经过高度训练的流动部队并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必须找到足够的财富以维持常规的战备。矛盾在于，既要保持一种良好的进攻态势，又要保持国家的经济优势，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机敏智慧的领导者们找到了化解矛盾的办法，他们在旧日的基础上把过去的罗马防御工事重新改造——并改造了罗马人关于防御的观念——以至于敌人一想到围攻这个城市所花费的代价便望而却步。

这块来自林迪斯凡的石雕描绘了一次突袭中的7个维京人战士。这块石雕来自林迪斯凡岛（北英格兰诺森伯兰海岸不远处）。维京人偷袭此地的记录早在793年就开始了。维京人是9～10世纪直至11世纪期间欧洲西自爱尔兰、东至基辅的最成功的斗士。他们频繁地应召于拜占庭帝国，就像盎格鲁—萨克森人一样。维京人的马匹只用于运输而不用于战斗

英国的回答

韦塞克斯的艾尔弗雷德大帝利用结构类似于早期罗马——日耳曼帝国的部队来抗击北欧维京人，保护他的王国。他广泛招募军队以应付各个地区的防御，同时精选了一些人作为战场部队的士兵，这些士兵与来自军事贵族

和富商巨贾侍从所组成的精良部队共同作战。艾尔弗雷德把他的精选部队分成两个部分，从而解决了如何长期防御的问题：一部分在战场，以随时对敌人的进攻做出反应；另一部分则留在家里，这些部队有规律地按时轮换，显然便也根据相同的模式，动员富商巨贾们的私人武装。艾尔弗雷德还在为防守韦塞克斯所建立的33个军镇中建设了相同规模的卫戍部队，该部队由军饷供俸。当地居民被派遣去保卫他们居住的城镇，并负责维修城墙。此外，地区防御则继续由普遍征募的队伍和精选部队来维护，但他们并不在国王手下服现役。

这种对罗马—日耳曼军事组织的继承，在整个西方中世纪相当普遍。普通武装的人们为地区防御提供人力，而更加高度军事化的精选公民组成了政府的远征部队；精锐部队的成员大部分来自外行而又世俗的重要人物的私人武装，这些重要人物包括国王和他们的那些最显赫的贵族。在庞大的帝国或在较弱小的国家，这种基本的军事组织机构一直持续到13世纪，有时甚至更远。甚至在文艺复兴初期的意大利的城市国家中，也有一支为进攻性军事行动而招募的精选部队，同时这些城市国家也普遍征召身体强壮的人保卫城邦，佛罗伦萨市征召的士兵的年龄上限是70岁。城市权贵们不仅在都市范围内，同时也从乡村中动员人力加入军队。

艾尔弗雷德为了抵抗维京人海上和陆上的进攻，通过修造特殊战船扩建了他的海军部队，把拥有60只桨的船作为标准战船。他还成功地建筑、重建和修复了相当多的防御工事。899年（艾尔弗雷德去世之年）和914年间签署于英格兰某地名叫《自由民每一海迪土地赋税法》的文件列举出了33个要塞保垒，它让我们得以一瞥盎格鲁—萨克森军事管理制度的复杂和精巧。此文件包含了对33个要塞的

拜占庭帝国战船上使用的“希腊火”。中世纪绘画不同于现代摄影之处，在于它更强调表现具有关键价值的东西而不是现实主义的摹拟：像这里，画面几乎没有表现几名桨手，焦点是船的中心结构，颜色最明亮的地方是“希腊火”本身。虹吸管也被加以强调，它延伸出船头之外。这很重要，它说明“希腊火”如何防止自身遭到回火的伤害，而船帆则表明这艘战船可用于公海作战

周边防御工事进行测量和勘查的数据，然后列举并估算出能出产和收成的土地资源，以便来自每个"躲藏地"——维持一个家庭所需要的土地数量——的利润都被用以供养卫戍部队的成员。每个成员需要防守并负责修理1/4杆长（4.23英尺）的城墙。古罗马的城市温切斯特很好地展示了这种高质量的管理工作。在那里，有2400个"躲藏地"被分配开来以支持周长为9954英尺的要塞城墙的防御，为2400名战士提供土地资源时的差错率基本低于1%。《自由民每一海迪土地赋税法》，也向我们暗示出发明盎格鲁—萨克森如此和谐的军事政策的人具有卓越的战略意识。它本身很好地阐释了这一点：在这里，任何两个城市之间的距离都不会超过20英里——一天的行军路程。既然在两城之间的行军途中部队不必在野外深夜露营而承受敌人可能发起的突然进攻，那么救援部队和补给队伍就拥有很大的安全。此外，来自另一个城中的部队在附近一个城防部队陷入包围之时可以迅速行动起来，对其实行救援。

德国的"捕鸟者"亨利国王（死于公元936年）也用了很大努力要建立一个和谐统一的防御工事体系，它以小地主的服役和他们的地产税收为基础，并建有极规则的堡垒和高效的补给设施。他的这种努力与那些稍早建立于盎格鲁—萨克森的英国体系，都不只是拥有表面的相似性。据编年史家维杜金德说，亨利在保护防御工事的方法上是：

78

> 每九个农民—战士中选出一个人，要求他们为其他几位成员建筑一些小的住处（在防御工事内）并从他地里的收获中收取1/3保留在镇中，而另八个人则要为这第九个人（驻扎镇）种地并从地里收割谷物。

德国和英国的体系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都归功于罗马帝国的纵深防御原则（参阅原文第64页），从较早时期未被文字记录下来的这种模式的实物代表，到现今仍存的记录，以及今日仍在拜占庭使用的这种原则，都可了解到这一点。

拜占庭帝国的回答

东罗马帝国不得不保护自己，抵挡来自东方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库尔德人、土耳其人以及哈扎尔人的进攻。它的安全尤其是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的舰队。四个世纪的岁月中，拜占庭帝国的海军不仅在地中海地区，而且在黑海和多瑙河地区都成功地维护了帝国的利益。标准的拜占庭战船是一种快速大帆船，它拥有两排共100人的桨手，每两个人占一把长椅。每只大帆船上的弓箭都带有一种能在敌船上喷射希腊火的类似虹吸管的装置。但对许多装置的现存描述都很模糊。它也许是由某个人射出一袋弓箭，这些箭在到达敌船之前可能就会像现代的连发炮弹一样爆炸，另外，也许是易碎的容器比如像陶罐，装着燃烧弹投向敌军。大帆船上的100名桨手同时也是可以参与作战的士兵。甲板下面长椅上的50名桨手没有武器，但上面的50名却配备着最精良的武器，就像过去战船上的“海军陆战队”。

911年和949年，拜占庭人对占据着克里特岛的穆斯林发动了两次水陆并进的大型军事行动，并在961年最终夺回该岛。11世纪时，西西里的穆斯林又遭到无数次的攻击。此间，拜占庭人表现了完美的能力和技巧，他们将大量马匹用战船远距离运至敌方并成功登陆，进入了良好的战备状态。进入11世纪中期，南部意大利的诺曼人也掌握了运输马匹的秘密，并最终把这份情报传给了威廉公爵，使他在1066年靠着拜占庭人设计的马匹运输战术得以成功地入侵英格兰。

拜占庭人不断地改进他们的海军技术。例如，他们开拓性地改造了战船的构架，认识到保守军事机密非常要紧，拜占庭人建立了一个严密的情报和反情报组织。穆斯林人之所以总是落在他们的基督徒邻居之后，这至少应部分归功于拜占庭帝国高效的保密工作。阿拉伯人的流浪骑兵没有什么海战传统，所以他们利用基督徒修造他们的船只并组成海军，这些基督徒当中有一些人已皈依伊斯兰教。一些最重要的穆斯林海军将领，像的黎波里的列奥和塔尔苏斯的达米安，都是拜占庭帝国的叛逃者。然而到11世纪

79

这座位于南部图赖讷地区(法国)洛什市的巨大的四方形塔楼由安热温的伯爵(公元960~987年)杰弗里·格雷曼特尔开始修建，约于1030年在他儿子富克·内拉手中完成。这座堡垒是安热温心脏地区东南边界防御的支点，同时也是向外扩张的基础。

富克·内拉的石堡网

安热温的富克·内拉伯爵(公元987~1040年)建立了一个统治整个法兰西西部的王国，在此基础上，他的后代杰弗里·普兰塔奇纳特家(死于公元1151年)和亨利二世(死于公元1189年)又建立了一个版图南起比利牛斯山脉北至苏格兰的大帝国。

富克王国的边境由一连串的石头堡垒来执行防御——在那时这是一种革新。它们位于边境外约20英里处。除此之外，富克又另修建并控制了20多座石头堡垒，建立了边疆的纵深防御，这样，垂涎欲滴的袭击者们再也不能随意出入安热温的心脏地区了。

虽然驻在塔内的士兵不能像18世纪要塞中的守军那样利用猛烈的火力封锁路口或浅的河滩，但弓箭手和弩手却可以往来入侵者之间并消灭掉那些被诱入射程之内的来犯者。更重要的是，骑兵部队可以部署在城外20英里的战线上阻挡敌军，这些骑兵拥有安全供应并能于夜间在附近的防御工事内安营。富克的堡垒或许并没有完全击退那些入侵者(假如这种情况确有发生的话)，但他们确实有效阻挡了敌人入侵。敌人攻击要塞受到阻截而暂停时，便给了富克时间，使他得以召集更大规模的军队去击退下一批敌人。

同时，在敌人艰难进军的每一座堡垒中都保持着一支流动的基地部队，他们使敌人步履维艰，有时甚至将敌人从中间切断，使之既无法得到补给又不能相互联络。任何来犯者若敢于孤军深入去围攻任何一个危机四伏的堡垒，都将冒着主力部队被削弱的危险，并有可能丧失已部署在敌人区域内以保护自己的军队。

富克·内拉统治下的安热温中心地区遍布着无数防范严密的城堡和要塞。伯爵通过对所有防御工事的系统化定位，把平坦的国土分为许多谷地，它们控制着穿过乡村地区的路径并掌握着水路。既然敌人不得不通过这些谷地，那么富克便可以召集部队并选择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开始战斗。

1066年的黑斯廷斯之战

1066年1月英王"忏悔者"爱德华一死，曾是他左膀右臂的韦塞克斯伯爵哈罗德·戈德温森便迫不及待地加冕称王。若爱德华的亲戚威廉公爵想要夺回王位的话，那就必须在秋季之前侵入英国并牢牢地控制王位。然而1066年年初时，威廉已在既无舰队也无技术和经验的情况下把大批战马运过海峡并进入战备状态。他只有诺曼底那些缺乏训练的队伍，但威廉解决了所有这一切问题，并在中世纪历时最长的大战中与哈罗德对垒(9小时)，凭借与诺曼底人的火力联合，又由于盎格鲁—萨克森人纪律上短暂却致命的疏忽，威廉取得了这次较量的胜利。

威廉得到了诺曼底权贵们的支持，并在南部意大利和西西里的诺曼底人领地上招募专家制定马匹运输的方案。军队中的雇佣军大多来自北部和西部法国的其它一些地区。8月初之前，他的军队和战船已在滨海迪活准备就绪。精密成熟的后勤系统支持着扎营部队，这支部队包括1.4万名左右士兵和2000～3000匹战马。当盎格鲁—萨克森人的战舰返回泰晤士河口等待整修时，威廉的军队乘机渡过海峡到达佩文西，即古罗马的港口安德里塔，那儿有适合马匹登陆的良好的设施。所以，登陆未受阻碍，威廉派遣他的舰队将步兵和补给运至黑斯廷斯——骑兵则行陆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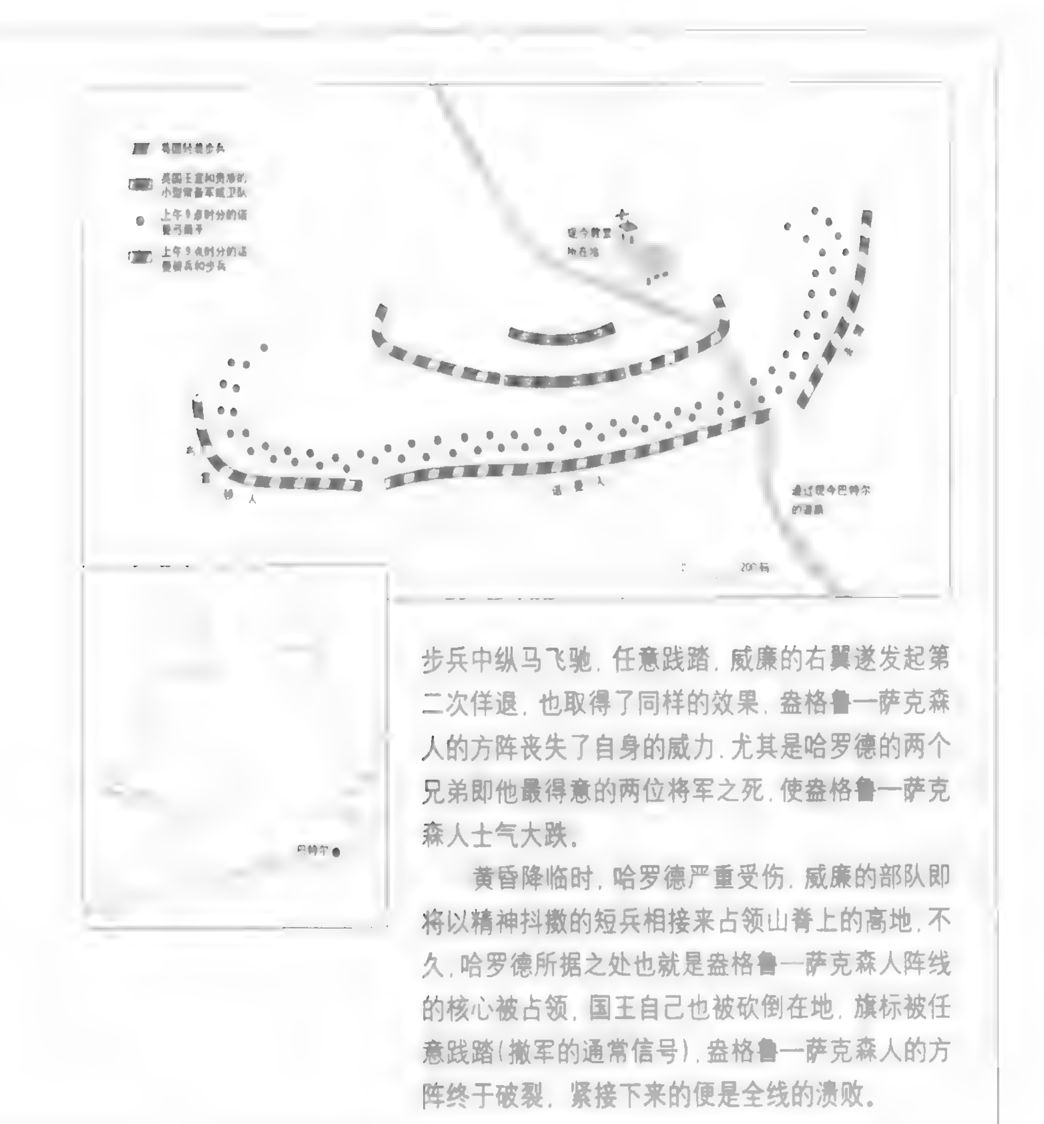
哈罗德那时恰巧正在离伦敦190英里之外的约克郡全力对付北欧海盗的入侵，就在其得知诺曼底人登陆消息的前五天，他才以巨大代价决定性地击败了那些海盗。他下令南部进行总动员，并率剩下的正规部队匆匆赶往伦敦。他的策略是在黑斯廷斯半岛封锁入侵者，在到达黑斯廷斯之前，哈罗德已召集到8000人，其中占绝大多数的地方募军来自伦敦和黑斯廷斯之间的地区，他们按指令聚集在黑斯廷斯北部至西北部约7英里的一个地方，现在名为"巴特尔"。哈罗德本来还有1000人左右的军队，包括受过严格训练的一些正规军队以及他的几位兄弟和其他一些盎格鲁—萨克森权贵们的私人武装侍从部队。

威廉在圣瓦莱里召集的1.4万人，可能只有1万人在战斗来临时能和他在一起，其中有重装骑兵约2000～3000名，1000人被留下来保护佩文西的要塞，另1000人则需要去执行黑斯廷斯的防御，但威廉拥有一支弓箭手和弩手组成的出色的先遣队，而盎格鲁—萨克森人却严重缺乏"火力"——无法远距离消灭敌军。

威廉不可能坐等自己被敌人封锁，他必须尽快激怒哈罗德并与他交战。于是他迅速赶往哈罗德大部分私人庄园的所在地苏塞克斯地区，哈罗德并不热心与威廉作战，他在一道880码长的山脊上占据了一道易守难攻的战线，它在地形上高出下面的沼泽地约275英尺。他还把民兵部署成一个巨大的方阵，正规部队被置于前线以坚固阵线并鼓舞士气。威廉可以开战，但他必须首先在黎明时分行军7英里，然后在进入敌军50码射程之内时，还必须冒着雨点般的矛枪攻上山。

10月14日威廉开始了进攻。首先，弓箭手和弩手发起一阵阵猛攻，以削弱盎格鲁—萨克森方阵的防卫力。然后，步兵骑兵同时向盎格鲁—萨克森人的阵线发起进攻，但它坚固得就像一道石墙。弓箭营和弹弩营的复合打击模式反复了多次，直到当天下午仍未奏效，于是，威廉决定让左翼的布雷顿骑兵——这种战术的专家——佯作撤退。诡计奏效，盎格鲁—萨克森阵线的右翼在疯狂追杀"飞逃"的布雷顿人中渐渐分散了。威廉军队发出预定的信号，这些骑兵突然掉转马头，在那些暴露在开阔地区且被兴奋的追捕搞得精疲力竭因而散开来的敌军

"哈罗德国王被杀"。此幕情景来自巴约的一张挂毯。传统看法坚持认为哈罗德是左边那个人，眼被箭射中，不是右边那个被一名诺曼底骑兵撞倒的人。下面的传统说法比较合理：威廉的取胜是由于武器尤其是火力联合的绝妙部署，诺曼底骑兵惟有在盎格鲁—萨克森人的阵线被打破之后才具有某种优势。



步兵中纵马飞驰，任意践踏，威廉的右翼遂发起第二次佯退，也取得了同样的效果，盎格鲁—萨克森人的方阵丧失了自身的威力，尤其是哈罗德的两个兄弟即他最得意的两位将军之死，使盎格鲁—萨克森人士气大跌。

黄昏降临时，哈罗德严重受伤，威廉的部队即将以精神抖擞的短兵相接来占领山脊上的高地，不久，哈罗德所据之处也就是盎格鲁—萨克森人阵线的核心被占领，国王自己也被砍倒在地，旗标被任意践踏（撤军的通常信号），盎格鲁—萨克森人的方阵终于破裂，紧接下来的便是全线的溃败。

下半期之前，当意大利的城市国家尤其是威尼斯开始建造越来越多设计更为先进的船只时，拜占庭的舰队开始相对衰落。1204年，为了掠夺大量财宝并结束教皇和长老之间的宗派之争，把拜占庭变成西方的一部分，十字军洗劫了拜占庭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他们让罗马基督徒在君士坦丁堡做东方教会的领袖并把另外一位西方人安置在皇帝的宝座上。

小国家小军队

穆斯林的征服令东罗马帝国急剧衰落，加洛林帝国也被分割成大量的小国家，这意味着东西方所招募的以进行进攻性军事行动为目的的军队规模都将缩减，它将远低于后期罗马皇帝和查理曼战场部队的规模。但是在9世纪中期之前，拜占庭帝国又能支撑一支12万人的常规军了。2.5万人组成战场部队，9.5万人的地方部队分布在整个帝国的20个地区，同时又以800万的人口作为基础支撑着这支庞大的军队。

10到11世纪在前加洛林帝国西半部出现的那些小国家不得不建立起他们较小

埃塞克斯郡黑丁汉姆城堡的高楼修建于1130年到1152年之间，其所有精髓部分都与一个多世纪以前由富克·内拉所建的四角形石塔相似。这些塔楼通常都得到了进一步巩固。首先在四周环绕以壕沟和泥土防御工事，然后又在外层修建了木头外堡(到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时)，最后又被日趋精巧的石头幕墙加以保护。不过，中世纪的这些塔楼不存在什么固定统一的设计，地貌、资源及修建目的，都会影响到它们的修筑地点、高度，以及其它防御性因素的配合问题。

规模的远征军。然而战场部队的这种缩减并不一定是源于士兵数量的显著下降，相反，事实证明那是因为统治者们再也无法对那些管理州郡并负责带领当地分遣队并接受招募的权贵们实行有效的控制。同样，保护当地城墙的镇上居民和军事化了的乡村人口也并未表现出更大的下降，但在维京人入侵期间已发生了一些人口的重新分布。在英格兰，9世纪后期到10世纪期间，外来入侵和国内战争都导致了很大的军队伤亡，但士兵仍不缺乏。艾尔弗雷德大帝的各城除当地民兵外，还有一支由2.8万人组成的由军饷供应的卫戍部队来保护，同时，精选部队“五个躲藏地”的招募制度又为战争提供了一支2万人的训练有素的部队。除这些外，盎格鲁—萨克森的皇帝们还可调用他们自己和权贵们的私人武装侍从以发动进攻性作战。在黑斯廷斯战争中，哈罗德国王召集了精选部队的绝大部分约8000名士兵，但这也只构成了参加作战的盎格鲁—萨克森部队人数的一小部分。

海峡对岸，法国的休·卡佩（死于公元996年）能够从他直接控制下的巴黎周围小小的中心地区召集起一支6000人的部队，而另一位更大的权贵安茹的富克·内拉伯爵（公元987～1040年），也能够召集起6000人的部队并发动进攻性的军事行动。1067年时，仅安茹市本身就能提供1000人左右参加精选部队，而保卫城镇壁垒只需1500名城市民兵。与富克同时代、比他年轻一些的威廉公爵可成功聚集起一支1.4万人左右的部队实施1066年对英格兰的入侵，它包括外国雇佣军队和一支2000至3000人组成的骑兵部队。

莱茵河另一边，到10世纪中期前，德国国王们统率着1.5万名重型武装的骑兵大军。根据先进的经济学和人口统计学来计算，这支部队在比例上与查理曼统治时人们根据土地占有量承担的兵役义务一致。955年对马扎尔人的拉茨菲尔德战斗中，奥托大帝那支8000到1万人的部队仅仅组成了德意志王国中所拥有的作战人数的一部分，同时还有一支基本募自萨克森人的军队进攻斯拉夫人。至于982年成功入侵意大利的战争，奥托二世率领的军队可能超过了2万人，其中包括1万名重型武装的骑兵。

1096～1099年，第一支十字军开进中东。它从西欧大部分地区招募而来，由罗马教皇使节勒普伊的阿德马尔主教率领，约6万人，数量上是查理曼所召集部队的两倍。而且因为有各种基督徒海军力量包括拜占庭和热那亚提供补给，军队后勤工作的范围已有了相当大的扩展。从君士坦丁堡到圣地的整条沿线，十字军击败了好几支大规模的穆斯林军队，而这常常归功于拜占庭职业化部队的援助，从轻装骑兵到器械师和海军人员。有争议的观点认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构成了中世纪由一支西方军队发起的最复杂也最艰难的战争。第一次东征所取得的最重要的胜利，就是包围并攻取了一些大的要塞城市诸如安蒂奥奇（公元1098年）和耶路撒冷（公元1099年），这样便使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建立十字军王国成为可能。十字军的战士们勤奋工作，利用城堡为基础的纵深防御体系来保护这些国家，

那些城堡可作为进攻敌人领土和保持供应线的基地。

步兵与骑兵

整个中世纪时代很少发现这样的战斗：骑在马背上作战的人员是战术上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在绝大多数战役中，徒步作战的人数都远远超出马背上作战的人数：5∶1或6∶1的比例在西方看起来是正常比例，而拜占庭人的这一比例则接近4∶1。而且，在中世纪意义深远的绝大多数战役中，绝大多数有时甚至是所有的骑马者也都下马徒步作战。骑兵的进攻很少取得成功，尤其是在没有弓箭手、弩手或其它步行作战部队支持的时候。

步兵战士不仅能够击退骑兵的进攻，在骑兵攻势较弱时还可毁灭来攻部队。然而，若步兵预设的作战程序失败，灾难就可能发生。骑兵常常用佯装撤退来引诱按兵不动的步兵，使他们以一种丧失纪律的方式从他们据守的阵地被引出来，然后骑兵们就可以突然掉转马头发起反攻，在一个开阔的地形中与步兵短兵相接。黑斯廷斯战役中，征服者威廉所施行的佯装败退就对他的最终胜利意义重大。此战术亦可有效用于与骑兵交战。比如928年在科隆内角，一支轻装的穆斯林马队诱惑奥托二世的重装骑兵陷入了一场漫长的追击，当奥托的马精疲力竭之时，其侧翼又遭到预先埋伏好的后备部队的打击。基督徒部队遭到的伏兵袭击后，战争最终结束。

步兵训练的质量可能优劣悬殊，普吕姆的阿博特·雷吉诺谴责他的莱茵兰地区地方部队的一段话常被人加以引用：

> 不计其数的步行者拥向那儿，他们从各个战场、各个乡下房子里出来乌合成众……当北方人了解到这群下贱人的虚弱和缺乏军事纪律更甚于自己防身盔甲的缺乏时，他们便大喊一声冲上去，砍倒他们，疯狂地屠杀他们，那情景看起来简直不像在杀人，而是在杀一批无声的动物。

而在天平的另一端，955年奥托大帝在奥格斯堡附近的拉茨菲尔德战役中对马扎尔人的惊人胜利，则表现了卓越的纪律性。奥托的大部分士兵都徒步作战，所以他们对马上弓箭手的胜利就更为引人注目。

当时的观察家们在认同和反驳当中逐渐明确了在中世纪可被认为是骑兵作战"信条"的东西。征服者威廉在黑斯廷斯遵循了这一传统信条，他不许他的骑兵部队率先去进攻那据守不出的敌人，直到他用密集的箭雨和步兵打击并削弱了敌军的防卫能力。确实，对付被壕沟严密保护起来的敌人，对骑兵来说惟一正确的选择就是跳下马背去做徒步作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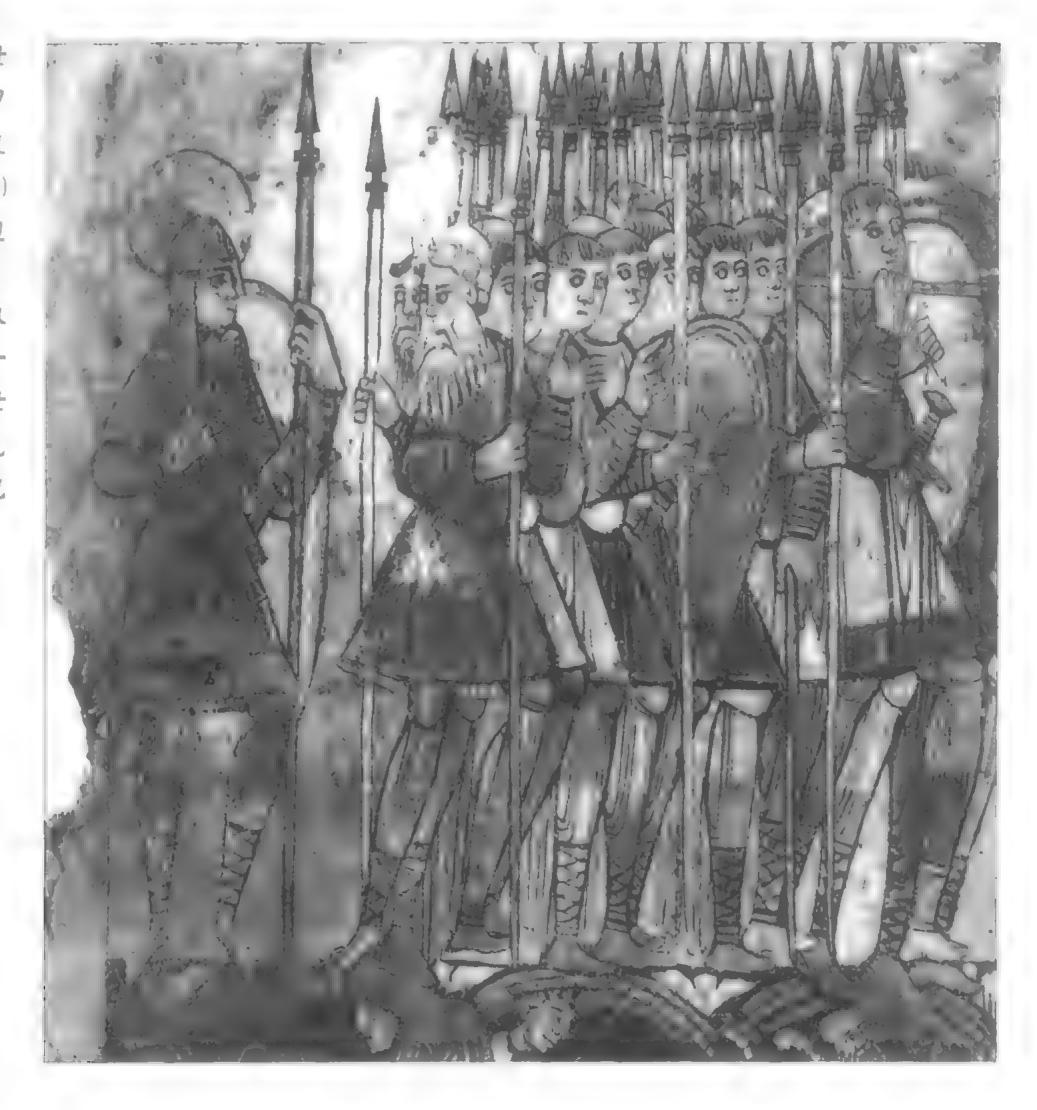
骑兵部队的将领们如果无视这一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信条，居然在没有任何支持的情况下或者在一次正面进攻当中，贸然向据守于工事内的敌人发动攻击，常会发现自己处于重重危难之中。查理曼传记的作者艾因哈德描述了782年法兰克人进攻他们的敌人萨克森人时在辛特尔山区发生的一次灾难：

固定在马鞍中。11世纪时，一个马背上的人站在马镫中挥舞他的长矛(上)，他把马镫作为一个立足点，从那里发起攻击。12世纪时(下)，他坐在马背上，脚在马鞍中，腿将马镫绷向前方，而背靠马鞍的弓形部分，被其托住。敌人长矛攻击时的惊吓只是把他逼至马鞍后的弓形部分中，而不至使他摔倒在马背上。到中世纪末期，马上长枪比赛中的骑马者装备得更像是破坏性赛马会中的骑手，而不像战场上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战士。战斗中的甲胄不像以前那样精心穿戴和防范严密了，这使骑兵战士在马背上或徒步时都能够达到更高的战斗效率。

85

86

在这幅来自安茹的12世纪一本手册的插图中，未着甲胄的步兵和跳下马来的轻装骑兵（手持剑和风筝形状的盾）混合在一起。军队统帅是左边重甲防身的下马骑兵（注意：与别的下马骑兵一样，他已取下了靴刺以准备步行作战，一种聪明的远见）。在整个中世纪时期的战斗中，一直都能见到这种混合型部队，当时的记录称之为方阵。



看起来他们不像是在进攻准备好迎战的敌军阵线，而好像在以血腥追逐逃亡者并聚敛战利品。萨克森人的队列在他们的营地前方安然等候战斗。每个（法兰克）人都以最快的速度策马攻击他们。但战斗一开始，进攻者就被萨克森人团团包围，几乎所有的法兰克人都惨死于萨克森人的围歼之中。

骑兵的作战信条也倡导应把骑兵部队部署在对敌人的侧面打击中。1097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在多里莱乌姆，一半军队遭到了穆斯林的打击，骑兵马上下马徒步作战，另一半骑兵则冲上去救援并自侧面进攻。敌人在夹击之下被击得粉碎，就好像战斗的策略预先就已制定妥当。993年在利雅得，一次这样计划好的奇袭被德国的“捕鸟者”亨利使用，以对抗马扎尔人的一只马上弓箭手部队的进攻。他使用一只轻装骑兵作为诱饵将敌军引入预定的位置，敌人第二串箭还未射出，他的重型武装骑兵就与轻装骑兵胜利会合了。

一些中世纪文本过分夸大了骑兵在战场上所扮演的角色，使之远比事实所证明的更为重要。拜占庭皇帝亚历克修斯的女儿安娜·康奈那在作品中写道，法兰克骑兵的进攻是如此的勇猛，它足以冲破巴比伦的城墙。她说她父亲对诺曼底重型武装骑兵的作战经验，使她确信骑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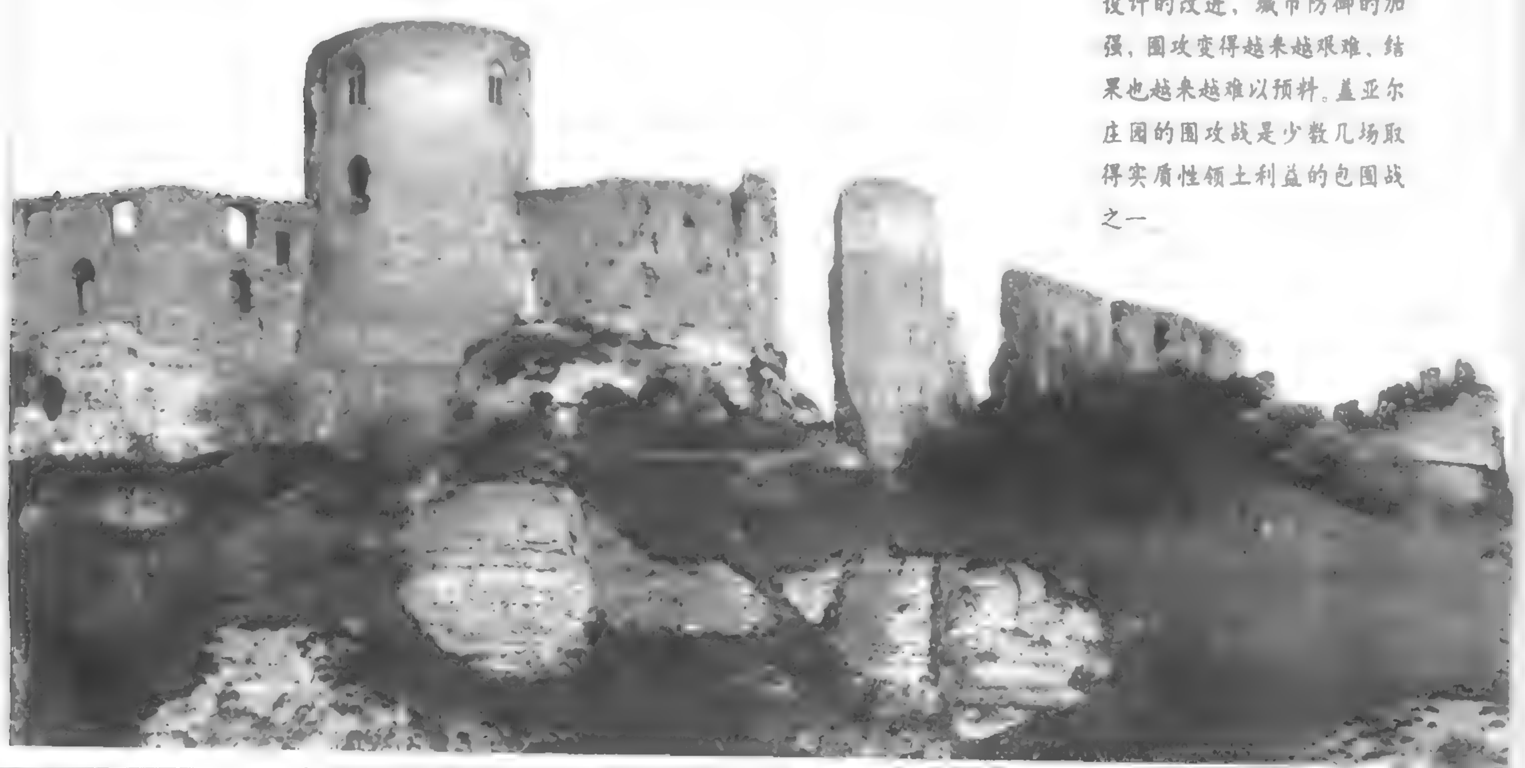
攻击确实势不可挡。更加臭名昭彰的是，中世纪传奇故事和罗曼史居然把骑士描绘成战争的支配者。事实上，亚历克修斯不费吹灰之力就使得诺曼底骑兵享有的优越性归于徒然，他们的正面进攻仅仅由于敌人设置的铁蒺藜和其它一些简单装置就陷于徒劳，传奇故事都是一些不切实际的虚构。

但中世纪的军事决策者和战士们对现实充分了解。他们投入大量财富建筑并维护城墙、堡垒，修造大炮、复杂的围攻塔楼以及连击棒，所有这些都为步兵配置。同时他们还付出很大的努力对地方民兵和普通步兵进行适当的征募和训练。最经常性地被引用、翻译和查阅的一部中世纪早期的通俗散文作品是维吉提乌斯的《军事问题》，它就是一部很少提到骑兵的有关步兵训练的手册。

围攻下的坚固堡垒

加洛林帝国崩溃以后，西欧的地方权贵们集中修建了许多防御工事以保卫他们所在的小规模地区免于敌人的入侵。这些工事在军事上的价值非常有限，虽然它们数量极其众多：单在韦克斯福郡和爱尔兰就有400座，而西班牙中部高原地区有更多这样的工事，以至于人们以它们的名字将一个重要大州命名为卡斯提尔。真正重要的是那些形成网络的防御工事。纵深防御战略经韦塞克斯的艾尔弗雷德、德国的"捕鸟者"亨利及安茹的富克·内拉的发展，在整个中世纪时期一直保持着它稳固的基础地位。这一点从以下这些事件中也可看出：1066年后征服者威廉在整个英格兰地区配置了许多堡垒，而12世纪期间卡佩王朝则宣称控制法兰西岛。

由于这些建筑的存在，围攻战争继续在军事活动中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而发生在战场上的大型战役则相对较少，除了有时发生在围攻者和救援部队之间的战斗外。然而，尽管炮术取得了惊人发展，而且第一次引进了牵引投石机，后来又发明了平衡力技术（它在威力和使用效率上远超过古代器械），但是从12世纪开始，围攻作战逐渐被证明很难取得成功且代价日趋高昂。越来越多设计精巧



盖亚尔庄园(下)于1190年由英王理查德一世以高昂代价(4.4万英镑)筑就。1204年，这个位于鲁昂附近塞纳河悬崖上，在防御诺曼底军队中具有关键作用的要塞，在一次漫长的围攻之后，落入法国国王菲利浦二世奥古斯塔修斯之手。诺曼底自1066年起属于英国，现在则变成了法国领地。从12世纪开始，随着城堡设计的改进，城市防御的加强，围攻变得越来越艰难，结果也越来越难以预料。盖亚尔庄园的围攻战是少数几场取得实质性领土利益的包围战之一

拓建城墙

[illegible]明，西方开始了漫长、艰难而又耗资巨大的拓建周围城墙的工程。这些只有靠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才能完成的工程表明，当时的思想家像他们的前辈一样赋予了要塞城市以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英国，设防城镇的数量增加了一倍，约达到200座，其中绝大多数新城墙宽6英尺，高20到30英尺。出于一些缜密的考虑：为了给难民提供住宿，为了给未来[illegible]留下余地，为了在墙内种植庄稼和放牧牲畜，也为了保护镇中心免被炮火轰击，许多城墙都围进了一些尚无人居住的地域。有些新的防御工事的确变得非常庞大，例如在约克，城墙向外延伸了两英里以上。

[illegible]一个原城墙的周长为2000码的古罗马城市外围建筑起一道4000码长的新城墙时，防御的周边长度虽然仅仅是以前的两倍，但圈起的范围却从25万平方码增加到四倍即100万平方码，于是[illegible]了一倍，但居住在防御区域内的居民却是原来的四倍了。

这样，围攻部队便在两方面被新延伸的城墙所挫败：[illegible]方面，必须克服的物质方面的障碍增加了，另一方面成功地围攻所要求的军队数量也相应大大提高。[illegible]防御一方来说，被保护人口的百分比却下降了。

结果，就在整体人口迅速增长的同时，西欧国家大量的城镇居民却卸下装备，走向了非军事化。

在法国南部的卡尔卡松城，古老的内层壁垒(右)仍然矗立在罗马人和西哥特人所立的根基上。8世纪时，他们这座城失陷在摩尔人手中。法王路易四世统治时期(公元1214～1270年)增修了外围城墙，卡尔卡松是鲁西永边界上的一座牢固的军事重镇，后者直到1659年才成为法国领地。

的人造防御工事表明，防御艺术已不仅仅是与防御技术并行而是超越了它。主要大国如英国和法国政治力量的增长，也使得仅凭一次成功的包围战就推翻一个王朝成为不可能。

紧张的训练和部队的高度团结极其关键。若用50个坑道工兵来挖一条长仅100码的位于城墙下30英尺的坑道的话，就需要有专门的技术知识和良好的训练，而且他们之间的凝聚力也必须足以反击进行地下破坏的敌人。利用破城槌在敌人炮火下攻城的战斗小组，或是夜以继日向敌人发射武器的投掷部队，当然也都需要类似于现代坦克或迫击炮组的严格训练和团结精神。甚至在接到指令的一个12人组扛着45英尺长的云梯穿过100码危险空地并把它稳靠在城墙上，然后以预定的程序向上攀援时，所需要的也远不只是那种“无声的勇气”。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后的两个世纪之内，许多西方国家扩编了军队。这一现象反映出欧洲人口、财富的增加及少数大国对外扩张能力的提高，同时也表明许多其它小国家已被消灭或被吸收吞并。例如在英国，12世纪晚期的君主们可以聚集起2万人的骑兵部队，而在1214年的布文战役之中，抗击敌军的综合部队人数可能已达至4万。进入13世纪末时，爱德华一世（死于公元1307年）为了在威尔士和苏格兰的战争，在重复的基础上召集了2.5万名步兵和5000名骑手；法国的皇家军队可能也达到了相同的数量规模，单是王国南部就能为“平等”菲利浦（死于公元1314年）提供2万名士兵。

在13世纪的意大利城市国家，为了防御和进攻附近的敌人，可召集的军事力量看起来也极其可观。米兰据说有可能从居住在城市本身的20万人中募到1万名骑兵和4万名步兵，当然人们也可能对此有所夸大——也就是城市总人口数量的1/4——另外还可以从它的600个附属社区中募用3万人。佛罗伦萨的数目看起来更接近现实一些：总数为40万的人口中可募用2000名骑手和1.5万名步兵。

骑士神话

此前不久有一个罗曼蒂克的时代。人们渐渐相信中世纪战争，是由那些被狂热的骑士精神所驱使的缺乏训练的封建领主承担主要角色的。因为他们有极浓重的独行侠风格，战斗中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是单个骑士之间的马上突袭。但这种观点却是一种谬误。

有三个理由可解释中世纪军事记录和那些不确切的解释之间为什么存在着差异。

首先，封地在欧洲的财产法律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相反，在军事问题上的角色却并不那么重要），这样它自然便赢得了那些关注法律制度历史的学者们的高度注意。第二，西欧绝大多数封建领主都是贵族，而他们留下了大量的待以研究的文件——“羊皮纸上的遗迹”。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被称为武功歌的浪漫史诗创作了一幅各方面都在对人们进行误导的中世纪战争的画卷。它把马上骑士描绘成一种中世纪战争尤其是欧洲战场的支配角色——正像美国电影院中的“西部片”所表现的那些牛仔，他们单用他们的六响枪就神话般地征服了边疆。

这两者都是不真实的虚构。消遣性的军事文学和中世纪时期的一些比赛把骑

在围攻作战中，骑兵一般无足轻重，但这儿的插图却对骑兵给予了最大关注，表现了骑兵支持者和艺术家们的心理偏向。画面中，骑兵所占空间分配的失调比例及过大的体形都表明了这一点。它运用了西方艺术家传统的以空间占有大小和富丽程度来突出重点的手段，但武器和其它装备被精心描绘，这又为画面提供了一种现实主义的氛围(来自推罗的威廉关于东征国家的手稿《历史》，写作并绘图于公元1280年)

在马上的那些人的重要性做了普遍的宣扬并过分地夸大了，而且，他们的后代太长时间以来也错把小说和戏剧等艺术形式作为现实接受了下来。

中世纪的那些人把自己看作战斗精英，他们通过歌曲、故事，甚至通过艺术家和历史学家的渲染来竭力制造这样一种神话：骑士才是中世纪军队中的精英人物。然而事实上，那些为主人服役40天然后就返回封地的骑士和封建主在军队组织中的地位根本就无足轻重。这种持续不到两个月的短期服役形式对战略设计和组织长期战役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损毁了封建统治者们期望于那种制度

的一切利益和价值，难怪现代作家的作品比中世纪的一些资料更频繁地向“封建主”寻求参考。而且，在整个中世纪欧洲，为地区防御所进行的民兵训练和对进攻性军事行动的步兵部队及大量弓箭手、弩手的支持，都清楚地表明那些制定军事政策和宏大战略的人赋予了步兵以重大意义。

最后，骑兵的徒步作战训练和围攻战所占据的支配地位，也都清楚地表明了中世纪战争的多面性质：其中，围攻作战起着决定作用，而罗曼蒂克文学中的骑士行动只不过是那个复杂均衡结构之中的一个浮华的花式。

第五章　新武器新战术

92

虽然整个中世纪时期的士兵一直徒步作战，但在13世纪时步兵开始在西方战争中担当起一种意义越来越重大的角色。尽管受到社会谴责，但弓弩却日益频繁地出现在战斗中，对骑兵战士和他们的马造成了严重威胁。每分钟射出十支箭的长弓（与慢得多的、射速为每分钟两支的弹弩完全不同）可以轻松地穿透锁子甲。用金属薄片制成的盔甲从1250年左右开始被引进，这表明人们已开始意识到需要对弓箭的新发展做出反应，这种发展持续影响作战方式直至一个半世纪之后。

在新的射击武器下寻求自我保护非常必要，但这却又不可避免地把骑兵变成了一种更加沉重、灵活性更弱的"战斗机械"，而且也使战争变得更昂贵。很大程度上由于经济原因，传统上组成封建骑兵的贵族们发现，维护他们的军事地位和角色并履行来自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忠诚感的作战义务逐渐变得困难起来。因为恰在战争花费上升的时候，他们所得的财产税收却在下降，这不仅影响到他们的战斗力，也影响了他们参战的愿望。

政治因素在西方也影响到战斗，在中世纪的最后几个世纪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蔓延的野心在增长。很多国家都想脱离对别国的依赖而争取自治。14世纪早期佛兰德公社脱离了法国王权的统治；在苏格兰，英国国王的"帝王"权力在独立战争中遭到了猛烈的抵抗；在瑞士，有好几个郡起来反抗奥地利的霸权；进入同一世纪末，葡萄牙人在阿尔茹巴罗塔战场上（公元1385年）确立了他们的民族独立，而下个世纪在波希米亚又发生了成功反对德国统治的一些战争。在这些风起云涌的冲突中，军队越来越多地从相关的普通人员中招募士兵。

公元1377年左右的一名德国骑士。他戴着护胸甲，外面是一件紧紧固定在身上的紧身战袄，下身是战裙。这套护身装备的许多部分都是锁子甲，但事实证明它太易为箭所伤。因此14世纪下半期，金属薄片做成的甲胄开始得到日益广泛的使用。

矛和弓箭

在佛兰德，军事和政治的控制对本城居民是短暂的，他们现在已构成了追求独立的军队中的中坚力量。在英格兰，罗伯特·布鲁斯（罗伯特一世）率领一支极"受人欢迎"的部队，使用完全不同于与贵族骑兵作战方式的游击战术与英格兰作战；在瑞士（像苏格兰一样，多山地形不适于使用重装骑兵），普通步兵比骑兵部队更有前途，尤其在被用做侵略性战术的一部分时更是如此。而且，与那些士兵极其低微的社会背景相符合的武器也开始大量使用。矛、戟、枪、棍和斧头制造起来都比较便宜，尤其是戟，带有一个能把敌人拖下马来的弯钩，事实证明，它是一种非常适用的"民主"武器。最重要的属长弓，它是非常便宜的"流行"武器，与过去那种水平端起然后引发的小弓相反，长弓方便与肩垂直，此时射出的箭距离更远且具有更高的精确性。众箭齐发的时候，长弓是一种极其高效的武器。英国人学会了把长弓与马上作战的武装骑兵（使用长弓和剑）相结合，后又把它与弓箭手并肩作战的武装骑兵相结合，从而把长弓的潜力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种

93

战术有很大优点。它保持了与过去的某种继承性，给予武装士兵（拥有一定社会身份的人）在作战中的一种新的、真正重要的角色，包括做他周围人的先导。同时，它也有助于在军队中的各种不同因素之间创造并发展出一种凝聚力，并因此而将战争导向胜利。

当英王爱德华一世于13世纪最后25年间侵入威尔士时，他也进行了如此实践。在部队前方，步兵与骑兵的比例约为15：1，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使武装骑兵与固定作战的弓箭手及弩手结合起来。这一战术体系在对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的战斗中均已奏效。弓箭手和骑兵现在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新的战术体系：先用弓箭使敌军陷入混乱，然后再用骑兵强攻敌人，在武装士兵的陪同（并保护）下，弓箭手现在可以坚守在他自己的位置上，而不必在骑兵进攻的危险面前弃弓箭逃跑了。

14世纪早些年的一些事件强调了骑兵在没有支持时的脆弱性。1302年7月，一支利用当地民兵和市民力量的弗莱明军队，在法国边界附近的库尔特累击溃了一支法国骑士军（约消灭1000人），他们的武器是矛和枪。虽然这次损失惨重的骑兵失败得很痛苦，但它不过是一个反兆：不久之后法国骑兵在蒙桑派韦勒（公元1304年）和卡塞尔（公元1328年）打败了弗莱明人，并将再次使弗莱明公社在1382年的罗斯贝克饱受蹂躏之苦。

库尔特累之战并不仅仅是一场意外胜利。1314年6月，在斯特林附近的班诺克本，英王爱德华二世也眼睁睁地看着他的骑兵被罗伯特·布鲁斯所率领的士气旺盛的苏格兰人击败。虽然他的骑兵有超过2.1万人的一支步兵部队与之配合，但英格兰步兵在此战争中的作用微乎其微。在这场决定性对垒中：

> （苏格兰人）三个步兵营从森林中冲出来，勇敢地杀向英格兰军队，而那些英格兰军队整夜手持着武器，把马系在树上。由于不习惯徒步作战，英格兰人连忙吹响警报匆匆上马。然而苏格兰人已吸取了先前弗莱明在库尔特累徒步击败法国人的经验，他们组织所有持矛士兵一群一群列队前来，向英格兰人的队伍发动进攻。对方被紧紧地压成一团，毫无反抗之力，因为他们的战马已被矛刺中，后方的英格兰军也缩回班诺克本峡谷，彼此践踏，死伤无数。[94]

1315年，为奥地利的利奥波德服务的一支骑士和男侍部队在莫尔加滕被来自瑞士施威茨和乌里的山地居民击败，而1319年时，在萨克森的迪特马申，农民们又赢得了另一场对骑士们的胜利。

苏格兰、瑞士和萨克森民兵部队所取得的成功，代表了一种新型战术的发展：密集的步兵充分利用有利地形向敌人发起进攻性极强的冲锋，将骑兵压缩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然后出其不意地将其活捉。未来的战争越来越依赖于密集队形或大规模部队作战，事实证明这种方式无论在进攻还是防御上都相当成功。

但这些新型的创意并非在任何地方都无往不胜。在意大利，马上骑士们取得了短期的支配地位，直到1450年，甚至是受到高级训练的大规模步兵也很少能对他们的战场霸权形成挑战。例如在1320年到1360年之间，据知约有700名骑名领袖（绝大多数是德国人）在意大利活动，他们率领着由退伍老兵组成的“自由连队”。起初只是暂时联合在一起向城市居民敲诈一些战利品，但后来逐

来自英国北安普顿郡的马林斯韦特纳姆的葬礼画像，他死于1416年。画像展示了全副的金属甲胄：从头盔到颈护，通过关节相连的手臂、臂部和腿部护甲，直到密护的足甲

中世纪后期伟大的军事领袖之一约翰·霍克伍德出生于英格兰科尔切斯特附近一个制革工人的家庭。自1360年起，他率领着其雇佣军为意大利不同的城市国家作战，直至1377年进入佛罗伦萨军队中作为对25万佛罗林银币的回报，他忠心服务于这个城市直到1394年离开人世。1436年，佛罗伦萨最著名的艺术家保罗·乌切罗在大教堂为他的葬礼立了这座纪念碑，以永远铭记这位伟大的教堂卫士。

渐成为固定的队伍，绝大多数时间受雇于意大利众多的城市国家。由普罗文卡尔的骑士蒙特利尔·德·阿尔巴罗（意大利人称作弗拉莫利尔）领导的"伟大连队"于1350年数目达到1万，这只是作战人数，另外还有2万名随营人员。"伟大连队"的"恐怖统治"因"白色连队"的到来而结束。"白色连队"由6000名法国战争中的老兵组成，蒙费拉的侯爵将他们邀请到意大利。1363年在米兰西部坎图里诺桥的一次战斗中，"白色连队"（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它的成员们比当时的意大利士兵穿着更多的金属薄片甲胄，且总是由侍从们擦得闪闪发亮）击败了它的敌人并且很快在约翰·霍克伍德爵士率领下，首先进入比萨，然后是在教皇麾下，最后是在佛罗伦萨当差。到1394年死去之前，霍克伍德一直在此地担任总司令。然而在城邦中当差并未阻止他们继续敲诈，也未剥夺他们寻找战利品的权利。锡耶纳共和国在1342年到1499年间曾37次被迫接受"自由连队"的"造访"，城市长老们经常得出这样的结论：对这些经验丰富的职业老兵进行绥靖和安抚，要比动员军队与他们作战来得更便宜，而且，这样做也不致使自己的国家陷入混乱。

百年战争

百年战争（公元1337～1453年）是此期最具重要性的冲突，因为它历时很长。这是一场因英国引起的征服战，也是一场反击法国的自卫战和自立战。发生在克雷西（公元1346年）和普瓦捷（公元1356年）的那些战斗表明，法国决定维持那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骑兵完成的突袭战术。而作为防守者，英国人绝大多数时候在受到攻击时都下马迎接进攻，紧接而来的短兵相接便为徒步作战的一方提供了相当的优势。同样在阿金库尔（公元1415年）之战中，英王亨利五世面临的是数量上占巨大优势的敌人，但他只从容等待法国人前来进攻。又有一次，许多前进中的骑兵和步兵甚至在他们根本未接触到英军阵线之前，就被密集的弓箭射到在地上，射来的箭就像云层一般，一个目击者如此告诉我们：

如果防守者训练有素，武器精良而且纪律严明，则进攻者要想击败他们必然会越来越困难。第一次进攻被防守者密集的箭雨大大削弱，而防守者的军队已摆好阵势，随时采取主动反击来打击丧失斗志的敌人，骑兵也严阵以待，只等去追击那些妄图逃离战场的人

普瓦捷战役（公元1356年）是入侵法国的英军所取得的一系列辉煌胜利之一。他们依靠弓箭手和马下武装士兵对抗法国的马上骑士。弓箭手信心十足，骑兵却不如此，他们的马显然太容易为箭所伤，有的马已经受伤，开始后退了。在接下来的溃败中，法国国王自己和他的一个儿子也沦为英国人的阶下囚

然而，虽然百年战争中发生了一些重要的战斗，但14世纪英国主要的攻击战术仍是突袭——或马队入侵——它在法国使用时只派较少的部队，有时只有两三个人。突袭的主要目标是通过一种旨在破坏敌人的经济、社会结构、人口而不是摧毁其军队的战争来削弱敌人的士气，并消灭其经济上的纳税能力以摧垮敌人抵抗到底的决心。用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生于1309年）的话说：

在我的青年时代，英国人曾被看成是最温顺的野蛮人。但今天他们却是一个战无不胜的好战民族。他们已经通过无数次的胜利推翻了法国人在军事上获得的荣耀。这个民族曾经比可怜的苏格兰人更低劣，但他们却用火和剑把整个法兰西王国毁坏到了那样一种程度，以致我最近因生意上的事情横穿法兰西时，不得不强迫自己相信：它确实是我以前见过的那个国家。但它再也不是老样子了，城墙之外没有一座建筑仍旧站在原地。

96

在这样一种恐吓性的战争中，不需要精良的武器甲胄，也不需要军事贵族的传统美德或技能。突袭中使用的马可能是小而便宜的劣种马，但一般士兵在纵火焚烧一个村庄或农民的谷仓时，其表现就和它们的社会地位一样出众了。他们迅速行进——有时一天十英里，就像1355年由“黑王子”率领的阿基坦人的大突袭一样——为尽可能多地破坏敌人领土，部队以平行纵队铺开，他们希望能迫使敌人作战或干脆逃跑，从而把国家丢下任凭他们进一步随意践踏。1346年（在克雷

西）和1356年（在普瓦捷）英国人实现了前一个愿望，而1355年（在卡尔卡松袭击中）和1359年（兰斯战役）他们实现了后一个愿望。1360年，英军的灵活战略导致了布勒丁尼和约的签定，这一和约赐予爱德华三世对法兰西1/3领土的绝对统治权，并因释放普瓦捷战役中被囚的约翰国王勒索到一笔巨额赎款。

围攻和火炮

尽管这种战争方式使法国的经济和尊贵荣誉都遭到了极大的毁灭，但它很少能迫使敌人全面投降。因此1415年英国转采征服性的战争方式，企望以此带来全面的胜利。这一希望到1420年前都会实现。新的目标要求使用其它一些旧方法，尤其是围攻，因为占领一座城堡或军事重镇可能导致对其整个国家的军事控制，有时甚至最终发展到签署一项政治和行政控制的议案。如果说亨利五世在阿金库尔的胜利相当引人注目的话，那么他在阿夫勒尔、法莱斯瑟堡和鲁昂的围攻亦是如此。鲁昂的占领，使英国控制了诺曼底并使英国进一步扩大了攫取领土的野心。

围攻是一种进展比较缓慢且缺乏戏剧性的方式。它需要有大量专业人员，尤其是地道士兵和那些擅长炮术的人——15世纪早期，传统的投石机和其它利用拉力和杠杆作用的武器仍和新的火药大炮（参阅第6章）并肩作战（如果不总是互相结合的话）。新型武器必然为围攻增添生气：正像当时的一些描述所证明的那样，对防御者来说，生命的危险性大大增加。为了阻挡那些骑马出动的突然袭击者，14世纪法国增设了许多以围墙设防的城镇。然而对于进攻者来说，倘若他能接近这些城镇，使它们进入自己的有效射程之内，那它们就成了挨打的死靶子。射程是关键，它常令拥有较大火炮武器的围攻者比防御者更占优势。那些防御者的火炮经常是较小的。对被围一方来说，面对着一个以良好火炮装备的敌手，问题不是他能否抵抗得住，而是他能抵抗多久。15世纪中期时，像当时的证据所清楚显明的，正是由于火炮造成的威胁，法王查理七世才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就重建了那些要害城市，这些地方在一个世代以前曾更长时间地抵抗了英国人的进攻。火炮带来的不只是毁灭，它还带来了恐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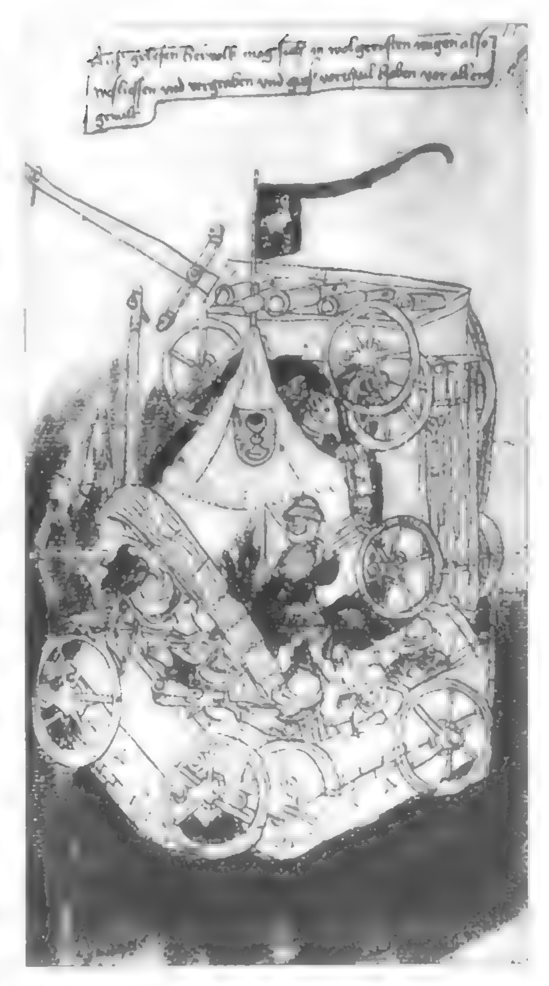
胡斯派和瑞士人

火炮使用的增多和修筑防御工事成本的增加，大大提高了战争的花费，但是并非所有的革新都贵得如此荒唐。例如，15世纪头25年间波希米亚的胡斯派发动的独立战争中，对骑兵的完全轻视和低微的战争花费形成了他们军事组织和作战方式的主要特点。由于民族主义、地区主义和社会平均主义的驱使，1415年以异端罪名被判处死刑的约翰·胡斯的一些追随者企图建立起一个国家，以实现他们激进的政治、社会和宗教观点。在此过程中，他们引进了革新的战争方法，历史证明这种方法将产生长期的影响。在一位天才军事领袖约翰·日什卡的带领下，他们发明了一种属于自己的特别作战方式。例如，他们用许多马车组成了流动的车堡。它的发明最初是为防御部队抵抗骑兵的进攻而用，但后来它被用来进攻——几乎像用坦克一样——以驱散并击退敌军，然后再返回原地，就像1421年12月在

97

波希米亚的库特纳·霍拉，当日什卡和他的部队差一点被敌人包围的时候他所做的那样。

日什卡的声名和战绩至少应部分归功于他的机智：马车实质上是一种农具，就像他的支持者们所使用的连枷（大量制造以用于战争）和矛，但胡斯派部队的成功绝对不是因为它最早在战场上使用了火炮，并且以马车把火炮从一个地方运至另一个地方，而是因为其它一些原因。在另外一些地方，沉重的火炮和迫击炮也被放在四轮马车上运送至各处。到达使用地点后，它们便被卸下来，固定在炮架上准备发射。直到15世纪中期——很奇怪如此之晚——一些资料才提到利用两个轮子并带着“炮耳”（架在炮管其中一边的木桩，作为调整炮管角度的轴心）的马车。这样取得的灵活程度和快速行动能力，使火炮在战术作战中越来越成为必不可少的角色，尤其是打击那些移动缓慢的目标时，比如企图爬上某野战工事或在艰难地形中拥挤在一起向前挪动的队伍。但是，发射频率过慢和意外爆炸的危险，意味着火药、火炮还是一种不成熟的武器。



15世纪初期，波希米亚的胡斯人用“车堡”——由许多农用马车组成的流动堡垒——保卫自己的独立。它们极为普通和廉价，突出体现了构成军队主体的农民的低下出身。部分马车负责掩护发射弓箭、手枪和投掷石头的步兵；另一部分运载野战炮兵和备用武器。虽然其用途主要是为了防御，尤其是对付骑兵，但流动车堡在进攻能力方面也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与之相反，15世纪下半期在法国和勃艮第军队中服务的瑞士部队使用的基本上是矛和手枪。由于富于作战经验的人口比例甚高，而且一般不存在社会背景的差别，所以他们的作战风格是偏爱集团性的进攻。当面临一次围攻战时，他们通常的选择是迅速行动，比如突然袭取敌人防线。他们很少去俘虏敌人（在那些以俘获富裕敌人作为战争主要诱因的贵族社会中，这是最普遍的做法），而且，他们向敌人挑战以激起战斗的嗜好与那种被广泛接受的逃避战争（因而也是失败的原因）的做法迥然不同。所以，几乎没有什么奇怪的，瑞士人成了最受欢迎的雇佣军，他们被雇主训练并用传统武器加以装备去迎接骑兵的进攻。在15世纪行将收尾时，对他们最具威慑力的策略仍是骑兵突袭。

骑兵的生存

如果说骑兵时代已经过去，那就错了。虽然很少有哪个地区像意大利那样由骑兵占据着绝对的支配地位，但15世纪的法国军队仍然包括许多轻骑兵、重装骑兵，同时还包括骑着便马的步兵，而勃艮第公爵们的对头部队中也并入了重装骑兵。这一情况说明了很多问题。其一，是传统的封建主义社会秩序在法国和勃艮第仍然幸存了下来——可能是一个骑士，也可能是贵族圈中的一个骑兵战士，都能折射出那一秩序的持续影响。在勃艮第，也保存着在公爵“好人”菲利浦的漫长统治时期（公元1419～1461年）曾被精心培育和鼓励、影响深远的骑士传统。也许这得归功于法国王权（如今已从和英国漫长的争战中恢复过来）新产生的领土野心。15世纪下半期呈现出某种战斗的复兴趋势，在过去的100年中很少有这种趋势。在这一点上，包括了瑞士人积极参与的法兰克—勃艮第战争。在15世纪的第三个25年中，关于如何作战、用何种部队去作战的原则具有特别的指导意义。

这幅画描绘了英王亨利四世和叛乱者珀西家族军队之间的什鲁斯伯里之战(1403年7月21日)。它生动地表现了综合作战的巨大威力以及骑兵部队的战马和骑手们的蓬勃活力。此画作于15世纪90年代，它强调了这样一件事实，被金属薄片制成的甲胄所保护起来的骑兵在决定整个15世纪期间许多战争的最后结局中，仍然充当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由于战马和通过越来越精巧的金属薄片甲胄（它意味着骑马者已无需使用盾）使驭马者得到安全的保护，骑兵上演着某种回归。虽然火炮，尤其是便携式轻武器正被日益广泛地加以使用，但它们的发射频率仍然很低。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的那些战斗（公元1476～1477年）和格朗松之战（公元1476年3月）、马拉之战（公元1476年6月），最后是南锡之战（公元1477年1月），所有这一切作战都证明骑兵仍然实用。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若没有它，任何一支15世纪的部队都不可能在战场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尤其在敌人缺乏高效的火炮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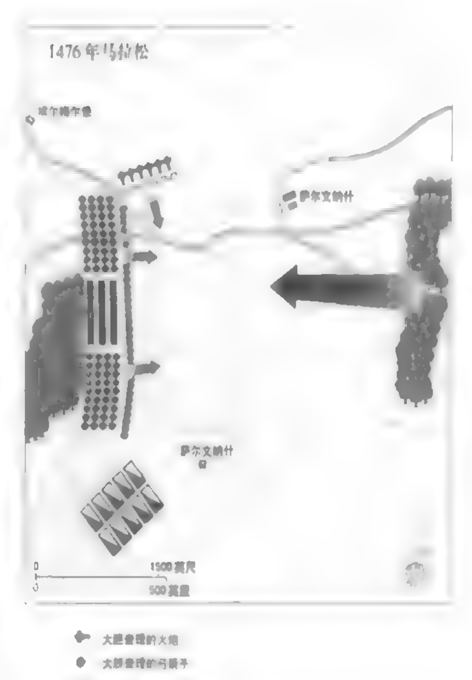
中世纪晚期的军队

这是一个变化的时代，不仅由于技巧方面的因素，更重要的是由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现实。勃艮第的查理公爵可能并非他所自比的亚历山大或恺撒，但他敏锐的预见力和丰富的经验使他意识到，他的军队中必须拥有各式武器，包括传统的和新式的。他在1472年创建的军队是前几年大变革的产物，它包括重装骑兵(约占15%)、骑马的弓箭手（约占50%）、矛兵（约占15%），手枪队（10%），以及徒步的弓箭手(10%)。虽然只是估计，但这些数字强调了马在战斗中的重要性，它的作用既不容忽视更不容被遗忘。

虽然如此，“大胆”查理的军队和其它军队却仍由步兵占据着统治地位。14世纪的英国，骑兵（武装士兵）和步兵的招募比例是1：2。15世纪早期亨利五世统治时，正常比例是1：3，到40年代招募工作变得非常困难时，这一比例一直上升到1：10之高。意味深长的是，步兵数量增长的这一变化在法国比在英国要慢得多：直到15世纪开始，法国军队的比例仍保持着一名骑兵对一名步兵，后来变化至1：2。接着，在15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英军被法军从诺曼底并最终从阿基坦驱逐出境时，才上升至1：5或1：6。在西班牙，一个世代之后重新征服了格拉纳达的军队中，每3名或4名步兵对应一名骑兵。只有在因社会－宗教的因素发生战争的国家里如波希米亚，这种比例才有很大的不同。1422年由神圣罗马皇帝西吉斯孟德派遣的对抗胡斯派人的军队中，共有1656名骑兵和3.1万名步兵，比例为1：19。

由于在环境、军事目标和可筹军费上的不同，各个军队自然会在规模上相差悬殊。13世纪末，许多由被迫服兵役者组成的军队规模都比较庞大。1298年英王

爱德华一世入征苏格兰时，身边几乎有3万人（以一名骑兵对大约8名步兵的比例）。1340年夏末，法王菲利浦六世在所有战场上调派的军队总人数达10万人之多。有的是他直接供养的，有的靠他辖下的各城市和贵族们提供帮助。同时，他的对手英王爱德华三世及其盟军约保持着5万人的兵力。不过，这些可能已构成了中世纪晚期最大的作战组织。薪俸部队的发展，加上1348年后布莱克之死的冲击，军队规模很快便降下来。进入14世纪末，一般的法国军队仅包括5000人，尽管1417年亨利拥有高于这个数字两倍的军队，而威尼斯的军队在1430年左右也拥有约7000人的军队。



在1475年5月发生的马拉之战中，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将其部队部署成一种复杂的结构加以利用：步兵与用篱墙保护的弓箭手部队互相交替，步兵的右翼是骑兵，左边则是以壕沟掩护的火炮。亨利统率的总人数在1.5万到2万之间。但在此期间，有一次当公爵允准他的大批部队后撤回营时，三支瑞士持矛兵的冒险进攻，突破了勃艮第人的防守。

中世纪的海上战争

对峙不只发生在陆地。英法之间漫长的冲突使海洋在战争中的角色变得越来越重要。为了在欧洲大陆作战，英国必须从海上运输他们的人力和马匹（成千上万），以及各种形式的武器、补给和装备。为了这一目的，必须找到船只，并能保证在需要它们的时候可随时使用（这种需要可能会持续数月之久）。皇家军官们通过公开征用的手段掠夺了一些商船。但这种方法收效太慢，而且在商人和渔民阶层引起了强烈反抗。另一方面，13世纪晚期在法国，菲利浦四世在鲁昂的塞纳河上兴建了一座造船厂：克洛·德加莱斯造船厂，目的是给法国的王室制造属于它自己的船只（能够迅速投入作战的船只），同时提供一些船只修理设施。

1340年6月，在英法百年战争的第一次战役中（可能也是最血腥的），爱德华三世率领一支强大的远征军越过英吉利海峡抵达佛兰德的斯勒伊斯港口。但他发现法国的舰队早已在港口前面准备就绪，决意要阻止它登陆。用编年史学家让·罗萨尔的话来说是这样的：“我正在谈论的战争极其污秽极其恐怖，因为在海上的进攻和作战要比在陆地上更艰苦也更残酷，你既无法逃跑也无法撤退。”正像另一位英国编年史学家杰弗里·列·贝克所描述的那样：

100

> 从弓、弩射出的箭似一片铁云袭来，纷纷落在法国人身上，成千上万人瞬间死于非命。就连那些胆子够大的或好奇心很强的人，一旦被逝在身边的矛、剑、投枪所包围，也开始喘息起来；从船上堡垒里掷下的石头也杀死了许多人。总而言之，这毫无疑问是一场既重要又严酷的战斗，惨烈得让一个懦夫从远处都不敢观看。

当时估计法军大约损失了2万到5.5万人（现在的这个数字被缩小到大约1.6万到1.8万人），包括那些与舰共存亡的指挥官们。斯勒伊斯的失败对法国称霸海上的野心是沉重一击。

亨利五世也很重视保有海上控制权。为了保证实现他在法国的军事野心，他部署了一支由39只战船组成的舰队，一些战船是靠继承、俘获或购买而逐渐积累起来的，另一些则是在他于南汉普顿设立的新船坞里修建的。

15世纪的海战主要是以箭矢、掷石及在战斗中的短兵相接。在这场1416年的战斗中，桅楼里的一名法军士兵试图向下面甲板上的弓弩手和划船战士投掷圆石时，被箭贯当胸。这些弓弩手保卫的是渡海至英格兰的沃里克伯爵理查德，他是英属加来港的长官。注意图左侧船边上突出的两门小火炮以及重炮位的缺设。

北方水域那种典型的高弦船需要码头的便利条件（或者至少要与码头高度相齐）以卸货或下人。但是浅龙骨的，由帆或桨驱动的单甲板平底战船却可以登岸。中世纪时，卡斯提尔和热那亚两地是这种船只的最大供应商。百年战争中，英法两国都竭尽外交手段来取得两地的支持，其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1372年一个平静的夏日，一支卡斯提尔舰队在比斯开湾击毁了一支英国海军船队，而这支舰队自己也于1416年8月15日被另一支英国海军船队击沉在塞纳河口。这支船队里还包括了一些热那亚战船，他们是帮助该军对英国在前一年占领的阿夫勒尔进行海

陆封锁的。

在这种封锁中，海陆战役往往结合起来。1346～1347年，英军对加来港实行了以海上封锁为后盾的长时期的陆上围攻，迫使其投降，赢得了在欧洲大陆上的一个宝贵前哨（占领至1588年）。港口和港口的控制，无论是为了保卫漫长的海岸线（例如法国），还是出于进攻目的，都是至关重要的。所谓港口，就是这样一些地方，舰队可以在此集结，也可以在此被摧毁，它使得海军作战通常只发生在近海的浅水里而非远海。港口若坐落在河口，也就同时控制了河流。1415年对阿夫勒尔的占领，使英国有机会海运士兵和大炮，并封锁了塞纳河至卢昂的河道，对该城进行长期禁运，从而于四年后最终占领卢昂。河流在一国范围内运送火炮和其他重武器装备的作用尤其重要。英国认为，若想控制河流，必先获得并保证海上控制权。15世纪时，如何设法取得海上控制权，已变得越来越重要，而这一目标若没有海军协助，便无法达到。海军的众多任务中，将包括对一个国家合法贸易利益的保护。

102

国家和战争

正如让·德·比埃伊在1466年写的军事论文《源泉》中说的那样，"所有的帝国和统治均在战争中发现了自己的起源"，中世纪也不例外，但国家的建立与国家的保卫一样，都要依赖于军队。1300年就已经有了短期服务的雇佣兵制度，意大利众城邦的壮大也使用了此种方法。但英国、法国和北欧比较大的王国，却仍然继续主要依靠传统的社会体制来提供战争需要的兵员。随着战争中封建义务的衰减和战争时间的延长，以及士兵们迫于经济需要不愿参与无利益战争的情绪，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为整个战争服务支付军饷的做法。

这种办法从13世纪晚期开始迅速蔓延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后果。因为涉及到大笔款项，而只有中央政权（国王、诸侯、"国家"）才有权通过税收来筹集、提供这些钱款，参战者与付钱者之间就分担了战争的责任。因此，统治者作为付钱人，就变成了雇佣者，他通过军事合同与那些为他效忠的军队达成协作关系。这在英语里被称做"契约"（indenture），法语里叫"the lettre de retenue"，意大利语里为"Condotta"。

契约是一份既有实际意义也具象征意义的文件。它预示了一个社会的领导者有权决定宣战还是议和，同时也宣布他有明确的权力来任命某人在战时领导军队（这些人是如何被选出或根据什么条件被选中，则是另一个问题），最后它还给予统治者以权力，来坚持确保效率的标准：那些接受报酬的人有义务去训练和服满既定的期限（开小差成为一种重罪），并根据契约中的协议，被配备与他们在军队中地位相称的武器。进行操练的需要，主要来自罗马帝国的传统，也是亚里士多德"任何国家都应枕戈以待"的思想在当时复兴的结果。对一些人来说，两个对手之间进行的通常是攻击性的打斗，和那些练习军事技巧的比赛看上去都是很必要的，而对另一些人而言，进行训练的重要性被认识得更明确。在英国，《阿姆斯条令》与《温切斯特法规》开启了一系列规章，这些规章受到王权的鼓励，强调身体健康的男性成年人有义务准备参战。类似的规章、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风行

104

在那些由勃艮第公爵、"勇敢"查尔斯委托付印的书籍中，有一本法文新译本《亚历山大大帝的伟业》。查尔斯对这位伟大的军事领袖推崇备至。图中，马其顿人正不顾海滩上三门火炮的轰击，试图在塞西亚登陆（这种火炮配有药室里装火药的炮弹和一种能提拉炮筒的装置）。战船甲板上也装有三门火炮，在桅楼里可能还能看到手炮，但双方最主要的武器仍是弓箭。

全欧洲。1363年，英格兰要求士兵进行固定的箭术练习；1456年，苏格兰出于同样目的，将足球和高尔夫球作为固定操练项目；1473年时，那些在勃艮第军队服役的士兵接受的命令，要求他们不仅会个人格斗，还要掌握编队战斗的本领，而军队的纪律也通过一种固定的检阅制度得到了加强。这种制度被称为"集中检查"，主要来源于英国式的操练，它在"百年战争"中逐渐发展起来，其重点不仅在于核点人数（以防军官们虚报军饷或诈领已开小差士兵的军饷），还在于确保最低标准的着装和武器配备。这样一来，付钱的契约人了解到他的付出的确是物有所值，而同时军队装备的标准也得到了保证，两方面的要求取得了一致。

统治者可以期望得到他雇来作战的士兵的服务，但也同样对他们负有义务，这两方面具有同等的重要性。首先，雇佣者应向军队提供武器、装备（包括昂贵的火炮）和其他在战斗中需要的物资。这不仅需要钱，也需要发展军队的组织和管理工作，以使军队的物质需求得到及时正确的补给。其次，他要向军队发饷，正常说来要用现金支付。这点通常更难达到，而且有可能导致军队的骚动，欠饷的士兵可能会转向"软弱"的靶子来进行自我补偿。这种行为会使民心背离（即失去潜在的"政治"支持），招来公众的批评，公众对这类受害者的困境更加了解。而更重要的，是这种不守纪律的行为可能会迅速带来军事效率和作用的跌落。既然，关于军队行动必须有秩序有指挥的重要性已被人们充分理解了，而罗马军队制度的那些严厉纪律也得到了广泛赞同，那么英国、法国、波希米亚、瑞士和勃

艮第指挥官们颁发的意在控制士兵行为的法令就不令人惊奇了。军队常设机构的发展，也反映了军队建立秩序的必要性。

古代民族的榜样

这些发展背后隐藏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古代（尤其是罗马人）支付战费的传统是众所周知的，而古代战争的经验也被后人充分理解吸收。像“勇敢”查尔斯公爵就熟知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军事将领们的战绩。他把亚历山大和汉尼拔的绣帷高挂在自己布鲁塞尔皇宫的大厅里，对恺撒、庞培、汉尼拔、亚历山大大帝和其他自己希望追随模仿的著名将领的事迹心醉不已，甚至有一本专为他翻译的恺撒的《高卢战记》。在这方面，历史是有教诲价值的，过去军事学的作者们也起到了相同的作用。

15世纪时，军阀贵族们最喜爱的文学作品并不是传统的骑士背景小说，而是那些能提供罗马或其他时期军事价值的作品。虽然《塞克斯图斯·尤利乌斯·弗尤蒂努斯的战略》这样的读本很流行，但维吉提乌斯的《军事问题》在它成书1000年后，仍然是最常被引用的军事书籍，它成为古代世界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他的思想还以“稀释”了的方式，在卡斯提尔国王阿方索十世的《七法全书》和罗马加莱斯的《统治原理》这两部写于13世纪中后期的书中被传播下来。一个多世纪后，诗人克里斯廷·德·皮萨在其作品《骑士制度和军队的丰功伟业》中再次表现出他的思想，而这本书正是威廉姆·卡克斯顿于1490年在英国编辑出版的《骑兵和步兵的功绩》一书的基础。这种流传方式使古代传统在新时期里变得比以往更加纷繁复杂。

正是在这种传统里，人们受到创建一支常规军的启发。每位国王或诸侯都曾配备一名私人卫士，这种卫士的数目变得越来越大，召集一支庞大的、相互协作的、土生土长的力量的做法也越来越普通（受古时传统的“平民”军队的影响），并在15世纪中期，于那不勒斯王国、威尼斯和米兰共和国内发展壮大起来。特殊的军事需要，对单纯依赖昂贵的雇佣军做法的日益不满，都是这种组织迅速发展的原因。在法国，常规军的建立是以查理七世于1445年撰写的《军队建制条例》为基础进行的，而他的继承人路易十一在1470年后，更是大大扩充了由皇家付饷的士兵数量。与此同时，路易十一政治上的死对头勃艮第的查尔斯公爵也正在做着相同的事。十字军征战西班牙的最后舞台——1492年收复格拉纳达的摩尔王国，是通过8万名将士的十场恶战才勉强完成的。

但大批量生产的火药武器的传播，却迅速改变了西方战争的性质。虽然“勇敢”查尔斯能毫无困难地理解他的祖父即曾于1356年在普瓦捷作战的“大胆”菲利浦的军事世界，但由于火药革命，他却可能对他的孙子、国王查尔斯五世的军事世界大感迷惑。查尔斯五世在1552年拥有大约15万人的军队，分别在陆地上的五个不同的地点以及在地中海、北大西洋上同时作战。

第六章　火药革命

在罗伯特·巴雷1598年的军事论文《现代战争的理论与应用》中，“一位绅士”向“一位上尉”指出：过去，英国人是用长矛而非枪炮完成伟业的。对此，那位上尉轻蔑地回答：“先生，”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自从火器出现以来，战争已被改变太多了。”大多数那个时代的职业军人都同意这种看法。作为一名英国退役军人，罗杰·威廉斯爵士在1590年写道：“我们必须承认亚历山大、恺撒、西庇阿和汉尼拔，他们都曾是最杰出最著名的勇士，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他们碰上的是像现在法国、德国和低地国家一样装备起来的对手，他们绝不会如此轻易地征服对方。”

在一个以自己是古人的传承和延续而自豪的时代，这样的认识是不同寻常的，但事实却也是不容置疑的。“火器”，特别是大炮的引进，以及新的防御工事体系，确实“革命”了战争。

火器的出现

制造火药的正确配方——用硝石、硫磺和碳组成——可能早在公元前9世纪就在中国被发现了；12世纪时，宋朝军队已经既使用金属炮又使用枪榴弹了。这种新科技在14世纪早期才逐渐向西传播。几份阿拉伯和欧洲的原始资料提到了铁炮，第一张已知的欧洲大炮图示（右图，大约是1327年），与来自中国的最早图示（左图，1128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最早一种火药武器的例证发现于1985年，它夹杂在众多图示之中，被镌刻在中国一个穴墓墙壁上的高浮雕里。这个墓大约建于1128年，其作者可能没有真正使用过火药武器，因为它在使用时会烫得让人握不住，但它与刀剑、战斧排放在一起，显示出在12世纪早期，火药大炮已构成了中国战争的重要成分

这第一张西方大炮图示非常有意义，显示其被用来轰击木制的城堡大门，因为至少有一个世纪，欧洲的火药武器被主要用来攻击像门道、房屋这样的“软靶子”。根据当时的一部编年史，当英国人于1333年围攻特威德河畔的贝里克时（当时正处于苏格兰边境）：

> 他们用大炮和其他（围城）装备向城镇发动了多次进攻，摧毁了许多民房，毫不留情地射出的巨石，把教堂也夷为平地。但是苏格兰人抵抗得很英勇……（以至于英格兰人）可能无法攻入……（但是他们）围攻了这么久，直到城里人粮食耗尽，困乏得无法清醒行事。

这段叙述说得很清楚，一方面，早期的大炮和其他围城装备，如弹弩与投石机，一起被用做同一种用途，即将石弹投射入城来摧毁房屋和教堂（而不是轰塌城墙）；另一方面，大炮的冲击力有限，虽然它能使守卫者因为必须时刻保持清醒戒备状态而困乏不堪，这座城池最终却是因为饥馑而被攻下的。

投石器和其他用具直到15世纪，仍在围攻中发挥作用。克里斯廷·德·皮萨在1409年关于军事实用的论文中认为，在一次成功的围困中，它们和铁炮的作用一样重要；而在1420～1429年法国的几次战役中，它们也同样发挥了效用。但是十年后，大炮终于完备成型。在“百年战争”第二阶段的法国，1430年的一次围攻中，大炮对城墙造成如此巨大的损坏，守军不得不投降；而在1433年的另一次围攻中，大炮直接对准了大门和城墙，严重破坏了它们，许多部位都出现了缺口；在1437年的第三次战斗中，枪炮“打下了一大块城墙……坍塌下来，使得（城池）无法防御”。

虽然如果能利用地形，使要塞位于大炮射程之外，或者在围城一方大炮火力不够的情况下，要塞还可以进行防御抵抗，但从14世纪30年代开始，西欧主要国家配备部署的火炮已经可以成功地在几天之内，将传统的垂直式防御堡垒变为瓦砾废墟。阿夫勒尔曾在1415年反围攻6个星期，1440年时坚持6个月，而在1449年12月法王查理七世的围攻中，由于专为此铸造的16门大炮的轰击破坏，只坚持了17天就沦陷了。而它只不过是法国从1449年5月到1450的8月，在诺曼底地区攻陷的70多座英国要塞之一。并不是所有的要塞都臣服于炮轰之下，有一些是在人数对比悬殊且出奇不意的情况下，无法抵抗而被主动放弃的，但大多数是因为法军的攻城战略使进一步的抵御变得不可能而投降的。法国对不伦坦尼、卡斯提尔对格拉纳达的快速征服，都发生在15世纪80年代，都同样归功于胜利者大炮的卓越火力。

这些令人震惊的胜利反映出重要的科技革新。早期大炮射程有限，为了造成平面的发射力，它们不得不被布置得很近，但太近了又可能被敌人的反击缴获或破坏。甚至到16世纪，专家们仍认为少于

108

已知最早的关于欧洲火炮的图示绘于1327年，图上一位骑士正小心翼翼地用一根火热的铁钩去点燃火药。大炮的设计与对面图上1128年的中国炮极为相似，它正对准一扇大门发射一支箭（摘自沃尔特·德·米拉米特的论文手稿《贵族的智慧及其审慎的统治》，时间大约在1326～1327年）。

“巨形绅士”，1449年为勃艮第公爵铸造的一种射石炮，后由船运载到苏格兰。炮身长15英尺、重15吨，能够发射直径18英寸的花岗石炮弹。在其帮助下，许多重要的坚固堡垒都被攻陷，但让它发挥作用也可能带来许多问题。例如，1497年将它从爱丁堡运送到战场时，虽然动用了100人和一队牛车，但刚出城它便散架了，不得不花费三天时间来修复炮架。通常，射石炮、加农炮和蛇形柄长炮（一种射程更远、能够发射一些较小炮弹的炮）只能利用水路运输才能将它们载送到目的地。

100码会太近不安全，而大于300码又太远，缺乏功效。本页上图绘制的那种短筒形大炮就是在100码内，也明显不能贯穿加固的城墙。直到15世纪早期，炮筒长度与炮弹尺寸的比例也很少有超过1.5：1的，但到1430年，这个比例被提到了3：1，这就不仅增加了准确性，同时也加大了初速和射程。初速和射程还由于同时期的一些其他发现而得到进一步加强。一方面，被制成小粒的火药比以往更为有效（当时有人算出大约增效三倍），另一方面，铁弹或铅弹比石弹更具有破坏性。最后，冶金学的发展，使得大炮能发射尺寸不同的炮弹，产生前所未有的威力。在留传下来的15世纪早期的样炮中，最小的炮发射的是直径5英寸的炮弹，而最大的炮竟能发射直径30英寸、超过1500磅的炮弹。

109

一种手持炮，作为小炮和滑膛枪之间的过渡，被德国埃兴坦的康拉德·凯斯尔图示出来。凯斯尔在1402年写了第一部关于军事技术的手稿，起名为《战争的强化》。他在书中从1000年前维吉提乌斯描绘的战时武器开始，一直论述到他自己时代所运用的武器。

但是这些庞然大物还是被像生产啤酒桶式地生产出来，用铁箍将锻造的铁桶板固定在一起，这就很可能导致灾难。1415年，勃艮第人的一门大炮在进攻土耳其人时，因为发射过于频繁而爆炸。而1460年时，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二世，因为站在一门点火时突然爆炸的大炮旁边而被炸身亡。但在苏格兰国王攻城利器行列中的其他大炮，例如“巨形绅士”，却被证明更为耐用和有效。

虽然用铜而不是用铁铸炮大大减轻了炮的重量，但在轰击加固了的城墙时，只有大口径的武器，才被证明是真正有效的。甚至在两个世纪以后，刚刚经历了1641年爆发的大规模反抗，爱尔兰总督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 除了那些有高墙防护的参加反抗的城镇外，还有许多只能用大炮才能攻取的城堡；如果我们没有加农炮的话，任务就会困难得多……因为加农炮射出的炮弹几乎炮炮都能打开缺口，所以大炮一开始就对城墙展开了摧枯拉朽式的轰击，加农炮射出的几发炮弹就可以将一切想轰击的东西破坏殆尽。

但是将这样庞大的炮身运到指定地点需要一条安全的途径，通常

需要来自陆军或海军的保护。事实上，这意味着在击败敌人的主力前，重炮只能被用来轰击海港，就像1453年君士坦丁堡之围那样；或者在一场重大战役中，当野战军与攻城器械一起蛇形运动时，重炮作为战役的一部分发挥作用。

因为这个原因，大炮在中世纪战争中几乎不能充当决定性角色，炮击主要是用来威慑而不是杀伤敌人。例如在克雷西（公元1346年），一位当时的人记载说，英国人“在阵地上发了几炮，用来吓唬那些弓弩手”。但一个世纪以后，大炮的射程已超过弓箭，而设计上的改进——主要是将炮身与两轮炮架结合在一起，使得它能相对迅速地对准各个目标。

欧洲最早的对特殊手持枪炮的记载是1364年，意大利贾佩鲁军火库的一份清单上记有：“500门炮，一拃长，可持于手中；非常漂亮，能射穿任何盔甲。”最早的图示，大约是1400年，也显示了一种放在木制发射架上的微型“炮”。大约1450年时，手持的武器看上去只能依托胸部或肩膀来发射。但这些便携式枪炮还只是许多武器中的一种，在数量和作用上远远比不上弓、弩、戟、矛。即使是勃艮第公爵即已充分理解了枪炮在战争中的重要性的“勇敢”查尔斯在15世纪70年代时，仍然最相信弓弩手而不是炮手。虽然训练士兵开火绳枪，比训练他们拉开一张弓的时间要少得多，从而大大增加了步兵的机动灵活性，但又过了一个世纪，枪炮才真正成为欧洲战场上的主宰者。

那时，火药已改变了围攻战。“过去那些能在任何敌人的围攻下坚持一年的坚固城池，现在在一个月内就陷落了。”一位编年史作者将之归功于大炮，正是大炮保证了15世纪80年代对西班牙南部摩尔王国的迅速征服。“当把大炮拉到城墙下后，它们以难以置信的速度被架设起来，转眼间就开始发射，它们轰击得如此迅速而有效，以至于过去在意大利要花上几天才能完成的任务，在几小时内就达到了。”同时代的一位历史学家也做出了回应，他描述的是1492年后法国引进的意大利炮。军事评论家尼古拉·马基亚维利在1519年写道：“没有什么城墙能留存下来，无论多么厚，大炮也会在几天内将之摧毁。”

110

因此，“火药革命”后防守者的问题，就是如何阻止敌方重炮的靠近，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是如何去尽力减少它们造成的破坏。到14世纪60年代时，许多要塞已经添增了自己的火炮，来封锁或阻隔敌方大炮的射程范围：1381年意大利中部的博洛尼亚在城墙上设置了35门大炮；而尼德兰的梅赫伦则在1372年到1382年间，以平均每年14门火炮的速度增扩自己的军火库；勃艮第的第戎在1417年拥有13门大炮，1445年已增加到92门。14世纪60年代还出现了炮眼（只是过去箭孔的一种放大），尤其在角楼和门垛上，以阻止敌人的进攻。不久，新的角楼被增置在原有要塞里，以便加强侧翼火力，而城墙和角楼也全部被加固增厚，使它们能承受放置其上的重炮的重量和滚动，同时也能吸收开炮时带来的后坐力。但是因为这些措施都是在传统的垂直防御体系的框架上采取的，所以只能延缓大炮的致命攻击，却不能避免它。

意大利建筑师和历史学家莱昂·阿尔贝蒂第一个预见出正确的反炮击法。他在15世纪40年代写成的《建筑艺术》中指出，如果将防御工事修成锯齿波浪形，防御会更有效。他还预言，星状构形可能是最佳选择，因为它能提供连锁呼应的火力场。15世纪晚期的其他几个意大利军事作者，也中意于多边形有角度的防御

工事。但开始时几乎没有统治者注意到他们的观点，这些论文都没有发表。15世纪最后十年，虽然大多数工事仍按传统设计建造，意大利中部的一些要塞却包括了按照固定间隔建造的大角度的棱堡，以便于既能躲开敌人的大炮，又能对任何进攻企图给以致命的侧翼火力。1515年，为了创造一个完整的互相支援火力的防御体系，奇雅塔韦基亚的帕潘港口用一整圈四边形棱堡包围起来，"大炮要塞"由此诞生了。

左页图：当瑞士伯尔尼的迪博尔德·希林为他1483年的编年史进行编辑和插图时，野战炮已经在欧洲战场上占据了主要地位。前景上两个士兵将剑放在一边，正在使用野战炮上的一种原始提拉装置，炮身被平衡放置在两轮炮架车的轮轴上。在他们身后，其他的大炮围绕着坎特伯尼的"熊旗"被架在特殊的大车上，正准备击退右边蜂拥而至的骑兵。

112

意大利式防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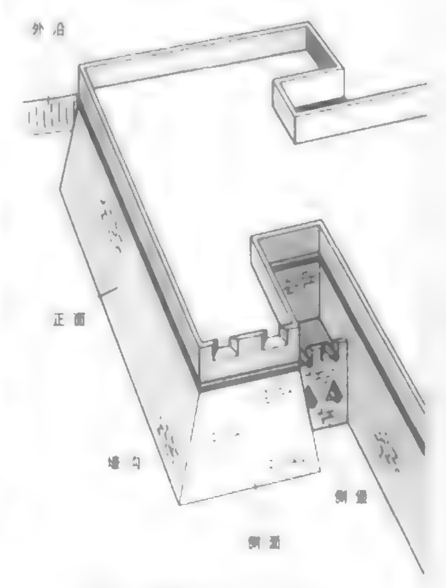
当时的人立刻接受了棱堡体系，认为它是惟一能有效抵抗"火药革命"的防御工事。它在意大利被称为"现代式"，而在其他地方则被称作"意大利式"。军事建筑师弗朗西斯科·法帕耶非常简练地评述："没有棱堡，任何地方都不能抵抗配有大炮的军队。"而法国军事专家、富尔克沃克斯的主人雷蒙·德·贝卡里认为，只有1510年后建造的防御工事，才能真正拦阻一支装备精良的侵略军。

因为修建棱堡的技术刚刚问世，那些在此之前修建的工事根本谈不上坚固，但是那些在此之后或在我们自己的年代里，已经接受棱堡概念的工事（如果它们是被从容建造，而非急急赶就的话）是极其难以被征服的。

急急赶就和有条不紊的建造之间有非常重要的区别，因为修建一个"现代的"防御体系，意味着一项大事业，实际上可能是那个时代最大的工程冒险。当安特卫普的五角形城堡在1567年动工时，它要求以每月6000立方码的创纪录速度来搬运65万立方码泥土和建造22.1万立方码的石工，即使这样，还是耗费了三年多时间才完成。很清楚，这样一项耗时的工程，尤其当它被用于整个城市时，只能以胁迫方式要求个人去参与建造，而不是出于自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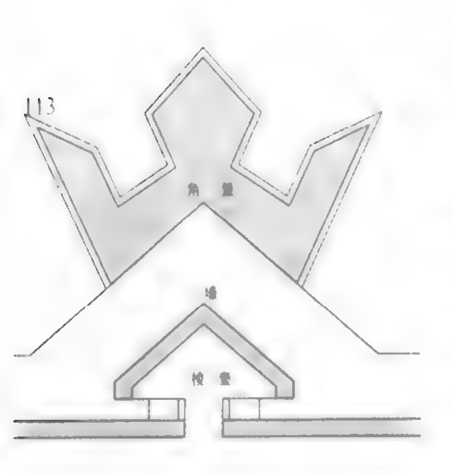
尼古拉·马基亚维利在他1526年的著作中，提出了将一座城镇改造为"大炮要塞"的三种不同方法。其中两种都是从破坏开始：拉倒已有的城墙，然后或者在它们旁边修建一个新的防御系统，将所有敌人可能威胁到的市郊和地点（比如周围的制高点）都包括进去；或者修一个比以前小的环形带，放弃（并推平）所有不能防御的地区。但这两种方法却要有巨大的开销，因此，1542年罗马教会放弃了用一条18座棱堡带环绕罗马的计划，因为只修一座的账单就已让教会承担不起。而16世纪90年代时，韦内齐亚人出于经济原因，决定将他们计划在帕尔马诺瓦修建的要塞规模，由12座棱堡降至9座。修建一座大炮城堡还要包括社会代价，因为它影响的区域要比以前大得多，尤其是那些位于中世纪墙外的郊区。它通常包括医院、宗教场所等重要的建筑物和工厂（磨坊和铁匠铺）。

因此，马基亚维利在1526年的报告中提出了装备现代化防御工事的第三种技术：这种工事虽然比其他工事要差一些，但却快速便宜得多，那就是对已有的防御工事动大手术。降低原有城墙的高度，增加它的厚度，重新设计角楼和进入棱堡的门道，制造一个陡坡来形成适宜的火力区。当然，如果不用砖石将土制堡垒保护起来，它们不会坚持很久（当时估计最少在4～10年之间）就得被侵蚀掉。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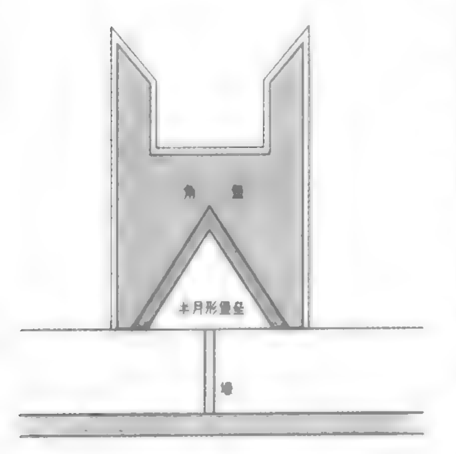


上图：棱堡构成了现代欧洲早期发展起来的新型防御工事的主要特色。它被坚固稳妥地修建在一条宽宽的壕沟后面，两侧向外突出，上载重炮以阻止敌人；而另外两侧，也就是侧面，与主墙呈90°角，布满具有致命杀伤力的武器。

113



当大炮射程得到改进时，防御工事也得到进一步加强：被添置的皇冠形堡垒（上面）、半月堡和角堡（下面）用以提高棱堡的防御能力。



它们建造起来的确相对快捷便宜，还能有效承受袭来的炮火，再加上足够的意志坚定的守军，甚至能抵御当时最强大的军队。1552年，洛林地区（法国东部）的梅斯城不顾自己缺乏现代的防御系统，试图抵抗一支人数高达5.5万人的可能是16世纪最大的西方野战军的围攻。法国人虽然在5月占领了这个城市，但5个月后，查尔斯五世召集大批军队来重新夺取梅斯城。可是5800名法国守军日以继夜地苦干，加固现有的防御工事。他们把“大马路”竖了起来（有的地方厚达16米），正墙两侧建上侧翼，安放在最薄弱的地方，并将所有城墙都用土制堡垒或木捆覆盖起来。所以，11月27日那天，围攻者在对准一段城墙发射了7000多发炮弹并最终打出70多米缺口时，仍不敢发动进攻，因为他们无法打哑法军侧面的炮火攻击。

16世纪晚期，随着大炮威力与攻城技术的改进，这种对中世纪工事的增添改装就不够用了，只有那种有角度的棱堡才能提供安全，因此发明于意大利中部的大炮要塞渐渐遍布全欧洲。到1550年，无论在意大利半岛，还是在弗朗库—尼德兰，或哈布斯堡—奥斯曼边境上，这种新型防御都占据了统治地位。从1529年到1572年，仅在尼德兰一地，就建造了大约26英里的棱堡防卫工事，它包括四座碉堡、12段全新的环绕墙和18个崭新的防护带。到1610年时，法国从加来到土伦的600英里陆地边境线上，散布着50座大炮要塞。而德国、英国、爱尔兰、丹麦、波兰和俄国的战略地带也都用棱堡卫护。甚至连那些遥远的海外殖民地，例如加勒比地区的哈瓦那和卡塔赫纳，环绕印度洋的蒙巴萨、第乌和马六甲，太平洋海岸线上的马尼拉、马考角和卡亚俄，也都采用了棱堡防御工事。

这些发展所带来的冲击在几个方面表现出来。首先，攻城者要花费长得多的时间。那种在一两个战季里就想从敌人手中夺取70多个据点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只要有棱堡在，在这样的短时间里只能夺取一个或者最多两个要塞。每攻占一个采用“意大利式防御”的要塞都要花上不是几年，也得是几个月的时间。实际上，对一座大炮要塞进行围攻，几乎和建一座要塞一样辛苦：要建造一系列围城工事并部署人员，直到守军被饿得投降。挖战壕是另一种办法，可以挖得近到允许对城墙进行近距离炮击，或者击中引爆棱堡下的火药库。

但是，攻陷一座大炮要塞不仅要花费更长的时间，还要投入多得多的军队。一方面，部署在围城工事中的人员需要一支更大的围攻队伍。17世纪杰出的军事工程师塞巴斯蒂安·列·普雷斯彻·德·沃邦认为，一个7∶1的攻方对守方的比例和至少2万人的军队是获胜的保证。而另一方面，进攻者只是战争的一方，为了捍卫自己的国土不受敌人的侵略，防守者也必须要有足够的守军，并保留一支救援解围的后备队伍。

114

“意大利式防御”被证明确有功效。匈牙利的锡盖特城，用完整的现代化城墙将自己环绕拱卫起来，结果在1566年时，它以仅800人的守军，便成功挫败了土耳其人的进攻。但如果有太多要塞需要守卫，即使守军人数相对较少，积少成多，也会大约牵制国家兵力的40%～50%。在1640年的战争中，西班牙军队的统帅计划在尼德兰北部的208个不同地区派驻守军，一共需要33399名士兵，而当时整个国家军队人数才有7.7万人。此后不久，法王路易十四也发现，将自己几乎半数的兵力布置在王国边境的棱堡里是很不明智谨慎的：1688年时，法国221个城堡中有1.66万名士兵，1765年时则增加到237个要塞和1.73万人。

自然，有效的防守不仅只需要更多的军队，它还需要更多的枪炮和弹药。15世纪40年代，法军中的大炮只需要20吨火药、40名合格的炮手；但到了1500年，这个数字增加到100吨火药、600名炮手；1540年时又变成了500吨火药、275名炮手。

军事资源，也就是人员和物资的集散，带来了非常严肃的新的战略问题。19世纪德国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他那本很有影响的《战争论》中，从物理学里借用了"重心"这个概念，来解释对他而言什么是战略重点。"一个战场，无论大小，上面都集结了军队，不管有多少人，在这个集结中只能有一个重心，那正是决策所应到达的地方。"

克劳塞维茨是从1792～1812年间法国的辉煌胜利，以及自己广泛阅读的军事史中总结出这个经验的，他指出："对亚历山大、古斯塔夫·阿道弗斯、查尔斯七世和腓特烈大帝来说，他们的重心就是他们的军队。如果他们的军队被摧毁了，他们也就会在历史上一败涂地。"但他的分析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古斯塔夫·阿道弗斯的军队，的确于1634年在纳德林根遭到了一次重大失败（在这位国王战死

对一个配有大炮的大要塞的围攻，构成了那个时代最浩大的工程项目之一。荷兰人在1637年包围严密布防的西属尼德兰城市布雷达时，大约5000名士兵挖了一道双层土墙，并用防守工事将其保护起来，以防来自守军或援军的进攻。经过6个月的围攻，向城中倾泻了2.3万发炮弹后，精疲力竭的西班牙守军终于投降

于并不重要的吕岑战役后二年），但这并没有导致瑞典的“失败”。相反，当战争最终以1648年的《威斯特伐斯特和议》告终时，瑞典达到了它所有的战争目的：扩张领土，为未来安全提供足够的保障，以及一大笔战争赔款。

纳德林根的惨败与威斯特伐斯特的收益之间的矛盾，来自于瑞典所掌握的无数大炮要塞，这些工事在主力部队战败后仍被牢牢控制着。1648年，瑞典在德国的军事力量只有7万人，但其中几乎半数士兵防守在127个战略要塞里，因此根本没有能让对手一下击毁的“重心”。16、17世纪时，主要采用“意大利式防御”的其他战例，对克劳塞维茨鼓吹的“致命一击”，也表现出相同的抵触性。这个问题又被后来平定荷兰反抗的西班牙军队司令唐·路易斯·德·雷克森斯做了进一步总结。他在1574年警告他的主子菲利浦二世说：“如果我们每征服一座城镇，都像已征服的这些如此耗时的话，世上决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财力，让我们用武力去平定在荷兰造反的20个城镇。”稍后不久，他再次进言：

> 我们已经打赢了一场战役，征服了许多城镇，每一个胜利本身都足以带来和平，在别的地方甚至能建立一个全新的王国，但在这儿却一无所得……我相信上帝已多次向我指出这儿的“应许之地”，就像他对摩西做的那样，但却将由别人成为进入该地的约书亚。

116

但西班牙的约书亚并没有出现，相反，荷兰和泽兰的大炮要塞挫败了菲利浦二世的所有征服企图，一直到1575年他的国库宣告破产，军队溃散，不得不在1576年放弃所有据点。一直到18世纪，“围”重于“战”这种耗时巨大的战争模式普遍存在于欧洲的许多地区。

大炮要塞的繁衍，在两个重要方面增加了战争费用：延长了每次军事行动的时间（却减少了目的）；增加了军队人数和战争所需装备的数量。16世纪晚期，西班牙的军费开支翻了5倍，其他较小的国家也同样如此。1565年时，英国首相暴躁地埋怨“战费的不确定，今天看上去所有的战争都要比预算多花上三倍的钱”。

但是，16世纪飞速上升的战争负担并不只源于技术的发展。首先，那个时期的“价格革命”增加了每件东西的成本，不管它是否与战争有关。例如，每年光粮食就比过去多花4%，衣服、武器和其他装备的价格也都相应上涨。

可这种无情的价格膨胀是与迅速持续发展的经济活动相联系的。1450年到1580年间，西欧人口翻了一番，持续增长的国内需要使土地耕种、工农业生产和贸易都随之蓬勃发展。这就让各个国家有额外的来源（通过税收、贷款，或兼而有之）来支持战争。当然，就像中世纪一样，许多项军费开支是难以承受的。首先，城市不得不经常支付自己的防卫费。安特卫普在1542到1557年间修建的宏伟的新城墙（由九个棱堡和五个巨大的门道组成）和后来建成的碉堡，完全是用以当地税收作抵押的贷款来支付地产和食物的（由此带来的“防务费”，过了两个多世纪也没还清）。此外，地方防卫的重复费用也会落到社会团体头上——标准的责任包括：维护和守卫城墙，为士兵提供食宿等，因此，许多城市的预算中有50%～70%被划归防务。

那时一个偶然的政治发展，却迫使西欧的大多数国家承担了一笔从未有过的

"火药革命"后的西欧形势图。查尔斯五世皇帝（公元1519～1558年）继承了四份不同的遗产，每份均来自他的一位祖父母。从阿拉贡的费迪南德那里，他得到了西西里、那不勒斯、撒丁和阿拉贡，还有伦巴第和突尼斯（公元1535年）；费迪南德之妻伊莎贝尔的遗产包括卡斯提尔、格林纳达和西印度，查尔斯又增添了墨西哥（公元1519～1522年）和秘鲁（公元1532～1534年）；勃艮第的玛丽为他提供了尼德兰的大部分地区，查尔斯自己又兼并了东北部的许多省份；玛丽的丈夫、哈布斯堡的马克西米安将奥地利和阿尔萨斯留给了孙子，并帮助他在1519年获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与此同时，查尔斯的兄弟费迪南德又于1526年在哈布斯堡版图上增加了匈牙利、波布米亚、摩拉维亚、卢萨蒂亚和西里西亚。哈布斯堡的领土现在将法国包围起来，或者像一位西班牙大臣所说的："西班牙帝国的心脏是法兰西。"

防务费用，从而导致了重税、高利贷，最后不是发生革命，就是带来政权危机。1477年，哈布斯堡的马克西米安和勃艮第的玛丽（"勇敢"查尔斯公爵的继承人）联姻，使德国南部的一个小王朝开始壮大发展成欧洲强国。通过一系列明智的合并和意想不到的死亡，他们的孙子查尔斯五世成为勃属尼德兰的第一位统治者（公元1506年），然后是西班牙和西属意大利的国王（公元1516年），最后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19年）。曾是西欧最强大的法国，发现自己现在被另一个王国的领土包围起来了。在接下来的一个多世纪里，法国君主们不断地试图冲破这个已形成的哈布斯堡束缚。他们慢慢意识到仅靠一两个地方的战争是无法达到这个目的的。因此1552年秋，当查尔斯七世围攻洛林地区的梅斯城时，亨利二世在尚帕堡部署了一支守望军队，以备梅斯救援之需；在北部边境又设下一支军队，此军在12月夺取埃丹（迫使查尔斯七世对梅斯撤围）；第三支军队被放到了意大利，先是保卫帕尔马，然后去驻守起义的锡耶纳共和国。这样，法军就同时在三个地方作战。如果算上驻守在其他边境和占领萨伏依的军队，就是四个；再加上与土耳其联合巡弋意大利海岸线的法国联军，就是五个。法国以前从未同时在这么多的不同战场上协同作战（尽管它以后经常如此）。

火药革命、大幅度的价格上涨和哈布斯堡在欧洲的霸权结合起来，成为国际间主要冲突的新"沃土"。战争的主要动机仍是王朝之间的竞争，但中世纪的各种冲突通常是孤立发生的，而1500年后这些冲突就常常是相互关连的了。此外，海战新技术的同时发展将敌意扩展到远洋，同时波及到美洲、非洲和亚洲的部分地区，这使得欧洲列强不得不保有费用昂贵的海军。

1759年11月20日，在布列塔尼的基伯龙湾，英国军舰在海军上将爱德华·霍克的率领下，包围了一支试图入侵苏格兰的法国舰队，并不顾每小时45英里的风速，拉起满帆向入侵者发动进攻。

第三部分　枪炮和帆船时代

第七章 舰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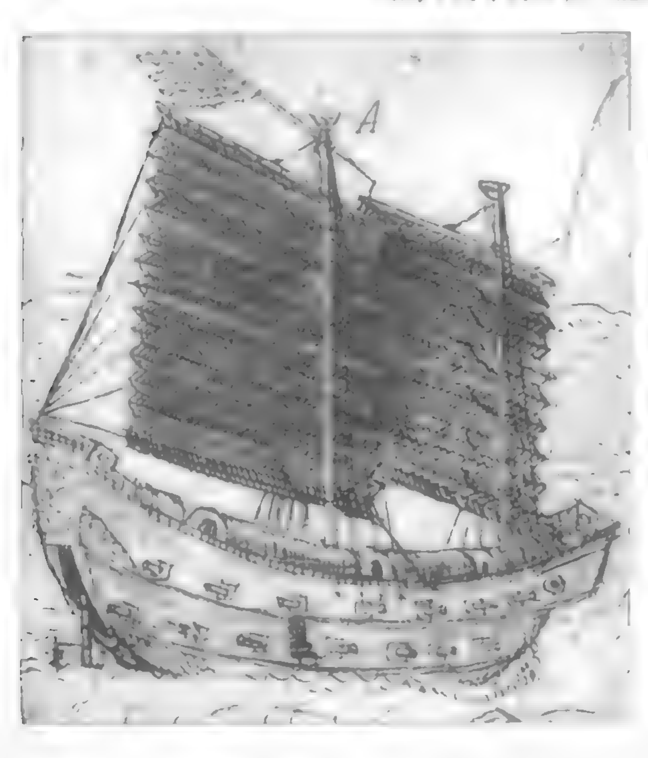
在过去三个世纪的西方海战中，大型战舰（主力舰）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它们采用重炮作为主要武器，在战斗时通常排成一线，以使自己的大炮能偏舷齐放。1916年的蒸气时代中，在日德兰角逐的舰队与17世纪中期英荷战争中的帆船战舰并没有多大区别，有着相同的战争地点和几乎同样的舰队排列。

很难确定这种盛行不衰的战术是从何时出现的。如对“什么时候首次将火药大炮有效运用于海上”的问题，就没有确定的答案。一些留传下来的中国青铜铸或铁铸的海上战炮，可以追溯到14世纪，但它们的体积都较小。1372年铸造的一门炮上这样镌道：

彼德·芒迪在1637年时曾率英国船只，试图找出一条从珍珠河直抵坎顿的航路，这是他在途中遇到的一艘中国战船。尽管体积庞大、粉饰精美，建有双层载炮甲板和炮孔，但只载有一些小炮。芒迪和他的船员们更惧怕的是中国战船的其他本领：如配置的火药、发射岩石的炮组、用来捕抓船桅和索具的铁钩，以及水底隐藏的抓钩等。抓钩是当敌船经过时用来抓取其锚链的

隶属于中国海军防务部。第42号。碗形炮口，重26斤，于洪武五年十二月吉时，由帝国铸造署监造

“42”这个数字证明在明朝第一个皇帝统治期间（洪武，公元1368～1398年），就已经存在一个固定的海军铸炮程序了。但长度只有1英尺2英寸，重量只有35镑的武器，只能对人具有杀伤力，却不能击沉船只。即使在17世纪，中国海战用的平底帆船也只配置对人有杀伤力的武器。1637年，英国旅行家彼德·芒迪勾画了一只他在坎顿城外看到的中国大型战船（左图）。在船的舷侧都开有“门”（炮孔），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炮均是每门只有4到5英担（1～20吨）重的铁铸小炮，大约1英寸的口径，能发射重约一磅的炮弹。这样的武器对其他船只构不成任何结构上的损坏。芒迪认为平底帆船不能承载更重的大炮，因为它们是木制的，很不结实。



火药和单甲板平底船

关于重炮用于战船的最早记载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欧洲。写于1400年的让·罗萨尔的“百年战争”编年史中，提到大约50年前，一些西班牙战船上载运了“用于防守的一切必需之物”，例如“弓弩、铁炮和加农炮”（加农炮是一种能从较远距离发射较小炮弹的大炮）。在适当时期，这种军备变成了典范。一个世纪后，根据勃艮第公爵的军备处记录，公爵舰队里的每艘单甲板平底船上都载有（至少在理论上）5门4米长的重炮，“每门均能发射直径4英寸的（石）弹”，而且“每门均被配给了适用于一切大炮的三个药室”，同时两门轻炮也配备了固定的药

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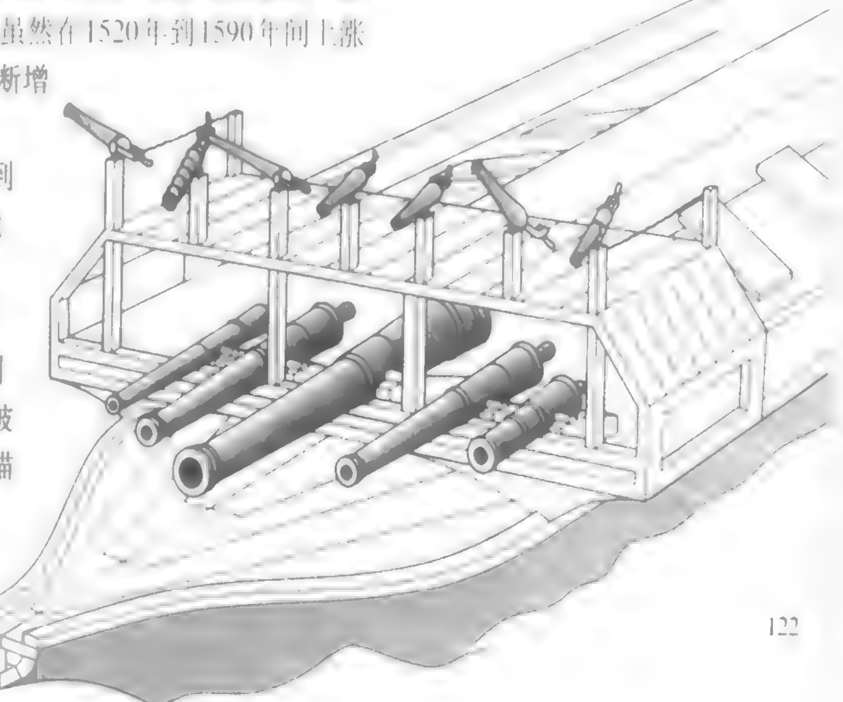
单甲板平底船长而浅，主要靠桨推动，它作为主要战船，已在欧洲水域服役了几个世纪。但是重炮的引进突然带来极大的设计变化，舰首的金属撞角让位给特殊的大炮平台，船首中心放有一门重炮，两侧有一些轻炮护卫。1506年时，最大的西班牙战舰上载有一门作为中舷主炮的重达4吨的铁炮，及2门大约2吨重的轻炮，和一门刚超过1吨的小炮。这些炮发射的都是石弹，但到了16世纪30年代，发射金属弹体的铜炮就代替了它们。这种一门中舷主炮，两侧由两门到4门其他重炮和一些具有杀伤力的轻炮护翼的排列法成了定规范例。普载的中舷主炮无疑是海上最有威力的火药武器，尽管其主要炮弹重50磅，16世纪中期一些行为奇重大的战船也装有60磅（7英寸直径），甚至100磅和200磅重的炮弹。有案的火炮试射计划的详细记录和当时的一些史书暗示出：这些大炮的有效射程高达1000码，最大射程为2英里。从16世纪40年代开始，一种甚至更有威力的由桨推动的战船——快船出现了，它由帆桨同时驱动，承载8门或8门以上的重炮（分布在船尾和船头之间），并适当布置了足够的轻炮。1588年，与西班牙无敌舰队同行的原威尼斯战船"圣诺伦佐号"，就号称装有15门大炮，其中包括10门火炮和加农炮。

121

16世纪50年代，地中海战舰的设计再次发生变化，成为由三人一组的桨手驱动的战船。过去的人手一桨，让位于三个或三个以上的水手同时划动一支巨桨。这种发展使战船体积有所增大，桨手数目大幅度增加，从每船144人上升到180人甚至200人，战斗成员也得到了补充。这时的一些战船甚至承载了400人——比许多欧洲村庄中还要多的人数，因此（正如17世纪一位舰长评论的那样），"当他们各自就位时，从船头到船尾只能看到他们的脑袋"。这数目的增加带来了两个后果。首先，人数的大幅度增加减少了每人应得的给养，尤其是淡水问题最为严重。因为在海上，每人每天至少要消耗半加仑水，现在在海上每行驶一天，每只战舰就需要在有限的贮藏间里加进200加仑的水。船员的每次增加，就会相应减少一艘战船驶离基地的距离。其次，保有每只战船的费用虽然在1520年到1590年间上涨了三倍，但欧洲各国动员资源作战的能力也在不断增长，因此导致了更大规模的舰队的组建。

查尔斯五世在地中海战争中拥有的战舰还不到100只，但到了他的儿子西班牙的菲利浦二世时，就几乎有200艘了。

总括起来，这四个发展——更大的战船、更多的船员、更猛烈的炮火和更庞大的舰队，改变了划桨时代海战的性质。一方面，主要舰队的有效范围被大幅削减了；另一方面，港口和能供作补给基地的锚的数量也萎缩了。地中海地区的海战迅速升转为一系列对重兵防守据点的大型正面攻击（杰尔巴1560年，马耳他1565年，塞浦路斯1570、1571年，突尼斯1573～1574年），而一些罕见的大海战（普雷韦扎1538年，勒班多1571年）



16世纪时西班牙战舰的载炮甲板上，通常载有一门能发射50磅炮弹的大炮，两侧各有两门能射10磅炮弹的轻炮，短而粗的射石炮在右边，再轻一些的在左边。上层甲板装有一种极具穿透力的武器。注意船"背"，原来很尖的金属撞角已经被锯掉，这使得主舷主炮在与敌人遭遇时，能完全吃重下压，直接射入敌舰，就像基督徒们在勒班多战役（1571年）中做的一样

122

都发生在或靠近大型舰队停泊的地方。到1600年，除了海岸防卫和私人使用外，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单甲板平底战船已不再使用了，因为保有一支能完成重大战略目标的划桨战船舰队的经费数目，已经高得让人难以承受。这种舰队只在波罗的海地区继续使用，那里怪石嶙峋的岛屿使海岸线极为复杂，帆船很难行驶其中。俄国在1719～1721年曾用这种船袭击瑞典海岸；瑞典人也创造性地使用舰载战炮，于1790年击毁了俄国大部分海军力量。但在其他地方，单甲板平底战船由于自身的重负，已经都被废弃了。

123

主力舰

代替单甲板平底战船成为欧洲主要战船的主力舰源于15世纪。大西洋各港口的中世纪造船人研制出一种“克里克”风格的帆船，就是将一个简单的船体用厚木板密不透水地叠接环绕起来，其中有一些船非常大，能用于军事用途。英王亨利五世（公元1413－1422年）就有几艘按传统设计的大战船，其中建造于1418年的“格雷西捷号”，用双层厚板建造，有两个船桅，从船头到船尾长约80米，重达1400吨，载有4门火炮（虽然都是从上甲板发射的小炮）。但此后不久，从西班牙和葡萄牙开始，欧洲大西洋沿岸海港的造船师都开始建造这种先有船骨，后添船身的船只，不过只是用厚木板一块块拼装上去，没有任何叠接。这种技术在船身上增加的重量导致了一种可能更复杂的船具装置方法。这时，船上已有三个甚至四个船桅来张挂不同的帆，有些是提供动力的正方形帆，有些是帮助侧面运动的三角形帆。到1500年时，“全索具帆船”即欧洲中世纪最伟大的技术发明之一，已成为大西洋上最主要的帆船。它的巨大承载量，满足了新兴的欧洲贸易的需要；它卓越的航海性能，为寻找新航路和海外殖民地提供了方便；而且它即能吸收发射炮火时的后坐力，又能承受射来炮火的冲力，这种结实构造开启了战舰相遇时偏舷齐放的大门。

124

但偏舷齐放也需要在船壳上配置复合炮眼，因为重炮只能沿着战舰的低层甲板安全部署。虽然已知的证据表明炮孔早在15世纪70年代就已存在，但第一艘能真正偏舷齐放的帆战船，看起来似乎是在1511年。在苏格兰下水的1000吨位的“伟大的迈克尔号”，它每侧载有12门火炮，另有3门重炮置于船头和船尾，还有300门小炮。这艘战舰是至少拥有11艘战舰的苏格兰海军的旗舰，此舰队于1513年在它的创建者詹姆斯四世手中，几乎全军覆没。第二年，“伟大的迈克尔号”被卖给法兰西以节省开支(它自己的运作费用就几乎占去国库收入的10%!)。它的服役期极长，长到可以看见英王亨利八世励精图治

图中这艘四桅葡萄牙战舰有24个炮孔的侧舷和两门“船尾追踪”炮，该图是德国旅行家汉斯·施塔登在1557年出版的《一次美洲旅行的真实历史及描述》一书的封面。船员正在拉帆，领航员正在观测太阳（用六分仪）和月亮（用背测杆）。这些船和其他战舰一起，保护着往返于葡萄牙和它在巴西、非洲、亚洲的海外殖民帝国之间的富有商船。

并开始一个长期的海军建设和竞争计划。可能是作为苏格兰旗舰的模仿，"伟大的哈利号"于1512年下水，也有1000吨位，载有43门重炮和141门轻炮，总重量达100吨（最大的一门重炮长18米，口径为12英寸）。亨利八世于1545年在索伦特海峡打败了一支法国侵略军，当他两年后去世时，他的海军已包括了53艘装备精良的战舰，总排水量达1万吨。

这支舰队，就像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四世的舰队一样，由于费用过于昂贵而难

1571年的勒班多之战

1571年10月7日的勒班多之战，参战人数大约为17万人，既是16世纪最大的欧洲战役，也是由炮火定胜负的第一次海上大战役。由208艘战舰、6只快船组成的基督徒海军，拥有大约1815门大炮；而他们的土耳其对手却只有750门大炮和230只战舰，战况极为惨烈。开战不久，奥地利的唐·约翰（基督徒军队总司令）就向一位高级参谋询问开炮的最佳时机，得到的回答令人毛骨悚然："近到让敌人的血溅到你身上时再开炮。""战舰相撞声和开炮声同时响起"，结果，在基督徒发动进攻后，破船沉船"漂满了八英里以上的海面，海上不仅布满残桁、断桨、碎木，还有数不清的尸体，水面被染成了一片血海"。总之，奥斯曼舰队损失了200只战船，包括大炮、给养和大约3万人。此外，这场轰动一时的惨败还引发了希腊和阿尔巴尼亚的几次起义。一时间，奥斯曼帝国在整个巴尔干半岛的统治岌岌可危，这场战役要成为16世纪具有决定性的战役之一了。

但事实并不如此。单甲板平底战船较易建造，奥斯曼统治下的地中海沿岸又有数不清的经验丰富的造船工人、船坞和储备材料，可以立即建造补替勒班多战役中失去的战船。锡诺普和伊斯坦布尔的皇家军工厂中还留有一些状况良好的战舰，而且当战败的消息一经传来，一个大规模的建造计划就马上启动了。到1572年4月时，仅仅在战败6个月后，土耳其就又有200艘战舰和5只快船整装待发了。

船员和桨手的主要征募地区——16世纪的地中海已经成为基督徒（北面、西面）和穆斯林（南面、东面）的海上战场。孤立的外围据点纷纷陷落，西班牙占领了佩尼翁·德·贝莱斯，土耳其占领了罗得岛和塞浦路斯。地中海上的一些战略要地更是争战频繁。例如，仅突尼斯一地，就曾易手四次：1535年和1573年先被基督徒占领，然后又在1570年和1574年被土耳其重新夺回。但这时和平出现了，先是韦内齐亚，然后是西班牙，分别于1573年和1577年与土耳其签定了休战协议，巨大的单甲板平底船让位给了小巧的海盗船队。

以长期维持。到1555年，它已缩减到只有30艘战舰，且主力舰也从12只减到了3只。1588年，虽然皇家海军只保有32艘战舰，但其中有18艘超过300吨位，总排水量超过了1.2万吨。那一年，所有战舰都被用来抵抗菲利浦二世入侵英国的无敌舰队，而幸存下来的西班牙侵略军在很大程度上多亏了后舰持续不断的弹幕掩护。一些人声称，英国人在西班牙人发射一轮的时间里能炮轰4或5次；而勒班多的老兵们认为，比较之下，他们1588年在运河和北海经历的炮火，要比勒班多的猛烈20倍。

这真令人吃惊，因为远程海战炮组的技术，就像全索具帆船一样，源于西班牙和葡萄牙。1500年，葡萄牙国王给部署在印度洋的舰队司令的指示中，特别指出当遭遇敌舰时，"你应尽力避免与它们过分接近，只用你的大炮就能打得它们折戟沉沙……使得战争能在更安全的条件下进行，也减少了舰队船员的损失。"这些命令的精确性暗示出早在1500年时，这些战术已经不是什么新东西了。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立即得到应用。葡萄牙海外舰队总是一线排开地迎击敌军，发射一次偏舷齐放后，调转方向，以便返过来再进行下一轮炮轰。但西班牙人没能保住自己在海战中的技术优势，在1555年写成的《海上作战的艺术》一书中，费尔南多·奥利维拉认识到："在海上，我们是远距离作战，就像面对高墙要塞一样，几乎没有机会让我们靠近得可以赤膊相见。"他很赞赏单线迎击的战术，认为那是理想的作战部署，但他建议舰长们只在船头放置重炮，就像单甲板平底战船那样，而将轻炮，特别是具有杀伤力的轻炮放在侧舷。"别在小船上放大炮"，他警告说："后坐力会让船身散架的。"甚至在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的主要舰种，葡萄牙大帆船上配备的大炮依然相对较轻：虽然每艘战舰上都载有50门炮，但大多数看上去只能发射14磅或更轻的炮弹。而与此同时，英国海军的大帆船上却有3到4门能射出30磅重炮弹的重炮，每个侧舷则有20门发射17磅炮弹的大炮，所以皇家海军能发射更为猛烈的炮火，发射次数也更频繁。虽然英军大炮在1588年只击沉了一艘无敌舰队的战船，但其他几艘也因在炮火中受损过重，而无法走完全程返

回西班牙，甚至连旗舰即那艘1000吨位的葡萄牙大帆船“圣马丁号”，也只是因为有两根巨索捆住了它损伤严重的两侧，才勉强坚持到家。

英国在1588年的作战记录已经丢失，因此不能对海军抵抗“无敌舰队”的成就做出更精确的描述，但保存的关于1596年偷袭加的斯的文件却透露了更多的情况。这一役包括了16艘后卫舰，由120多艘精锐的英国和荷兰战舰组成。400吨位的“无畏号”上装有35门大炮，其中17门发射大口径炮弹。当离开英国时，它为这17门重炮带了576枚铁炮弹，发射了353枚（61%）。与此同时，500吨位的“彩虹号”上装有26门大炮，其中至少25门能发射大口径炮弹，它离开英国时带了670枚铁弹，发射了392枚（58%）。这意味着只在一场战役中（1596年6月21日），平均每艘战舰就几乎发射了400枚大口径炮弹，而且许多炮弹其实是在一天内射出的。根据当时的文件记载：“当数不清的炮火从我们船上发射时，敌方城镇和战船损失惨重，而我们却毫无损伤。”这场战争标志着一种全新的海战模式。

“无敌舰队”之役和对加的斯的袭击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们说明了西班牙海上势力的衰微；另一方面，导致了更自信和更富有侵略性的英国人对菲利浦二世

1588年和1688年的无敌舰队

1588年，由130艘战船和3万人组成的西班牙无敌舰队入侵英格兰却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一个世纪后，1688年，一支由463艘战船和4万人组成的荷兰舰队，却在奥朗日王室的威廉王子的指挥下取得了胜利，[illegible]了伦敦，在一个月内建立起一个新政府，奥朗日的威廉也成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国王威廉三世。但他的胜利却导致了法王路易十四的宣战，使英、荷、法都卷入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除了一次短暂的休战外，一直持续到1713年。

荷兰舰队采用的阵形。由威廉三世的高参、汉斯·威廉·本廷克草绘。

这是绘于1545年的英王亨利八世的一艘战舰"玛丽·罗斯号"。它装载的大量大炮证明：炮火在海战中的重要性在此时已得到充分认识。但降低炮孔、使其尽量保持靠近海面的重要性却没有被重视。因此同一年，在驶往索伦特海峡去阻挡一支法国侵略军的途中，"玛丽·罗斯号"翻倒、进水、沉没了

财富的袭击；另一方面，也导致了西班牙远洋舰队第一次开始躲避这个新的威胁力量；另外，它鼓励了其他国家去碰碰运气，对抗显见软弱的菲利浦二世的全球帝国。荷兰人，像西班牙人一样开始建立海军，刚开始时他们的战舰主要用于海岸防御，规模较小；但从1596年开始，能与敌人作战的大型战舰被建造配置起来，到1621年时荷兰海军已经拥有9艘500吨位以上的主力舰了。

一场海军军备竞赛由此开始了，大西洋上的所有列强都争相生产更多更大的战舰。1610年在英格兰下水的1200吨位的"皇家王子号"，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舰，也是装备最精良的战舰，一共装载了83吨重的55门大炮。1637年下水的1500吨位的"海上霸王号"也同样如此，装有超过153吨的104门大炮。它长127米，宽43米，事实上仅比1805年在特拉法尔加角下水的英国旗舰"胜利号"小1/3（后者长170米，宽53米）。这些战舰和20多艘与它们相似的战舰一样，都超过了当时宅邸的平均面积，载带的大炮比当时许多要塞里的大炮还要多。

舰队列阵

17世纪时的主力舰配帆数不足"纳尔逊时代"同级战舰的一半，这使它们很难控制（用舵轮代替舵柄后更是如此，直到18世纪），再加上它们的笨重性，就让单列向前迎击的作战方法很有吸引力。1500年葡萄牙舰队在亚洲采用的这种战术，与1653年英国海军在北海得到的"让舰队在作战中更好地保持阵形秩序"的指示几乎如出一辙：

"海上霸王号"的龙骨图。它是第一艘三层甲板的战舰，是英王查尔斯一世在位期间的1636年1月设计的，20个月后下水，总造价超过4万英镑（其中半数是付给造船者的工钱）。它的主设计师菲尼亚斯·佩特本想让它装载90门大炮，但查尔斯国王不顾他的意见，将炮数增加到102门，使它成为当时最大的战舰。

一看到旗舰已发起攻击……每个海上中队都应以己之长，与邻近的敌舰开始作战；为了保持阵形，每个中队的每艘战舰都应尽力与"主舰"保持在同一条线上。

荷兰人也最喜欢这种战术。因此在英荷战争（1652～1654年、1665～1667年、1672～1674年）中，两支由大型战舰组成的舰队，常一字排开，在5英里或更长的距离上胶着在一起，展开可持续数天的猛烈炮火攻击。例如1673年夏天，荷、英舰队在北海进行了三场海战，每支舰队都包括130到150艘大型战舰，即现在所说的"主力舰"，每方都拥有9000到1万门大炮。

虽然这些战舰都因配备了大炮而威力倍增，但只靠炮弹是很难击沉它们的。即使是由一艘主力舰通常能发射的最大的32磅重的炮弹，也不能在它穿入船体时造成一个很大的弹洞。穿入爆炸时带起的橡木碎片可能会杀伤船员；但船只的整体结构却大多完好无损。只有火势蔓延，有可能焚毁船只；或者船员中的散慢性到了令人无法接受的程度；再或者船只已不能操纵时，舰长们才会惊慌失措。

因此，海军军备竞赛继续进行。到1688年，荷兰海军战舰已达到102艘（包括69艘主力舰）；英国海军有173艘（包括100艘主力舰）；而法国海军是221艘（包括93艘主力舰）。所以这些主力舰都是两层或三层甲板，载有50到100门重炮，可以说基本上旗鼓相当。它们极大的相似结构还导致了一种很普遍的骗术，即悬挂假旗来欺骗敌方船只。虽然1688年11月，威廉三世在英格兰的大胆登陆让法国吃了一惊，但路易十四的海军在第二年控制了英吉利海峡，对爱尔兰进行了一次大规模入侵，并于1690年在比奇角外（萨塞克斯海岸上的一个海角）击败了英荷联合舰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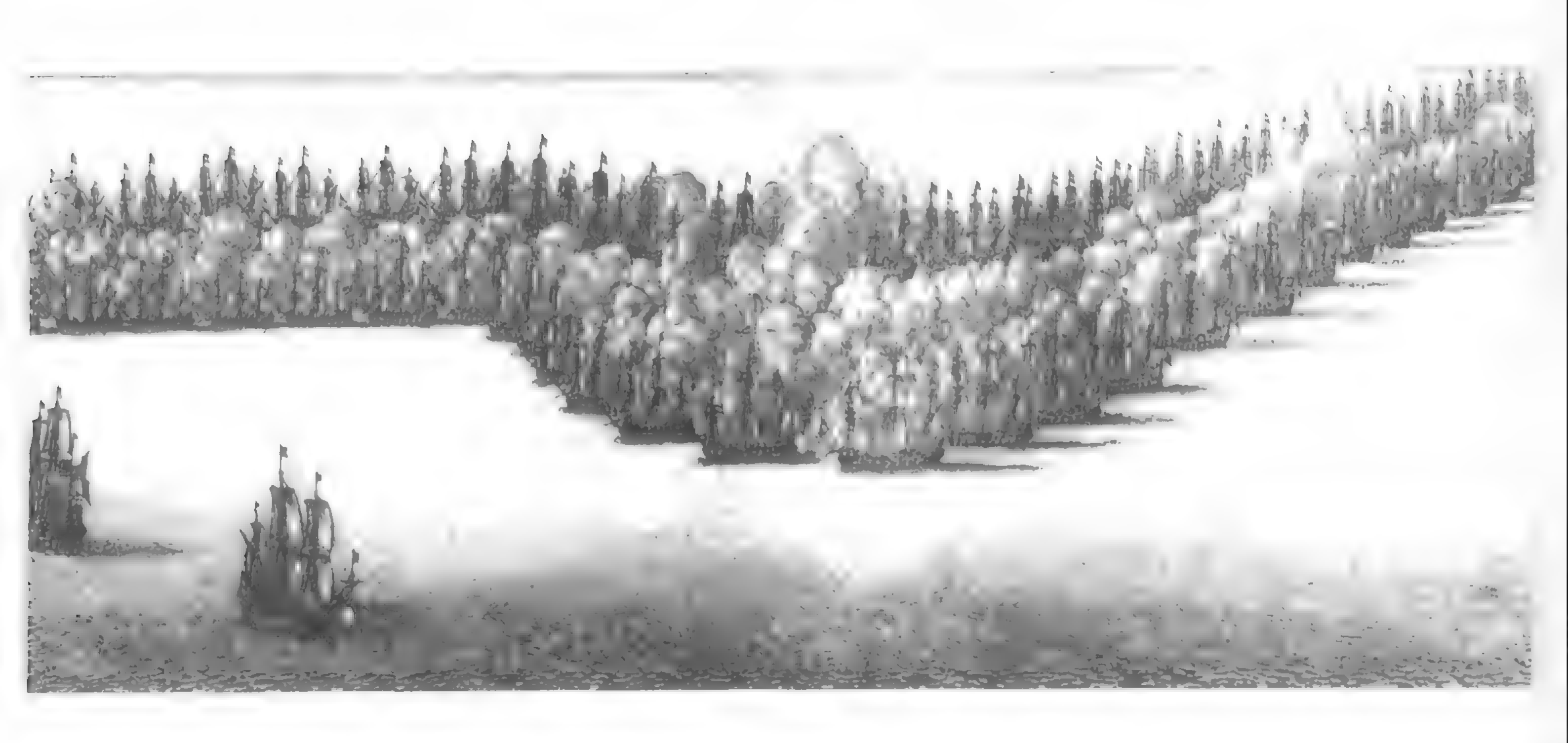
于1666年7月25日发生于肯特海岸外的圣詹姆斯日的战斗，由89艘英舰对抗由88艘战舰组成的荷兰舰队。双方摆开一条超过九英里的战线，整日都在近程内交换偏舷齐放，隆隆炮声将陆上50英里内的窗户都震得"格格"作响。虽然战势明显有利于英军，他们也设法在短期内封锁了荷兰海岸，但交战结果实际只损失了两艘荷兰战舰和一艘英国战舰。第二年，在意识到谁也无力赢得决定性的胜利后，双方讲和了

正如勒班多战役一样，如果被征服者在海上仍保有足够的实力，那么一次单独的海上胜利是远远不够的。用一位被击败的英国海军上将的话说："大多数人都害怕法国的侵略，但我却持相反意见，我总说只要我们还存有一支舰队，他们就不会做出这种尝试。"他是正确的。比奇角之战后，英国"存有"的舰队规模不断扩大，从1688年的173艘军舰、6930门大炮、总排水量大约10.2万吨，增加到了17世纪末的323艘战舰、9912门大炮、总排水量16万吨。在新增的战舰中，71艘是主力舰。

但几乎没有什么战舰是"第一流"的：庞大的参战群体，90～100门炮的重负，使得它们过于昂贵而修建不起，而且除了风平浪静的天气，其他时候很难被操纵。渐渐地，炮重相对于船身面积而言在逐渐减小，而由于增加了更多的帆，浆具方面却逐渐地得到了改进，帆叶被缩折起来，添加了脚索来保证船员能抓牢围栏。18世纪时，法国形成了一个更科学的造船设计环境（每个船坞都有一个"建造会"，由高级海军军官和主要造船者组成），在两种有影响的新型战舰设计上走到了前列：一种是两层甲板、74门炮的大型战舰，是所有主力舰中用途最广、最有海上价值的舰种，从1719年开始投入使用；另一种是轻型挂帆的快速战舰，单甲板上列26门炮，1774年开始投入使用。其他海上军事力量很快就萧规曹随，以至于"74型"和"快舰"成为典范和标准。但在整个18世纪，法国战舰继续不断地添加新的发明革新，显示出它们的建造者在海船设计和修建方面的领先地位。事实上他们是如此先进，以至于英国海军将领们有时会把法国的技术成果转化到他们自己的旗舰上。

费用计算

海军军备竞赛的费用被证明是令人承受不起的。修造一艘主力舰的费用，在1588年只有2500英镑，一个世纪后就涨到了1.3万英镑，那时，海军船坞里有4000



多名工人，是英国最大的工业。此外，1588年时，在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英国舰队上服役的士兵还不到1.6万人；而17世纪50年代时，克伦威尔的海军人数达到了3万人；17世纪90年代时，威廉三世的海军更是高达4.5万人。到哪里去找这么多人呢？只有商业舰队才能在战时提供足够的受过训练的水手来武装一支海军，因此商业船只与战争舰队的规模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联系。在这里，英国因其岛国地位得到了很大好处，这意味着它所有的国外贸易必须通过海运完成，所以即使它战舰上半数的船员是“被强迫的”士兵即被强征入伍的士兵，大多数船员也早已习惯于在海上驾驶船只。相形之下，找到一支适宜而又足够的军官队伍来指挥船只，反倒更困难一些。但海军机构的固定化，逐渐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员来担任职业军官。

英国在从1585年到1604年对抗西班牙的战争中花掉了150万英镑；1648~1660年这段时期是900万英镑；在威廉三世的战争中（1689~1697年）是近1900万英镑。没有任何欧洲国家能与之匹敌，其最简单的原因就是除了英国，其他欧洲国家都是大陆国家，被迫保有一支庞大的陆军。这并不意味着法国和荷兰就再没参与海上竞争，在17世纪晚期的一些场合以及1780年左右，他们都曾参与竞争（还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只要英国能依赖陆上盟友，通过陆地威胁它的敌人，他们就不能摧毁英国在海上的霸权。

欧洲的第一个海上帝国

北大西洋的海军军备竞赛，在内海耗资巨大的僵持中达到了顶峰，但也同时使得舰队能远离家园去寻找战略目标。葡萄牙人再一次开了先河。例如，1502年，在马拉巴尔海岸外，一支由5艘小军舰、3艘西班牙大帆船（较大型，装备武器的商船）和10只其他船只组成的舰队，与一支大约由20艘大船、60艘小船组成的印度船队相遇了。印度人凭着其数量上的优势，试图靠近过来战斗，于是葡萄牙

轻快帆船（上图），是进行探险和海岸贸易的理想船只。它能驶近海岸、抢风行驶，还能装载相对于其体积而言足够大量的货物（或船员）。在这幅由一位荷兰观察者于1564年画下的图例中，能看到船上使人印象深刻的炮组。但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还建造了较大的贸易船只——大帆船（就像下图，1540年绘画作品中的那一只）。这些船货运量巨大，下甲板上开有为重炮准备的炮孔。其中有些船达到了2000吨位，是曾经造过的最大的木制船只。用葡萄牙诗人卡蒙伊斯的话说，轻快帆船和大帆船“掠过从未有人驶过的海洋”，开辟了欧洲人海外征服的道路。

指挥官：

命令小军舰头尾相接，排成一线，全帆前进，一有机会马上开炮，并对殿后的大帆船也下了同样的命令。每艘小军舰上都有30个船员，下甲板4门重炮，上甲板6门轻炮，还在后甲板和船头放置了10门轻型小炮……大船每侧都载有6门大炮，船尾和船头有2门小炮，8门轻炮和许多更小的炮。

当他们从马拉巴尔舰队中驶过时，每艘舰只都偏舷齐放，并“匆忙地再次填弹，用成包的火药填满炮膛，这些火药包是他们为此目的事先准备好的，以使能在战时迅速填装”。“在驶过后，他们又折回来”，再次重复放炮。根据这段记载，他们的大炮瞄准的是敌船的吃水线，而小炮对准的是船桅、索具和甲板上聚集的人群。有几艘敌船沉没了，其余的也遭受了沉重的损失，人员伤亡更是惊人。虽然印度人“也用船上的大炮开火多次，但这些炮都太小了”，无法造成对方船只结构上的损害，所以葡萄牙人基本上毫发无损。此外，欧洲人大多躲在甲板下面，无论子弹还是箭矢都伤不到他们。马拉巴尔舰队四分五裂，仓皇逃窜。

其他海上遭遇战也都获得了与此役相似的胜利，从而导致在印度洋沿岸甚至延伸到中国海，都产生了一连串据点要塞和贸易点，并取得了南非海域内大多数海上贸易的管理控制权。欧洲人带来了那句从中世纪起就一再被证明的格言：贸易与战争是相互依存的。

但大炮和战阵可能使帝国的建立未免太容易了一些，17世纪晚期一位有所觉悟的葡萄牙作者写道：

从好望角开始，我们再也不愿让任何事物脱离我们的控制。我们急于将手放在每一件事上，将从索法拉到日本这5000里格（长度单位，约等于3英里）的地域一把抓起。更糟糕的是……我们这么做时，并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实力，或者想一

想……这种征服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的。

16世纪90年代，英国和荷兰舰队进入了印度洋，开始向葡萄牙人的贸易控制权进行挑战。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出的舰队包括了14艘战舰，其中9艘超过了400吨位；而1603年派出的舰队中，有900吨位的多德雷切特号（Dorclreeht），装备了6门发射24磅炮弹的重炮和18门发射8～9磅炮弹的大炮。在1602～1619年间，东印度公司在13个地方设立了要塞和大型贸易据点，共派出246只船前往亚洲。相比之下，只有79艘葡萄牙船到达了它们的印度目的地，虽然其中有些船很大，但只有43艘平安返回了葡萄牙。

到目前为止，美洲大陆的力量平衡还没有倾覆伊比利亚人的迹象，他们已在那儿建立了有效的权力。在哥伦布于1492年偶然地在加勒比登陆后的那一时期，军事力量、狡诈再加上运气，使一小帮西班牙人有效地控制了“新大陆”上75万多平方英里的土地。这面积是他们在“旧大陆”那个半岛的四倍；而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2000万人口，更是西班牙本国人口的七倍。此外，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卓越的航海技能和战舰武器装备，他们已将连接南欧和加勒比地区的海洋变成了一个西班牙内湖。第二代侵略者和冒险家也干得几乎同样出色，欧洲人占领区的前沿不断地向前推进，即使他们统治下的人口在无情减少。在麦哲伦环球旅行之后，太平洋也变成了西班牙内湖。富有讽刺意义的是，正当西方面临着几个世纪以来来自陆地的最严峻的挑战时（指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它在海上却开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扩张时期。16世纪不仅是一个军事革命和海上革命的时代，它还是西班牙征服者的黄金岁月。

第八章　对美洲的征服

"他们没带武器，也不知道武器是什么。当我给他们看剑时，他们竟无知地抓住剑刃，割破了手指。他们没有任何铁器。"哥伦布这样描写他于1492年10月12日在"新大陆"遇到的第一批当地人。乘坐着三艘广泛用于航行和冒险的轻型战舰中的一艘，哥伦布到达了巴哈马群岛，来到了一个前人未知的新世界。

虽然弄错了很多事情，但有一点哥伦布是正确的："新大陆"上的土著人不用铁器。大多数土生的美洲人才掌握石器时代的技术，只有在哥伦布到达后，才第一次见到了铁制武器甚至铁制工具。在以前对亚非的探险旅行中，欧洲人遇到的人也像他们自己一样，是用铁器的。1492年，当圣萨尔瓦多的居民"无知地割伤自己"时，他们显示出对只有铁才能产生的锋利刀刃的完全陌生。这种铁刃将成为征服的中心，因为铁（有时以它更纯的形式比如钢）构成了强有力的刀剑、匕首、长矛的主要成分，也是弓弩的重要元素，而所有这些武器都能用来造成致命的伤害。铁还是轻武器、火绳枪和大炮的中心成分。最后，防御用具、头盔和胸甲（金属马甲和肩膀、胳膊防护物）也离不开铁，欧洲人以其保护自己免受当地武器的伤害。

这个场面摘自16世纪80年代、由多米尼加修道士迪戈·杜兰编辑的墨西哥征服史。图中，用铜头箭矢和黑曜石镶边的棍棒武装起来的阿兹特克勇士，正在面对头戴钢盔、手拿武器的西班牙人

根据哥伦布的记载，当地人带弓，尺寸与欧洲的相同，但箭要长一些，用尖锐的木签或木杆制成，有时箭头就是一颗鱼牙。实际上，整个美洲的渔猎工具都是用木杆、石头或牙齿制成的。因此，打猎钓鱼用的铁钩、箭矢的铁头、砍木头用的铁斧和雕刻用的铁刀，立刻就成为美洲各地易货贸易中的畅销品，用它们来猎取食物比以前容易得多。17世纪时，奥尔巴尼——纽约附近的莫霍克人，甚至为欧洲人取了个绰号"制铁者"。但箭上的铁头、雕刻用的铁刀和伐木用的斧头也可以被用做武器，并最终改变了美洲人作战的方式。

开始时，哥伦布遇到的加勒比人对那些与他们自己的武器很相像的武器显示出更大的兴趣，尤其是对加铁制成的弓弩，它射出的箭比自己传统的弓箭射得更远，穿透靶子的劲头也更足。但陌生的宝剑的优势却没有立刻表现出来。看到泰农人对弩的兴趣后，哥伦布从鞘中抽出剑给他们看，说这和弓一样有威力。而这两样——剑和弓——将成为欧洲人在加勒比地区第一场军事遭遇中惟一用到的武器。

大炮：留下深刻印象

西方人带到"新大陆"的战争武器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们的最新科技成果——火绳枪和大炮，用铁和铜铸成的大炮已经开始改变欧洲战争的形式。整个美洲大陆上的欧洲人都急于向当地人炫耀他们最

新式的也是最有威力的武器，后者也的确给当地人留下了深刻印象。1492年12月26日，在圣多明各试射了土耳其弓后，哥伦布命令两种火药武器：一门大炮和一支spingard（火绳枪的前身）开火。“当国王（头领）看到它们的威力和穿透力后，他深感震惊。当他的臣民听到炮声时，他们全部扑到了地上。”然后，当地人送给哥伦布一个用很多黄金装饰的大面具。

并不是每个征服者在炫耀武力后都能得到黄金的，但仍有数不清的欧洲人下令开炮，以威慑当地人。1536年，雅克·卡铁尔在第二次溯圣劳伦斯河而上的航行中，曾让船上的大炮轰击森林。据他自己记载，阿尔克人震惊得似乎天塌了似的，“使劲哀叫，放声嚎叫，让人忍不住地以为地狱开了，鬼都跑出来了”。误会也发生过。1564年8月29日，雷火击在佛罗里达海岸法国营地附近，引发的火灾吞噬了500多亩土地。火势一熄，6个印第安人就来拜访法国远征队的队长。送上几篮满满的谷物、南瓜和葡萄干后，蒂穆克人首领说：“他发现我向他的地盘发射的炮弹很奇怪，使一些绿色的大草原燃烧起来……他认为他的家也被烧毁了。”意识到蒂穆克人是看到了巨大的闪电，并认为它来自大炮而不是一种自然现象后，法国指挥官劳登尼尔忙用话语“加以掩饰”。他告诉首领说，他开炮是为了表示不悦，他能毁掉印第安人的家园，也能轻而易举地重建它们。他开炮是“为了让对方意识到我的威力。”出于同样原因，埃尔南·科尔蒂斯也命令在墨西哥的一名当地的文人面前演示炮火，后者把他对大炮的印象写在树皮纸上传呈给蒙特祖马皇帝。全美洲的印第安人都毫无困难地认识到了大炮可能造成的毁坏程度。

134

石器和青铜武器

但是，阿兹特克人及其联盟并没就此止步。他们不时地击败西班牙军队，给西班牙人造成相当的伤亡，这暗示出他们不仅是一支有力量有高度机动性的战斗队伍，而且还掌握着有效的武器。有三个地区的技术已经从石器时代进入了第一个金属时代（青铜），它们是安第斯高原中部安第斯山脉的一个北部支脉（今天的哥伦比亚）和墨西哥高原。其中只有墨西哥高原上的人民先进到将金属用于军事用途。西班牙人在特拉斯卡拉初次遇上的铜头箭和标枪，给科尔蒂斯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命令周围乡村制造了成千上万支这样的武器，重新武装他的西班牙弓箭手，以便对特诺奇蒂特兰发起最后的进攻。这样，当弓箭的力道主要还是由铁制部件产生时，它们的箭头已经用铜来制作了。为了抵挡这种新式的金属武器的攻击，墨西哥高原的勇士们发展了一种特殊的战斗防护衣，二寸厚的棉制马甲和塞满棉花的盾牌。这两样后来都被西班牙人采用了，因为它们在抵御当地的铜制或青铜武器时被证明非常有效，其重量也比传统的铁铠甲轻得多（也不易生锈）。

135

除了对特诺奇蒂特兰的征服外，西班牙人几乎没机会用到大炮，因为所有欧洲人从一开始就享受了巨大的技术优势。当时只有一些墨西哥高原和秘鲁的勇士们使用青铜武器，而大多数当地人只有弓箭及用兽皮制成的盾牌和木制棍棒。箭头可能有时会涂毒，棍棒用黑曜石镶上边，但这些仍是用木头或石制工具制作出来的武器。即使是黑曜石，一种由火山喷发形成的玻璃状物质，在遇到金属时也很容易碎裂。在其他地方，易洛魁人的武器基本上就是弓箭和一种用麋鹿皮制成

的盾牌；而图皮勇士（生活在今天巴西的沿海一带）作战时使用的是半宽的木棒和长矛，这种长矛是由一种非常硬的黑木或同样硬的红木削制而成的。他们的弓箭有时也用这种木头制成，箭头是芦苇或竹子。当地的攻击性武器也没有特殊不同之处，基本上还是普通的狩猎工具。在作战时，尤其在与人作战而不是与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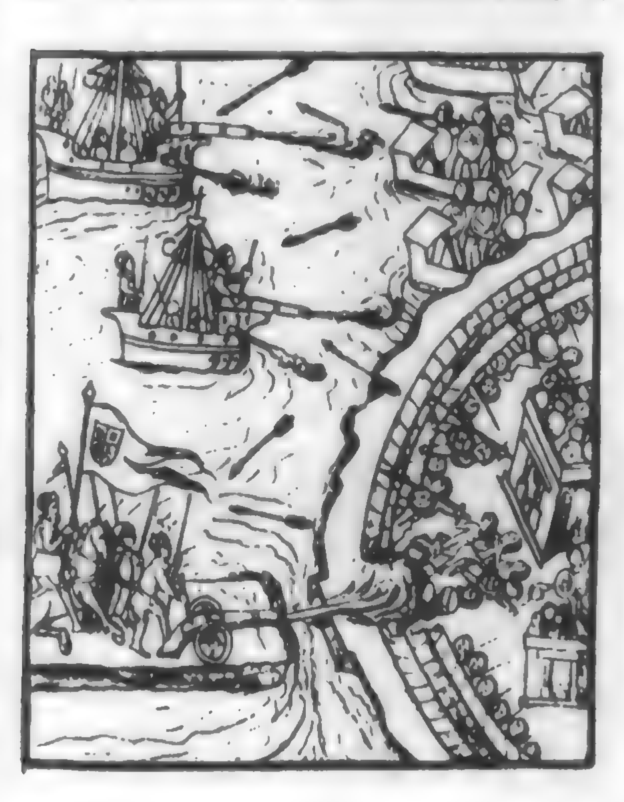
炮轰特诺奇蒂特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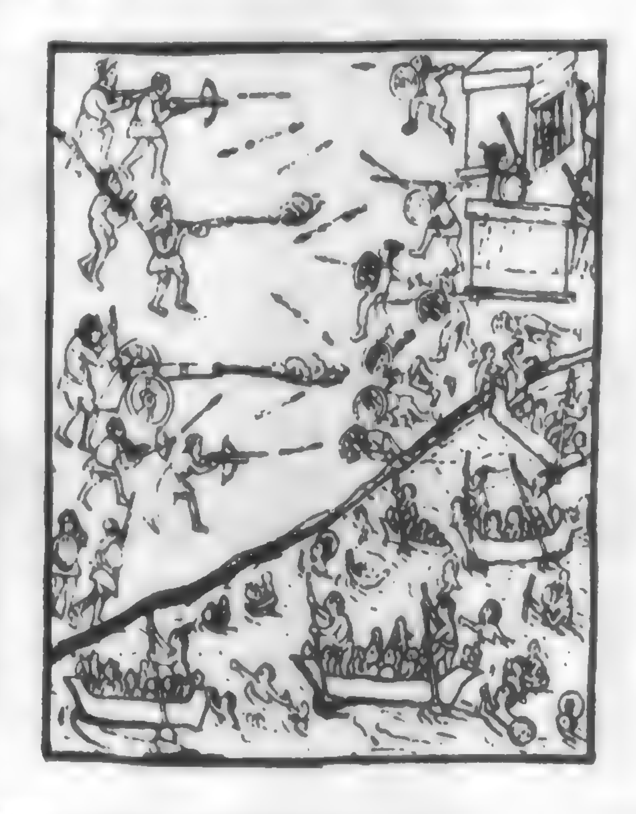
在征服美洲的过程中，大炮常被用来显示武力而非用于战斗，但最著名的一次例外是对特诺奇蒂特兰的围攻，它是阿兹特克的首都，但于今日墨西哥城的心脏地带。

西班牙人于1519年11月8日抵达特诺奇蒂特兰，立即抓来了阿兹特克首领蒙特祖马作为人质，大约6个月后，他们在一次晚宴上杀害一批当地的领主，激起了一场爆炸似的反抗。尽管他们有火绳枪和大炮以及几万名当地人组成的联军，西班牙士兵仍遭受到他们征服此地50年来最大的失败和最惨重的人员伤亡——成百上千名士兵被杀——大约有450名西班牙人和4000名他们的印第安盟友，剩余的人不得不在1520年7月1日撤离这个城市。为了报仇，科尔蒂斯重返特诺奇蒂特兰，并采用了典型的欧洲围攻战术对其实施围攻。

特诺奇蒂特兰是一个湖中岛，通过三条堤道与大陆相连。采取军事行动先将该都城与湖边的盟军隔离，再将三支由200名西班牙人和2.5万名印第安人组成的军队安置在各个堤道的入口处后，科尔蒂斯设法将这个城市孤立起来。城市被孤立后，科尔蒂斯把大炮放到13艘特殊建造，能承担船员和炮身重量的双桅船上，于1521年5月中旬开始炮轰特诺奇蒂特兰。尽管他控制了城市用水和三条堤道，但仍无法强迫它投降，这令科尔蒂斯极为恼怒。他被迫将大炮登陆，一房接一房地摧毁这个城市。三个月后，当围城结束时，没有一栋建筑物保存完好，后来人们不得不在旧址上重建一座新城。

科尔蒂斯在特诺奇蒂特兰操纵他的大炮和弓箭（左图，从湖中的双桅船上；右图，陆地上一座建筑接一座建筑地战斗）。这个事件在几年有时是几十年后，被人们用纳瓦语写成的挽歌和史诗记录下来，用感人的语言描写了围攻带来的毁灭和人员伤亡。而从胜利的西班牙人角度出发的记载，却写出了无数英雄和胜利者。





这是16世纪中期一幅不知名的当地绘画，描写的是特拉斯卡尔的征服。图中，与西班牙人结盟的当地武士，全副武装，即将投入战斗。他们手拿盾牌和长2尺8寸、用黑曜石镶边的宽棱木棒。经验较少的战士身穿简单的棉制铠甲和狮皮衣（左边），而经验丰富、级别较高的武士则在棉制铠甲外穿有精制的羽毛紧身衣。羽毛头饰暗示级别。尽管是和西班牙人并肩作战，这些队伍使用的仍是当地的传统武器和装备。

搏斗时，还要加上必要的自我防护装备，如盾牌和头盔等。

大多数当地人使用的这些武器再加上他们缺乏防护衣或铠甲的事实说明，正如许多早期欧洲探险者所言，他们的战争目的通常只是为了伤害对方，或者使敌人暂时失去知觉以便俘虏他。此外，在"新大陆"的大多数部落中，战争是为了复仇或者补充损失的劳力。如果是前一个目的，战俘会被很残忍地毒打或吃掉；如果是后一个目的，战俘会成为奴隶，或者被另一个部落收养和吸纳。战争双方通常都彼此认识，甚至叫得出对方的姓名，而且当地战争常常是指向敌对部落中的一些特定人物。相比之下，欧洲人的战争很少有这种个人色彩：土著人对欧洲人几乎一无所知，多把他们看做是另一个种类的人类。彼此在作战方式上也有很大不同，欧洲人是杀人而不是俘虏人，铁制武器具有的巨大技术优势，使得他们对当地人民的进攻显得特别残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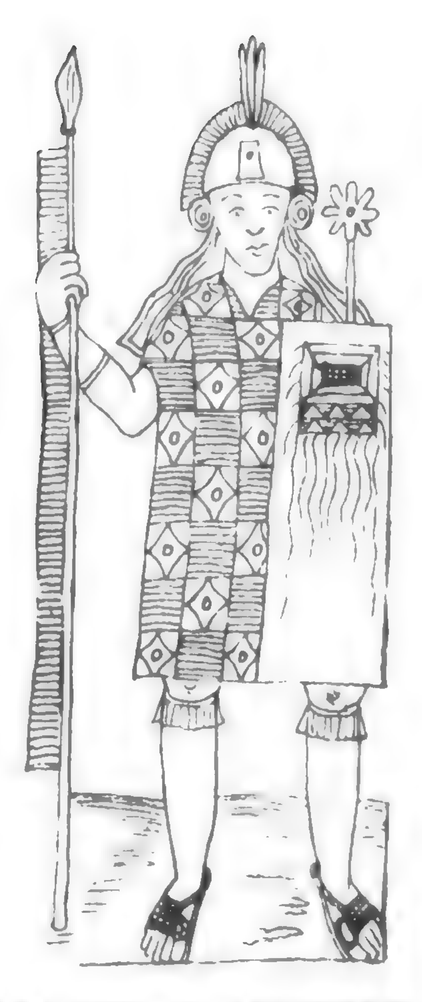
对印加帝国的征服

美洲两个最大的帝国——秘鲁中部的印加帝国和墨西哥高原中部由阿兹特克领导的"三方联盟"，都拥有更多出色的勇士和武器。其中印加帝国较少致命的金

属武器，主要使用半圆形铜边棍棒，这种武器没有锋刃，与铁器相撞时很容易弯曲。虽然基本依靠用石头制成的武器，印加人却完美地利用了这种技术和他们的地形所可能提供的战略优势。印加人居住在林木罕生的山区，最有效的武器就是从山顶推落或用投石器掷出的石头。虽然印加勇士掷出的石头既可以杀人也可以将人击晕，但西班牙人的铁制头盔、铠甲和胸衣却常常能使这些石头发生偏斜，不至于带来致命的伤害。在1536年印加人对库斯科的围攻中，石器时代的武器被充分证明敌不过铁器时代的武器。在那次战役中，190名穿戴铜盔铁甲的士兵竟击败了2万名用石头武装起来的当地人。西班牙方面的惟一伤亡是一名没戴头盔的士兵。在库斯科战斗中，贡萨洛·皮萨罗据说只在一个下午，就用自己的钢刃剑砍下了200名印加勇士的手。印加人却不能对西班牙人造成任何类似的伤害，除了有时用一种当地的套索击倒他们的马匹（一根绳上旋系三块石头的技术，至今仍被用于阿根廷大草原的围捕牛群），却很少能靠近他们以便乘势追击。

西班牙人征服了“新大陆”上的三个主要帝国：阿兹特克帝国、印加帝国和玛雅帝国，同时也征服了一些较小的文明社会，包括吉本卡斯和塔拉斯孔。西班牙士兵还和上百个用石器时代的武器武装起来的印第安部落进行了战斗相比之下，16、17世纪的葡萄牙、英国、法国和荷兰殖民者，从一开始就把他们的定居点集中在人口相对稀少的美洲东部海岸及河边

阵地战中，石器时代的武器几乎不能抵挡所向披靡的铁剑，但安第斯山那令



这是瓜尔曼·波马·德·阿亚拉画的两个印加武士。他是17世纪早期印加最后一位统治者的文书。左图显示的是传统的投石战术：石头被从投石器中掷出，而且先要在头顶旋转投石器以获得速度和力量。右图画的是一位手持长矛和锤矛的印加勇士，矛头是石质或青铜质的。星形锤矛是印加人在短兵相接时的典型武器

人目眩的垂直地形有时却为印加战士提供了战术上的优势，这一点他们很快就学会了利用。利用地势将西班牙人诱入狭窄的山道，是印加人惟一能够重创他们的机会。与美洲其他地方的居民不同，印加勇士有史以来作战就是为了杀人，而不仅仅是俘虏对方。因此，一旦堵住一条通道的入口并占领制高点，他们就将巨石推落下去，将敌人连人带马一起杀伤。1536年就发生了三次这样的进攻。贡萨加·德·塔皮亚手下的70名西班牙士兵，在瓦伊塔拉附近中了圈套，几乎全被杀死；迭戈·皮萨罗部下60人中，有57人在柏尔科斯附近被杀；莫尔贡凡约·德·基尼奥内斯也有30名士兵在从乔科瓦山下来开往海岸的途中遭到了相同的命运。从那以后，西班牙士兵在行经山路时总是小心翼翼、慎之又慎。

137

除了造成人员伤亡，印加人对安第斯垂直地势的充分利用，还迫使西班牙人采用了与在美洲其他地方不同的作战方法。在库斯科附近的第一场大战中（公元1536～1537年），印加人的一支主力联军占领了两个几乎无法靠近的石头堡垒：库斯科上首的萨克塞胡曼和山顶的奥扬泰坦博。如果大炮被迫在这样一个陡峭的角度开火，炮身的后坐力就能把大炮震落山底。在对萨克塞胡曼的围攻中，皮萨罗兄弟不得不采用传统的攻城术：用梯子爬上城墙。

虽然印加人利用他们的陡峭地势，掀起了两次反抗西班牙人的大起义，但他们最后成功的机会极小。两次起义都被一股来自美洲和西班牙的人力物力的巨大洪流击败了。仅在1536～1537一年间，就有1000个士兵、上百匹马和几千件武器涌进了秘鲁。1539年11月，第二次印加大起义结束，但直到几十年后，西班牙人才在这一地区得到最后的胜利。从他们于1532年占领卡哈马卡平原上的阿塔瓦尔

138

印加的堡垒寺院——奥扬泰坦博，它坐落在库斯科以北，是进入安第斯山和亚马孙盆地的便道。它是印加领袖曼科的据点，从要塞掷出的石头成功地遏止了西班牙士兵的攀登，使它在1536年免于被占领。陡峭的山坡也阻止了西班牙人使用大炮。但是曼科的同父异母兄弟投奔了西班牙人，曼科只得放弃此地并转移到另一个更为险峻的地方，之后此地逐成废墟。

帕开始，到最后一位印加军事领袖图帕克·阿马若被杀，一共是40年。图帕克就是利用险峻地势的战术优势才坚持这么久的。要想到达他的最后一个据点——比尔卡班巴，只能翻过一座海拔1.2万英尺的高山，然后经过狭窄的绳索桥，进入亚马孙热带雨林才能发现它。

战略上的联盟

铁制武器固然给“新大陆”上的欧洲人奠定了决定性的技术优势，但这种优势还有部分原因来自他们战略运用得当。他们成功地利用了当地人之间的矛盾，先以小股人马而非大部队抵达，技巧地与当地人结盟，或者为了自己的目的挑拨当地人的世仇。这些方法被证明是很重要很有效的。从一开始，西班牙、法国、葡萄牙入侵者就大力推行与当地的一个或另一个民族结盟的政策。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的做法就是窥探、观察那些正在寻找新盟友的彼此有世仇的民族。因为特拉斯卡拉人仇恨阿兹特克人，所以科尔蒂斯与他们结盟，以获得攻打特诺奇蒂特兰所需要的勇士和供给。1537年底，西班牙军队的领导者之一迪戈·德·阿尔马格罗，说服了曼科的兄弟波鲁及其部下投奔西班牙一方，暴露了曼科的力量和弱点，从而迫使曼科撤离和放弃了陡峭的奥扬泰坦博。皮萨罗兄弟和阿尔马格罗总能找到一位印加领袖做盟友，他们答应在西班牙统治区给他极大的特权和荣誉，而他则能使印加帝国处于分裂状态，并保证其中一些地区效忠于西班牙。

葡萄牙人也充分利用了当地的盟友，他们在巴西与图皮人联合起来与阿亚蒙

若魁人作战；而在尚普兰的法国人则联合了加拿大的阿尔贡金人和休伦人，只与易洛魁人苦斗不休。即使是起初拒绝与当地民族"纠缠不清地结盟"的荷兰人和英国人，也最终发现如果不利用当地人之间的仇怨、依赖这样的联盟作为支持的话，他们就无法生存下去。

但是当地的敌人并不是欧洲人在美洲的惟一作战对象。即使在征服墨西哥和秘鲁的巅峰时期，西班牙军队之间也忙于自相残杀。1520年，特诺奇蒂特兰之战的中途，科尔蒂斯不得不抽调部队去对抗一支被派来推翻他的900人的西班牙队伍。征服秘鲁的主要领导人之间的仇恨（皮萨罗兄弟和阿尔马格罗）更富于传奇性。在镇压印加人起义中，这种仇恨爆发成一场内部战争，双方（及其追随者）打得你死我活。在军队指挥官的控制和经济报酬的驱使下，下面的士兵也乐于在战斗中彼此兵戎相见。但是这些争斗并没有削弱欧洲人对美洲土著人的压制。如果当地人知道如何利用这些分歧和仇视，就像西班牙人在当地人身上所做的那样，结果就不得而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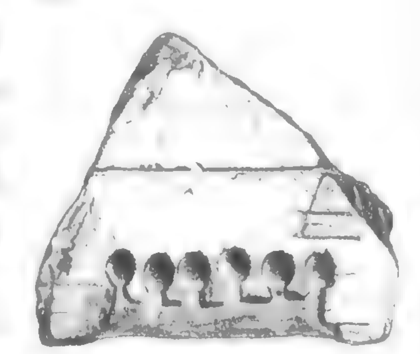
铁　刃

除了秘鲁山区和墨西哥的铜头箭矢及标枪外，欧洲人可能遭遇的惟一潜在危险来自毒镖和毒箭。毒镖在加勒比海和南美的东海岸使用得最为广泛，主要用于麻痹大猎物和鱼。当地战争传统上是用棍棒作战，但拥有技术优越性的欧洲人到来后，毒镖和毒箭就转而对准了人类这个猎物。为了保护自己，葡萄牙人采用了塞满棉花的铠甲来对抗武士们射出的毒箭，这是他们在15世纪40年代时从非洲学来的方法。1548年以后，每个在美洲的葡萄牙定居者都被要求有一层棉花填充物，最好在外面再罩一件皮制胸甲，而糖厂主则被要求在他们的产业中至少储有20件这样的装备。虽然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采用了这种棉制胸甲，但西班牙人已在特拉斯卡拉人那里尝到了厉害，葡萄牙人也早在70年前就从非洲人那里吃到了苦头。

战争中的敌人是从对手身上互相快速学习的。正如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从他们的敌人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一样，"新大陆"上的人民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全美洲人都迅速适应了各种各样的铁制技术：从欧洲人那里获得的渔猎用的铁制工具，在任何被引进的地方都被快速采用；铁链改变了易洛魁"长屋"的建筑，也改变了他们的狩猎模式。1492年时，哥伦布可能会发现当地人"对武器表现得很天真"，但这种天真不会持续很久。皮萨罗俘虏印加王子阿塔瓦尔帕18个月后，其继任者手下的勇士就已经拥有了西班牙的宝剑、斧头、头盔和盾牌，并用它们来保卫库斯科上的要塞。在大约五十年的时间内，"新大陆"上的当地人就已经既掌握又拥有了足够数目的铁制和钢制武器来进行有效的自卫反击。但不幸的是，对他们而言这一切已经太晚了。

在当地人获得足够物资储备和掌握铁制武器前的50年，西班牙人在他们的早期征服期间伤亡相对较小，因为他们的全部大胜利都发生在当地人能熟练地运用致命的铁制武器之前。在整个美洲大陆上，只要是在前50年，无论欧洲人何时与当地人作战，战争模式都与西班牙人的早期征服模式相似。虽然当地人的突袭偶尔会给他们带来较重的损失，但更普遍的战果是欧洲人几乎无人死亡，而当地人

在与欧洲人初次接触的50年里，美洲印第安人创造了精巧的石头工具，来修理缴获的武器，也为自己提供武器弹药。图上所示的是半个石模（上图），用来制作6颗欧洲枪支所需的铅弹。一个石头手斧（下图），用来修理滑膛枪。这两件东西被分别发现于马萨诸塞的萨顿墓地和伯尔山墓地。



却伤亡惨重。1624年在圭亚那作战的一名法国胡格诺教徒让·德·弗雷报告说："120多名敌人（印第安人）死了，受伤的更多。而我方却只死一人，伤15人。"同样的结果也出现在新英格兰的皮阔特战役中（公元1638～1639年），在最后的激战中，印第安人的伤亡数很高，有400到500人，而欧洲人却无人战死，受伤的人数也近乎于零。1644年2月，一支由140人组成的荷兰军队袭击了康涅狄格的格林威治的一个印第安村镇，杀死了500到700名印第安人，但荷军一方却没有任何死亡，只有15人负伤。

拥有铁器只是在"新大陆"上为欧洲人提供了一个初始的优势而已。到17世纪60年代时，马萨诸塞的印第安人已能够生产弹药和修理滑膛枪了。智利南部的游牧部落马普彻则采用马和矛，成功地阻挡住装备精良的西班牙军队达几十年。一旦拥有了铁器时代的技术，当地人就能更好地保卫自己，他们与欧洲人之间的战斗也就不那么一边倒了。一旦欧洲人失去了他们的优势，他们的伤亡人数便大幅度增加。1675～1676年，英王菲利浦与印第安人作战的军队伤亡是3000人，而他们征服大帝国的能力也就随之而去了。

在"新大陆"的所有军事力量中，西班牙人将铁器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在铁制武器还未落入当地人手中之前，他们就已经用剑、弓、滑膛枪和头盔、胸甲一起，迅速征服了当地社会，而且通过继续保持对铁制武器的垄断试图控制所征服的巨大领地。当英国和荷兰当局意识到这种危险性时，他们便都立法禁止与当地人进行任何武器交易，但他们的同胞却更急于买卖被禁止的武器来牟取暴利，而不是参与禁运禁卖。可是西班牙士兵和定居者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在西班牙，携带武器——在此情况下通常指的是铁制武器，传统上属于贵族特权，因此防止武器落入印第安人手中，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其社会差别。此外，西班牙官员遵循了穆斯林曾在伊比利亚半岛制定的一条规则：禁止被征服者拥有铁制武器。中世纪时，战败的犹太人和基督徒们被禁止拥有铁制武器，包括匕首。再次征服伊比利亚后，西班牙人把这条曾加在他们身上的限制又加在战败的摩尔人身上，规定他们不许拥有任何铁制武器，而且严格限定像刀子这样可用做武器的铁制工具的拥有者身份。1492年后不久，这样的限制就被用于格拉纳达的摩尔人。因此，广泛地对铁制武器和潜在性武器实行禁令，既有社会意义又有战略意义。一直到19世纪早期，西班牙的殖民统治进入尾声时，法律依然禁止印第安人有使用枪炮的资格。

142

因此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文化上，西班牙人都习惯于利用铁制品的技术优势，但欧洲其他国家却没有做好相同的准备。在西班牙人成功地推翻"新大陆"上的主要帝国一百多年后，荷兰官员还认为防止马匹落入印第安人手中，比防止他们拥有枪炮或铁制武器更重要。在纽约的第一批荷兰殖民者可以卖给印第安人铁制武器甚至大炮，但绝不能让印第安人骑马或教他们骑马，否则就会失去他们的财产和报酬，被永远地逐出殖民地。后来，荷兰官员们才认识到铁制武器比马匹更重要，试图禁止交易，但已经太晚了，当地人已经武装起来了，而且通常他们就是由荷兰人自己武装起来的。

葡萄牙商人刚开始也为巴西的印第安人提供铁斧和铁刀，使他们在完成砍伐巴西树木的任务时既快捷又有效。但在开始定居大约二十年后，殖民者们认识到

了自己的错误。第一任总督将军被授予了严厉的权力，制止进一步出售重刀这样的武器给当地人。一旦犯禁，便判处其死刑。同时鼓励人们相互窥探和揭发，凡告发某人向当地人出售武器者，可以得到被告发者的一半财产。

马 匹

在西班牙人冲杀轻甲装备的印第安人军队时，马匹增加了长矛的速度和力量。在平地即在较平整的地形上，马上的西班牙人能冲破印第安人的防线；在山区，马匹使得西班牙人能够闪电般地突袭乡间，搜寻粮食。

143

欧洲人享有的最后一项辅助优势，是运用驯养的动物尤其是马匹参战。“新大陆”的家养动物极少，偶尔会把熊这样的野兽关在栏里，养肥吃肉；而羊驼和骆马（传说中坏脾气的骆驼的坏脾气亲戚）主要被用做驮畜。在欧洲人的早期胜利中，马匹的作用虽然没有铁那么重要，但欧洲战马在攻击时的速度及其与长矛和剑的锋利铁尖的结合，大大增加了铁制武器打击时的力量。

但也出现了一些困难。虽然马上骑士开始时被当地人畏惧，但这种畏惧很快就消散了。骑兵的冲锋在开阔的大平原上最为有效，但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大部分地区都是山区，余下的许多地方也都是热带雨林和沼泽，它们都不是适合骑兵作战的地形环境。只有在安第斯山区，由于它的许多地方都有维护良好的道路，骑兵们才能快速行动并充当先锋部队，无论进攻还是退却均十分迅捷。在印加人对库斯科发起的围攻中（公元1536～1537年），西班牙的秘鲁远征军与印加人旗鼓相当，全靠对周围地区闪电般的马上突袭来搜寻粮食，西班牙人才坚持下来；直到在印加领导人之间挑起内讧，大量西班牙武器源源而至，印加人解除其围攻为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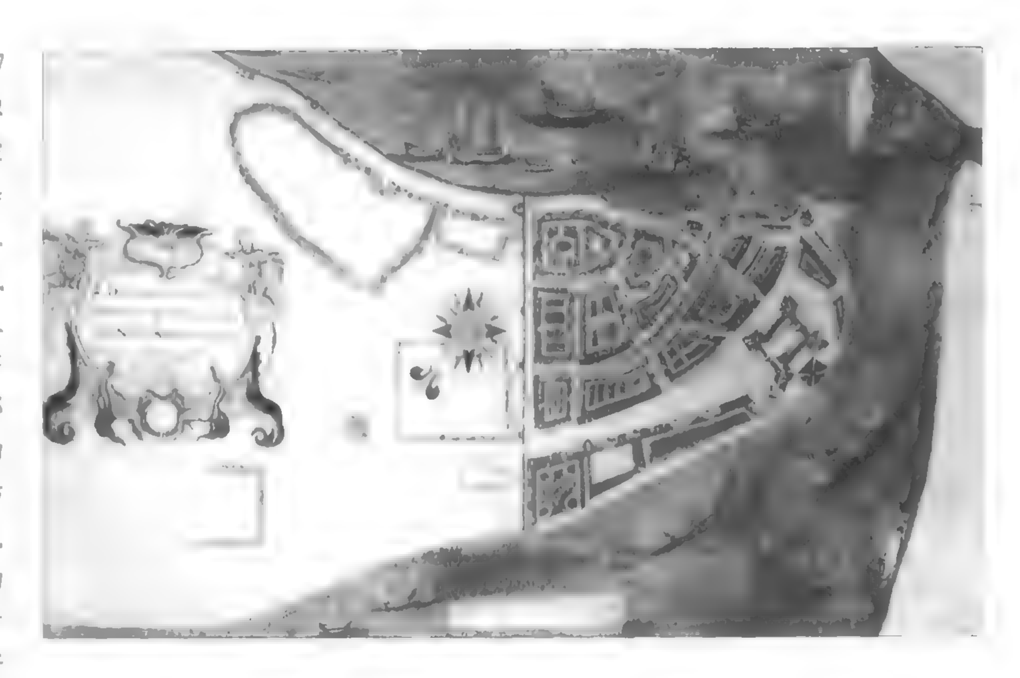
这种骑兵突袭所以能够成功，部分原因是因为印加人既没有骑兵，也没有在遭遇骑兵时对抗它的武器。欧洲人在安第斯的队伍中，有时候大约1/3左右的士兵有坐骑，相比之下，科尔蒂斯的军中则最多只有10%的人骑马。

很久以后，马匹和骑兵战术将在智利、阿根廷和北美的平原上变得非常重要。除了安第斯地区，美洲的战争像16世纪时世界上的其他地区的一样，是由步兵和步兵武器——火绳枪、弓箭、宝剑，偶尔也有野战炮，构成了胜利的关键。

疾 病

在为欧洲人赢得胜利的武器中，有一种是他们无形之中带来的，那就是天花、麻疹、伤寒、斑疹伤寒、流感，这些美洲大陆闻所未闻的传染性疾病。这些疾病给“新大陆”当地人的大规模的军队，造成了组织上的软弱。例如，皮萨罗到达秘鲁后不久，一场传染病就在印加首都蔓延开来，它杀死了王位继承人，重新开启了关于继承权的争斗。结果是一个帝国四分五裂，互相攻击，开始更关注自己内部的矛盾冲突而不是那一小撮外来人。而十年之前，在科尔蒂斯撤走后，第一场灾难性的传染病——天花，袭击了特诺奇蒂特兰的阿兹特克人，起到了“特洛伊木马”的作用。疾病不仅减少了人口包括勇士的数量，也带来了军队领导者的

144



阿姆斯特丹要塞（这幅17世纪草图的右侧——今日纽约城巴特里公园所在地），控制着通往新阿姆斯特丹的海上通路。建于整个美洲海岸上的工事，都是早先的欧洲移民为了防止其他欧洲人的炮火袭击所作的戒备。要塞最坚实的城墙通常是面对大海的，那是欧洲人最可能发起进攻的地方，但殖民者们也不得不防范来自陆地的进攻。后来变成世界上最著名的金融中心的街道，就得名于图中央那道看上去是垂直线的城墙，此墙将荷兰定居地与曼哈顿岛的其他部分分离开来。

继承权问题。因为缺乏在战场上更替死去领导者的传统（阿兹特克人的作战主要是为了俘虏，而不是杀人），这场大传染病在军队指挥层留下了完全始料未及的权力真空。由此在人员更替（和战略更替）上造成的混乱，甚至限制了这部大型军事机器进行有效集中和反击的能力。

加固的阵地

一旦凭借最初的胜利侵入“新大陆”，欧洲人就陷入了与当地人的长期低强度战争。美洲的当地民族成功地学习和吸取了欧洲人的技术（刀、剑、枪炮和马匹），并使其适用于他们自己的战术和战略传统（伏击、“打了就跑”的偷袭、夜间袭击）；在这点上，他们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成功地迫使欧洲人只能缓慢而困难地向前推进。

因此，在南美洲和北美洲，欧洲人采用了防御战略来对付长期战争，方法就是修建设防的定居点。在西班牙征服的地区里，禁止武装当地民族的政策执行得很有效，定居者不需要这样的防卫工事；只有在北部边境，这种防御技术才是必需的。但在美洲的其他地方，就需要一些形式的工事来保护自己，以对付当地的敌人。法国人一开始就在巴西、佛罗里达和加拿大构筑了要塞；葡萄牙人要求农业定居点拥有军事设施。每个糖厂主都不得不修建一栋设防的房屋，配备一个向外的壁垒和瞭望塔。相比之下，在新英格兰，乡镇的地址一开始就选择了一个远离当地居民（和可能遭受突袭）的安全距离，因此他们的定居点就不是那么层层武装、重重设防，火绳枪和滑膛枪是他们的武器。但是在弗吉尼亚，欧洲人的定居点离当地人住所要近一些，城镇都以木墙来防范、抵抗当地人对他们的武装袭击。

但是当地人并不是防御工事所必须抵抗的惟一对象。正如西班牙士兵在征服秘鲁和墨西哥时自己内部曾争斗不休一样，各种不同的欧洲团体之间不久也同样失和并争斗起来。西班牙人获取的财富和新土地所提供的机遇，使得每个欧洲列强都试图征服美洲。到达有争议或有潜在争议性的地域后，新来者的第一步就是

设防，以对抗已经在这块大陆上定居的其他西方人。1550年以后，这种设防包括了最新式的欧洲防御工事的建设——宽墙和土制工事，以抵御大炮的轰击。1607年，第一批英国的永久性定居者，在乔治·珀西的带领下建造了一座要塞，它是"三层的，每个拐角有三层半月形壁垒，墙上放有4门或5门大炮"。佛罗里达的法国胡格诺教徒们一住下来就建造了一个棱堡，因为他们深知它在当时战争中的重要性。这些防御工事可不是用于防御当地人的，这些工事的坐落地点、所设定的靶子或防范的入侵者正是其他的欧洲人。

因为携带大炮的欧洲战舰的攻击肯定来自海上，所有"新大陆"上的海岸工事都被仔细建筑以抵抗来自海上的进攻。曼哈顿岛上的荷兰工事，是被设计用来以交叉炮火封锁溯东江而上的船只的。在加勒比岛屿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的西班牙城市圣多明各，则利用了大量的悬崖峭壁来架设大炮，以此阻挡从海滩上的直接登陆者。但因为岛上的当地人已经被灭绝了，西班牙人就让要塞的后面处于开放状态。结果在1585年，弗朗西斯·德雷克登陆时，遵循简单的权宜之计（不是这儿，就是那儿），脱离了大炮的射程而从要塞背后发起攻击，攻陷并劫掠了这座城市。

在德雷克于1585～1586年对加勒比海进行了灾难性的袭击后，军事工程师们修建和重整了西属美洲的海岸工事，以防止以后再发生类似的攻击。大批环绕城市的城墙也随之被仔细地修建起来。这些西班牙工事还存留在整个加勒比海地区，时至今日，位于波多黎各的圣胡安－德尔蒙若、哈瓦那（古巴）和卡塔赫纳（哥伦比亚）的城墙还在供人观赏。但是有一个很著名的要塞已经不复存在了，它是位于曼哈顿岛南端的一个荷兰要塞，要塞的一面建造了许多木栅栏和胸墙以加强要塞的防御功能。胸墙的通道和街道，被以堡垒或城墙命名。美国境内最著名的街道，即美国资本中心华尔街就是以堡垒命名的，它是西方战争方式的著名象征，由荷兰人建于1652年，用以维护他们在美洲大陆的落脚点。

145

第九章 王朝战争

堡垒设计的革命、战斗中对炮火的更大依赖和1530～1630年间军队规模的扩充，改变了西方战争的方式。一方面，战争现在影响到更多的人（既是直接的，比如士兵人数的增加；也是间接的，比如战争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围攻超过了实际的战斗。一位经验丰富的法国士兵布莱兹·德·蒙吕克，在16世纪中期写道：围攻技术构成了战争"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方面；而用一个世纪后奥勒若公爵罗杰·博依尔的话说："现在，战斗不能决定国内的争吵，它只能像以前那样使国家沦为征服者的劫掠物。因此我们更应像狐狸而不是像狮子那样作战，你应该围攻20次才打一次仗。"

在意大利北部进行的帕维亚的战斗中（公元1525年），哈布斯堡皇帝的军队主要凭借对手持枪炮的创造性的使用，击败了法王弗朗西斯一世。图上，一个身穿白衣以示区别的火绳枪手方阵，击退了一次骑兵冲锋；同时在后方阵地上，长矛队伍正在厮杀。法军遭受了高于哈布斯堡军队八倍的惨重伤亡，他们的皇帝也被俘了

职业军队的出现

此外，战争现在发生得更频繁，持续的时间更长，卷入的人数也更多。16世纪和17世纪发生的战争比欧洲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多，整个大陆大约只有十年的和平时期。16世纪时，西班牙和法兰西几乎一直在发生战争；而17世纪时，奥斯曼

土耳其帝国、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帝国和瑞典是平均每三年就有二年处于战争状态；西班牙是每四年有三年在作战；波兰和俄国是五年中有四年是战时状态。

正如意大利诗人富尔维奥·泰斯蒂在1641年写的那样："这是士兵的世纪。"每个国家都保有大量士兵。15世纪70年代时，勃艮第"鲁莽"查尔斯曾在尼德兰创建了一支大约有1.5万人的军队，但一个世纪后，他的后代菲利浦二世在那儿供养了8万人的队伍。1640年，西班牙在低地国家的军队已超过8.8万人。同样的趋势发生在其他任何地方。17世纪时，有1000万到1200万欧洲人变成了士兵。这些军队的大多数是步兵：法王弗朗西斯一世于1525年入侵意大利时，3.2万人的法军中只有6000人是骑兵；1635年，法国准备与哈布斯堡作战时，下令征募了13.2万名步兵，但只有1.24万名骑兵。

147

在由围攻和小冲突占主导的战争中，主要军事目标是设防的城市而不是野战军，征募的步兵比骑兵更具有突出意义。无论是在战壕还是在堡垒里，步兵尤其是滑膛枪手都非常重要，而马匹看起来比它们铠甲在身的骑手们更难抵受攻击（许多人只在一场战斗中就要失去几匹坐骑）。从经济角度来看，也同样如此。兵役轮值带来了很大好处，许多士兵既是军人又是自己的支付者。他们被征募、配备和保持所花的是同一笔费用。但这种变化也产生了严重的问题。

最为严重的是，对于这种扩大了的新军队和增加了的运作范围，管理系统却还是相对保持不变，军事机构（像国内其他部门一样）不得不忍受多重管辖、不负责任的扯皮和管理者内部小团体之间的无谓争斗。此外，每个战季开始时，政府都要召集超过他们供给能力的大批军队。控制无力和物资不足，就产生了严重的纪律问题。骑兵通常来自社会上层，其成员从孩童时代就接受战争训练，因此可能会承受巨大的艰辛；但紧急招募的步兵，有时是被强征入伍的，根本不愿作战，他们往往通过"开小差"或"兵变"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对此，有两种对策被广泛采用：按照合同雇佣外国的职业士兵；对本国招募的士兵灌输一整套的纪律和训练。前者在16世纪风行一时，后来才逐渐让位给后者。

使用雇佣兵在中世纪变得很平常，整支军队都可受雇于任何付得起钱的国家。这种做法在现代时期的早期继续流行，瑞士和南德的军事承包人是其中的骨干，他们的队伍训练有素，随时可以紧急开拔。一看到有麻烦发生，政府就会与一位有能力的承包人签订合同，确定所要征召和武装的部队人数、将要支付的报酬及第一次召集的时间和地点。有时，在预料到会有危险（或只是为了防止这支队伍被另一个战争国征募）时，会有一笔"滞付金"（德语中的"wartgelt"，意即"等待中的钱"）不被支付，直到整个调遣已经完成，或者危机已过。但多数情况下，承包人应保证他们的人"见票即付"。

148

这个体系之所以能运转，是因为有很多意志坚定、能力出众的承包人。德国骑士葛茨·冯·伯利欣根（公元1480～1562年），就专门为他自己或他人的（以所得物的1/3作为回报）仇隙作战。在他的回忆录《我的仇隙与纠纷》中，他列举了其中的30桩。他率领征募的人员（大约有150人）纵横于整个西德地区。出身高贵的同时代人，如果有更大的财力，还可以征募到比葛茨更多的军事力量——一个甚至可能二三个军团，到17世纪早期时，有些人竟能调遣整支大军。在"三十年战争"中（公元1618～1648年），德国境内至少同时活动着100名军事承

对退伍军人的医疗和照顾

16世纪时，关于人体运作的了解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士兵们至少可以在一点上放心，即军中的医生和护士是所能提供的经验最丰富的医务工作者。像截肢这样的新技术已经发展起来并用以处理在战斗中或被从火药武器中射出的石弹、金属炮弹击碎的四肢。这幅木刻（左下图）先自汉斯·冯·格斯道夫的《军队外科手术手册》（公元1517年），此书是已出版的第一本关于外科手术的插图本论著。一位患者（站在右边），捧着被成功截去手部的已去掉绷带的残余上肢；另一位患者则失去了右腿。他被按坐在椅子上，受伤的腿架跨在好腿上，手抓住膝盖作为支持，眼睛被蒙住以不让他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

手术工具在16～19世纪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锯、曲柄和一大堆又长又快又薄的器械。先用刀切开，然后再拉几下锯就行了，下面放一个盆来接血。在麻醉剂被发现之前，大多数医生不顾带给病人的剧痛与震惊，相信只有一种方法能够止血和防止感染，那就是烧灼截肢部位周围的肌肉。只是到了16世纪，才发现如果为伤口涂上一层厚厚的动物脂肪，伤口也会同样愈合，而且远没有那么痛苦。

如果患者躲过了来自伤势、震惊或者感染的死亡的威胁，健康得足以照顾自己，他们就被装上假肢。16世纪晚期的著名军医安布鲁瓦兹·帕雷设计了一整套假腿（右图），希望能减少截肢者的不便。

战伤需要在战场上或战场附近得到处理，但当时的军队医院很少，彼此之间也相距很远，只有西班牙曾试着正确地照顾受伤的士兵。它的军队都配备了成批的训练有素的医生和护士。1572年到1659年间，在尼德兰连续作战的西军有了欧洲第一所军队医院，地址在布拉班特的梅赫伦（今天比利时的梅林）。它有330张床位和一支60人到100人的医疗队伍，其成员从主治医生到洗衣妇一应俱全。从痢疾、疟疾到心理失调和战争带来的精神创伤以及严重的创伤，士兵们在任何疾病上都能得到相当成功的治疗。治疗是免费的，但要从士兵的基本月薪30银币中扣下1个银币，作为医院的管理费。传染病与外伤一样是个大问题，梅毒极为流行，某一时期内竟传染了大约1/4驻扎在尼德兰的西班牙士兵。尼德兰医院为此得到一笔政府基金，用以专门研究梅毒的治疗方法。再没有任何国家能如此精心地照顾它的伤兵了。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就采取了全然不同的方式来对待她的军队。在英国于1588年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后，她拒绝了一切给退伍军人发钱的建议，最后只发放了残疾抚恤金。1593年的议会法案发布了业已过时的法律命令，并声称"它是与基督的仁慈、我们的政策和我们国家从1588年5月25日起获得的荣誉相符的。这个荣誉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冒着失去四肢和致残躯体的危险换来的。因此，那些为了保卫女王陛下和我们的国家，冒着生命危险，失去四肢和致残躯体的人，应该得到曾被剥夺的回报与奖赏，这是他们尽忠职守的结果，其他人也应努力如此"。尽管法案词句华美，但在此之前的5年里，那些在无敌舰队战争中残废的士兵，或者饿死了，或者在运河港口上乞讨，这笔姗姗来迟的抚恤金只帮助了那些幸存者。

包人，到17世纪30年代这个数字增加到300人。瓦伦斯坦的阿尔贝在两次不同的场合，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招募了一支大约2.5万人的军队（在1625年和1631～1632年）。而萨克森—魏玛公国的伯格纳德，曾在1635年率领他自己的1.8万人的队伍为法国服役。1639年，伯格纳德去世时，由承包人在国外招募的外国军队，已达到法军人数的20%。（大约有12.5万人）。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时，驻扎在德国的6万人的瑞典军队中，只有1.8万人是瑞典人。

一名来自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领导下的苏格兰和爱尔兰步兵营的雇佣军。此营有800名强兵，1631年被雇来与瑞典的阿道弗斯·古斯塔夫作战。在"三十年战争"中（公元1618～1648年），大约有2.5万名苏格兰人出国参战，几乎是该王国成年男子人数的10%，其中大多数在新教国家服役。这些部队不同寻常的装束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这幅同时期的版画，是在他们抵达德国后不久在纽伦堡完成的，是已知的第一幅关于高地（"爱尔兰"）服装的图画。

雇佣军的巨大优势在于他们已经懂得如何运用武器，如何布阵作战。正如一位法国军事作家在16世纪40年代观察的那样，外国雇佣军是"那些最可信任的人，没有他们，我们将没有勇气去做任何事"。但在紧急关头，他们也可能是不可靠的。如果他们太远离家园，如果他们发现军队中的同胞站到他们的反面，或者（如上所言）如果他们的报酬被延误了，他们就可能拒绝作战。此外，当战争持续下去时，他们的经验优势很快就会消失，因为不仅他们的人数由于伤亡在不断减少，而且本国征募士兵的能力也会随着时间而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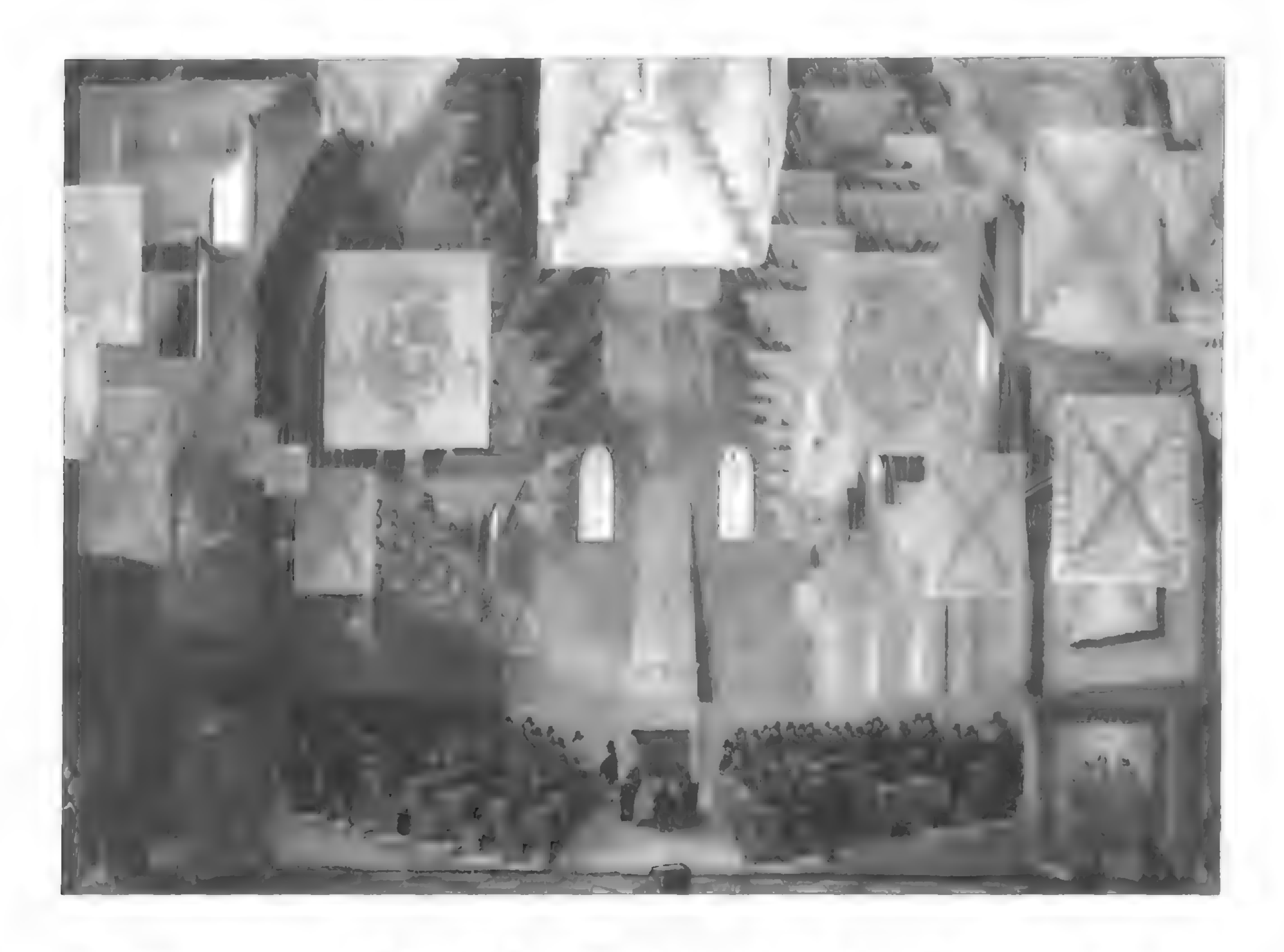
有几个进步帮助了本国招募士兵的职业化进程。大多数国家引进了军服、军乐和拥有自己效忠目标的固定军团。1534年，查尔斯五世在他的三个意大利领地——那不勒斯、西西里和伦巴第，各组建了一个常备的西班牙军团（叫做tercio）。每个军团都有自己的徽章、军装、随军牧师和执法官，以及自己的军乐队和医疗队（前者以25∶3的比例在数目上超过后者）。就像罗马皇帝的兵团一样，其明确的目的就是激发同样持久的勇敢传统和严格的团体忠诚。这个做法被一直延续下来。1589年，当在尼德兰服役的伦巴第军团因为犯上被强行解散时，军官们隆重集会，毁掉了他们的军衔徽章，撕破了他们的制服。"这些，因为它们再也不能代表国王陛下了，也就再也不能要求它们曾拥有的敬意和爱护。"整个西班牙军队对此均深感痛惜。因为西班牙军团名声赫赫，是"军团之父和我们这个时代欧洲最优秀士兵的学校"。

徽章、制服和装备

其他国家很快就追随了哈布斯堡的榜样，建立了自己的半固定化军团，以它们的团队识别徽章为荣。到16世纪晚期时，大多数军队指挥官在衡量战果时，已经不看杀戮的人数，而是看缴获的旗帜数量了。但此时尚没有努力规定服装。一些人认为军装就像仆人的号衣，可能会职消一个战士应有的斗志和怒火"。另一些人则引用了阿尔瓦的第三任公爵唐·费尔南多·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的话，这位可能是16世纪最著名的将军说："在积极作战时，指挥官应让他的整支军队都穿上鲜亮的蓝色。"这些人认为有1万名穿着颜色对比强烈的军服盛装的士兵，看上去要比2万名都是黑军装的士兵更危险，因为后者"就像是市民或店主"。

但是在阿尔瓦时代，因为不可能大批量生产的缘故，没有一支军队有能力为2万人配置一个颜色一个样式的军装。此外，即使士兵们开战时穿的是同色同样的军装，也几乎没有人在结束战斗时还穿着它们。驻扎在德国的苏格兰军团的上校，

149 150 151



俘获的敌人军旗数目往往被用来衡量一场胜利的程度，因此很快就成为珍贵的战利品。例如，尼德兰的国家将军与荷兰共和国的最高领袖曾在一个大厅里会面，大厅里装饰着几十面营旗和连旗，都是在荷兰争取独立的斗争中，由弗兰德的西班牙军队通过军事行动赢得的（公元1568～1648年）。一面旗帜（上方左面）展示的是埃库莱斯山的柱子，这是查尔斯五世皇帝的私人标志；一些旗帜说明它们是属于西班牙哈布斯堡的皇家武装；大多数都带有勃艮第公爵的"圣安德鲁十字"（哈布斯堡家族正是从他那里继承了尼德兰）

罗伯特·门罗，曾在1629年到1633年间行军3000英里（根据他自己的统计）。而在英国国内战争时期，从1644年的4月到9月，英国查尔斯一世就率军跋涉大约1000英里；而在1642年9月接下来的三年里，他的侄子和主要指挥官、莱茵的鲁珀特亲王，改变军队驻地152次，整夜行军9次，野外露宿7次，大战11场，小战62回。

在这种情况下，外衣、长靴和短裤很快就会坏掉，正如1633年一个晚上，在尼德兰作战的一个英国士兵发现的那样：

> 除了一小团潮乎乎的亚麻外，我没有任何东西来抵御寒冷和湿地……我的靴子里也灌满了水，裹紧我的湿斗篷，我蜷缩得像个刺猬似地躺在那儿，在破晓的晨光中看上去像只淹得半死的老鼠。

穿得破破烂烂的士兵们乐于从一切可能的渠道来寻找替换的衣服——从倒下的战友身上，从平民那里（买或抢），甚至从敌人那里。1651年时，苏格兰禁卫骑兵团被命令"都应身着同一颜色的外套"，但当敌人的一只载有替换军服的补给船在途中被击中缴获后，苏格兰士兵们兴高采烈地充分利用了这些军装。

因此，指挥官们有必要为他们这些洋相百出的军队制定特殊的标志，通常是一条有颜色的腰带、一条丝带或一种羽毛头饰。凡哈布斯堡帝国的士兵，无论是西班牙人还是奥地利人，都带有红色标记；法国军队是蓝色，瑞典人是黄色，而

荷兰共和国是橙色。当以上数支队伍汇集一处时，还需要一些额外的通用记号：在布赖滕费尔德战役中（公元1631年），萨克森和瑞典联军从他们赴战途中路过的森林里拽下一束带叶的枝条或者一束蕨类植物，插在帽子上作为标记；而在马斯顿莫尔，国会和苏格兰联军也收到命令，要求他们穿戴一些白色衣服来区别自己人。但是形势很快就有了改变。1645年，保皇军总司令下令用奥地利衣服来装备他的600名部下，还附上了确切的面料样品，指定了复制的颜色。他还为当地大批量生产的供应商们送去了牛角制火药筒和子弹带的样品。一旦有了常设军团，形成了固定的需求，军装就最终成为可能。

152

同样的过程也影响了武器的供应。虽然精确的标准对剑和弓的生产没有多大关系，但对有效使用枪炮却至关重要。罗杰·博依尔曾抱怨说，在17世纪40年代，他在爱尔兰的滑膛枪手们几乎丢掉了一场战争，因为供应的子弹尺寸大于所提供的枪支，以至于一些士兵“被迫咬去多余的铅皮，而另一些人被迫砍掉子弹的一部分，结果失去了大量时间，子弹的射程也缩短了”。就像军装供应一样，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是要求确保替补品和初始供应品都遵从一个单一的标准；而另一个原因是对补给品的需求很高。英国国内战争时，一位保皇党指挥官拉尔夫·霍普顿爵士，曾在1643年急躁地抱怨道：“真难以置信这些家伙能用他们的武器做什么；他们看上去就像他们的军火一样短命。”他很快就找到了进一步大发雷霆的理由。他的军队从法国进口了1000支滑膛枪，结果发现其中“有三四十种不同的口径———些是手枪口径，一些是马枪口径，还有一小部分是鸟枪；还有那些应被扔做一堆的旧垃圾”。很清楚，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渐渐地，在这一时期的其他战争中，一个稳定的大量需求导致了标准化武器的生产和分发。

这是1641年在法国北部的利斯河畔艾尔之围中，一群来自弗兰德的西班牙军队的衣裳脏湿的士兵。此图为安特卫普（比利时）艺术家彼得·斯奈亚尔斯所画，他尤擅于“现实主义”的战争绘画。虽然远景处的围城工事和帐篷都整洁有序，这支装备精良的队伍却不如此。在战事接近尾声时，这些穿着佩带通用标记的湿衣服的人，是衰败的前兆。

从方阵到横队

无论枪炮标准或不标准，如果没有步兵作战时队形部署的巨大变化，它们就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16世纪的战争图稿和保存下来的花名册，都清楚地显示出一种变化。最初，步兵的密集编队主要由以“方阵”作战的长矛手构成（与希腊方阵不同），同时由几行神枪手布置在方阵边缘，直到遇到“长矛的冲击”；但这种队形让位给了线形编队，主要由滑膛枪手组成，由几行长矛手掩护。这个变化听起来很简单，但却改变了步兵战士的生活。

例如，在1495年7月进行的福尔诺沃战役中，大约一万名士兵（加上大约6000名随营人员），在法王查尔斯八世的亲自率领下，在至少2倍于己的意大利军队中强行夺路，拉长队形，纵列行进，意图跨过塔罗河。双方一半以上的队伍是由马上骑士构成的。战斗从早晨8点以炮击开始，后因雨水淋湿火药而被迫终止，两个小时后战斗继续进行，意军骑兵在两个地方发起冲锋，但均告失败，因为雨水将塔罗河变成了汹涌的急流，周围地区也都变成了滑溜的泥淖，不适于骑兵作战。意大利战马滑倒时，法国士兵就秩序井然地冲上去，格杀毋论，杀死每个在路上的敌人。摔下来的骑士苦于铠甲的束缚，只能形同拘禁地躺在那里，无

153

在奥地利格拉茨的地方军械库里，几乎有4000个头盔、同样数量的滑膛枪、配有火药瓶和其他附件，以及手枪、宝剑、护胸甲及其他的军队装备品；它们仍保存完好，可在遭遇突袭时装备军队。17世纪的战争刺激了对军需品的需求，使得集中的大批量生产更有效益和效率

能为力地看着胜利者在战场上四处活动，用斧头劈开他们的头颅或割断他们的喉咙。后来前往战场的人注意到大多数尸体在脸上或喉部都有一处刺伤。是役，大约有3000名意大利士兵和200名法军阵亡；查尔斯八世率其部队安全撤回法兰西。

除了卷入更多的人数和扩大了步兵的作用外，16世纪早期的大多数战争都类似于福尔诺沃战役。在马里尼亚纳（公元1515年）、米尔贝格（公元1546年）和圣·康坦（公元1557年），较快地决出了战果，火药起的作用不大；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有意选择了对手。即使在比科卡区（公元1522年）和帕维亚（公元1525年），步兵的火力虽然击破了提供重要支援的地面和战场工事，为打败瑞士长矛编队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在16世纪的整个前50年里，战场上火药武器的使用还处于初级阶段。

接下来的那次大战，即1568年到1648年间荒废并最终分裂了尼德兰的那次战争，几乎没有任何激烈的战斗。相反，各国军队的指挥官们，从阿尔瓦公爵开始，在奥朗日亲王的领导下，对反抗者们采取了一种"蒸汽压路机战略"，企图不战而胜。用一位战场指挥官唐·桑乔·德·

武器练习。这是1607年由阿姆斯特丹的雅各布·德·盖耶雕刻出版的一卷图示，代表着军事教育中的一个全新概念——训练手册。一幅带有编号顺序的图示显示着32个持长矛的不同姿势中的一个（从"拿起"开始），25个使用火绳枪和32个使用滑膛枪的顺序步骤（到"开火"结束），以使得教官能让他们的士兵整齐划一地照此操练。基本思想（和草图）是拿骚的约翰伯爵为了荷兰军队的使用而形成并加以发展的，德·盖耶的作品很快就有了丹麦、德国、法国和英国译本。

隆多尼奥的话说：

（阿尔瓦）公爵不顾来自那些忘记了胜利是幸运之赐的人的压力，努力避免直接作战，这对好坏双方都有利。如果奥朗日是位强有力的君王，能够长久保有一支大军的话，我将乐于作战；但钱财短缺必将导致他的军队涣散，而且他也无力再重组力量，我当然反对作战。

但是时间是非常关键的，除非能只在一场战役中击败敌人，否则严峻的形势将发展下去。因此在1572年，奥朗日发动了一次对尼德兰的大规模入侵，并得到了广泛支持。但尽管通过一连串战斗，采用武力或威吓从反抗者手中重新占领了9/10的面积，到这年年底时，在参战的荷兰和西兰岛省份中，仍有24座设防的城镇掌握在反抗者手里。正如阿尔瓦抱怨的那样，他指挥着大约6万人，“一个足以征服许多王国的军队数目，但在这里却远远不够”。因为许多重新占领的城镇需要驻防，阿尔瓦的作战力量已缩减到只有1.2万人（连围攻一个城镇都不够，不要说24个城镇）；而且，在连续作战9个月却没有得饷的情况下，那些士兵的情绪正在哗变的边缘上。最糟糕的是，阿尔瓦的巨大军事机器的费用已远远超出了他的主子菲利浦二世的收入，这笔收入除了荷兰战争外，还要支持许多其他的战事（包括在地中海上，对土耳其人发动的大规模海上攻击）。毫不奇怪，在1573年7月，已连续作战15个月的西班牙步兵为了欠付的军饷（整整两年）发动叛乱，荷兰反叛也因此持续下去。

滑膛枪的兴起

针对这种形式的消耗战，阿尔瓦有许多重要的革新，其中之一就是增加军队的火力。16世纪50年代，在意大利，他为每个连队都增添了一些配有滑膛枪的士兵，这种武器很重，只能使用分叉的支撑物来发射，但射出的圆球却威力极大（根据英国军事著作作者汉弗莱·巴威克的看法），它能在200码处射穿护胸甲（而大多数武器在80码以外就几乎造不成任何伤害）。因此在小遭遇战甚至在主导低地国家战争的围攻城池的战壕战里，滑膛枪都具有巨大的优势。因此阿尔瓦又给他的每个军团增加了两连完全用火药武器武装起来的士兵，借此进一步加强他步兵的火力。1571年时，尼德兰的西班牙军团进行了一次检阅，总人数为7509人，包括450名军官、596名滑膛枪手、1505名使用更轻型的火绳枪的士兵，其余的使用长矛——一个大约2名枪手对5名长矛手的比例。但30年后，就在1601年，尼德兰的西班牙军团又进行了一次检阅，总人数6001人，包括646名军官、1237名滑膛枪手、2117名火绳枪手，其余的为长矛手——一个三条枪对一支矛的比例。

军械上的戏剧性突变伴随着战术上的同样戏剧性的改变。几位西班牙指挥官曾对战术体系进行试验，力图达到对火力的最佳使用效果，但都没有拿骚的莫里斯的革新那么出色。莫里斯是1568年曾被阿尔瓦击败的奥朗日亲王的儿子，他在16世纪90年代时就开始训练他的军队，“练习”整队、重新整队、出操和检阅，这是罗马军事论著作者们倡导的训练方式。1594年，莫里斯的表兄，拿骚的威廉·

从长矛到滑膛枪

17世纪头十年，由荷兰做先锋的军事革新并没有立即转为实用。比如白山之战（公元1620年，左边图解），交战双方为波希米亚和哈布斯堡—巴伐利亚联军，注意向双方发起冲击的是庞大的长矛军团，相对较少的滑膛枪手和很少的大炮支援，但在詹科奥金之战中（公元1645年，下图），交战双方为哈布斯堡和瑞典，两者都摆出了更细更长的横队，配备了更多的野战炮和滑膛枪手。白山战役是由骑兵和长矛兵的冲击决定的，而詹科奥金却是靠火力赢得的。这两个战役都很重要，前者迅速结束了波希米亚从"三十年战争"开始的叛乱；后者迫使哈布斯堡开始与胜利的瑞典军队进行严肃的谈判，开启了最终结束战争之路。

路易在阅读埃利亚的《战术》时，意识到滑膛枪手的循环编队可以重复形成连续不断的弹雨，就像罗马军团中的标枪投手和弹弓射手能达到的那样。这个措施克服了前装式滑膛枪的根本弱点——它缓慢的发射率，因为当一个步兵队形摆成一系列的横队时，第一排可以一齐开枪，然后退下重新装弹，由别的横队重复他们的动作，这就产生了连续不断的杀伤性弹雨。

排枪发射的发展对战术形成了重要影响。首先，军队现在在作战时不得不散开，既使火力的发挥达到最大程度，又使自己被敌方枪弹命中的可能性降至最小程度，这就达到了一种有效的“规模经济”，因为军队的线形排列可以在一个地点部署多得多的人数，从而杀伤敌人也更有效。

155

这也产生了很重要的后果。首先，它可能将有50列的长矛方队变成10列（或更少）的滑膛枪横队，不可避免地将更多的人推向面对面厮杀的恐惧中，在每个战士身上都要求有杰出的勇气、技巧和纪律。第二，它将重点放在了整个战术单位的能力上，要求它们在完成排枪的必要动作时既迅速快捷又整齐划一。

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是练习。军队不得不训练开火、反向行进、装弹和统一行动。拿骚的伯爵们因此把他们的军队分成小得多的队形，连队从250人、11名军官缩至120人、12名军官；2000人的营更多地让位给580人的大队，伯爵们还得教会他们如何操练。莫里斯的另一位表兄、拿骚的约翰伯爵发展了一种极其重要的军训新工具——操练手册，而且在1616年开办了欧洲第一所真正的军事院校，校址是他在西德的都城锡根，目的是教育年轻的绅士们懂得战争的艺术。训练要花6个月，包括武器、铠甲、地图、救援示范和其他学校所能提供的教育性目标。第一位校长，约翰·雅各布·冯·沃尔豪泽出版了几部战争手稿，都基于荷兰式操练（在锡根惟一教授的体系）。

现代早期的大多数军事行动涉及的军队相对较少，而且多涉及到平民。安特卫普的塞巴斯蒂安·弗兰克斯在1616年的绘画中，描绘了一幅想象的但却极为真实的场景。一群士兵正在袭击一列货车，准备抢劫。男人们被枪杀、女人们被剥去衣服、货物被洗劫。注意大多数士兵都佩有一种红色的特殊标记（像一根羽毛或一条腰带），暗示他们是为哈布斯堡帝国服务的

拿骚式“操练”很快就流传到欧洲，尤其是信仰新教的欧洲国家，其原因有

三：一是因为有数不清的外国人前往荷兰服役；二是不同的军事论著的作者们都纷纷描述（有时图示）它们；三是因为荷兰对友好国家提供军事指导员（约翰伯爵就曾亲自对瑞典进行短暂访问）。他们的名声甚至传到了“新大陆”，弗吉尼亚的总督乔治·亚德利和一位曾在荷兰军中服役的前志愿军，开过莫里斯伯爵徽章的玩笑。

拿骚家族军事改革的全部价值在尼德兰地区并没得到充分认识，因为荷兰军队几乎从不使自己面对战斗的严峻考验。众所周知，莫里斯和他的表兄们对战术显示出极大兴趣，威廉·路易伯爵写过一篇论文，探讨发生于公元前216年的坎尼战役，线形战斗次序也是部分地模仿了汉尼拔的迂回包抄策略而设计的，但是他们在两次阵地战中的暧昧战果（1597年在蒂伦豪特和1600年在尼乌波特），却暗示出他们并没完全掌握确保总体胜利的程式。即使是“三十年战争”（公元1618～1648年）中的早期战役也和上个世纪的战斗极其相似，庞大的步兵和骑兵军团被部署成一个棋盘模式。但到了1631年，瑞典的古斯塔夫·阿道弗斯皇帝证明了排枪和线形编队的全部潜力。首先，由于不断的操练，他提高了滑膛枪手再装弹的速度，以至于只要6列横队就可保持持续不断的弹幕（而不是荷兰军队所要求的10列）。

皇帝本人对这种方式感觉极为强烈，甚至为新入伍的士兵们亲自示范如何采用站姿、跪姿乃至卧姿来使用滑膛枪发射。其次，瑞典军队的火力通过添加野战炮而得到大大的加强。蒂伦豪特的荷兰军队只部署了4门野战炮，尼乌波特也只有8门，而古斯塔夫·阿道弗斯在1630年入侵德国时，随军带了80门。他所有的大炮都属于仅有的三个口径之一（24，12和3磅），为了加强装膛速度，有些大炮来时就配备了已装好的弹筒。因此，发射三磅炮弹的大炮在一小时内能开火20回，不比一名滑膛枪手慢多少。最后，古斯塔夫还训练他的骑兵抽出宝剑进行彻底的冲锋，而不是用手枪或卡宾枪打打小遭遇战（就像大多数德国骑兵乐于做的那样）。

156

布赖滕费尔德战役

布赖滕费尔德战役，于1631年9月17日就在莱比锡郊外展开，令人信服地显示了新式军事体系的优越性。一支为神圣罗马帝国服务的雇佣军，大约有1万名骑兵、2.14万名步兵，由一位经验丰富的常胜将军（蒂利伯爵）率领，布成30列长、50列宽的方队，由27门野战炮做支援。而瑞典人和他们的清教徒联军，却有51门重炮，每个瑞典营都有一个由4门轻炮组成的炮组。他们的2.8万名步兵由1.3万名骑兵做掩护，站成了6列。战斗中，第一个小时过后，与古斯塔夫交战的德国军队就崩溃了，但瑞典人却以完美的行进秩序占领了他们的阵地。在第二个小时的战斗中，大约8000名帝国士兵阵亡（他们大多数是被瑞典的炮火杀死的），9000多名成为俘虏或开了小差，更多的人则卷入了随之而来的匆促撤退。总之，2/3的帝国军队，120个营连和所有的大炮都失去了。蒂利这位常胜的将军，也失去了镇静，在司令部里郁郁不乐，“大惑不解，看上去沮丧之极，在军事会议上十分优柔寡断，不知如何去拯救自己，也决定不了任何事，只能一个接一个地放弃

157

计划，看到的只有巨大的困难和危险”。根本没有敌军阻挡他们，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几乎所有的德国军队都倒向了古斯塔夫和他的联军，这样在1632年时，这位瑞典皇帝已经统辖着6支独立的军队，总人数为18.3万人。

此战与福尔诺沃战役的对比是很清楚的。在布赖滕费尔德，虽然交战双方的军队规模不同，持续的时间要长得多（大约7小时），战果也是由步兵、纪律和火力决定的，但瑞典的滑膛枪手扮演了决定性角色，有时甚至射出了致命的“双倍齐发”。他们密密麻麻地只列成三排，第一排跪着，第二排蹲着，第三排站着，以便于“在一瞬间将尽可能多的铅弹倾泻进敌人的胸膛——因此也给他们造成更大的伤害——因为一记持续漫长的雷霆要比十回断断续续的散雷使人更加恐惧害怕。”结果，多不胜数的人死在了布赖滕费尔德，部分原因是炮火比剑伤和矛伤更富有杀伤力，炮弹能更轻易地粉碎一块骨头或撕裂一个内脏器官，造成致命的伤口（也因为当时医学知识的有限）。

158

布赖滕费尔德战役对战略战术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其他军队立刻仿效瑞典体系。第二年，在吕岑，由沃伦斯坦率领的哈布斯堡军队已经拥有了有效的火力，表现出占领阵地的机动灵活性。古斯塔夫本人死于一次激烈却并非决定性的冲锋中。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西欧的所有主要军队都采用细长的线形编队来作战，滑膛枪手占据了主导地位。

大战斗和小战争

但这些战役中很少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就像引起广泛研究的坎尼战役一样，它们大多数只能带来一场战役的胜利，却不能赢得整个战争。1634年，哈布斯堡军队在纳德林根大胜瑞典主力部队，再加上吕岑战役的胜利，就抵消了瑞典在布赖滕费尔德的成果。而在1645年的詹克奥和阿勒海姆之战中，瑞典军队虽然摧毁了哈布斯堡皇帝和他的天主教联军的武装力量，但却遭受了随后三年无休无止的敌对行动，直至和平到来和“三十年战争”结束。这个问题部分是军事上的，部分是政治上的。一方面，在战场上，或出于驻防战略防御要地的需要，年复一年地保有大量的军队，对每个国家都是不能容忍的重负。仅运送大炮就给后勤出了个大难题。16世纪50年代时，国王查尔斯五世的军事顾问计算了一下，只运送一门大型攻城炮就需要39匹马，如果再加上一星期的弹药供应，还要增加156匹马；一个世纪后，他们的继承者又统计了一下，如果想运送一行10门攻城炮、10门迫击炮的话，需要1849对公牛和753辆大车。喂养这些公牛和其他拉车的动物，再加上骑兵的坐骑（和替换坐骑），又是一个叫人头疼的问题，因为2万匹马每天就需要90吨饲料（400亩草场的草量）。

159

实际上军队本身甚至更令人头疼，正如卡迪纳尔·黎塞留说的：“一个人可以从史书上发现，由于缺少粮草和纪律而失败的军队，要比被敌人击败的军队多得多。”一支3万人的军队，如果被正常供应食物的话，每天需要4.5万lbs（20吨）面包，即需要10万lbs的面粉加上炉子来烘烤它们，还需要3万lbs肉（相当于1500只羊或150头牛）。此外，虽然家畜可以活着运送，直到需要时才屠宰，但一个星期的面粉供应和炉子却需要450辆大车和相应数目的拉车牲畜。然后是随营

人员问题，他们的数目有时等于个别时候甚至超过了作战总人数。1622年，西班牙军队围攻尼德兰的贝亨奥普佐姆时，被围城镇中的一位卡尔文派牧师说道：“从没见过这样小的一个躯体却拖着这么长的一条尾巴……这么小的军队却带着这么多大车、行李马、驽马、随军小贩、仆人、妇女、孩子和一批乌合之众，他们的数目远远超过了军队本身。”

因此毫不奇怪，战场上的军队需保持相对较小的规模。举一个简单的例子，1632年11月，当古斯塔夫·阿道弗斯指挥着18.3万名士兵行动时，6.2万名士兵散布在德国北部的98个驻防地里；3.4万名士兵保卫着瑞典、芬兰和波罗的海省份；6.6万多名士兵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以半自治的地方性军队在活动，因此当皇帝战死在吕岑时，他手下只有2万人。

1632年的“战争”和现代欧洲早期的其他敌对年头一样，意味着小冲突小意外，而不是全面的围攻和战斗，后者的战果很快就被前者日见衰弱的耗费抵消，只是延长了战争的时间而已。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国内战争中，1642年到1648年间

暴行种种

如果军队在战争中的职责就是杀人毁物，那么在所有冲突中有一些残忍可能是无法避免的。此外，在几乎所有社会里，有许多暴行是发生在特定环境下的，导致的结果也基本相似，尤其当一支敌军突然崩溃，将自己变成了怯懦之众而另一支则变成杀人不眨眼的暴徒时更是如此。

这最常发生于敌人在战斗中被彻底击垮之后，因为在势均力敌的战斗中，混战的士兵是很难做出致命打击的，但当胜利者能践踏分散的逃亡者时，形势就不同了。一座城镇被攻占后，大屠杀经常发生，围城也是被当成“全体战争”来对待的，因为在围攻者眼中，导致士兵伤亡的士兵和接受过防守自己家园而武装起来的平民并没有什么不同。在炮击、进攻和通常跟随一次成功的冲击后的洗劫中，军队和市民、军务和民众是很难区分的。此外，通过破坏来进行精神发泄，保持士兵身心无损，也使许多胜利者不急于终止暴行。

但有些战斗看上去比其他战斗更具残忍性。针对反叛者，或者针对拥有不同宗教信仰者的战争，通常会残暴得多。一本1638年出版、题目是《德国的哀悼》的英国手册，就“三十年战争”造成的凄凉景象，提供了一份冗长而令人痛苦的报告，按照“拷打”、“强奸”、“屠杀”这样的标题分成不同的章节——全都配有令人毛骨悚然的插图（右图），以强调人类在战争时的非人道行径。

选自1638年出版的《德国人的哀悼》

共发生了600多次战斗，整个战争大约8万的伤亡人数中，只有9次的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其余都来自较小的冲突战，几乎一半的战斗死亡人数不超过250人。此外，许多士兵是因为疾病或事故而死去或离开军队的。一位保皇党军官很抑郁地说："我们埋掉的脚趾和手指比人多。"

而政治在导致无穷的战争方面也同样重要。首先，构成早期现代战争原因的许多问题都没有任何简单的解决途径。16世纪时，战争是为了王朝权利（法国的查尔斯八世于1494年入侵意大利，就是为了维护他对那不勒斯王国的权利），但到了17世纪，他们更关注于控制邻近的土地。统治者们看上去不断地在寻找一种更实际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战争只是为了获得代表真正的战略价值和经济意义的土地和权利，他们甚至用武力去占领他们根本没有任何权利要求的土地（瑞典对埃莫拉尼亚地区和梅克伦堡根本没有任何资格来要求，但他们要求将其作为和谈的一部分，只是坚持说占领这两块领地对瑞典的国家安全非常重要，他们不断地发动战争，直到其他每个人都对此表示同意）。

160

但是在1530年到1650年间，除了王朝意图外，各方还为了一个更为重要的意识形态理由而作战，那就是宗教，因为天主教与新教是互不相容的。罗伯特·门罗，一位在"三十年战争"中先参加了丹麦军队后又入瑞典队伍的苏格兰人，曾给出他参战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保卫新教信仰和他国王的姐姐伊丽莎白·斯图亚特的权利和光荣——她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剥夺了土地和头衔（门罗撰写了英国第一部军团史：《门罗，他和英勇的苏格兰"麦凯斯"军团一起进行的远征》，伦敦，1637年）。"新教事业"推动了许多战事，它使英国在1585年后决定帮助荷兰共和国，同样也使丹麦和瑞典在"三十年战争"中大动干戈。对西班牙和意大利统治者而言，它对天主教的信仰已构成同样有力的威胁。1591年，菲利浦二世的一位大臣对他的主子极为恼怒，因为菲利浦对各地保卫"天主教事业"的支持，已使他的国家同时在与法国、英国和荷兰作战，因此，他责备国王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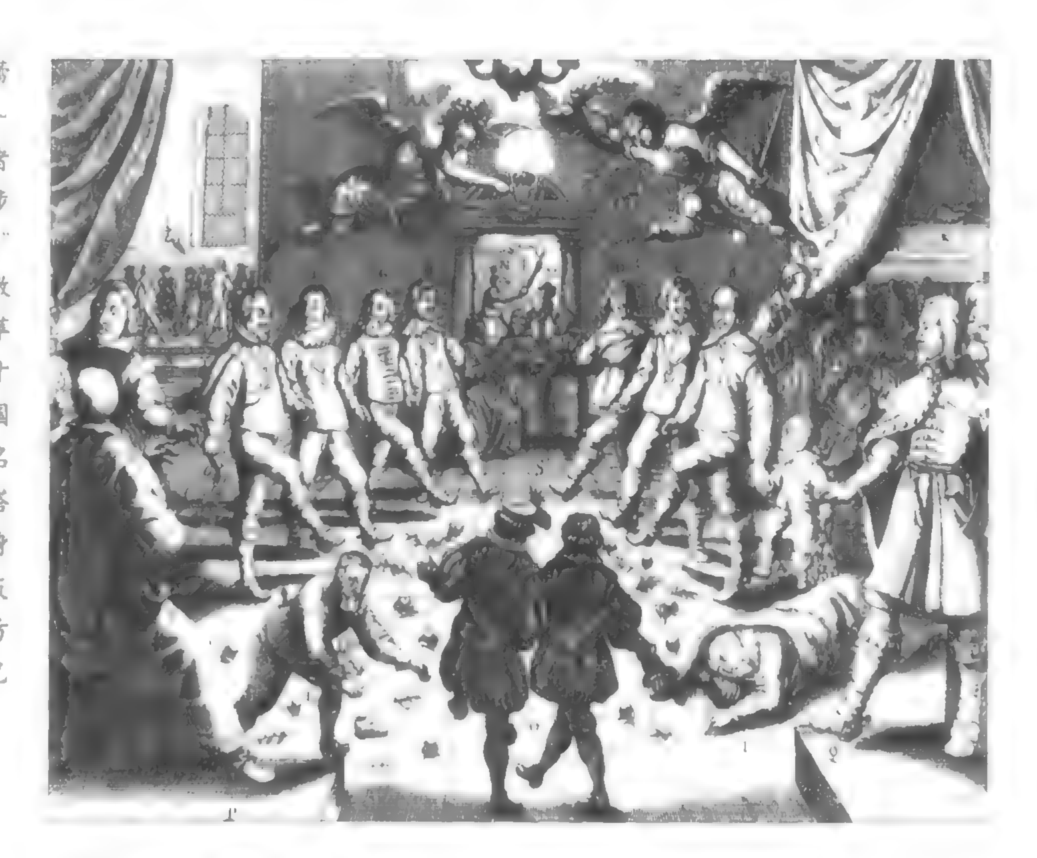
> 如果上帝有意让陛下去治愈所有来到您面前的愚人，他本应该给您这样做的能力；如果希望由您来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麻烦，他就应该给您这样做的金钱和力量。

但是国王并没听取他的意见，西班牙和法兰西的战争持续到1598年，与英国打到1604年，和丹麦一直作战到1609年（1621年再度开战）。

宗教和战争法则

早期战争所隐含的宗教意义看上去不仅延长了作战时间，而且也增加了其残忍性。人们公认这也是个由围攻占据战争主导地位的时代，而战争在任何时代都是残暴野蛮的，许多士兵对敌人尤其显露出不同寻常的残忍，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在惩罚上帝的敌人。因此1631年，由蒂利伯爵率领的天主教军队在遭受布赖滕费尔德报应前不久，曾抢劫了新教城市马格德堡并屠城三日，被当时的新教徒们称做"永难忘记的灾难，将其比做"特洛伊的陷落或诺亚洪水"，而天主教徒们却视

161



“伟大的欧洲战争芭蕾图”，一幅绘于公元1647～1648年的讽刺画，展示统治者们集合在和平会议上，试图步调一致，以结束“三十年战争”的情景。天使们在他们面前散发着橄榄枝和引发争端的苹果。右面，还是孩童的路易十四与奥朗日亲王（荷兰共和国的领袖）、葡萄牙国王和一名瑞典将军手拉着手（古斯塔夫·阿道费斯卧睡在他们身边），与左边的皇帝及其盟友们几乎步法一致。而处于前方的中立国瑞士，正在寻找自己的利益。

其为《旧约》所命令的对不信主者的惩戒。

这一时期教会人士并没有提倡对此应有所节制。例如，1645年在英国“国会军”冲入一位天主教贵族的据点贝辛宫前，曾进行了一次布道，咒骂那些“上帝的公开敌人”、“血腥的罗马天主教徒”和“坏蛋”，号召灭绝他们。这里，就像其他场合一样，随军的神职人员的职责几乎与政治委员一样，在军中鼓吹意识形态上的狂热，压制任何怜悯之心。因此毫不奇怪，被打败的贝辛宫保卫者们几乎没人能活命。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宗教战争的时代，同样盲目的不妥协态度也影响着战略决定。1571年，因为主要谋划者被捕，西班牙的菲利浦二世入侵英国以支援一次天主教徒起义的计划败露了，但他仍然坚持如此：

我是如此渴望完成这桩事业，我对它是如此萦绕于心，我是如此相信上帝将视其为自己的荣光，以至于我是不会被说服改弦易辙的，我不接受也不相信任何反对意见。

两个月后，国王才同意取消此计划。同样在1586年，当菲利浦二世决定让西班牙干涉法国内政以支持天主教派时，他写道：

真的，我之所以同意这样做，只是因为它看起来是解决那个王国宗教状况的惟一可行之路。我们这么做时可能会遇到其他的困难，但是宗教事业重于一切。

这一时期相同的言论很多：大多数统治者都将他们自己的利益和统治的土地，等同于上帝的利益和土地（正如菲利浦二世一次曾向一名沮丧的下属解释的那样：

“你在为上帝和我的事业而作战，两者是一回事。”）；大多数国家将自己看做是新“选民”，认为上帝会给予他们直接的保护，来抵抗和击败那些不能分享他们的意识形态的国家。

宗教改革所释放的忏悔狂热不仅加剧了战争的发生，也加强了外交往来，相同宗教的国家间互换使节，互访首都，签署协助防御条约。在相对和平的时期，像1618年的前十年（而不是1914年前的那些日子），他们竭力创造国际间的结盟，以便在受到攻击时提供支援；在战时，各国政府为了抵消军事失败的后果，往往列出能对抗他们取得暂时胜利的敌人的进一步盟国。就像一位资深大使在1619年观察的那样，“三十年战争”走的正是这条路：“今天人类的战争不再只局限于自然力量的较量，就像斗牛一样，甚至也不只是战斗，他们更多地依赖于失去还是获得朋友和联盟。”但是根据什么标准来选择这些“朋友和联盟”呢？从16世纪30年代到17世纪40年代，欧洲分化成不同的宗教阵营，但这种两极分化是极不稳定的，因为教派利益和政治利益是几乎不能一致的，于是就形成了似乎永无休止的难以控制的循环冲突。

到17世纪中期时，许多观察家们害怕战争已将欧洲带到了自我毁灭的边缘。德国牧师保罗·格哈特在一首赞美诗中写道：“哦，快啊！醒来吧，从这严酷的世界中醒来吧，在恐惧猝不及防地突降以前，睁开你的双眼吧！”一本来自1647年士瓦本一个农民家庭的《圣经》上绝望地写着：“我们活得就像畜生一样，只能吃树皮和野草。没人能想到这种事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许多人说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上帝。”稍后在英国，在国内战争结束后几个月，约翰·洛克遗憾地写道：“所有那些在欧洲造成如此混乱和毁灭的火焰并没有平熄，只有成百上千万人的鲜血才能熄灭它们。”

像这些作家、艺术家和普通人一样，政治上的领导人们也开始对前一时期的过分征战感到嫌恶，强烈希望它再也不会发生。这就像在一战留下的后果中，屠杀是如此的残酷，混乱的忧惧是如此可怕，以至于“再也不要战争”的态度成了主要呼声。有些人从这些情绪中觉察出了专制国家发展的高潮，因为全西欧的政治家们都认识到应更好地控制军队，而且这种控制应由国家来掌握。他们还意识到向一位受到一定约束的君主交纳重税，要好于向一支无所顾忌的雇佣军提供无休止的钱财。

163

西方的政治家们也开始倾向于“非宗教派别化”的政府，试图减少失控的冲突所带来的危险。当然，宗教还在继续影响战争和政治，例如，它帮助威廉三世在1688年推翻了信仰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而对于路易十四反新教政府的共同恐惧，也对他在1685年后联合他的北部敌人这件事上起了一部分作用。但在17世纪40年代以后，宗教就像王朝利益一样，在国际关系中不再占据主导地位了。因此，在对抗路易十四的战争中，加尔文教徒威廉国王最忠诚的盟友却是信仰天主教的萨伏依大公欧仁，他是为同是天主教徒的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服务的。而在“伟大的北方战争”中（公元1700～1721年），路德教派的瑞典人却最终败于由路德教派的丹麦、加尔文教派的勃兰登堡、天主教的波兰和东正教的俄国共同组成的联盟下。17世纪晚期时，虽然战争方式仍基本未变，但它们却已在为全然不同的理由而战，国家对其控制也比过去要大得多。

第十章　冲突中的国家

164

1659年击败西班牙后，法国成为欧洲大陆上最强有力的国家，并且改变了战争的面貌。波旁王朝扩充了作战力量，改进了军队管理，创建了一支强有力的常规军，由此开始了欧洲的一种新格局。普鲁士和俄国都引进了这种机制，并发现它不仅需要军事上的改革，也需要行政上的改革。通过战争，这两个新列强终于能跻身于欧洲列强之林。英国则称雄海上，与西班牙、荷兰和法国一起扩张着殖民地。最后，在"七年战争"中，西方列强们同时在欧洲、美洲和印度争霸，将战争扩张到全球范围。1661～1763年的世界，为强权政治家们实现自己的野心提供了一个历史舞台。他们更新军队的装备，为了荣誉发动了一连串的战争。

皮陶这幅32岁时的路易十四肖像，展现出这位傲慢而专横的年轻君王的形象。当时他正准备于1672年进攻荷兰，以此扩大他的荣誉。他还没尝过失败的滋味，还没看到他的国家被战争搞得精疲力竭，没看到自己的野心如何受挫于他的敌人组成的联盟

穷兵黩武的显赫帝王

这个时期早期的法国，比其他国家更能为西方军队提供范例。在路易十四（公元1643～1715年）的统治下，法国军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而他即位时还是个孩子，直到1661年才真正掌握大权。1635～1659年，在同西班牙的长期战争中，法军真正人数最多时是大约12.5万人，比前朝的军队规模翻了一番，但这种增长并未就此止住。自从1500年以来，法军在和平时期的人数保持在1～2万人之间，17世纪80年代时是1.5万人，而17世纪90年代的战时军队规模，书面上是4万人，实际上是33.5万人。这种人数上的增长可能构成了17世纪陆上战争最重要的变化。

在结束于1659年的那场战争中，增加的军队人数给军队管理和国家财政造成了难以承受的重负，无粮无饷的军队全都经常抢劫周围的法国平民。这种情况迫切需要解决。虽然才华横溢的法国作战部长米歇尔·列·泰利耶起草了改革军队管理的条例，但却不能将此计划付诸实施，直到和平重新到来。因此，实际的改革工作更多地落在了他能干而又残忍的儿子，那个马奎斯·德·卢瓦的身上。他先和父亲一起工作，然后自己也当上了作战部长，直至1691年去世。在路易十四时期，作战部加强了对供应、作战和人员的控制。这项任务的中心就是军队管理人。国家文职官员被派到军队中去，以帮助军队解决在战场上遇到的世俗性管理问题。由于他们的努力，供应过程虽然在紧急时期仍不规律，但已达到了比以前有效得多的水平，这就既保证了良好的纪律，也保证了战场上大军的稳定。

165

为了完成这个改革，路易和卢瓦先制服了军官队伍。在此之前，军官们享有令人吃惊的独立性，但卢瓦依靠国王做后盾，限制了他们的意见和行动。他坚持要军官们去到军中，而不是在宫廷里闲逛，他还极大

地控制了军官们的滥用钱财现象。此外，1675年时，军衔表严格规定将由资历来决定军衔，而不是靠出身或社会地位。

作为一个整体，法军机构中最大的失败并不是严格的军事化，而是路易十四从没反省过由君主支付战争开支的这种方式，所以由英国和荷兰调度的那种低成本的长期信贷让他入不敷出。路易在1661～1683年间的财政部长让—巴蒂斯特·柯尔培尔，曾试图在一个更合理的基础上来建立法国的财政政策，但路易的穷兵黩武却使他劳而无功。1671年11月，柯尔培尔完全反对国王准备出兵突然入侵荷兰共和国的计划，并做了最后的努力来说服他的主子：在一次会面中，柯尔培尔声称他不知如何去支付这场预期的战争的开支。“那就多想想，”他的国王冷冷地回答：“如果你办不到，总会有办得到的人。”柯尔培尔恼怒了一星期（此间他庞大的通讯系统都完全停止了），然后被迫“投降”，以未来的岁入作为抵押，在昂贵的短期信贷基础上建立起一个财务政策。

除了税收和信贷外，路易还尽可能地依靠其他的金融手段。通过两种值得注意的方式，战争可以部分地支付它自己。首先，占领了外国领土的军队可以要求当地人民上交“贡物”——金钱与友爱的支付物。有时，法国将这种“上贡”运作得如此合理，以至于它们看上去更像是固定的税款，而不是抢掠，但做到这一点主要还是以暴力来胁迫。就像路易十四自己在1691年曾想到的那样：“为了让人们上贡而被迫去烧毁村庄是很可怕的，但如果威胁或劝诱都不能让他们纳贡，那么使用这些过激手段就是必须的。”

166

其次，路易也让那些急于有权指挥军团或他们自己连队的法国贵族们付钱。

法国士兵的面包

这些文章摘自《法军供应合同》（巴黎，公元1697年），持有人为弗朗索瓦·诺德特（一位为路易十四军队供应食物的合同商人）。它们说明了法军后勤在17世纪90年代达到的规律性和合理性。他在这里还讨论了如何采用特制的弹药车，或者沉箱，装在马车上，组成辎重队，或使用连级的运输单位来运送面包的问题。

在法国，战时与在和平时一样治理得井然有序……今天，她有一项优于敌人的长处，那就是她军队的必需品供应得极好；其他国家……不会使用法国人常用的弹药车，他们也没有排放整齐，贮满了军队各项军需品的仓库……

作战部长为即将作战的军队制定相应的辎重数目，通常是一次给出军队日需量的四倍。因为粮食通常是每隔四天一次补给军队的……那就是说（面包最多）要在士兵的干粮库里放四天，要在弹药车里装四天。

每批辎重有100匹马，每四匹马拉一辆弹药车，由专门驾驭联畜运输车的人驱赶，因此每批辎重有25辆车……弹药车是大圆桶形的，盖子在中心突出一些……使雨水能流下去……它长8英尺4英寸，从底到盖顶高3英尺4英寸，底部为2英尺5英寸宽，向顶渐宽至2英尺9英寸……顶部用蜡衣封盖……弹药车至少要涂上2层红油。

一支6万人的军队可能要配备4万匹马，每匹马每日要吃掉大约50磅的青饲料。这么庞大的粮秣必须在当地发现和获得，供应军马饲料这项无休止的任务占据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骑兵们挥舞镰刀的时间要比用剑的时间还多。在N·盖拉尔这幅作于1696年的版画中，士兵们正把大约200磅重的草料铡断、打包和装车。草料队通常有几千人，由一位中将指挥

对那些追求名誉、地位的人来说，购买上校、上尉这样的职位是必需的，但这个买价只是一连串开销的起始。上校经常要支付创建自己军营的费用。此外，如果粮食、装备或军饷未到，或者如果分给新兵补助金的数量不足，指挥官们有可能得从自己的腰包中掏出钱来弥补这个亏空。

战斗和围攻

路易十四的军队并没经历任何战术上的大革新，只是对以前传统的延续。1660～1715年间，步兵队形继续以一种稳定的进程而变得越来越细、越来越长，从这个时期开始，6列纵深队形减少到4列甚至3列。1660年时，长矛手构成了步兵编队的1/3，而到了1700年，就最多只占1/5了。用火绳来引发枪击的滑膛枪手在1660年还占主导地位，但却渐渐在法军队伍中消失，直至1699年，他们被快枪手即更昂贵的用燧石来引发枪击的枪手完全代替。法国人还在1703年放弃了长矛，因为插在燧发枪端的刺刀使得滑膛枪手足以既能将它当火药武器使用，也可以用做一种有效的短矛。燧发枪和刺刀的使用并不是什么战术上的剧烈变化，只是在漫长发展过程中前进的一步而已。骑兵和炮兵也享受到了现代进步。骑兵团增加了精选的卡宾枪连（配有内制来复线的卡宾枪的士兵），路易还增加了龙骑兵团的人数（有坐骑的士兵，马上步下均可作战）。法国炮兵标准化了大炮，增加了在围攻战中使用的迫击炮的数目。野战军的战斗阵形仍和1660年时差不多，整支军队排成二行或三行，步兵在中央，骑兵在两翼，炮兵散列在前。

战场上的作战越来越依赖于后方的供应，即使在战季中用来喂马的新鲜的青饲料，也不得不在军队占领的地方就近获得，因为如果长途拖运的话就太沉了。但是分给战斗中每人每日1.5磅的面包定量却能够用车运送。面包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军需，决不能出现差错，因为在17世纪，军队若缺粮无饷，就会开小差、抢劫或哗变。既然防止这类事的惟一保障是固定的供应，因此军队是由它们的粮秣员们维系的，将军们难以想象而且真的害怕供应不及时会出现的后果。

对固定供应的依赖性增加了要塞的重要性。这些要塞被用做仓库，保卫着交

167

168

路易十四和他的军队一起度过了大量时光、直到年龄的增长限制了他的活动为止虽然他从未公开指挥过一场战斗，但他参加了许多大围攻。围攻战适应了当时战略和战术上的变化、也符合路易追求细节和控制的口味。让—巴蒂斯特·马丹这幅画，描绘了1692年那慕尔之围中身披红斗篷的国王。这次围攻由沃邦指挥，但到了1695年联军又夺回了此要塞

通线，也使物资丰富的地区免受敌人的强行征敛。路易十四最杰出的军事工程师塞巴斯蒂安·列·普雷斯彻·德·沃邦，不仅改进了要塞设计，也提高了进攻它的技术。至今仍可以看到他的军事建筑作品的立体图景。其模型曾在凡尔赛宫的镜厅一度展出，目前仍存放在巴黎的军事博物馆里。他不仅设计单个堡垒，还将它们部署成“前方形”，一种双行堡垒群，来保卫法国薄弱的东北边境，因此在17世纪后50年中，在法国境内或国境周围发生的战争都是围攻而不是战斗。正如德国军事作家约翰·贝尔在1677年写的那样：“相比之下，野战几乎再也不是讨论的话题了……实际上……整个战争艺术看上去已落在了狡黠的袭击和精明的工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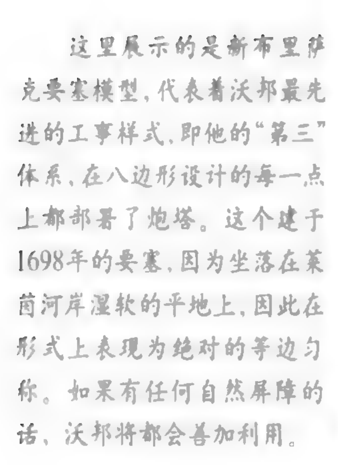
路易的第一次战争是以光荣的名义试图获得军事胜利和领土征服。1661年他

由宫廷画师亚森特·里戈绘制的塞巴斯蒂昂·列·普雷斯彻·德·沃邦肖像，显示出这位伟大工程师的性格。这是一张坚强而又出奇敏感的脸，他震惊于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提出了占领要塞的系统性方法，以便“多放炮少流血”。沃邦还很勇敢，在1667年的里尔之围中，他被一颗子弹射中了左颊，留下了终身的伤痕。他是如此乐于冒险，以至于路易十四最后禁止他进入围城的战壕中

掌权后不久，就以他的西班牙妻子的继承权为借口，提出了一些站不住脚的权利要求，命令他的军队于1667年入侵西属尼德兰地区。他认为荷兰人和英国人会允许他攻击他们的宿敌，但他们却和瑞典人联合起来，强迫路易十四于1668年结束了这场“权力转移战争”。路易十四将这看成是背叛，大骂荷兰人“忘恩负义、信仰败坏、夜郎自大”。

因此当路易将他的下一场战争指向荷兰共和国自身时就毫不奇怪了，他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对他未来征服西属尼德兰地区的反对。他秘密送钱给查尔斯二世，换得了英国的支持，然后在1672年5月袭击了孤立无援的荷兰。开始，法军在德·孔代亲王、亨利·德·拉·图尔·多韦涅和维孔特·德·蒂雷纳的指挥下，大获全胜；但在他们于6月12日跨过莱茵河后十天，孤注一掷的荷兰人断开大坝，阻止了法军。而出于对路易十四的征服野心的担忧，西班牙帝国和勃兰登堡也和荷兰联合起来，1674年时只有英国仍保持单独的和平。在这样的反对力量前，路易从荷兰领土上撤军，但在其他前线仍继续作战。但1678年结束荷兰战争的《奈梅亨条约》仍给予路易十四极多的新土地，尤其是弗朗什孔泰省，所以他毕竟赢得了些荣誉。

事实上，到1678年时，路易的政策已有了改变。1675年蒂雷纳去世，孔代退隐，这些英勇善战的将军们的离去，使路易开始听取更为谨慎的卢瓦和他的宠臣沃邦的意见。国王变得着迷于保护他的所有物，这意味着加强国境线。正像克劳塞维茨在后来观察到的那样：“对路易十四而言，保卫王国的边境免受任何威胁，几乎已变成一个荣誉问题，而实际上却毫无意义。”为了封锁他的北部边境，他在1681年攻占了斯特拉斯堡，1684年时又占领了卢森堡。但是如果路易将这种他称之为“重新统一”的土地攫取法看做是防卫的话，欧洲却将其理解为赤裸裸的侵略。



这里展示的是新布里萨克要塞模型，代表着沃邦最先进的工事样式，即他的“第三”体系，在八边形设计的每一点上都部署了炮塔。这个建于1698年的要塞，因为坐落在莱茵河岸湿软的平地上，因此在形式上表现为绝对的等边匀称。如果有任何自然屏障的话，沃邦将都会善加利用。

哈布斯堡的胜利

17世纪80年代，当路易十四加强他的莱茵河防线时，他最害怕的潜在敌手既不是西班牙人也不是荷兰人，而是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因为他们在反击土耳其的战斗中力量不断增强。在他们的东南边境，哈布斯堡已和奥斯曼土耳其打了几代的仗，但高潮却是在1678～1683年间奥斯曼帝国对西方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

土耳其人的第一个目标是乌克兰，但在1681年时曾放弃对那个地区的权利要求，不过两年后当一次起义威胁着哈布斯堡控制的匈牙利时，一支大约9万人的土耳其大军侵入了奥地利。哈布斯堡3.3万人的野战军撤退了，只在维也纳留下1.2万人的守军，土耳其人在7月中旬对该城进行了围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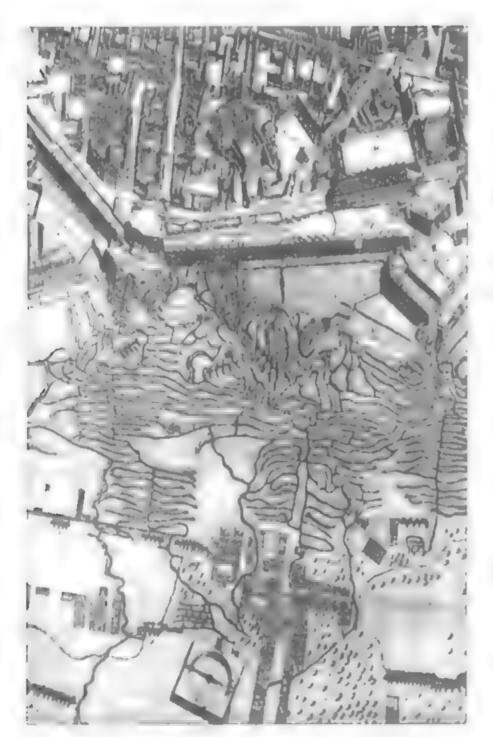
预料到会有围攻，工程师格奥尔格·林普勒已经加固了维也纳城墙和棱堡，防守者在大炮上也占有明显优势——312门火炮对112门，但形势仍不利于他们。因为土耳其人更多地利用了坑道而不是大炮，并将进攻集中在了两个棱堡上。

长期围攻消耗着守军，到9月份时只剩下4000人了，当坑道毁掉了主要棱堡后，看上去土耳其人马上就要冲进城去了。但在9月7～8日晚上，明亮的火箭照彻维也纳森林的上空，预示着援军已到。波兰国王扬·索别伊斯基率领一支2.1万人的波兰军队赶到了，这实际是一次急行军，他们从华沙以南出发，15天里走了220英里。另外几支波兰和德国军队也来了，基督徒方面的野战军现在总数达6.8万人，足以对抗土耳其人。9月12日，这支军队从维也纳森林中冲出来（"就像一群疯猪"，一位奥斯曼指挥官这样评价），摧毁了土耳其军队。奥地利军队追击撤退的奥斯曼人，将他们逐出了匈牙利，而奥地利人在莫哈奇（公元1687年）的胜利又将他们逐出了多瑙河以东。当然，在对抗奥斯曼人的战争中崛起的哈布

波兰军队聚集在克拉科的骑兵、步兵共约2.5万人，然后分两路向前挺进，显拿沃斯基指挥左翼，雅布翁诺夫斯基指挥右翼

170

171



斯堡军队也构成了西方逐渐军事称霸全球的一方面。它几乎是另一次伟大的十字军东征。路易十四害怕随着奥斯曼威胁的衰落和奥地利军队的强大，那位皇帝会将所增加的力量转而对付基督教的法国，在这点上他是正确的。哈布斯堡的胜利为他们赢得了更多的土地、人口和资源，甚至让他们摆脱了来自西班牙的一度有利于查尔斯五世的控制，并在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后，摆脱了许多旧帝国的权威，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帝国正跃跃欲试，准备重新确立它在欧洲事务中的主要参与者地位。

实际上，到17世纪晚期时，欧洲已经分裂成两大力量体系：法国、英国、西班牙和荷属尼德兰，它们位于西部；奥地利、勃兰登堡—普鲁士、瑞典和俄国，它们位于东部。总而言之，这两个体系从整体上构成了欧洲的国际关系。但是，它们有时是用外交和利益维系的，与其他国家相比，奥地利无论在东部还是西部都更能发挥影响。

彼得大帝

172 1683年9月12日的维也纳解围(上页下图)。经过两个月的围攻后，由波兰国王约翰·索别伊斯基亲自指挥的援军居高临下，冲入了土耳其人的阵营。基督教的矛骑兵从左方携有十字的三角旗下蜂拥而出；而土耳其骑兵可以从头巾上分辨出来。土耳其阵营周围缺少防护措施，从而导致了他们的失败。一幅当时的版画(上图)，详细描画了土耳其的围城战壕，它只集中在城墙的两个棱堡之间的一个狭小地带。左边是勒弗尔棱堡，右边是布格棱堡，它们中间是“布格迷宫”的遗址，一个从主城墙伸延出来的简易外围工事。

还有一个国家也受益于奥斯曼帝国的衰败，那就是俄国，它在彼得一世大帝（公元1689～1725年）的统治下进行了军事和政治改革。彼得即位前，在东方孤立已久的俄国已经在中欧的争斗中开始扮演角色，并按西方样式改革军队，但是彼得加速和加强了这两种趋势，他的成就真可以称得上是革命。经过彼得的重塑，俄国取代了瑞典，成为北部最重要的军事力量并开始了它的扩张。

传统的俄国军队包括骑兵和一批被称做“弓箭手”的步兵，前者主要由小贵族和中产阶级组成，拥有土地，以马上弓手的身份作战；后者则始创于1550年，装备有滑膛枪和戟。这两种传统的军队曾经很有威力，但已不能再和俄国的敌人们抗衡。骑兵们坐骑差劲，武器过时；而弓箭手领导不力，变得越来越沉湎于他们和平时期的生意而不是战时的责任。17世纪时，沙皇曾征募外国雇佣兵来加强军队。刚开始是整支外国军团，到了17世纪中期就变成只雇佣外国军官来训练和率领俄国人的军队，这些外籍军官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军事模式，并模仿西方军队创建了俄国的“新式军团”。对抗波兰的“十三年战争”（1654～1667年），确立了火药武器的胜利，而在此战的最后一年里，俄国建立了一个新式军团的牢固基础；但是随着和平的降临，沙皇出于经济原因解散了他的西式军事单位，彼得即位时俄国军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传统的军队。

还是个孩子时，彼得就显露了对西方军事作战风格的兴趣，并组织了两个由年轻人组成的军营，进行训练和指挥。在年轻的彼得于1689年获得他那困难重重的王位后，看上去他对这支小军队的关心要胜过他对更世俗的政府的责任心。1695年和1696年对克里米塔塔尔进行的两次军事远征更刺激了他的征服野心，促使他决定“西化”他的军队和国家。1697～1698年，他游历西欧，学习一切能学的东西，尤其关注于军事和海军问题。

彼得接下来与瑞典在“北方大战”（1700～1721年）中进行了较量。在战争的第一年里，他率一支4万人的军队包围了那瓦尔，却被查理十二世（公元1697～1718年）亲率的一支只有8000人的瑞典军队打败。这次耻辱驱使彼得彻底改造了

彼得大帝热衷于西方，甚至爱屋及乌到西方的生活方式和外表装束。这幅1717年由J·M·纳捷完成的肖像中，这位沙皇无论在姿态还是盔甲上都是一位西欧的君主（将其与本书第152页中50年前路易十四画像比较一下）。彼得从西方引进了政府和军事改革，但却以一位俄国贵族的粗暴方式将其强加给他的人民

他的军队。1705年，他建立了一个征兵系统，到1713年时已征兵33.7万人。彼得不仅增加了军队规模，而且用现代的燧发枪和插装刺刀重新装备了他的所有步兵，用西方战术来训练他们，通过持续但有节制的军事演习来强化他们。开始，他继续依靠从国外雇佣的军官，但也强迫有地有钱的俄国人参军，以提供一批有能力的本国军官。1725年的一道敕令规定，外国人不能超过全体军官人数的1/3。

173

彼得为建立海军做出了更多的贡献。在他统治初期俄国并没有海军，俄国人对出海也没有什么兴趣。但沙皇彼得创造了奇迹，他修建了船坞，建起了港口，圣彼得堡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甚至还创立了一所学校来培养海军军官。到“伟大的北方战争”结束时，他仅在波罗的海舰队里就拥有124艘俄国造战船，这还不算从瑞典人手里缴获的船只。彼得还建造了上百只适用于波罗的海和黑海的浅水战舰。他一方面聘请西方专家来设计和指挥船只，另一方面也训练俄国人，使他们最终能自己担任这些角色。与英国、荷兰共和国和法国不同，彼得在完成所有这一切时，并没有一支商业船队为他提供有技术的水手和经验丰富的船长。

由彼得开始的改革过程说明：如果没有政府和社会的相应变革，就不可能“西化”战争工具，其他国家后来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彼得改革了政府管理机构以获得军队需要的物资。他设立了人头税，这和其他财政措施一起使国家岁收翻了一番。他还强迫拥有土地的阶层接受教育，以便培养一批更有能力的军官队伍。1722年公布的“官阶表”，使社会精英的构成更为合理化。彼得甚至命令贵族们割去胡须，穿戴西式衣帽。经济也没能免于他的改革，为了供应军队武器，他大力推进产量已经很大的冶金业，同时也鼓励其他生产部门的发展，例如纺织业，以使他的军队能自给。彼得的行为是如此“革命”，以至引起强烈的反对，他死后，一些改革措施被废除了，但他仍成功地使俄国拥有了强大的军事力量，成为一个西方大国。

到1708～1709年时，他已准备好在大为改善的条件下与查理十二世再较量一番，而这位鲁莽的瑞典皇帝在1708年孤军深入乌克兰，恰给了彼得一个梦寐以求的机会。秋天，彼得打败了一支派来增援查理的瑞典军队，使后者的军队在1708～1709年之交的冬天没有得到适当的补给，人数逐渐减少。1709年春天，已经精疲力尽的瑞典人包围了波尔塔瓦。带着对自己军队的新的自信，彼得决定“在与敌人的战斗中获得胜利”，包围他们，解除围攻。一靠近瑞典人，俄国人就建起了令人目眩的成串多面堡，在阵地周围挖出层层壕沟。查理决定在形势变得更加不利之前发动攻击，因此在7月8日凌晨，率领2.5万人的队伍袭击彼得的营地。但在战斗的第一阶段，俄国的多面堡就瓦解了他们的攻势，给他们造成惨重的伤亡，然后彼得的4.5万人的军队从战壕营地里冲杀出来。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数不清的俄国火炮像割麦子一样，将瑞典军队一行行一片片地撂下，当俄军发起进攻时，瑞典人向后败逃了。在战斗和在溃不成军的撤退中，俄国人杀死或俘虏了几乎整支瑞典军队，清楚地宣示俄国已成为一个军事强国。

174

这场战争将再持续12年，彼得也将继续他的改革，但欧洲已经从另一个国家即俄国的兴起上看到了一个强国瑞典的衰落。

路易十四的伟大战争

当彼得从事他的改革工作时，路易十四发动了他的最后两次战争——奥格斯堡同盟战争（公元1688～1697年）和西班牙继承权战争（公元1701～1714年）。这些漫长而又耗费巨大的争斗将新大陆和旧大陆都牵扯进去，因为每个欧洲竞争对手都已瞄上了北美大陆，先是威廉国王战争，接下来是安妮王后战争。但是因为南亚次大陆还相对没有受到注意，这些战争就缺少18世纪中期战争所具有的真正的全球意义。

1688年，路易要求得到永久的保障，使得没人敢挑战他在"重新统一"中兼并的土地。因为没能得到这样的保证，他就发动了对哈布斯堡帝国的战争，并认为它将速战速决。10月，法军占领菲利普斯堡要塞，这是莱茵河上的最后一个桥头堡，威胁到阿尔萨斯。接着，他的军队将帕拉蒂内特变成废墟，意在使接近河边的敌军无法补给，以保证法国不受任何跨过莱茵河的攻击。但是法军的侵略和残忍，促使欧洲结成了一个新的反路易十四同盟，这个大同盟包括哈布斯堡帝国、荷兰共和国、西班牙、萨伏依、勃兰登堡和大不列颠（现在由荷兰统治者威廉三世统治）。

面对如此强大的同盟，路易召集了他统治下的最大的一支军队，由能干的卢森堡元帅率领进行野战，而围攻战则交给沃邦指挥。法军赢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几乎从没吃过败仗。投入到战斗中的军队规模有相当大的增长。在1693年7月29日进行的纽文登战役中，卢森堡指挥的8万法军击败了威廉三世领导的5万联军。尽管获得了这些胜利，但这场战争大大消耗了路易的财源，削弱了他的信用，使得他在吕斯卫克签订了一个精疲力竭的和平条约，放弃了他从1678年以来获得的许多权利。

现在，欧洲可能要享受和平了，但又出现了西班牙继承权的纷争。病弱无能

莫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公元1650～1722年）曾不断地使路易十四的军队蒙受耻辱。这幅画摘自一幅挂毯，它本来挂在一个感激他的国家为他修建的金碧辉煌的布莱尼姆宫里。图上他正处于他最大的胜利——1704年的布莱尼姆战役中。作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将军，在长达11年的关于西班牙继承权的战争中，他担任了英国和联军的最高指挥官，并从未输过一场战斗或战役。他的军事生涯中包括了几乎全部成功的30次围攻和四次大型战斗

175

的卡洛斯二世国王于1700年去世，身后没有子嗣。法国和哈布斯堡候选人都想得到王位，并煞费苦心地试图达到一个双方都接受的瓜分方案，但未想卡洛斯将所有国土都留给了法国候选人、路易的孙子——安茹的菲利浦。于是，1701年西班牙继承权战争爆发。法国开始打得很顺利，但以前征战导致的积弊很快就显露出来。它就像一个疲惫不堪、伤痕累累的拳击手，只希望在铃响时还能站住脚而已。针对法国又成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同盟，尽管法国现在有了西班牙做盟友。在这次战争中，英国产生了一位伟大的将军莫尔伯勒公爵，他接替萨伏依的尤金亲王指挥英国军队。1704年，他们在布莱尼姆大获全胜，这是此战中最引人注目的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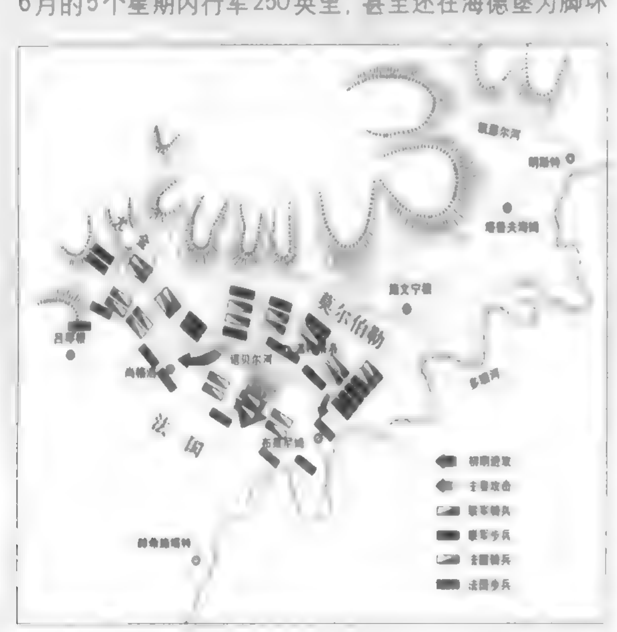
法国的运气在布莱尼姆后并没有好转，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1706年只带给他们更大的灾难。莫尔伯勒在拉米伊战斗中击败法军，为联军赢得了西属尼德兰。同时在阿尔卑斯山南部，尤金在都灵与另一支法军狭路相逢，结果将他们逐出了意大利。法军一次接着一次失败，路易十四看起来找不到一位能打胜仗的将军了，直到他任命马歇尔·克洛德·德·维拉尔于1709年指挥他的主力部队。虽然莫尔伯勒和尤金再次合作愉快，于9月11日将维拉尔逐出了马尔皮拉魁特战场，但这却是一次“皮洛士的胜利”，因为法军是井然有序地撤退，是准备再战的。是日，双方都召集了9万人的军队，伤亡总人数超过3万人，使得这场战役成为路易十四战争中最血腥的一次战役。

176

法国一直坚持到1712年，这一年，莫尔伯勒因为政治原因被解除指挥权，维

1704年布莱尼姆战役

1704年，法军和巴伐利亚盟军一起进入德国的心脏地区，希望将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军队逐出战争。莫尔伯勒公爵率2.1万人从尼德兰出发，挥师南下，急行军增援奥地利人。由于有当地政府沿途为他提供给养，他在5~6月的5个星期内行军250英里，甚至还在海德堡为脚坏了的士兵提供了新鞋。他到达目的地时，军队已增至4万人。



一到达多瑙河，他就与萨伏依的尤金亲王率领的一支奥军会师，8月13日，两军共同面对驻扎在布莱尼姆的敌军。法国—巴伐利亚联军有5.6万人，而莫尔伯勒和尤金指挥着5.2万人。莫尔伯勒军在左，划分为方形，对抗由塔拉尔指挥的一支法国军队；尤金军在右，面对着一支由马尔桑和巴伐利亚选侯指挥的法—巴联军。

莫尔伯勒先进攻他左边的布莱尼姆村镇和右边的尚格洛，借此发动攻势。他的军队虽遭受很大的伤亡，但在两翼牵制了法军，削弱了塔拉尔的中军。关键时刻，他掩杀过去，打得法—巴联军溃不成军，一败涂地。法—巴一方的伤亡被俘人数是3.86万人，而莫尔伯勒和尤金指挥的队伍伤亡也达1.2万人。一位当时的英国回忆录作者罗伯特·帕克上尉记述了路易十四在得知布莱尼姆战败后的反应：“这是他漫长的统治期内，所遭受的一切致命后果中最严重的一击，他激动地说，他经常听说军队战败，但从来没像这次一样。”路易十四再也不能威胁德国的心脏地带了。

右页图：这是在霍雷林登战役(1745)中的腓特烈大帝。作为普鲁士的君主，他更像一个伟大的实践家，而不是一个伟大的革新者。他获胜依靠的是将一个有根本缺陷的军事体系发挥到极致，而不是靠突破那个体系的束缚。他的军队得益于一批出色的贵族军官的努力和规范全军的严厉无情的纪律，尽管队伍中还有许多外国人。但这个体系也依赖于腓特烈的天才，他于1786年去世后，普鲁士就没有了以前的荣光，开始走下坡路了，最终于1806年在耶拿被拿破仑彻底击败。

拉尔在德曼与联军遭遇，击败了联军。这次胜利为法军对西属尼德兰发起最后一次攻击铺平了道路，而这次进攻导致了1713年和1714年和平条约的签订，此条约保证了法国边境，为波旁王朝留住了西班牙王位。法国虽然最终保住了它所有的南部边疆，但在北美却被英国从它手里永远夺走了阿卡迪亚。

腓特烈大帝

路易十四死于1715年，他的死也带走了一个时代。他为光荣和崇高的利害关系而战，但在1715～1789年间，国与国之间却更多地是为了不同的利益，而不是为霸权而战。战争从没如此多地基于理性的经济考虑。军事史学家们将这个时期称之为有限战争年代，虽然有些例外，但这个形容确是实情。这并不是说这些国家以前没为经济目的开过战，17世纪时荷兰和日益商业化的英国就曾围绕财富和商业利益进行过战争，但在18世纪，经济概念已成为全欧洲政治计划的核心部分。那些思想可以用“重商主义”一词来概括，它重新安排了世界的有限财富，强调经济自足的需要，坚持多卖少买的要求，以便于积累财富。

依照这个公式，一个国家若有得，另一个国家便必有失——这是一个总数为零的游戏，战争在其中是达到一种目的的一种公平手段。当然一个国家若只是为了有限的一些目的而战，它在战争中毁掉自身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有限的目的带来有限的努力。因此，法国和英国在加勒比海争夺糖岛，在加拿大争夺皮毛生意，在印度争夺珠宝；而在欧洲大陆上，普鲁士的国王则梦想着鼓励发展新的生产部门，使他的领土能经济自足，梦想着夺取西里西亚省，以使他的国土变得更加富裕强大。

由腓特烈二世又称“腓特烈大帝”（公元1740～1786年）统治的普鲁士，是欧洲主要强国中最新崛起也本是最不可能出现的列强，它多半是推行其才能卓绝的统治家族——霍亨索伦的政策的产物。当勃兰登堡选侯腓特烈·威廉掌权时（公元1640～1688年），他的领土包括勃兰登堡、东普鲁士和散布在德国北部缺乏政治上统一的一些零碎土地，只是因为财产和王位继承的偶然性才让它们落到他手中。每块领土都拥有自己的机构和特权，没有一个感到有责任去为另一个提供保护。选侯领土的这个缺陷为它们带来了不幸。命运将它们置于“三十年战争”的交战双方之间：瑞典在北，哈布斯堡在南。从1630年开始，勃兰登堡由于作战军队的占领而遭受严重的破坏。腓特烈·威廉认为，只有自己拥有一支大军才能保卫他的国土。但是如果想从他那些支离破碎的领土收入中拿出钱来建立、供养一支军队，他就必须把那些分散独立的领土纳入一个统一的政体中。因此，普鲁士是为了供养一支军队而创建的。通过争论和赤裸裸的武力，腓特烈·威廉从他的领地上获得了许可，允许他向每块土地征税以供养一支军队，征募完全掌握在他手中的力量。为了在东普鲁士得到这种特权，他甚至包围了自己在那儿的都城——柯尼希斯贝格。

他的继承者继续推行他的事业。腓特烈（公元1688～1713年）以同意做哈布斯堡皇帝的盟友并共同对抗路易十四为交换条件，从皇帝那里获得了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的头衔。这种从属关系很快就变成了平等关系，霍亨索伦家族被接纳

为真正的欧洲君主。腓特烈一世不像普鲁士人，他喜欢奢华铺张，但他的儿子腓特烈·威廉一世（公元1713～1740年）却回复到更斯巴达式的生活，通过紧缩经济开支和艰苦的努力，他将继承来的军队翻了一番，达到8万人，是法国常规军规模的一半，尽管普鲁士的人口才有250万（法国人口有2000万）。腓特烈·威廉一世的儿子腓特烈大帝，立即在这份先人创下的财产上苦心经营，并企图攫取富饶的西里西亚地区——普鲁士成为与哈布斯堡争锋敌对的一个德国政权。

腓特烈和他的军队集中体现了17世纪出现的战争模式。在根本上，这种模式是建立于一个假设上的，即普通士兵可以被训练但不可被信任，无论他是一个志愿兵，还是17世纪末及18世纪实行的初级征兵计划招募的产物，这个士兵都要被视为一个潜在的开小差者。在1775～1777年间的法国作战部长圣日耳曼伯爵看来："在一般情况下，军队都是由那些国家渣滓和社会上的无用之人构成的。"这样的人必须被编制成队，以进行严格的控制和不断的监督，要强调严格繁琐的步兵和骑兵战术，使他们能在空地上队列整齐。指挥官们轻视那些伏击战术，认为它让士兵寻找自己的隐蔽处、按自己的想法作战，是既危险又无用的。如果有机会在隐蔽时脱离军官和军士们的监视，士兵们能不逃跑吗？只有严明的纪律和不断的操练才能在战时脆弱的队列中达到统一作战。现在的战斗阵形比以前更细长，步兵进行齐射时只站成三排，排与排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空隙。畏惧是腓特烈的战术能够顺利运作的关键，正如国王自己宣称的："一支军队大部分是由游手好闲、不思进取的人构成的。除非将军不断地监视他们……这架机器……将很快分崩离析。""（士兵们）对长官的畏惧要超过对面临的危险的恐惧。"虽然这套体系有局限，但腓特烈将它推至了顶峰。他继承了欧洲训练精良步兵的方式，当他的骑兵达不到步兵标准时，他就用无情的操练将其"鞭策"成形。

这套体系运作的关键，是普鲁士拥有欧洲最职业化的军官队伍。腓特烈强迫年轻的贵族去做军官。一旦他们参了军，只有病弱和死亡才能把他们解放出来。法国军官表现得像非常独立的贵族，许多时间根本不呆在兵团里。而普鲁士军官却要和他的队伍守在一处，因为是他们而不是军士监督着操练和管理；他们还要在前线上领兵冲杀。为了使他的军官们感觉光荣，腓特烈也仔细制定了一个由士兵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等级制度，即使只是一个中尉或上尉，也要优于一名高级文官。

依靠这支出色的军队，腓特烈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权战争（公元1740～1748年）中，夺取了哈布斯堡的西里西亚省。查尔斯六世皇帝（公元1711～1740年）行将就木时，曾进行了许多交易以确保他女儿——玛丽亚·特丽莎的继承权。但它们全都落空了，她不得不对抗那些野心勃勃的邻居们，包括巴伐利亚、萨克森、法兰西和普鲁士。在接下来的战争中，腓特烈赢得了西里西亚，也换来了玛丽亚·特丽莎永不消弭的敌意。他的目标和所得都很有限，但她的仇恨却是无限的。

财富、权力和殖民征服

腓特烈和玛丽亚·特丽莎之间的争斗也加剧了英法之间的矛盾。法国支持普鲁士，而英国却是受到围攻的女王的后台。1688年以后，国际政治上一个不变的主题就是英法之间的竞争，双方进行了一连串的战争，简直可以称得上是第二次

百年战争。在18世纪中期的几十年里，法国和英国为了丰厚的利益，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发生了全球性的冲突。

但是因为英国的海上霸权，在海洋上的冲突被证明是一场不平等的竞争。大英帝国比之法国享有一项关键的优势，它是在尽力保有一支海军，而法国却需要一支陆地大军来保障它在陆地上的优势力量。在漫长而昂贵的消耗战争中，法国人不能既保有一支伟大的陆军，又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但在海上的颐指气使却让英国赢得了18世纪的经济争斗，因为海洋的统治者也统治着海外贸易。18世纪时，英国在欧洲战争中一直遵循一个固定模式，即只派一小支军队在大陆上作战，却用它的商业财富来援助联军，同时利用它的海上优势控制欧洲周围的水域，并赢得殖民贸易和海上贸易斗争的胜利。

180

反过来，殖民力量也进一步增强了英国的经济实力。如果金钱就是军事力量的话，那么英国就拥有无人可比的军事实力。它所以有能力频频获胜，其核心在于长期的低息信贷——它有能力合理地聚集必需的资金。这种能力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建于1694年的英格兰银行；但是其更基本的力量源泉是商业与政治。国会控制着政府的财政，它代表的是那些通过土地和商业赚取财富的阶层，是他们在为国家和它的战争付钱。对那些赖账出了名的国王们，国会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因为它一向以自己审慎的放债而自豪，条件很合理，利息也很低，甚至连国外的投资也涌入进来。相反，像路易十四这样专制的君主会拒绝为了税收和金融而放弃他的权利，因此也就无法像国会那样得到放贷者们的信任。从根本上说，英国的军事和海上力量出自它的政治体系，也出自它的商业财富，或者出自它的水手和士兵们的勇敢。

英国运用它的海上力量和金融力量，取代了西班牙、荷兰和法国，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的殖民国家。在南美和加勒比地区，衰落的西班牙正不断地将商业特权拱手相让给英国；而在印度和北美，在这两个18世纪殖民战争的主要战场上，法国为了保住它辛苦赢得的殖民地，进行了一场根本不能成功的绝望战斗。

印度拥有许多强有力的当地政权，它们都有先进的文化、悠久的军事传统和庞大的人口。因此，任何想独霸这块次大陆的欧洲国家都不得不与当地统治者们结盟以赶跑欧洲的竞争者，都不得不利用当地矛盾以离间和征服当地的统治者。因此，在印度发生的欧洲战争都必须被置于一个很复杂的背景里，它不仅是西方的冲突，也是印度人之间的战争和竞争。英国在印度的胜利不仅是一桩武力伟业，更是一场外交上的胜利。

181

欧洲人享有海上的巨大优势已经很久了，他们偏舷齐放的战舰统治着辽阔的海洋，特别是当荷兰、英国和法国取代葡萄牙，成为欧洲贸易者们的排头兵时。但是海上的力量并不易于转化成陆上的力量，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在印度的欧洲贸易公司最先感兴趣的都是商业，而不是征服。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领导者们是在获利和损失的基础上来估算胜利的，他们在1677年时还坚持认为："我们是为做生意而不是为打仗去的。"但是，成功的贸易需要在海岸有贸易点，那些贸易点的安全又需要现代的工事和士兵来防护。

最后，欧洲人不仅做生意，也通过作战来控制领土；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不仅从贸易中，也从贡物中赚取利润。为了同时应付当地的统治者和欧洲的敌人，西

印度士兵和印度的征服

因为控制印度领土的欧洲人已经超出了他们偏舷齐放的战舰的保护射程，他们不得不发展和利用亚洲人来使用西方的军事技术。这不只是一个将欧洲武器交到印度人手中的问题；事实上，当欧洲人离开战舰时，他们以前享有的技术优势已不复存在了。当地王公很早就使用了滑膛枪，军械库里也装满了火炮。但关键不是拥有这些现代武器，而是对它们的训练使用。1749年，约翰·格兰特，一位在印度服役的英国军官报告说，印度统治者们的军队几乎根本不会瞄准，"他们没有正规的训练"。这种欧洲式的批评可能过于小瞧了当地队伍的军事价值，但却指出了印度军队与西方军队的根本不同之处。

欧洲人在印度需要的人力来源被地理环境限制了，因为不可能从欧洲运来大批军队。雇佣当地队伍，或与当地盟友签约，虽可增加人数，但欧洲军队的主要兵力在规模上仍无法与当地王公们的军队相比。

看起来，法国第一个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增添了用西方方式严格训练过的印度军队，用纪律和操练对他们实行严密的控制，让他们在炮火下协调一致地作战。1746年，法属印度总督，约瑟夫·普莱克斯，在自己300名欧洲人的队伍中加入了700名印度士兵，并藉此打败了卡纳蒂克的纳瓦卜。1748年，斯特格林·劳伦斯来到印度，指挥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军队，他也采取了同样的革新。但是东印度公司的印度士兵是在印度军官的直接指挥下服役的，一个印度军营中仅有几个欧洲军官。到1766年时，欧洲军官数就增到了8个，其中5个是军士长，由此可以看出对操练的重视。

罗伯特·克莱夫是劳伦斯的心腹爱将，通常能在与印度敌手的人数比是十比一的劣势下，以非常少的军队赢得战斗，他凭借的不仅是军事行动，更多的是外交上的胜利。但当公司得到孟加拉后，其丰富的物产和人力资源改变了次大陆上的力量平衡。1767年时，迈索尔邦的海达·阿里面对的一支队伍中已有了800名欧洲人和5000名印度士兵。到1782年，东印度公司已拥有一支1.15万名的军队，其中90%是印度士兵，大多数来自孟加拉。现在，有他们在诡计和外交上的天分作辅助，英国人可以希望用武力来控制印度了。

这是1825年在马德拉斯军队中服役的印度士兵，他们穿着的欧洲军装更适合于寒冷的气候，而不适合于南亚的酷热，当时对服装的惟一让步是他们缠头巾式样的帽子。他们的衣着是一个深层转变的外在标志——一个位于南亚次大陆上的纪律森严的欧洲式士兵的创造体。

这头大象的盔甲，是1757年克莱夫在普拉森胜利中获得的战利品的一部分，它充分体现了印度传统的军事战术当象夫驱使他们庞大的坐骑向前踏杀他们的敌人时，大象的庞大和重量构成了真正的威胁。但是这种传统的战争方法在欧洲先进的技术和战术面前遭到了失败。印度人掌握欧洲军事方法的能力导致了印度士兵的产生，但也在当地政权中产生了武装力量，例如马拉塔人就能采用西方的作战方式来对抗英国人。英国人最终的胜利，不仅是因为他们依赖了大炮而非大象，还在于他们控制了印度的政治。

方人不得不在印度创建他们自己的军队。因为从水路将欧洲士兵运到印度太困难也太昂贵。印度士兵，即雇佣的用西方模式装备和训练的印度军队，就为此提供了解决办法。一旦训练得当、统率得法，无论是对抗土生的印度人还是欧洲军队，印度士兵都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虽然英国不是第一个使用他们的国家，但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却最终在印度士兵身上获利最大。

法国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之间的冲突因为第一次卡纳蒂克战争（公元1744～1748年），而在1744年开始变得激烈，而且一开始都投入了欧洲正规军和海上力量。1746年，那位能干的法国总督约瑟夫·迪普莱克斯，在一支法国舰队的协助下，包围并占领了英国在马德拉斯的主要据点。但即使英国对法国在本地治里的基地围攻失败了，《艾克斯拉沙佩勒条约》还是将马德拉斯还给了英国。因为英法都卷入了当地的印度战争，第二次卡纳蒂克战争接踵而至。迪普莱克斯再一次显示出他在外交和军事上的才华，由法国人做后台的候选人成为卡纳蒂克的土邦主，从而使法国成为印度东南部实际上的统治者。所以这一回合法国人赢了，但他们的胜利没有持续多久。

18世纪时在美洲进行的欧洲战争却有很大不同，因为英法都大量利用当地的美洲人做同盟，他们在战斗中只扮演了一个次要角色，所以欧洲人之间为了控制美洲而进行的战争都不具有决定性。法国人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将阿卡迪亚输给了英国，却保住了他们在圣劳伦斯河和密西西比河沿岸的据点。在接下来的冲突中，从乔治王战争（公元1743～1748年）到奥地利王位继承权战争的美洲阶段，英国和新英格兰殖民军于1745年占领了法国在布雷顿角岛上的路易斯堡要塞。但同是那个将马德拉斯还给英国的《艾克斯拉沙佩勒条约》，也将在新大陆的所有征服战果都还给了他们原先的主人，只有在加拿大的竞争还没有得到解决。

针对当地美洲人发动的战争更有决定性。技术、疾病和不断增加的人口（到1700年时，至少有100万欧洲人后裔住在美洲），为殖民者带来巨大优势（见第8章）。到18世纪时，印第安人只能在欧洲殖民地的边境角落里拥有自己的土地，而且即使是那里也不能长久拥有。战斗是激烈的，战果对双方都很残忍，但结局却是早已成定论的。只要法国和英国开战，当地人就能在这边或另一边找到盟友，但1763年新法兰西的消亡结束了这种局面。美国的独立给当地印第安人造成了甚至更多的伤害，因为英国在某种程度上还尊重印第安人在阿巴拉契亚山以西的土地，但这个新国家却从开始就对当地人怀有敌意。《独立宣言》本身就谴责印第安人是“残忍无情的印第安野人，他们知道的战争规则，就是不分年龄、性别、情况地一律加以毁灭”。以这样一种态度，美国在它存在的第一个世纪中逼迫当地部落四处漂零迁移也就不令人惊异了。

1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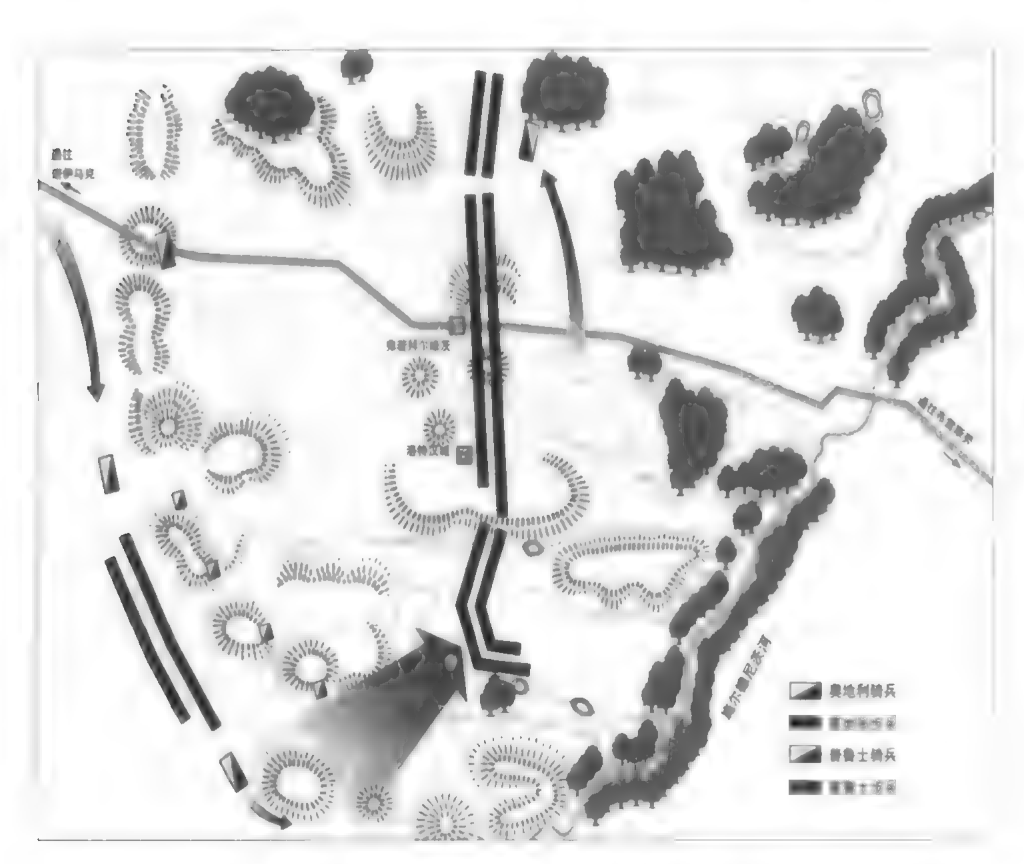
七年战争

这个商业战争的年代在七年战争（公元1756～1763年）中达到了高潮，

那是一场后果波及欧洲、北美和南亚的真正的全球性冲突。在欧洲，腓特烈现在与英国结盟，只求保住西里西亚；他的目标很有限，也适合他付出同等限度的努力。但是为了他“偷走”西里西亚，玛丽亚·特丽莎几乎不惜一切代价地决心惩罚他。为此她与俄国和法国结盟，步步紧逼地要压垮这位普鲁士君主。这迫使他为了有限的目的而做出无限的努力。

1757年，腓特烈的军队取得了最伟大的战绩。11月5日，法国对他发动的一次大规模进攻在罗斯巴赫遭到了灭顶之灾，腓特烈摧毁了一支两倍于己的法—德联军。但当他忙于应付西部的敌人时，奥地利人侵入了西里西亚，所以仅在一周后，他的军队就离开了莱比锡，在16天内几乎行军200英里赶到了帕克维茨。他从帕克维茨出发，率3.6万人的军队向由洛林的查尔斯指挥的大约8万人的奥军挺进。当查尔斯得知腓特烈正急行军靠近时，便在洛特伦城周围摆出一个防守阵势，但是树木茂密的山峦掩住了他从北向南排开的五英里长的横队。12月5日上午，腓特烈开始向奥军阵地行进，然后利用山峦隐藏住他的行列，折而向南，将小股部队集中到奥军阵线的左翼。他的部队行动得是如此迅速，从行军行列转换成战斗横队是如此准确，以至于他们猝不及防地完全抓住了奥军的左翼。在强大的炮火支援下，腓特烈的军队在下午大约一点钟时插入奥军左翼，然后向北奔驱，到达这个反方向目的地。他的一些滑膛枪手甚至放枪达180次。到这一天结束时，奥军死亡1万人，被俘2.1万人，总伤亡数几乎与腓特烈的全军人数大致相当。拿破仑评价这场战役说：“洛特伦战役是一个移动、调遣和决策的杰作。它足以使腓特烈不朽于世，将其置身于最伟大的将军之列了。”

罗斯巴赫和洛特伦可能会挽救普鲁士，但这场战争却又拖了6年。从18世纪40年代晚期开始，一直持续成为“七年战争”。腓特烈的敌人们改进了武器、战术



在洛特伦战役中，普鲁士的腓特烈打破了一条已知的战争规则，在穿过奥军前沿时，集中军队进行侧翼攻击，从而赢得了最大的胜利。他很有技巧地将自己的行动隐藏在一座树木繁茂的山梁后，用一个假动作把奥地利人的注意力吸引到右翼上，而他却向对手的左翼发起突然的攻击。

和管理。1755年的俄国步兵规则公开仿效了普鲁士的战术，它的大炮也因为采用了更好的炮身、延长了训练时间而提高了速度和准确性；一种更好的供应体系则减少了军队的辎重车，使它更富有机动性和越发不像一支东方军队了。更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奥地利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权战争中失利后，也改革了它的武装队伍：步兵都使用了一种标准的操练手册；训练和装备得到了改善；维也纳新城里开设了一个军事院校；大炮进行了全面的翻修，包括重新设计的等于甚至超过普鲁士标准的火炮；军官队伍面向一般人招纳，1758年时还成立了将军队伍。最后，那位优秀的奥地利指挥官利奥波德·冯·多恩元帅，发现(用他营地的一位助手的话说)普鲁士国王"总是将进攻放在他想要攻击的军队的一侧或两翼上，(因此)只要简单地计划出一个适宜的对策即可"。所以尽管具有野战天才，腓特烈还是最终被他强大敌人的手段和智巧压过，因此几乎遭到了彻底的毁灭。到1761年底，他已走投无路，只得退回柏林，陷于绝望之中。但是他的死对头，俄国的伊丽莎白在1762年1月的去世挽救了他，因为她的继承人彼得三世是普鲁士的崇拜者。普鲁士精疲力竭但却安然无恙地从战争中脱身了。

英国军队离开他们在圣劳伦斯河上的战舰，翻越悬崖，在魁北克外的亚伯拉罕平地进行战斗。双方都冒了很大的风险。沃尔夫是因为冬天临近，而被迫立即发起进攻，但如果法国人继续躲在城墙后面，他的这番努力就要失败。不过法国的蒙卡尔姆也不得不在空地上打一场仗，因为他没有抵挡一次长期围攻的补给供应。

184

因为法国和它的老对手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结成了一个很不寻常的联盟，因此"七年战争"的欧洲阶段是一场很奇怪的战斗，打起来既没有多少决心也没有多少胜利。但是如果法国在大陆上没有什么输赢的话，路易十五(公元1715～1774年)却在海外以极大的代价在作战。在北美，法国和英国之间的长期敌视终于到了最

后的爆发时刻——法国和印第安战争(公元1754～1763年)。1758年6月，当一支由杰弗里·阿默斯特和詹姆斯·沃尔夫将军率领的英国军队抵达路易斯堡前时，英国的胜利已为期不远了。在占领了那个要塞后，沃尔夫进攻了魁北克。

率领9000名英国正规军和500名殖民军，沃尔夫于6月26～27日在正处于魁北克下游的伊勒多奥尔良登陆，与法国总督马奎斯·路易斯·约瑟夫·德·蒙卡尔姆展开了一场三个月的决战。沃尔夫尝试了几种进攻方式，都被蒙卡尔姆挡住。到9月份时，随着冬天的临近，英国舰队的指挥官开始着急在圣劳伦斯河结冰前让船只返回去，所以沃尔夫和他的将领们决定走一步险棋，攀过一条翻越悬崖的羊肠小径，从圣劳伦斯河直接到达就位于城市西南部的亚伯拉罕平地。这条路是如此的崎岖，以至于法国人认为它是不可翻越的，所以防守非常薄弱。技巧和运气使英国人在1759年9月12～13日晚上完成了这桩伟业。次日清晨，沃尔夫已在平地上集合了4800人。

蒙卡尔姆现在决定出动4500人进行战斗，因为魁北克只有两天的食物供应了，几乎再也不能承受一次围攻了。当双方军队都布阵待战后，上午10时法军向前移动。沃尔夫曾命令他的军队卧倒以防范法军的侦察兵，现在命令他的士兵都站起来向前行进。在40码的射程内，他们开始一次接一次地向法军齐射，后者大乱。英军训练有素的射击决定了这场只有15分钟的短暂战斗。当法军撤进城里时，英军追踪而至。在战斗中，沃尔夫三次受伤，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他的生命；蒙卡尔姆也在撤退中受了弹伤，在那天晚上死去了。因为缺乏补养，法国于9月18日投降，交出魁北克，在为该城补给了食物和必需品后，皇家海军也撤离了。1760年春天，法国人围攻魁北克，但在圣劳伦斯河上另一支英国舰队的及时到来挽救了守军，也为英国赢得了加拿大。他们现在享有整个北美洲了，从乔治亚到纽芬兰到密西西比河沿岸的伊利诺伊。

与此同时，在印度，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也赶走了法国的印度公司。就像在北美一样，在印度的战争也有些独立于欧洲事务之外，有自己的动因。1756年，孟加拉的纳瓦布夺取了英国在加尔各答的贸易基地，将幸存者都投入了臭名昭彰的“黑洞”监狱。第二年初，罗伯特·克莱夫重新占领了这座城市，然后率领1100名欧洲人和2100名印度士兵组成的军队进入内陆，于6月23日在普拉森打败了纳瓦布的5万人的队伍。克莱夫那天所以能够获胜，不仅是因为他军队这边的优势火力，更主要的是因为纳瓦布的盟友和将军们背弃了他。1760年，法国人投降，交出本地治所，虽然《巴黎条约》将其归还给了他们，但他们再也不能获得全部的地位了。最后，赫克托·芒果指挥的一支公司军队，于1764年10月23日在伯格萨尔击败了另一支印度军队。这场艰苦的战斗为东印度公司赢得了富饶的孟加拉省、比哈尔省和奥里萨邦，使其成为控制次大陆的支点。公司现在已组成了一支强大的印度军队，从它统治下的庞大人口中征兵，从作为公司贡物的王公岁入中支饷，而这些岁入也来自当地的人民。

在很大程度上，“七年战争”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一个在全球扩张、划定西方霸权，由军事需要来构建政府，由战争来决定国家在欧洲的命运的时代。但1763年后，欧洲战争的性质将发生变化：王国战争将让位于国家战争，而且是以更强烈的热忱和新式的军事器械交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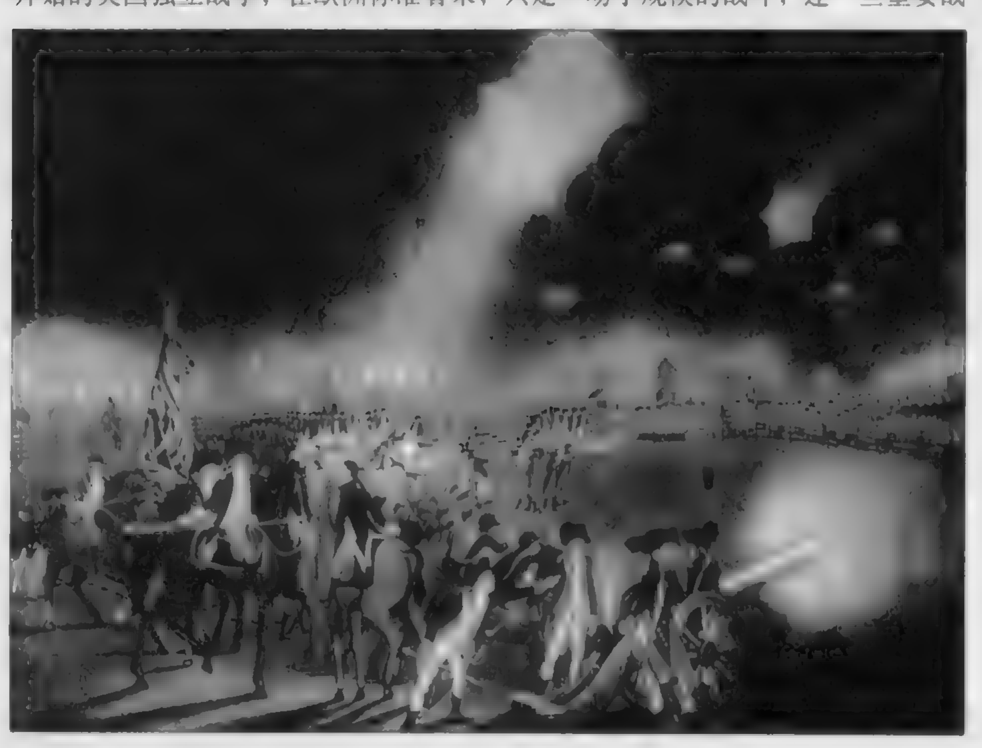
第十一章　武装起来的国家

在1763和1815年间，革命和战争改变了西方世界的面貌和核心。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时，在北美洲大西洋沿岸的英国殖民地还只是定居地，要依赖于英国。在海那边的法国，一个可追溯到800年前的君主政体还统治着一个特权贵族的社会，而农奴们仍在他们地主的土地上辛苦劳作着。美国和法国的革命不仅是这两个国家历史上的头等大事，也影响到了西方世界的每个角落。始自美国的革命浪潮最终席卷了整个拉丁美洲。1789年巴黎人民攻陷巴士底狱后，法国社会的变革不仅改变了法国，也永远改变了欧洲。

战争自身也在变化。法国革命实现了一个武装国家的理想，国家主义开始在西方的纪律重视程度上施加力量。普通士兵现在也被期待着表现出以前只属于军官的同样热忱，普通士兵们新的忠诚感影响到了战术、后勤和战略。最后，拿破仑证明了战争新形式中蕴含的潜能，并因此永远改变了军事行动的方式。

美国的革命战争

革命首先降临到美国。1763年将法国逐出加拿大和密西西比以西地区后，英国当局试图对大西洋岸边的殖民地加重负担，加强控制。这种强求、反抗、压迫的过程最后导致了1775年4月的战争，当时马萨诸塞的英国总督派兵收缴了殖民者存放在康科德的武器弹药，当地的民团进行了抵抗。从“枪声响彻世界”那天开始的美国独立战争，在欧洲标准看来，只是一场小规模的战斗，连一些重要战



这幅简单的画稿描绘的是普林斯顿战斗；1777年1月3日华盛顿在此战中对抗2000多名英军，并取得了胜利。这和他一周前在特伦顿击败1400名赫斯雇佣兵的胜利一起，给予了革命者很强的信心。在这次战争中，美国的独立事业常常得益于小规模的胜利，它们的政治意义和鼓舞士气的作用，要远远超过其参战人数

役涉及的人数也没超过几个营。双方，尤其是造反的用民团作战的美国人，通常都得到令人失望的结果，但除了民团外，美国人还成立了一支正规军，或者叫"大陆军"。虽然不像传说得那么神奇，但散兵和狙击手也的确参与了战斗，而且关键战役都是以非常传统的欧洲模式进行的。虽然军队人数一直很小，他们的战争模式也基本上是传统的，但这场战争却决定了很重大的问题。此外，在他们赢得独立的斗争中，美国的爱国者们早于法国革命爆发前14年，就已经坚持一个民族的政府应由一个民族的军队来捍卫的想法。

莱克星顿和康科德战斗后不久，一支由1.5万殖民者组成的军队，包围了由7000名英军驻守的波士顿。美国大陆会议选中乔治·华盛顿来指挥这支围城部队，历史也将证明他们对这位弗吉尼亚庄园主和"七年战争"的老兵的信任是正确的。他是一位具有伟大的判断力和政治品德的人。在1775年6月17日的邦克山战斗中（实际是在布里德斯山进行战斗），1500名战壕中的殖民者击退了占优势兵力的英军发起的两次进攻，只是当弹药耗尽时才屈服。虽然英军取得了此次胜利，但这次战斗却使革命军士兵有了自信——他们是能抵得住那些"红外套"的（指英军——译者注）。

特伦顿战役中的乔治·华盛顿将军。他在此震惊并击败了赫斯守军，时间是1776年12月26日。华盛顿是一个很有个性的聪明人，当机会来临时，他敢于冒险。他认识到在这场消耗战中，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将他的小部队集聚在一起、度过困难时期。与革命时期指挥军队的其他将军不同，他拒绝将军队用做获取政治权力的资本。当他于1789年成为总统时，送他上任的是选票而不是刺刀。

1776年3月放弃波士顿后，英国人准备夺取纽约。华盛顿预见到这将又是战争的一个爆发点，已经率军赶到那里，计划用挖战壕的方法来据守，这个战术曾在邦克山大显身手。但是在威廉·豪爵士指挥下的英国军队挫败了他的计划，在长岛击败了美国人，迫使华盛顿于9月12日放弃该城，经新泽西撤回并退进宾夕法尼亚他身后还被英国人紧追不放。"战线（守军的），我想，有些过长"，虽然豪将军在12月20日曾很有先见之明地这样承认，但看上去只有出现一个奇迹，才能挽救华盛顿那溃不成军的队伍了。圣诞节那天带来了这个奇迹。率2400人渡过特拉华河后，次日早晨，华盛顿在特伦顿猝不及防地打垮了英国雇佣的赫斯佣兵。九天后，他又在普林斯顿击败了一支英国分遣队。这些胜利虽小，但特伦顿和普林斯顿的战斗为他创痕累累的军队带回了一些自信。

纽约附近的战斗使华盛顿懂得他是不可能在公开的战斗中与英军相抗衡的，同时也告诉他不需要如此，他只需要将军队凝聚成形，限制英国人控制的地区，等待适当的时机就行。除了1777年在费城有一次打乱英军进攻的无用尝试外，华盛顿通常避免战斗，他在进行一场消耗战。当他的军队遭遇艰难，最低潮时是在福日山谷度过的1777～1778年的冬天，他也想方设法使他贫弱的队伍团结在一起。就在这个过程中，他已埋下了胜利的种子。

188

华盛顿一直在设法将他的军队改造成能按欧洲模式进行有纪律、能战斗的队伍，这种努力得到了奥古斯塔斯·冯·施托伊本的协助，他是一位曾参加过腓特烈大帝军队的军官。冯·施托伊本为华盛顿的军队编制了一套简化的枪操练法，并将其有效地教授下去，所以到1779年时，华盛顿的正规军在战场训练上已能与英军相匹敌，但是人数却从来没够过。

英国人将华盛顿赶出纽约后，主要战斗就转移到其他前线。豪为1777年的战斗拟订出一个雄心勃勃的战略方案："如有可能，要充分广泛地调用国王陛下的军

队，在一年内结束战争"。1万人去夺取普罗维登斯，然后是（如有可能）波士顿；1万人从纽约出发，溯哈得孙河而上至奥尔巴尼；再有8000人守卫新泽西并威胁费城。另一支英军占领易洛魁，然后和效忠人士一起沿莫霍克山谷下行。最后，来自加拿大的一支队伍，先走尚普兰湖，然后走哈得孙河向南行进，与从纽约出发向北前进的队伍会合。这样，就能将新英格兰与其他的造反州隔裂开。

这是个好计划，但它的胜利必须依赖于1.5万名援军和一个炮兵营的到来（豪聪明地建议这可以从德国、英国、俄国中征集）。但是伦敦政府完全拒绝再提供进一步的援助，所以1777年4月，豪决定放弃他雄心勃勃的计划——"我在这年结束战争的希望破灭了"，他如此抱怨，而将兵力集中到对费城发动的一次进攻上。

于是，来自加拿大的军队在约翰·伯戈因的指挥下，出发至哈得孙河。开始，他的战斗很顺利，但当夏天过去时，他的行动放慢了，因为遇到供给问题。豪，就像他曾警告过伦敦（和加拿大）的那样，正随他的主力军队进攻费城，只派出一支由亨利·克林顿率领的4000人的小部队，半心半意地与伯戈因合兵一起；几次小胜后，克林顿就返回了。最后，在长期的穷途末路下，伯戈因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在萨拉托加附近的两次战斗中，霍雷肖·盖茨指挥的一支军队击败了伯戈因，他于10月17日率军投降。被美国人的这次胜利所鼓舞，法国于1778年2月加入战争，两年后，6000名法国士兵在罗得岛的新港登陆，他们将为赢得这场战争的最后一次大战起到很大的作用。

在南方的战争

1778～1781年间，北方保持了相对的平静。1778年6月，克林顿取代了豪做英军指挥官，从费城撤至纽约。华盛顿也重新开始他的等待游戏，战事移到了南方。除了1776年克林顿曾不成功地试图夺取南卡罗莱纳州的查尔斯顿外，南方诸州进行的都是一些小型战斗，直到1778年12月，英军占领了佐治亚州的萨凡纳。第二年秋天，一次美法联合的大远征曾试图重新夺回萨凡纳，但是失败了。1780年，克林顿对查尔斯顿进行了另一次围攻，于3月攻陷它。他然后坐船回纽约，但留下一支8000人的军队去征服南方的其余地区。1780年8月16日，在南卡罗莱纳的卡姆登战役中，以查尔斯·康沃利斯为首的这支英军击溃了盖茨领导的一支队伍。在打败萨拉托加的胜利者后，康沃利斯期待着赢得这场战争，但事实并非如此。

189

这次机会转折的动因是：纳塔内尔·格林率领3000名大陆军和民团在北卡罗莱纳的夏洛特，迎击康沃利斯的4000名正规军。在这场令人惊异的战役中，格林并没有赢得一次战斗，他只是在消耗英军，致使康沃利斯于1781年3月放弃了卡罗莱纳，引军返回了弗吉尼亚。在弗吉尼亚，康沃利斯遭遇到由德·拉斐特侯爵指挥的另一支美国军队，却无法让其与自己交战，最后只得带领7000人的军队退到了约克镇。康沃利斯不再是猫了，他就要变成鼠了。

得知康沃利斯躲到约克镇的消息后，华盛顿立即行动，率军迅速南下，同行的还有刚刚抵达的由让—巴蒂斯特·罗尚博所指挥的法国军队。与此同时，9月5～9日在弗吉尼亚角的战斗中，一支法国舰队避开了一支英国舰队，驶回纽约，

三位使卡罗莱纳从英国统治下获得自由的指挥官、纳塔内尔·格林(左图)、丹尼尔·摩根(中图)和安德鲁·皮肯(右图)。格林是罗得岛人，在被派往南部解救卡罗莱纳的局势前，是华盛顿的军需官，但格林是一个很有天分的业余军事家，他意识到在击败英军时，"跑"和"打"一样重要。摩根从退隐中出山，做了格林的中尉，并在考彭斯赢得了重要的战术胜利。皮肯指挥民团游击队骚扰英军，使他们无法在充满敌意的乡间停留

封住了康沃利斯的后路。到9月末时，9000名美国人和7800名法国人的军队包围了康沃利斯的7000人的队伍；在华盛顿的指挥下，法国工程师们建起了正式的围攻工事。在无望逃脱的情况下，10月19日康沃利斯投降了。这场胜利是北美战争中主要战役的终结，和平谈判很快开始，最后签订了《巴黎条约》，英国承认了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

新观念新武器

美国的胜利使法国尝到了复仇的甜头，此外，法国人能痛击他们的英国敌人，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其在遭受"七年战争"的耻辱后，用来提高法军素质的改革运动合法化了。

这场运动的核心是纵队和横队支持者之间的一场战术争论。深纵队形，即the ordre profond(深队形)的支持者们将他们的结论建立在那些由来已久的观念上，认为法国人在猛冲时要比在固守时表现出色。连伏尔泰这样的大权威也同意："法兰西民族总是以最大的热情发起进攻，抵抗它的冲击是极其困难的。"但横队战术的拥护者们，即the ordre mince（薄队形），却从腓特烈大帝的胜利里吸取了信心，而且有一段时间，法国的操练手册就是仿效普鲁士的。在认识到这两种基本队形的优点后，1772年，雅克·德·吉贝尔伯爵出版了他的《战术概论》。他的办法是在战斗中两种队形都用，可称之为混合队形。这场战术上的争论最后产生了那本1791年8月出版的操练手册，书中没有强调单独任何一种队形，而是提供了一份队形和演化的"菜单"，如何操练可根据指挥官的口味自行选用。

当法国人为了重步兵的最佳战术而唇枪舌剑争得不可开交时，他们也在尝试着增加轻步兵的数量。由于害怕开小差，18世纪中期的指挥官们很少使用须自己

纳塔内尔·格林的南卡罗莱纳战役

1763～1815年这段时期内，彻底歼灭的拿破仑式战争并不是惟一具有决定性的战斗方式。相反，美国将军纳塔内尔·格林将正规军与游击队结合起来，以消耗并击败敌人的方式，预示了20世纪民族解放战争的战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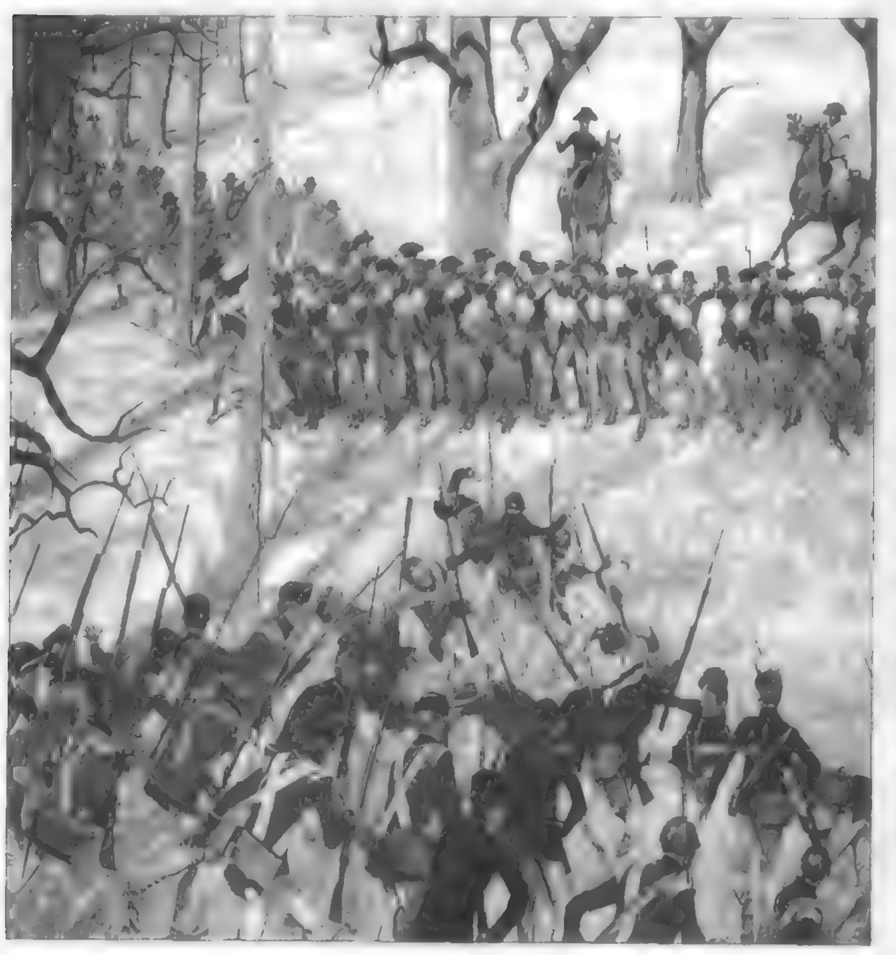
当格林，这位自学成才的士兵，于1780年12月抵达南方时，英军已基本摧毁了在卡罗莱纳的美国军队。格林在南卡罗莱纳召集了一支小部队，决定与已经建立起来的游击队合作，拖垮康沃利斯。

格林拉开战幕的方式是把他的3000人小军队分开丹尼尔·摩根指挥其中的1000人在考彭斯战斗中粉碎了一股英军力量。鱼饵已投下，康沃利斯上钩了。他赶至考彭斯，在那儿烧掉了他的储备以使他的纵队能没有障碍地追赶那些无礼的美国人。当康沃利斯毁掉自己给养的消息传来时，格林宣布："那么，他是我们的了。"他意识到咬住康沃利斯军队的游击队可以在路上自己保证补给。康沃利斯的人却只剩下他们自己背着的东西了，而那是绝对不够的。所以格林迅速地"跑"到了弗吉尼亚的唐河，康沃利斯被迫在后面追赶。格林的队伍若想逃出康沃利斯的手心，只能这样行动，他们赢得了这场比赛，但康沃利斯的2500人军队却因为饥饿和疲惫，已经损失了500人。

暂作休息后，格林再次跨过唐河，追踪康沃利斯到吉尔福德郡府，在那里和他打了他一直想打的仗。格林知道即使他输了，他也可能赢，因此虽然康沃利斯赢得了那天的胜利，但他又折损了530人。率领着疲惫不堪的军队，康沃利斯被迫退到了恐怖角，从那儿放弃了卡罗莱纳，匆匆去赶赴约克镇的失败约会。格林在与其他英国军队的交战中又输了两仗，但胜利者们遭到了如此惨重的伤亡，不得不退回查尔斯顿，将卡罗莱纳的其他地方留给了格林。格林评说道：

> 很少有将军能比我更频繁、更精力充沛地"逃跑"……但我注意不跑得太远，通常向前跑向后跑都一样快，以使我们的敌人相信我们就像是能到处乱跑的螃蟹。

150年后，毛泽东使用了与格林如出一辙的战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1781年1月17日的考彭斯战斗中，丹尼尔·摩根将军为美国赢得了独立战争中最辉煌的战术胜利，虽然这场战斗规模很小，双方都只有1000名士兵。摩根了解自己指挥的军队的能力和局限，所以只要求他的民团做力所能及之事，他则依靠大陆军来压住阵脚。在这幅画中，在战斗的紧要关头，马里兰和特拉华的大陆军击退了英国步兵发动的进攻。

寻找隐蔽地和目标的散队步兵，但在18世纪后50年里，所有欧洲的主要军队都在有限的基础上退而使用轻步兵。"七年战争"中"新大陆"的战斗和美国独立战争只是给这个趋势以一个很突然的影响，但到1789年时，法国步兵军营中已包括了一个轻步兵连，法军拥有整整十二营的轻步兵。

这种发展与任何科技进步无关，例如步枪，因为法国人继续用平膛的滑膛枪来装备他们的轻步兵；但是如果说步兵武器变化不大的话，炮兵则不然，1774年采用的格里博弗尔方法极大地改进了法国的火炮。让·瓦克特·德·格里博弗尔，在"七年战争'后升做法国炮兵最高指挥官，他改变了炮的生产方式，不再像以前那样将炮膛在火炮内浇铸成型，而是先将火炮浇铸成实心的，再开出炮膛，这就带来了更严密的承受力，使得大炮能以更少量的火药达到更大的射程。格里博弗尔方法还生产出更短更轻，因而也就更机动灵活的野战炮。和新式的武器一起，炮兵军官的训练也得到了提高。

192

在提出改进战术和技术的同时，改革者们也提及了一种新战士，甚至一种新社会。吉贝尔在他的论著中写道：

> 想象一下，在欧洲出现了这样一个民族，他们将自我克制的美德与一种全民的自卫组织和一个坚定的扩张计划融为一体，他们不会忘记自己的体系，知道如何去经济地作战，如何靠胜利为生，不会因为经济考虑就被迫放下武器。一个人可以看到这样的民族征服它的邻邦、推翻软弱的政体，就如疾风吹过弱草一般。

其他的人，包括有影响的哲人孟德斯鸠，也为这种国家士兵的理想说了一大堆相同的赞美之词。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改革者就是革命者；相反，改革运动在整体上反映的是深刻的社会保守主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主题就是需要有一个强大而又不排外的职业的贵族军官队伍。正像莫里斯·德·萨克斯宣称的："事实上，惟一的好军官是那些除了自己的宝剑和斗篷外便一无所有的穷绅士们。"改革者们谴责购买军官职位的做法，因为它有益于那些只有纯正的贵族血统，或不是贵族但有钱的新手们。作为对这种批评的一种反应，法国在1776年开始停止买卖军队官职。法国在1750年以后还设立了新式的士官学院，借此提高军官的职业教育，但是，学员很快就需要有贵族地位才能被录取。而且作为这种改革的皇权影响，1781年的塞居尔法禁止直接任命任何候选人，除非他能证明自己的父亲方面有四代贵族血统。所以虽然在1789年以前，法国军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但其中一些改革是如此不彻底，以至于只有大革命才能推翻它们，以便塑造只属于它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军事组织。

法国大革命中的国家士兵

193

1789年7月"袭击"法国的大革命，像动摇了君主政体一样强烈地动摇了军队。当路易十六（公元1774～1793年）在革命第一年试图用他的士兵去对付人民群众时，军队表现得既无用，又不情愿，甚至反戈一击。1790年，全法国的军团中都发生了一系列革命兵变，最严重的那次爆发于洛林地区的南锡。后来，当国

为了证明派到前线进行督察的官员（代表团）的政治可靠性，作战士兵受到了轻蔑的对待，这可以从拉弗物的这副讽刺性版画中表现出来。画家的父亲曾是革命军中的一名士兵。画面上寒冷不堪、衣衫褴褛的法国士兵站在齐腰深的水里，而那位督察官员却在吹嘘："敌人想不到我们会在这儿。现在是7点钟，明晨4点我们将打他个措手不及。"

王试图于1791年6月逃离法国时，大量的辞职瓦解了军官队伍。古老的军团队伍解散了，当战争两次来临时，法国将需要一支全然不同的军队，这支军队于1792年4月成立。

这支军队首先在志愿者中重新征募军人。早在1791年夏天，政府就命令扩充正规军，但革命者并不想只依靠他们，因为革命者将其视为一个潜在的政治威胁。因此，巴黎在刚成立的国民自卫队、国民警卫军中征召了10万名义勇军。这些按照自己的营队组织起来的1791年的义勇军，后来和1792年7月征募的义勇军合在了一处。但到1793年时，志愿兵制度无法满足庞大的战时人力需求，所以8月时，革命政府颁布了全民动员令，或者说对全体法国人民的征召令——比全国征募更极端的法令：

> 年轻人应该去战斗；已婚妇女将去制造武器和运送补给；女人们要缝制帐篷、缝军装，在医院中服务；孩子们将去撕破烂；老人们应让人将自己抬到公共广场上去鼓舞士气，宣传对国王的仇恨及共和国的团结

到1794年夏天时，按照花名册，革命军登记有100万人，其中75万人是武装队伍，这支大军的社会阶级、职业、地域来源都准确地反映了法国社会。它是由法国所能提供的最年轻的士兵构成的武装国家。

为了领导这些军队，法国建立了一支全新的军官队伍。旧皇家军队中大批军官的离职留下了如此多的空缺，以至于只能将非军职军官迅速提升到军官行列中来填补空位。义勇军营选举他们自己的军官。一些军官的升迁是昙花一现，但整体说来，军官队伍变得越来越职业化，提升是由资历和才华决定的。在大革命前，贵族们在部队军官中大约占85%的比例，但到了1794年夏天，他们的比例已低于3%。但即使军官队伍已不再代表旧的特权阶级，革命政府也从未真正信任过它的指挥官。为了监视他们，巴黎派出了著名的"代表团"和不那么出名但人数更多的"政治委员"。在前线，这些代理人审查军官们的一言一行，他们的不满可能就意味着断头台。为了在普通士兵中确保正确适当的意见，革命政府还发起了一场政治教育运动，向军队散发了上百万份官方布告、激进报纸，甚至爱国歌单。

以1791年的操练手册作为指南，这支国民军队发展了一个行之有效的战术体系。虽然那些新兵可能永远也不会掌握阅兵场上操练的细节，营队还是站成横队以保证密集火力。但他们也采用了纵队攻击时的优势，那是一种站成纵深12列、每列大约60人的新队形。这种密集队形行动敏捷、易于变成横队，并可迅速地向

敌人发起冲锋。在主横队前面，法国人布下散兵来骚扰准备进攻的敌人。革命军步兵所享有的最大优势并不在某个单独的因素上，而在于它灵活地综合了各种战术，形成了适应于地域和环境的战斗方式。

法国骑兵在战场上发挥了次要作用，因为他们在战争的前几年里人数很少，能力也不足，但是炮兵却是无价之宝。法国将越来越多的力量投入到马拉的大炮和机动大炮上，后者用更大的马队牵拉，炮兵们也骑着马以便赶上大炮的进程。这样的炮群可以疾驰向前，将炮解下拖车、开火、再系上拖车，赶往下一个为步兵提供有力支援的重要位置。

弗朗索瓦·凯勒曼，左边骑白马之人，指挥了1792年击退普鲁士侵略的瓦尔米战役。普鲁士军队当时被认为是欧洲最好的军队，因此侵略军的指挥官布伦瑞克公爵以为法国人在与普鲁士人面面相对时会转身逃命。但当普军进攻时，凯勒曼率军发出一声雷霆般的呐喊："祖国万岁！"那天晚些时候，发现法国人拒意坚定后，布伦瑞克告诉他的将领们："今天我们不能再在这里作战了。"对巴黎的进攻随即撤销。

战场上的革命

当1792年4月战争开始之时，只完成一半训练的法国军队遭到了一连串的灾难，尤其在关键的东北边境。在替换了一批不成功的将军后，查尔斯·迪穆里最后接手了那儿的指挥任务，而弗朗索瓦·凯勒曼率领南部的军队。夏季将尽之时，一支普鲁士和奥地利侵略军突入法国隆维边境，占领了凡尔登，威胁着要一路挺进巴黎。这支军队的指挥官是布伦瑞克公爵，他五年前曾令人震惊地成功入侵荷兰共和国。迪穆里英明地调兵遣将，以挫败布伦瑞克的计划，9月20日在瓦尔米，凯勒曼率军3.6万人击退了布伦瑞克3～3.4万人的军队。瓦尔米并不是一场炮火决战，但当法国的炮手们表现出色而凯勒曼的步兵们也站得坚定不移时，布伦瑞克取消了他的进攻。这场不引人注目的胜利捍卫了革命。伟大的德国诗人歌德目睹了这场战斗，当晚他对战友预言道："从这个地方，从这一天开始，世界史上将

布伦瑞克公爵曾率军入侵法国，意在终止法国革命的进程，但他本人并不是一个反动者。他无论是作为一名伟大的士兵，还是作为一位自由主义者，都享有如此高的声望，以至于1792年初，法国的战争部长想让他来指挥法国军队

出现一个新纪元，而你正在它的诞生之所。”瓦尔米战役后，法国开始展开攻击，到这年末，他们已在奥属尼德兰和莱茵河沿岸取得了许多胜利。

但是，1793年对法国是个很坏的开端。迪穆里在一次反攻中失去了奥属尼德兰；但是包括英国在内的联军并没有继续前进，而是停下围攻边境的要塞，这些要塞是波旁王朝留给大革命的遗产。失败，再加上在旺代爆发的反革命暴动动摇了革命政府。它现在成立了独裁的“公共安全委员会”，无情地发动战争。拉扎尔·卡诺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军事工程师，被欢呼拥立为“胜利的组织者”而走上前台，成为委员会最能干的军事权威，比任何人都更卖力地督促战果、后勤和战略部署。

到1793年夏天，法国已稳定了北部前线。与此同时，在地中海海岸，由于拿破仑·波拿巴指挥的法军有效地利用了大炮，从而收复了以前被英国夺去的土伦。革命军再一次奋勇向前。1794年5月17～18日，在图尔宽附近，6万人的法国军队击败了由奥地利、英国和汉诺威联军6支队伍组成、共7.3万人的包围行动。这次法国的胜利为更出名的弗勒吕斯胜利铺平了道路。弗勒吕斯战役发生在6月20日，当时7.5万名法军成功地防住了由萨克森—科堡公国的亲王指挥的5.2万人军队的进攻。尼古拉斯·苏尔特后来说这是他见过的最激烈的战斗。弗勒吕斯之战后，奥地利放弃了尼德兰。法军的胜利继续源源而至，它迫使联军退过莱茵河，在萨伏依取得了胜利，而且在1795年初，征服了荷兰共和国（将它改名为巴达维亚共和国）。

但在这最后一次胜利后，战争在德国陷入了困境，部分原因是一名法国将军叛变致使共和国的入侵计划落到了敌人手里。在意大利，法国人占据了热那亚周围的海岸，但没有什么进展。

查尔斯·迪穆里应该为法军在瓦尔米的胜利得到更多的赞扬。是他积极而出色的调度，使法军夺取了阿戈纳要隘，封锁了布伦瑞克的道路，迫使布伦瑞克在一个有利于法军的时间和地点作战。

1792年的第一场胜利和随后在1794年获得的胜利，使大革命越过了法国边界。但是如果法军的战斗能力在全欧洲被压迫民族中曾激起了同情革命的可能性的话，那么被占领区那些军队的行为却使当地人民转而反对他们的解放者。由于补给供应运作可怜、远远不够，法国士兵开始抢劫以求生存。并不是他们想这么做，而是不得不如此。

1795年，督政府取代了以前的革命政府，但是它却越来越腐败，忽视军队，只为战时的投机商们中饱私囊。但是，巴黎政府将最终为它的忽视军队付出代价。在革命热情最高潮时，士兵们被当做英雄对待；而当那个时候一过，他们就被弃置一旁，成为牺牲品。伤亡和开小差使军队严

重减员——从1794年夏天的75万人，减少到了一年后的大约48万人，1796年时是40万人，只比路易十六时期的军队多一点儿。出于良好的动机，军队相信自己代表了革命最崇高的理想：为公众利益而牺牲，职位向有才华的人开放，彼此间平等友爱。但恰恰相反，督政府看上去不仅抛弃了军队，也抛弃了革命本身。这样一个不满的军队将最终反对那样的政府，拿破仑·波拿巴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

波拿巴的战争工具

1796年3月27日，年仅26岁的将军获得了在意大利军队的指挥权，那是一支在法国边境和热那亚之间的地中海海岸上赖着不走的衣衫褴褛的军队。波拿巴答应给他们食物和名誉，即使他自己对革命理想并没抱多大希望。

士兵们，你们饥肠辘辘、衣不蔽体；政府允诺给你们许多东西，但却什么也没给你们。你们在这些危险中所表现出的耐心和勇气是值得赞赏的；但它们却没给你们带来任何荣誉——一丝荣光也未降临到你们头上。我将率领你们进入世界上最肥沃的平原。那富饶的省份，那富饶的城镇，将全都任你们处置；在那里你们将发现光荣、名誉和财富。意大利的士兵们！你们难道没有获得这一切的勇气和毅力吗？

凭借这一点，波拿巴的第一仗就通过一连串漂亮的兵力调遣和艰苦的战斗，面对并击败了皮德蒙特和奥地利联军。他先用轮流攻击两军的方法将皮德蒙特军与奥军分离开来，驱使他们后退，使其横队之间失去联系；然后他对皮德蒙特军队发起猛攻，迫使他们于4月28日退出战争。接下来，波拿巴在谋略和武力上都大胜他的奥地利对手博利厄，使后者将伦巴第遗弃给法国人。波拿巴在接手指挥权才6个星期就取得的胜利，实在令人震惊。将奥地利人逐出意大利北部其他地方所花的时间要长一些，因为他们占据了曼图亚，不断地派兵去救援被围攻的要塞。但拿破仑对其各个击破，1797年4月18日，奥地利同意停火，后来双方正式签订了《坎波福尔米奥条约》。

1798年，胜利连连的波拿巴率军远征埃及，因为他相信控制埃及将开启通往印度之门，但这只是一个浪漫的想法。避开在地中海巡行的霍雷肖·纳尔逊上将后，波拿巴率领大约4万人的军队于7月1～3日，在亚历山大附近登陆，并占领了这个城市。7月21日，他在金字塔战役中摧毁了一支马木路克大军。但所有这一切都化为了乌有，因为在8月1日的尼罗河战役中，纳尔逊击沉了法国舰队，13艘主力舰中只有两艘逃脱，从而将波拿巴的军队围

这幅未完成的拿破仑·波拿巴肖像，作者为雅克—路易斯·大卫，现挂于卢浮宫内。它显示的是那位在1796年战役中征服意大利北部的年轻而消瘦的将军。拿破仑于1769年生于科西嘉岛，他先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科西嘉爱国者，但很快就改弦易张，将自己的命运与革命的法国联系在一起。他在1793年的土伦围攻中获得了很高声誉，但他的军事生涯不久就因为与激进革命家马克西米安·罗伯斯庇尔的关系而受到损害，他被拘捕了一段时间。1795年，他调转炮口对准人群，残忍地镇压了一次暴动即著名的“葡萄弹攻势”，从此再度得势。

在这幅1807年弗里德兰战役的浪漫场景中，兴高采烈放马疾驰的胸甲骑兵，以及全副铠甲在身的骑兵，在经过拿破仑身边去冲锋时，向他欢呼致敬。在皇帝身后站立的是他的皇家卫队步兵，都身穿外套和白色的长裤，头戴黑色皮帽。这幅画展示了拿破仑式战争中吸引人们想像力的某种外在的庄严和辉煌。但鲜艳的军装、戏剧性的动作和伟大的胜利，只构成了现实的一部分，那永无尽头的伤亡名单是拿破仑无限野心的另一个后果

困在埃及。波拿巴对这一灾难表面上显得很勇敢，他攻进了叙利亚，但在攻占阿卡失利后，又被迫折回。带着他远征埃及的光荣，这位受挫但仍野心勃勃的将军抛弃了他的军队，搭乘一只快舰于10月9日在土伦登陆。

抵达法国后，波拿巴将他的军事声望转化成政治资本，在巴黎附近军队的支持下，于11月9~10日推翻了督政府。当上了第一执政的波拿巴现在统治了法国，但他很快又返回前线，去赶走趁他远征埃及时又重占了意大利北部许多地方的奥地利人。1800年6月4日，他在马伦戈险胜奥军，再加上12月3日让·莫罗在霍恩林登取得的胜利，迫使奥地利再次接受了法国的条件。英国也在1802年与法国签订了一个条约——法国现在太平了。1804年，波拿巴取得了更大的权位，他加冕自己为拿破仑皇帝。

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拿破仑赢得了这么多战斗，升到了这么高的位置？毫无疑问，他继承了革命军的遗产，包括一支勇于献身的军队、一支建立在才能基础上的军官队伍、从战争中锤炼出的将军们，和一个优于法国那些敌人的灵活的战术体系。拿破仑的军队不再是1793~1794年时的革命军队了，但仍是法国人，是他们祖国的儿子，仍愿意献身于她并为她的领导者所鼓舞。1798年的乔丹法设立了一种新式的全国征兵制度，它要求所有的年轻人都去登记，每年由政府从那些够资格应征的人员中设定一个招募定额。这种新的征兵法到1815年时，已为拿破仑提供了200多万士兵，并成为整个西欧和中欧征兵法的范例。

拿破仑继续改进适于他军队的作战方法。通常，他只是简单地修改一下他所发现的战术，例如他对混合队形的战术重视，这种队形就是将纵队和横队结合起

来的编队。此外，他还受益于法国骑兵的复兴，它已在18世纪90年代晚期慢慢地重新建立起来。他非常欣赏炮兵的重要性，并增加了炮兵人数。

除了这些，他还改进了革命军的组织结构。在1792年和1793年，法国在战斗师的使用上是走在前列的。他们将步兵、骑兵和炮兵联合起来，创造了一种只有几千人的小型军队，它既可以独立行动，又可以与其他师联合作战。在开始1805年的战役前，拿破仑又发展了这个组织概念，将“师”合并为“军”。“军”在规模上差别很大，可以从少于1万人到接近3万人。在拿破仑的最高指挥下，它们独立成型，与其他军合作的“军”比“师”的运作还要好。“军”这个组织解决了指挥和供应问题。拿破仑指挥的新式野战军往往只是因为过于庞大而无法被一个人有效地控制，将他的军队分成军后，拿破仑就加强了指挥和控制（虽然什么也不能完全消除战场上的混乱）。“军”还改进了后勤供应，因为沿不同路线前进的几个军要比只沿一条路线行进的一支大军更易于补充给养。

但是，拿破仑的机动性要求一个更灵活、更能随机应变的供给体系。古典型军团的指挥官们有了笨重的补给线后，就不会害怕吃不饱饭的军队会开小差或哗变；而法国大革命的士兵们却恰恰相反，希望在需要时能自己搜寻粮秣，同时仍保持他们作为战斗单位的整体性。以乡村为生虽然在战争的关键时刻能使迅速行动成为可能，但也不是什么万灵药，因为虽然当队伍行经富饶的地区时，自己找粮可以保证一支军队的供应，但如果队伍在一个地区停留时间过长，或经过一个贫瘠或者被坚壁清野的地区时（就像拿破仑在俄国所发现的那样），它就不能支持一支军队了。

对他成攻原因的分析中，没有一个能回避拿破仑的天才。作为一个最精通战术和作战的人，他的目的不是简单的击败敌军，而是消灭它。他达到这一目的的典型做法就是“向后方运动”(manoeuvre sur les denières)，设计用来威胁敌人的侧翼和后方。他用自己的部分军队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同时指挥另一部分，通常是一个军，去迂回包抄敌人的侧翼。这能将一次战场失败变成灭亡，因为现在拿破仑的军队已经控制了敌军的退路。在可能的情况下，一次主动追击就可完成战斗的全部任务，就像拿破仑在1806年的耶拿—奥尔战役中一样；他在普鲁士军队战败后，围杀了几乎全部普军。

战功卓著的军队

拿破仑在他的杰作即1805年的战役中将他的军事天才发挥到了极致。法国和英国在1803年再次开战，但是开始时两个对头并未真正交手。法国在布洛涅安营扎寨，威胁着要进行一次从未进行的入侵行动。但当奥地利和俄国、英国联合起来，在1805年组成“第三联盟”时，拿破仑把一切入侵计划都放在一边，于8月全速赶赴奥地利。

拿破仑率领的这支沿莱茵河而下的伟大军队，现在总数约21万人。他另留下5万人在意大利王国，由马歇尔·安德烈·马塞纳指挥。为了对抗后面这支军队，奥地利集中了它的主力9.5万人，由大公爵查尔斯率领。这意味着奥地利人只能在乌尔姆驻守7.2万人，在联结乌尔姆与意大利的蒂罗尔也只有2.2万人。

200

与他以前对付奥地利的战役不同，这次拿破仑准备直接顺多瑙河而下。在不断的运动中，由法国操纵了战争。要塞已经失去了它们在17世纪享有的主导地位，但拿破仑也不能在沿多瑙河前进时，留着乌尔姆来威胁他的后方。依靠就地搜寻粮秣，这支大军于9月26日跨过莱茵河，迅速移师到乌尔姆以东，切断了奥地利人之间的联络线，包围消灭了几乎整个奥地利军队。接下来，拿破仑又挺进维也纳。参战的俄国军队成了他前进的最大障碍，但不顾俄军的努力，拿破仑还是在11月14日占领了奥地利首都。

不过，维也纳也不是他的最后目的，因为他知道只有击败敌人的主力部队，才能将奥地利逐出这场战争。而且这需要尽快完成，因为普鲁士也威胁要参战（这将使拿破仑的任务更加困难）。所以拿破仑定下计谋，要迫使盘踞在维也纳北部的奥地利和俄国联军与他作战。他假装军纪混乱，占据了一个虚设的位置来诱使联军前进。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他的将军米哈伊尔·库图佐夫指挥下的联军吞下了这个诱饵，但即使这样，对于拿破仑的计划它也是不够的。他还不得不引诱联军以一种自寻死路的方式来攻击他。为了达到这一点，他于12月2日在奥斯特利茨对库图佐夫摆出一个看上去很软弱的右翼。这位俄国人被迫拨出大量军队来进行一次横向移动以包围法国人，但那个看起来如此软弱的侧翼已经因为达武军团的到来而得到了加强，这个军团是在夜晚以急行军抵达战场的。在整个英勇的战斗中，路易斯·尼古拉斯·达武阻止了俄国纵队进攻的势头。与此同时，库图佐夫由于抽调军队完成侧翼运动，使自己的中军变得虚弱，而这正是拿破仑所希望的。时机一到，他就指挥苏尔特的大军冲进了俄国中军并摧毁了它，然后折而向右，去

一位士兵自行找粮补给的经历

拿破仑消灭敌人能力的关键，在于法国士兵比欧洲其他军队都行军迅速。皇帝认识到，速度能为他赢得时间，因此不断地强调："在战争中，时间的损失是不可弥补的。"而作为他牢骚满腹的军队中的一员，一位近卫队老兵曾抱怨："皇帝发现了一种作战的新方法：只依赖我们的双腿而不用我们的刺刀。"但这也是一支需要依赖肚子来行军的部队，快速的急行军需要一种不会延缓步伐的后勤模式。

与旧皇家军队的指挥官们不同，拿破仑轻视正规的供给安排，而要求他的军队在行军中自己寻找粮秣。1805年9月和10月，在对付乌尔姆的伟大的"向后方运动"中，他把乡村补给所提供的机动性发挥到极致，当时他的军队在不影响战斗力的情况下，每天要走16到19英里。

一位近卫队士兵的证言将这点阐释得最为清楚。下士让一皮埃尔·布莱兹在参加了这次有历史意义的行军后，给家里写信说：

皇帝在布洛涅检阅了我们。那是1805年8月25日。那天，我们高兴地得知我们将要离开海岸……去到德国作战……我们确信在皇帝的率领下，我们将走向胜利……关于这次沿莱茵河而上的行军，我没有什么值得说的。9月26日，我们跨过莱茵河，没有发现敌人……我们将敌人丢在右侧，以便于在曼海姆过河：9月25日时，子弹就发给了每个人，我们被命令在弗兰肯塔尔兵站卸下所有不必要的东西，使我们能尽可能地轻装……我们的快速行军不允许携带食物，尽管总司令达武将军千方百计地筹措，但我们仍经常没有面包，有面包时也经常是坏的，不能吃。但我们在没有面包的情况下仍能前进，因为现在正是西红柿成熟的最好季节，它们长势极好。我们有多少次毁掉了村民们的希望啊！我们偷取了人家一年的劳动成果，但我得说我们是被迫这么做的。我们本可以抢劫分配那些水果的，那儿有那么多：经过诺伊堡的乡下时，我从没见过这么多苹果：但士兵也吃掉了许多，都吃病了。

1805年，法军从莱茵河出发，在一次大型的"向后方运动"中到达多瑙河，切断了乌尔姆与外界的联络通道及后路。拿破仑让缪拉的骑兵和拉纳的军队通过黑林山，假装进行一次直接的攻击，从而使奥地利人按兵不动。法国骑兵布下的疑阵掩护了大军的行动，法军在一个军的巴伐利亚联军的协助下，在乌尔姆后面挥师而下，跨过多瑙河并包围了这个不幸的要塞。

袭击俄国侧翼部队的后方。联军的中军与左侧溃散了，只有俄国的右翼还能有秩序地撤退。两天后，奥地利人投降。拿破仑的胜利中，没有比奥斯特利茨战役更能改变欧洲地图的了。作为这次战役的一个后果，1806年，已经存在了10个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不复存在，哈布斯堡统治者现在只是奥地利皇帝了。

奥斯特利茨战役本身，就足以为拿破仑赢得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的声誉了，但尽管他有不能否认的天才，他最后还是遇到了失败。有四个原因解释了他的败落：战略上的贪婪；当地人不断增长的对法国占领军的憎恨；敌军中显著的改进和革新；海洋和商业的世界主宰者英国对他的一贯反对。正因为他所具有的所有战术和作战能力，拿破仑成为一个致命的战略缺陷的牺牲品：他既不知道适可而止，也不知道适时而止，因此注定早晚要失败。在懂得如何在战争中一时击败一个敌人的狭义方面，拿破仑显示出伟大的才能：他在1805年、1806年和1807年筹划的战役，有效地将和平先强加给奥地利，然后是普鲁士，最后是俄国。但拿破仑看上去从未有过一个使自己满意、也能保证欧洲长期稳定的终极目标。相比之下，腓特烈大帝在夺取西里西亚、实现了他的野心和目的后曾说："从今往后，我连一只猫也不会攻击，除非是为了保卫我自己。"从一个很确实的意义来说，

达武元帅在拿破仑的奥斯特利茨部署中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因为拿破仑希望他能用小部队抵住俄军侧翼的进攻。事实证明达武是奥斯特利茨和奥尔斯塔特战役中最伟大的元帅之一。在奥斯特利茨前夜休息中的拿破仑（右图）。拿破仑总是在信使们都赶来并汇报了军队的情况和位置后，在深夜拟订他的计划。在拿破仑的左后侧，一群军官正在抄录命令；右后侧睡着拿破仑的来自埃及的马木路克仆人

203

战役前夜，苏尔特军团同时据守法军前线的中部和右翼；战役当日清晨，达武抵达战场并掌控右翼，苏尔特在中部集中力量发动进攻。在奥斯特利茨，拿破仑将俄国人拉进了一场他们最好应避免的战斗。拿破仑诱使俄军去进攻他军队的右翼，以此削弱了俄军中军，从而使法国的一次进攻有机可乘。这场战斗可从三个阶段来看：(1) 俄国人试图用大量军队包围法军右翼，但在达武指挥下的法军顶住了这次进攻；(2) 拿破仑指挥苏尔特的军队进攻现在变得空虚的俄军中部，在激烈的战斗后，法国人突破了俄军阵线；(3) 在中部获胜的法国人折而向南，粉碎了萨昌米尔附近的俄军左翼。

"七年战争"是强加给腓特烈的，他更想要的是持续的和平。而拿破仑却正相反，他看起来似乎总是那么野心勃勃，没有节制。

作为对付其宿敌的卓越预见的部分胜利，拿破仑试图将整个欧洲大陆组织起来，以进行一场反对英国的贸易战。事实上，英国从1803年开始就已封锁了法国港口；现在拿破仑要用他的大陆体系来报复，想将所有英国货物都摒弃在欧洲之外。他先以1806年的《柏林宣言》形成这个体系，然后又扩张它，于次年用《蒂尔希特条约》将俄国也包括进来。就一个国家试图在战时通过使用经济压力来打败敌人而言，这并不是第一个范例，但却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然而拿破仑并没有将所有欧洲国家合并成一个单独的自由贸易区，而是垄断关税以使法国受益；结果，大陆体系更多代表的是法国的主宰地位，而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对抗英国的共同前线。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英国货的排斥已被种种例外和一个强大的黑市贸易修正了。但是，早在1807年法国入侵葡萄牙时，大陆体系的延展或维持已被当成开战的理由；此外，当1810年12月，亚历山大沙皇脱离拿破仑，宣布俄国港口对载有英国货物的中立船只开放时，两个皇帝之间的战争变得不可避免了。

在奥斯特利茨，苏尔特元帅的大军冲进了俄军中军，给予俄国人致命的打击。但他的师指挥官们可能抱怨：在战争最艰苦的时刻，苏尔特并不在场。他已经积聚了如此多的财富和声望，以至于他再也不急于用生命去冒险了

204

西班牙的溃疡和俄罗斯的溢血

当他于1808年任命他的哥哥约瑟夫为西班牙国王时，拿破仑已经在法国的肌体上捅开了一个持续五年的不断被汲去鲜血和资源的伤口。1808年，英国人第一次远征，在葡萄牙登陆并占领了它，但却被逐出了西班牙。从他在葡萄牙的基地出发，阿瑟·韦尔斯利在1809年中又再一次进军西班牙，结果又被打了回来。

弗朗西斯科·德·戈雅在他的蚀刻组画《战争的灾难》中，捕捉到了西班牙人的愤怒与仇恨。这幅画中，一位西班牙农民正挥斧砍向蹂躏他家园的法国士兵。戈雅记录了在西班牙发生的、拿破仑从未能扑灭的“民族战争”的火焰

但是，韦尔斯利，现在是威灵顿子爵，1810年时技巧地保卫了葡萄牙，将驻扎在里斯本外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前的法军拖得精疲力尽，饥饿不堪。1812年，威灵顿再次发动进攻，他的军队虽然受到些挫折，但在1813年取得巨大的胜利。6月21日，在最高潮的维多利亚战役中，威灵顿率领8万人击败了约瑟夫·波拿巴指挥的6.5万人的军队。

通过半岛战争，西班牙游击队员吓坏了法国人，限制了他们依赖乡村补给的能力。法国参谋佩尔特曾描述游击队是如何“企图一点点地消灭我们，袭击小分遣队，屠杀生病和落单的士兵，摧毁补给品，绑架信使”。就像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游击队一样，西班牙游击队也使他们的敌人处于进退两难之中。英国、葡萄牙和西班牙正规军的存在，迫使法国人不能分散与游击队作战；但如果不分散，他们又发现很难既对付游击队又就地自行补充粮秣。如果西班牙和美国的游击队角色很相似的话，西班牙战争的残忍性却将他们区别开来。西班牙游击队员对落到他们手中的法国人绝不宽恕，法国军队面对的是残酷的报复行为。

当“西班牙溃疡”正慢慢地让法国流血时，法国在俄国却遭受了一次大出血。1812年6月入侵俄国时，拿破仑拼凑了一支超过60万人的法国和联合部队的大军，但据最慷慨的估计，他在12月时只领回了9.3万人。他进行的这场侵略，亦即最大的拿破仑式灾难，是希望强迫独立的俄国返回法国的轨道上来，并重新保证他那已摇摇欲坠的大陆体系。俄国人意识到他们的力量在于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有能力用地方来交换时间，所以在法军赢得了不具有决定性的斯摩棱斯克和瓦卢蒂诺战役后，库图佐夫将军拒绝同拿破仑进行他渴望已久的大战，一直到9月7日，在距莫斯科只有60英里的博罗季诺。那天，拿破仑向他的军队发表演说：“士兵们！这是你们渴望已久的战斗。从现在开始，胜利要靠你们了；你们也需要胜利。”事实上，这是皇帝自己渴望和需要的战斗，但他没有充分利用他的机会；他只是简单地率军向俄军阵地发起直接的进攻，当他最终赢得那天的胜利时，已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一份总数为6.8万人的伤亡名单，使博罗季诺成为可载入历史的拿破仑战争中最大的一次流血。

战后，库图佐夫只是在拿破仑的前面采取引诱的步骤，法军于9月14日进入莫斯科，但俄国人不但没有保卫他们的首都，反而烧毁了它，所以拿破仑只是成功地占领了它的废墟，而且由于没能迫使俄国人接受条件，一个月后他开始撤离。因为后勤供应一团糟，又不能依靠冬天光秃秃的原野来补充给养，拿破仑的大军在11月底撤过别列津纳河时已溃不成军。他在西班牙和俄国的损失，再加上他继续不愿削减自己的战略目标，决定了他在1813年试图占领德国和在1814年被迫拯救他的王冠。但在这些最后的战役中，第三个因素也发生了作用：他敌人的能力增强了。

右页下图：滑铁卢战役中，法军在步兵、骑兵和炮兵之间没有足够配合的情况下不断战斗。在这幅英雄油画中，亨利·菲利波托描绘了法国胸甲骑兵对英国步兵方队发起的那次注定要倒霉的冲锋。下午4点钟左右，内伊命令发起的这次进攻，很快就失去了控制，使这支骑兵成为参战的又一支无助的法国骑兵

205

拿破仑曾受益于王朝战争向国家战争的转换。法国大革命已经实现了国家士兵的理想，对它为之战斗的事业和人民做出了承诺。拿破仑利用了他自己军队的国家主义，但当法国的占领激起了那些他曾征服或羞辱的民族的反抗情绪时，他就被击败了。西班牙人对法国的憎恨孕育了拿破仑式战争中最痛苦最残酷的战斗，俄国在1812年的抵抗被证明也毫不逊色，而当再一次被推回德国后，拿破仑又面

对着一次德国起义。

1813~1814年，为推翻法国在中欧的统治而战的德国军队有两个推动力量，一个是他们对法国的憎恶甚至仇恨；另一个是刚刚觉醒的德国民族主义。无论哪种力量，都使他们成为法国强硬的对手。自从1805~1809年的耻辱后，德国的军事改革家们已经进行了组织和战术变革。此外，拿破仑已经教会了欧洲一种新的战斗模式，而且很不幸，他的敌人们都是好学生。

因此，被征服的查尔斯大公爵一马当先，在1805年后对奥地利军队进行了一种改革。他试图在多民族的奥地利领土上尽力建立一支国家军队。1808年，奥地利创立了一支一级战时后备军，或者流行的说法是“民团”，最终人数达到24万人；他们最适于承担后方梯队的责任。查尔斯还从法国那里借来了军队的组织系统。新的操练手册中包括了散兵战术，轻步兵营也出现在军队名单上。他还努力提高骑兵，尤其是炮兵的素质。但在奥地利于1809年与拿破仑进行较量时，这支新军队尚未凝聚成型。所以虽然在1809年5月21~22日的阿斯珀恩—埃斯灵战斗中他们让拿破仑受挫，但拿破仑在7月5~6日的瓦格拉姆战斗中再次击败了他们。

这付胸甲（上图），为索朗索瓦—安托万·福沃在滑铁卢战役中穿用的，是冲锋骑兵（下图）在抵抗炮火时穿戴的胸部护甲不够结实的证据。福沃的命运有一些具有特别代表性的地方。他的一生正好涵盖了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福沃生于1792年，由于胸甲破裂，死于滑铁卢战役，那正是同一个为帝国带来衰亡的致命时刻

1806年在耶拿—奥尔战败后，一系列更复杂有效的改革改变了普鲁士军队。主要的改革家格哈德·冯·沙恩赫斯特，希望建立一支受益于普通士兵的具有献身精神的军队。他写道：“当人们就像雅各宾党人那样知道求助于人民的精神时，我们就胜利了。”而这不只仅仅需要军事行动。因此，1807年10月9日，普鲁士政府发表《解放敕令》，废除了农奴制，与法国人在大革命中所做的很相像。沙恩赫斯特还坚持向所有人开放一个专业的、受过教育的军官阶层，而不考虑他们是否有贵族地位。1808年，一道命令将军官队伍重新定义为依靠才华而不是出身：

因此，就整个国家而言，所有具备这些能力的个人均可在军队编制中得到最

高荣誉职位的军衔。迄今而存的所有社会优先权，在军队编制中也将依此终止，每个人，不论他的背景如何，都有同样的义务和权利。

为了在军官队伍中更清楚地显示这一点，普鲁士的改革者们先于欧洲任何其他国家建立了军官教育机构，包括一所训练参谋军官的学院。沙恩霍斯特还成立了普鲁士参谋部，它在19世纪的战争中变得极有影响。

普鲁士改革的目的在于建立一支民族军队。《蒂尔希特条约》（公元1807年）将常规军限制为只有4.2万人；但普鲁士尽力钻这些限制的空子，另创立了3.36万名受过训练的后备军。1813年，当与法国的战争变为可能，普鲁士就扩充了常规军，成立了新军队。Jäjer（来复枪手）即大部分由中产阶级组成的志愿步枪手，显示了他们的爱国主义；皇家公告召集了一级战时后备队，一种由所有年龄在17岁到40岁之间、没有参加其他军事服务组织的男人构成的民团；而战时后备队（由其他所有人构成）充当了最后一道防线。到1813年8月时，普鲁士的战斗力量已升至28万人。

滑铁卢

1813年，拿破仑的敌人采用了他自己的作战准则来转而对付它们的创造者：他的敌人们变得更富有侵略性，他们不仅寻求击败他，还要消灭他的主力军。18世纪战役的精确和谋略已成为过去，联军不仅要像过去常做的那样，一点点地击败他，还要联合起来，随着炮声行军作战。1813年，在高潮的里斯本战役中，奥地利、普鲁士、俄国和瑞典合起来总数达34万人的联军击败了拿破仑大约20万人的军队，结束了他在德国的统治。在1814年的保卫战中，拿破仑显示出他过去的一些辉煌，但仍在南部遭到了刚挟半岛战争之胜而来的威灵顿军队的攻击，与此同时，东部和西部的几支军队也指向了巴黎。当拿破仑调遣军队威胁普鲁士和奥地利的联络线，以迫使他们在3月底撤退时，他们却将这威胁置之一旁，继续挺进巴黎，这说明他们已掌握了拿破仑式战争的关键。联军齐聚巴黎后，拿破仑宣布退位。

这幅托马斯·劳伦斯爵士所作的肖像表现了威灵顿公爵的英姿。他在印度时掌管士兵贸易。拿破仑起初轻蔑地将威灵顿当做"印度士兵的将军"，但很快就开始尊敬他。1809～1813年，威灵顿在葡萄牙和西班牙指挥了一系列战役，将法国逐出了伊比利亚半岛。接下来，1814年，威灵顿入侵法国，在拿破仑退位前已到达图卢兹。1815年，他在滑铁卢指挥了英国和联军队伍

被打败的郁郁寡欢的皇帝被流放到爱尔巴岛，但他很快就谋划着要重夺王位。1815年3月1日，他在坎耐斯登陆，开始了那注定要失败的"百日政权"。结果自然毫无疑问：欧洲各国对他了解得太清楚了，根本不相信他只希望和平地统治法国的保证。战争再一次开始了，他的敌人已经熟悉了他的战争艺术，不会再成为牺牲品。在滑铁卢，威灵顿与布吕歇尔联手，于6月18日再一次打败了他；而且即使拿破仑赢得了那天的胜利，他也肯定要败在奥地利和俄国的大军前。为

推翻他，两国已经在两国的边界线上集结了大约45万人的大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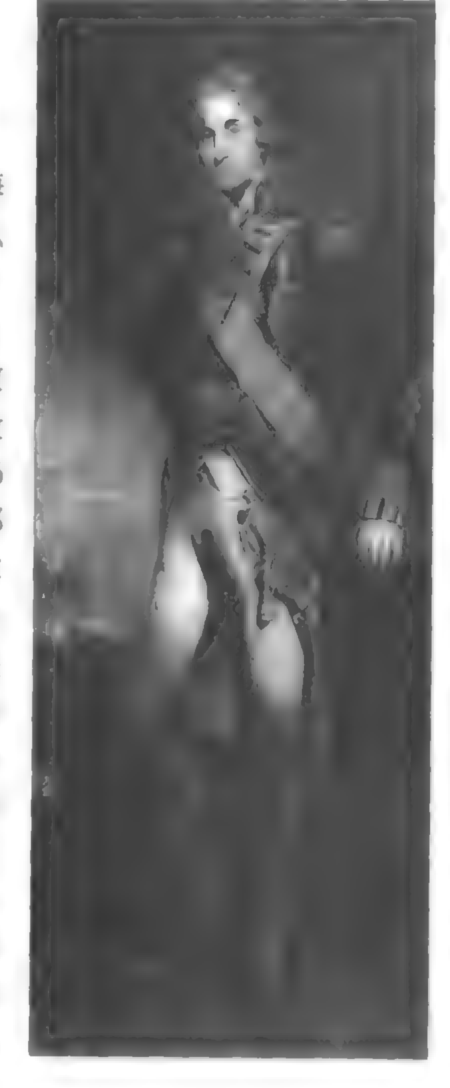
在任何情况下，法国是否继续保有同样规模的野战军已是充满疑问了。1806～1814年间，在拿破仑军中服役的200万法国人中，已经大约有1.5万名军官伤亡，9万名注册士兵死于战斗，另有30万人住在医院，不少于62.5万人被记做“俘虏”或“失踪”，这些是截止到1814年征兵名单结束时的数字。在死者中，8.4万人死于西班牙和葡萄牙，17.1万人死于俄国，18.1万人死于德国。总而言之，拿破仑的战争已经杀死了20%在1790年到1795年间出生的法国男性，即每五个人中死一个（可比较一下，1891～1895年间出生的法国男性，有25%死于一战，即每4个人中死一个）。

法国战败的另一面是英国的胜利。英国从1793年开始就反对法国，一直到拿破仑最后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为止，中间只有1802～1803年这一短暂的间隔。英国一直是海上霸主，它的海上优势为它赢得了商业和殖民财富，使它能为反对拿破仑的陆上战争提供资金。

虽然法国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曾享受过一段短暂的海上复兴，但它自己的大革命却严重地伤害了海军。革命的激情不能像在陆地那样贯彻到海上，因为移居国外或被革命运动清洗而损失的经验丰富的贵族船长们，是不能像步兵军官那样以同样的成员来替代的。此外，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适合于营帐里的生活，却可能与海上生活的义务与纪律不相容。

纳尔逊的果断手腕

法国大革命战争时期，法国与英国在海上曾有过一段时间的对峙，但几乎没有什么结果。1794年5月29日～6月1日，理查德·豪上将赢得了这场长期战争的第一个大海战，史称为“光荣的六月一日战役”，当时他打败了一支法国护卫舰队，但被护卫的商船却设法安全地溜进了法国的布雷斯特港。在1796年的第二次大行动中，法国一支1.3万人的部队试图在班特里湾登陆但却失败了（于爱尔兰的西南部），可是这说明不了什么，因为失败的原因更多的是恶劣的天气作祟，而不是英国舰队的作用。1797年，皇家海军与法国的一些新盟友陷入冲突。2月，海军上将约翰·杰维斯领导下的一支英国舰队，与他的下属海军准将霍雷肖·纳尔逊一起，在圣文森角战役中击溃了一支西班牙舰队；10月11日，在坎珀当战斗中，海军上将亚当·邓肯也永远结束了荷兰同英国的海上竞争。但在英国船舰上发生的哗变却同这些胜利一样重



霍雷肖·洛德·纳尔逊，是英国最著名的海军上将。他12岁那年以一名海军候补生的身份进入皇家海军服役，升职很快，21岁就当上了舰长。他的大胆战术改变了海上战争。他的肖像证实了他个人的勇敢，那空荡荡的右衣袖显示出他在1797年的战斗中失去了右臂。三年前，他还在科西嘉战斗中失去了右眼的视力。因此，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他被一颗滑膛枪弹射中，死在他的旗舰“胜利号”的甲板上，这个事实就毫不令人惊讶了。

要。春天和夏天时，在斯皮特黑德海峡和诺尔河上的英国舰队发生兵变。对前者，海军迁就、调停了哗变者；但镇压了第二次哗变。作为这些哗变的结果，普通水手在海上的混乱生活得到了改善。

1798年被证明是具有决定性的一年，英国应付了法国的两次海陆进攻。法国成功地在爱尔兰登陆了一支小部队，但很快被英国俘获，并由此使英国再一次打败了被派来增援的一支法国舰队。与此同时，在地中海上的尼罗河战役中，纳尔逊彻底消灭了他发现的那支法国舰队。

纳尔逊和英国其他海军将领一起，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改变了海战的性质。18世纪标准的海上战术是纵队向前，需要一支舰队作为一个整体来战斗，一只主力舰接一只主力舰地依整齐的顺序来偏弦齐放。这种战术重视秩序，强调一名舰队将领对其下属的最大控制；但反复再三的纵队向前战术会导致没有决定性的战斗，双方只是互相炮击，难分胜负。战斗指示坚持要指挥官们严格遵守纵队向前的战术，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只是为了这么做而这么做，而不是想打败敌人。这正是适用于那位倒霉的海军上将约翰·宾的例子：一个海军法庭发现他于1756年梅诺卡外的一场败仗中没有尽全力后，便以此罪名枪决了他。

与纵队向前战术相比，混战战术将一支舰队的作战改为打破敌人的编队，进行一系列一艘船对一艘船的战斗。这意味着要放弃对整个进攻舰队的命令，而依赖于每位船长的经验和创意。从理想上说，这种混战战术有某种取胜的法门，那就是在向敌人发起进攻前，应设法将多出的人数或较好的位置转化为作战优势。

历史学家们很久以来都批评纵队向前战术的僵死，而称赞混战战术，就是因为纳尔逊应用了它，尤其在他的杰作——特拉法尔加角战役中利用了它。但混战

克拉克森·斯坦菲尔德关于特拉法尔加战役的绘画，捕捉到了纳尔逊的“胜利号”（中心偏右），与“可畏号”（正在其左部）和“Bucentaire号”（右边船尾朝向观者）之间的较量场面。在左方远处，科林伍德的“皇家统治者号”正在另一点冲入法—西联队编阵在最右处是“Santissima Trinidad号”，载有130门炮的世界上最大的主力舰。纳尔逊战术体系的关键是冲进敌人的战斗编队，以船对船的混乱方式作战。这幅战斗景象显示的是致命的看上去混乱不堪的激战，正是典型的“纳尔逊式的果断手腕”的写照

战术只对那些拥有更好的舰长和船员的舰队有利，因为它是极其依赖于一艘战船对另一艘战船的优势的。到18世纪末，英国恰好在船长和船员的素质上优于它的陆上对手，只要有机会咬住敌人就能赢。纳尔逊意识到了这一点，带头使用了这一战术，但他既不是惟一的，也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英国海军上将。豪在1794年“光荣的六月一日”中就对法国人使用了这种混成战术，杰维斯在1797年的圣文森角之战中也使用了。

210

在特拉法尔加，纳尔逊用混成战术为自己赢得了巨大的声望。在1805年的那场战役中，纳尔逊经常与他的舰长们商讨，直到那群“兄弟帮”理解了他的目的和方法。他记录了一次他和舰长们的会议：

当我开始向他们解释“纳尔逊的果断手腕”时，那就像一次电击。有些人流下了眼泪，所有人都表示赞同……从上将往下，大家不断地重复着——“这一定会赢，只要能让我们抓住他们！天哪，你是是被你用信任激励起来的朋友们包围着的。”

只要和法国人撞上，纳尔逊是能依靠他舰长们的能力和那些生活在索具里、大炮上的英国水兵们，去赢得一场大战的。在西印度洋似乎是对法国舰队徒劳无益的搜寻后，10月21日在特拉法尔加角外，他终于碰上了由皮埃尔·维尔诺夫指挥的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后者正试图获得加的斯的安全庇护。纳尔逊指示他的舰长们他想分两队进攻，分别由他自己和卡思伯特·科林伍德率领。11:48分，正当两支舰队要相遇时，纳尔逊命令打出旗语：“英国期待着每个人都克尽职守。”两个英国分队打乱了敌人的纵队，纳尔逊冲着联队的先锋部队驶过去，而科林伍德是拦腰而过。纳尔逊的旗舰“胜利号”冲入敌舰队时，与一艘法国的“74型”战舰“可畏号”缠斗到一处，“可畏号”的滑膛枪火力打倒了“胜利号”上许多船员，并致命地打伤了纳尔逊。但正如这位奄奄一息的海军上将计划的那样，一旦英国人打乱敌人纵队，导致一场混战，就等于得到了胜利。英国海员的技术使纳尔逊的战舰能挫败联队，并将优势火力集中对付落单的联队战船。到这一天结束时，英国人已击沉一艘敌舰，俘虏了另外17艘。

211

1805年后，英国继续对海上保持警觉，并继续扩充自己的舰队，法国再也没能与英国在海战上争雄。但英国却的确对许多法国岛屿、哥本哈根和安特卫普进行了一系列水陆攻势，更不要说为了打击新成立的美国而在1812年战争中发动对华盛顿和新奥尔良的攻击了。但在战争中最成功的海陆行动，却是英国于1808～1813年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进攻（参阅第185～186页）。显然，如果没有海上的控制权，大不列颠的陆上战斗将难以想象。

英国：商业和帝国的霸主

但是，英国的海上力量为其赢得的主要好处可能是殖民地和商业利益。随着法国海上力量的消耗，西班牙变得无足轻重，再加上它们经常在战争中是“错误一方”，英国在海外和世界贸易中可谓一手遮天。战争期间，英国就已从法国那里

抢走了许多殖民地（此外，拿破仑还聪明地放弃了路易斯安那，将这块他不能保卫的北美的最后一片法国土地卖给了美国）。英国横扫了法国商船所要经过的海洋，而法国人所能做的报复行为就是建造强有力的袭击舰，对英国商船单独作战，捕获消灭他们发现的一切船只。其他反对英国的国家也冒险从事殖民和贸易活动。因此，1795年，英国夺取了荷兰的科勒尼角，后来虽然在《亚眠条约》（公元1802年）中将它归还给荷兰，但在1806年又把它夺了回来，这次是一直到20世纪才归还。

在与法国的长期争斗中，英国得到的最重要的殖民地收获不是在美洲或非洲，而是在印度。像以前的例子一样，印度的战争遵循着其自身的逻辑和时间表。一旦占领孟加拉，便对印度土兵大军的拥有成为可能，英国东印度公司从1766年到1805年，与两个主要对手——迈索尔邦和马拉德斯展开了一系列的冲突。南印度迈索尔邦与东印度公司的新军事力量进行了四次战争。在1766～1769年的第一次战争中，海德尔·阿里在与公司军队的战斗中表现得很有战斗力；但在1780～1783年的第二次战争中就难以招架了，虽然这次还有一支法国海军中队在印度洋中为其助阵。1789～1792年的第三次迈索尔战争是斗争中最重要的一次战争，虽然英国人在对付迈索尔的轻骑兵上遇到了很大困难，他们仍利用马拉德斯的轻装马取得了胜利。为了买到和平，海德尔·阿里的继承人蒂布·苏丹——将自己物产最丰饶、人口最稠密的土地割让给了公司，所以在1799年的最后一次战争中连有效的抵抗也组织不起来——战死在保卫首都的战斗中。这次短促的战争，是阿瑟·韦尔斯利即未来的威灵顿公爵的第一次战斗。

韦尔斯利在接下来的殖民戏剧中将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因为东印度公司利用马拉德斯的内战，在1803～1805年的第二次马拉德斯战争中向他们以前的盟友发起了挑战。尽管被内部分裂削弱了实力，马拉德斯人仍打得很出色；韦尔斯利后来评价说，1803年9月23日，他在阿瑟耶的那次胜利，是他整个军事生涯中打得最艰苦的一仗。对迈索尔和马拉德斯的胜利为东印度公司赢得了对德干高原的控制权，这个成就可与对孟加拉的掌握相媲美。在这些冲突中，东印度公司懂得了印度当地战争方法的价值，并在部署公司军队的火力优势时，还利用了印度对手政治上的弱点；它正是凭借这几点才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在与大革命和拿破仑法国对抗的商业及殖民阶段，英国成为一个世界贸易巨人。它充分利用了工业革命的起始地优势，扩大了英国商业贸易的力量。工业革命虽然还未改革真正用于战场的武器，但它在英法对抗中，通过增加英国的财富影响了战争进程。18世纪出现了一些最终改变了纺织工业的基本发明，这些发明都与蒸汽和水力的改进有关。1740到1806年间，英国钢铁工业从1.7万吨增长到26万吨；到1813年即维多利亚之年，已经有3000台机动织机在英国使用了。是生产和贸易给予英国财富，使它能为自己对抗拿破仑的战争提供资金，并资助那些与拿破仑在战场上英勇搏杀的大陆国家。

英国人拥有欧洲最合理、最有效的战费体系。为了支付他的军队和战争费用，拿破仑掠夺了欧洲，这种方法即使能弄到足够的经费，却也疏离了归顺的民族和不甘心的盟友，从而为他的衰亡铺下了道路。相比之下，英国却将筹集战资的能力建立在它的政府、信贷机构和商业上。英格兰银行不断证明了它以低息筹贷的

能力，而国会也建立起一个令人欣赏的偿付债务的记录。作为世界工厂和仓库，尤其在战争中，没有任何国家能像英国那样受益于贸易税收，尽管为了其支付战争账单税率也确实上涨了。

英国的财富允许它资助一个又一个反法联盟。拿破仑法国的主要敌人们可能依靠了这些款项，但不能据此就说英国承担了这些战费的最大份额。1805年，英国答应资助“第三联盟”的成员国，保证每征募10万人，它就每年支付1.25万英镑。但这个数目，按奥地利的估计来看，只能支付奥地利战争费用的1/4。因此，这些资助看上去，除了是实际帮助外还有鼓励作用。英国也向它的盟友们提供武器，例如，在1813年重新装备普鲁士军队的大量武器都来自英国。由于有海军防卫，拿破仑最终也没发动对英国的战争，但英国却能找到对法开战的大陆盟友；所以，除非拿破仑同意将他的帝国限制在这位商业巨人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否则他就不能逃脱挫折和失败的命运。

213

美国和法国革命永远改变了战争的性质。在这些革命发生前，虽然荷兰和英国的例子已将局面做了某种程度上的修正，但国际间的战争仍是国王和亲王们之间的王朝事务。当革命或改革使一个民族在社会中有了更多的机会，在政府中有了更多发言权的时候，就已经从自我主体到整体国民地改变了这个民族，那些国民将把国家的战争看做是他们自己的战争，战争也因此变成国家武装之间的竞争。

政府、社会和（必然的）动力上的激烈变革并不是发生在同一时刻，甚至不是在同一个十年里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18世纪晚期，美国和法国的革命和代表机构使他们成为这股潮流的带头人。但在更早的时候，英国人在他们孤立的历史和17世纪对君主政体的国会胜利基础上，也已经发展了具有他们自己特点和品质的民族主义。19世纪晚些时候，民族主义还刚刚渗入到意大利和德国人民中。到1813年时，这个概念已在知识阶层有了市场，并成为政治和战争的一个因素。未来人们将看到，全欧洲都将以不可预知的血腥后果，投入到民族主义的湍流中去。

1913年，骑兵军官正在检阅英国的空中力量。

第四部分　机械化战争的时代

第十二章 战争的工业化

在1815年平定欧洲各国之间已持续25年的战争，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但是胜利者们同意他们拥有一些共同利益，尤其在控制已席卷欧洲的民族主义的目的方面。但对欧洲而言，和平最重要的可能是那种普遍的精疲力竭，没有一个国家会为了解决领土纠纷或考虑到称霸野心而愿意诉诸战争。虽然在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之前或之中，在英国发生的工业革命已为英国带来了闻所未闻的财富和经济实力，但他们仍乐于在控制世界贸易的同时，在欧洲大陆上保持一种力量平衡。

胜利者们还同意给予法国人一个温厚的和平：他们将君主政体和1792年的疆土归还给波旁王朝。但如何解决东欧及德意志各政权之间的问题与冲突，却比处理战败了的法国的问题更困难，因为法国征服带来的影响已经如此扰乱了德国的生活结构，以至于没有什么解决方法能将中欧的时钟拨回到1789年。此外，俄国人对东欧尤其是波兰，怀有极大的野心。

最后，政治家们终于推敲出一个可以接受的方案。俄国实际上接收了整个波兰；作为交换，普鲁士得到了与法国相邻的莱茵河沿岸的领土，以防止复兴的法国再进入德国西部。这些收获为普鲁士提供了两个重要的好处：首先，由于将它的大部分波兰土地换成了德国领土，它已变成一个民族成分相对单一的国家；同样重要的是，它得到了一个不出名的河谷——鲁尔的控制权，这里将成为工业革命的第二大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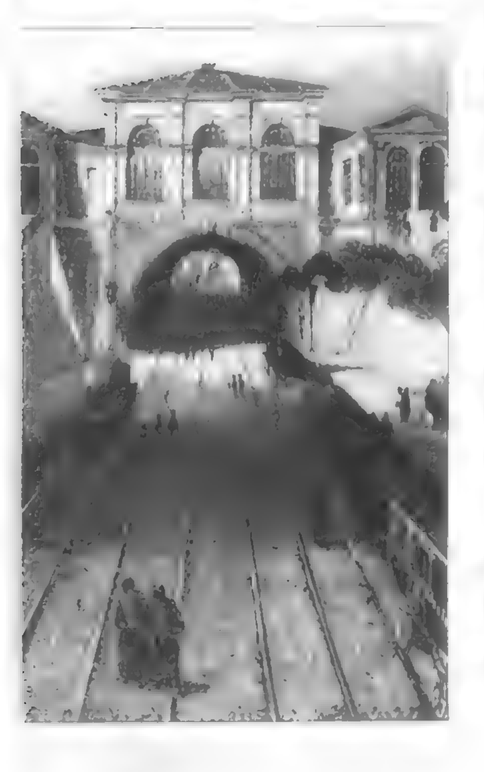
由于兼顾了所有主要国家的利益，维也纳会议成为西方文明史上最成功的谈判会议之一。它的确有一些欠缺，最明显的是不断增长的民族主义威胁，但就整体而言，这次会议为主要国家之间保持力量平衡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此基础是被关于1792年和1815年的战争灾难的记忆强化了的（它帮助抑制了野心家，直到另一代人掌权）。

1815年后，欧洲因此享有一个从未有过的和平发展时期。当然，也有一些政治上的困难。1830年，一场法国革命将波旁王朝赶下了台，虽然其结果只导致了一次改朝换代而已；同时布鲁塞尔的骚乱也带来了低地国家的分裂。1848年，一个对秩序更严重的挑战发生了，而且麻烦又起自法国。但是这次它并没局限于法国边境，而是蔓延到了中欧。维也纳会议建立起来的意在扼杀哈布斯堡和德国土地上的民族主义的控制体系，在一周内就崩溃了。最后，只有俄国的干涉才帮助镇压了起义的匈牙利民族主义者，保证了哈布斯堡君主体制的统一。

在普鲁士，保守主义者开始对革命力量无能为力，但在法兰克福召开的代表大会也不能在革命的形势下统一一个新德意志国家。一场殊死搏斗后，保守主义者又重新控制了局势。普鲁士国王拒绝接受法兰克福大会为他提供的一个新德意志国家的王冠，并嘲弄地说他可不愿接受一顶来自阴沟的王冠。从广义上来说，1848年的革命失败了，但它却显示出在欧洲的平静下面蕴藏着深刻的民族主义。

1837年的巴黎——圣日耳曼铁道线。铁路改变了全欧洲的经济结构，但只有普鲁士觉察到它的军事用途。他们既根据经济需要，也根据战略需要来发展铁路。结果，进入19世纪60年代，他们已能比任何潜在的对手更迅速地将大规模部队部署在边境一带，并予以及时的支援。

217



克里米亚战争

俄国在避免1848年革命和镇压匈牙利民族主义者方面的成功，鼓舞着沙皇在巴尔干采取一种更有侵略性的政策。奥斯曼帝国已经是一个衰朽虚弱的国家，无力面对西方的工业和科技挑战；但它却具有一种几乎永不枯竭的、在自己的灾难中生存下去的能力。俄国人希望能利用奥斯曼的虚弱，英国人和法国人却对此提出了异议。他们尤其是英国人不能允许俄国在土耳其的崩溃中占便宜，希望能阻止俄国拥有对地中海的直接入海口。

1854年，一支俄国军队越过多瑙河，侵入奥斯曼领土；英国和法国对俄宣战，并派兵到康斯坦丁堡保卫土耳其。即使在多瑙河南部的战斗发生前，奥地利已经参战并表现出对俄国1849年援助的令人吃惊的忘恩负义：他们要求沙皇从奥斯曼领土上撤军。俄国人答应了，撤去了开战理由，但英国和法国领导人仍决定给俄国一个教训。结果是克里米亚战争爆发。

从某些方面说，这场战争是战争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但从另一些方面看，它又倒退到了18世纪的“有限制的战争”。第一次，科学技术在战场上发挥了直接作用。为复线滑膛枪发明的锥形来复枪弹（那种枪膛里制有螺旋线的滑膛枪），使得步兵能举枪击中300码外的敌人（这种铅弹底部是中空的，用爆炸冲力推出弹身并使其正好契合来复线所给予的速度和方向。因此将滑膛枪的杀伤射程提高了三倍）。同样重要的是海上汽船的出现：英国和法国已经能很轻易地运兵到土耳其和克里米亚。最后，电报使得在巴黎和伦敦的政府能与战场上的指挥官们保持联络；此外，报纸的通讯员们也能在几天而不是几周内，为编辑们弄到报道的消息了。但尽管有科技上的进步，参战的政府却均未能就一场全面战争发动起大众的热情和民族

克里米亚图 虽然法国和英国袭击了巴尔干上的目标，而且在北冰洋和太平洋上展开小型行动以对俄国实行完全封锁，但克里米亚仍是他们的主要目标。他们的汽船将大量军队运到半岛，并在那里支援它；而俄国却由于没有通行该地域的铁路而难于供应兵力。1854年9月，联军登陆，意在冬天到来前，夺取俄国黑海舰队的主要基地——塞瓦斯托波尔。但他们没有考虑到塞瓦斯托波尔城防的复杂性，以至于这场围攻持续了一年。

218

主义精神，克里米亚战争只是一场为很含混的问题而战的冲突，最重要的莫过于参战者的生还。

俄国从多瑙河北部撤军后，英法指挥官决定入侵克里米亚，进攻俄国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海军基地。1854年9月，联合舰队将英法联军很随意地运到克里米亚海岸登陆，幸运的是没有俄国人阻挡他们。联军然后向南挺进塞瓦斯托波尔。路上，他们遭遇了驻守在阿利马河高地上的一支俄国军队。英国人在左侧发起的一次进攻压住了守军；在排成横队前进的英国士兵进入敌人滑膛枪射程之前，他们复线滑膛枪的准确射击，已经杀死了大批排列成密集纵队的俄国人。阿利马的胜利反映出的是联军科技上的优势，而不是训练或纪律上的出色。

219

联军到达塞瓦斯托波尔后所组织的一次立即发起的进攻本可以拿下这个港口，但是法国人极为谨慎小心，他们为围攻做准备的时间使得俄国人完善了他们的防卫。在冬天结束军事行动前，俄国人曾两次试图突破围攻，进入被包围的港口。在巴拉克拉瓦，经过一团杂乱无章的战斗构想和误会后，英国骑兵攻击了位于一个长河谷尽头的俄国炮兵阵地。这完全是光荣的无望之战，“轻骑的冲锋”被添入了英国那份长长的英雄式的失败名单上。但是那天结束时，联军仍处于俄军和塞瓦斯托波尔之间。第二次解救港口的尝试也未成功，在英克曼战斗中，联军的膛线枪完全控制了战场，俄国人伤亡1.2万人，而联军只伤亡3000人。

220

随后的冬天平息了这个地区的战斗，而英军对此没有做好准备：它的补给体系瘫痪了；前线和医院的情况很快就令人怵目惊心；只有一些军官可以在他们的游艇上过冬。但对代议制政府的国家来说，高级军官们可以忽视普通士兵苦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英国记者们报道了军队在这种可怕情况下的遭遇，公众的呼吁导致了真正的改革，英国军队由此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

简而言之，克里米亚的冬天无情地毁掉了英军，法国人和彼德蒙特人不得不承担起1855年的大部分战斗。俄国人又企图进一步救援塞瓦斯托波尔，但又一次被联军的科技宣告失败。在8月中旬的最后一次救援尝试中，俄军又承受了8000人的伤亡，而联军却不到2000人。9月8日，法国人冲进马拉科夫要塞。有史以

巴特勒小姐的一幅油画：《点名》。虽然俄国军队在克里米亚损失了大约50万人，但联军也遭受了严重伤亡，他们的供应系统在黑海沿岸冬天的严酷条件下瘫痪了。军服不足；配给食物在能提供的时候也不能吃；一个无能为力的医疗体系更加重了这种不幸。但与以前的战争不同，英国的阅报公众通过报纸了解了情况，这些报纸都派有战地记者，他们用电报将稿件传回了伦敦

来第一次，带领进攻的军官们对表统一时间。这次进攻成功了，它使得港口的防守瘫痪。

最后，克里米亚战争并没有什么作用。它只是暂时阻止了俄国在巴尔干的野心，将土耳其的崩溃又推迟了一个世纪。但是，过去是战术水平决定战果，而武器的进步却表明，现在科技已成为战场胜利的关键。谁在它的军队中认识并利用了这个变化，谁就将对其敌人享有一个重要的优势。

美国南北战争

美国南北战争是19世纪最重要的战争，因为它是第一次敌对政府都利用了人民对席卷西方的工业技术的那种法国大革命式的激情。首先，对立双方都摆出了决不妥协的立场：对北方来说，不恢复联邦就没有和平；对南方来说，没有独立也没有和平。但双方在开始时都低估了对手的政治决心。大多数南方人相信，只要对怯懦的北方佬打几个速胜仗，就能保证胜利；而大多数北方人也相信南方人民反对分裂，几个胜利就能让分裂分子的阴谋破产。

北方当然拥有很明显的优势。它的人口几乎有2500万，而南方却只有900万（其中300万是奴隶）。几乎全部主要的工业中心和大多数国家铁路都在北方。此外，联邦政府还控制了海军和陆军，以及大量的国家官僚机器。但南方也有一些其他优势，首先就是地理上的，从中佐治亚到北卡罗莱纳的距离大约是从东布鲁塞尔到莫斯科的距离；从路易斯安那的巴吞鲁日到里士满超过了从法德交界到波兰东部边境的距离。使“出兵对南方作战”更困难的还有一个事实：这个地域的许多地方都是原始荒野，尤其是西部。虽然东部战场离北方工业中心要相对近一些，但联邦的西部军队，如开罗、伊利诺伊军队的出发点与北方工业中心却相隔1000多英里，如果没有铁路或汽船的话，北方将不可能利用经济实力来承担这场战争，甚至有可能输掉它。南方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它不必一定赢得胜利，只要阻挡住北方的军事行动，它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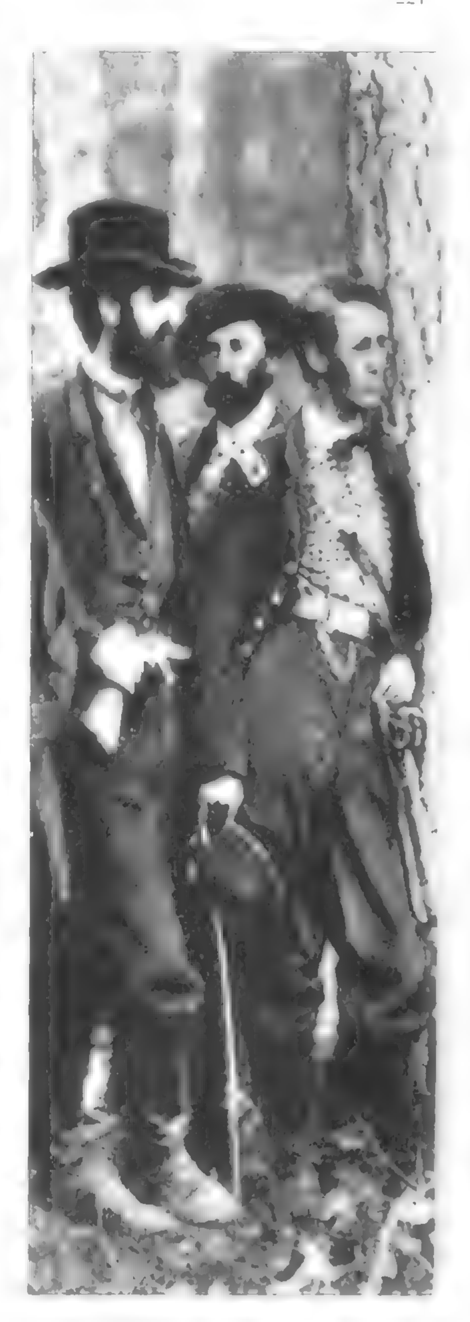
双方都面临着从无到有创建有战斗力的军事力量的难题。正规军只比用来吓唬印第安人的保安部队多一些；军队中没人接受过领导大军的训练和准备。就像大部分美国军事史一样，南北战争是一段临时拼凑军队、在战场上学习的经历。如果说军官们对战争所知甚少的话，政治家们就是一无所知了：亚伯拉罕·林肯曾绝望地命人将国会山图书馆中所有军事史方面的经典著作送到白宫。他最后虽然成为一位著名而成功的战时战略家和政治领导人，但这几乎完全归功于他天生的直觉和智谋，而不是任何严肃的学术准备。

双方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召集、训练和供应大批军事人员。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南方在这点上又享有了一个重要优势。因为它没有正规军，所以那些从联邦军队中辞职、为邦联而战的军官们分散到了各州的民团组织中，在那里他们的经验提供了一定的基础知识。而在北方，正规军仍保存着，并拒绝为训练志愿军与它的军官们分开。

军队本身还保留着一种普遍的平民性。即使被认为是南北战争中最“盔明甲亮”的波托马克军队，从照片上看，对着装整齐这一点也显得随随便便。但在正

温菲尔德·斯格特·汉考克将军的下级指挥官和参谋们正暂时休息以进行深思熟虑。到1864年时，联邦军队已经包括了一个有高度战斗力的参谋和指挥体系，由正规军和志愿兵军官组成，他们都是在战场上学会自己这一行的这些人可能在军服的考究上显得有些随随便便，但他们却拥有充沛的精力和称职尽守的领导能力

221



确的领导下，这些军队所忍受的牺牲，却是美国军事史上很少有军队能比及的。葛底斯堡战斗中明尼苏达第一军的表现就是一个实例。1863年7月2日，它承受了80%的伤亡；但第二天下午，它所剩无几的幸存者又站在了准备接受皮克特冲锋的队列里。

开战那年即1861年，林肯表现出非凡的政治才能：那一年北方的胜利与南方政策的错误形成鲜明对比。一个很重要的战略问题，就是谁将控制毗连各州。在马里兰，联邦政府为了威慑分裂分子，在安纳波利斯采用了直接军事干涉的政策。在密苏里，忠于联邦的当地政治家和士兵们控制该州，赶走了邦联支持者，但在后方乡镇却开始了各色游击战。联邦在肯塔基也中了奖，此州的立法机构和人民仍对联邦保持忠诚，但州长却赞同分裂。在僵持不下中，它宣布中立，但南方军队的侵入却迫使州中那些支持联邦者真的支持了北方。

222

除了丢掉毗连各州外，南方领导人还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扣押了棉花船，以迫使欧洲国家干涉这场内战。这种希望是不切实际的：英国和法国的相当一部分人民支持统一的联邦，而且英国一直面对着如何阻止加拿大从北部入侵的问题。最后，棉花禁运剥夺了南方的大量收入，并在联邦的封锁还处于初级阶段时，就使自己失去了进口大量武器弹药的机会。

东线的战争

1861年的军事行动突出表现了双方在战争准备上的欠缺。在"痛打南方士兵"的压力下，面对着大多数只有90天服役期的义勇军很快就将返家的事实，联邦的高级指挥部命令军队出师华盛顿，到达马纳萨斯。接下来的布尔云战役中，每件事都从英雄主义变成了闹剧，一群国会议员居然带了女眷出城观看战况，结果却是南方军队险胜此役。在以相当的英雄主义进行战斗后，傍晚时分，在南军的一次反攻面前联邦军队崩溃了，他们恐慌四散，一直跑回华盛顿。

布尔云的战败显示出联邦希望以一场战役结束南北战争的想法是多么不切实际。林肯意识到有长期征兵的需要，并任命一位聪明的年轻将军来指挥军队。麦克莱伦将军，他的军队都亲昵地称他"小麦克"，是一位伟大的教练员和自我宣传家，但他的才能也就止于此。他将自己当成拿破仑的后继者，却将林肯叫做"那个猩猩"，可他并没在战场上显示出什么能力。他是一个对不可知的事物充满畏惧的人，因此总将敌方人数估计得太多，几乎任何事都能作为他按兵不动的借口。

尽管政治压力督促他动用正在训练的军队，麦克莱伦却拒绝在1861年剩下的日子里进行一次大型军事行动。1862年，他计划让他的波托马克军队沿詹姆斯河而上，进攻当时的邦联首都里士满。春天时他开始这次行军，并达到了普遍的惊奇效果。应该承认，他的确没得到进攻需要的全部队伍，因为林肯希望保护华盛顿免受邦联袭扰，故此留下了一个军，但麦克莱伦仍享有超过对手的相当大的优势。詹姆斯半岛上的前进是一次缓慢的行军，占人数优势的南军总是困扰着这位过分审慎的联邦指挥官。

223

到5月底时，麦克莱伦终于来到了里士满门前，并准备进行一次广泛的围攻。但邦联军队也准备好了。在罗伯特·E·李将军的天才指挥下，他们发动了一系列

勇猛的反攻，将麦克莱伦和他的军队赶回了他们的补给船。并不是所有的邦联进攻都成功了，莫尔文山战斗就是一场灾难，但李已经达到了对敌人的完全支配和操纵——一种让波托马克军队再也没恢复元气的打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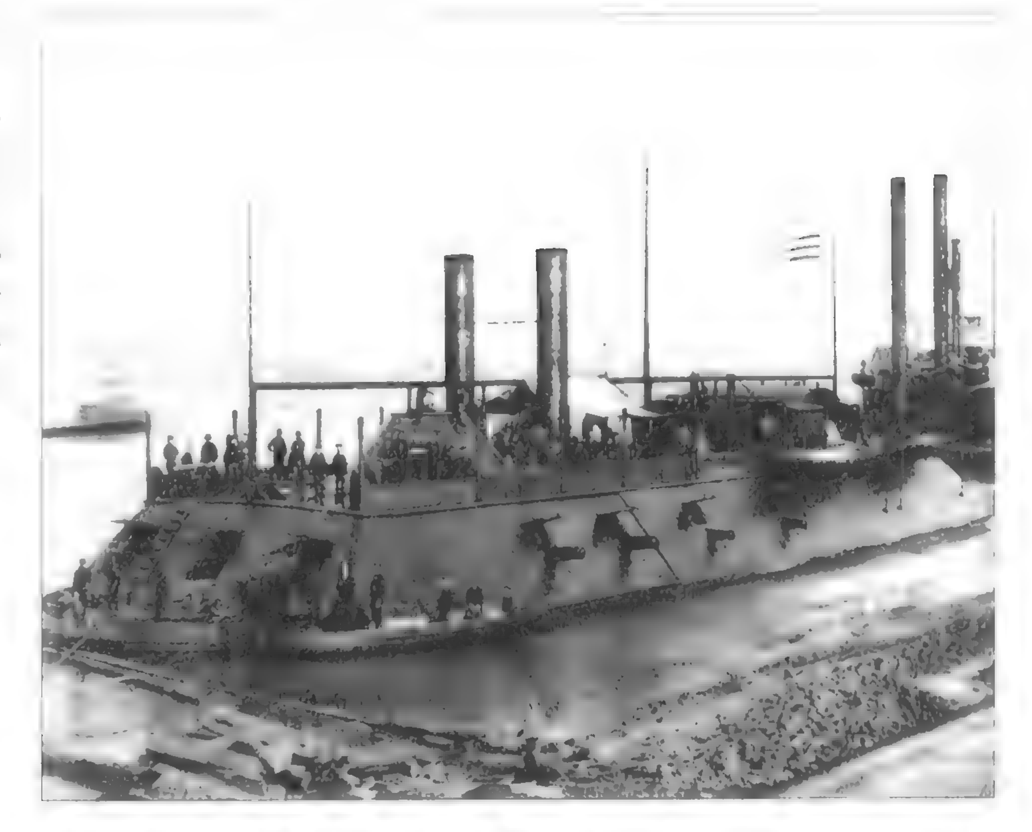
麦克莱伦的无能、粗鲁和傲慢，使林肯在詹姆斯半岛远征结束前，就撤掉了他的军队总司令一职。现在，里士满前线的战败促使林肯在北弗吉尼亚任命了一位新指挥官约翰·波普，一位来自西部的成功而又好斗的将军。就职伊始，波普就对他的新军队宣布：西部的士兵们永远不会习惯背对敌人；他很快就和部队及下级指挥官们结怨。结果是第二次布尔云战役中的另一回灾难性失败。在此战中，李让他的下属"石壁将军"托马斯·杰克逊和詹姆斯·朗斯特里特去迷惑波普，并最终击溃了他的军队。在麦克莱伦从詹姆斯半岛仓皇逃回而波普也处于一团混乱后，李侵入了北方。北弗吉尼亚的军队开进了马里兰，杰克逊也在弗吉尼亚的哈普尔渡口摧毁了一支联邦军队。

由于受到李行动的威胁，林肯又重新任命麦克莱伦为波托马克军队的指挥官。让联邦幸运的是，李的作战计划落到了他们手中，但即使这时，麦克莱伦还是以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小心翼翼来行动，从而使邦联能在最后关头集中他们的军队。结果是安提塔姆战役，美国军事史上最血腥的一天，总伤亡人数超过了2万。麦克莱伦对邦联横队发起了三次大型进攻，每次都有一线进展，但邦联军坚持顶住，而麦克莱伦却不顾敌人已处于崩溃边缘的事实，拒绝派出后备军。麦克莱伦宣布获胜，但最多是打了个平手。可林肯却抓住一次战场"胜利"的机会，签署了《解放宣言》：从1863年1月1日起，所有在反叛各州土地上的奴隶都将获得自由。林肯的宣言是对南方社会结构和文化的一次直接进攻；对"赢得战争需要什么"这个问题很少再有错觉了。

224

麦克莱伦强烈反对解放奴隶，他大言不惭地宣扬他如何拯救了北方，但又表

美国军事史上最血腥的一天发生在安提塔姆的战斗中，时间是1862年9月17日。2万美国人被杀或致残。在"血径"上（如詹姆斯·霍普上尉这幅无法修复的残画所显示的，他在安提塔姆为佛蒙特步兵部队充当侦察员和地形工程师），联邦的一次大进攻冲击了一个巩固的沿塌陷公路而设的邦联阵地。结果是一次屠杀，联邦军队向整个战壕开火，屠杀他们的敌人



1862年，密西西比河上的美国船只“凯罗号”。南北战争时，北方军队在西线享有的一个重要优势就是大型的汽船舰队，一些船配备了大炮，另一些则做运输之用。这使得他们能有效利用从田纳西、肯塔基、阿拉巴马和密西西比州流进密西西比河的巨大水路网系。

现出无意与李将军再战。林肯厌恶地永远解雇了“小麦克”，任命安布罗斯·伯恩赛德为波托马克军队的指挥官。伯恩赛德是一个更好斗的人，但也更无能。12月时，他命令军队进攻弗德里克斯堡一个无法攻破的南方阵地，惨重的人员伤亡导致他被撤职。

西线的战争

1862年的西线战事对联邦更有利。1862年初，一位不出名的联邦将军——尤利塞斯·S·格兰特，进攻了守护坎伯兰河和田纳西河通道的两个要塞：亨利和多纳尔森要塞。它们的被攻占开启了两条河流，为联邦确保了肯塔基州，并使联邦炮舰能全途沿田纳西河上溯至阿拉巴马州的马瑟尔浅滩，他们在那里切断了邦联仅有的一条东西铁路。

格兰特的军队然后溯田纳西河而上，到达夏洛。4月时，他一边忙于练兵，一边等待着卡洛斯·比尔将军的军队到来。但阿尔伯特·西德尼·约翰斯通将军的邦联军队却先到了，这让格兰特大吃一惊。有那么一刻，看上去邦联军可能会将格兰特的军队赶进田纳西河了。但夜幕降临，经过一天的厮杀后，比尔也及时赶到了。第二天，格兰特和比尔反将邦联军完全赶出了这个地域，北方取得了南北战争中第二个重要胜利。

在夏洛的两天战斗中，双方均伤亡惨重，步兵部队利用膛线枪来固守阵地，互相开火。拿破仑式的战术已被证明不适应当今的技术进步。同样的结果在1862年的许多场合重复出现，但惨重的损失却为格兰特赢得了心狠手辣的名声。北方的民众们尚不了解这场战争将耗资巨大。夏洛之战还反映出南方对北方的抵抗程度，正如格兰特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评述的：

彼得斯堡的邦联战壕（公元1865年）。到战争最后几年（公元1864年和1865年），双方军队在利用战壕方面均已技巧娴熟。李在彼得斯堡的防守体系是用来保护邦联首都里士满的，结构复杂、位置适当、能够相互援助。刺栏（照片中尖头金属桩的装置），扮演了倒刺铁丝在一战中将要扮演的角色，它的防护是如此出色，使得直接进攻几乎无法成功

一直到夏洛之战时，我仍和成千上万名国民一样，相信只要能对南方的任何一支军队获得一次决定性胜利，就能使反对政府的反叛迅速突然地垮台。多纳尔森和亨利要塞就是这样的胜利……但当邦联军队聚集起来，不仅是试图守住一条阻止继续向南的防线……而且顶住了进攻，并做出如此勇敢的努力来重新夺回已失去的土地时，事实上我不得不放弃了以前的所有念头，我已明白：只有完全的征服才能拯救联邦。

夏洛和安提塔姆之战后，防守者开始不断求助于修建掩体和挖战壕，而进攻者就必须面对跨越死亡区的问题——一个直到一战结束才找到解决方法的问题。

226

联邦在夏洛的胜利开启了进军密西西比州的科林斯之路，而且可能也打开了这条大河。美国海军已经占领了新奥尔良，沿河一带的邦联据点全处于被攻击之中。但在西部的联邦军指挥官，直接听从格兰特和比尔军队指挥的亨利·哈勒克将军开往科林斯的行军，使得麦克莱伦的行动看上去快如闪电。1862年的剩余岁月目睹了联邦军在西线残局上的努力。邦联军队在田纳西和肯塔基州发起了反攻，在他们的攻势瓦解前几乎已到达了俄亥俄河。格兰特率军沿密西西比河前往维克斯堡，那是控制此河的中枢关键，但一连串的失利却使他的行动陷入了困境。

钱瑟勒斯维尔和葛底斯堡

1863年的东线战事中，交战双方的平衡并没有什么变化。在东线，约瑟夫·胡克将军于年初接替了伯恩赛德的职位，他像麦克莱伦一样，是个自视甚高的人。在给胡克的任命书中，林肯特别提到了盛传于华盛顿的流言，据说这位将军声称

需要一种军事独裁权。林肯干巴巴地提醒他说对这样一支军队，最主要的需求是战场上的胜利。“我现在所要求你的就是军事胜利，”林肯评说道，“而且我愿意为此冒独裁的风险。”

1863年5月初，胡克进攻了北弗吉尼亚军队，南北战争中罕见的一次例外，一位北方指挥官出奇不意地“咬”住了李将军。但在“莽原”深处（弗吉尼亚中部弗吉尼亚森林中的一个区域），胡克被制住了，而李却恢复了元气，分军两路，命“石壁将军”杰克逊行军至钱瑟勒斯维尔，猛攻胡克的侧翼并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只有夜幕才把全部联邦军队从即将崩溃中拯救出来。但这次侧翼进攻所造成的最大打击，却是在这位联邦指挥官的心里：就像林肯评述的，胡克对此的表现就像是一只脑袋上被打了一板子的鸭子。不顾其军队指挥官们要求留在战场继续战斗的事实，胡克下令撤退。

南方领导人面临的严峻问题是下一步做什么。李争辩说应侵入北方，寻求一场决定性的胜利以结束战争；其他人则争论说，李在钱瑟勒斯维尔的胜利应能允许南方在东线坚持住守势同时加强西线，那里格兰特刚在维克斯堡诱捕了一支联邦军队，使得南部邦联可能既失去密西西比河，又失去一支大军。由于李的名望，他赢得了这场争论：6月中旬，北弗吉尼亚军队开始向宾夕法尼亚进军。

波托马克军队和它的新指挥官，被部下称为“老鳄鱼”的乔治·米德将军，立刻开始追击。在一次典型的遭遇战中，在葛底斯堡这个非双方所选的小镇上，一场持续三天的大战发生了。邦联军队技巧地赢得了第一天，将三个联邦军一片混乱地赶过小镇。第二天是勉强平局。全靠乔舒亚·张伯伦，缅因州第20旅旅长的

乔舒亚·张伯伦，名誉陆军少将，美国志愿军

截止到葛底斯堡战役时，乔舒亚·张伯伦，这位鲍登大学的前修辞学教授，在军中服役还不到一年。张伯伦和他的缅因州战友们于1862年夏天应征入伍，他被任命为缅因州第20旅副旅长。四个月后，他们在安提塔姆接受了战火的洗礼（美国军事史上伤亡最惨重的一天）。1863年6月，张伯伦成为第20旅旅长；葛底斯堡战役的第二天，他的旅进入防线，保卫联邦防线左翼的重要阵地“小圆顶”。黄昏时，南方的一次大进攻威胁着要吞掉“小圆顶”。激烈的战斗实际已耗尽了第20旅全部的弹药；当敌人再一次冲上来时，张伯伦命令他的人上刺刀，进攻敌人。这个行动粉碎了邦联的进攻，将波托马克军队从失败中拯救出来。

因为勇敢和出众的能力，张伯伦被授予荣誉奖章；到战争结束时，他已经是一名荣誉陆军少将了。格兰特认为他是波托马克军队中最能征善战的旅长，并挑中他在阿波马托克斯接受南方的投降。

张伯伦返回缅因州后成为该州州长和鲍登大学校长。他曾于1864年受伤，1914年死于旧伤复发。

勇气和毅力才挽救了联邦军的左翼：他在敌人三倍于己且己方弹药耗尽的情况下，命令手下上刺刀冲杀。第三天，李对联邦军的防御中心发起了一次大规模进攻。当邦联军从丛林中涌出开始1.5英里的行军并走向塞莫特瑞岭的缓坡时，联邦军队齐诵"弗雷德里克斯堡，弗雷德里克斯堡"。结果是对乔治·皮克特将军进攻队伍的一次大屠杀，与6个月前弗雷德里克斯堡的迈尔高地下的那次屠杀一样具有决定性。由于他的军队已被击溃，而且弹药几乎用尽，李撤退了。

对邦联政府来说，葛底斯堡不仅仅是一次战术上的失败。由于入侵宾夕法尼亚，李将灾难性失败的舞台设到了西线上。这次失败使邦联丢掉了对密西西比河的控制，为北方的入侵敞开了田纳西州。事实上，考虑到维克斯堡的危机，李对一次决定性胜利的寻求，既没有根据这场战争的战术现实，也没依据南方的战略形势。这一年的其他日子里，东线上进行了一些杂乱无章的战斗。李将朗斯特里特部派到了西线，而且几乎形成了进行侵略战的态势，这使米德重新认识了李的能力，米德不愿让他的军队再卷入一次谋略战并对抗一位如此才能非凡的对手。

格兰特发起进攻

1863年，战争重心转移到西线。在经过了一个沮丧的冬天，试图通过维克斯堡北部的沼泽地后，格兰特以一个令人震惊的行动开始了他的春季战役：5月，他派军经密西西比河驶过维克斯堡，切断了他与北方的联络渠道。然后，在可能是南北战争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运动战中，他分隔了这一地域的两支南方军队，并在维克斯堡消灭了一支。因此展开的大围攻因1863年7月4日该城及邦联守军的投降而达到高潮，并开启了密西西比河。然后，格兰特向上级提议率军进攻重要港口莫比尔，但哈莱克因为嫉妒他的这位下级而对此表示反对，并用其他任务分散了格兰特的军队。

结果，在罗斯克兰斯指挥下的联邦军队前进到了田纳西中部，它们缺乏来自西线其他战事的支持，却碰上了战争中最无能的南方指挥官之一布拉克斯顿·布拉格将军。到8月末时，罗斯克兰斯已将布拉格赶出了田纳西；但在佐治亚州的邦联军队，由于得到来自北弗吉尼亚军队的朗斯特里特军队的增援，开始了反攻。在奇克莫加的战斗中，朗斯特里特在第二天发起的进攻，在联邦阵线中心造成了一道裂缝——一个由于参谋们的无能和罗斯克兰斯与下级部属们的不睦而造成的漏洞。结果，虽然布拉格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南方仍然大胜，联邦军的幸存者夺路逃回查塔努加，邦联军随即包围了他们。

林肯马上对此做出反应。他给予格兰特整个西线的指挥权，并从波托马克军队中抽调两个军去加强西线。联邦后勤体系调动2.5万人，带上他们所有的马匹和大炮，在不到两周内走了1200英里。格兰特表现出他一贯的镇定自信，将联邦军队集中到了查塔努加。他首先打通了该城的补给线，因为城中军队已经短缺口粮了。

一旦联络恢复后，格兰特就攻击了布拉格。侧翼攻击有些成效，但未能将敌人逐出监视此城的阵地。乔治·托马斯将军曾在罗斯克兰斯军中服役，经历了奇克莫加的大溃败，格兰特命他对邦联居高临下于查塔努加的阵地进行一次侦察，

尤利塞斯·S·格兰特（公元1822～1885年）1861年前，格兰特在他选择的每一项职业上——军官、农夫、店主，都屡遭失败，但他却显示出非凡的决策力，是一个精于判断的人，并有足够的谦逊从自己和别人的错误中学习经验。他的创作文笔清晰，这使得他的回忆录成为19世纪文学史上的一个成功之作。他还是南北战争中惟一一位对重大政治和战略问题有清楚认识的将军，这些本事后来帮助他赢得了两届总统任期（公元1869～1877年）

但这次侦察却变成了一次全方位的进攻，并在看上去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取得了胜利。

格兰特的胜利重新扭转了西线局势，联邦现在控制了密西西比河。此外，它的军队还在田纳西长驱而过，到达了南方的经济心脏——佐治亚州的门前。联邦在西线的胜利与在东线的失败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时候，林肯认识到了格兰特的价值，任命他为整个联邦军队的总司令，国会还在他的荣誉上添加了“中将”这一头衔。格兰特现在掌握了联邦军事战略的控制权，以结束这场已持续三年的毁灭性战争。

1862年时，林肯曾向麦克莱伦提议，让北方发动全方位的进攻以压服南方可能是一个好战略。在给他妻子的信中，麦克莱伦表示了对这种做法的轻蔑。但林肯是对的。具有资源和人力优势的北方是可以利用同时来自各个方向的压力来击败南方的。这正是格兰特想要做的。正如他向下级指挥官们所说的：“如果敌人能保持平静并让我采取主动的话，我的计划……是向所有部位的敌军一起发起进攻，并有那么一个共同的中心。”在东线，波托马克军队将进攻北弗吉尼亚军，而詹姆斯的军队将攻击里士满南部以切断李的补给。另一支联邦军队将顺谢那多厄山谷而下，使南方无法得到该地区的丰饶农产。在西线，谢尔曼将进攻乔·约翰斯通将军的田纳西军，而班克斯将进攻莫比尔，迫使约翰斯通分散兵力。

229

如果这些行动都能以格兰特预想的方式进行的话，南北战争可能在1864年就结束了，但班克斯没去进攻莫比尔，反而溯红河而上；西格尔也令人沮丧地失败了；而巴特勒（用格兰特的话说）则在詹姆斯半岛上“沤坏”了他的队伍。因此，每件事都落在了谢尔曼和格兰特的进度后面。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是因为那些下级执行者们——班克斯、巴克勒和西格尔只是政治上的将军，没有能力去正确完成他们的职责。但格兰特从没抱怨过他们缺乏能力，或者因为他们没能在1864年取得胜利而斥责他们，因为在北方的高级军官们当中，只有格兰特意识到了这些人对林肯谋求1864年11月的连任具有的政治重要性。

格兰特随波托马克军队一起行动，他认识到这支军队和它的指挥官都缺乏推动力。他虽然欣赏米德将军的诚实正直，但也发现了米德在对抗李时的自卑感。在战争的剩余岁月里，格兰特一直和波托马克军队呆在一起；当它与李缠斗时，为它的行动承担责任。但由麦克莱伦训练出的这支军队和军官队伍，却被证明像它的前任指挥官一样，是个有缺陷的军事工具。美国军事史上，任何军队都从未有过比它更令人沮丧的记录；任何军队在追寻胜利时都从未比它遭受过更高昂的损失；任何军队在作战中都从未比它错过更多的机会。直到1865年4月的五叉口战斗它才终于在处于攻势时赢得了一场胜利。

南方的战败

波托马克军队以一种对自己对国家都惊人高昂的代价，进行了它1864年春季和夏季的战斗。在恐怖的莽原战役中，它在邦联的侧翼攻势下几乎难以脱逃生还。然后，重心迅速左移，格兰特试图包抄邦联军队，使自己的军队处于李不得不进攻的位置。但在紧要关头，邦联队伍到达了斯波特瑟尔韦尼亚郡府。在随之而来

的第二次可怕厮杀中，邦联以军用战壕作掩护，重创了进攻的联邦军。厄运继续缠住了波托马克军队。为了鼓舞他的军队，约翰·塞奇威克将军——一位很出色的军长，站在一个土防工事上宣布，在这个距离内邦联军连一只大象都射不中，而这时一位南方神枪手的子弹正好贯穿了塞奇威克的脑袋。

230

经过一周让双方都大伤元气的激烈厮杀，格兰特又转移到了南部；他在北安娜河和金港向李的阵地发起了直接的进攻。即使按照这场战争的标准来看，这些天也是黑暗的日子。波托马克军队中，一位旅长给他的妻子写信说："已经30天了，送葬的行列络绎不断地经过我身边，这已经太过分了。"格兰特然后绕过李，来到詹姆斯河，将军队安排好，想要夺取彼得斯堡以切断南方的补给线。如果彼得斯堡真陷落了，李将不得不放弃亚特兰大和里士满，后撤到北卡罗莱纳，但波托马克军队的指挥官们再一次错过了这个机会，使李有了足够的队伍派到彼得斯堡，去加强那儿的防御。到这时，双方军队都已精疲力竭，无力发动进一步的攻击了——但格兰特最起码已经成功地达到了拖住李进攻的目的，北弗吉尼亚军再也不能采取进攻了。

所以，一切都依赖于谢尔曼对约翰斯通的进攻了。谢尔曼于5月初对亚特兰大开始攻击。两军对峙中，他虽然把约翰斯通从一个阵地赶到另一个阵地，却没能获得重要的军事胜利。到7月时，邦联政府受挫于这种撤退局面，便让一位军长约翰·贝尔·胡德接替了约翰斯通。胡德曾是"石壁将军"杰克逊手中一位出色的师长，在许多战场上都表现得很勇敢，并在战斗中失去了双臂和一条腿。但胡德也是一位引起不睦和好争辩的师长，选他做高级指挥官就像选布拉格一样，是个糟糕的选择。

231

胡德对邦联在1864年面临的麻烦的解释是：南方军队失去了他们在1862年曾享有的凌厉攻势。

南方的战败。战时联邦的战略包括了四个要素：封锁海岸；占领里士满；开启密西西比河；将战火烧到南方家门，危及它的经济和人民。是最后这一方法最终瓦解了邦联的斗志。

作为亚特兰大前线的指挥官，他决定重新恢复这种进攻精神。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他对谢尔曼发动了三次猛攻，但每次都被联邦士兵瓦解了，只给进攻者带来了可怕的伤亡，并迫使胡德最终放弃了亚特兰大。他最后将他的失败归罪于他的军队缺乏进攻精神，却完全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战斗面貌已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但他的进攻所遭受的伤亡却显示出，南方为了寻求独立仍愿承受可怕的损失。

谢尔曼占领亚特兰大一事对林肯的再次当选非常重要。胡德现在向北行动以威胁谢尔曼在田纳西的补给线，但谢尔曼劝说格兰特允许他进行一次南北战争中最有创意的作战计划：让乔治·托马斯率领他的部分军队后退去占领田纳西中部，谢尔曼则摆脱他的补给线，穿过佐治亚的心脏向海边进发。格兰特最终批准了这次行动。胡德追击托马斯的军队先到了富兰克林，他在这里大骂他的参谋人员是懦夫，然后挥师向战壕防备良好的北军发起进攻，结果是一场杀戮，他的许多将领均战死于此。但胡德对此却无悔意，又挺进到纳什维尔，在此被托马斯摧毁了他这支从亚特兰大开始就屡遭残杀的军队的余部。

232 威廉·T·谢尔曼将军（公元1820～1891年），摄于亚特兰大战斗中。他指挥了许多对南方的猛裂破坏战，这些破坏战被称做"严酷的战争"。

与此同时，谢尔曼已穿过佐治亚州。战争开始发生恶性转折，因为军队将战火带到了南方的心脏地带。虽然谢尔曼并没将他的矛头直接对准平民，但它的"附带"效果——破坏民房、摧毁庄稼、偷盗农畜，已经显示出联邦政府愿在多大程度上来毁灭邦联。谢尔曼的军队在他们行军身后留下的"烟囱废墟"中得到了极大乐趣。正如谢尔曼对阿拉巴马州北部平民的警告：

> 美国政府在北阿拉巴马有任何和一切用以帮助强化战争的权利，可以拿走（邦联人民）生命、他们的房屋、他们的土地、他们的一切，因为他们不能拒绝战争就存在于那里的事实，而战争是不能被宪法和条约所束缚的力量。如果他们想永远打下去，那么好吧，我们将接受这个结局，我们将撵走他们，将我们的朋友安置于他们的所有物之中……对那些狂妄而顽固的分裂分子来说，死亡是慈悲，他或她的财物被剥夺得越早越好。撒旦和那些天堂里的反叛天使们是被允许继续活在地狱中的，因为那就是对他们的惩罚。

在佐治亚和南卡罗莱纳进行的破坏，代表了一个大政策的一部分，它意在摧毁想要继续作战的南方人。它也是对邦联士兵的一个明白警告：他们将再也不能保护自己的家园免于战火了。

正当谢尔曼向海边进发时，格兰特已派出菲利普·谢里登将军进驻谢那多厄山谷。谢里登是战争中最有能力的战场指挥官之一，但他也像杰克逊一样，是脾气最暴烈的将军之一。格兰特的指示表明：谢里登在谢那多厄所做的一切正是联邦高级指挥部门的一般政策。他命令谢里登要将谢那多厄变成"一个荒芜之地……让此季从它上空飞过的乌鸦群也不得不随身携带它们自己的口粮"。

谢里登兴致勃勃地执行了他的命令。1870年，他去参观普法战争的战斗时，来自普鲁士主人的一个评价，暗示出联邦的战略在多大程度上已变成一场针对南方人民抵抗的残忍无情的战争：谢里登提到普鲁士人对待法国人太"人道主义"了，并对他热切的听众补充说："这些人应让他们一无所有，只留下他们的眼睛为

战争哭泣!”应该承认，无论谢尔曼还是谢里登，都没达到二次大战中“轰炸指挥部”的“空屋”战役的水平。北方军队还只是有选择地战斗，因此在摧毁南方经济基础系统、家园、粮食储备和农畜时，还能饶过那些可怜平民的生命。而且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摧毁了那里的奴隶制度，这正是南方文化和政治特性的核心。

到1865年初，邦联局势已经无望。林肯在1864年秋天的再次当选，粉碎了它最后的一个希望：这位伟大的解放者将目睹战争走向终局。邦联各州中都有联邦军队在随意行动。李的军队正因开小差在逐渐减少；谢尔曼正在大肆破坏南卡罗莱纳州，这个州曾率先脱离联邦，并以四年前的炮轰萨姆特要塞开始了南北战争，而今谢尔曼的军队却以破坏它为乐。北卡罗莱纳州很快也尝到了联邦军队的厉害，邦联的“最后一个港口”费希尔要塞，在一次海陆联合战役中陷落了。

罗伯特·E·李（公元1807~1870年）。李是南北战争中最优秀的战斗指挥官之一。他对波托马克军队的统治力几乎贯穿了战争始终，直到格兰特到达东线时为止。作为一名著名的进攻型指挥官，李在他的最后几次战役中，证明了现代火力为防守者提供的巨大优势

233

“末期不悦”的代价

4月时，波托马克军队在五叉口赢得了它的第一个进攻战的胜利，使得李在彼得斯堡的阵地瓦解了。以谢里登为首的一次快速追击最终在阿波马托克斯“抓”住了李。意识到大局已去，李遂投降。他后来成为美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将余生用于督促他的人民接受这个结局。不幸的是，联邦军队在南北战争最后一年所进行的毁灭性战争、一个战败地域内的种族关系问题，导致南北方之间的裂痕一直接续了一百多年。但一个简单的语法变化却显示出南北战争造成的变化。1861年前，美国人说“美国是”时，“是”这个动词是复数形式；1865年后，他们再说“美国是”时，“是”已是单数形式了。北方的胜利对20世纪有重要影响。在北美保留一个有巨大工农业力量的统一国家，将在抵抗德国的两次世界大战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而一个分裂的次大陆在这样的战争中将发挥不了多少作用。

美国内战是第一次现代战争——战争中的军事力量都建立在公众支持和工业化基础上，并用铁路和汽船将其运送几百英里，可以到达整个战争的边缘所在。无论是从事一场大战的战略视野还是军事能力，都不是一开始就已存在的；只有军事力量的创立和它那些必要的支持，才产生了那些既非显明可见、又未轻易解决的问题。但是美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却最终发展出一种可带来胜利的战略，一种消耗战而非决定性战斗的战略。与1864年在南方发起的全面进攻伴行的，是一场打击南方人民普遍意志的战争。但这样一场战争的代价也是惊人的：双方共有大约62.5万名士兵战死，一个相当于美国到越战为止并包括了大部分越南战争的所有战争死亡总人数的数字。对美国而言，另一个可比性的损失数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大约死亡210万人（而不是11.5万）。南北战争暗示着新型的技术战场将带来惨重的伤亡人数，而现代国家动员人力和工业资源的能力，却可以几乎无期限地供养那个技术型战场。当西方文明进入20世纪时，那些人力和工业资源更是极其迅猛地发展、增长起来。

俾斯麦的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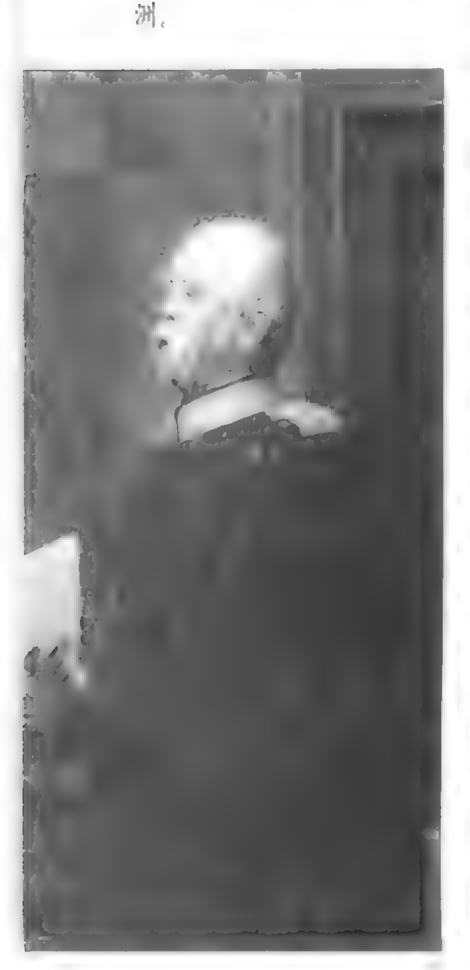
但几乎就在同一时候，欧洲人也领略到了关于现代战争的不同经历。在普鲁

士的带领下，经过一系列几乎与美国内战同时发生的战争，德国完成了统一。这些成功，包括了一系列短暂而耀武扬威的战争，但又不仅仅依赖于普鲁士的战术或技术优势；它们更反映出普鲁士领导人的雄才大略和它军官队伍的职业化。而后者部分来自于对1806年耶拿—奥尔施泰特惨败的反应。培养训练参谋人员的战争学院（Kriegsakademie）的设立，使普鲁士能在1813年的反法解放战争中及时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参谋系统中心，而它在与拿破仑的战斗中，在处理相关的无数细节方面的成功，阻止了战后紧缩时期解散军事学院和一个新生参谋部的行动。

到19世纪60年代的这段时期，一个小型但杰出的参谋部，推动着普鲁士军队认识到铁路和武器技术的变化在未来战争中将能提供的优势。而1858年赫尔穆特·冯·毛奇成为参谋总长后，这个进程更加速了。在19世纪40年代，德国铁路的发展速度是法国的两倍以上，到1854年时，德意志联邦已经拥有几乎7500英里长的铁路。到1860年时，普鲁士自己就已拥有3500英里长的铁路（而且毛奇也从他在铁路债券的投资中发了财）。关键之处在于普鲁士的参谋部与欧洲的其他军事组织不同，它已经系统地构想了如何最佳地利用不断发展的铁路潜力，来为调动和部署军队服务。但普鲁士的优势不仅在于它动员、部署和支持军队的能力。普鲁士军队还第一个在欧洲使用了后膛装弹的步枪即撞针枪，这使它的士兵的装弹时间比他们的敌人要快三到四倍。在交火中卧倒时能如此快速地装弹，就是一个明显优势。

奥托·冯·俾斯麦亲王（公元1815～1898年）。他是欧洲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真正理解了战争只是一种政策延伸的几位政治家之一。结果，他总能瞄准能得到的利益，并本能地知道何时结束游戏。但俾斯麦从未解释过他的政策，或者对下一代德国领导人进行教育；这对第二帝国最终造成了致命的后果，并几乎毁掉欧洲。

234



但是这些变化只是潜在的，它需要技巧性的战略和政治行为来将这种军事潜能转变为战略现实。19世纪60年代初，普鲁士国王要求国会支持一个时间为三年的军队服役期，但国会拒绝提供经费，从而使普鲁士陷入政体上的僵局。绝望中，威廉一世求助于一位老派贵族——奥托·冯·俾斯麦来打破僵局。

俾斯麦是一位非凡的人物。他短暂的军旅生涯并不成功，大学时光都被花在酗酒和嫖妓上。他的外交经历也没有为他赢得什么朋友。但他的确拥有那个时代很少有人拥有的才能。他具有估量对手的非凡能力，是一位第一流的政治家；他还有一个赌徒的直觉，知道何时下注何时离桌。与大多数普鲁士保守主义者不同，他了解德国民族主义暗潮涌动，并看出普鲁士或者顺潮流而昌，或者逆潮流而亡。

俾斯麦最伟大的长处就存在于欧洲体系的弱点之中。欧洲很少有人认识到普鲁士由于进行工业革命而具有的潜力；同样重要的是，大多数欧洲人都把普军看成大陆上最无能的军队之一。此外，克里米亚战争后，英国已从大陆事务中抽身出来，法国在战略政策上没有一个有效的聚焦点；而因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表现，奥地利与俄国正处于矛盾之中。这位普鲁士新宰相就在这样的权力真空中，打上了自己的印记。正如他警告普鲁士议院的那样：“我们时代的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和多数票能决定的——那正是1848年和1849年的大错，它们应用铁和血来解决。”第一个机会随丹麦而来了。

丹麦国王去世时，没有留下男性继承人，这对丹麦王位没有任何影响，但对德国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领地却关系重大。1864年，以普鲁士和奥地利为首的德意志联邦，拒绝承认丹麦对此领地的权利要求。然后，德国联军与丹麦人进行了短暂的战斗，但问题是怎么处理这个被解放了的省份。俾斯麦是欢迎这种混乱局面的，因为奥地利接管了这份领地，但与它们的联络孔道却全部通过普

鲁士领土。能导致双方误解的机会真是数不胜数，俾斯麦对此十分高兴，甚至都不愿去将它们增加到极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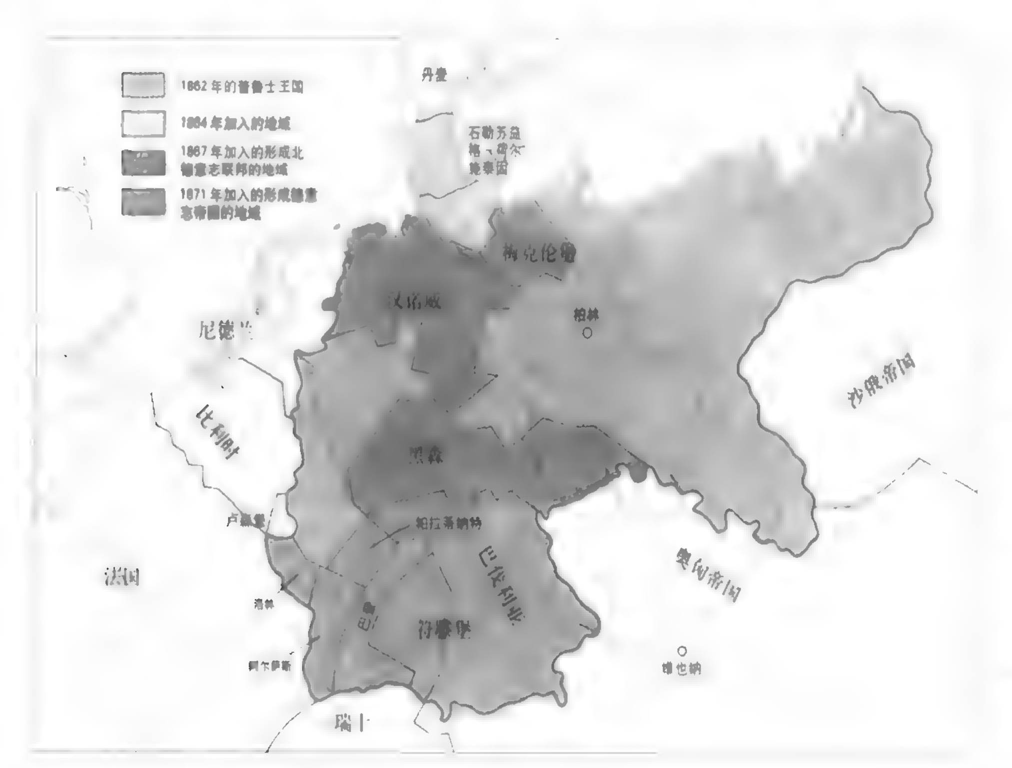
看上去俾斯麦是希望与奥地利人谈判，以达成一个交易，即由普鲁士控制北部德国，由奥地利控制南部。但奥地利人对德国内部的力量失衡反应冷淡，他们不仅拒绝承认普鲁士是平等国家，而且还积极寻求战争。而除了法国外，欧洲其他国家对中欧的紧张局势表现得兴趣不足；法国则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相信普奥之间将有一场长期战争，它计划从中干涉以谋求好处。

235

普鲁士确实承受了一些重要的不利条件，其他的德意志国家都与奥地利结盟了；普鲁士的国土被分成两半，而且波希米亚为奥地利进攻柏林提供了一个缓冲带。但毛奇及其参谋部却利用了这些挑战。一支普鲁士军队迅速赶走了汉诺威人，统一了普鲁士领土。与此同时，1866年6月，毛奇利用北德的铁路系统，将三支军队快速部署在奥地利边境，让它们在波希米亚会合。奥地利的参谋工作却很糟糕，反映出奥地利人在过去几十年里对军队职业化表现出的漫不经心的态度。结果，奥地利军队在波希米亚中部集合得很缓慢，而这时最西边的普鲁士军队已经越过了萨克森，其他三支普军也已迅速进入了波希米亚。撞针枪给了普鲁士人一种压倒一切的战术优势，最初的小冲突也加强了这种优势——有记载的伤亡比例是，一名普鲁士人对四到五名奥地利人。而更重要的是，早期的这些失败打击了奥地利人的士气。

震惊于敌人的前进速度，奥地利指挥官贝内德克亲王撤到了柯尼希格雷茨以北的一个低丘地带。奥军有19万人，加上2.5万名萨克森人做支援。普军超过20万人，但当柯尼希格雷茨战役于7月3日开始时，只有两支普军在战场上（且毛奇的电报系统已中断）。但这时贝内德克已认识到对方的撞针枪对其军队造成的危险；他命令部下让军队后撤，依赖比普鲁士占优势的大炮作战。但奥地利的高级军官们却表现得像骑士，居然抗命不从。结果，当普军第七师在奥军右边一个从

236



1864~1871年，德国的统一和扩张。普鲁士针对它的邻国发动并赢得了三次大战：1864年对丹麦、1866年对奥地利、1870~1871年对法国。它的胜利使德国领土扩张到北部和西部。普鲁士的主要目标是将德国联邦统一成一个国家，这结果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的力量平衡

赫尔穆特·冯·毛奇将军（公元1800~1891年）对于科技推动战争的作用有真知卓见，构成了非凡的作战思想。是他促使普鲁士军队利用了后膛装弹的“撞针枪”和铁路的全部潜力。但毛奇在认识必须将所有战斗都统一起来的政治约束方面却能力不足，他与俾斯麦的争吵将在下个世纪里把德国的将军们错误地引入两次世界大战中。

林覆盖的小区域——希维沃尔德取得局部胜利时，奥地利指挥官们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攻，但这些反攻全被瓦解于普军的火力下。在这一地区的59个营队中，奥地利人动用了49个营去进攻希维沃尔德，结果有28个营被消灭。事实上，这毁掉了奥军的整个右翼。当由普鲁士皇太子指挥的第二支普军到达战场时，奥军在右翼的困难就变成了一场灾难。

与此同时，普鲁士人还设法调动在敌人左翼附近的易北河的军队。奥地利炮兵和骑兵殊死战斗，才阻止了普鲁士人对贝内德克整个部队的包围。而生存下来的也是一场悲剧，仅在一天的战斗中，奥地利就伤亡4万人，还有2万人成了战俘。通往维也纳的大门被打开了，哈布斯堡国家的灭亡看上去就在眼前。普鲁士的将军们，包括毛奇在内，都急于去折取他们伟大胜利的月桂（喻荣誉——译者注）了。

但俾斯麦却没这么做。他说服国王停止了普军的前进，与奥地利人进行谈判。因为他认为，战争若持续下去，受益的将是法国和俄国。但是，如果普鲁士提出很慷慨的条件，就能说服奥地利接受一个长期的和平。普鲁士将限制它的领土目标，只要北部德国、南部德国可以只处于它的利益范围之下。这样一个和平对奥地利人是最有吸引力的，因为他们不会因此失去自己的任何领土。俾斯麦的和平显示出了他天才的领导能力。普鲁士吞并了北部德意志国家，控制了南部德国的军事和外交政策，和平安抚了奥地利；而且俾斯麦使法国始终保持了中立。奥地利欣然接受了这些条件。但这样的战略睿智却不被普鲁士士兵们所赞同；对他们来说，俾斯麦的策略剥夺了他们在敌人首都痛击敌人的机会。

普法战争

为了近在眼前的未来着想，俾斯麦想巩固他的目标，他认为现在没有必要去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毕竟，南部德国是抵御他的两大敌人——自由主义和天主教——的坚固堡垒。但是法国拒绝接受1866年的结果。第二年，法国试图购买卢森堡公国，但在英国和德国的抗议之下，它放弃了这一要求。外交上的挫折并没中止法国人干预南部德国事务的企图，法国的拒不让步使得俾斯麦最后决定冒另一次战争之险以稳定他的目的，而法国人成全了他。拿破仑三世的帝国正处于不断增加的国内政治压力之下，国民要求他解放宪法，而外交政策上的挫折也渐渐磨蚀了其政体的声望，因此，这位皇帝寄希望于外交或对外军事胜利来解决困境。

但这时的军事平衡甚至比1866年时对普鲁士还有利，普鲁士的参谋部已将它的管理和组织能力提高到了一个新高度。参谋工作使得普鲁士人能进一步利用铁路的巨大潜力，而参谋部体系更为传达命令和确保它们的执行提供了一种手段；普鲁士将发现自己很易于管理它在1870年所征募的大军的部署和作战行动。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参谋体系，法国人也不会败得那样惨。

很有讽刺性的是，普鲁士人没有它们在1866年享有的技术优势——法国的察斯波特步枪要优于撞针枪；但普鲁士人已经修正了他们在大炮上的弱点：他们的后膛装弹的铁炮使他们在速度和炮火的准确性上都要优于法军。但法国人还拥有另一种可能为他们提供巨大优势的武器——the mitrailleusc即早期的机关枪，但

作战部将这种武器隐瞒得如此秘密，以致几乎没有法国指挥官知道它的存在。除了他们的参谋体系外，普鲁士人还拥有其他优势。他们拥有一个很有效的预备役系统、经过两次战争洗礼的高级军官们和毛奇这样一位杰出的战斗指挥官。最重要的是，他们拥有俾斯麦这位出色的战略家，他的策略使其他欧洲国家均置身于这场战争之外。法国人却没有预备役体系，他们只有一个软弱的参谋部，甚至没有一位特别有能力的将军。

由于严重错估了力量，拿破仑三世向普鲁士发出了挑战。聪明绝顶的俾斯麦导演了一场好戏，将他的国王与法国大使在柏林的一次小对峙写成了一条新闻电讯，使得普鲁士人认为他们的国王受到了侮辱，而法国人也认为他们的荣誉受到了侵犯。于是，法国对普鲁士宣战，双方都开始调兵遣将。法国人相信战争将始于他们对莱茵兰德的侵入，虽然为何目的尚不清楚，但他们的军队将像1806年的耶拿—奥尔之战一样牢牢控制住主动。尽管普鲁士要从更远的距离调兵遣将，但他们有效的参谋工作和后备体系却允许他们将38万人运到法国边境，同时还部署了9.5万人去监视奥地利。到1870年7月31日时，法国人只有22.4万人位于边境地区。拿破仑三世临时拼凑了两支军队，指挥它们的元帅们以前从未承担过这种责任，而且法国军队也没有一个有能力的参谋部来指挥军队的作战和后勤供应；而另一方面，三支普鲁士军队都有有效的参谋人员来共同规划他们的作战和后勤；率领他们的是扬名于1864年和1866年战争的指挥官们。

开始的几次小战斗已展示出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将贯穿于普法两国野战军之间的战斗。法国人在机动战场上表现出很强的能力，察斯波特步枪也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它的价值。但法国人在作战水平上的无能却抵消了他们在战场机动性上的优势。8月6日，普鲁士皇太子的军队在魏森堡与法国对手交战，双方都遭受了大约6000人的伤亡，不过，普鲁士还俘虏了6000名法军。比局部胜利更重要的是，皇太子成功包围了麦克马洪元帅的军队，迫使法军从阿尔萨斯全面撤退。与此同时，巴赞元帅领导下的法国主力部队也受到了打击。在斯皮克恩山峰上，大占优势的普鲁士军队进攻了法国第二军。法军打死打伤普军5000余人，但自己也

1870年，普鲁士步兵正向色当附近的法国阵地行进。在普法战争中，法国在步兵武器上一般拥有优势火力，所以普军尽管通常能主宰战场，却常有更惨重的伤亡。但是，在色当的普军发挥了大炮的优势，在短暂的较量后，在武器上被压倒的法军被迫投降

238

伤亡近3000人，可是巴赞却没有增援他的军长（这不是他最后一次当部下殊死苦战时他一筹莫展地按兵不动）。但斯皮克恩战役的重要意义在于，毛奇将他的第一支和第二支军队插入到两支法军之间，而皇太子的第三支军队却包抄了普鲁士左面的麦克马洪军队。

8月16日，在控制了第一支和第二支军队的行动后，毛奇将巴赞引入了战斗。这时，普鲁士人已接近包围他们的敌人了。那天在马斯拉图尔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遭遇战。法军伤亡1.6万人，而普军是1.7万人。但重要的是，巴赞是向北而不是向西撤退，这就进一步增加了普鲁士人包围他的军队的机会。

239

两天后，两军再次交战，而且法军几乎就要获得一场可能扭转普法战局的大胜。在圣普里瓦，巴赞的第六军2.3万人将10万名普军拖住整整一天；如果得到增援的话，第六军很可能将一次局部的战术胜利转变为重要的战争胜利。与此同时，两支普鲁士军也在格拉沃洛特取得了初步胜利，但在向前挺进时却被法军缠住。他们随后发起的一系列混乱的进攻只是增加了自己的损失而已。法国守军如此坚决地粉碎了德国人的最后一次进攻，以至于普军进攻单位整个地崩溃了；这时法军任何一次反攻都能给普鲁士人造成军事行动上的严重失败，但在场的法国指挥官拒绝采取单独行动，而巴赞也像麦克莱伦在安提塔姆一样，再一次拒绝参加这次战斗。双方伤亡都很惨重，但形势仍有利于法军，这暗示出他们离胜利已有多近；德国人损失了20163人，而法国却只损失12273人。最后，巴赞退回到梅斯，这使得普鲁士人设套诱捕了他的全军。

240

对梅斯的法军的包围对拿破仑三世构成了一次政治上的灾难——威胁到他政权的生存。法国因此征集了所有剩余的职业军队；麦克马洪元帅指挥这次远征行动，皇帝自己也随军而行，孤注一掷地想要赢回他正在失去的声望。但是，法国人却是沿巴尔干边境开往梅斯的；他们本可以选择一条不这么倒霉的行军路线。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毛奇在麦克马洪的侧翼调遣军队，以便在色当包围并歼灭第二支法军。普鲁士人已从他们在圣普里瓦和格拉沃洛特血淋淋的经验中学乖，用大炮轰击被包围的法军以迫使他们投降。这标志着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结束。

德国的胜利

在巴黎，法国宣布成立一个共和国，它的新领导人们进行了全民动员。战争已使双方的民族主义分子们热血沸腾。但法国的问题是新征募的军队是成千上万名乌合之众，受过训练的职业军人们都在普鲁士的战俘营里。因此，新共和国的处境与1861年美国内战中参战双方的境遇相同，它必须从毫无经验的平民社会结构中建立起军事组织。普鲁士当然就没有这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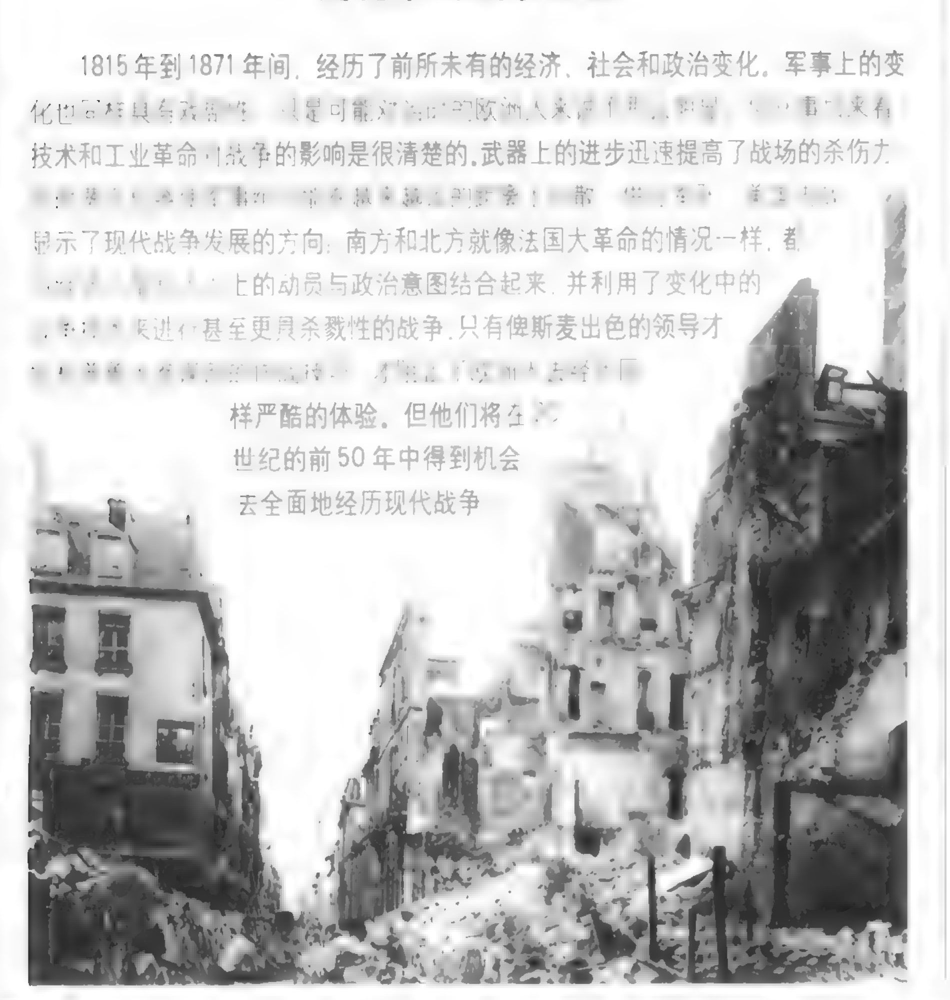
10月，将梅斯口袋中的法军彻底消灭后，毛奇进军巴黎。法国人破釜沉舟，准备抵抗这次围攻；同时他们也试图将军队后缩于一处。巴黎围攻一开始，俾斯麦就要求普鲁士将军们进行炮轰，以迫使共和国坐到和平的谈判桌上。在围攻和炮轰中，法国人做了一系列努力来解救首都，而且针对普鲁士在法国北部的联络线展开了一场游击战。救援努力以惨重的伤亡而失败，同时对补给线的攻击也没达到目的，只是激怒了普鲁士人并进一步加剧了战争。在无可挽回的情势下，法

兰西共和国终于投降了，巴黎内部不断增长的革命威胁无疑为此助了一臂之力。

由此导致的和平，在20世纪的历史上产生了一些不幸的反响。首先，德国人获得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但却在法德两国间造成了一个永久的裂痕。其次，普鲁士在1866年和1870年胜利的短暂性和迅速性，使得欧洲大多数政治家和将军们都相信，现代战争将是短促并相对无痛苦的。总的来说，对这些战争的分析既忽略了俾斯麦非凡的领导能力，也忽视了普鲁士的对手们在战略和作战水平上的极度无能。

所有这些结果中最危险的是它们对德国人的影响，他们相信自己是因为战场上的本事而获胜的。他们的军事表现当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俾斯麦在战略和政治上的现实主义和适当节制才是关键因素。但是，1866年和1870年的胜利，却诱使德国的政治家、士兵和知识分子们相信：军事和战斗上的利害关系应永远重于战略和政治因素。在凡尔赛镜厅宣告成立的新德意志帝国所承载的光荣正是它在1918年灭亡的基础。这个新国家信奉俾斯麦借以掌权的那条原则，即普鲁士军队将独立于宪法束缚之外。在有俾斯麦这样的政治家，且他能直接接近皇帝并对其施加巨大影响的国家里，这条原则没什么关系，一切尚可在控制之中；但在俾斯麦后的德国，政治层将失去对国家军事机构的控制。

变化中的战争面貌



第十三章　世界大战的趋势

242

普法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43年（公元1871～1914年），构成了欧洲一个前所未有的和平时期。其部分原因是，欧洲列强在夺取尚独立于西方控制之外的地区上，有着共同的利益。西方影响的扩张，在非洲、亚洲和太平洋上确实造成了相当紧张的局势，但各帝国的目标还存在着距离，从而阻止了一场欧洲大战在帝国主义竞争中的爆发。

19世纪末，美国和德国的工业化进程加速发展，同时法国、奥匈帝国，甚至沙皇俄国也加入了西方世界经济力量的扩张。这种增长就推动了一种世界经济的形成，这种经济使财富流布于各个方向，超越了上流社会的狭窄范畴。最后，西方的经济力量还为20世纪的灾难性战争提供了资源；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欧洲人从他们的繁荣兴盛中得出一种很惬意的错觉，认为只有他们才握有通往未来的钥匙。

这个发展过程还有更黑暗的一面。西方体系是建立在单一民族国家（奥匈帝国例外）的竞争上的——只要那种竞争是与寻求经济和外交利益相关联，它就不会威胁到这种结构的基本稳定。但经济的扩张，赋予了这些国家巨大的军事力量，从长远观点来看，就使得战争既不可避免又富于灾难性。西方的政治经验没有跟上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勃兴。最重要的是，民族主义驱使着政治家和将军们去执行增加了风险性的政策，从而使战争越来越成为一种可接受的选择；同时，公众们也接受了那些有关民族权利和抱负的鲁莽观念，而全然不顾它们的政治或战略后果，结果导致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和普遍的不负责任行为的混合。

技术的发展

帝国主义发展的这几十年里，陆军和海军技术都发生了一场革命，军官队伍的职业化也相应加速。但那种职业化的进程，却为欧洲的军事领导人提供了一种很狭隘的世界观。1813年的普鲁士军官们，像奥古斯特·冯·格奈瑟瑙、格哈德·冯·沙恩赫斯特和卡尔·冯·克劳塞维茨都眼界开阔；而1900年的军官，像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特奥多·冯·伯恩哈迪和坎里希·冯·鲁登道夫，却都是些浅薄偏狭的学究；两者之间的对比是再生动不过了。其他国家的发展过程也存在大致相同的情况。

243

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是，19世纪社会和军事组织不断增加的复杂性；另一个是，改革和拓展了战争性质及社会支持战争能力上发生了一次技术革命。结果，欧洲军队开始不断转向德国的那种参谋部，对它进行认真的研究，重点是将其作为他们军官职业化的范例。但即使是德国的军官队伍，对参谋部的思想也是有抵触的，而在坎伯利（英国）和莱文沃思（美国）建立的参谋学院也是举步维艰。海

军对职业化的进程更为反对：一直到1911年，英国皇家海军都没有一所参谋学院和一个适宜的海军参谋部。

绝对不能低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将军们所面临的问题的复杂性，否则便弄不清这次战争的真正原因。而从1871年起，列强之间并没有大战这个事实，更增加了这种不确定性。此外，军队不得不依赖于平民对欧洲社会政治和经济稳定性的评估，而这种意见又被证明是极度不准确的。

德国埃森的克虏伯兵工厂中一个制炮车间。1840到1900年间，欧洲经济的大规模工业化广泛但不平衡地分配了财富。技术的飞速进步，也为欧洲军队提供了日益复杂先进的武器。到1900年时，克虏伯不仅为德国军队生产武器，也为外国购买者生产武器，而它不断增长的武器生产能力，将使它成为德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对抗整个世界的军火制造中心。但它只是工业化世界中几家大武器生产商之一，这个工业化世界现在已包括了日本，它能迅速扩大生产以满足需求

在军事圈内，科技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发展着，对这种技术变化的适应就足以占据大多数军官的时间。率领舰队于1914年参战的海军将领们，都是在19世纪80年代入伍的，他们的传统和技术更接近于纳尔逊时代而不是20世纪。1880年时的原始蒸汽船和部分铁制战舰许多还带有帆，而海军却已进步到了使用巨大的油力无畏战舰。它载有武器，能在20英里外发射炮弹，时速超过了20海里（巡洋舰和驱逐舰能达到30海里的速度）。配备无线电后，海军可在全世界控制和部署战舰。到一战结束时，潜艇、飞机和航空母舰的引进，标志着影响海战结果的技术发生了巨大变化。

技术对陆军的冲击不那么具有戏剧性，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仍是一个分水岭。1914年的军队仍保有19世纪的那些战术和作战概念，但手动步枪、机关枪和榴弹炮时代的严酷现实，却表明这些军队用以参战的每个战术概念都是过时的。无烟火药使得步兵能隐蔽行动，再加上它所提供的更高的初速，可使其在远距离外射中目标；而硝酸根炸药的产生也让炮弹具有了巨大的毁灭性。最后，能吸收后坐力的炮架，不仅允许炮兵在远距离开炮，而且开炮频率也更快，因为他们不必在每次开火后重新瞄准了。

如果这样的变化在20世纪末看起来很明显的话，那么它们在1914年7月时可并不如此鲜明。军事组织几乎没有机会来处理战争的肮脏生意。在和平时代，他们不能复制出战时的情况；因此，他们发现很难去估计技术和学说变革所带来的影响。这就像已经几十年没做过手术的外科医生们，他们不得不在寒冷、潮湿的手术室里做上千次手术，不仅不吃不睡，还要承受对手从手术室阳台上射过来的冷枪。1914年前的和平年代，使欧洲将军们未能完全理解技术与军事残忍结合后的影响。

244

此外，在外围进行的战争，即大多数对付非洲、亚洲、美洲西部和中亚地区不幸居民的战争，也为许多人提供了一种错觉，认为战争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这种战争只牵涉了欧洲国家的较小精力，因为它们基本上是对抗当地边境

的民族，而他们为保卫自己所动员的经济和技术力量是很小的。因此，这些小型战争都是训练精良、有纪律有组织的军队来对部落人群作战，后者无论多么勇敢，也无力坚持抵抗前者的进攻。

马赫迪和祖鲁人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国家，英国与非欧洲人发生的战争次数最多。苏伊士运河的建成，使埃及处在了英帝国的一个中心位置，原因就在于通往印度的交通路线的重要性。1882年，亚历山大发生的严重的反西方暴乱导致了英国的干涉。9月，加尼特·沃尔斯利指挥的一支英军趁夜晚偷袭，在泰勒凯比尔击溃了埃及军队；一场紧随而至的追击彻底结束了这场战争并在以后的74年内将埃及置于英国的统治之下。

然后，苏丹的麻烦又把英国拉入了尼罗河源头的战争。1883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统治者马赫迪的追随者们，消灭了一支1万人的埃及军队，又使苏丹保持了十年的独立。但在1896年时，霍雷肖·基奇纳领导下的英军开始系统征服这个地区。由于有建成的铁路作为行军前进的援助，基奇纳得以用他们携带的现代军事力量来对付敌人。在恩图曼，一支由4万名伊斯兰教苦修士组成的军队，攻击了基奇纳2.6万人的英埃联军，但却不敌对方快速射击的武器和大炮。战斗的高潮是第21枪骑兵发起冲锋，粉碎了苦修士们的最后一次进攻，这是历史上最后的几次骑兵冲锋之一。战斗结束时，英国人的伤亡低于500人（只有50人死去），苏丹人却有3万名死伤。

进一步向非洲大陆南部挺进后，南非因与印度的联系而受到英国的重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在这里，英国不仅遇到来自原来的荷兰殖民者——布尔人的敌意，还受到了当地黑人，尤其是祖鲁人的仇视。苏伊士运河建成后，英国本可以将南非置之一旁，忽略不管，但在奥兰治河沿岸发现的世界上最大的钻石矿脉，加上对南非矿藏价值的进一步发现，又刺激了英国对它的野心。

1877年4月，英国人吞并了布尔人的一个根据地——德兰士瓦省，因此与当地的祖鲁人有了矛盾。19世纪初的祖鲁皇帝恰卡，曾经建立起一个出色的军事体系，能部署4万名训练精良、纪律严明的武士；但他们的武器和战术能力仍是古罗马时代的。虽然用盾牌和短矛作战，祖鲁军队却表现出非凡的坚毅，在远距离徒步行军和需要时隐蔽自己方面有惊人的能力。但是，英国人却低估了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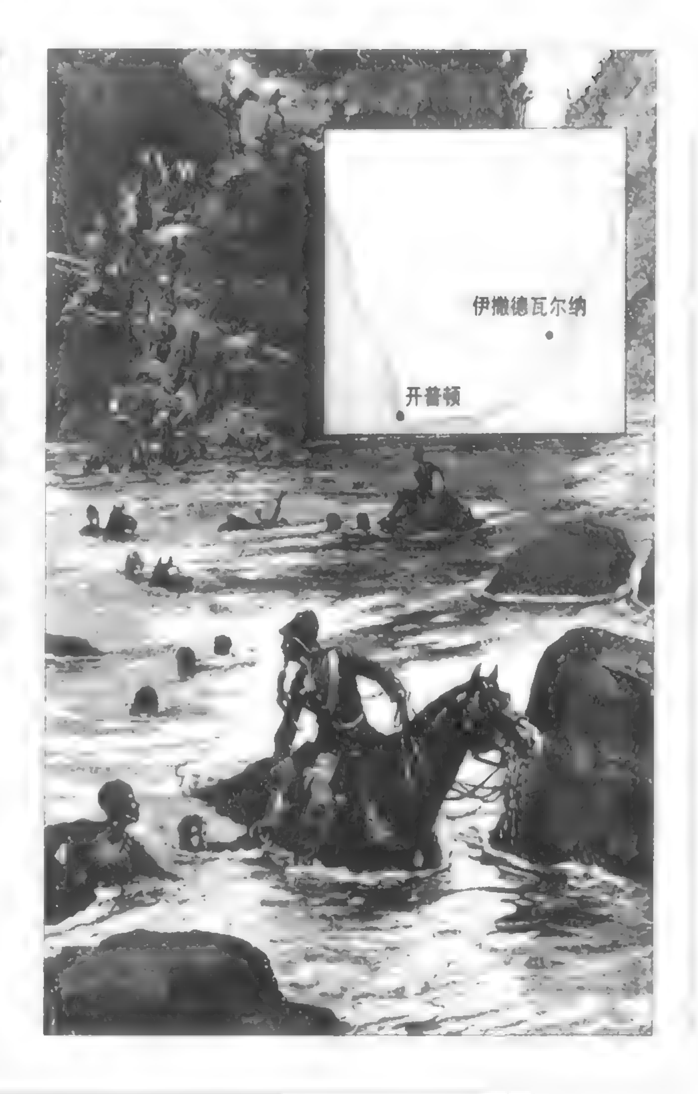
245

1882年，在泰勒凯比尔战斗中帮助击败埃及民族主义者军队后，苏格兰军队在斯芬克斯像前摆姿势合影。到19世纪晚期时，欧洲的军事和技术优势已达到了如此程度，以至于其他文明根本无望抵抗西方的干涉。

1879年伊散德尔瓦纳

[illegible]要求后，驻南非的英军侵入祖鲁人领地。英国派出了大约5000名白人士兵和8000名在当地征募的士兵；而祖鲁人是4万名。与许多在19世纪末屈服于西方帝国主义的民族不同，祖鲁人拥有一支战斗力强、纪律严明并在战场上有很大机动灵活性的军队；但他们是用矛，而不是用枪装备起来的。

英国指挥官，洛德·切姆福斯德，以三个广泛分散的纵队，率军进入祖鲁人地区。祖鲁人出奇不意地在伊散德尔瓦纳抓住了英国人的主要营地，发起了一系列猛烈的进攻，却均遭受了惨重伤亡；关键时刻，英军的补给体系中断，那些掌管分发弹药的人要求有收据。因为英军用光了弹药，祖鲁人的数量优势发挥了作用，英军只有一些幸存者逃出了营地，得以跑掉。但是最终还是祖鲁人输掉了整个战争。



的对手。1879年，洛德·切姆斯福德率军远征祖鲁人。他分散了兵力，而祖鲁人就在他的先头军队周围隐蔽活动。1月22日，祖鲁人冲进了英国人在伊散德尔瓦纳的营地；由于当时英国军官犯了严重的战术错误，再加上那种愚蠢的补给体系——它居然在守军申请弹药时要求有手写收据，祖鲁人几乎杀光了英国人。

那天傍晚及夜里，挟胜而来的祖鲁人进攻了罗克渡口的一个小前哨，它由包括病人在内的大约一百名士兵防守着。在一场英勇的抵抗中，英国人击退了祖鲁人的进攻狂潮；步枪的杀伤力重创了进攻者。随之发生的一系列殊死激战，使得大量援军能够及时赶到。1879年7月4日，切姆斯福德率领4200名欧洲士兵和1000名当地军队，到达了祖鲁首都；面对一万多名祖鲁人的猛烈进攻，欧洲人大开杀戒，摧毁了祖鲁人的中坚力量。

但英国在南非的麻烦还远没结束。1880年末，布尔人在德兰士瓦省起义。一个月内，他们就已侵入了纳塔尔省，并击败了像对待祖鲁人一样完全低估对手的英国军队。1881年2月，布尔人再一次公然与英国人交战，并利用隐蔽和步枪火力的优势第二次打败了他们，并打死了指挥这次战斗的英国的将级军官。英国政

府认为对布尔人不值得大动干戈，便承认了他们独立的共和国；但这两次战斗却反映出布尔人是多么强劲的对手。

西部是如何赢得的

当英国在南非发动对黑人和布尔人的战争时，刚打完内战的美国人，也解决了他们自己的"内部问题"，实际就是划定了在西部的边境，将"文明"带到美国统治的所有地方。菲利浦·谢里登将军那句值得回忆的评价——"我惟一见过的印第安好人就是死人"，总结了大多数在西部负责"治安行动"人员的态度。印第安人是经验丰富的战士和坚韧不屈的对手，但他们缺乏组织技能和坚持一场战争的能力。一旦与其狩猎地隔开、得不到武器弹药，他们就注定要失败。

最大的印第安战争是19世纪70年代中期对苏族人的战争。1876年6月，一队美军与"狂马"率领的苏族武士发生了激战。双方都向后撤退了，但第二队美军又继续向前挺进，并派出由阿姆斯特朗·卡斯特指挥的第七骑兵队作先头部队去拦截苏族人。但卡斯特没有遵守命令。一头金色卷发、身穿鹿皮夹克、衣饰华美的卡斯特，率领一部分军队直捣印第安人的主营地。而剩下的队伍，则由不那么渴求光荣、信奉"谨慎是勇敢的精华"这句格言的人带领。结果，卡斯特和他的队伍全军覆没，这场战败被画在密苏里州西部所有酒馆的墙壁上，因而得以不朽。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获胜的苏族人避免与美军接触，但那些负责战役的人却持续他们的追击，一直到入冬。1876年11月，美国正规军发现了印第安人的一个主要宿营地，在一次出奇不意的夜袭中，消灭了它的大多数居民。1877年1月初，美国军队追上了"狂马"，炮轰他的营地，使印第安人四处惊逃，就此瓦解了苏族的抵抗。

而比苏族的抵抗更激烈的是内兹珀斯人的反抗。这个部落拒不服从美国官方要求他们放弃俄勒冈土地的命令，于是战斗爆发了；内兹珀斯的领导人约瑟夫族长率领300名武士和700名族民向东行进。1877年夏天在爱达荷州，约瑟夫从占人数优势的白人军队中杀出一条血路，到达了蒙大拿州。他的勇士们不仅表现出狩猎部落天生的技能，还在战场上表现出非凡的纪律性。内兹珀斯人继续他们穿过蒙大拿的行程，几乎已经到达了在加拿大的避难所，这时被十倍于己的美国军队逼进了鹰溪湾，最后被迫投降。

十年后，美国军队发现自己正与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阿帕奇人进行着一场游击战。阿帕奇人由杰若内穆指挥，实行一种打了就跑的战争。而使正规军在这场战争中特别受挫的是阿

内兹珀斯的约瑟夫酋长（海因穆特·托亚拉克特）具有经验丰富的军事领导能力，这使得他的人民在美国军队试图将他们移往印第安人保留地时，能从俄勒冈杀出一条路，几乎到达了加拿大。但1877年在蒙大拿，白人士兵的人数最终远远超过了内兹珀斯人。约瑟夫死于1904年。

247

小比格霍恩河战斗，画者是当时在场的一名北部夏延部落的印第安人怀特·伯德。乔治·卡斯特过于自信，率军向配有连发枪的苏族武士发动进攻，但被后者全部歼灭。

帕奇人徒步长途行军的能力。通过在此地区的荒漠中集结了大量的优势兵力，美国正规军才迫使他们就范。

当英国和美国从事特别的殖民地战争时，一些类似的冲突也在别处发生。俄国人在中亚作战，而法国人在1847年控制了阿尔及利亚后，也将自己扩张成一个包括印度支那和中非大量领地在内的帝国。西方人无论进军到哪里，其他存活下来的文明中心都处于守势。

奥斯曼帝国仍在继续着它那漫长的走向灭亡命运的衰败。1876年，依靠当地穆斯林的热情帮助，土耳其人镇压了基督徒在波斯尼的一次起义。塞尔维亚人赶来帮助他们的兄弟，但自己也在土耳其人手中吃了败仗。这时候，1877年初，俄国插手干涉。一支由海军支援的俄国军队，占领了多瑙河口。然后俄国人赢得了一系列对土耳其人的胜利，他们的快速进军已经威胁到土耳其对巴尔干南部的控制。但俄国人却停下来进攻了普莱夫纳要塞，并在5个月后占领了它；接下来，他们将战火带到了康斯坦丁堡门前。但此时，其他列强也参与进来，阻止俄国摘取其胜利果实。《圣斯特凡诺条约》（公元1878年）承认了塞尔维亚、蒙特内格罗和罗马尼亚的独立，保加利亚也变成自治国家。欧洲人虽然大获全胜，但却分歧重重，不能就此宣告奥斯曼帝国的灭亡，所以土耳其人在控制中东的同时，仍在欧洲占有一席之地。

249

布尔战争

1886年威特沃特斯兰德地区金矿的发现增加了布尔共和国已知矿藏的价值。此时，继1887年吞并祖鲁人领地后，英国人已切断了布尔人入海的通道。角省殖

民地和伦敦的野心已加剧了南非地区的紧张局势。成千上万名冒险者涌入德兰士瓦来碰运气，外来者与布尔人之间的紧张也急剧上升。

“破坏者”莫兰特（这是他航海离家前所摄的一张照片中的形象）和其他奥地利人因为屠杀布尔平民而被处决。虽然对他们的惩罚按军法来说是正确的，但许多英国人的所作所为却没有受到“军法”的制裁。在许多奥地利人看来，单把他们的士兵挑出来处决，不外乎是为众多犯有同样罪行的人充当替罪羊。作为呼吁抗议的结果，奥地利政府废除了对它士兵们的死刑惩罚——一战中的许多奥地利人觉得可以自由表达他们对参谋军官们的意见，以及对专横凶狠的军警们的看法，这使他们与英国士兵和其他多米尼加士兵得以区别开来。

布尔共和国没有一支传统意义上的军队，只是将松散的民团编成了义勇军。他们的领导人无论在战略还是战术上都没有一致的主张，而义勇军即使在最鼎盛时期，纪律也是涣散的。但布尔人的确拥有现代步枪，他们的战士也都是出色的神枪手。他们了解南非的无林草原，并在开垦这片严酷凶险的土地的斗争中，拥有了一种坚韧精神，与他们作战的英国军队纪律严明、组织良好，但几乎没有一位将军了解南非的情况，军官和士兵们都普遍轻视这些与他们作战的农夫们。

布尔人意识到英国人正在组织优势兵力，就以1889年10月对纳塔尔省的一次入侵推动了这一敌意。但他们这样做，也使他们失去了操纵英国公众的同情。可是在整个战争中，大多数欧洲人的同情都倒向布尔人，虽然皇家海军使这种同情不能转化为有意义的支援。但是，行动迅捷的布尔军队很快就孤立了马弗尔和金伯利，并在一个月内在莱迪克密斯诱陷了第三支队英国军队。英国人赶快去救援被围攻的城市。11月末，一支由保罗·梅休因将军领导的1万人的军队，打出一条通往莫德河的道路并试图到达金伯利，却遭受了近500人的伤亡，而布尔人几乎未失一人。无烟火药和手动步枪使布尔人能发出一种残忍的火力，使英国军队的步枪和大炮都瞄不准敌人；但任何穿越由看不到的布尔人控制的死亡区的行动，都要遭到难以接受的伤亡。

更糟糕的还在后面。1899年12月的第二周内，英国人尝试了一连串的失败，使此周变成众所周知的“黑色星期”。12月10日，一支由加塔克爵士率领的军队被消灭了：布尔人在斯托姆贝赫附近伏击了那次混乱的进军，给英国人造成惨重伤亡。同一天，在马格斯冯滕，梅休因向守在牢固战壕里的布尔人发起猛烈进攻；他的军队一无所获，只是再次承受了严重损失（死210人，伤675人）。因为英国步兵和炮手们几乎从未看见这些防守者，布尔人再一次几乎无任何伤亡。五天后，南非总司令雷德弗斯·布勒将军，试图在渡过图盖拉河后，转向布尔军队的侧翼。但英国人却在困难的地形中陷入混战，布尔的步枪手们狠狠打击了英国军队。英国炮兵再一次没能发现布尔人的防守阵地，却让布尔人杀死了自己的大多数炮手。进攻者死143人，伤756人，失踪220人。布尔人获得了11门大炮，却只损伤了50人。

如果布尔人是一支纪律良好的军队，他们本能将他们的胜利变成一次真正的成功。但他们却没这么做，而英国人也撤退了。布尔指挥官们发现现在很难将他们的人留在战场上，因为大多数人认为战争已打赢了；当每个士兵都强调自己的需要时，他们缺乏的纪律性导致了义勇军的解散和以后的改组。而另一方面，英国人拒绝让自己如此受辱。英帝国的四面八方的力量都汇集到米字旗下，来自英国、加拿大、奥地利和纽泽兰的大量军队涌入了南非。不管将军和士兵们为第一

左页图：按照英国标准，布尔义勇军看上去就像一群衣衫褴褛的乌合之众，但英国人却是几乎完全以外表为基础来衡量军事战斗力的。布尔人拥有最现代的步枪，从孩提时代就纵马驰骋于南非的疏林草原，并从他们的荷兰祖先那里继承了内在的固执与勇气。在适当的环境里，他们能成为极其出色的战士，在第一次布尔战争中，由于英国指挥官的战术愚钝与无能，布尔人的这些素质得到了完全的发挥与体现。

250

同战争中其他早期战斗相似，斯皮温山之战极可能发生在地形有利于短兵相接的区域。在发起进攻的英国部队尚未搞清布尔人的阵地在哪里之前，布尔人的步枪队就已给进攻者以重创。就像在后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初年出现的情况一样，炮兵不能打击尚未视及的目标

次冲突所做的准备如何不足，帝国的资源却不可避免地注定了最终的结局。但事情并不是迅速转变的。布勒又发动了两次以上更大型的攻击，试图突破布尔人阵地，但他的军队在斯皮温山和法尔山遭到了更惨重的伤亡，而且仍旧无所进展。两次战斗的总损失是408人被杀、1390人受伤、311人被俘，但布尔人的伤亡还不到100人。

一位新任指挥官洛德·罗伯茨将军接管了这场战争，由基奇纳做他的参谋长。罗伯茨采用运动战，用骑兵去包抄布尔人阵地。1900年2月，英国人解围了金伯利，并在马格斯冯滕前击败了布尔的主力军。但由于罗伯茨临时生病，基奇纳对驻扎在帕尔戴伯格的敌人发动了直接进攻，得到了以往的结局，320名英国士兵被杀，几乎1000人受伤。布尔人本可以脱身，但他们的指挥官皮特·克龙杰拒绝抛弃他的伤员。到这个月末时，罗伯茨已经俘虏了克龙杰手下的布尔人，使英国人享受了他们的第一次大胜。当英国军队对敌人施加了绝对优势的压力时，更多的胜利接踵而至。因为克龙杰的军队投降了，布勒得以穿过图盖拉河救援莱迪史密斯。英国人很快消灭了布尔共和国，于1900年5月吞并奥朗治自由省、9月吞并

了德兰士瓦省。

从传统意义上说，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了，但在现实中它却只是开始。传统上的抵抗崩溃后，布尔人返回了他们的家园，但却拒绝接受将他们的国家置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结局。他们转向了游击战，由袭击小分队毁坏英国的交通联络和补给线，当地的居民也为他们提供隐蔽处、食物和英军行动的情报。由于对敌人的动向了如指掌，布尔人能够进退自如地打击敌人而避免重大伤亡。另一方面，英国人的作战则大多是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采取行动。

251

为了挽救日益不利的形势，英国人修建了一系列的碉堡和围栏，以保护他们的供给地和交通线。在试图粉碎布尔人的抵抗失败之后，他们转而攻击布尔游击队所依靠的平民支持者。将平民居住区封锁起来，把12万布尔妇女和儿童投入集中营。其中大约2万人由于受到漠不关心的冷遇而死于疾病和饥饿。英国人还使用大量非正规部队去追踪搜捕布尔游击队，将战争引向广大农村，结果，虐待和屠杀平民的丑闻不断发生。英国人的“兽性和残暴”最终摧毁了游击队：1902年5月，布尔人被迫承认了英国人的统治，英国人“赢得”了这场战争。但是1902年以来南非令人悲哀的历史表明，没有一方是赢家：不是英国人，不是布尔人，当然也不是目击了这两个白人种族在他们的土地上展开血腥争夺的黑人。

英国人利用他们资源和人力上的优势赢得战争——在战争结束时，他们在那里已经组成了30万人的部队——他们情愿将其军事力量集中在南非。布尔战争对英国军队造成了相当的冲击：最重要的是，它导致了对步兵训练的强调，从而使英国在1914年创造出了最优秀的阵容整齐的士兵队伍，但它在改变军官队伍的基本态度方面却做得很少。历史学家们喋喋不休，诉说着英国将军们在吸取布尔战争的经验教训方面的无能。实际上，他们的确已意识到了现代武器杀人的威力，但在与装备更先进的欧洲大陆敌人相对抗时，英国的将军们发现，为了适应战争的新情况，无论是自我调整，还是再来一番革新，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52

日俄战争

在所有非西方的文明中，只有日本表现出了吸收西式武器并转而将它们用来对付其发明者的能力。很少有人预见到这一点。自从17世纪早期以来，日本德川幕府的大将军们就摧毁了他们所有的敌手，开始通过限制轻武器（其实是任何形式的武器）的拥有权，并通过在贵族庄园中摧毁一切武装，只允许留下一座城堡这样的方式，来寻求日本社会的非军事化。同时，他们还扼制国民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严格检查一切外来书籍（尤其是那些关于军事问题的），并且还把对外贸易都集中在遥远的长崎港。另一方面，由于国内持续了200年之久的和平，日本经济繁荣起来：农业生产、国内贸易、产品制造，以及银行信贷，所有这一切都迅速发展。1800年以前，20%的日本人口居住在城镇，而到1850年，已有40%的日本男性能够阅读书报。此时的日本也许仍然缺乏西方的驱动机械和科学知识，但它却拥有大量娴熟的技工，一个高效的贸易和金融网络，此外，乡村和城镇都已具备了足够的对各种压力做出成功反应的能力。首先，是美国在1853年施压，企图使日本对西方贸易实行“开放”。德川幕府政权于1868年倒台，权力移交给另

253

日军炮兵正在装载18个"大阪宝贝"之一——自日本本岛带来的大炮部件，在1904年打响的旅顺包围战中，它们被用于发射500磅型炮弹以对付俄国的各战略要塞和堡垒。从日本制造现代武器的工业能量来看，它已跨入了现代工业国家的行列，就像俄国从自己惨重损失中所发现的一样

外一批领袖，这些领袖已经意识到，日本要么进行变革，要么屈从西方列强做亡国奴，二者必择其一。在1/4个世纪之中，日本如此高效地进行了它的现代化进程，以至它已能够在亚洲本土部署它的新式武装部队——英国训练的海军和德国训练的陆军——并能击溃中国（公元1894～1895年）。日本得到了台湾，仅仅由于俄国的介入才失去了对朝鲜的直接控制。

整整下一个十年中，日本和沙皇俄国不断走向更激烈的冲突。绝大多数欧洲人都相信俄国将轻松击败日本（民族的偏见使西方低估了日本的军事能力，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从军事和经济力量的角度看，日俄战争本来也确实应是俄国胜利。但沙皇政权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方面，越过西伯利亚，它只能部署很有限的力量，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是一条单轨线，在贝加尔湖两岸被切断，所有的物资在湖的一岸都必须先卸下来，运到湖对岸，再装到列车上。另一方面，更为严重的是，沙皇尼古拉二世对政府问题抱着一种天真的想法，并轻信了那些毫无责任感的腐败议员，而正是他们使俄国陷入了革命状态。

双方冲突发生了，因为每一方都旨在控制朝鲜和满洲。但俄国在贝加尔湖东岸仅拥有10万兵力，而且它的经济力量只能勉强支撑这样一支部队。相反，日本却能迅速向亚洲本土投入一支25万人的固定部队，同时还拥有两倍于这个数目的后备军。海军方面，日本舰队支配着亚洲水域，而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若要越过

成千上万英里的距离到达太平洋却困难重重。此外，和英国决定性地携起手来，也为日本的安全提供了保障：若英国不参战，则俄国按照约定就不能从它的法国盟军那里接受直接的帮助。

1904年2月，日本的鱼雷船未经宣战便向旅顺港的俄国舰队发起了进攻。它们击沉了一些船只并将俄国军队封锁起来。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英美会议大体上赞同日本，居然向大胆的进攻者表示敬意（这与1937年之后他们对珍珠港事件的反应讽刺性地形成了强烈对比）。日本军队还在仁川打击了俄国船只，一个星期之后，日本第一军在仁川登陆，占领汉城。在朝鲜站稳之后，日本向北一直进军到鸭绿江畔，并拟向满洲的俄国军队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

俄军统帅阿历克谢·库罗帕特金将军计划撤进满洲内地，让旅顺港去抵抗围攻，同时等待穿越西伯利亚而来的援军。这一步骤应能取得相当效果，但沙皇的总督却下令迅速进攻，结果是日本第二军使防守鸭绿江的俄军领教了一次惨重失败。同时，日本海军第二支部队在旅顺港东北的辽东半岛登陆。第三支军队也在鸭绿江西部登陆。日军对旅顺港的包围渐渐形成了。同时，另外一些部队使围攻瞒过了满洲中部的俄军。从作战方法的运用上看，此情形与1854～1855年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极为相似，当时的围攻发起者也是必须阻止俄国军队，以免他们突破至被围海港。

254

5月末，日军对旅顺港周围前哨阵地发动了初次进攻：他们把俄国军队拖下了南山高地，但却遭受到三倍于敌人的伤亡。由于尚有足够的储存以支撑过整个夏季，且俄军占据着一个坚固的据点，所以，在陆地和海洋上，非决定性的小规模战役形成了夏初战斗的主要特征。然而，8月中旬，日本发动一次小型的集团进攻，日军最终占领了俄军的一些重要阵地，但俄军的机关枪和大炮却对密集的日军造成了1.3万人的伤亡，而俄军在战斗中仅损失3000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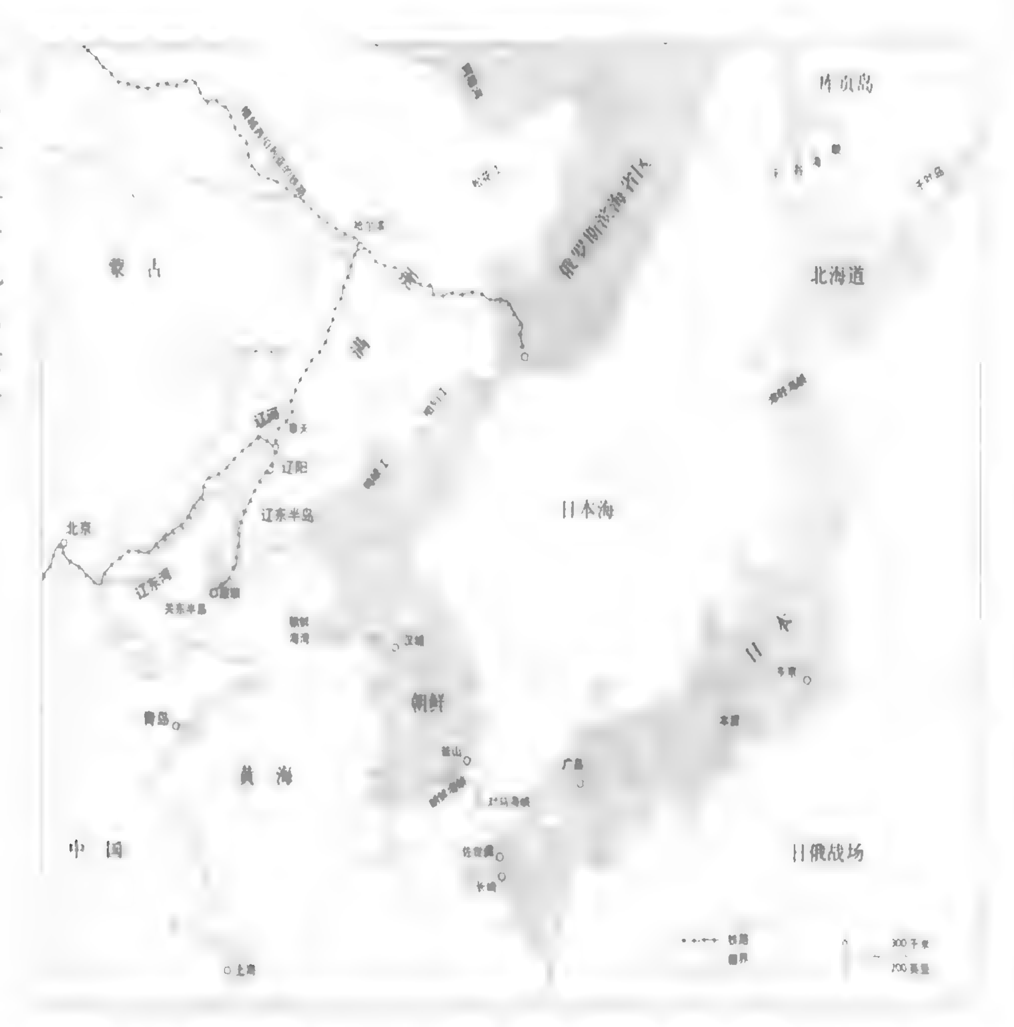
9月末，日军重新发动进攻，这一次他们伤亡更重，而且未取得任何重要成果。11月末和12月末的第三次和第四次进攻也仅仅增加了这种毫无意义的牺牲。于是，日军全力进攻203高地，这是俄军的防御轴心。到12月5日，他们终于将守军逐出了阵地，但又为此损失了11000人。占领203高地，使日本大炮得以摧毁俄国远东舰队的残余力量。但直至1905年1月，他们才迫使俄军投降。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在当时的对垒中饥荒情形严重，但日军却在敌人的防御工事中发现了大量的粮食储备。

在日军进攻旅顺港的同时，中部满洲里也发生了重要战斗。从1904年6月开始，双方逐渐向大型交战演化。8月下旬，双方军队在辽阳交锋，当时日军数量共12.5万人，俄军加上欧洲来的第一支增援部队共15.8万人。首先发动进攻的是俄国人，但气势汹汹的日军的反攻使俄国将军们认识到日军的强大力量。双方最后伤亡几乎对等：日军2.3万人，俄军近2万人。但俄国人承认了他们的失败，并向回撤军。

欧洲援军源源而来，库罗帕特金的部队增至20万人，而日本援军也使其部队数目增加到17万人。10月初，俄国人在沙河进攻日本人的右翼，试图切断日军的交通线；然而，日军向俄国人的中部反攻，几乎将其突破。库罗帕特金停止进攻，绝望中回转去救援其心脏地带。这一次，俄军比日军损失严重：4万人对2万人。

255

日俄战争的战场靠近日本的军事基地，但俄军却要么横越6000英里的西伯利亚、要么绕非洲、亚洲航行2万英里才能将其部队运送过来。20年以前，由于俄国享有的技术优势，这个距离或许无关紧要，但到了20世纪初，它却关系重大，因为日本此时也已经拥有了同样先进的武器和技术。



尽管满洲严寒的冬天已经到来，双方军队却仍然在不断加强各自的力量。到1月中旬前，俄军有30万人，日军人数也已达22万人。1905年1月26日和27日，俄军重新发起进攻，几乎击破敌人；设若他们知道发扬自己的长处，他们可能会突破日军阵线。但战斗发生在一次暴风雪天气中，混乱和模糊使俄国将军们失去了决定性的机会，前线因此重归稳定。

到2月末前，日军得到来自旅顺港部队的支持，终于取得了与对手同等的实力：双方现在大约都拥有31万兵力。2月21日奉天会战开始。日军陆军元帅大山郁夫派遣他的第三军自侧翼包抄俄军右翼。虽然双方都致力于从侧翼挫败敌人，但是，部队进攻的速度和致命性的作战武器使这种努力注定失败。日本人将俄国人逼进了绝境——仅靠前线剩余军队作为后备支援才使其免于溃散——而且，虽然他们的进攻没有封锁俄军，但两个星期的战斗之后，日军进入了奉天。又一次持续三天的激烈进攻强迫俄军全线后撤。俄军已被彻底击败，损失超过10万人，而日军伤亡仅7万人。

当战争在满洲发生的同时，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搭乘一支环球探险队的船只前来解旅顺港之围。这支舰队由一些过时船只临时拼凑起来的，缺乏训练，物质上也缺乏对这种长途旅程的准备，更不用提什么大型的舰队行动了。它在沿途几乎未得到什么帮助。一次史诗般长达2万英里的旅程之后，32艘俄国船只终于在1905年5月27日到达东亚海域。然而到达对马海峡时，他们发现自己正处在日军炮火的射程之内，并已落入敌人圈套。双方舰队作战持续了一整夜，日军的优越

性表现得更为显著。虽然有几艘船侥幸逃脱，但波罗的海舰队却已不复存在。

对马之战代表着俄国的最后喘息。在沙俄境内的大多数中心城市，革命已经爆发，因为对于许多目睹尼古拉和他的顾问们做出的每一个拙劣的国内外重大决策的俄国人来说，他们的军队所蒙受的这一耻辱，终于使人忍无可忍。国内政权曾有一次几乎就要崩溃了，但最终还是幸存下来。不过，在沙俄内部因不满而人声鼎沸之时，日本也承受了战争的巨大创伤，国内金融已接近崩溃的边缘。1905年9月，通过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中间说台，双方终于接受了和平妥协。俄国放弃旅顺港、朝鲜和满洲。日本在前两个地区获得了决定性利益，但直到1931年，才彻底控制了满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亚洲的失败再一次将俄国注视的焦点移回了欧洲，尤其是巴尔干半岛。

就已经发生的情况而言，满洲的战争已经预示了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上将为人熟知的现象。在每一个地方，都是炮火连天，各国士兵遭到大规模的屠杀。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已意识到了这一事实。其中有些国家最优秀的战士也死在战场上——就英国而言，如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就德国而言，如杰出而刻薄的马克思·冯·霍夫曼（此外还有其他人）。不过，战争也使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们确信，一个国家不可能长期承受大规模冲突带来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压力。俄国难道不是在不到18个月的战争之后就陷入了无政府和革命状态之中吗？而日本不是也濒临破产的边缘了吗？因此，教训是很显然的：一个国家必须在大规模战争开始之初就赢得胜利，必须尽最大努力聚集起哪怕每一"盎司"的兵力。有的分析家相信，要取得胜利，部队中的最后一个营的战士也得战死沙场，他们须像日军在进攻旅顺港中表现出来的同样孤注一掷的自杀精神去对敌作战。然而，这是个错误的结论。

通向阿尔马盖敦之路

很少有人像温斯顿·丘吉尔那样出色地描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其对战争的叙述中有这样的评论：

> 在对大战原因的研究中，有一点已经显明出来：那就是大家都普遍意识到世界命运单由一些个人来掌握是有问题的。有句话说得好，"人类事件中错误总比设计的要多"。人类思维的有限性（即使是最能干的人物），他们受到争议的权威，他们身处的观念气候，以及他们对重大问题偏袒的对待等等，都使这一点不可避免，那问题远远超出了他们思维所能及的范围。它在规模和细节问题上如此庞大，各方面的因素又是如此多变……事件……已踏上了既定的轨道，没有人能再把它拉下来。德国固执、鲁莽又万分尴尬地叮当作响地走向弹坑，并拖着我们所有人跟它一起向前滑去。

257

俾斯麦在统一战争中的战略上的胜利，以及其后娴熟的外交政策，曾一度将新帝国领入了欧洲一个独一无二的地位，但是他的后继者们没有看到德国位置的优越性，而且也未意识到，任何使德国成为欧洲霸主的企图都将使其它国家联合

凯泽·威廉二世（公元1888～1918年）非常热爱他的海军和他的地位赋予他的这套海军制服。然而他的帝国为他所做的那个漫不经心的"世界帝国"之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德国制定的排斥英国海军的作战计划，促使英国警醒并与法俄结成了同盟，以封锁德国走向欧洲霸权的道路

起来对抗它。这部分是由于俾斯麦的错误，他从未清楚地阐明他的政策，而且他没有对军事装备问题置于宪法的控制之下。年轻的凯泽·威廉二世开除了俾斯麦，从而将新一代德国人引入了国家权力之中，这新一代的德国人几乎没有感受到俾斯麦对军队所使用的控制。他们崇拜战争，而俾斯麦仅把战争看成一种工具。最重要的是，他们相信德国具有无限的潜能，并拥有权力（因为德国的文明和文化）将这种潜能转变为"阳光下的地带"。使情况变得更加危险的是，德国的高层军事领导人已不再需要克劳塞维茨那种把战略看得高于一切的信仰，对新世纪的德国人来说，重要的只是必须进行战争，必须采取行动。

俾斯麦一被免职，从大臣及法官干预下解放出来的那些德国外交部的专家们就说服威廉取消了1887年与俄国共同签署的"再保险条约"。这一协定承诺：当协约一方和第三方发生战争时，另一方应保持中立。他们相信法兰西共和国和沙皇俄国绝不会结成联盟，然而1891年沙皇在演奏法兰西革命歌曲时居然脱帽肃立，一年之后，两国结成同盟。如今，倘若大国之间的冲突爆发，德国将面临两面作战的可能。

下一个20年期间里，很难从德国所追求的政策中看出他们有什么明确目的。1894年，凯泽读了美国海军力量的先见者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著作后，坚定地认为德国要想登上世界帝国的位置，必须建立一支庞大的舰队。凯泽的这种热情毫无疑问是由他和他的英国侄子们之间的爱恨关系所激发出来的。直到1897年，他才找到他的海军上将艾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这个人既有野心又有杰出的政治天才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蒂尔皮茨创造了土地贵族和工业家之间的有效联盟，以保证海军建设的资金来源。他分辩说，建设一个这样的舰队将会迫使英国尊重德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利益，而且，由于英国和法俄联盟一直存在利益冲突，德国完全可以建设这样一支庞大的舰队，而不必担心英国从中干预。此外，蒂尔皮茨还坚持其它一些假设：战船造价将保持稳定；英国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国家不可能进行漫长的军备竞赛；而且，英国将不会与它古老的敌人法国和俄国结盟。最后，在蒂尔皮茨战略的核心部分，还抱着这样一种假想，德国舰队最终将得到足够的力量击败英国皇家舰队，而且它的舰队将在一个下午之内，就能从英国手中夺去对世界各个海洋和国家的控制。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直到1914年战争爆发，德国还没有制定出一个方案，以明确计划假如英国并不对德国各港口发动密集的封锁，那么德国该如何使用它的海军。蒂尔皮茨的最大错误在于，他未意识到英国的地理优势赋予

了它一个几乎不可攻克的海洋地位：英国的许多小岛正好位于德国进入大西洋的通路上，在英吉利海峡和北海出口封锁德国对英国皇家海军来说易如反掌。但什么也不能阻挡德国继续推行其计划的疯狂念头。

军备竞赛开始

1906年，英国海军部的革新领袖约翰·费希尔爵士发明了一种革命性战船：无畏战舰。这种装备齐全规模空前巨大的战舰令过去的所有战船黯然失色。靠这种领先技术，英国开始以最快的速度制造新的战船。从短期看，战船设计上的新变化使船只的造价提高了两倍，从长远看甚至将提得更高。但德国加强舰队建设对英国控制权所造成的威胁促使英国议会决心赶上——实际是超过——蒂尔皮茨计划的每一个脚步。丘吉尔某一年的讲话表现了这种情况的特征，“海军部要求6艘（战船），国会提议4艘，而我们则将其调整为8艘”。而且，一系列外交协定（以1902年与日本结盟开始）允许英国把它的舰队集中在北海以对抗德国的威胁。

德国不断加强海军促使英国在1904年和法国达成了和平协议，这解决了两国之间的许多突出矛盾。德国于是在摩洛哥问题上挑起一场外交危机，以此作为回答并试图瓦解增进中的盎格鲁—法兰西的友谊。但这个举措使这两个国家走得更

1911年，英国的一支由无畏战舰组成的舰队喷着气驶往英吉利海峡。1906年2月10日派出的HMS无畏战舰代表着海军力量平衡的一个意义深远的改变。这艘无畏战舰以其使用巨型大炮（10门口径12英寸的大炮）的突出特点和具有的重型装甲设施，建立了一个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标准。所有重要帝国（以及绝大多数较小的追随国）当时都加紧将资源投入在这种“无畏战舰”的制造上；但由于英国起步早并享有技术优势，它一直在这场竞赛中保持着领先地位。

近。1907年，作为对德国政策的反应，英国又与俄国达成了和平协定，同样解决了彼此间许多突出的争端。虽然这些协约没有使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国家结成正式联盟，但它们创造了一种利益上的沟通和交流，德国正确地领悟到了这种交流就是与它的敌对。接下来的几年中，英国不断通过一此军事协定加强其与法兰西的联系，1912年，它甚至将其地中海舰队一直推进至北海；作为对英国承诺保护法国在大西洋利益的回报，法国也同意保护英国在地中海的利益。但法国最大的承诺却是——没有通知整个内阁——在必要的时候，英国远征军将由法国护送进入欧洲大陆。

所有这些都未能使德国死心而停止那个将危及其长远战略利益的武器计划，但日益增长的欧洲紧张局势却在1912年导致了德国战略重点的改变。从1900年起直到此时，德国尚未进行过任何行动上的扩张或对计划中的限制性成分进行任何修订，但此刻的局势已非同一般。每个人都能看出，就战争形势而言德国战略几乎完全依赖于施利芬计划，而且直到1913年，德国仍然缺乏足够的军队去施行那个德国命运所依托的作战计划。军队的不足导致了两个缺憾：首先，直到1912年，参谋本部还未将其宏大战略的完整蓝图送交作战部；其次，保守党的避难所即作战部，一直反对军队力量的膨胀，因为此种做法将增加中层军官的数量并因此而削弱贵族对军官队伍的控制。由于凯泽没有一个权威中心控制军队——超过40个参谋官就有直接接近他的权力——不同力量之间便常常争吵、辩论不休，而实质性的问题却迟迟得不到回答。

1912年总参谋部在领导人之一埃里希·鲁登道夫上校的领导下，最终粉碎了作战部对提高军队权威化的反对。结果是帝国议会在1912年和1913年增加了军队的消费水平，以供养16.5万名新增的士兵，而且作为计划的一部分，同时还将和平时期的军队数量由54.4万人增至87.7万人。这样，1914年德国军队便具备了足够的力量去施行它的施利芬计划。为了复仇，保守党曾迫使鲁登道夫离开参谋本部并给了他一份暧昧不明的部队统治权，但是并不能阻止他再次回来。

暴风雨在聚集

巴尔干的一系列危机为即将到来的欧洲战火提供了火种。一方面，奥斯曼帝国极其虚弱，另一方面，奥地利和俄国又野心勃勃地想要使这种情形加剧，两者刚好结合起来。另外，每个东方国家都感觉到了内部政治动荡的威胁，因此都在寻求通过外交努力来逃避国内的困境——这种努力开始于巴尔干。1903年，一群激进的民族主义军官掌握了塞尔维亚的权力，他们追求一种激烈的反奥地利政策。这使奥地利越来越将法俄支持下的塞尔维亚视为其生存的直接威胁。1908年，在一种离间塞尔维亚和俄国愿望的驱使下，他们与俄国达成了一个协议，得到了俄国战船帮助其打开博斯普鲁斯海峡大门的回报。通过这个协约，奥地利取得了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纳那的权益。在这一事件当中，奥地利吞并了波斯尼亚，而俄国却一无所获（因为其它帝国的反对）。德国在羞辱俄国人方面扮演了一个很活跃的角色，凯泽将他自己描述成了一个策马援救奥地利的侠义骑士。

1911年9月意大利人进攻土耳其在北非的利比亚省，进而夺取了佐泽卡尼索

斯群岛，由此开始了巴尔干纷争的第二个回合。意大利人的这些行动使巴尔干各国纷纷谴责沮丧的土耳其人：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和黑山全部参与进来。但小偷们很快由于这些掠夺品而陷入争吵。塞尔维亚、希腊、黑山，接着是罗马尼亚联合起来狠揍了保加利亚，甚至土耳其人也参加了。虽然塞尔维亚人在战争中攫取了在规模上两倍于自己国家的土地，但奥地利人却阻挡了他们进入亚得里亚海和世界海洋的通路：德国又一次阻止俄国支持塞尔维亚，而在德奥建立了强权联盟之后，塞尔维亚被迫做出了让步。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王位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他的妻子在波斯尼亚的萨拉热窝被刺杀。奥地利警方和军队长官逮捕了一个可疑的恐怖分子。由于谋杀者年龄还小，所以他们没被判处死刑；射出决定性一枪的加弗利尔·普林西波被判处20年监禁（但他在1918年死于结核病）。然而，奥地利以对塞尔维亚宣战作为对此次暴行的最后反应，并决定利用这一事件来消除塞尔维亚对它在巴尔干半岛进行扩张的反对

19世纪时，俾斯麦曾经声明，巴尔干半岛甚至不如一个波美拉尼亚手榴弹兵的骨头那么重要。那么是什么改变了德国的政策呢？最引人注意的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威胁，德国人始终认为他们处在可怕的危险之中。在内部，刚刚放弃其革命活动的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社会民主党在新近的选举中赢得了更多的选票，就此而言它已是帝国内最大的政党；在外部，尽管已花费了巨额投资，与英国的海军军备竞赛却远未结束；而且英国看起来好像已经与德国在欧洲大陆的敌人结成了同盟。而且，那些敌人尤其是法国和俄国，正在稳步增加他们在大陆的地面部队的力量。俄国已经抛出了一个拟在1917年完成的防御计划，这一计划将使俄国军事力量掌控中欧的能力急剧增加。因此，奥地利便成为德国最后的重要同盟；如果帝国不支持维也纳，连奥地利也可能掉转方向从而使德国在欧洲大陆上孤立无援。

当德国的领袖们对国际环境忧心忡忡之时，奥地利也陷入了绝望。哈布斯堡王朝是欧洲惟一一个不是建立在民族主义基础之上的政权。在国家内部，捷克人、波兰人和斯洛伐克人都在闹独立，甚至匈牙利人也不完全可靠，而在边疆的意大利人、塞尔维亚人和他的罗马尼亚人都在为生活在哈布斯堡王朝异族统治下的弟兄们要求自由。如此四面树敌，战争岂非惟一的选择吗？正如那句令人发冷的德国警句所言："一个悲惨的结局胜于没有终止的恐惧。"最终，还是德国最迫切地需要战争。在1912年凯泽和他的军事领袖们举行的会议上，陆军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伯爵鼓动发起一场预防性的战争，他说"越早越好"，其他人也都热情呼应。意味深长的是，接下来的两年之中，德国的领袖集团并未为战争进行统一的准备，但大气候是很清楚的：一旦时机到来，它就将把欧洲推到悬崖边上。

1914年6月28日，时机终于来临了。一群年轻的恐怖分子在塞尔维亚政府的训练、支持和组织之下，刺杀了当时访问新合并的波斯尼亚的奥匈帝国皇储。事件激怒了欧洲。虽然奥地利警方以最典型的无能做法调查了这一事件，但奥地利却犹豫了。7月份的绝大部分时间，奥地利人都在那儿发抖，并因此失掉了欧洲的

许多支持者；当他们终于采取行动时，这一刺杀事件已经被排在欧洲报纸的最后几版了。同时，英国也千方百计地解除危机，而且他们相信自己正与德国做着相同的努力；但凯泽及其政府实质上却在玩着一个双重游戏：德国一方面对英国的积极调停表示公开支持，但另一方面即私下却在怂恿奥地利人对塞尔维亚采取最决然的敌对态度。

实际是，德国人给奥地利人提供了一张希望被使用的"银行支票"。因此，7月23日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拒绝了一切商量的余地。尽管塞尔维亚的回答相当怀柔，但奥地利依然在7月28日对其正式宣战。可笑的是，奥地利的无能却使实质性的军事行动延迟了两个星期；不过，为了保证越过鲁比肯，奥地利人轰炸了贝尔格莱德。因此，俄国人面临着这样一种处境：若再次屈服于德奥压力，将对它在巴尔干半岛的利益造成无法补救的损失。

各大帝国的作战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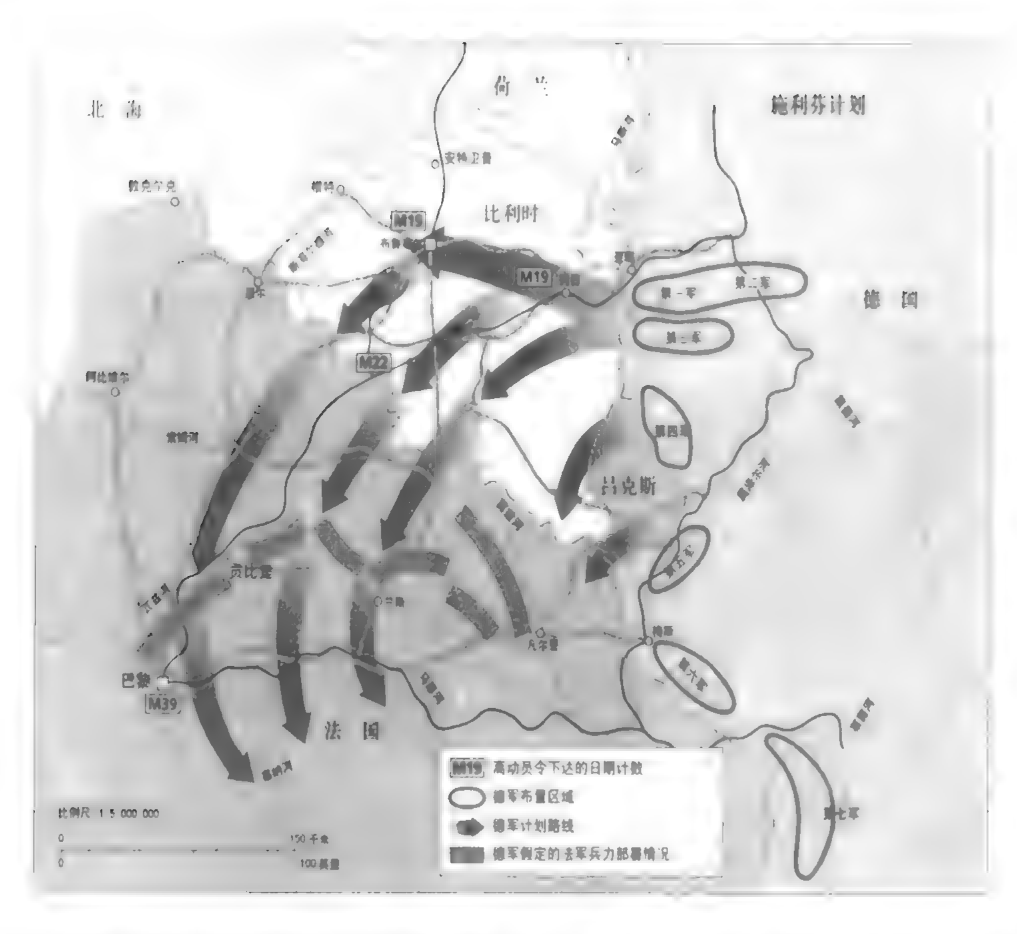
事已至此，各方面的军事策划已使战争不可避免。1914年之前欧洲各国抛出的所有作战方案中，惟有英国没有期望它的军队取得什么确定性的结果——尽管那仅仅反映了英国为战争准备的军队在规模和力量上仅在欧洲大陆扮演着一个次要角色。但即使是英国也预见到了战争的必然性。它有一个专门的代表团，对法国向德国莱茵兰的军队发动决定性进攻表示支持，结果法军击败了德军。

在理解这些计划时，历史学家必须抱着这样一种认识：军事方案仅反映了经济学家、政治家及士兵们对情况的理想估计。欧洲参谋本部都已充分了解到，现代战场将成为可怕的屠宰场。但各国专家们相信，现代各个国家皆是不堪一击的虚弱的大厦，经济方面没有能长期支持战争的力量，政治方面也不稳定。很少有人相信一次大战能持续一年而国家的政治和财政却保持不崩溃，更难有人相信一次大的冲突和战斗会持续两年。但在这样的思想荒原中也已出现了几个先知：老毛奇曾警告说，下一次欧洲战争将持续30年的时间（他的估计比人们想的更接近事实，如果把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视为一次大战争的话——就像修昔底德看伯罗奔尼撒战争那样的眼光——毛奇正好一语中的）。波兰企业家伊凡·布洛克在《战争不可能发生吗?》（1899年）一书中也提出了一个同样的警告，他预言说"下一次战争中每个人都将进入壕沟"，但这些估计都是很个别的情况。欧洲各大国近期的所有战争持续时间一般较短。以德国的情况看，革命一爆发，政治和经济的稳定也很快崩溃了。所以，看起来欧洲各国军队所面临的首要战略任务是，在国内财政和政权倒塌之前迅速赢得战争的胜利。

262 艾尔弗雷德·施利芬（公元1833~1913年）伯爵是德国陆军总参谋部军官的典型代表。他从不允许自己偏离追求残酷战争的"美德"，他甚至还会在圣诞夜向他的属僚们提出一个战术上的问题并且要求在圣诞节后的第一个周日就听到回答。但是与他在战争方面深谋远虑相比，政治方面他却特别盲目。就像他同时代的绝大多数德国军人一样，他驳斥了克劳塞维茨的著作《战争论》，认为它是一本"只有教授们才去看的书"。

最重要的例子是在德国的施利芬计划中，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主观假设如何引发了战略上的巨大灾难。德国与他的战争敌人所犯的错误相同，只是程度更深，而且对本国的冲击更强。施利芬计划反映了德国"战争方式"的威力和弱点。既然这种"战争方式"在20世纪上半期将占据支配地位，那么就需要从细节上来详细考察这一计划。

艾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伯爵在1891年成为德国陆军总参谋长，他的首要责任就是制定出一套方案以对付潜在的可能爆发的战争。到1891年之前，德国的那



剧烈变动的军队规模、大大增加的步兵和炮兵武器的效率，引起了各种实战和战术方面的问题，施利芬计划是试图克服这些问题的尝试。这份计划的日程表在时间上精确到每一天，在地点上精确到了每一条铁路和公路。即人数为150万人的七支部队，德军必须在动员令后12天内夺取列日（在这里，三支主要部队将开始成扇形展开），动员令后19天之内征服布鲁塞尔，动员令后22天之内越过法国边界，并在动员令后39天内攻占巴黎。这意味着在6个星期之内就将法国踢出战争——这是施利芬所估计的俄国完成全国动员所需的精确时间——这样将能够让德国及时调动得胜部队转向东线以迎战并击败东普鲁士的俄国人。

个面临与敌对国法俄两面作战的噩梦终于变成了现实。在那种情况下，施利芬的前任从保卫西线阿尔萨斯—洛林的角度考虑，主张进攻俄国；但施利芬认为俄国疆域的广袤将阻碍他们取得确定性的胜利。然而，法国也依赖一道沿着法德边境修建的坚固防御线与德国对峙，这使在西线取得迅速成功也同样成为问题。但施利芬本人是个军事史研究者，他完全从自己的研究尤其是对汉尼拔在坎尼的胜利所作的研究中得出结论：包围封锁是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惟一途径。所以现在他建议入侵比利时，以扫清法国防御工事的周围地区。一旦在低地国家陈兵，德国军队就可以从侧翼包抄法国防线并在巴黎东部对其进行严密的封锁，从而摧毁法军。法国被消灭之后，德国就可从容对付俄国了。

263

从各方面看，施利芬计划好像都从作战实际出发，对德国的那些战略问题做出了完美的回答。但从政治层面来看，它却非常非常脆弱，因为它限定了问题的狭小范围，而且对其军事行动做出了错误的主观假设。最显然的弱点反映在战略领域：侵犯中立的比利时，必然使它在战争中站到法国那边，若德国很快便取得胜利，这种干扰或许不算什么，用施利芬的话说它将使德国将英、法军队一起肃清。但如果战争长久持续下去，英国则将成为德国行动的一个严重威胁，同时入侵中立的比利时也会对美国的态度产生相当的影响。然而，由于他们一厢情愿的“速决战美梦”，这种考虑并没有过多地影响施利芬和他的后继者们。

实际上，施利芬计划已埋下了它失败的种子。计划的成功施行依赖于法国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恰到好处——也就是法国把他们的全部力量用以对付在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一次入侵——同时还依赖于比利时同意德国侵入它的领土。来自比利时的任何稍微严重的抵抗都将使德国面临巨大的后勤困难，尤其是如果比利时人故

264

意对铁路隧道或桥梁进行破坏的话。

而且，施利芬和他的策划者从未就巴黎所代表的问题达成协议。如果德军右翼已深入法国腹地并包围法军，那么封锁巴黎这座城市的部队将从何而来？而且，如果德国军队停下来消灭巴黎的法军，那么法国不就有了足够的时间去重新部署兵力了吗？事实上，与欧洲其它重大战略一样，施科芬计划是一个纯粹的意念中的战争，在这里，敌对各方都按照其为自己设计的舞蹈动作而行动，没有任何人假设自己会有什么失误或错误延误他通向胜利的道路。

陆军总参谋部新上任的领导小毛奇修改了施利芬计划，他增加了左翼和中心的力量，但右翼仍和施利芬所计划的一样（从后勤上看，德国能否在右翼推出更多的军队并保持对他们的给养确实值得怀疑）。具讽刺意味的是，发生在过去几年和平时期的最具灾难性的拙劣修补却不得不去应付最后的战争选择，由于1913年小毛奇决定抛弃进攻俄国的参考方案，这样，虽然战争可能开始，但德国的开幕式将不得不在西线举行。此外，毛奇和鲁登道夫决定，动员令一下便马上开始军事行动，以阻止皇帝和他的外交官们在最后一分钟的再次犹豫。首先是入侵中立国卢森堡和比利时。

其它国家的军事计划也反映了与德国军事和民众领袖们所抛出的同样的“速决战梦想”。同时，它们也反映了这样一件事实：策划者中很少有人经历过战争，尤其没有任何一个人经历过即将到来的1914年的这场如此规模巨大的战争。结果，他们所有的努力看来都是不现实的，不过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努力也反映出了他们对当时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现状进行实际分析的尝试。然而，他们做出的所有假定几乎全都错了。

进入战争倒计时

7月28日奥地利对塞尔维亚正式宣战，使时间炸弹上的钟声开始嘀嗒作响；如今已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阻止这颗炸弹爆炸了。在过去十年中，俄国曾两次在德奥挑战面前让步，但他们不会第三次做这种事了。但沙皇只是半心半意地动员了对奥地利作战的俄军，却没有动员与东普鲁士对阵的俄军，但他的将军们使他相信：那样的安排丝毫不起什么作用而且将把优势拱手相让德国。

7月30日，俄国一颁发总动员令，德国人就开始行动了。整个7月，凯泽一直向他的参谋官们保证说他绝不会“退缩”，但在最后一刻，他的激情却冷却下来。他问惊骇无比的小毛奇，是否军队应该先去进攻俄国而只在西面保持防守。心碎的陆军总参谋长几乎落下泪来，他回答说：只有一个选择——施利芬计划。凯泽凄凉地回答说：毛奇的叔叔——老毛奇可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但是，8月1日凯泽还是认可了总动员，并因此认可了——虽然在凯泽与小毛奇之间曾发生过那次关于施利芬计划的紧张事变——战争。同一天法国也进行了动员，但他们对德国大使说法军将乖乖地呆在边界线后。那与德国无关：当德国在8月3日对法宣战之时，它的部队已经在卢森堡和比利时境内了。现在，在奥地利宣布反对塞尔维亚之后，德国即将入侵卢森堡、比利时以及法国。当英国大使暗示德国总理有条约义务尊重中立的低地国家时，贝特曼—霍尔威格回答说“条约只不过是

265

1832年发明的电报在1914年战争的爆发之中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政治要员们利用它来进行交流。7月28日奥地利通过电报对塞尔维亚宣战；第二天凯泽·威廉和沙皇尼古拉（通过无线电只有45分钟的距离）为避免战争用它交换了几次意见。作战部也使用它来进行军队动员。7月30日下午6点一过，圣彼得堡的电报操作员们就开始发出大量的指令，以动员一次空前规模的同时性的军事行动：744支步兵营和621支骑兵中队——总计约有200万人——应召武装起来

一张废纸"。

说服英国内阁相信英国必须站在法俄方面也并没费多大力气。从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欧洲所有大国都卷入了这场浩劫性的冲突之中。正如英国外交公使格雷子爵所暗示的那样："整个欧洲的灯火都在熄灭，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将不会看到他们被重新点燃。"他说对了：它们将不会在整个欧洲被重新点燃，直到1989年。

第十四章 战争中的西方

8月21日，英国骑兵在比利时的蒙斯附近发起进攻。当欧洲军队在1914年8月进入战事的时候，他们却从1870年起就一直未曾进行过重大的陆地作战。所以，他们头脑中保留着的许多战争观念更适合于19世纪早期的战争，而不适合于使用机关枪、快速火力步枪，以及远程大炮的现代战争。开始的几个月内，这些骑兵只是在战场上乱转，既没有一个明确的使命，也无长久的生存能力，尽管有几次像这次一样的小胜利。然而，到1914年10月止，由于一条从英吉利海峡一直延伸至瑞士的巨大战壕竣工，他们在战场上完全失去作用，很快被召回到后方去负责安全任务

1914年7月外交上的失败引起了空前的大冲突，有人恐惧，同时也有许多人欢迎。整个欧洲，当后备军人纷纷集结起来时，人群也在因宣战而欢呼。然而，这种敌对情绪并未按人们所期待的那样上升为一种迅速的能马上一决胜负的大战；相反，一场恐怖的、看来似乎毫无尽期的争夺发生了。就双方的优势而论，很难预料到德国人会支撑到它以后所支撑的那么长时间。毕竟，他们是在与世界上最大的三个帝国——英国、法国和俄国同时作战。这三个国家联合起来，由美国支持。而且，德国的所作所为最后也将美国逼进了它敌人的名册中。但他们确实支撑到了那么长时间，而且到1918年时，他们已取得了东线的全面胜利，西线也几乎如此。不过，到最后，尽管他们有着娴熟的技艺和作战技巧，却终于未能克服自身的基本战略缺陷和阵容庞大的敌人联合体的巨大压力。

1914年，欧洲军队在战场上面临着一次技术上的革命。过去几十年发明出来的各种武器——有枪栓的来复枪、机关枪、现代榴弹炮等——在战斗中提供了空前规模的火力并对西方各军事组织提出了无法解决的问题。现代武器使各部队对敌方的防守阵地束手无策，直到1918年，不管是部队指挥官还是参谋本部都没能制定出一种如何使用现代科技的方案或发展出一种新的战术观念来攻破那些防御地点。而且，战争过程中，瓦斯、坦克、飞机，以及全副的新式步兵武器使战术问题简直令人气馁，问题的解决也难以预期，同时，战场上新产生出许多复杂的信条。前线——至少是西线——一直比较稳定，但战争地带的情况却经历着巨大

施利芬计划几乎成功：德国8月1日进行了军队总动员，虽然列日直到8月16日才陷落，但德国人却在20日拿下了布鲁塞尔并于24日进入法国——仅比原计划晚了两天。然而，施利芬忽略了在右翼拟以每日20至25英里行军的庞大的第一军的补给问题，这简直是后勤上的噩梦；他也忽视了如何使强大的巴黎卫戍部队保持中立甚至停止抵抗的问题；而且因为侵犯了中立的比利时，他的计划也必然在战争一开始就使英国加入了进来。

的变化，同时，作战部队也根据山脉另一边的局势变化不得不进行着调整和革新。

各部队在它们精心制定的计划的基础上逐渐走向1914年的首次交锋，绝大多数高级军官都认识到了现代武器致命的威力，但将军们以及政治家、经济学家们都相信，现代社会不可能支付一次漫长的战争所花费的高昂代价。因此，他们决定发动能迅速赢得战争的致命性一击，并不惜一切代价。俄国的目标是夺取东普鲁士，同时对奥地利进行猛烈的进攻。法国希望在德国军队后面切下一条薄片，将军队通过阿尔萨斯—洛林推进至莱茵兰。但就像1870年那次战争一样，他们错误地估计德国不会使用它的后备军；因此，当法国意识到德军可能通过比利时发动进攻时，他们却错误地估计了德军的规模和实力。

267

最初的行动

以其设计者施利芬伯爵命名的那一德国军事方案设定：帝国只有通过赶在俄国军队动员之前扫清法国才能赢得西面战争（参阅第234～237页）。由于法国边境上的防御工事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所以施利芬便主张入侵比利时以从侧翼挫败法国的防御，并使德军得以扫清南部，掌握巴黎，同时从西面对法军进行封锁。德军并非企图大量占领比利时领土，而只是将其作为一个发射台，通过它向法军左翼投出德军的三支部队共32个师的兵力。因此，1914年8月4日，100万德军开始入侵比利时，这一行动是以结束英国国内关于是否应尊重过去十年中与法国达成的非正式性军事协定的政治争论，结果是英国立即对德宣战。

268

首先，为了部署实行施利芬计划所必需的军队，德军必须夺取列日和列日的

壕沟。由克虏伯和什科达所制造的大口径迫击炮已摧毁了比利时的防御工事。同时，已成为德军中一位醒目人物的埃里希·鲁登道夫上校也将部队开进了列日，促成并接受了这座城堡的投降，这一成功使他获得了东普鲁士德军参谋长的任命。比利时在列日的抵抗虽然带来了一点小麻烦，但几乎没有影响德军的计划，但比军撤往安特卫普却威胁了德军侧翼。为消除这一威胁，德军不得不分出两支部队去对付他们。在别的一些地方，比利时人也故意破坏公路，损坏通讯线，炸毁铁路隧道和桥梁，以阻断他们的敌人。狂怒之中，德国人开始报复。他们炮轰了卢万的大学城，并在有抵抗行为的地方杀害公民人质：在迪南处死了664名人质，在埃沙特处死了150名，由此定下了一种基调——后来几代中也很少有变化，它足以引起1914年的世界公愤。

1914年的圣诞节。经过这一年夏末和秋季的厮杀，西线各方军队都已精疲力竭，陷于僵持状态。恶劣的天气使糟糕的环境更加险恶，部队的防护更是岌岌可危。圣诞节这一天，前线士兵索性停火；一些更大胆的甚至爬出了战壕。清晨刚过，大批士兵便涌进两军战壕之间的无人地带，相互交换圣诞礼物。午后，他们开始玩起足球来。然而，一进入深夜，短暂的停火即告结束，各方军队又干起了杀人的营生。自此到1918年11月之前，那里不再有第二次停火。

当德国人按照施利芬计划进入比利时的时候，法军也在执行他们自己的战略方案——“第七方案”，这是由法国参谋本部部长约瑟夫·若弗尔制定的。正像施利芬所期望的那样。8月中旬，法国第一军和第二军戴着白手套的军官们，将各旅集结起来，威风凛凛地开进阿尔萨斯-洛林。但在那里，巴伐利亚亲王鲁普雷希特指挥下的德国守军对他们进行了屠杀。法军颤抖着退了回去；鲁普雷希特要求乘胜追击，总参谋长赫尔穆斯·冯·毛奇默许了，他希望军队能通过这一行动实行一种双重封锁——虽然这样做违背了施利芬计划的基本思路，即从西线横扫法军。

现在，法军进攻方向转向阿登，但他们又一次陷入巨大的德军军阵中，再次被赶回来。在这里，德军也在加紧进攻，虽然他们的行动又一次将法军推出了施利芬所设计的圈套。到此时，德军右翼已完成了其在比利时的兵力部署，正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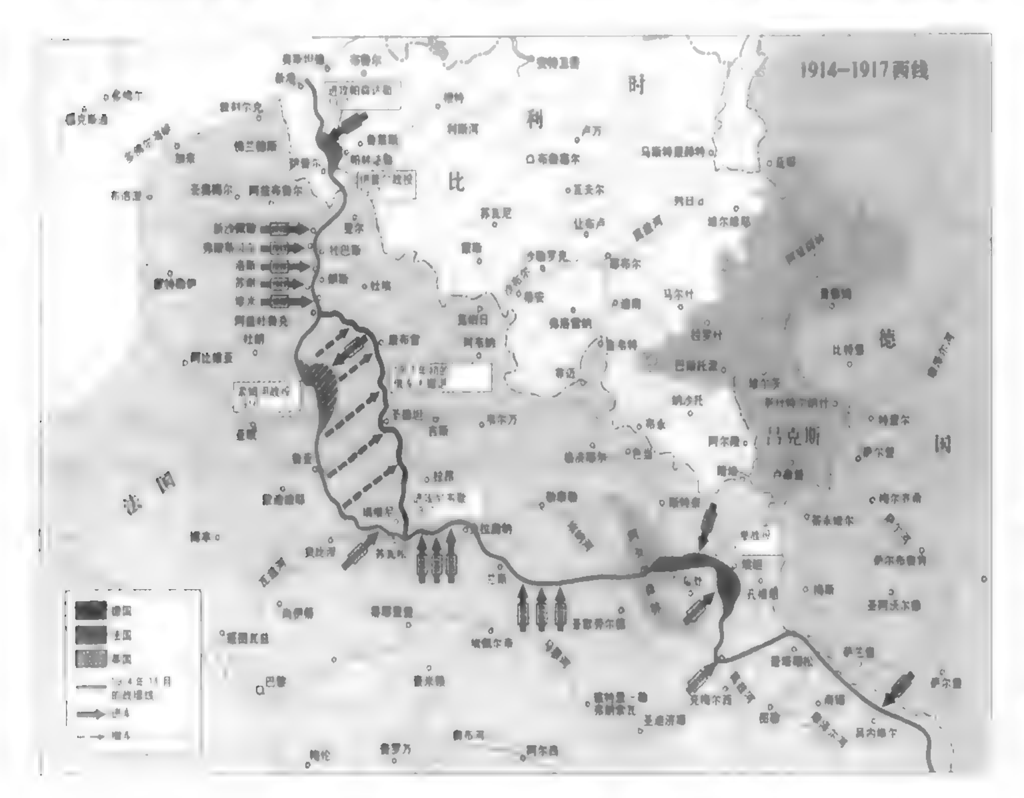
继续前进。起初，法国最高指挥部没有意识到自身处境的恶化，但第五军指挥官夏尔·朗尔扎克自己行动了：在阿登遭到一连串打击之后，他下令部队适时撤退。在中欧列强军队逼近的右翼，新到达的英国远征军8月23日在蒙斯也遭到了重击，他们也被迫撤退下来。到此为止，德军右翼已形成了对整个协约国军队左翼的包围之势，但右翼指挥卡尔·冯·比洛拒绝了第一军司令亚历山大·冯·克卢克调整一下西线以包围英国远征军的请求。

法国最高指挥部终于意识到了危险。“爸爸”若弗尔并没有十分惊慌；相反，他孤注一掷地对左翼的法国军队进行了改组。德国的进军和协约国的撤退皆以每日大约20英里的速度，形成了一场向巴黎的赛跑，但协约国拥有这样一种优势：他们正在退往自己的物资储存地，而德国却没有补给来源，所以补给很快就耗竭了。何况，由于俄国对东普鲁士的威胁，德国最高指挥部又选择了这一时刻从右翼抽走两支部队去支援东线。

至此，伤亡的增长和施利芬的错误算计结合起来，使德军指挥官们面临着一个艰难选择：如何对待巴黎。由于没有足够的军队进攻巴黎或围守这个首都，9月1日德军转向东部，试图经过巴黎以扫清法国军队。但若弗尔已向巴黎迅速调进了援军，当空中侦察显示德军正向东移向巴黎时，他果断地打击了德军。9月5日到10日的马恩河战役卷入了超过200万名的士兵——可能是到那天为止人类历史上所发生的最大规模的对抗——战争开始，法国的进攻迫使克卢克的第一军转向西南，与比洛几乎面对正东方向的第二军的方向完全相反，在两支部队之间，打开了一道裂缝。英国远征军因此而被赋予一种平衡，它站在两者之间，利用这道裂缝；如果它调兵行动，协约国军队则会很可能摧毁德军右翼。

269

实际上，英军进军的速度实在太慢，但德军也始终处于严重的困境之中：他们的右翼已经分裂，没有什么明确的中心，同时他们的后勤系统也已近乎崩溃——他的铁路最远点位于比利时腹地——部队已精疲力竭。正如一位军官所指出



按照施利芬的作战计划，德军与敌方经过最初的行动和海上争夺之后，西线进入一种凝固的长时间的静止状态，交战各方的阵地上几乎没有什么行动，但在此之前，已有数百万青年人死于大规模的混战之中。

的："我们再不能做任何事了。士兵们倒在沟里奄奄一息……命令来了，要求发动进攻。我躺在马上，马的鬃毛被压在我的头下。我们又渴又饿，冷漠征服了我们。"被派来调查情况的参谋本部代表理查德·亨施上校意识到一场灾难正在临近；他以毛奇的名义，命令部队撤往埃纳河。施利芬计划已经失败。法国生存了下来。

然而，协约国军队的追击行动却犹豫了，一到埃纳河，德军前线就得到了稳固，协约国部队企图通过侧翼包抄他们的对手而重新获得自由的机动性，但随之而来的"向海洋的赛跑"仅仅伸展了通往英吉利海峡的那条崎岖的战壕。10月，德国参谋本部新任总参谋长埃里希·冯·法金汉下令在佛兰德斯发起进攻，想把协约国军队逐出安特卫普和海峡各港口。然而，德国的"碗橱"已经如此空虚，以致投入了一支8月份才开始训练的毫无经验的大学生部队。德国占领了安特卫普，但3.6万名大学生后备部队中，只有6000人毫发无伤地幸存下来，其中的一人就是阿道夫·希特勒。到11月前，协约国军队在从瑞典到英吉利海峡的近500英里的战线上被紧密地包围起来。四个月之久的战斗最终导致了一种普遍的僵局，但法、英、德将近50万士兵在战争中倒下了。尽管伤亡如此可怕，但至少三年多之后，这些战线才会改变。

270

德军在东线的胜利

在东线，同样发生了意义深远的战斗，同样包括了可怕的伤亡、僵持以及战前计划的破产。当德军将主要兵力投入西线时，施利芬已经接受了暂时失去东普鲁士的这一可能性；但到1914年之前，俄国的军队组织已取得了重大的改进，它努力以比所预料的快得多的速度进行了军队动员和部署。两支部队分别在保罗·楞能坎甫和亚历山大·萨姆索诺夫的指挥下打击了东普鲁士。楞能坎甫的军队自俄国领土进军，从东面进攻柯尼斯堡，同时萨姆索诺夫的军队从波兰进攻并打击德国的北面。如果俄国人把这些行动都协调起来的话，他们大有希望攻取东普鲁士并摧毁德国第八军。但并不存在什么协调：两个指挥官彼此憎恨对方，而且俄国人电报密码的被破译，使德国人清清楚楚地掌握了他们的意图。

楞能坎甫首先行动。8月19日到20日，他的部队在东普鲁士的一个小镇贡比涅击败了德国人；如果他把握住这最初的胜利，可能他就能将德国人置于绝境之中：东普鲁士的德军指挥官失魂落魄，他下令部队撤退，完全放弃这个省。毛奇和凯泽反对这一意见，他们免了他的职，代之以另一退休的将军保罗·冯·兴登堡，命他和鲁登道夫共同担任陆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在新组成的领导小组到达东普鲁士之前，当时正在战场的总参谋部军官马克思·冯·霍夫曼就已经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密码情报清楚表明楞能坎甫计划呆在原地不动，这便使德国人拥有了一个重要的机会孤立并摧毁正从波兰向北进军的萨姆索诺夫的部队。霍夫曼通过铁路把迎战楞能坎甫的大部分军队撤了下来，而将他们集中在滕嫩堡以对付萨姆索诺夫。到8月26日时，萨姆索诺夫意识到了他的军队正处于严重的麻烦之中，但他决定留下来战斗，因为他相信楞能坎甫很快便会赶来救援他。然而，楞能坎甫的进军失败了，而那天德军的进攻在萨姆索诺夫的两翼大获全胜；在中部，俄军取得的一次有限的胜利仅仅使他的军队更深地进入到德军所设的罗网之中。到

271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工业动员

1914年进攻性行动的失败导致了一种军事上的僵局，这种僵局惟有通过努力支撑住战争消耗才能被打破。这样，战争便像美国内战一样依赖于工业力量，依赖于是否能得到原材料进入世界经济圈。起初，德国工业在军事潜力方面拥有优势，但协约国的封锁使他们被世界市场拒之门外。

但战争密度越来越高的时候，战场上要求越来越多的武器和军火以补给大炮，更不用提食物、衣服、铁丝网以及兵员了。但当国内农业和军事生产对工人数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时，作战前线也不停地消耗着国家的人力。所以，双方都在工厂和某些职业中广泛求助于妇女劳动力，有些职业在战前想也没想过会以如此方式雇佣劳力。到1918年之前，英国所有军工厂中有60%的工人由妇女组成，而且，无论是在民主国家还是在专制国家，经济的每一部门都被置于某种形式的政府控制之下。

长远看来，协约国可任意借助美国经济，但德国却遭到封锁，这使它只能使用中欧资源，这种封锁产生了巨大的效果。美国提供的贷款和它后来的参战更促进了那种效果。1916年末，在鲁道夫领导下，德国试图火速提高军事生产的努力最终却毁灭了它的经济，导致了1918年德国的崩溃。最终，似乎为了对拿破仑进行阐释，上帝还是站在了较大工业的这边。

在每一种繁重的工作如焦炭和钢铁工业中，都可见到妇女劳动力被以反经济制度的形式大量引入。在这里，英国的焦炭女工强调她们能做任何男人所做的工作。

8月30日止，德军已摧毁了萨姆索诺夫的军队，并俘获了9.2万名俄军，缴得400门大炮。现在他们转向东部，到9月中旬之前，第八军已将楞能坎甫逐出了东普鲁士，并使其军队遭受了重大伤亡。这些胜利奠定了鲁登道夫和兴登堡成为民族英雄的基础。

由于德国人书写了东线的历史，俄国在东普鲁士的失败使其在别处的胜利也失去了光彩。事实上，1914年俄国人主要的精力并非针对东普鲁士，而是针对加利西亚的奥匈帝国。在南部，奥地利人首先发起进攻。他们的参谋长康拉德·冯·海增多夫从互相背离的几条线上派遣三支军队进入波兰，在那里他们很快陷入了困境。第三军退回到它的出发地，同时俄国人有一次通过切断其通讯线几乎使第四军被孤立；虽然奥地利人最终杀出了一条血路，但他们几乎完全是跌跌撞撞地退回了他们自己的领土——越过加利西亚。9月末，俄国人几乎打到了匈牙利平原，这本应在1914年就把奥地利推向崩溃，但他们的进军终于因为后勤困难和巨

大伤亡而变得步履维艰。

战斗在东线持续了整个秋天——其战线延伸的长度是西线的两倍——敌对双方都试图重拾他们已经失败的作战计划的残骸。俄军不断将其装备和弹药储存向前推进，对奥匈帝国形成了一个严重威胁；但这样做另一方面也把他们的将来作为赌注押了上去，因为事实证明由尼古拉二世乖戾的独裁政府无能地动员起来的俄罗斯工业，已不能重新储存起军队在作战中所要消耗的大量物资。但是，秋季战役对于中欧列强来说也是一次勉强才能势均力敌的竞赛。德国不得不派出18个师的兵力去支持奥地利，而且，经过一系列孤注一掷的努力之后，中欧列强的联合力量才在冬季初期与他们的敌人进入相持状态。那时，奥匈帝国1914年秋的一场极具讽刺意义的失败甚至将他的军队作为战争残余物从东线的主要角色中清除出去。但俄国人也彻底衰弱下来——他们已耗尽了兵力。更为危急的是，他们的后勤供应系统已经崩溃。1914年10月奥斯曼决定进攻俄国，向高加索发起进攻并袭击黑海地区，未来的局势因此变得更为紧张了。

272

1915年：协约国失败之年

1914年末，英国海军部部长温斯顿·丘吉尔为英国内阁写了一份刻薄而富有见识的备忘录。他警告说，战争已陷入了双方都没有希望去打破的僵局之中；将军们当然愿意尝试努力，但那只能使伤亡更加严重。丘吉尔暗示说，惟有机器的手段才有希望解开这种战术的死结，但这种方法的发展需要几年，至少也得花费几个月的时间。1915年的战斗正好反映了丘吉尔的预见。对英国来说，1914年的西线就是几次增加其常规军伤亡的进攻；但1915年开始集结起来的志愿军还没有做好准备，所以法国不得不负担起西线的大部分战斗。

1914年在东普鲁士马祖里湖周围战败的俄军俘虏移向德国俘虏营。传统看法认为应在东部前线开始作战，强调德军在东普鲁士取得的这次胜利。然而，与此同时，在南部波兰和加利西亚，俄国军队也对奥地利军队取得了重大胜利

273

法国的军事信条一直强调士气是战斗中最重要的因素。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对的，但他们的部队缺乏技术、大炮的支持以及突入并突破德军防御所必需的战术观念。3月和5月，法军在香槟前线发起重大进攻，同时英国也在更北的地方发起进攻，两次进攻都遭受了巨大伤亡。毕竟，德国人已在他们前线的最重要的部分后面组成了二线防御，协约国军队的指挥官们相信运动战的惟一途径在于大规律的炮轰，它将破坏敌人的防守并使攻击者越过争夺地带。但他们没有想到长期的炮轰将警醒德军，从而使他们有时间派遣后备军进入受到威胁的战区。9月在卢斯，英国其实已经打破了德军的防御，但英国远征军的司令官约翰·弗伦奇伯爵却还停留在后方很远的地方，从而使德军在英国援军到来之前就修补了缺口。法国进一步的进攻就只能是无谓地增加伤亡；1915年期间，100多万法国人伤亡于战场，但最终也未取得重大的胜利作为回报。

在东线，情况对协约国军队来说更令人担忧。鉴于奥地利的虚弱，1915年早期法金汉决定必须由德国来承担进攻的任务。他的主要目标并非像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所鼓励的那样大肆入侵俄国，而是有限制地发动战役以消灭俄国军队并迫使俄国人后退，从而消除他们对奥

在东部前线上，军事行动所引起的双方军队的相对移动比西线要显著得多。首先，军队与空间的比率要比西线低得多——主要因为前线长度是西线的两倍——它使敌人拥有更多的潜在机会突破防线并随之对其加以利用。但更重要的是沙皇政府的无能，它在1915年没能发掘出战争所需的工业潜力；同时还有德国所采取的战略——他们从未直接进入俄罗斯腹地，但却发动了一场从内部破坏沙皇政府稳定的相当成功的战役，同时在外围地区实行了有节制的进攻。

地利的战略威胁。随着这种有节制的战役，德国人开始了他们精心策划的阴谋摧毁俄国政治和军事士气的努力（这一努力在1917年革命中达到顶点）。由于德国只是稍微侵入了俄国领土，所以德国人没有直接威胁"俄罗斯母亲"；相反，他们迫使俄国最高指挥部在漫长而守护不足的交通线上陷入泥淖而不能自拔，从而加重了对手的困难。

德军的最初进攻发生在加利西亚。1915年5月2日，奥古斯特·冯·麦肯森进攻介于格尔利采和塔尔诺之间的俄军阵地，并利用突袭拿下了它们。两个星期之内，进攻的德军就将他们的敌人从加利西亚驱逐出去。俄军陷入了一无所有的绝境之中；就像一位沙皇军官绝望中所指出的那样："战争之初，我们拥有大炮、军火和步枪，所以我们战无不胜。当军火和武器补给开始耗竭时，我们依然战果辉煌。但今天，当我们的火炮和步兵都已变成哑巴之时，我们的军队正淹没在自己的血泊之中。"一个月中，德军几乎推进了100英里，俘获俄军40万人。7月，法金汉分别命令兴登堡从北部、麦肯森从南部共同将俄军逐出波兰。鲁登道夫争辩说，如增加援军将使他消灭更多的俄国人，但因其它战场的情形，法金汉拒绝了他的要求，他尤其想消灭塞尔维亚——在那里，奥地利占领贝尔格莱德的努力

274

安扎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陆军)部队于1915年4月在达达尼尔海峡附近后来变得非常著名的安扎克海湾的沙滩上登陆。完全是由于幸运，这次水陆两栖的攻击恰好发生在土耳其人认为不具什么战术重要性的地区，所以他们没有派遣重兵防御。然而，俯视着那片沙滩的那些断崖解释了土耳其人的信心的依据——在土耳其人来到这里防卫它们之前，安扎克人是不可能攀上那些高地的

一再遭到失败——然而英国对达达尼尔海峡的打击对中欧列强在巴尔干半岛的地位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并使德军在奥斯曼倒台的情况下阻止大量后备援军进入成为理所当然。

对达达尼尔海峡的进攻是这次战争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战略杰作。它是丘吉尔智慧的作品：这位部长论证说对此地的胜利进攻将突破土耳其的防御，为俄国打开关键的补给线，把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带入战争并加入协约国作战；为塞尔维亚提供直接支持，并创造出一条对抗奥匈帝国的第三条前线。但这些可能性一个也没有发生，因为无论战役在战略上有什么优点，实行这样的作战行动和战术是极其冒险的。首先，丘吉尔说服了海军上将们，动用皇家海军试图突破那些马尔马拉海入口处的要塞，他们抱着这样的希望：一旦那些过时的中欧列强军队的战舰通过海峡，他们就能够进攻君士坦丁堡并造成土耳其的崩溃。但来自土耳其陆地炮兵连的顽强抵抗与地雷一起挫败了这一企图。现在，作战部同意用地面部队来支持进攻——第29常规师和埃及的帝国部队——由伊恩·汉密尔顿伯爵来统率。但计划一直给人漫不经心之感，而且向加利波利派去的地面部队从未受过任何水陆两栖作战的训练。再说，最简单的问题也还未搞清：那里有水岸吗？有公路吗？将发生的是什么样一种战争呢？土耳其防御的力量所在和弱点各是什么？

275

1915年4月25日战役开始了，协约国部队在加利波利半岛的陆地上作战。土耳其最辉煌的胜利是它的机关枪手屠杀了从克莱得河的汽船上发动进攻的英军。不过在岸上，英国军队未受任何抵抗便进行了成功的登陆，但当时的指挥官们不知接下来该做什么，因而没能掌握主动权——他们的部队只取得了一个立足点但却没有控制高地。沿海岸更远处，安扎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部队错误地在一个后来被叫做安扎克海湾的地区登陆。没有遭到土耳其人的抵抗，但对着那隐约

出现的高地、安扎克人进军的速度放慢了，在他们到达那座山脊之前，一个没有什么名气的土耳其上校马斯克伐·麦肯森已经到达那里，他很快意识到了这一地点的重要意义，并迅速派兵占据了那些高地。正如丘吉尔在他的战争史中所记录的那样：“各种可怕的‘如果’聚集着。”

至1916年夏、凡尔登战场四周密集的炮火已刮倒了所有的草木、削平了乡村的所有高地、这里的土地一片荒凉，看起来就像是月球表面 直到1915年夏季为止、大炮一直是西线战场的统治者、这种角色在整个战争期间也未有丝毫改变。但是、没有任何其它一场战役像在凡尔登战役中这样、由大炮占据着绝对的支配地位。虽然炮轰持续不停、但这里的陆军士兵却整天整天地躲在他们的战壕里、还没有与敌人见面就丢掉了自己3/4的兵力

登陆最终以要命的僵局告终，现代武器高效的杀伤能力使双方都不可能冲破这个死结。土耳其人占据着高地，而帝国军队拥有海岸，任何一方都不能将他的敌手从其防御阵地撼动半步。8月，英国人下了赌注。援军到达之后，汉密尔顿的参谋部计划从安扎克海湾发动夜袭，但那是不可能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队因此遭受了重大损失，同时；由那位1882年以来一直未带领过军队的斯托普福德将军指挥的几个师的援军在苏夫拉海湾成功登陆，但是他们最终却陷入普遍的涣散、消极地等候着土耳其人。斯托普福德尚未接到通知：苏夫拉以东四英里的高地就是他的目标。三天后他行动起来、但土耳其人已经准备就绪。这些失败决定了加利波利战役的命运。冬天的时候，英军撤退。在此地作战的协约国军队人数近50万，而伤亡接近一半。协约国失败的结果是保加利亚加入中欧列强、与德奥军队联合起来于当年年底消灭了塞尔维亚。这样，中欧列强便在整个巴尔干地区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然而，1915年，另一条重要战线又被开辟出来。由于加利波利的远征，同时也由于意大利人的错误估算，意大利领导层相信战争就要结束、协约国即将胜利，因此，1915年他们对奥作战。意大利人面临的任务是突破奥军在阿尔卑斯山区的阵地——一战中没有一支部队解决过这一问题——但事实证明，要取得成功惟有使用大量的农民骑兵，并且这些意大利社会中最贫穷的人们在沿伊松佐河地区进攻奥军阵地时必须承受无数的失败。到1918年11月时，意军损失已超过50万人，而作用仅仅是迫使具相当规模的奥匈军队在三年的时间内信守了他们的诺言——否则他们很可能已投入东线的作战了。

1916年：充满血腥屠杀的战争

1916年末，法金汉向凯泽递交了一份战略备忘录，暗示说帝国正面临着一场巨大的消耗战，对手比自己拥有更多的物质资源和人力；在调查了各个不同战区之后他评论说，德国在任何地区都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可能性。英国显然仍是帝国最大的敌人，德国想不出什么办法来直接打击英国，而法国却是英国在欧洲大陆的一支宝剑。因此，法金汉建议以凡尔登为目标与法国进行一场消耗战以挫败法军士气。参谋本部遂将作战计划投入实施，但法金汉却未告知当地的指挥官

德国一架口径为210毫米的榴弹炮正准备发射。凡尔登战役之初，德国在炮火实力方面本来占有优势，但他们拒绝在马斯河左岸发动攻击使得这种优势归于枉然

277

即德国的皇太子；对凡尔登的袭击只需消耗一些敌人兵力即可。而且，法金汉作为参谋本部长官掌握着后备部队，加上他使军队的进攻沿着马斯河右岸移动，这便决定了皇太子的部队将不可能仅通过一次奇袭就能攻取凡尔登。

法金汉相信，一次规模空前的炮轰可使德国以最小的代价取得实质性的初步胜利，并进而剿杀法军的一切反攻；他还错误地假定他的部队将能够保持其炮火优势。然而即使犯了如此错误，德军的初期的进攻也几乎成功。法军指挥官们长期忽视了这一地区；直到最后一刻，他们才对德军一次重大进攻的警告情报做出反应。飓风般的炮轰开始四天之后，1916年2月21日德军几乎未付出什么代价就攻占了法军外围防守据点之一杜奥蒙特，而且有一段时间他们很可能将迫使法军撤离凡尔登。但德军的伤亡超出了他们自己的预料；由于法金汉的过分谨慎，后备军也未能及时到达；同时马斯河左岸的法国守军也使进攻德军的损失越来越严重。但就像1914年8月那次战斗一样，法国人也确实做了德国人所期望的事：他们投入了所有的兵力去保护凡尔登。杜奥蒙特陷落之后的第二天，法国还派来了他们最优秀的将军——菲利浦·贝当。

战争开始时，贝当还只是一个几乎没有擢升希望的上校，因为他推崇近代时期防御战争的力量，所以被绝大多数法国军官视为拥有“神秘艺术”的一位防御专家。但1914年8月后，贝当像闪烁的流星般升起。他来到凡尔登，发现这里到处一片混乱，他看到德军只在河的右岸进攻，便嘲讽说：“（那些绅士们）并不知道他们的任务是什么。”他在河左岸加强了法军的炮火，重振法军已被粉碎的士气。当他自肺炎中逐渐康复时，还躺在病床上布置了对凡尔登的有效防御。

战斗导致了恐怖的大屠杀，大炮成了屠夫，而陆军士兵则成了屠刀下的牛犊。1916年4月，一名法国上尉从勒莫特一奥姆峰（凡尔登西部高地）作战归来后如此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我从平生所见过的最残酷的刑罚中生还……连续四个昼夜——96个小时——最后两天完全被浸没在冰冷的泥泞之中——可怕的炮轰一直在持续，除了壕沟的狭地（有的看起来甚至还太宽），没有任何躲避之处。当然，德国人没有进攻，那样的话他们就未免太愚蠢了，但在我们背上来一场射击练习倒要方便得多……结果，和我一起到达那里的[illegible]……一个[illegible]规模的轻装步兵排取代了我们的位置。那是下一盘菜，得有另外一个排来服侍，因为女妖的胃口是贪得无厌的

一名陆军中尉写道：

起初，偶尔有一个连仅剩着残缺不全的骨架回来，领头军官已受伤，倚着一根棍子。所有人都一小步一小步走着或者不如说是向前挨着，他们成“之”字形蹒跚向前，好像兴奋过度……这些沉默的面孔看起来都在哭泣着某件恐怖的事情——那可怕的牺牲。有两个人看着我们返回的义勇军士兵无声地哭了。

278

到4月1日时，德军的损失已经达到了极限，皇太子建议法金汉休战，然而，由于关于法军伤亡重大的乐观情报的误导作用，总参谋长婉拒了皇太子的建议，相反，他下令为攻取凡尔登进行最后一次努力。6月7日，德军拿下沃克斯堡，但100名守军的拼死抵抗使德军伤亡近3000人。看起来，凡尔登的最后突破就在眼前。值此关键时刻，俄军、英军分别在对奥地利的战争和索姆河战役中取得胜利，迫使法金汉分出兵力火速去支援其他战线，但凡尔登的战斗并未终止。在德军离凡尔登仅6英里时，法国开始了反攻。他们在罗伯特·尼韦勒将军的指挥下，运用了安德烈·拉法格上校所创的强调小单位和分散指挥的战术，夺回了杜奥蒙特和沃克斯堡，并几乎把德国人赶回了他们的所来的阵地。凡尔登战役，双方军队共有40多万人惨遭屠杀，80万人受伤——敌对双方伤亡几乎对等。

索姆河战役

当德军进攻凡尔登的战斗结束时，英国作为西线的一个重要角色初次登台。在1915年12月的一次会议上，协约国领袖们已选取了索姆河作为他们1916年的主攻目标，但凡尔登之战限制了法国的参与。如今，英国远征军新任司令官道格拉斯·黑格爵士面临着两个重大问题：一方面，德军掩蔽壕防御和铁丝网对任何进攻而言都是一种严重的障碍；另一方面，1914年和1915年才以热情聚集起来的志愿军在战争事务上缺乏专门训练，仍然只是业余爱好者。黑格的一个主要属僚亨利·罗林森爵士认为，若从英军战术虚弱的方面来看，英国远征军应将其在西线的作战行动当做一次大型围攻来对待：通过发动一系列直接的小规模进攻，英国军队将获得必需的战斗经验，同时也可用他们已充分动员起来的民族工业重重地打击德国。但黑格对此完全置之不理。相反，他决定先向敌军发动大规模的炮轰，然后以集团性的严格控制的步兵进攻，向已经遭到毁坏的德军阵地进军。

英军的炮轰准备工作持续了一个星期之后，1437门大炮向德军阵地发射了150万发炮弹。7月1日，炮轰达到高潮后停止；18英里长的战线上，英军14个师如浪潮般席卷而来。然而，炮轰并未达到黑格所期望的效果：许多铁丝网仍然原封未动，而且，德国步兵机智地越出了战壕，在一个明朗而清澈的晴天对进攻者进行了大屠杀。一位德国观察家报道说：

一旦人们进入适当的位置，就看见英军士兵正从战壕里爬出来排成若干延展的阵列向前移动……（当）最前面一条阵线进入100码之内时，整个前沿机关枪和

步枪便突然嘎嘎作响……有的人跪着射击，那样可以从已被击破的敌人阵列中找到更好的靶子。同时，其他一些人在激动之下索性不顾自身安全地站了起来，向着他们前面的人群扫射。红色的冲天炮升入蔚蓝的天空，向炮兵发出信号，随即，德军后部的炮兵连便射出密集的炮弹，它们划破了天空，然后在敌人的前进阵线中炸开。整个地区似乎都已被掀翻，后面的军队……在炮弹的阵雨之中前进了……与这一切混合在一起的，还有受伤者的痛苦呻吟，求救者的呼号，以及临死者最后的惨叫……英军步兵庞大的阵线被毁了……恰如波浪撞击上岸堤，被一次次地反弹回来。

1916年7月1日，英军步兵人数达到了顶峰：共有12万人；然而这些人中，19240人阵亡，35493人受伤，2152人失踪，还有585人被俘。进攻者伤亡将近50%——不过在少数地区，英军也确实夺取了一些敌军的第一线的防护壕。

英国的一些历史传记向来只把焦点集中于第一天的悲剧，而忽略了后来的作战状况。这种情况可以理解，但却是错误的，英国军队并没有重复它们的第一次错误，但后来却把进攻局限于更为有限的强调其大炮优势的战斗。另一方面，根据法金汉的命令，德军拼死战斗，坚守每一寸法国领土，反攻所有被英军夺取的据点，并努力控制战场的前沿。结果，德军一直暴露于英军炮轰的巨大压力之下，同时，他们的反攻也只是增加了自身的伤亡。从7月2日开始，英军使德军所遭受的伤亡率几乎接近了自己以前所承受的，而且，在某些时候他们甚至还取得了一些重大的成功。7月14日，由罗林森的第一军2.2万名士兵发动的一场黎明进攻，在德军防御区中撕开了一个6000码的缺口；只是因为他们的后备部队没有迅速跟

1916年7月1日，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也是英军历史上最糟糕的一天，英军第29师进入了索姆河的无人之地。然而，战役接下来的时间中，英军遭受了非常惨重的伤亡，因为德军死守着每一个阵地，并把他们的绝大部分士兵部署在最前线的壕沟。在那里，第29师的大部分兵力毁灭在德军的大炮之下

进，才阻碍了他们的进一步突破。

如果协约国在人力和物资上都占据着优势，这种水平的消耗对德国来说便意味着各方面资源的严重枯竭。消耗战争——资源战——以索姆河和凡尔登战役为典型，虽然缓慢但却稳步地将德军引向了失败。8月底，在由军事上失败所带来的紧张的政治压力下，凯泽取消了法金汉的职务并以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代之，后者显然居于支配地位。历史学家们强调，鲁登道夫强加于帝国的畸形工业和行政政策在招致德国的最后崩溃上负有重大责任，但他们却常常视而不见鲁登道夫对德国战争信条的重铸。事实上，是德国人发明了现代战场，这种发明使战争延续至1918年。一旦掌握权力，鲁登道夫立刻认识到德军在索姆河正在遭受着可怕的打击。与一战中绝大多数指挥官不同，他及时前往战场了解第一手材料——什么样的事情正在发生？他在回忆录中记录说，“调节自己以适应(确切的情况)就是我的责任”。而且，在他寻求事实的过程中，他要求士兵和参谋本部的军官们说出他们自己的思想，而不是去遵循那些“已成定势”的东西。他掌握的情况加深了他最坏的担心；敌方的战术方法也使德军的伤亡达到了最大限度。

鲁登道夫将问题交给了拥有最新作战经验的总参谋部的军官们。这些军官们发明出了一种新的战争理论，它包括在1916年秋天完成的一本手册《防御战争的作战方式》之中。这种战术上的改变来得太晚，没能影响到索姆河战役，但新的战争学说却转变了德军在1917和1918年中的进攻方式。他们不再拖着大规模的步兵开赴前线，而是只部署一小部分机关枪在前沿阵地。这样，敌人的进攻越深入，一旁则是围绕机枪的排列就越紧密，它将使进攻者遭受更加严重的损失。同时，大量的步兵呆在敌人大炮的射程之外，他们可抓住随时出现的机会发动局部的或全

面的反攻。最重要的是，新的学说把战术的决定权威沿指挥链向下传递开来。如今，战场上的中尉和上尉们将对部队是撤退、坚守还是反攻等关键问题做出决定。

同时，东线情形的发展对中欧列强比较有利。1915年的胜利之后，法金汉找不到任何理由把俄军一直追到他们国家的腹地。然而，他对奥地利的轻视却在1916年引发了一次危机，1916年初康拉德建议中欧列强应把意大利踢出战争；法金汉搁置了这一建议，但奥地利却没有告知德国就提前行动，他们从东线抽出自己最精锐的部队去打击意大利。不久以后，作为对绝境中的法国呼吁的回应，俄国也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在新的领导之下，沙皇的战争宣传家们终于动员起了俄国的工业，各种装备和补给开始源源流向前线。如今，在高加索对土耳其的成功作战之后，俄国最高指挥部决定发动一系列有节制的进攻。由阿历克谢·布鲁西洛夫的军队在南方开始发动进攻，并以此作为在北方大规模进攻德国的战役准备。布鲁西洛夫的考虑远远超出其他沙皇军官，他为进攻在细节上做好了一切计划，并对部下强调了一切必需的准备工作，使他们因此完全了解了奥军的防御情况。这一防御已因康拉德撤消了进攻意大利的决定而大大削弱了。

1916年6月4日，布鲁西洛夫的进攻开始，奥地利崩溃。两周之内，俄军就俘虏敌人20万人，部队向前推进了40英里；奥地利又处于失败的边缘。法金汉要想组织起足够的部队来支援这个令人烦恼的同盟，惟有停止在凡尔登的战争，虽然接下来沙皇的司令官发动进攻时也同样表现出了准备上的不足，这也是早先俄国军事行动的特征。但是，布鲁西洛夫的成功使罗马尼亚人确信奥匈帝国正在崩塌，8月，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对中欧列强宣战。那时，德国和奥地利尚拥有足够的兵力摧毁罗马尼亚并控制其宝贵的资源——小麦和石油。这样，罗马尼亚加入战争的惟一结果，就是更加延长了本来已使俄国精疲力竭的战线。

索姆河战役期间，受伤的奥军战士正等待着撤往一所医院。至1916年时，药品终于运进了这片战场，如果伤者进入医疗状态，他们将还有一些存活的希望；但是，输血和抗生素的使用仍只能寄希望于将来，死亡率仍然居高不下。

1916年，参战的任何一方都不存在什么成功。凡尔登战役严重损伤了法国；英国在索姆河也没得到什么特别的好处；俄国国内陷入了革命的边缘。另一方面，奥地利又承受了新的失败，德国也经历了几乎令其无法承受的巨大消耗。交战各方在精疲力竭之中就像一个个被揍晕了的拳击手，惶惑地走进了1917年；但没有一个人看出这场漫长的屠杀活动行将结束。

282

1917年：最阴暗的一年

284

1916年末，法国用罗伯特·尼韦勒替换了已经被失败弄得名声扫地的乔弗雷。尼韦勒享有改革家的盛誉，特别是在凡尔登，他成功地夺回了在战役第一阶段失去的领土，这一胜利给他带来巨大的荣誉。掌握了指挥大权后，尼韦勒根据安德·拉法吉写的一本关于战术的小册子（它对德国人产生了深远影响），立即着手改变1917年初的作战原则。拉法吉的探索意在建立一种机动分散的战术，使部队能够插入和穿过敌人前线战壕构成的严密防御；法军在凡尔登的成功，证明他的思路是正确的。尼韦勒提议在1917年春季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运用他新的战术理

1914~1918年的海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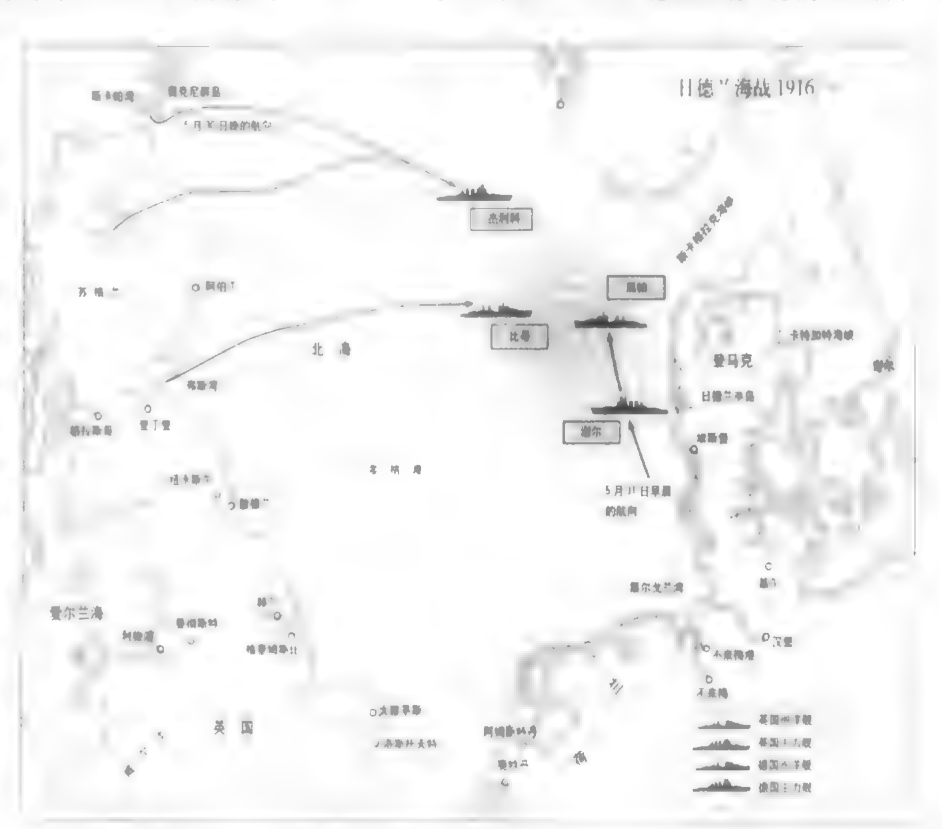
各交战国的海军也加入了战争，因为他们相信一场大规模的海战将决定海上统治权的所属。德国公海舰队期待着英国皇家海军能在黑尔戈兰湾建立一个严密的封锁圈，打算用那里的大量水雷、潜水艇和鱼雷艇重创英军；然后，德军分舰队便可突围并摧毁敌军。然而，英国没有封锁此地，相反，其主力舰队却开进了奥克尼群岛的斯卡帕湾并以此为基地对德军保持着一种深远封锁。另外一些规模更小的协约国海军部队关闭了海峡，这实际上等于把德国排除于世界贸易之外。战争继续下去时，英国又对中立国贸易强加了许多更严格的限制。与此同时，在战争开始之初几个月，皇家舰队肃清了德国海军的残余力量并清扫了敌人的贸易海域。

这种沮丧的情形导致德国海军在英格兰东海岸对英国海军进行了一系列袭击。然而到1914年后期时，皇家海军已能破译敌人用密码表示的联络信号，1915年1月，英国战斗巡洋舰又在多格滩之战中击败了德军分舰队。但后来英军犯了一系列错误，使敌人的分舰队主力得以逃脱，但他们也击沉了敌人的布吕歇尔号巡洋舰。

1916年5月，德国再次出兵海上，这次它投入了公海舰队的全部兵力。海军上将莱茵哈德·谢尔率领公海舰队，包括一支缩短了休整时间的早期无畏战列舰队。他希望能捕获部分皇家舰队的战舰，摧毁他所发现的一切猎物，然后在英国海军主力舰队追上来之前返回安全地带。然而，由于英国海军已能破译德军信号，所以当德国远洋舰队还在突突地冒烟之时，他们就发起了突围。德国前卫部队由海军中将黑帕率领下的5艘战斗巡洋舰组成；谢尔拥有6艘无畏战列舰和6艘早期无畏战列舰。英军占有绝对的优势：英国舰队的前卫司令官大卫·比蒂爵士拥有6艘巡洋舰和4艘超级无畏战列舰，约翰·杰利科爵士率领下的主力舰队由24艘主力舰和3艘巡洋舰组成。

5月31日，两支前卫部队遭遇。黑帕向南转向德军主力舰队，比蒂紧追不舍。一场追逐战于是发生了：英国战列巡洋舰“不屈号”与“皇后玛丽号”一起跟着向前直追。过了一会儿，德国舰队主力突然出现在地平线上。比蒂突然掉转航向，向北部直驶挪威。德国人没有意识到英国巡洋舰正在去与其它部队会合——这是对比蒂做法的惟一解释——他们追了上去。下午6点左右，主力舰队进入他们的视野中，同时，就在他们右边，杰利科下令分舰队由航行队形转变为战斗队形。一场可怕的沉重炮轰降落在远洋舰队头上，仓皇之中谢尔下令全线掉头，才使舰队免于覆没。但德国人错误地理解了当时的形势，他们企图向后退回自己的基地，所以一小时之后他们再次陷入英军舰队密集的火力之中。在这次更加仓皇的情形中，谢尔下令他的舰队再次全线转向，从西方逃走。

夜晚降临之时，英国看来有希望重现“六月的第一次辉煌”。现在，他们横阻在德国人和他们的基地中间，给了敌人沉重的连番打击，而且拥有很有利的情报，但英国没能很好地利用他们的这些优势。海军部没把消息传递给杰利科，主力舰队的舰长们也没表现出丝毫主动性——有好几次英国人甚至让德国战舰从他们右边溜了



过去。第二天早上，主力舰队独自飘浮在北海海面上。从百分率来看，双方舰队损失的吨位几乎相等，虽然德国还有两艘巡洋舰前甲板与浪头平齐着狼狈驶回了基尔。不过，重要的是英国仍保持着北海的制海权。

如果说远洋舰队没有取得什么成功的话，那么德国的潜水艇却对敌人造成了致命的威胁。1914年11月，作为对英军封锁中欧列强的回答，蒂尔皮茨针锋相对地宣告对英军的潜水艇部队实行封锁，虽然那时德国海军仅拥有29艘潜艇，一年后这个数字升至54艘，但由于工程学上的困难，德国船坞中每个平均只拥有1.3艘潜艇。

更令人吃惊的是，德国如此毫无顾忌地发动他们的潜水艇战役，就好像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潜力完全不值一提似的。1915年春，德国领事在《纽约时报》第一页上公然宣告德国将在丘纳德轮船"卢西塔尼亚号"驶往英国之时将其击沉；它确实这么做了，1198名乘客丧生。尽管美国大多数人都是持孤立主义态度，但这一行动也几乎将美国带入战争。由于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保守态度，也由于到最后，凯泽终于意识到美国加入自己的敌人的行列对自己并没什么好处而宣告结束这次毫无限制的潜水艇之战，危机才告缓和。但是，利用1915年和1916年两年战争后的残余力量，德国海军的领袖集团又发起了一场激烈的战斗，试图恢复前次的进攻。陆军将领们也未考虑美国的潜在危险而对海军给以支持。1917年初，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强迫通过了这一议案并迫使凯泽同意，就像鲁登道夫所宣称的那样："美国并没有令我感到困扰……一点也没有；我完全不关心美国是否宣战！"1917年2月，德国重新开始了无限制潜水艇进攻战，4月，美国对德宣战。

可笑的是，德国海军却几乎没有为这次战役做什么准备；其作战计划继续对一流主力舰表现出过分的青睐，但1917年他们的潜艇比起两年前代表着更大的威胁。英国海军部仍然固执地反对使用护航舰队保护协约国贸易，直到1917年春，商船的大量损失严重威胁了英国的经济，首相大卫·劳合·乔治才要求使用护航舰队。

1917年4月，被德国潜艇击沉的协约国船舶总吨位是841118吨。引进护航舰队以后，7月时这一总数降至36.5万吨；9月又继续降至20万吨。至此德国潜水艇的威胁已降至可控制的程度。1918年夏季时，几乎每个月都有25万名美国士兵由庞大的护航舰队载入欧洲战场，德军简直没法消灭一艘船。

日德兰半岛海战中使用的"HMS皇家橡树号"主力舰。地理环境封锁了德国公海舰队进入大西洋的通路，同时在北海海域内，英国海军掌握的准确情报也使它对海上对手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正像日德兰海战中的联系通路——上页图中所描绘的——所暗示的那样。

论指挥法军突破德军在法国境内的凸出防线。

然而事实证明，所有这些预想都存在错误，因为早在冬季中旬，鲁登道夫已下令部队从突出部位撤离。对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历来有几种不同的说法。虽然有的人认为放弃已占领的法国领土，表明德国力不从心，但缩短前线却给部队带来实际利益，使他们能专注于建立起新的防御，充分利用地形去实践新的战术理论。最终，德国人通过放弃已占领地区，创造了不可小视的成功，取其《尼伯龙根之歌》传奇中邪恶的侏儒之名，他们相当准确地实施了代号为“阿尔贝里赫”(Alberich)的战略退却。鲁登道夫的退却，消解了尼韦勒发动进攻的理论依据。而德国新的纵深防御体系，却破坏了法国既定的进攻性的战术调整。

总之，1917年的法国军队成了脆弱的战争工具。没完没了的进攻和流血拖垮了部队乃至整个国家。此外，战时的法国军方根本无视士兵应有的权利和待遇，医疗条件极差，将军们恣意挥霍士兵的军饷，所谓饮食成了滑稽的嘲弄，留给士兵的根本不足以维持正常的生存需要。如果尼韦勒正视这些不足，或许有可能在即将发起的进攻中重创德军。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坦率地说，法国人通过德军第一道防线时，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但正如鲁登道夫所设计好的那样，他们越是向纵深推进，遭受的伤亡就越大。到了第二天结束时，法军死伤达12万人，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法国所剩兵力能够突破德国的防御。但尼韦勒为了成全这场灾难，像他的前任一样，继续进行着这场屠杀。

在伊珀尔的第三次战役期间，负伤的德国战俘在新西兰师的前方医疗站得到治疗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同，在这次战争中，所有各方都普遍遵守国际法，对战斗中被俘人员予以人道主义的待遇

285

此举引发了军队中日益滋生的反抗。开始仅有少数几个团拒绝发动进攻，但很快这种骚乱蔓延到整个部队。一周之内，很多团部发生了兵变。对于大部分参加兵变的人来说，他们仅有的要求是希望得到公正的待遇——在某些情况下，兵变部队仍留在前线战壕里——但同时发生在后方的骚乱却出现了这样几种情况：醉酒的士兵攻击军官，医务人员遭到暴力袭击，在巴黎，失败论者无所顾忌地宣传他们的和平主张。

法兰西为濒于崩溃边缘的局势不寒而栗。在极度失望之际，法国政界把权力移交给乔治·克列孟梭，一个始终以冷酷的态度看待危机的政治家。转过来，他又任命贝当去重新组建军队。克列孟梭竭力使巴黎恢复秩序，贝当则用强制性手段整顿军纪。至少有23名参与兵变者被枪决，另有250人被开除军籍，被流放到人迹罕至之处或被驱赶到炮火中去送死。不过，除了采取以上的暴力镇压手段，贝当还实际走访各个师，倾听各种抱怨，进行彻底的医疗改革，尽量消除引发部队不满的政策和其他方面的因素。首先，他清楚地认识到，他必须管理好士兵的生活。然而，法国军队在1917年的余下时间仍不能进行重大的军事行动。由于俄国发生了革命，美国才开始战争动员，作战的重担便落到了英国远征军的肩上。

尽管几乎没有历史资料表明黑格已经竭尽全力去避免1916年的失败，但英国最高统帅部事实上已允许西线各兵种作战部队创造性地运用各种战术。结果，虽然缺乏系统的归纳与介绍，但如同德国军队一样，新的作战方式和战术原则已经逐渐形成。与之相联系，每支英国部队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去攻克战术改革的难题。某些情况表明，尤其是罗林森和普卢默的部队所采用的措施和方法既符合实

1917年11月14日，驻守在帕森达勒前线的加拿大第4师的部队。从画面可以看出，炮火和雨水已经把弗兰德斯战场变成了淤积黏质泥浆的沼泽。在这一可怕的地貌上，人们生活、战斗、被杀死以及被淹没。尽管如此，整个前线仅向前推进了几公里

际又富于创新，突出了战前准备的精当细密，行动的出奇不意，谋略的诡谲多变以及最大限度地发挥英军炮兵的威力。普卢默的部队在1917年6月发动的一场进攻战，由于计划周密、炮兵火力与步兵的推进配合协调有力，结果仅以微小的伤亡便摧毁了德军在梅西讷里奇的阵地。这个胜利表明，英国人在1917年取得了较好的战绩。然而，即便这样，也未能实现黑格所期望的在西线取得的辉煌性突破。因此，黑格宁肯采纳他的同事骑兵将领休伯特·高夫的大胆而脱离实际的建议。

从担任指挥的第一天起，黑格便一直对弗兰德抱有浓厚的兴趣，把它视为可能发动一次进攻战的基地。但在1916年，法国面临的形势迫使英军不得不发动索姆河进攻。到了1917年，黑格完全能够立足于自身进行选择了，因此他选择了弗兰德。这种选择以一定的战略合理性为后盾，即考虑到以被占领的比利时为基地的德国潜艇对协约国船只构成的严重威胁。然而，与1916年的情形十分相似，黑格的计划驻足于拿破仑战争的理想世界——他打算先用炮火重创德军的前线防御力量，造成敌人的惶恐和畏惧，然后用步兵发起攻击，突破敌人的防线，骑兵紧接着冲上去，对溃散之敌实行强有力的追歼。

在中世纪以前，弗兰德一直是一片巨大、原始的水洼泽地，当地居民在此挖掘了纵横交错的排水沟渠。每年8月，这里都要降下大量雨水，黑格选择了这样一个地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1917年7月15日，英国军队开始猛烈炮击，炮击一直持续了7天，完全摧毁了当地的排水系统。7月31日，步兵占领了靠近伊珀尔的帕森达勒高地，翌日，天开始下雨，炮火和雨水很快将乡野变成一片淤泥黏滑

的洼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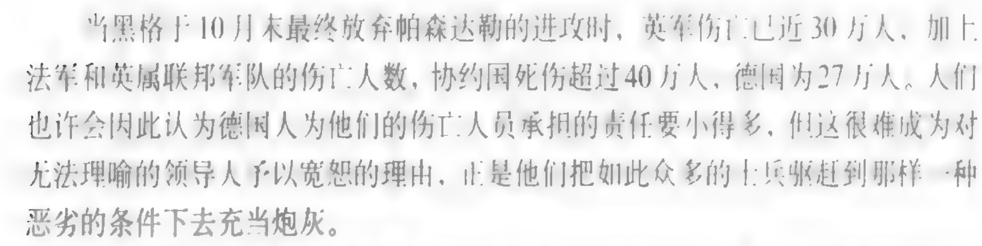
此外，密集的炮火主要落在德军最前沿的阵地上，稍后的主要防御阵地则大部分没有遭到炮击，因此英军最初的进攻仅占领了很小一块地方。但被盲目乐观的部下包围着的黑格却向伦敦报告一切良好。他的情报部长查特里斯上将和参谋长朗基罗特·基格尔特别乐意充当这种欺骗性宣传的工具；战斗结束时，基格尔正在返回伦敦的途中，这是他第一次亲临前线巡视。他哀痛地叹道："仁慈的上帝，我们真的有必要派部队到那里作战吗？"——这句话表明了英国远征军领导层的复杂心态。

继索姆河之后，帕森达勒成为另一场不祥的消耗战。9月13日，赫伯特·普卢默爵士的部队向德军前线发起进攻，向前推进了4000码，进攻前向敌人阵地倾泻了305万发炮弹。但大量德军步兵隐蔽在炮火范围之外，他们的损失与索姆河战役相比明显下降。不过，对于所有参战的人来说，帕森达勒是一次可怕的经历。一位澳大利亚军官经过实地考察后写道：

前线战壕里的环境。尤其是潮湿阴冷的冬季，对前线部队几乎构成了不亚于遭受敌人进攻的最严重的负担。尽管几十年来，医疗手段已经有了重大改进，但尚不能有效地医治在那样的环境里容易引发的肺病和传染性疾病。图中所显示的是1918年在比利时梅西纳附近交通壕里的澳大利亚军队的真实状况。它反映了在战争的第四个冬天，前线部队所面临的灾难

287

> 斜坡上到处堆放着横七竖八的尸体，敌我双方的都有。我看见尸体堆里有一个药盒，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穿行于其中，走到它的跟前。在那儿，我发现大约有五十来号人还活着，他们浑身裹着棉纱。我从未见过如此身体残缺不全或沮丧不已的人。他们蜷缩着身子，挤成一团，紧靠在一个箱子的后面，完全处于极度恐惧和精疲力竭的状态。自发起进攻以来，他们一直遭到德国人的阻击，整整57天——面对的是死亡和即将被抛进火化堆的命运。负伤者难以计数，而且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和必要的照顾，以至他们的呻吟也是那样微弱，有些伤病员已经有四天都一直处于这种境况。



当黑格于10月末最终放弃帕森达勒的进攻时，英军伤亡已近30万人，加上法军和英属联邦军队的伤亡人数，协约国死伤超过40万人，德国为27万人。人们也许会因此认为德国人为他们的伤亡人员承担的责任要小得多，但这很难成为对无法理喻的领导人予以宽恕的理由，正是他们把如此众多的士兵驱赶到那样一种恶劣的条件下去充当炮灰。

1917年，英国夸耀地宣称，黑格先前提出的战略目标，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去实现。坦克第一次出现在索姆河战场上，然而如同所有的新式武器一样，它们从一开始就遇到了难题。当佛兰德斯地区的战斗暂时停息下来时，英国坦克部队指挥官埃莱斯将军提出，用坦克袭击佛兰德斯以外的德军阵地，很可能取得成功。此时的黑格由于在佛兰德斯的重大伤亡而承受着来自劳埃德·乔治的沉重政治压力，他别无选择地同意了埃莱斯的建议。11月20日，经过短促的猛烈炮击后，英国坦克向康布雷前线的德军阵地发起攻击。担任防御的几个师在德军中属于战斗力最差的"二流"部队，又无可投入使用的后备队，因此阵地很快丢失；在一天里伤亡近5000人。英国坦克及其支援的步兵所夺取得的地方，超过他们在3个月的帕森达勒进攻战中的收获。不过，英军在那里缺乏后续部队，进行防御的各种准备也大为不足。结果不到一周，康布雷附近的英军阵地便遭到德军的凶猛反击。德军第一次采用鲁登道夫及其参谋人员制定的新的进攻方案，很快把英国人赶回

到发起进攻前的地方。黑格和鲁登道夫都断定，坦克不过是战场上移摄镜头的一次闪烁。

当折磨人的战事在西方连绵不休之时，俄国爆发了一系列重大事件。1917年2月，沙皇政府的统治倒台，从时代的角度看，这标志着一切专制统治残余的消失，代之出现的是由一些不成熟的政党组合建立的临时政府。为了加重其混乱，德国允许流亡在外的革命领导人弗拉基米尔·列宁，乘坐一闷罐列车通过德国领土返回俄国。1917～1918年间，他们一直向他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党提供充足的经费，资助其煽动声势浩大的运动，以反对俄国继续介入战争的行为，因为在俄国政治家中，只有列宁迫切希望立即结束战争；他大力宣传布尔什维克的"和平与面包"的口号，这种鲜明的态度体现了其德国资助者的需要以及他们自己的基本目的。由于他们富有成效的宣传，布尔什维克极大地削弱了临时政府的基础，影响了军队的士气。结果，俄国军队纪律的涣散导致了7月间进攻的全面失败。就在这一个月，人们也目睹了布尔什维克在圣彼得堡起义的失败，但4个月后沙俄军队发生整体的崩溃，文职政府允许列宁掌握了权力。

288

由于训练有素和战斗顽强的俄国军队的瓦解，又面对德国和奥地利的利益要求，新的统治者只能选择委屈求全的道路。最初的谈判失败之后，德国人的快速推进终于使列宁懂得，革命的言辞不能遏止军事力量。1918年3月，在德国人推进到距离他们的首都仅有100公里的紧迫形势下，布尔什维克签署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放弃了波罗的海各国即波兰、芬兰和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但是德国的野心几乎是没有节制的。鲁登道夫将最具战斗力的部队留在东线，而不是调往西线，以便趁机夺取更多的领土。到5月初，德国人已经占领了乌克兰的其余地区及克里米亚和芬兰，鲁登道夫梦寐以求的是将日耳曼帝国的疆界伸延到乌拉尔山脉。布列斯特条约和它引起的后果，显示了德国日益扩张领土的野心，同时也为其后来竭力抗议的不公正的凡尔赛公约敲响了警钟。

当俄国崩溃之时，德国人从其精锐师中抽调少量部队，支援奥地利军队去应对意大利发动的新攻势。1917年10月24日，奥德联军进行的一场进攻沉重打击了意大利军队，使之陷于危机四伏的绝境，现存兵力严重不足，部队待遇十分凄凉，整个民族精神已经瓦解，形成灾难临头之势。一天之内，意军在卡波莱托的伊松佐峡谷一带的前沿防线全部崩溃，在某些地区，奥德联军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纵深处——至少在西面——深入达10公里。一个德国军官(埃温·隆美尔)带领一个加强连在一天之内就轻而易举地俘虏了近1万名意大利军人。整个战局似乎表明，意大利将不得不乞求和平。但德国已无力继续在战场上保持进攻态势，而奥地利单方面又不具备在战争中彻底打垮意大利的实力。由于来自英法联军的大力援助，意大利军队终于阻止了敌人在皮亚韦的进攻。但卡波莱托的溃败，表明协约国已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1918年：决定性的一年

到1917年秋季，鲁登道夫的战术专家们提出了一种新的进攻理论——与成功的"纵深防御"并行不悖的"纵深进攻"——在紧跟着的整整一个冬季，德国一

直在采用这些新的战术，紧张地组织和训练一支由若干精锐师组成的规模不大的集团军。大约有40个师的“强击部队”得到了新式装备，补充进最优秀的军士和军官，接受了新的理论指导下的严格训练。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的军官，包括师级指挥官，都经过军事学校的培训，能透彻理解各级指挥理论。新的军事理论对下至军士的各级指挥权限做了明确的强调，重申了战场上的机动性，但又指出这种机动性必须保持与火力的紧密联系和协调配合。此外，新的理论还要求德国军队不断增强和发挥突破敌人防线的主动性；他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无情的打击，攻入敌人的后方。速度是实现战略目标的关键。

然而，德国所面临的形势潜藏着重大的不利因素。除了精锐的强击部队，德军中的其他部队普遍缺少装备、给养和进行新式战争的训练。再者，其优秀的军士和军官都集中在强击部队，势必造成其他部队战斗潜力的明显削弱。这样，鲁登道夫将不得不抢在美国人到来之前，主要依靠他少量的强击部队取胜。否则，德军中的其他部队将不能支撑长期战争。结果，尽管德国人对贯穿整个战场的一系列战术问题都提出了为人称道的见解，但他们却缺乏把这些战术成果转化为实际胜利的成熟思想。当德国皇储鲁普雷克特就春季攻势的作战目标询问鲁登道夫时，他回答：“我反对用‘作战’这个词，我们将打穿一个洞，钻进(他们的防线)，其余的我们将一目了然。”鲁登道夫决定把高夫的第五军和普鲁默的第三军作为第一

1917年，一辆英国喷火式坦克正通过铁丝网构成的障碍并碾压出一条通道。这幅照片显示了坦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上的一种主要作用：在没有延伸炮火的支援下它能摧毁敌人的铁丝网，为步兵冲过去与敌人拼杀扫清障碍。到1918年，坦克已能以这种明确的方式对战役产生影响。

289

个打击的目标。在1917至1918年冬天，黑格也提出了一种纵深防御的策略，但他的指挥部提供的情况证明，将一种系统连贯的理论传达到整个英国远征军是不可能的。在大部分英军的防御阵地，步兵一直处于敌人炮火袭击下的前沿阵地上，炮兵与步兵之间缺乏协调配合；由少数训练有素、能够独立进行战斗的军官组成的指挥机构也难以理解。黑格和他的参谋人员又明显缺乏实际指挥能力。例如英国远征军的一位指挥官在他3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

> 我……告诉部队指挥官们，我对自己在三军前线所看到的一切十分满意。作战计划是可靠的，而且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我惟一担心的是，一旦敌人发现我们的前线固若金汤，他们就会由于担心必然造成的惨重伤亡而推迟下达进攻的命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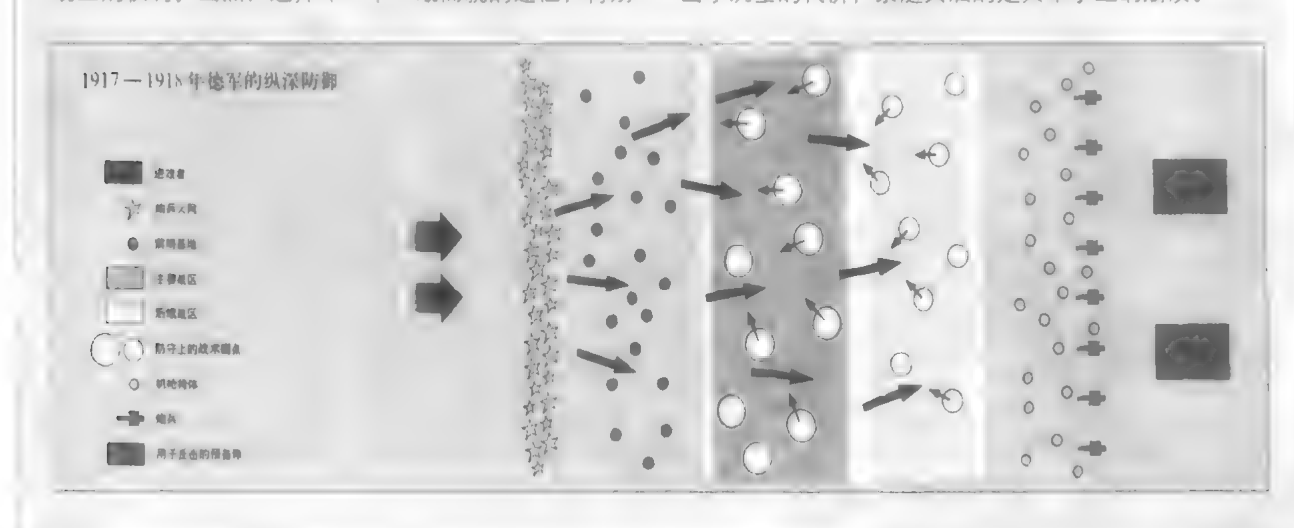
1918年3月21日凌晨5点，德军的进攻开始了。6473门榴弹炮一起开火，实施饱和轰炸。密集的炮弹落在40公里前线的每一条战壕、每一个阵地和军需仓库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场谋略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需要交战各方进行诸多错综复杂的战术策划，以便使他们的部队能成功突破敌方的防御阵地。最重要的需要是形成不用“预先定位”就能准确命中目标的炮兵战术，因为任何火力的定位只能使敌人警觉到对方即将发动的大规模进攻。

具备那样的能力需要详细的航空照片，炮兵弹道学的完整知识，可靠地预见天气条件对炮弹飞行的影响的能力，以及对敌人的防御系统实质的准确估价。军队在经历炮兵战术发展的同时，也必须相应地发展一种有利于机动分散作战的步兵战术，以便使军官清楚自己在战场上的权利。当然，这并非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特别是在等级森严的军事组织中。此外，敌对双方战术的发展，也增强了武器的复杂性和精密程度，往往使步兵和炮兵的火力得以加强，并强化了防御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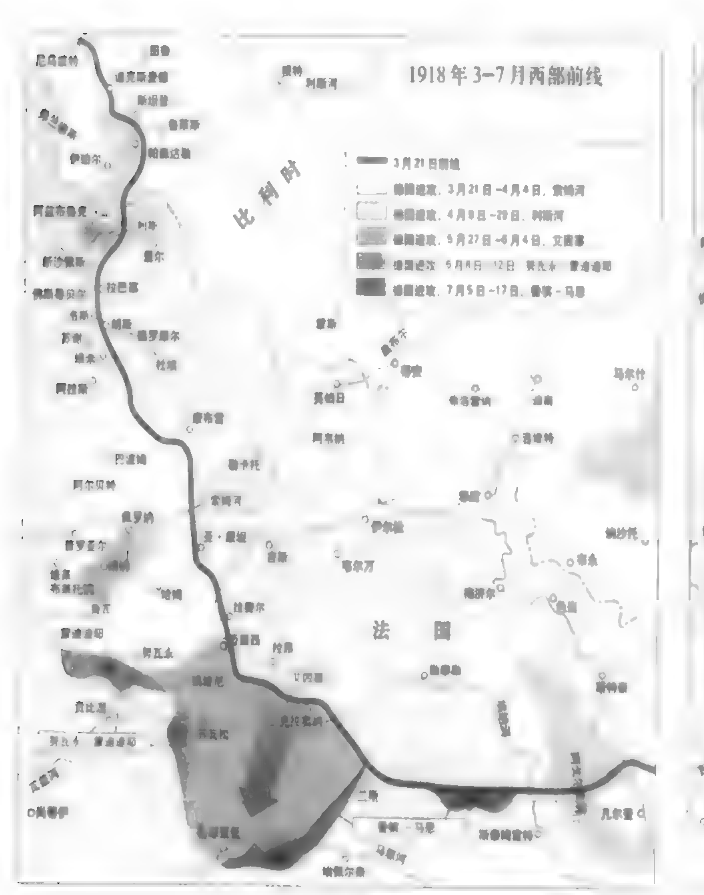
这样，在整个战争期间，随着敌对双方竭力占据优势的较量，各种战术也经历了急剧变化。新的进攻战术的发展，能被一种纵深防御所抵消(如下图所示)，越是向防御系统的深处推进，遇到的阻碍就越密集，这将给进攻者带来重大损失。类似的实例出现在1917年4月法国命运不佳的进攻期间。到1918年，德国军队改进了进攻战术，终于打破了西线的僵局——但是在伤亡方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紧随其后的是其军事上的崩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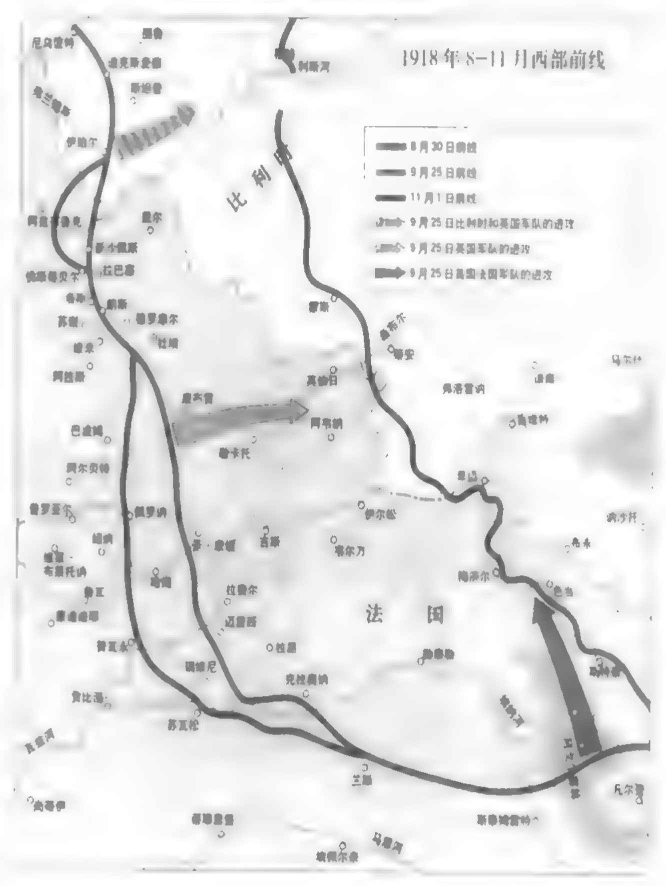


9点55分，3500门迫击炮加入了炮击的队伍，发出呼啸的炮弹声。5分钟后，32个步兵师开始向前推进，另有9个步兵师作为预备队。在这次代号为“米迦勒”的进攻中，德国人出动了100多万兵力。几乎顷刻间，英军的防御全线崩溃。第二天，德军的进攻摧毁了高夫的第五军，但西线普鲁默的部队仍有效地控制着德国人试图夺取的重要地区。正是由于这一点，鲁登道夫失去了赢得战争的最后一个机会。尽管事实上，德军在南线的推进已经使英、法军队濒临被分割的危境，但鲁登道夫却决定加强北线的突击，结果收效甚微。与此同时出现的一些情况也干扰了德军的推进：即使纪律严明的强击部队，也因为争抢协约国的军需物资而贻误了战机，甚至在最精锐的强击师中，也失去了各种严格的纪律约束。

在此期间，黑格准备把英军撤回海峡，割断其与法军的联系。但此时发生了两件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一件是贝当及时明智的参与，陡然间加强了南线的指挥；另一件是面对败势，协约国政府建立了一个最高指挥部，以统一协调各方面的力量。费迪南德·福煦一个杰出的军事教员和领导，被任命为协约国军事力量的最高司令。他就任后一周就指挥协约国军遏止住了德国人的进攻。而德国人的推进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们是这场“米迦勒”进攻的真正受损者。实施新的战术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因为进攻者要蒙受重大伤亡，而且德国人在战略和实战中并没有取得具有实际意义的成果。再者，进攻结束后形成的新的防线需要补充更多的兵员，因而加重了有效防御的难度。

然而，鲁登道夫又将他的下一步注意力转向英军前线的北部阵地。他决定最终将进攻的目标定在那里。不过由于损失太大，这次能够投入的兵力仅有11个师。德国人再次取得战术上的成功，虽然这很少被提及。一些葡萄牙部队的溃散给德





1918年的攻势：德国的春季攻势（左图）和协约国在战争最后半年的攻势(右图)。德国的攻势形成空前的推进，却没有出现决定性的成果。这些驱进仅仅是占领领土而缺乏战略目标，结果证明，在所占领的地区比在发起进攻的起点更难以防御。实际上，关键性的结果是德国军队在实施进攻的过程中拖垮了自己。协约国部队则集中攻击一个防御目标，直至摧毁对手。大量这样的战例将由英国军队带入——一场最成功而又极少被检验的战役中

美国军队在1918年夏季以每月25万人的数目增长到达欧洲，逐渐改变了西部前线难以确定的僵持状态。但是，无论在军事上还是经济上，美军在参战前都缺乏准备，这就使他们很难形成有关战场的现代意识。然而，富兰克林·罗斯福，美国海军部的助理部长，以这些不足为鉴，注重观察和学习，在下一次战争中，当他成为总统时，竭尽全力使美国的武装力量做好了实质性准备，以对付由于外国入侵引发的危机。

国人帮了忙，强击部队迅速向前推进；但由于黑格在这一地区有充足的预备队，德军在整个战役水平上并不具备实现重大突破的能力。因此在付出了重大代价仍未取得重要收获之后，进攻便停止下来。考虑到协约国后续部队都集中在北线，鲁登道夫决定改向驻守埃纳的法军发动攻击。到5月底，他在沿舍曼斯达姆斯一带的地区集结了44个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早在3月，英军中受到重创的3个师已经先期到达这里休整和重新组编。贝当下令法军指挥官准备纵深防御，但第一军的司令官杜切斯雷拒不服从，致使对战况有较多了解的英军不得不将其步兵挤满在前线战壕里。

5月27日，4000门大炮齐鸣，装填进不同剂量的毒气和高爆炸药的炮弹在空中划过。3个小时后，德国步兵控制了高地。协约国部队的防线崩溃。一天之内，德国第七军就渡过两条河——在某些地段渡过3条，形成了长25公里的突出地带，深入协约国军前线达12公里。进攻的德军围歼了4个师的防御部队，另外4个师撤离。第二天，德国人的攻势丝毫不减。在最终对佛兰德斯发动攻击之前，鲁登道夫进攻舍曼德斯达姆斯原本是要将协约国预备部队从北线逐出。现在成功在望，他命令其指挥官全权负责，敦促后续部队继续推进，尽管还缺乏明确的目标。1918年5月20日下午，德军占领了距离巴黎不到40公里的马恩，法国政府再度准备撤离到波尔多，全国陷入一片恐慌。

不过，贝当始终保持着镇定，战斗开始的第一天，他就调了16个师开往马恩河。他要自己的部下和政治家们明白，英法军队必须坚持数月以等待美国援军的到来。事实上，美国已经开始向他处境艰难的盟友提供大量的有效援助。6月4日，美军在法军的支援下，在沙托—蒂也里打了一场漂亮的阻击战，遏止了德军的进攻。尽管美军在战术上还显得不够成熟，但他们高昂的士气和充沛的精力极大地鼓舞了法国人的斗志。与此同时，德国人准备发动第四次攻势。这一次他们的目标是要将法国人消灭在春季攻势所形成的突出部位之间的裂口处。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都进行得很差，以致对手已经有了足够的警惕。在这一地带担任防御的法国指挥官一直把步兵布防在前线战壕里，虽然敌军的炮弹夺去了他们当中不少人的性命，但至少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德国人再次以重大伤亡换取有限的收获。

为这场战争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所做的准备是一次重大消耗，它使士气低落的德军更加疲惫不堪。虽然已是机关算尽并几乎耗掉所有的人力，鲁登道夫仍瞄准兰斯，打算实施他的最后打击。他始终确信，他能够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攻势打垮美国。不过为了道义上的目的，他给予这场箭在弦上的进攻一个代号“Friedensturm”——友好风暴攻势。由于再次预先得到警告，协约国最终完成了纵深防御的准备，福煦抽调了11个师作为增援部队。事实证明，德军的最后一次进攻比1917年对法国人发动的里维尔春季攻势遭到更大的损失。经过如此惨重的伤亡之后，除了蜷缩在前线战壕里，德国人几乎没有立足之处。部队士气受到严重挫伤，降至从未有过的低谷。自从发动“米迦勒”攻势以来，已有100万德国

士兵阵亡或负伤，突击部队的伤亡更为惨重。长达4年的屠杀所造成的损失是难以弥补的。鲁登道夫的不断进攻拖垮了整个军队，把它带到濒于崩溃的边缘。与此同时，协约国的实力却由于几十万美军的到来而迅速加强。

法国人首次发动攻击。7月18日，法国第十军进攻了马恩河沿岸突出部位以西的德军阵地，一个小时之内就直接威胁到苏瓦松，那里是驻守突出地带德军的后勤供给基地。最终，德国人弃阵脱逃，这是他们在1918年遭受的第一次重大失败。福煦发动一系列进攻，以便对精疲力竭的德军不断施加压力。协约国军队的下一步打击目标在北线。1918年8月8日，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英联邦部队在大量英国坦克的支援下，对阿米恩斯附近毫无准备的敌人发起攻击。英军炮兵压制住了敌人的炮火，同时，坦克掩护步兵穿过死亡地带。德军有6个师被歼——事实上，他们的瓦解是那样彻底，以致溃散的队伍试图阻拦后续部队收复前线阵地。英国的装甲车冲入德军的后方，粉碎了其后续部队实施反击的各种准备。2/3以上的德军失散人员成了俘虏——一个灾难性的标志。鲁登道夫在战后承认，8月8日"对德国军队来说，是开战以来最倒霉的日子"。

保罗·冯·兴登堡（公元1847~1934年，左）和埃里希·冯·鲁登道夫（公元1865~1937年，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半期，一直统治着德国。他们因坦嫩堡的"胜利"（事实上，应归功于其他人）而获盛名，并于1916年夏天掌握了国家命运的操纵权。鲁登道夫将通过他所卷入的现代战争，迅速建立起一种战术理论。但他在战略和政治上的迟钝——特别是刺激美国加入战争——决定了德国的最终失败

英军以最小的伤亡取得令人震惊的胜利。坦克成了战争之神。虽然它在战场上的作用毕竟有限，但英国人完全能够以坦克的火力作为取胜的关键，发动至少一至二场大规模进攻；遗憾的是，英国远征军中的高层指挥人员没有真正认识到这种武器的潜在威力，因而黑格只是小批量地使用坦克，或者通常将它作为攻坚战的接应，完全依赖于炮兵和步兵的协同配合。不过，到了9月，英国远征军已经突破了德军在西线的重要防御工事——锡格弗里德防线，迫使敌人撤离比利时海岸，并差一点收复布鲁塞尔。但他们是在付出重大代价后取得这些胜利的；令人吃惊的是，从1918年8~11月，英军伤亡人数已经超过一年前在帕森达勒的损失，尽管这是在完全不同的境况下出现的结果。

在英国人将德军逐出占领地时，法国军队对条件优于他们的中部德军实施了精心组织的攻击，结果以相对小的伤亡重创了德军。美国军队发起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主要以凡尔登南部圣米歇尔突出地带的德军为目标。美军的准备十分仓促，以至德国人相信这不过是一场骗人的把戏。但为了在美国人进攻时缩短战线，他们让部队做了有限的后撤，并预备了一千多架飞机作为空中支援。在攻占圣米歇尔突出地带之后，战斗力日益增强的美军又向默兹——阿戈纳地势险恶的德军防御阵地运动。在那里他们遭遇到令人生畏的对手。缺乏实战训练的弱点加重了美军的伤亡。尽管并不比战争初期其盟国军队所经历的场面更险恶惨烈，但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场面仍令人毛骨悚然。

294

在西部前线，失败一直尾随着德国军队。强击部队明存实亡。担任防御的师已经减员到其建制的20%，只有机枪手仍在继续进行顽强的抵抗。然而西线的局势却不是眼下德国最担忧的。由于频繁发生的罢工和工人暴动已严重危及了德国的工业生产，物质匮乏的阴影笼罩全国。作为德国的盟友，比利时和土耳其已经

被4年战争消耗得国力枯竭，分别在9月和10月向协约国求和；到了11月，从萨洛尼卡出发的协约国军队到达匈牙利平原；同时，意大利和英国军队渡过皮亚韦河，挺进奥地利，迫使其在11月3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绝望中的鲁登道夫请求政治家们出面促成停火，以挽救危如累卵的军事形势。但为时已晚；德国人已经丧失了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权利，担任谈判的巴登的开明首相马克斯亲王无法软化协约国提出的德国必须无条件放弃抵抗的强硬要求。德国最高统帅部认为，战争的失败是由于国内爆发了革命。为了保持德意志帝国的荣誉，他们决定派遣远洋舰队进行"敢死航行"，进入北部海域，这就更加重了德国的危机。然而已经经历4年野蛮杀戮、饱尝恶劣待遇和粗劣食品之苦的士兵不愿再为帝国海军的荣誉去送死，他们揭竿而起，进行革命，俾斯麦王朝随之崩溃。皇帝被迫退位，乘飞机逃往荷兰；鲁登道夫利用假胡须进行一番伪装后，飞往瑞典。1918年11月11日，敌对双方在西线实现停战。

国内战争

从政治和战略的角度看，战争的行为给人们留下了大量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如果说欧洲的军事将领们已经显得很难适应战争的挑战，政治家们的表现也强不了多少。1914年当德国大军长驱直入时，法国政府曾放弃巴黎飞往波尔多，直到第二年仍驻留那里较长一段时间。他们的胆小卑怯不可能使其居于同霞飞的战略相抗衡的地位。在英国，由于加利波利—丘吉尔权力旁落引发的一系列难题，导致阿斯奎思首相在1915年面临危机。尽管保守党的加入组成了联合政府，但这个政府并不能改变放任自流的现状。只有整个民众的强烈不满和逐步升级的战争才能给英国带来变化：1916年12月，达维德·劳埃德·乔治通过宫廷政变取代了阿斯奎思，但同时也搞垮了他的党，削弱了政府控制黑格的能力。在法国，1917

这是两幅保存下来的1917年战争的招贴画。右边的一幅(来自奥匈帝国)意在从过去的历史中寻找现代战争的支撑点。而德国的招贴画(左)则以现代战场上的士兵来产生一种吸引力。画面上的士兵显然是配备了现代装备和新式武器的德国突击队员，背景处非常明显地带有战壕上带棘刺的铁丝网。

年军队的溃败和政府的软弱，最终导致克列孟梭权力的极度膨胀。这些政治危机一方面反映了战争对社会施加的影响，同时也表现了军事将领与文职领导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295

德国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即不是将战争的组织指挥置于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人的控制管辖之下，而是把它拱手交给军事将领。掌握了权力的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迅速崛起，大大加强了军方在一切方面对政治策略的压倒之势。对美国的宣战，为军事统治导致的恶果提供了最显著的例证。将具有损害性的过高要求强加于德国工业的所谓兴登堡计划，破坏了国家脆弱的统一协调，最终导致经济的全面崩溃。自始至终，德国军队都在同根本没有搞清的目的与手段的相互关系打赌。他们将目标确定于Weltmacht oder Niedergang——世界霸权或失败——而最终得到的是后者。

在东方，两个专制大帝国，奥匈帝国和俄国发生了最不成功的变化。沙俄统治者的一系列颠三倒四的决策，将民族危机扩大到极点，直到军事上的失败导致文职政府垮台，国家的权力转移到激进的革命者手中。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很快又使许多俄国人怀念起原来不称职的统治者。从始到终，奥地利人在战争中一直是糊里糊涂的。他们既不容置疑地对自己的举动感到意外，又毫无疑虑地惊讶于对手的行为，他们的多民族国家后来发生分裂，其碎块如同在波斯尼亚等地区一样，一直困扰着整个世界。

人类为战争付出的代价是那些生活在20世纪末的人们难以想象的。被动员参战的人达7000多万，900多万人死于战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年龄在十几到二十几岁之间。据统计，大约有70多万英国士兵葬身炮火，另有来自其自治领地的士兵死亡2.5万人。其他主要参战国家死亡人数为：意大利50多万，奥地利110万，法国130万，德国高达200万。这些巨大的伤亡所造成的影响和后果是难以估量的。澳大利亚年纪在18至45岁之间合乎应征条件的男人中，几乎有一半作为志愿兵赴欧参战。他们中有1/3的人负了伤或留下终身残疾，几乎1/6的人阵亡。在军队服役的塞尔维亚人几乎有40%死于战场。死亡的土耳其军人占其总兵员的大约30%，罗马尼亚和比利时军队死亡人数也分别占其总兵员的25%。而法国、俄国、英国及其自治领的，奥匈帝国和德国的阵亡军人，均占其陆、海、空总兵员的11%～17%。只有美国的阵亡比例不到5%。

为了经受如此持久和激烈的战争考验，不仅需要动员全部人力，而且需要动用所有的物力和财力，这在以往的战争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由于大多数男人都上了前线，各国妇女都进了工厂和各种工作场所，这也是过去不曾见到的情景。由此必然从道德观念到妇女地位等整个欧洲的一切领域带来巨大的社会变化。在英国和美国，对妇女享有投票权的认可成为社会变化的一个并不十分显眼的标志，但也是经过斗争才实现的。

296

然而，战争的最大影响却集中体现于对人类进步信仰的丧失，这种信仰在1914年6月以前曾被视为西方文明的标志。在战后的世界，各种左翼的和右翼的败坏社会的激进学说到处蔓延，比什么都更清楚地表明欧洲精神风尚的衰败。毫不夸张地说，战争使欧洲知识界的精英们坠入绝望的精神探索，只能在战争留下的一片愁云惨雾中寻求答案。也许诗歌最能表现欧洲战争的历程。1915年，一个

年轻的英国诗人鲁伯特·布鲁克在临终前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假如我将死去，想到的只是此刻的我：
在异域的某个角落
魂牵梦萦的永远是英国。
那片沃土里埋藏着一粒更富有生命的尘骸，
它孕于英国，在那里形成，有了知觉，
曾奉献出爱的花朵。
吮吸着英国的灵秀之气，长成堂堂的英国之躯，
经受江河的荡涤，沐浴故乡的阳光。
这颗心祛除一切邪恶，让此刻之所想成为永恒精神的一次冲动，
英国赋予的思想，在异处回报；
她的视听，她那幸福的清平之梦；
在英国的天空下，在平和的心灵里，
充溢着笑声、友好的祝愿
以及绵绵不绝的温馨。

三年后，另一个英国军官西格弗里德·莎逊(英国著名"战壕诗人"——译者注)写下一首完全不同的有关西部前线的诗：

右页图说明文：在试装室里，大战中伤残的英国退伍军人正等待着看示范，以学会如何使用他们的新假腿。

黎明的山峦叠起一片灰暗
炫目的阳光泛起紫色的疯狂
飘渺的青烟里裹着闷燃的野火
遍布满目疮痍怵目惊心的斜坡；
一辆辆坦克一路踉跄冲向防线。
排炮抬头怒吼。
炸弹、枪支、铁锹和战斗器具压弯了
笨拙的身体，士兵们争先恐后爬向灼人的战火。
灰色的队伍，抱怨的面孔，笼罩在恐惧之中，
他们跃出战壕，冲向高地
手腕上嘀嗒作响而时间在空忙，
诡秘的目光中，握紧的拳头里
有在泥泞中挣扎着的希望。
噢，天哪，让这一切都停止吧！

西方文明经过三年多在腥风血雨中跋涉的历程，确已变得使人惊恐不安。然而这还不是它恶变的终结。

第十五章 冲突中的世界

298

1919年初，战胜国领导人在凡尔赛会晤，讨论和处理由于德国战败，奥匈帝国、沙俄和土耳其的瓦解，以及左派革命幽灵四处游荡所带来的各种重大问题。他们几乎没有可能重建持久的和平，因为在业已结束的冲突模式中包含着新的重大对抗的不可避免性。按照停战协定，协约国军队一直驻扎在德国边界的外围地区，尽管在经济和政治潜力方面，德国一直位居欧洲之最。在俄国，以救世主自居的马克思主义者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此后长达70年的时间，他们的思想观念完全脱离了欧洲的体系。于是，一个取代大帝国的过于松散的联邦式国家出现在东欧。这样，成功的解决办法只能依靠西方民主的意愿去保护它的各项条款的实施。然而，美国在1920年后撤出了世界事务，英国也表现出日益减少卷入欧洲事务的意向。这就使法国不得不通过强迫德国遵守停战协定中带有羞辱性的条款来抑制其实力的急剧膨胀，并作为一种针对性的应对措施，沿东部边界——马其诺防线构筑大量防御性工事。到了20年代初期，许多德国人相信，1918年战争的失败应归咎于国内犹太人和共产党人蓄意的政治破坏，虽然当时他们纷纷逃往波兰、丹麦和比利时；加之巨额赔款的重负，海外的利益被瓜分，海军舰队被强行撤消等令人难堪的结果，德国国内业已受到伤害的民族情绪更加恶化。军方和政界要人应对失败承担责任，因而也必须为他们把自己的错误强加于新建立的魏玛共和国而受到谴责，这个共和国已在战胜国的强大压力下被迫接受了一切和平条款。与此同时，法国的高压加重了新的民主秩序的危机。1923年，德国推迟向驻鲁尔区的法国占领军交付赔款。德国领导人以导致经济自杀的铤而走险的方式对战胜国做出了强硬回答；这种蓄意造成通货膨胀的政策，摧毁了中产阶级的全部积蓄，极大地动摇了人民对共和国的稳定感和信心。

下一次战争的准备

1923年后，欧洲一直沉浸在依赖并不可靠的美国贷款所造成的虚幻的稳定感之中，主要军事强国都削减了他们的军备。但是这一切都不过是相互间的良好愿望而已。1929年10月华尔街股票市场倒闭，宣布了一个凄风苦雨时代的到来。美国各大银行收回他们的贷款，引发了中欧经济的崩溃。一时间失业人口高达1000多万，随之出现的是魏玛共和国的解体。1933年1月，阿道夫·希特勒成了德国总理；出自改变整个世界秩序的共同欲望，他加入了意大利的贝利托·墨索里尼、苏联的约瑟夫·斯大林和东京军国主义者的行列。

299

与此同时，欧洲的军事一直紧紧抓住大规模战争这样一个课题。他们面对着在预算紧缩时期迅速改变技术装备，以及如同陆地和海洋一样，天空业已代表一个独特的交战舞台的现实。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地面冲突进程的重大决策形成

于20年代。在德国，军事改革的决定性因素是汉斯·冯·泽克特将军被任命为军队总司令。面对协约国要求德国军队减员至10万名士兵和4000名军官的强制性规定，泽克特设立总参谋部控制和管理军队及其军官团。此举产生极显著的效果，“德国国防军”（作为众所周知的新的德国武装部队）成了欧洲惟一着手进行既冷酷无情又充满清晰的分析判断的最新军事变革的武装力量。历史学家往往认为，一般说来，人们总是为了最近一次战争而准备再次投入战斗。实际上，这并非普遍的事实，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却是一个明显的例外。泽克特组建了不少于57个负责考察和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专门委员会。这些由总参谋部军官主持的研究机构，主要由在进攻与防御军事学说方面的卓有建树者组成。他们提出的理论见解，曾对1917至1918年的战争产生过重要影响。其结果，德国军队的发展成了1918年战场的续接画卷。1924年，德国军方出版了军事条例手册——《军队领导》——其内容完全基于对最近一次战争的分析和评价。

汉斯·冯·泽克特（公元1866～1935年）作为杰出的总参谋部参谋，他是德国军队中智力派的代表。1919年成为战后第一任武装局局长，1920年任统帅部首脑。在这一位置上，他对改变德国军队的文化基础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使之有了严格的评估标准，形成基于切身体验的训练方式并训练出了其他欧洲军队所没有的青年军人。但与他的大多数同僚一样，他并没有从战略上认识德国失败的教训。在就任德军总司令期间，他把很大的精力用于策划摧毁波兰，以夺取与革命的俄国接壤的边境地区。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德国的军事改革正是建立在这样固定的基础上。他们的理论强调发挥各级指挥员的机动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强调指挥人员必须来自前线，无论是德军中的步兵军官还是其他军兵种的军官，都概莫能外地要通过这条途径。结果，那些在30年代发展起来用装甲加以武装的部队，在协同作战的基础上建立起系统的作战和战术构架，创造出体现军事力量中一个关键性进化发展的装甲战争的概念。1933年，希特勒拟定了一个重新武装的庞大计划。然而在这一时期，他还没有直接干预军队统帅部门的战术或作战决策；在重新武装起来的德国军队中，扮演最重要角色的仍然是陆军总司令维尔纳·冯·弗里奇和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1933年，他们着眼于德国所处的战略局势，一致认为，由于资源、技术和专业的不足，德国尚不能冒着风险建立全部机械化和摩托化部队。因此它需要一支由大量的步兵师组成的陆军部队。

与此同时，德国以巨大的精力和热情进行装甲化的试验。他们已经拥有两笔固定财产——一种融会贯通的军事学说和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期英军装甲化试验的有关知识。早在1934年初，贝克领导的总参谋部就实际检验和考察了装甲部队和陆军的潜能，在周密调查的基础上才正式批准组建那样的装甲编队。1935年德国陆军自豪地声称他们已经拥有3个装甲师，到1939年有了6个装甲师，到了1940年，其装甲师增加到10个。这些发展都纳入了德国人对作战体验与和平时期实际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进行彻底检验的框架中。因而在193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建议中，装甲部队仅以师为作战单位调动使用，但在入侵波兰和法国时，装甲部队已经以军为单位发挥作战功能。到了1941年，最终发展成坦克集团军，除了其名称，它几乎装备了一切。

欧洲其他国家军事理论的变革却不是那样顺利。直到1932年，英国尚未对第

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进行必要的总结和检验。后来当一份文件对此提出尖锐批评时，皇家总参谋长蒙哥马利—马辛贝德粗暴地扼杀了这一正确意见。然而在英国军官层中，却有一股重要的富于智力和探索的蓬勃力量，形成了致力于推动装甲化战争发展的具有革新精神的指挥员群体。其中的两个佼佼者是J·F·C·富勒和B·H·利勒尔·哈特。他们为走革新之路进行了富有说服力的充分论证，对加速改革施加重要影响，并很快赢得了众多军官的支持和呼应。更重要的是，皇家总参谋部的首脑之一米尔恩勋爵支持为机械化作战所进行的试验，在面临经费短缺的压力时，他增拨了不足的款项，使得扩大试验成为可能。

但是到了1934年，英国的军事改革面临夭折。来自两方面的因素妨碍了改革系统计划的实施。一是政界人士以及公众舆论明显反对英国军队对（欧洲）大陆承担义务，由此导致1939年英国政府仅为军队提供少量的经费；二是大部分军官仍迷恋于对普通士兵的传统支配权和优越感。他们将官职视为一种舒适的地位和特权，而不像一个专业人员那样需要刻苦钻研。这种支配传统与各个军事部门的偏狭眼界结合在一起，严重阻碍了军事系统理论的发展。结果，对于最具支配欲和优越感的军官来说，从事骑马、猎狐，用长矛刺杀野猪等消遣娱乐比为战备刻苦钻研更重要。

法国已经开始了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某些研究，但笼罩在人们头上的1914至1917年间可怕经历的阴影，抑制了他们在这方面所进行的努力。其决策者小心翼翼地走向有限的战备进程。由法国的军事学院的少数人提出并被称为“井然有序的战斗”的理论，似乎为避免上次战争的可怕伤亡提供了一条出路。但是这种理论仅仅包含精选出来的1918年少数几次战役的体验，更糟糕的是，以莫里斯·甘末林为代表的高级指挥官们，对各种新观念和不同意见采取拒不支持的态度。最终，法国最高统帅部根本无法想象或有足够的准备及能力去突破自己原来的狭隘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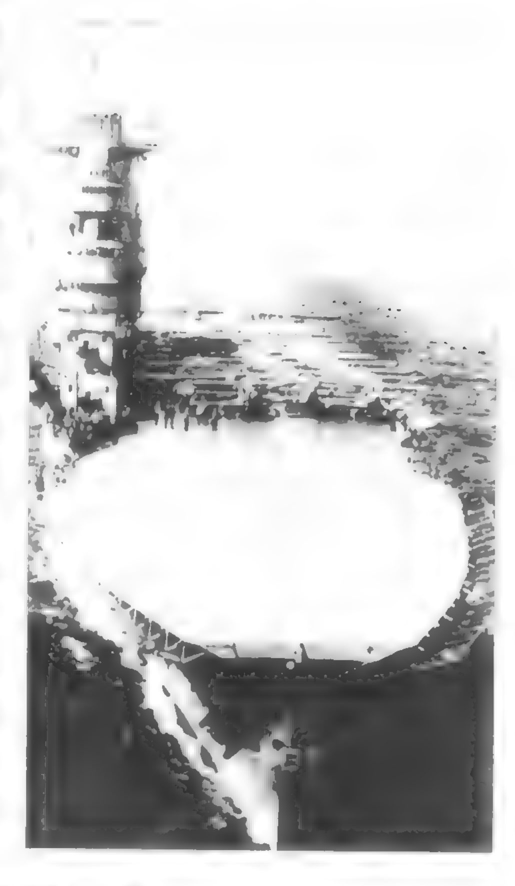
苏联军队的情况也许最具悲剧性。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尚未出现任何重大威胁的和平时期——好大喜功的领导层就推出了冷酷无情的发展苏联军事力量的工业一体化计划。到了30年代中期，苏联红军已经拥有两支具有明显区别的武装力量：一支是农民组成的民众武装，体现为俄国军事力量的传统类型；另一支是正在形成的机械化武装力量，装备精良，并部分接受过范围极其广泛的实战训练。但是1937年5月，斯大林开始在苏联军队中进行大清洗。那些曾经支持改革和创新的人在NKVD（斯大林的秘密警察）的缉捕队面前消失了。在这一将死亡称之为“去世”的时代，苏军有一万多名军官被“肃清”。

空中与海上力量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飞机所显示出的各种性能，已经勾画出今天的空中战争的基本轮廓：紧密的空中支援，空中侦察，空中阻击，空中防御，制空权和战略轰炸。十分有意思的是，战后有关空中力量的预言和宣传，却很少涉及过去的经验，而是将讨论的中心集中在它们未来的潜在能力。在这方面出现了两派观点。一派在欧洲，意大利将军吉乌尼奥·杜赫以及战后英国第一任皇家空军司令

301

特伦查德勋爵，主张通过对人口稠密地区的战略轰炸来赢得下一次战争。他们认为，居民中心是特别容易受到攻击的目标；空中轰炸将导致大规模混乱、行政权力机构的解体和革命。他们都指出，空中打击力量的其他形式，均代表了对它的潜在能力的一种误用。他们还确信，陆军和海军将会被证明与未来的战争行为不甚合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杜赫对意大利以外的欧洲国家的实际影响并不大，然而特伦查德在组建英国皇家空军和为之提供战略理论依据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理论后来往往被用来解释阿瑟·哈里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实施的敢于冒险、毫不妥协的强硬指挥。特伦查德还扶植起一大批狂热地宣传和倡导他的观点的军官（例如休·道丁和阿瑟·特德等）。



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现代航空母舰已经出现在美国。1922年，列强集团间签订的海军军备控制条约要求美国拆除两艘正在建造中的战列巡洋舰。但是它们的外壳却变成了两艘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上图）和"莱克星顿号"。两舰具有空前宽敞的甲板、运载量和速度（33节）。它们的"流动岛"式的结构，能最大限度地为飞机起落提供自由

另一派观点形成于美国，美国国会不允许发展以城市人口稠密地带作为主要打击目标的轰炸机力量。空军部队战术学校逐渐形成的空中打击的观念，旨在使敌人的整个经济体系瘫痪。它认为，通过攻击和摧毁诸如电力或各种滚珠轴承等重要工业设施，空中轰炸能够造成敌方现有工业发展的中断。这种理论主要依赖于轰炸机群以尽量小的损失通过敌人的空中防御而进行的远程飞行，以及精确地攻击目标的能力。

有关空中力量的所有阐述和见解都立足于这样一种设想，即轰炸机群总是能飞抵目标。于是乎，空中防御就不代表一种可行性的选择。然而，张伯伦政府在30年代后期敦促皇家空军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和条件，去建立以雷达和战斗机为基础的空中防御体系。负责加强和扩充战斗机司令部的官员是休·道丁，他对现代技术具有清醒透彻的理解并具有建立空中防御系统所需要的组织才能。

在德国，空军方面早就认识到空中打击力量的重要性，但其远见卓识之处也许在于，他们认为陆军的前途和命运将对国家的生存产生决定性影响。由此逐步发展成一种基础坚实的理论，强调空中力量与其他军兵种的协同配合。不过，德国人对战略轰炸同样感兴趣。在纳粹关于攻击敌人的人口或经济设施的军事理论体系中，并没有什么敌意——事实上，纳粹分子相信，其理论的价值将为他们提供一种实实在在的优势，即在由于德国人口稠密地区遭到战略轰炸而卷入的冲突中激发出超越其他国家受到类似攻击的抵抗力量。值得一提的是，他们逐步发展了复杂飞行和不经目测投弹的仪表装置，能够在黑夜或恶劣大气条件下识别目标——而英国皇家空军直到1942年才具备这种能力——其惟一的技术难题是在引擎（发动机）的改进方面，他们的过失则反映在所制定的阻止德国生产高性能战略轰炸机的177号方案中。

302

海军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很少注意。皇家海军用两次大战之间若干年时间为日德兰半岛的重新开放做准备。尽管德国潜水艇险些赢得最近的一次战争已是事实，但英国在防御潜艇的攻击方面投入的时间与财力相当不够；可利用声波去辨识和搜寻潜艇的"声纳"（在皇家海军中称为"潜艇探测器"）的出现，使英国海军将领们误认为德国潜艇已不再构成严重威胁。在这方面，德国海军与其对手的看法倒是没有什么不同。德国海军将领对于英国宣布他们已经掌握了战胜潜

艇的办法深信不疑。因此，当重振军备一开始，他们便主要着手建造大型战列舰，而用最小的投入去重建他们的潜艇部队，后来又将它们专用于攻击北大西洋的商贸船队。

相对而言，日本和美国海军改革的步子迈得更大。他们都把战备的基点置于太平洋海域。都从他们的舰队将要展开的最激烈战斗出发去思考问题。两国海军一方面强调以战列舰为中心，另一方面也加紧发展舰载飞机和海军航空兵，以扩大舰队的作战区域，尽管在太平洋海域战列舰将领一直占据支配和控制地位，但到了1941年，新一代的海军航空兵（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晋升为海军将军）已经取得具有重要影响的地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们以新的激烈的指挥方式投入到海上作战。

通向战争之路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之后，即着手组建后来引发一场新的世界战争的机动部队。他已经形成了一种系统的可怕思想，即按照种族来划分文明的敌人（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者从阶级出发来确定他们的敌人）。他确信，德意志人是由最优等的雅利安种族组成的，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的创造者。他一再论证说，德国要么必须为它的世界历史使命占有领土和资源，要么必定做无谓的沉沦，对于俄国东部地区和垂涎已久的乌克兰，德国将通过驱出被他们视为“劣等种族”的斯拉夫人，实现他们的目标。但是按照希特勒的观点，德意志必须首先谨防犹太人的阴谋破坏和他们的孪生子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如果雅利安种族要充分实现他们的愿望，德国必须消灭犹太人和他们对欧洲的影响。希特勒并不打算恢复德国在1914年的边界，而是企图以整个欧洲大陆作为重建德意志帝国的基地。他一上台便立即废除凡尔赛和约。这无疑为他在1933年开始实行庞大的重新武装计划铺平了道路。1935年，他与英国缔结了一份海军条约，使其重振军备合法化。到了1936年，尽管军方领导人担心会引起法国的反应，希特勒仍下令在莱茵河沿岸地区恢复武装。然而就在此时，欧洲却将其注意力从这一系列挑衅性的行为转向其他地区。1935年，墨索里尼进攻埃塞俄比亚，芥子气（*一种糜烂毒气—译者注*）的袭击瓦解了埃塞俄比亚的抵抗，整个国家被意大利吞并。1936年，以弗朗西斯克·佛朗哥为首的西班牙军人发动军事叛乱，引起一场长达三年的残酷内战，这一事件再次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欧洲各国的左派人士畏惧国内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威胁，认为西班牙发生的这场军事叛乱，不过是其国内矛盾加剧的表现形式。然而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却对西班牙共和政府予以有力的支持，不断攻击本国政府煞费精力和财力的防守政策。

303

与此同时，在德国，过分庞大的重新武装计划使其整个经济疲惫不堪，希特勒与其顾问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结果，希特勒在1938年初免去了他的高级将领和各部部长，而任用了一批更富于冒险精神和具有特殊个性的人物。一个月内，他入侵了奥地利。英国成了这一事件的旁观者，法国政府则在抗议声中承认了这一事实。

304

由于缺乏必要的国际压力，希特勒确信他同样能摧毁捷克斯洛伐克，眼下德

意志帝国已经对它形成三面包围之势。1938年春季，他制造了一桩动摇捷克共和国的危机，这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他吞并捷克的野心。而在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看来，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屠杀之后，如果有人还希望招致另一次欧洲冲突的发生，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因此，他一味迁就、安抚希特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由于这种绥靖政策，英国越来越深地卷入欧洲的事务——有了1938年9月对德国的三次私人访问。在张伯伦的最后一次访问中，他、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为了德国的利益共同瓜分了捷克斯洛伐克：尽管总体上还处于有利的军事形势，但英国却出卖了法国东部最重要的盟国，以此作为换取希特勒友好允诺的回报。张伯伦对捷克斯洛伐克奉行他的一惯政策，主要是希望德国做出让步和英国防御力量的不足——为此，他觉得自己负有重大责任——需要一种和平的解决办法。

但是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的妥协者却由此打开了血腥之门。以后半年多时

恐怖轰炸和西班牙内战

当德国人对西班牙内战进行干涉时，他们决定将其行动控制在一个较小的范围，不打算出动德国陆军或海军的正规部队。然而他们一旦获得在西班牙的经验，便立即对检验恐怖轰炸对平民的精神和心理造成的影响产生浓厚的兴趣。于是，他们在1937年4月空袭了格尔尼卡——巴斯克地区的一个小城镇。小城镇被夷成平地，国际舆论大为震惊，纷纷提出了抗议，苏联宣传机构也抓住这个题目，大肆鼓动。其实这一事件本身与其影响并不相称——与后来将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其战略意义是微不足道的。

不过，德国人对西班牙空袭所获得的资讯，决不限于轰炸本身。他们了解到，发现并准确地打击目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还学会了如何为陆军提供密切的空中支援——一条将他们带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极为重要的经验。最重要的是，他们掌握了空对空战斗的“无名指”（finger four）战术。其结果是德国空军能把一种适用范围广阔的能力带入日益逼近的战争，这种能力使他们对地面与空中作战的发展进程产生影响。

西班牙内战持续了近三年。其时间长度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战争双方都不具备很快取胜的技能。此外，叛军领导人佛朗哥将军很可能有意延长战争，以便能够最大限度地消灭他的敌人。

间，英国和法国对其面临的岌岌可危的颓势几乎毫无作为。德国是不惜一切地在重新武装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并从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掠取了大量的经济和金融资源，加强了他们的战略地位。1939年3月，希特勒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残存部分。德国人闪电般占领布拉格的做法，终于唤醒英国领导人，使其充分意识到德国的威胁。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张伯伦试图通过建立一个以尚存的东欧较小国家为基础的外交堡垒去孤立德国。但由于他拒绝正视战争的不可避免，因而缺乏与苏联的接近。从某种角度来说，即使他这样做也已为时太晚，因为通过逐渐产生的好感，斯大林同希特勒已达成妥协。斯大林现在认为，他从纳粹那里得到的比从西方盟国那里获得的要多得多。

1939年3月，英国允诺对波兰的主权承担责任的做法，大大激怒了希特勒。希特勒低估了促使英国政府开始积极运转和张伯伦在精神上变得坚强起来的来自两方面的政治压力，对其狂热的追随者宣称："我早已在慕尼黑看透了我的敌人，他们都是些胆小的可怜虫。"伴随着政治和外交的压力，德国的大批军队在波兰边境集结。8月23日，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使他们的国家成了从事罪恶勾当的合伙人。德国将使它的战争指向了波兰，并尽可能地针对西方武装力量，而不会受到苏联的威胁和干预；反过来，斯大林将得到东部波兰、波罗的海诸国、芬兰和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等广大地区。由于苏联做出保持中立的承诺，使得希特勒能够长驱直入：1939年9月1日，德国军队入侵波兰，两天后，英国和法国政府被迫向德国宣战。

德国的安逸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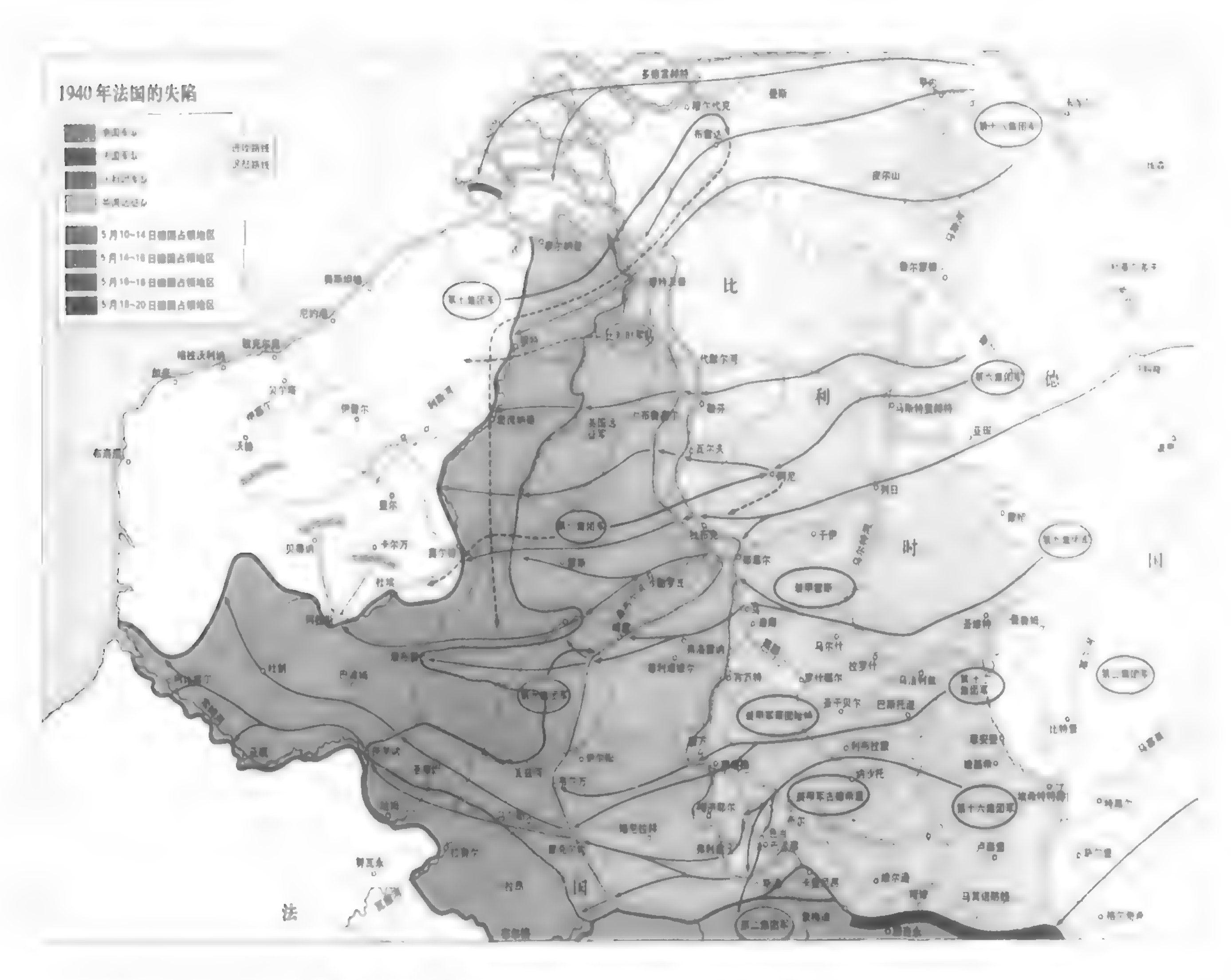
德国进攻波兰的计划始于1939年4月，最高统帅部指令总兵员为150万的两个集团军群担任摧毁波兰的任务。由费道尔·冯·包克率领的北方集团军群负责消灭将德国分离成两部分的"波兰走廊"一带的敌军，然后它的装甲部队将长驱直入地插到波兰的后方，同时，由戈德·冯·伦施泰特率领的南方集团军群将向波兰发起正面攻击。其中的三支突击部队，将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插入波兰腹地，直逼华沙。波兰人始终没有弄清德国人主要攻击的目标是哪里，试图进行全面防御而不是重点区域的防御，于是将部队沿线分散部署在他们整个开阔的边界地带。

头几天的情况是，德军的装甲部队突破了波兰松散的防线，并已逼近华沙，对波兰的首都同时展开封锁性的穿插阻截和猛烈进攻，德国空军给波兰的处境造成空前的困难。一周之内，除了华沙，德国人已粉碎了波兰人的抵抗，并将波兰军队全部驱赶进合围的口袋，使他们除了投降几乎别无选择。9月29日，斯大林（就在波兰崩溃的前夕，他的军队已经开始入侵行动）和希特勒一起瓜分了这个国家。在旋风战役期间，有7万波兰人被杀害、13.3万人负伤、70万人被俘，而德国仅死亡1.1万人、负伤3万人，3400人失踪。

从表面上看，征服波兰的胜利像是一次令人叫绝的成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德国军队就粉碎了敌人的抵抗，从各种可以测量的因素来说，这支军队具有相当的优势。然而，德军的高级领导层并没有估计到，当（敌方军队）处于与其相同的各种条件时，其部队的表现究竟如何。在以后几个月时间里，最高统帅部

305

德国军队在1939年9月进入华沙。1939年9月1日，两个强大的德国集团军群开始入侵波兰。联合进攻在一周之内将波兰拦腰切断。事实十分清楚：波兰人试图进行全面防御，结果却是满盘皆失。9月17日，苏联人从东入侵波兰，几天后，波兰被胜利者瓜分



1940年法国的沦陷。德国的进攻，以1914年的施利芬计划进行推测，预计应通过比利时北部，但实际它却穿过阿登高原。到5月12日傍晚，向前推进的装甲部队以强有力的拳头击打到默兹河岸。每个装甲师——每一个都是步兵分队、炮兵、工兵和坦克的有力合成——都突破和渡过了默兹河。法国人的反击总是迟缓或有气无力。到了5月16日，进入开阔地带的德国装甲师沿着法国南部毫无防御的道路开始向海峡岸边滚滚推进

与希特勒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它的领导人论证说，德国军队尚无发动针对西方的重大进攻行动的准备，只有实施大规模的训练计划，才能弥补自己在波兰战争中表现出来的不足。另一方面，希特勒正面临将德国置于危险境地的经济形势。英法两国早已对德国实施经济封锁，对德宣战后这种封锁进一步加强，德国的进口货物因此急剧减少。因而，德国的石油供应显得十分紧张。事实上，在整个战争期间，德国的炼油厂加上从罗马尼亚进口的石油，都难以满足战时军队和经济运转的需要；而这两者无论哪一方被削弱，都将危及德意志帝国的战略地位。1939年，从罗马尼亚进口石油的通道被堵塞，导致德国的石油储备急剧减少。结果，在德国的经济难题与战争行动能力之间的矛盾尚未解决之前，希特勒便推搡着他的将军们立即在西部发动一场进攻，后由于天气恶劣和盟国反应迟钝，才使德国人把他们的进攻推迟到次年的春天。

与此同时，按计划占领了东部波兰和波罗的海各国的苏军，于1939年11月进攻芬兰，但他们的准备太差。芬兰工人并不像斯大林所希望的那样，真正加入到“工人和农民”的洞天福地中去，而激烈的战斗却在他们的中产阶级同胞兄弟与入侵者之间展开。虽然芬兰人的抵抗给入侵者造成重大伤亡，最终苏联强大的军事力量仍突破了芬兰的防御。1940年3月，芬兰被迫接受停战协定，但冬季战争严重损害了苏联红军的声誉。在这次战争中，红军以20万之众对付仅有2.4万人的芬兰军队，反而遭受了重大伤亡——写进希特勒统计材料中的这个原因，在

本书后面部分再涉及。

瑞典人援助芬兰人的一次联合行动引起了德国的担心，德国因此竭力阻止瑞典的铁矿石出口。在德国的战争经济中，铁矿石是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源。为此，希特勒决定发动一场针对斯堪的纳维亚的先发制人的打击。4月，他的军队向丹麦和挪威发起进攻。前者经过顽强抵抗后沦陷，德国人继续向北推进。由于战舰的掩护和挪威政府的卖国与无能帮忙，德国人很快便攻占了挪威的重要港口；同时，空降兵迅速控制了挪威的主要机场。只有在奥斯陆峡湾，挪威人才真正展开了一场成功的防御：那里的后备役军人将新造的“布吕歇尔号”巡洋舰沉入海底，以此阻挡德国人的进攻并为政府撤离赢得足够的时间。

英国皇家海军的反应缺乏果断，但在纳尔维克却是个例外，在那里英国战舰使德国人感到震惊。它们击沉了10艘德国驱逐舰，将其山上的部队与增援部队分割开来。但在其他地区，同盟国的行动过于迟缓。从近期来看，斯堪的纳维亚战役是一场灾难，但它有两个有利于盟国的结果：一个是，由同盟国在挪威的失败引发的政治危机导致了张伯伦下台，1940年5月10日温斯顿·丘吉尔就任英国首相；另一个是，在挪威战役中德国海军遭到重创。到了1940年7月1日，德国仅有1艘重型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其整体力量根本无法适应横渡英吉利海峡入侵英国的需要。

307

法国的沦陷

1939年10初，希特勒命令陆军统帅部拟订占领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直达法国南部索姆河的行动计划。尽管元首和陆军统帅部对发动“黄色”战役的时间与必要性争执不休，希特勒仍通过集团军群参谋长埃里奇·冯·曼斯泰因催促向阿登高原增调几个装甲师，以便他们能够随时突破马其诺防线而对默兹河沿岸的盟军防御阵地进行闪电攻击。1940年2月，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弗兰兹·哈尔德终于按时将所有德国装甲部队部署在这一地区，尽管他对向阿登高原推进的计划一直怀有疑虑。他和德军的大多数高级将领还怀疑，单靠机械化部队是否能成功地突破默兹河防线，于是命令步兵师紧随装甲部队之后。但是，装甲部队指挥官拥有对自己部队的独立指挥权；如果他们能如期到达并突破默兹河，就可以利用其成功而大肆夸耀。按照新的作战计划，德国装甲部队推进到阿布维尔的峡岸地带，将法国、英国和比利时军队逼到背靠大海的困境，与此同时，德国空降兵和地面部队以压倒之势扑向荷兰，比利时军队的主力基本被歼，只有少量的盟国军队（没有配备装甲）仍坚守在马其诺防线的要塞。

盟军战役设想形成及其实施过程，对德国十分有利。法军总司令甘末林过分依赖地固守在马其诺防线的中部和右翼，不惜将其惟一的预备部队——第七军调离与荷兰人命运休戚相关的盟军左翼防线，这就扩大了盟军在战术上的缺陷。最终，甘末林不得不将法国的整个战役预备队从海岸撤离。

308

1940年5月10日，德国人再次采取行动。在北部，伞兵部队占领了通向荷兰的重要桥梁，以便其第九装甲师能够突进到这个国家的心脏；其空降部队也试图占领海牙的主要机场，俘获荷兰政府。虽然这一“突击行动”失败了，但德军战

1940年5月向西推进的德国步兵 在严格检查波兰战役中“已知的教训”的基础上，经过整整一个冬季广泛和严格的训练，到1940年春天，德国步兵已经成为世界上战斗力最强的士兵

略计划的其他部分却获得了成功。随着荷兰防线的崩溃，德军猛烈轰炸了鹿特丹，造成3000平民伤亡，此后他们又以更多类似的轰炸威胁荷兰人。5月14日，自1830年以来从未进行过战斗的荷兰军队停止了抵抗。与此同时，包克的由步兵编队组成的B集团军群已经做好全力以赴进攻比利时的准备。由于德国滑翔兵运动迅速，加之盟军方面当时对战局发展迷惑不解，导致号称“坚不可摧”的埃本埃马尔要塞被占领。然而法军中的善战部队和英国远征军采取紧急行动挽救危局：包克的推进使他们确定了自己的推测，德国人将重演他们的“施利芬”计划。

但是，德国人并没有那样做。他们不受盟国空袭的干扰，三支突击部队中的9个装甲师穿过阿登高原向前推进，法国和比利时军队进行了有限的抵抗。5月12日傍晚，三支突击部队都已到达默兹河。

在中间地带，德国装甲部队未能突破敌人的防线。在南面的色当，由海因茨·古德里安统率的部队也遭遇到顽强的抵抗。第十装甲师损失了50艘强击艇中的48艘，才有一个连渡过默兹河；第二装甲师则望河兴叹。但第一装甲师的来复枪团在一个步兵团的配合下，突破了法军的防御线，到傍晚前他们已经夺取了能够俯瞰默兹河的西面高地。在后来三天多时间里，古德里安不断扩大他的桥头阵地，迅速将三支突击部队插进盟军的防御阵地——向海峡的挺进指日可待。然而，随着装甲部队越来越深入法国的领土，德国最高统帅部和陆军统帅其部变得十分过敏和多疑起来，于是发生了17日古德里安被指责破坏命令的事件，其原因仅仅是当坦克向西快速推进到索姆峡谷时，他为了进行“火力侦察”而关闭了自己的无线电台。5月20日，德国装甲部队到达阿布维尔海岸，包克率领的部队也于此时攻占了布鲁塞尔——一切都按计划准时进行。

同盟国最初的反应是冷漠、迟缓，很快又变得惊惶和沮丧。法国政府解除了甘末林的职务，但他的替代者马克西姆·韦冈德就任时，所有的战斗都已结束。由于德国人的成功看上去过于圆满，因而显得不够真实；正像古德里安所说，战斗“几乎不可思议”。当德军攻占了法国的港口之后，希特勒及其最高统帅部和陆军统帅部更加疑心重重。他们总是叨咕：在佛兰德斯地区大水的阻拦中装甲部队会不会遭到重大损失，德军进入法国后法国人会不会恢复抵抗。

309

结果，在26日攻占了布洛涅和28日比利时宣布投降后，德国陆军统帅部下令装甲部队停止进攻。高层将领们相信步兵和空军完全能够完成粉碎北线盟军防御的任务，然而德国统帅部的这种看法是建立在含混不清的基础上。皇家海军将他们的军事技艺运用于撤退英国远征军，以及在敦刻尔克上空制造烟雾形成空中掩护，德国空军遭遇到从不列颠起飞的英国“喷火”战斗机的顽强抗击。到6月3日代号为“发电机”的战役结束，盟国船只共运出近35万人的盟军部队——它虽不足以挽救法国，但足以使英国战斗下去。

310

战役的其他部分对德国人来说却是马到成功。在进行了最初的抵抗之后，法军全线崩溃，德国人像潮水般地向南涌去。少数法国人愿意继续战斗，多数人却

一个法国坦克兵向德国步兵举手投降。1939年，法国最高统帅部终于组建了3个装甲师，但已为时太晚。法国装甲师缺乏理论、训练、通讯系统，尤其缺乏诸兵种协同作战的观念。结果，法军是作为个体而不是作为一个整体在战斗，因而在双方军队间造成了十分明显的不同后果

亟待和平。6月22日，上了年纪的凡尔登的保卫者马赛尔·贝当在一份带有胜利者提出的许多苛刻条件的停战协定上签字。自此，法兰西与纳粹征服者合作的一段漫长、黑暗的历史开始了。

不列颠之战

包括希特勒在内的大多数德国人，把对法国的胜利理解为战争的结束，他们以异常欣快的心情，急切地等待着英国主动求和。但是妥协忍让的安抚时代已属于过去。尽管存在着来自张伯伦的支持者们的反对，丘吉尔却使英国的立场变得强硬；他估计到，美国不会无限期地保持冷漠，德国和苏联的联合也不会长久。他已经得到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6月做出的承诺，美国将向英国提供武器和经济援助——条件是英国拒绝支持任何与希特勒的谈判。

直到7月底，德国人才意识到英国仍在进行战斗。于是，他们竭尽全力，拼凑了一场以不列颠诸岛为目标的空中进攻。他们打算，如果这样仍不能从精神与意志上打垮英国，就采取下一步行动，即实施代号为"海狮"的横渡海峡的入侵战役。然而后一步行动根本不可能有成功的机会：挪威战役之后，德国海军实际上什么也没留下，无论是陆军或海军都缺乏参加大规模两栖作战的经验。为了实施"海狮"计划，他们不得不征调莱茵河上的驳船用以运送渡海部队。人们由此能够想象得到，以这样的渡海船只与英国驱逐舰抗衡的结果将会如何。

在对英国军事力量的核心部分发动的攻击中，德国空军陷入令人沮丧的困境。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空中战役，德方对英国的许多情况尚不清楚，德国空军所掌握的有关英国皇家空军的实力和弱点等各个方面的情报都被证实是错误的。

再者，德国空军在法国已经蒙受了重大损失，保存下来的飞机和飞行员都难以满足新的战役的需要。与此相反，英国拥有一支训练有素、战斗力强大的战斗机部队，有以雷达为基础的有效的预警系统，再加上休·道丁勋爵的第一流的指挥。道丁一面调动指挥他的部队为保卫整个不列颠而战，一面又在北部地区开辟和建起能够装备若干飞行中队的飞机生产基地。他的目的是与德国人打一场消耗战，后因秋季天气恶劣而放弃。在战争的其余时间，英国人第一次享受到他们具有优势时的快意，即破译德国最高统帅部发出的许多绝密电文的能力。在掌握了广泛的无线电窃听技术，熟知德国如何通过接收设备采用与

在1940年夏季与德国空军进行的不列颠空战中，英国空军的喷火式战斗机起到关键性作用。它的作战性能与Bf-109战斗机相当，却要超过飓风式战斗机，因此，它们足以在争夺不列颠的制空权中与德国战斗机相抗衡。在雷达的帮助下，英国战斗机能及时发现正在飞临的德国入侵者，在一场持续性的消耗战中，它们使德国空军为自己的冒险尝试付出了难以承受的代价

传输设备相同的算法获取信息解释的主要工作方式（由波兰秘密组织提供），并在仔细研究了德国的无线电操作程序的基础上，英国形成了日益增强的洞察敌人战争行动的能力。他们还能截获德国高级将领中持不同政见的“过激派”的电文（通过破译得到的情报）。

德国最初的空中攻击将英国皇家空军从海峡逐回到本土，但他们也向英国人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德国空军的战术和作战经验。8月13日，德国人与皇家空军展开决战：在北部空域，他们因损失惨重而受挫，但他们在南部的猛烈攻击却对皇家战斗机司令部的基地和机群造成严重破坏。德国人对此情况一无所知，英国也一直保持着顽强抵抗的势头。进入9月，在巨大的压力下，德国空军急于要在天气突变之前彻底打垮英国，于是骤然转移了对伦敦的注意力，这一决定无疑使皇家空军战斗机的战斗力得以恢复。9月15日，英国出动1 10的战斗机进行大规模空袭，其效果之显著迫使德国空军匆忙结束了他们的进攻。德国人利用他们的仪表操纵投弹的系统不断实施夜间轰炸，但这很可能使英国人在遭受轰炸期间研究出挫败这种系统的技术成果，并形成有效的反措施。后来结束战争的首次战略性轰炸进攻，就多少反映出英美空军的确吸取了其中的一些经验教训。

311

1937年，当它第一次投入生产时，Bf-109便成了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战斗机。由于不断改进其引擎和其他性能，它一直保持着德国空军主力机种的地位。虽然英国于1938年开始生产两种性能与之匹敌的战斗机——飓风式和喷火式，但在战斗机的导航性能方面，整个战争期间，它一直是对手的克星。

巴尔干的战争

1940年6月10日，贝利托·墨索里尼对英国和法国宣战。除了一定要重新夺取罗马在地中海地区的古代遗产外，他闯入冲突与对抗时并没有其他明确的战略目标或作战思想，他所统率的不过是一个缺乏现代战争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军事机构。整个夏天，意大利人一直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他们时而被自己的决定所干扰，时而又受制于德国人强加的各种禁令，直到9月墨索里尼才强令驻守利比亚的马赛尔·格拉齐亚尼进攻埃及。但这支部队到达西迪拜拉尼，便神志恍惚地进入了一系列相互隔离的防御阵地。

在巴尔干，同样是在9月，希特勒派遣一个配备坦克的摩托化步兵师、两个高射炮团和两个战斗机中队，以军事“顾问团”的名义开往罗马尼亚，以保护德国在那里的利益，尤其是石油。但他未将此情况通报其意大利盟友。作为一种报复，墨索里尼于10月进攻希腊时，也没有事先告知希特勒。但是，意大利军队刚刚解散了它的预备役部队，所存兵员仅能用于攻占阿尔巴尼亚——作为进攻希腊的跳板——以至于必须在希腊进行战争动员之前使双方兵力达到一比一的比例。此外，经证实，阿尔巴尼亚的港口不适用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和作为意大利的军港。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希腊人便将意大利人像赶鸭子一样赶回了阿尔巴尼亚，几乎同时，英国军队开进了克里特岛和希腊。墨索里尼彻底颠覆了巴尔干的稳定。

意大利的下一步灾难接踵而至。1940年11月，一队英国鱼雷攻击机轰炸了停泊在塔兰托的意大利舰队，击沉了3艘意大利战舰，改变了地中海地区海军力量的均衡。12月，英国军队从埃及袭击了西迪拜拉尼前线的意大利阵地。他们取得了总体上的成功，几乎将意大利人赶出利比亚。与此同时，其他英联邦军队也纷纷入侵意大利的殖民地索马里、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的一个省——译者注），并最终占领了整个埃塞俄比亚。到1941年5月，意大利的所有殖民地都被攻占。

312

在意大利处处挨打的窘困时期，德国人最初表现得幸灾乐祸，但是，当意大利的灾难预示了轴心国在地中海和巴尔干的联合态势将被拆散的内卷，以致意大利可能会被从战争中驱赶出去时，德国立即采取了行动。1941年2月，隆美尔率领德国非洲军团的先遣部队到达的黎波利，并立即展开进攻，很快便开始驱赶英军。英军由于抽调了6万人开赴希腊而被削弱，只得退守埃及。

不过，要恢复巴尔干的局势，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为了控制住希腊人和减轻意大利在巴尔干承受的压力，德国人与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进行了秘密谈判。1941月3月，南斯拉夫使节在一份与轴心国联合的条约上签了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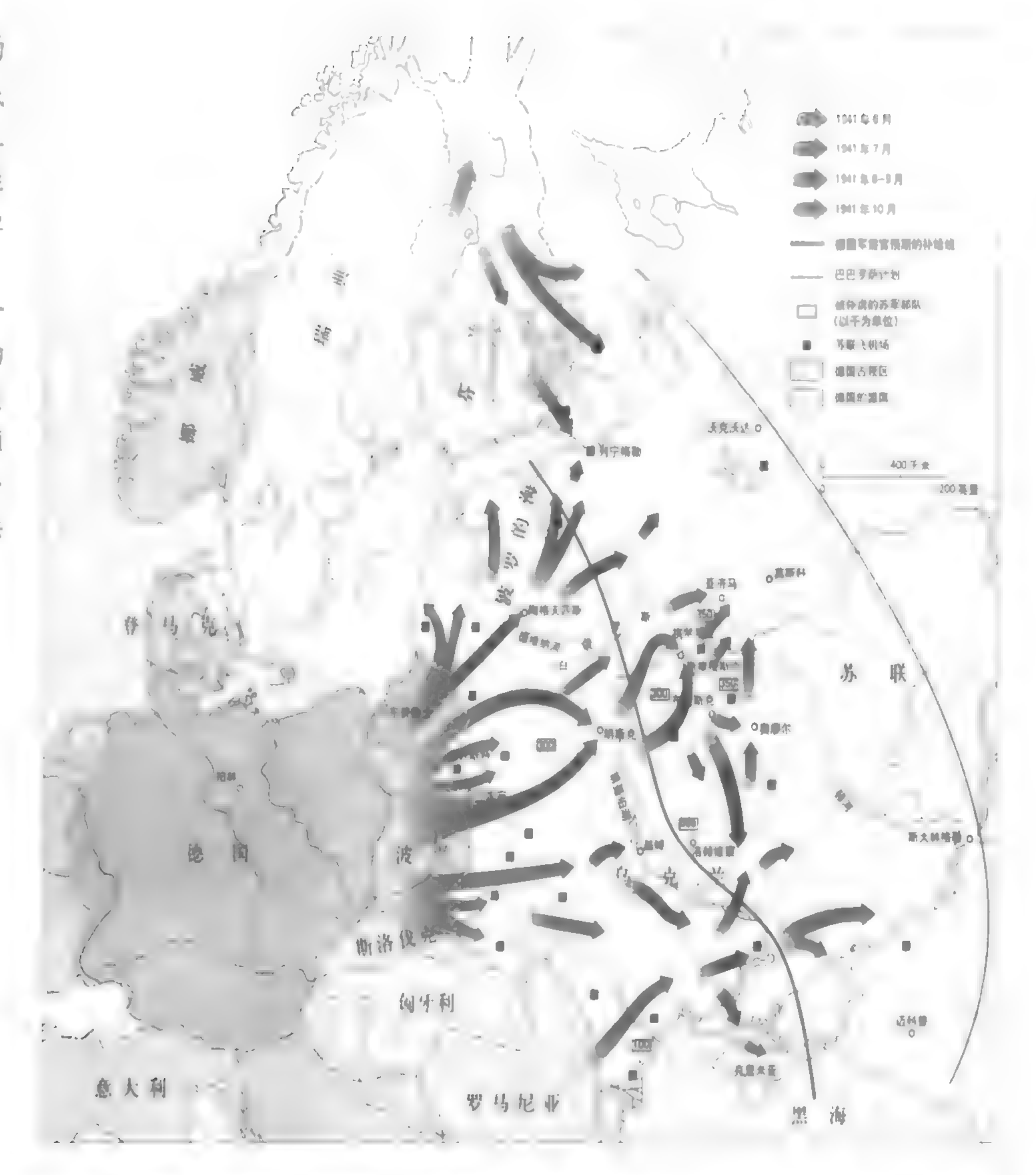
313

但很快塞尔维亚军官就发动政变推翻了他们的政府。希特勒为此大动肝火，立即命令德国军队以“最快的速度打垮”南斯拉夫人，并下令德国空军把贝尔格莱德从地球表面消灭。两周后，德国空军忠实地执行了这一命令，连续24小时的狂轰滥炸，使南斯拉夫首都变成一片废墟，1.7万名平民被炸死。德国的装甲部队同时摧毁了南斯拉夫的防御，12天里这个国家遭受了空前的灾难。进攻如此快速和猛烈，这是德国人的成功之处，以至于几乎在战斗结束的同时德军就开始撤离，以便迅速投入即将进行的对苏联的入侵。如此一来，数千名南斯拉夫士兵得以在山区坚持下去。几个月以后，一场残酷的游击战争之火燃遍全国，德国人终将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1941年春季，行进在希腊北部废弃路面上的德国部队。早在一年前进攻法国之时，德军就擅长于诸兵种协同作战

以及出色的组织指挥和军官及士官的训练培养——这再次给纳粹提供了战胜对手的重要优势。对于数量占优势并赢得过胜利的英国和希腊军队来说，惟一的选择是向南部撤离——英国人从海上逃走了，希腊人则向敌人投降并蒙受了被占领的痛苦

德国入侵苏联所包括的作战范围、其战线比以往的战役都要长得多。结果，尽管在战役的第一阶段，德国人还能有望避开后勤供应的困难，但是到了7月末，他们便遇到了几乎无法解决的难题。在下一阶段的进攻，尤其是在秋季的进攻中，德国军队的出色战绩明显要超过其谨慎的后勤预算，在俄国冬季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它的军队很快便面临供应系统瘫痪的危险。



进攻希腊的战役也进行得十分顺利。希腊最高指挥部将其军队部署在与保加利亚接壤的边境一带，德国人却穿过南斯拉夫从侧翼轻易地突破了希腊的防线。英国人担心其后路被德国人切断而匆忙撤离，大多数英联邦军队也纷纷退却。失去了武装的希腊人以蔑视的目光，面对保加利亚人和那些在阿尔巴尼亚与意大利战斗时走进轴心国战时拘留营的人。

希腊大陆失陷以后，英国仍然控制着克里特岛，皇家空军从这里能够威胁罗马尼亚的油井，希特勒也看到了这一点。自从皇家空军在马塔潘角击沉意大利的三艘重型巡洋舰，意大利海军仅存的一点自信也损失殆尽，任何进攻克里特的计划都由空军来实施：德国空军的第七空降师——世界上第一支伞兵师，在第五山地师的配合下执行攻击任务。德国人面对的是一个庞然大物。正像德国情报部门估计的，英国在克里特岛不仅拥有近两倍于德国的兵力，而且侦听到了“过激派”提供的大批德国空降部队将攻占克里特的三个空军机场的预警情报。但是，在后台指挥的英国统帅部并没有重视这一情报并调动部队准备迎击敌人的两栖进攻。这对于德国人无疑是无声的动员。1941年5月20日，第一天空投下的部队大部分被地面防御者消灭；德国人只在马莱迈建起一个不稳固的立足点。然而，一旦伞兵赢得了机场的控制权，德国空军就能不断加强其对空投的支援，平衡逐渐被打

苏联在1941年遇到的困难，并不都是由于德国军队的优势，其中一些完全是自己造成的。在战役的第一周，坦克部队穿过沼泽直接向德国人的进攻发起反击。他们的指挥员按照命令，驱赶每辆重达42吨并装配着当时世界上最坚固的装甲传送装置的T-34坦克群驶进沼泽

破。皇家海军再次实施成功的撤退。但德国人占领了克里特岛，直到1944年初，盟国才能对与德国命运攸关的罗马尼亚油田实施空中打击（飞机从意大利基地起飞）。

夺取克里特岛的胜利使德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损失了近60%的空中运输机，伞兵部队伤亡之惨重也使希特勒拒绝批准再次实施空降攻击。然而，英国和美国却对德国的进攻产生了极深刻的印象，也组建了自己的空降部队，该部队将在盟军进攻欧洲大陆时发挥重要作用。

“巴巴罗萨”计划

1940年7月末，希特勒在占领法国后即决定入侵苏联。最初把他推向东方的是战略和思想体系方面的原因，但后来支配他的是一种迫在眉睫的征战意念和经过大肆渲染的对苏联的评估。他宣称，德国人是作为征服者而不是解救者出现的。希特勒的意图是消灭东欧的犹太人，以此作为进一步征服斯拉夫人的前奏，因此，“特别行动”突击队紧跟每一个入侵的集团军，专门负责肃清犹太人、信仰共产主义的官员和其他“不良分子”。希特勒把他的这一意图全部明白无误地传达给他的高级将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愿意忠实地执行他的这一意图。“巴巴罗萨”——以一个著名的中世纪德意志皇帝命名的入侵计划已经为人所知——那是一场毫无约束的思想观念的冲突，其激烈、残酷的程度是自17世纪宗教战争以来欧洲从未经历过的。

314

德国人为“巴巴罗萨”制定的军事计划是一种善于机变的战术——带有愚昧政治乐观主义的战斗精神以及逻辑上低能的混合物。十分明显，这场战役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俄国的绝对庞大，如果德国推进到里加、斯摩棱斯克和基辅以西地区，将会陷于后勤补给上的困难。由于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经了解和熟悉

了俄国的地理环境和日气条件，他们对其天气也不会产生过多的错觉。希特勒倾向于进攻乌克兰和列宁格勒，陆军统帅部则意在进攻莫斯科，认为一旦得手，将导致整个苏联的自行解体。德国最高统帅部的策划者们打算将红军消灭在边境地带，阻止他们撤到内地，然后像（希特勒）期望的那样，将敌人包围得“如同孩子用纸牌搭成的房子”。

到现在德国军队已成了一部令人生畏的战争机器。两年来攻无不克的胜利磨炼了它的将军、各部队的指挥员、军官和未受军官衔的军士们。但其自身也存在无法克服的缺陷。德国人仅仅依靠从欧洲各地拼凑起来的军事装备，包括捷克的坦克、挪威的山炮、比利时、法国和英国的卡车，即开始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入侵。然而其装甲部队的行动速度几乎是步兵的两倍，因此不得不一再地等待——既是为了燃料，也是为了得到步兵的支援。德国人开始实施“巴巴罗萨”计划时，实际上没有预备役部队。另一方面，斯大林的行为扩大了德国人的优势，“大清洗”处决了苏联军官队伍中的1/10；弥漫性的恐惧情绪窒息了一切创造力；对“斯大林同志”的迷信加重了战争准备工作的虚幻性。直到最后，斯大林仍相信希勒会遵守他们在1939年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出于对他的政治惩罚的恐惧，若干红军的正规师拥挤在边境地带，其指挥员接到的命令是决不允许后退。

1941年6月22日凌晨1点30分，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最后一列货运列车（确切地说是源源涌出的几千股水流中的一股）满载原料从中立的俄国驶入德国领土，去喂养纳粹的战争机器。两小时后，德国炮兵从北部海角到黑海2000公里长的边境向苏联前线开火，同时开始了一系列毁灭性的空中攻击，紧接着300多万轴心国军队向东滚滚推进。他们出其不意的行动使整个苏联为之震惊。前线

德国攻击艇渡过德涅斯特河发起进攻。纳粹迅速推进的速度和距离，使苏军失去了重新恢复的时间。红军指挥员明显缺乏对德作战的灵活多变的能力。而斯大林和最高统帅部又拒绝让整个国家做好纵深防御的准备（也许是出于苏联政权在政治上易受攻击这一现实的考虑）。结果，苏联人没有守住任何阻止入侵者的重要江河防线

的某苏联部队指挥官哀怨地询问他的上级：“我们该做什么？我们已遭到攻击。”得到的回答是：“你们一定是疯了，为什么不用密码发报？”早晨来临，当德国大使向苏联外交部递交宣战书时，仍有前线部队提出相同的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应怎么做？”

四天时间，苏联损失了3000多架飞机。德国装甲部队突破了整个前沿阵地，向苏联后方长驱直入：北线曼施泰因的坦克部队四天挺进200公里，到达德温斯克的德温纳河畔。在中央集团军群作战区域，由霍斯和古德里安率领的装甲集团军群第一周就将部分苏军主力部队包围在明斯克（俘虏32.4万人，击毁或重创坦克3300辆）。7月中旬，他们又在斯摩棱斯克横扫了陷入重围的同样数量的苏军主力部队（俘虏了30万人，击毁3000辆坦克）。德军的胜利使哈尔德不无得意地在7月初的日记中写道：“当我宣布进攻俄国的战役14天来一直处于节节胜利时，这是不用做过多强调的事实。”只是在南部，德国人遇到了有效的抵抗。但即使在那里，到了7月中旬，他们也已将近到达基辅的门户。

被德国人抓获的苏军战俘。到1942年3月，360万苏军战俘中的200万人已经死亡——其中60万人被处决（大约每天6000人），因为他们是政治委员、共产党员或犹太人。在1941年被捕的战俘中，仅有10万人能够活着回到苏联

然而到了7月末，德国人的地面推进停止下来。纳粹的后勤系统仅仅能向装甲和机械化步兵师提供补给，现在，这些行进在最前头的部队几乎消耗了所有备用的弹药和油料，什么也没有给进一步向东推进的其他部队留下。步兵师依靠双腿艰难地向前跋涉，走得最慢的甚至被后方收容。再者，尽管向前推进时消灭了许多红军正规部队，但苏联预备役部门源源不断地向前线部队补充兵员。哈尔德在8月初的日记中沮丧地说：

> 整个形势看得越来越清楚，我们低估了俄罗斯这个庞然大物……这个结论首先反映在步兵师方面。我们已经识别出360个步兵师的番号。在我们看来，这些师被公认为缺少武装和训练，在战术上也是落后的。但是它们确实存在着：我们消灭它们12个，俄国人就轻易地补充另外12个。

整个8月，向前推进的德国部队为生存而战斗：后勤部门艰难地维持着日益危急的供给形势；行进中的步兵被催逼着向前赶路。他们已经取得惊人的战绩，但确也蒙受了巨大的伤亡——到8月中旬，伤亡几乎达到40万人，占总兵力的10%以上。陆军统帅部、最高统帅部和希特勒之间再次发生激烈争吵，将军们急于向莫斯科推进，希特勒却要占领乌克兰和列宁格勒，因为前者盛产谷物，后者是革命的发源地。结果像通常一样，希特勒赢得了这场争论。8月下旬，德国人终于积聚了足以支撑他们向前推进的供给，北方集团军群包围了列宁格勒，在那儿，斯大林的追随者既拒绝将市民疏散到安全地带，又不愿为应付被围做好准备——因为选择其中之一都将意味着失败主义。结果，因饥饿和疾病死亡的列宁格勒人总数最终超过100万。在中部，古德里安的装甲集团军群向南突进乌克兰。斯大林再次拒绝任何撤退；陷于基辅包围圈中的60万苏联军人被押送进德国的战俘营，其中只有少数得以幸存下来。

年末，在基辅和列宁格勒的这些胜利使希特勒和他的高级指挥官们不顾一切地实施进攻莫斯科的巨大战役。尽管如此，后勤机构面临的选择却十分清楚：要么保持在从列宁格勒到克里米亚延伸线上的适当位置，以准备过冬；要么直驱莫

斯科，到达这个没有保暖衣服和供应奇缺的苏联首都。将军们为到达莫斯科兴高采烈地签署了文件。

“台风行动计划”于9月末拉开帷幕，古德里安的装甲集团军群首先开始行动。其他两个装甲集团军群紧跟其后，于10月1日发起进攻。一周之内，德国人在布良斯克和维亚济马完成了两个更大规模的包围，再次抓获60万名苏军战俘，在苏联首都的前沿防线撕开了一个大裂口。但是连绵不断的秋雨使德国人的推进变成了缓缓移动。苏联人利用这一机会艰难地聚集在一起拼死抵抗。进入11月，寒冷的天气将泥浆冻成坚硬的土层，德国人恢复向战场推进，试图做最后一次包围莫斯科的努力。到了12月初，一些部队已经到达能够视及克里姆林宫的位置，但是德国人的腰带已经勒紧。他们的坦克和一些其他装备在特别寒冷的天气无法投入作战；前线部队早已精疲力竭，难以继续战斗——他们完全没有做好在冬季条件下作战的准备。德国人已经消耗掉所有贮存的物资。12月6日，日本袭击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前一天，苏联红军进行反击，减轻了莫斯科的压力。希特勒企图通过一次单独的战役征服苏联的赌博失败了。

318

319

莫斯科的战斗

德国人在基辅包围战中战胜了苏军——抓获60多万战俘，缴获大量物资——德国最高统帅部为此欣喜若狂。但是，甚至在基辅的战斗结束前，希特勒就开始准备下一次大的战役——对莫斯科的防御力量发动攻击，不惜一切地占领苏联首都，在冬季临近时消灭斯大林的政权。

希特勒的决定得到东部战线德军高级指挥官们的狂热支持。中部集团军群的费尔费·马赛尔·博克和陆军最高指挥部表现得尤甚，因为在战役开始前，他们一直论证说，莫斯科是决定性目标，占领它就能赢得胜利。只有后勤学的专家们对此持有疑虑：从此次战役的观点来看，他们必须着手准备过冬的军事物资，但另一重大推进将不仅有碍于过冬物资的贮存，而且还将妨碍他们积存过冬的燃料和保暖用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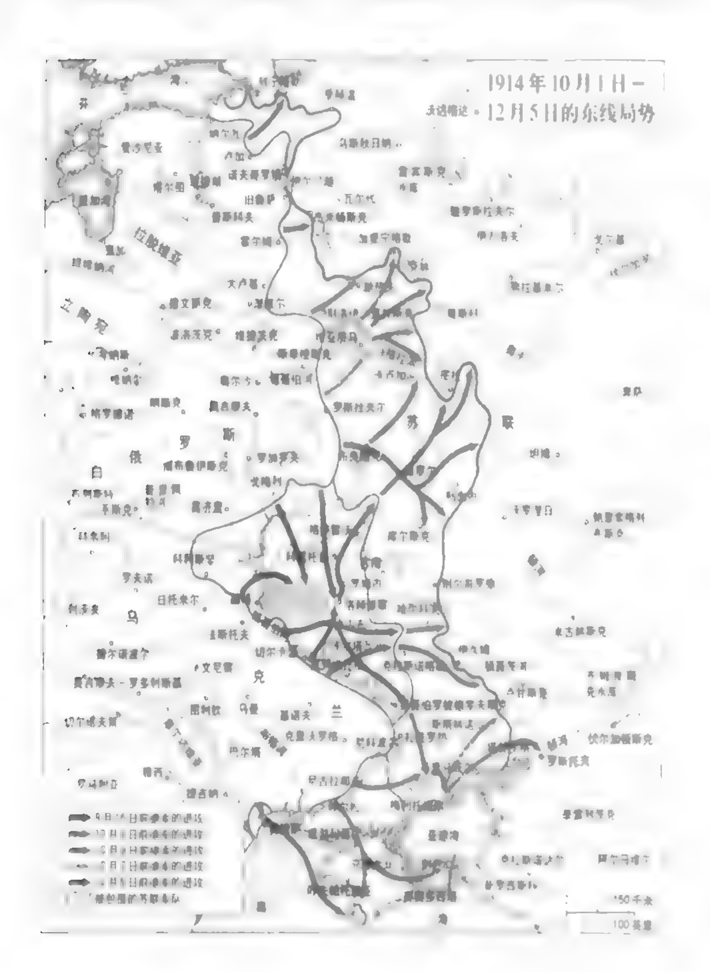
为德国一贯轻视的后勤部门提供的选择十分简单：前进。9月底，古德里安从乌克兰匆匆赶回，指挥其装甲集团军群从南面向防守莫斯科的苏军发起攻击。10月1日，其他两个装甲集团军群也投入到代号为“台风”的行动中去。仅第一天，德国装甲部队便取得了作战的主动权。德国人的进攻是那样成功，以致苏联方面只是通过询问英国（根据“过缴派”提供的情报），才知道他们部署在斯摩棱斯克以东的部队已经处于德国人的攻击之下。希特勒宣布，德国在东部战线发动了一场伟大的进攻。苏联侦察飞机很快查明德军先头部队已经深入到前线的后方。与此同时，通向莫斯科前

正行进在带有纳粹徽章（由德国飞机识别）的坦克前面的德国部队消失在暴风雨之中。然而，德国部队缺少过冬的衣物，其坦克也缺乏冬季作战必需的润滑油。9月初，他们的进攻被阻止在莫斯科前（见下页地图）。

线部队的交通运输线全部瘫痪。德国人已经走在取得布良斯克和维亚济马两地压倒性双重胜利的路上，将有60多万苏联军人被俘，成百上千的人被杀害，大量的军事装备被缴获。

但是，10月中旬，当德国人正在完成两个包抄时，天气突变，一年一度的秋雨骤降季节来临。尽管事实上，德国人与莫斯科人之间力量对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但粘黏的泥土阻塞了行进在泥淖中的德国装甲部队和摩托化步兵。这使苏联人获得了加强和巩固自己的足够时间，并任命大清洗中的幸存者、富有指挥才能的上将军官之一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负责指挥莫斯科的防卫。朱可夫一面强令前沿部队不惜一切地拖住泥淖中的进攻者，一面开始武装大批预备役人员，准备进行最激烈的战斗。

进入11月，天气再次发生变化：冰雪取代了雨水，天寒冻硬了泥土。对莫斯科的进攻一度恢复，但德国最高统帅部再次面临天气造成的难题。后勤供给的形势给德国的推进带来更险恶的后果：冬天的脚步已迈进门槛，德国军队却没有御寒的衣物，为部队提供补给的军用物资贮存寥寥无几。然而，德国高级指挥官们执拗地认为，在1914年马恩河战役中没有继续战斗，使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相信这次最后的进攻将使他们占领莫斯科并推翻苏维埃政权。他们再度低估了自己后勤供给面临的困境 [illegible] 对莫斯科的进攻继续进行。例如，德军总参谋长弗兰茨·哈尔德认为，也许寒冷将使其作战的机动性得以恢复，而且极有可能到明年1月中旬以前不会有雪。



1914年10月1日—12月5日的东线局势

1941年12月5日
莫斯科战役

高级指挥官们尤其是最高统帅部对正在迅速恶化的前线情况明显地缺乏了解。到了11月中旬，隆冬来临，德国坦克乘务员发现，坦克推进装置上曲 [illegible] 坦克油料，用以烤热推进装置，直到引擎 [illegible] 希望出现的结果。随着后勤补给系统的逐渐瘫痪以及气温的骤然下降，经历了5个月激烈战斗的德国军队已显得精疲力竭。

直到进攻者紧缩腰带，朱可夫才对其预备部队下达战斗命令。12月初，当德国的地面部队推进到苏联首都的视域范围时，一场大雪使气温突然下降到华氏零度以下，苏联人终于发动了反击。在东部战线的整个地区，希特勒的军队都陷入绝望的境地——这一境地预示着所有的入侵者都将被消灭

第十六章 战争中的世界

320

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驻守在一系列设防地带的东部德军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他们的主要交通运输网络四周布满了绰号为“豪猪”的防御工事，已摇摇欲坠于崩溃的边缘。尽管如此，获悉日本参战的消息，希特勒立即在12月11日对美国宣战，这一决定注定了德国的命运。德国海军因此受到鼓舞而积极行动起来，陆军和空军却对此反应冷淡，因为他们的注意力仍被吸引在东部前线：在那里，苏军正开始对德国的中央集团军群进行强有力的反击。由于斯大林拒绝了他最优秀的将领格奥尔基·朱可夫关于集中兵力于一条战线的建议，苏联人实际并未取得重大胜利。至此，红军弄清了他们成功和失败的全部原因。

当战斗在3月中旬平息下来时，双方完全进入相持状态，但是希特勒认为，德国必须在美国的潜在能力发挥出来之前打垮苏联。根据这一观点，他决定由自己直接指挥德国军队，而让大多数曾在1939至1941年间赢得过胜利的高级将领引退。1942年4月，希特勒做出决策：北部和中部的部队必须坚持防守，而在南部的部队将发起攻击，以夺取高加索地区的石油。然而他一直搞不清，德军是应该攻入高加索占领油田，还是应该占领伏尔加河畔的斯大林格勒，以阻止石油向北外流。整个战役期间，他一直摇摆于两种选择之间。

苏联首先开始行动。但他们对哈尔科夫实施的攻击严重受挫，损失了南部前线的所有预备役部队。紧接着德国人在克里米亚发动进攻，曼施泰因的第11集团军摧毁了全部残存的苏军阵地。主要进攻于6月27日开始：西部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沃罗涅日。德国人在那里摆开一个阻截合围的阵势，并将其一直延伸到顿河沿岸。这次苏军实行了退却——那里再不会出现围歼战——在德国装甲部队之后，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意大利部队也在向前运动，以保卫德国南方集团军群不断延长的侧翼，因为德国人自己缺乏足够的兵力进行这场战役。

携带迫击炮的德国步兵在斯大林格勒月夜似的景色中开始穿插行动。德国人于1942年8月末对斯大林格勒进行逐段进攻，但伤亡惨重。残酷的战斗吞没了两个侧翼的部队，留在伏尔加河沿岸的德军阵地已岌岌可危。到11月初，即使他们占领了该城90%的地区，但整个德国部队已是精疲力竭

到了7月末，德国部队已经前进到顿河沿岸，一个月后到达伏尔加河。9月13日，德军在沿伏尔加河西岸12公里宽的地带向斯大林格勒展开猛烈进攻，两个月时间，这座城市变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凡尔登。德国第六集团军的部队将苏联人一批一批地驱赶到伏尔加河。到了11月中旬，他们已经占领了大半个城市，尽管损失了大量的人员和装备。与此同时，苏联红军也把大批增援部队调往斯大林格勒，使其有足够的兵力坚持战斗下去，并将大部分援军留做预备队，准备投入大规模的反击。与前一年苏联人的进攻不同的是，斯大林把目标集中在一个有限的范围：消灭德国第六集团军。

321

当希特勒正竭尽全力挽救轴心国在地中海地区的颓势时，苏联人开始大举反攻。投入100万兵力、1.3万门大炮和近900辆坦克的“天

王星”行动计划，出奇不意地将第六集团军逮住。1942年11月19日总攻开始，西入后进攻的矛头转向斯大林格勒的后面，20多万德军陷入用古典的“坎尼”计谋设置的圈套。这（在另一情况下）将不得不求助于普鲁士总参谋部。戈林一再做出保证，德国空军能够向第六集团军提供援助，希特勒也下令弗里德里克·保卢斯将军坚守阵地等待援兵，同时指定因为在克里米亚的胜利而被提升为元帅的埃里奇·冯·曼施泰因担任救援任务的指挥者。经过反击，德军逼近斯大林格勒，但是没有希特勒的同意，保卢斯拒绝执行曼施泰因的突围命令，而希特勒则不允许突围。

12月，苏联人发动了另一场进攻，东部的平衡因此发生重大变化。针对顿河上游地区的意大利和匈牙利军队实施的大规模攻击，导致了他们的彻底崩溃。苏联的这一胜利，关闭了德军通往斯大林格勒的空中补给线，1943年1月31日，保卢斯投降。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死亡、负伤、失踪和被俘的德国人总共超过100万——几乎占其东方前线总兵力的1/4。其后果也威胁到整个南方集团军群。从1月到2月，曼施泰因蒙受了失败的折磨：他只能得到从高加索调来的第一装甲集团军的补充，而第17装甲集团军仍奉命留在库班佩宁苏拉，因为希特勒要求立即付诸实施1943年夏季进攻的计划。苏联人继续向前推进，并显示出挺进到克里米亚以西的黑海、以切断德国南方集团军群的态势。但他们的推进缺乏紧凑连贯和集中统一，结果使得力量分散、行动迟缓。曼施泰因很快找到了苏联人的易受攻击之处，在2月末和3月初发起的一场占压倒性的反击，使靠近他们的苏军遭到重大伤亡，甚至重新夺回哈尔科夫。紧接着，连绵不断的春雨使战斗暂时平息下来。

1942年11月，守卫斯大林格勒的苏联步兵进行反击。苏联坚持不懈的城市防卫，成功地牵制并拖垮了德国人。他们对德军的侧翼阵地发起攻击，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伟大胜利

地中海战区和同盟国的战略

当纳粹的几百万军队和苏联军队激战于东方战线时，在北非，英国面对的仅仅是少量士气低落的意大利军队，他们主要依靠埃温·隆美尔指挥的一支德国部队的支持。虽然在数量上始终超过自己的对手，但英军却蒙受了一系列着辱性的失败，这反映了这支军队十分缺乏军事技能和作战经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隆美尔显示出一种系统有效的指挥方式，突出机动、快速和创造性的特点。到1942年7月，他的部队已经推进到埃尔阿拉曼，距离亚历山大仅有70公里。

同他们的对应者一样，英美的战略决策者已经认识到工业生产的至关重要。从1940年夏天开始，英国和美国就强调充分动员自己的工业、人力和物资投入战时生产活动。另一方面，在1942年前，德国就开始实行了一种“大炮加黄油”的经济政策。那样，他们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有用的资源为其战争服务，并保持比盟国工业能力高得多的生产水平。在这方面，希特勒的军工部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在战争的后半段创造了奇迹。但是到了1942年，德国工业失去了这种竞争的优势：美国经济呈现长足发展的态势，令人难以置信的各种产品源源不断地从美国工厂流出。根据一个研究轰炸机轰炸进攻的英国编史家的记

322

德国观察兵正监视着逐渐驶近的英国坦克。1941年和1942年，在北非的德国人多次选择一些坚固的防御阵地，有意让英国人在无效攻击中瓦解自己

载，到1944年，美国工厂已经制造出“像棒棒糖”那样的四引擎轰炸机，而同一时期美国在太平洋的主力作战舰队的规模也超过了世界其他国家海军的总和。

面对1941年12月11日日本和德国的宣战，罗斯福总统和他的顾问专家选择了以“德国为首要打击目标”的战略，提出在1943年发动一场横渡海峡的入侵行动，直捣希特勒的心脏。英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经过讨论认为，尚不具备实施这一计划的足够兵力，西部的主要军事力量应主要用于地中海地区下一年的战争和对俄国境内的德军进行压倒性的打击。这样的分歧反映了英美战略上的不一致，但罗斯福对英国做了短期的非正式访问，协调了双方的分歧；他指示其指挥官在地中海西部地区的重要战役中与英国进行合作。

即将实施的代号为“火炬”的战役，选择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为进攻目标，以便对来自西部的轴心国军队施加强大压力；但就在“火炬”战役开始的前夕，英国向亚历山大的隆美尔部队发动攻击。丘吉尔对早期在北非的失败做出了反应，撤换了地中海战区的大部分高级指挥官，而予以贝纳德·洛·蒙哥马利充分信任，把第8集团军交给他指挥。无论有过什么样的过失，蒙哥马利都不失为一个目标明确、训练有素和讲求实际的杰出指挥官。不过，与在缅甸的威廉·斯利姆不同，他从不占用时间去纠正他指挥的部队的战术缺陷，而是决定同德国人打一仗，以显示第八集团军的战斗实力；结果，在埃尔阿拉曼进行的与其说是运动战，不如说是消耗战。但重要的是表明了在拥有兵力与装备上的优势之前，第8集团军已经具备了极强的实战能力。10月23日，蒙哥马利指挥23万英军和1030辆坦克向隆美尔率领的10万德军和500辆坦克发起攻击。11月3日，德国的非洲军团开始退却，并一直退到突尼斯。

当蒙哥马利追歼德国人时，11月8日，美国和英国在法属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几个点同时登陆。法国人进行了大规模抵抗，但最终缴械投降，德国人则决定加倍在突尼斯构筑防御工事。做出增援北非的决定，是希特勒最大的失误之一：众所周知，这个决定使地中海地区保持关闭状态长达半年之久，并无视同盟国海上优势的影响，将德军的某些最精锐的部队置于像斯大林格勒一样既无法防御，又无法从那里退却的境地。进一步说，希特勒要德国空军打的是一场不利条件下的消耗战，因此必然遭到难以承受的损失。

持续到1943年5月的北非战役，也给盟国带来了重要的后果：一方面，美军在卡塞林要塞遭到战术上的失败，这给美军提出了严厉的警告，使其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另一方面，也正如美国军方所担心的，它阻碍了1943年横渡海峡进攻计划的实施。作为一种替代，1943年1月，英国、美国军政高级领导人在卡萨布兰

埃尔温·隆美尔（1891－1944年）是一位具有实战经验的指挥官，在许多情况下，他的出现能给部队以鼓舞，并以其第六感官准确地预测战场上发生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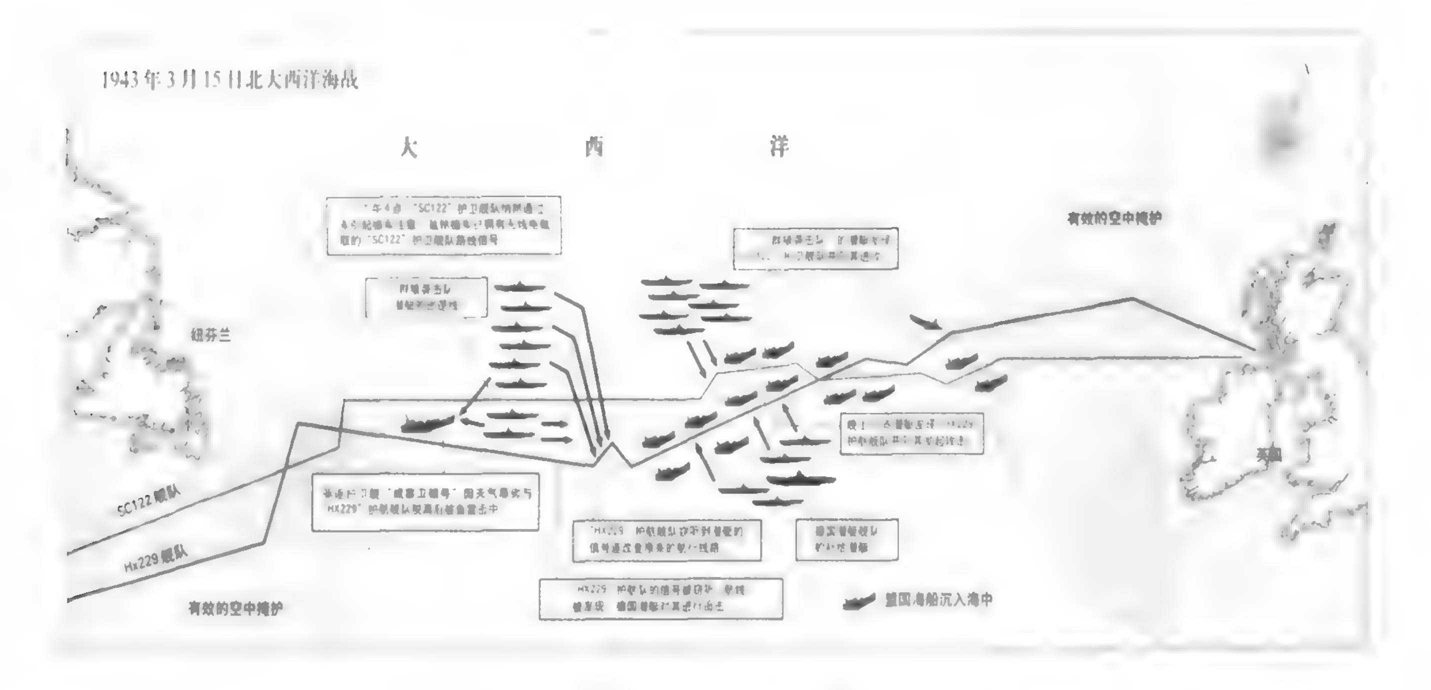
卡举行会议，确定将西西里岛作为下一个进攻目标。7月10日，盟军在那里成功地进行了登陆，虽然德军坚持抵抗决不退却，但到8月17日，盟军仍占领了整个岛屿。

西西里被攻占最终促使意大利国王罢免了墨索里尼，马歇尔·巴多格里奥，一个以军事上无能而著称的意大利新任政府首脑，试图通过谈判使意大利摆脱战争，但他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德国人却很快巩固了他们在佩里苏拉的军事地位。直到9月初，盟军才穿越非洲大陆。在萨莱诺经过几次棘手的战事之后，他们向北推进到那不勒斯，在那里又遇到黏稠泥浆的阻碍，被迫停止在亚平宁山脉的泥淖中。然而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仍被德军控制着。

盟军无力将罗马以南的德军驱逐，给人带来极度的失望。1944年2月，得到海岸两栖作战部队配合的盟军，在安齐奥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捕捉到德国人，但却未能在战局上占据明显优势。正如丘吉尔所说，盟军满怀希望地扑向一只猞猁，但逮住的却是一只搁浅的鲸鱼。只是到了5月，盟国才打破了在意大利的僵持局面：进攻是由自由法国的步兵部队发起的，他们穿过被德国人认为是不可能穿越的地带逼近罗马，直接威胁到德国第10集团军。但是美军指挥官马克·克拉克将军认为，占领罗马的光荣应该属于美国部队，结果贻误战机，致使德国人趁机撤离。紧接着，在一个多夏季的时间里，盟军一直在驱逐佛罗伦萨以北的德国人，然而这时的意大利已经变成一个死水回流的战区。

大西洋的战斗

英国和美国为确保军事实力和经济生产而成功地保护了海上运输线，构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国在西部战线最重要的胜利。在1939年，无论是皇家海军还是德国海军，都没有预料到会发生一场大规模的袭击商船的潜艇战争。一支规模不



1943年3月15日北大西洋海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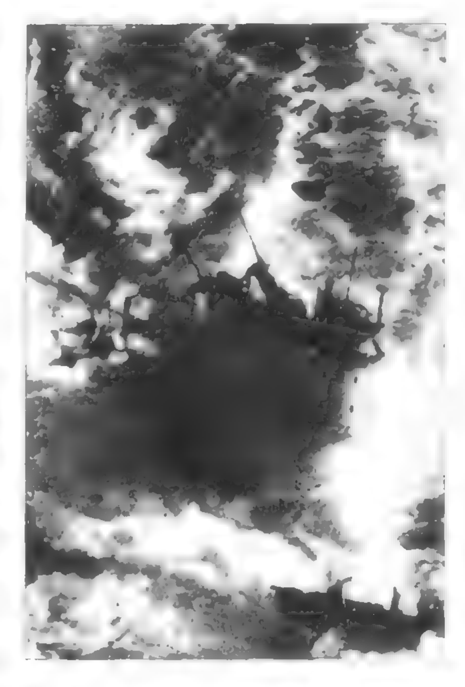
上图为1943年3月6日至22日，SC-122和HX-229型护卫舰的护航线以及它们在3月15日所遭遇的困境。到1943年，在北大西洋的盟国海军经过良好的训练和兵员补充，加之以陆地为基地的远程空中力量的支援和技术改进，已基本达到与他们的残酷对手相匹敌的能力。在1943年4、5月间，平衡逐渐被打破，战局向着有利于盟国的方面发展，德国潜艇在对护航舰队实施的攻击中开始蒙受灾难性损失。在北大西洋的胜利，构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方盟国最重要的战略成就之一。

大的潜艇部队——决不超过50艘——却给盟国商船造成重大损失；但在战争的第一年，由于有英国的护卫舰护航，盟国的海上运输并没有受到重大损失。1940年后，法国和挪威控制的海军基地完全为德国所利用，但潜艇的发展却较为缓慢，部分原因是德国海军一直侧重于水面战列舰的建造。此外，这一时期，皇家海军截获了德军的密码索引，能用英国发出的侦察信号干扰和破坏从永久性基地发出的德国海军电码。于是，在1941年上半年由于遭到潜艇袭击而造成商船损失的直线上升，到了同年下半年便显著地降下来。

1941年末，德国人将一种新的复杂技术引进电文与密码的互译系统，致使英国人丧失了捕捉敌人重要情报的机会，同时希特勒对美国的宣战，引发了德国潜艇对美国东部沿海一带商船的猛烈袭击。不能原谅的是，美国拒绝了英国的劝告，重犯其盟友的每一个错误：没有护航，没有灯火管制，没有无线电寂静。其结果是一场大灾难。1942年春天，美国在东海岸实行了严格的战时管理，德国潜艇部队指挥官卡尔·邓尼兹海军上将因此把他的攻击目标范围转移到防御松懈的加勒比海域。不过，德国人也犯了一个关键性错误：为了保卫挪威和北非并与地中海的盟国海军作战，希特勒让大量的潜艇承担起防御的角色；邓尼兹把潜艇严格管束在港口，剥夺了下属部队的机动性，各种行动计划将被搁浅的危险性日益增加。德国的标尺是那样短小，以致与计画无缘。正如其一个对手所指出的，邓尼兹沿用"18世纪的战争方式，采用的却是20世纪的技术"。

尽管事实上有数百艘德国潜艇现正在大西洋上作战，1943年的局势却向有利于盟国的方向转化。美国船舶修造厂生产的商用船只和护卫舰，数量远远超过其损失，盟国的防卫也有了明显的改善，远程作战飞机能够深入到大西洋空域的纵深处，其所不及的少数区域将通过空中监视进行控制。此外，可运用于防卫的战术和技术出现了重要的进步。1943年初，英国终于再次获得渗透德国潜艇通讯系统的能力。同年春天，大西洋的战斗进入白热化状态。3月份，德国潜艇击沉了总计62.7万吨位的盟国商船；由SC122型和HX229型护卫舰担任护航的船队遭到40艘潜艇的攻击，德国人击沉了21艘盟国舰船，仅自损一艘潜艇。但在4月份的

最后一周，当41艘德国潜水艇向ONS5护卫舰护航的商船队攻击时，他们击沉了12艘商船，自己却损失7艘潜艇，另有5艘遭重创。在5月份，德国人损失了41艘潜艇，再难以取得任何成功，邓尼兹只得将其潜艇部队从大西洋撤出。盟国赢得了战役胜利。



一艘被击沉的德国潜艇　它遭到一架美国海军飞机的深水炸弹的攻击和机枪扫射，沉没前船员纷纷弃船而逃。到1943年末，德国潜艇已经变成猎物而不是猎手

空中战争

就盟国在战争中的举措而言，没有其他任何一方面能比联合轰炸进攻更能引起广泛的争论。1942年2月，在阿瑟·哈里斯接管轰炸机指挥部前，英国对德国的经济和城市进行空中攻击的行动被证明是失败的。5月，他指挥轰炸机对德国城市科隆进行了1000架次的空袭，几乎将其夷为平地，但除此之外，一年多来值得一提的成功为数甚少。为此，哈里斯大力加强对指挥部的领导，他坚持认为，地区性轰炸能最终瓦解敌人的士气。1943年，轰炸机指挥部实现了哈里斯的预想：在春季，组织实施了对鲁尔区狂风暴雨般的轰炸，7月末又出动飞机轰炸汉堡，炸死4万名城市居民。施佩尔提醒希特勒，如果英国轰炸机指挥部在其它五六个城市取得同样的效果，德国的士气将被全部瓦解。

然而，在1943年的余下时间，哈里斯的部队没有取得攻击汉堡的类似成功。到了秋末，他们轰炸的目标转向柏林。但这一战役严重损害了轰炸机指挥部。因为德国的空防力量，尤其是夜间战斗机的作战性能日益加强。轰炸德国境内纵深目标所进行的远距离飞行，加大了英国轰炸机遭到攻击的可能性。1944年3月末，对纽伦堡的灾难性轰炸，使英国人损失了105架轰炸机，其中的大部分是被敌人的战斗机击落的。这不得不使哈里斯放弃了远程攻击计划。

326

当英国对德国实施夜间轰炸时，1943年6月，美国开始白天轰炸德国的工业目标。美国空军战略家坚信，装备精良的B－17重型轰炸机群在执行攻击任务的飞行中，能免受重大损失地穿过德国的空中防线。但是德国战斗机部队显示出一种远比美国人估计的强劲得多的对抗力量。8月，60架美国轰炸机在攻击施韦因富特和雷根斯堡时被击落；两个月后，对施韦因富特滚珠轴承厂的轰炸又使美国损失了60多架轰炸机。从夏季到秋季，美国每月阵亡的飞行员占其飞行员总人数的30%，尽管他们也给德国空军的战斗机群造成重大损失。第二次轰炸施韦因富特的灾难，迫使美国人放弃了对德国境内纵深地带进行的没有护航的空中攻击。然而，1944年初，一种真正的远程护航战斗机P－51"野马"式战斗机开始装备部队，美国第八空军联队再次攻击了位于德国中心地区的目标，开始了一场针对德国空军的残酷的空中消耗战。到了5月，德国战斗机队伍终于被瓦解。

虽然盟国自己也认识到，把260万吨炸弹投到"欧洲堡垒"的头上并不能最终赢得战争，但它毕竟对德国的士气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反过来又可用来解释为什么德国人把那样巨大的物力和财力耗费在V－1和V－2的研制项目上——根据《战略轰炸观察》的估计，这些物力和财力仅在1944年就能制造出2.4万多架战斗机。此外，大约有1.2万门重型高射炮和50万士兵连同大量设备简陋的建筑物，在夜以继日的轰炸中被抛向天空。所有这一切消除了人们对德国人曰的担

1944年，一架从美国本土……14……的B-24……[illegible]……任务中一机上油料箱爆炸，机组人员无一生还，但整个机体仍……[illegible]

忧。最重要的是，白天实施的空中攻击表明，盟国赢得了整个欧洲的制空权。这是保证横渡海峡入侵计划成功的先决条件。轰炸法国的公路和铁路，对在诺曼底进行的地面战役产生了关键的影响。与此同时，德国的人造油生产被摧毁，这进一步沉重打击了德国的陆军和空军。

最后，从1944至1945年整整一个冬季，对交通运输网络的系统轰炸，彻底破坏了德国的战争经济，这也可以作为德国没有出现拼死防御盟军进攻的一种解释。这些战果是用15.8万名飞行员（包括大约65万平民）的生命换来的，联合轰炸进攻为盟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3～1944年的东部战线

1943年初，苏联人的胜利和德国人的反击在奥廖尔与哈尔科夫之间的库尔斯克周围形成一个凸起的巨大肿块。曼施泰因劝说希特勒相信，消灭在库尔斯克突出部位的苏联部队，将使德军的整个前线得到巩固。然而，希特勒推迟了发起攻击的时间，直到德军的实力恢复到最高点。库尔斯克以北莫德尔的第9集团军终于配备了拥有900辆坦克的3个装甲军；在南面，曼施泰因掌握了4个装甲军共1000辆坦克；德国空军为这次密码暗号为“城堡计划”的进攻调集了2500架飞机。但是当一切准备就绪时，德国人便遭遇到了已有充分准备的强硬对手。苏联人打算把进攻的德军围捕在一个由防御阵地构成的延伸达200公里长的巨大罗网里，到那时，他们只需动用装甲部队就能赢得胜利。此外，他们的情报部门在进攻前两天偶然截获了敌人的有关讯息。几乎在德军准备发起进攻的同一时刻——1943年7月5日拂晓——这很有利于苏联炮兵开火，发生了战争史上最大规模的先发制人的炮击；数百门大炮和迫击炮猛烈轰击了准备进攻的德军，不到两天时间，德国人的努力化为乌有，接着苏联人的坦克部队便大显身手。在普罗霍罗夫卡，7月12日，1000多辆苏联坦克向南推进，大批反击部队紧随其后。

库尔斯克战役表明，红军已经在战争中获得了令人生畏的作作战技能。他们也掌握了诱骗敌人的谋略。如此一来，从1942年末起，他们发动的每一次重大进攻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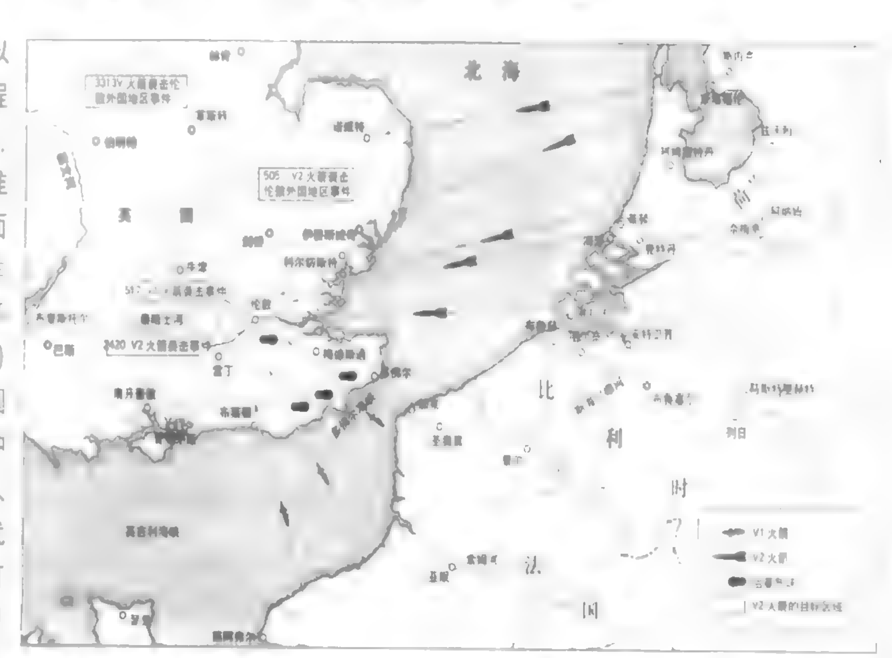
使德国人惊讶不已。取得库尔斯克的胜利之后，斯大林在普里佩特沼泽和亚速海之间400公里长的前线部署了260万兵力、5.1万门大炮和迫击炮、2400辆坦克和强击炮，以及2850架作战飞机。他们首先夺回了霍罗夫卡，在9月末撕开德国南方集团军群的左翼，然后为了与德国人争夺第聂伯河而不顾一切地急速推进。结果苏联人重新夺回了乌克兰重要的农业和工业地区。完成了为德国人的灾难编目之后，红军到达了黑海，完全孤立了在克里米亚的德国第17集团军。

1944年春季夺取敖德萨附近的拉兹杰利纳亚车站的战斗。到这时，苏联军队诸兵种的协同火力、组织调动的机动性和性能良好的步兵武器，以及数量上的优势，改变了整个东部战线的平衡，使局势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转变

10月来临，连绵秋雨给德国人带来喘息之机，随之而来的冬天又使红军恢复了进攻，这次他们投入了400万兵力和4000多辆坦克，并配备了美国援助的四轮和六轮卡车，有了适应战役需要的后勤供给保障。到了1944年5月，他们已经到达喀尔巴阡山脉以及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边境一带，而在其他地区的进攻，则肃清了固守在列宁格

V—1火箭和V—2火箭：报复性武器

虽然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以前情况已经十分清楚：发展远程火箭计划需要付出高昂的费用，而且所生产的武器缺乏高度的准确性，但德国军方仍着手这方面[illegible]至1942年[illegible]英国轰炸[illegible]德国城市[illegible]严重破坏[illegible]时，V–2火箭（用作"报复性武器"）成了紧急实施的项目；同时，德国空军也在加紧V–1火箭——一种由冲压式喷气发动机推动的无人驾驶飞机的制造。然而，这两种武器系统均不具有任何准确度：打击英国南部某地有一定规模的目标，是其能够发挥的最大效能。[illegible]负荷不足兰卡斯特轰炸机载重量的1/5。



攻击英国的V-1火箭是从法国南部发射的，而V-2火箭则在发射场[illegible]——位于荷兰北部。两个发射点的目标都对准伦敦。虽然两种武器都不具备精确性，但V-1火箭仍能造成相当大的心理影响（V-2火箭的影响要小得多），尽管实际上它们什么也毁灭不了。结果证明，它们只能给人们带来[illegible]，却几乎不能[illegible]而，它们耗费了德国的巨大财源。

作为海岸防御工事检查官的隆美尔于1943年末抵达法国，引出了在法国海岸浅水线和深水线之间设障的庞大行动计划。图片上，正在沙滩的障碍上工作的德国士兵在盟国侦察机低空搜寻时，奔跑着寻找掩护。1944年6月，这些障碍将迫使盟国军队乘低潮时在诺曼底登陆

勒周围防御工事里的德国人，重新夺取了克里米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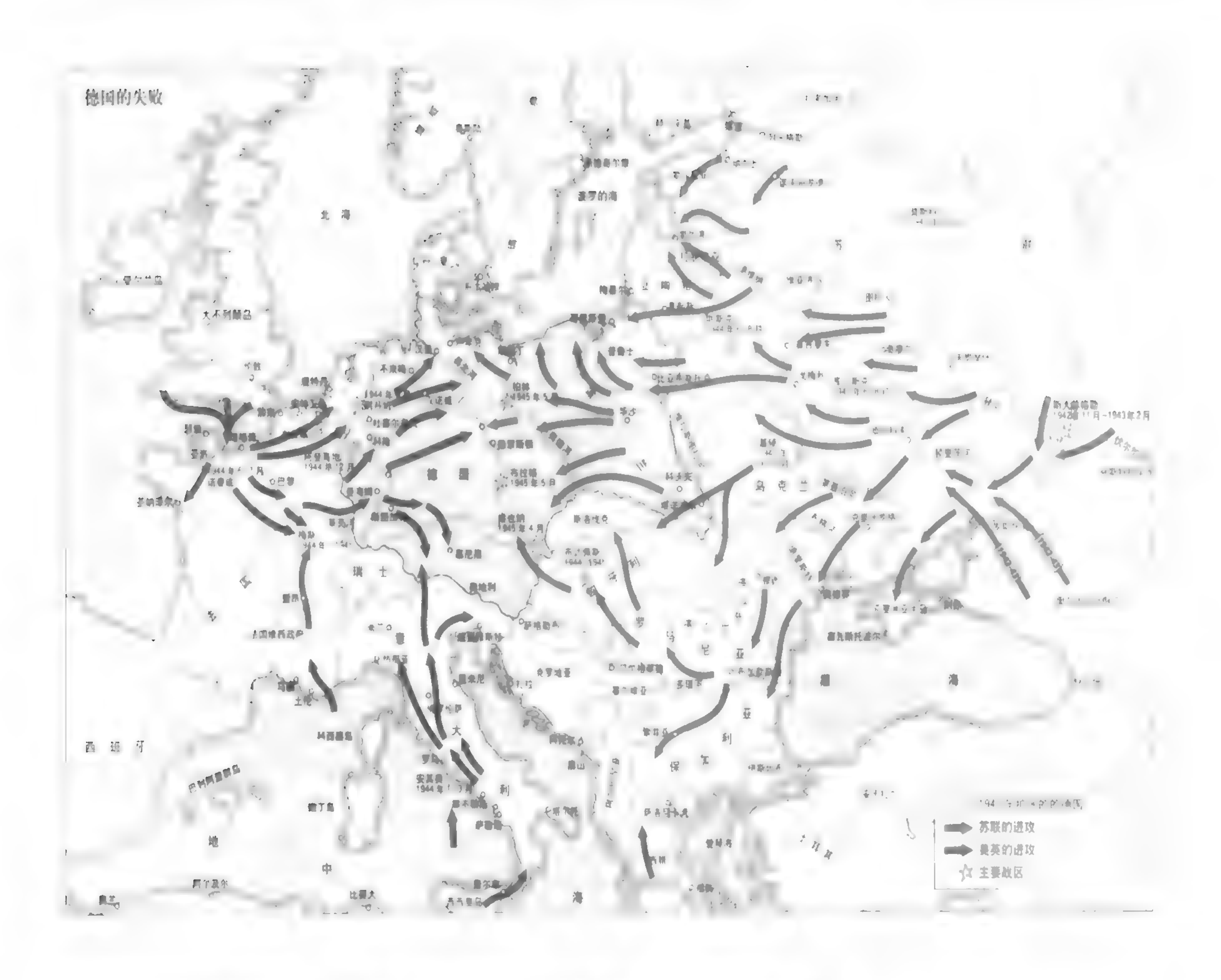
春末，苏联人有意向德国人提供假情报，透露苏联军队下一次重大进攻将对准德国的南方集团军，打算把他们驱赶到巴尔干，而事实上红军正在为攻击它的中央集团军集结力量。斯大林在等待时机，直到英美联军实施诺曼底登陆后。1944年6月22日——正是“巴巴罗萨”战役发起3周年，代号为“巴格拉季昂”——以1812～1813年卫国战争中的一个英雄命名的战役拉开序幕，进攻的矛头直指明斯克周围德国防线的中心部位。希特勒命令他的部队坚持抵抗，直到最后一寸土和最后一个人。他们对此惟命是从；到7月20日，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全部被摧毁，其中17个师被彻底消灭，50个师损失了大部分或一半有生力量。终于有这么一天，部分对希特勒的战争举措感到震惊的德国军官决定结束他的性命，但他们没有成功。红军为在下个月赶到华沙附近的维斯图拉河继续向前推进，但1944年8月29日，当红军到达那里时，斯大林下令停止前进。波兰的地下组织——无论是反共产党的还是反纳粹的——都举行起义，获此消息，斯大林的眼里露出感觉极好的神色，因为这给他提供了一个在他动手前就借德国人之手消灭其在波兰的敌人的机会。但向西快速推进的苏联军队参与了这场杀戮；而另一英美军队取得决定性胜利，他们将被顺利地带入德国。

在此期间，斯大林确定了在巴尔干夺取的战略目标。1944年8月20日，苏联炮兵轰击了多瑙河三角洲北面的德国和罗马尼亚军队的阵地，造成其防线的迅速崩溃，100多万防御部队陷入混乱和瓦解，三天以后罗马尼亚宣布退出德国的联盟，一周之内罗马尼亚大部分地区已处于苏联人的控制之下，其军队开始掉转枪口对准德国人。比利时紧随罗马尼亚之后，也艰难地停止了抵抗。驻守希腊和马其顿地区的德国部队应时撤离，集结于匈牙利前线。然而，即使匈牙利人也急于努力脱离轴心国这艘正在下沉的战船，虽然纳粹已将一次反德军事政变扼死在萌芽状态。到了11月份，只在布达佩斯的郊区仍有德国人和匈牙利的残余部队继续进行抵抗。苏联人现已获得了日后冷战时期成为他们帝国控制区的控制权

战争在西部的胜利

1944年盟军在法国的登陆行动是战争中最复杂的军事行动。1942年迪耶普海上袭击的失败说明，在入侵的最初阶段占领港口几乎是不可能的，入侵者将必须携带所有的登陆设备，因此，这种冒险不仅要求空中优势，而且也要求控制住部队的行动、设备以及越过海滩向岸上的支援。只是在1944年，盟军才拥有了足够的登陆船只和使这样一种军事行动成为可能的后勤供应。到了1944年1月，诺曼底战役的最高指挥部一切准备就绪：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全面负责，英国的蒙哥马利在战斗开始阶段指挥地面部队。就在到达英国时，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发现预计作为登陆部队的一支伞兵和三个步兵师力量不足，于是，这些队伍的数量被增加到三支伞兵和五个步兵师。在步兵占领了使强大的后勤供应得以顺利进行的海岸线时，伞兵将保护进攻部队的侧翼。

在法国，隆美尔不知疲倦地投入到防御工事的准备当中。与其他德国指挥官不同，他意识到了必须把入侵者阻止在沙滩上，否则战争就要失败。但是德国人



处于巨大的混乱状态中：负责全面指挥西欧德军的戈德·冯·伦施泰特采取了与隆美尔根本不同的做法，而希特勒本人还保留着对装甲后备军部署的个人控制权。

1944年6月6日黎明，在1.2万架飞机的掩护下，一支由大约6500艘军舰和运输舰组成的队伍将入侵者带到了诺曼底。只是在奥马哈海滩，防御工事才对进攻者起了重要的阻滞作用；在其它地方，德国人反应迟缓而犹豫。考虑到大部分战事，希特勒和德军最高统帅部还是深信进一步的登陆行动会发生在加来海峡附近——盟军的诱骗行动又一次成功——第一天，盟军派出了17.7万人登陆。而当地的德军表现得尤其残酷而顽固，暴行发生了：比如在6月7日，纳粹党卫军某师的部队用希特勒式的手段屠杀了将近一百名加拿大战俘，并且用坦克从他们的尸体上碾过。在战场的东部地带，英国人和加拿大人没能打败数量上胜过自己的敌人，也没有取得进入诺曼底另一边平原的道路。在西部，美国人占领了瑟堡，但此后便在法国陷入困境。在六七月间，一场使人回忆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规模消耗战耗去了大量的人力、装备和军需品。但最终当蒙哥马利的连续进攻将德军装甲部队钉在东部时，美军把敌人从岸边赶走并在7月31日占领了阿弗朗什。从那儿，美军本来能包围整个德军战线，但相反，他们却向西前进进入布列塔尼。不过，希特勒命令在莫尔坦的反攻却给了盟军可乘之机。"过激派"预先通知了盟军，在美军装甲部队最终转向东方威胁到诺曼底的整个德军阵地时，盟国空军和地面

到1943年为止，盟国战时经济的联合产量已取得对纳粹德国战时经济的压倒性优势。尽管如此，1940年和1941年收复被纳粹德军占去领土的战役还是拖长并付出了重大代价。由于受到四个方面的进攻——东方、西方、南方、空中——德国的失败已是不可避免的了。但是，这些战斗的长度却使德国能继续他们的非人道主义罪行，直到1945年春

330

部队彻底击败了德军。同时，8月15日，盟军在被占领的法国地中海沿岸又完成了一次成功的登陆行动。

现在战斗变成了对德国边境的全面进击，蒙哥马利坚持有限制地进入纳粹德国，当然是在他的指挥下；艾森豪威尔虽然为他提供了大多数军需品，但还是继续坚持非限制战线的战略方针。9月2日，英军解放了布鲁塞尔；两天之后，在当地造船厂未受损害的情况下又占领了安特卫普；但紧接着，蒙哥马利便停止了前进，因为要为"商品菜园"军事行动做准备。这个计划预计通过穿越荷兰的进攻和对阿纳姆境内莱茵河上桥梁的占领，包抄德军的防御工事。结果，德国人恢复了元气，其第15集团军逃进了荷兰并设法封锁了到安特卫普的道路。约二个星期后，"商品菜园"军事行动开始。但英国第一流的空降部队没能确保阿纳姆；同时，增援的装甲部队推进缓慢，而且作战计划在进攻的最初几小时便落到了德国人手里。这次失败使德国人能继续掌握他们的西部边界直到冬天，也使美国和英联邦的军队面临着从艰难的地形中驱逐德军的不愉快前景，并且在美军和英军的阵地遭受重大损失而又缺少后备力量使精疲力尽的部队能有时间休息和进行修整的同时，又必须修复好阵地。不但这样，盟国空军还破坏了法国的后勤军事防卫设施和交通网，这也使前线盟军的供应变得困难。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2月底安特卫普的道路被修复时为止。

331

欧洲的结局

1945年2月中旬，被英国和美国轰炸机轰炸之后的德累斯顿。爆炸引起的大火断送了3万多当地居民的性命。这是从主教堂一角俯瞰到的曾是欧洲最美丽的城市之一的德累斯顿的废墟

不管怎样，直到1944年秋，德军所有的前线还处于防御状态。盟军威胁着第三帝国的大门，空袭轰击了德国的工业和城市。德国人几乎介于狂热的决心和绝望的顺从之间，像许多人描述的那样："享受战争，因为和平将是地狱。"德国人确实有太多的东西要恐惧：直到1944年秋，灭绝集中营还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干扰地继续着他们残忍的工作。大多数德国人意识到了自己国家所犯下的极端恶劣的罪行，他们将为此遭到质问。但暂时，顽固的抵抗和可怕的天气还使盟军处于困境中。

12月16日，德国微弱的攻击抑制了美军在阿登高原的防御，其目的是将北部的英国和加拿大军队同南部的美军分隔开并重新占领，然后破坏安特卫普。美国的战线弯曲了，在一些地区防线崩溃了。此时惟一可用的后备部队是两个空降师。他们立刻被派去支援侧翼——第82师到达德军北面正在增长着的德军突出部；第101师则急速推进到巴斯托涅。第101师在这里进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抵抗：一段时期德国人放弃了这所城镇，但第101师的燃料只够到安特卫普一半的路程，他们对重要的道路交叉点的控制增加了自己的麻烦。但他们一直没有放弃努力。1944年的盟军最高指挥部已不是1940年的最高指挥部，它的反应平静而迅速。甚至在接到支援阿登高原的命令之前，巴顿的第三军就已在向北开进的路上了。恶劣的天气对德军最初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但天一晴，盟国出奇制胜的空军便让德军遭受了重大损失。到12月末，德军已被打败并开始撤退。突出部的战斗消灭了德国最后能作战的后备部队。

332

同时，盟国空军取得了战略上尤其是战术上针对德国运输网的巨大胜利。到

12月份，德国铁路运载量已降为正常状态的60%。到1945年2月，编组车辆的能力已落至平时的20%，结果导致其军用设备和军需品的生产几乎完全停止。再也不会有"诸神末日"的死亡搏斗了：因为没有了战争工具，德国人便失去了抵抗的能力。

结局来得不慢。1945年1月中旬，苏联军队在东部发起进攻。东普鲁士、波美拉尼亚、西里西亚刮起了复仇和暴力的飓风，可怕的杀戮和不幸发生在苏军踏过的每块土地上。1941年德国人在意识形态战争的旋风中散播的种子现在有了收获。红军封锁了奥德河，但指挥官们在向德国做最后推进时产生了犹豫。与此同时，西方盟国也终于摆脱了困境。在北方，英国和加拿大的军队进逼至莱茵河，并仔细地为计划好的越河作战方案做了准备。3月初，美军到达莱茵河，德军的抵抗瓦解了。在雷马根，他们完好无损地占领了鲁登道夫桥，并使尽可能多的部队冲过莱茵河。蒙哥马利明显的不必要的准备成了人们的笑料。4月份，盟军部队在西方已能开进到任何一个他们想去的地方：越过北部德国平原、鲁尔区、巴伐利亚，甚至能够进入奥地利。在南部，德国在意大利的军队投降了。在东部，苏军猛冲过奥德河进入柏林。4月30日，当希特勒在他肮脏的地堡中把枪举向嘴的上腭时，欧洲的一个恶梦终结了。一个星期后，希特勒的指挥官们无条件投降。

1941年12月，日本对美国珍珠港（夏威夷）停泊的战舰的攻击将美国彻底拖入了战争。然而，蔚为奇观的战术成功却掩盖了一场重大的战略灾难，因为日本人完全错过了真正重要的目标：珍珠港的修复设施和为美国来年的太平洋海战打下基础的巨大油库

日本的扩张

也许美国实力最明显的标志就是，除了在非洲和欧洲扮演角色外，它还同日本进行了残酷的较量。从20世纪的最初几十年开始，美国和日本之间就一直存在着冲突的可能性，美国的移民和关税政策同日本对中国的残酷征服所造成的紧张状态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恶化了。由于在萧条期关闭了自己的市场，西方强国鼓励了日本对亚洲大陆的侵略政策，并帮助日本军国主义获得了权利。1931年，日本军队未经东京授权便占领了满洲。六年后这支军队对中国不宣而战。日军很快占领了中国沿海地区和大多数重要城市，且在身后留下一系列暴行。

虽然资源有限，但日本人的野心却几乎是不受限制的。甚至在1905年的巨大胜利之后，日本的帝国防御计划就已把俄国看做主要的威胁。现在，虽然在中国的战争吸住了它的大部分力量，它还是沿满洲边界制造了一系列事端以试探苏联红军，这种试探一直持续到1939年苏联军队在朱可夫指挥下摧毁了在蒙古边界哈拉哈河的一个日本加强师为止。这次彻底的失败使日本人相信苏联红军并非傻瓜。尽管在菲律宾的美国军队代表着一个大问号，但第二年法国的崩溃还是（为日本）提供了新的前景。日本能冒险向东南亚的欧洲殖民地前进而把一个重要的美军基地留在前进道路的侧翼吗？1940年6月，日本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9月与德国和意大利签署了十年军事、经济协作条约。1941年4月13日，为了在预期的与西方强国的战争中保护自己的北部侧翼，日本又与苏联签定了互不侵犯条约。对这些举措，美国没有反应。但在1941年7月，日本把它的控制范围扩展到印度支那南部诸省时，罗斯福总统

行动了。由于受到中国困境的刺激并恐惧于日本的计划，美国宣布对日本实行全面贸易禁运，这立刻得到英国和荷兰的支持。日本80%的石油进口依靠美国，这使它面对着不能忍受的抉择：或者选择战争，或者放弃自1931年以来所有的大陆收益（这是美国恢复贸易的条件），于是日本领导人想出了这样一个计划，先占领东南亚，然后在占领区周围建立一个能阻止任何反攻的防御带。由于资源劣势使自己意识到难以获得对美国的完全胜利，所以，日本人希望一场长期的、昂贵的战争能削弱美国人的决心，以使互相让步和取得和平变得容易一些。

这一切是不易觉察到的，美国人以平常心态面对着战争的可能性。如战争爆发前不久《时代》杂志所暗示的："现在，一大批陆军、海军、空军的队伍被排在赛场的起跑线上，处在发令枪响前的紧张时刻中。"1941年12月7日清晨的几小时中，这种轻松自如的假定事实象吗在猛然降落到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头上。日军一场完全从运输舰上发起的空袭，击沉了5艘美国战列舰，破坏了6艘，并摧毁了3艘巡洋舰和近200架飞机。尽管如此，日本人还是犯了许多错误。对珍珠港的突然袭击使美国人团结一致，这是其它任何行动都不能做到的。而且，虽然战舰的损失看起来惨重，但这些战舰都属一战时期的产品，当时并没有航空母舰停泊在港口内。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日本人没有在环绕港口的巨大贮油槽和发电厂上空投落一颗炸弹。如果他们也集中攻击了这些目标，他们就会迫使美军在以后一年半的时间里以圣地亚哥作为舰艇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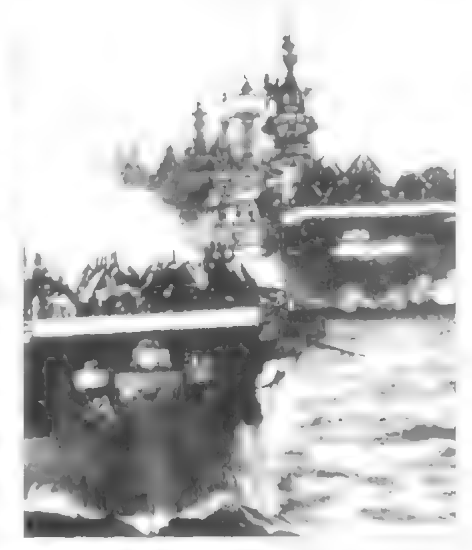
珍珠港事件可谓迅速降落到东南亚殖民强国头上的一系列灾难的前兆。美国在菲律宾的防御变成了一种耻辱；英国在马来亚也不好过，1941年12月，他们在那里失去了两艘主要舰艇，1942年2月又在新加坡损失了13万军队；到3月份，荷兰也失去了在印度尼西亚的统治权。缅甸在1～5月间被占领，英帝国的军队被赶回到印度边境。在战争的最初6个月中，由于地面部队承受了最低限度的任务和损失，日本以超出自己预料的更快的速度和更小的代价达到了目的。

1941年12月，英国皇家舰只"威尔士王子号"上的水兵等待着弃船离开马来亚。由于开进暹罗湾而超出了以陆地为基地的空军的掩护范围，海军上将菲利普斯阁下使自己的舰队处于难以生存的境地。"威尔士王子号"和"击退号"战舰被日本飞机击沉的事实突出了这样一个真相：除非得到空军的保护，否则战舰不可能在敌对环境中生存。菲利普斯同他的战舰一起沉没了

1942年5月，日本的运气开始消退。在珊瑚海发生的第一场战斗中，双方的舰艇尚未照面，美国人便击沉了一艘日本运输舰并破坏了另一艘，而且使日本空军蒙受沉重打击，阻止了日军在新几内亚南岸的登陆。同时，美军设法破译了日本的海军密码，这些情报（被称为"咒语"，和截自德军的"过激派"的信息一样有价值）表明日本人试图冒险运用分散的兵力制造战略包围圈。当一支队伍寻求攻击并占领远离阿拉斯加的阿留申群岛的几座岛屿时，另一支队伍——带有4艘航空母舰——试图占领太平洋中部的吴市港和中途岛；而第三支队伍则作为战略后备军巡逻在两者之间的海域。日本人为迷惑美国人而设计了复杂的方案，但"咒语"泄露了真相，美军事先做了部署。于是在太平洋战争的高潮时刻，我们看到美国的俯冲轰炸机准时无误地出现在中途岛附近三架日本运输舰上空，像暴风一样攻击了甲板上装满弹药、加过燃料的飞机。日本的空中战斗巡逻机、"零式"歼击机和甲板处在同一水平线上，高射炮无法反抗鱼雷轰炸机的进攻。瞬间，日本的运输舰变成了火海，所有的运输舰都被迫放弃。战斗结束时，日本损失了1/4

的运输舰。太平洋上的天平无可挽回地倾向了美国一侧。

1942年8月，美国在太平洋上采取了第一次攻击行动，第一海军陆战师在所罗门群岛的一个岛屿——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而且，不顾夜间被日军击沉四艘重型运输舰的萨沃岛战斗的惨重损失，美军继续采取攻击行动。以后的几个月中，双方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和所罗门群岛海域激烈交火。当澳大利亚军队和美国军队顽强地穿越丛林将日军从莫尔兹比港击退时，新几内亚也发生了重要战斗。虽然这两次战役盟军都未能赢得决定性胜利，但却缓慢而稳定地在使日本走向失败。



到1944年，由于诸如“独立号”级以及跟随其后的“埃塞克斯号”级航空母舰的加入，在太平洋的美国航空母舰拥有了无可比拟的攻击力量。在战斗中，这些航空母舰能发射出同世界上任何一支空军驾驶的飞机相媲美或更具优越性能的飞机

在欧洲，美国人常常对盟国战略中的政治因素作最低估计。然而在太平洋，美国的国内政策却造成了在攻击日本帝国上的分歧。麦克阿瑟将军保卫菲律宾的记录并不令人佩服，但他与国内的政治联系却使罗斯福不敢将他召回华盛顿，以免他与赫斯特新闻界和共和党勾结在一起。结果，看来还是把他留在太平洋上更安全。作为美国的高级官员，麦克阿瑟声称自己是在一座联成一体的舞台上指挥，但事实上海军并不打算让他来领导。结果是一个折中办法：麦克阿瑟可以指挥西南部的太平洋战场，高级海军指挥官尼米兹上将指挥中部太平洋战场。

在1943年的夏末和秋季，当麦克阿瑟在新几内亚将日军击退时，海军发动了横跨中部太平洋的强攻。这时，新的埃塞克斯级运输舰开始到达珍珠港，它载重2.7万吨，时速高达每小时32海里，并且携带着100架飞机。这些运输舰标志着美军攻击力量的增长。同时，美国的造船厂正以几乎一个月一艘的速度生产着此类舰只，并以同样的速度生产“独立号”级轻型航空母舰（载重1.1万吨）。这些舰艇在F6F“泼妇”战斗机（后来被证明优于“零式”飞机的）的支援下，确保了日本既不能在海上、也不能从空中击败美国。

神风自杀飞机的进攻。画面的素材来自吉布尼的记忆，他在美国海军服过役。日本对美国在海上和空中优势做出的令人措手不及的回答就是出动“神风自杀飞机”进行攻击。这些志愿者驾驶着执行自杀任务的飞机直接冲击目标，把还保留在船上的炸弹、军火和燃料所能造成的破坏程度增至最大。结果，尽管事实上日本已没有了海军，但在1944年末和1945年初，美国海军的伤亡却戏剧性地有所上升

日本的失败

尼米兹的第一步行动是进攻吉尔伯特群岛的塔拉瓦。在那里，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犯了大量错误：炮击过于短促；海军陆战队错误地估计了潮汐漫过造成障碍的暗礁的时间，致使突击部队被迫在炮火下涉过700码无遮挡的水域，而且通讯联系中断了。塔拉瓦变成了血染的屠场，留下了1000具海军陆战队员的尸体和2000名伤员，但教训也教会了美国人许多东西。1944年初，轮到下一步进攻马绍尔群岛时，尼米兹迫使他的舰队指挥官们进攻群岛链条的中心部位，并依靠航空母舰来压制敌人空军的火力。日本人正在建筑难以攻克的防御工事，但未能建好。结果，夸贾林环礁作为塔拉瓦战役的部分结果而陷落了。一个月后，美国人通过占领埃尼威托克岛跃进到马绍尔群岛的北边，同时，又用空袭摧毁了特鲁克群岛的庞大的海军基地。这些"越岛作战"行动使大量日本守军被孤立在其环状珊瑚岛上。没有了空军和海军，这些阵地便失去了战略意义。

336

为了不被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比下去，麦克阿瑟向阿德默勒尔蒂群岛开进。在乔治·基尼将军高效善战的空军部队的配合下，麦克阿瑟的军队攻击了新几内亚西部300海哩外的一座小岛比亚克。1944月5月中旬，美军攻占了这座岛屿，使菲律宾处在远程空中进攻的范围之内。作为回应，日本人决定派遣舰队进攻暴露在比亚克岛上的美军部队。形势突出了美国分隔攻击所包含的高风险性。但就在日本将要行动的时候，尼米兹进攻了马里亚纳群岛中的塞班岛，控制了这座岛屿，这就意味着把霍姆群岛置于美国空军的活动范围之内。

面对顽强的抵抗，占领塞班岛不是件轻松容易的事情：美国陆军和海军承受了不少于1.4万人的损失。当战斗在塞班岛上继续进行时，日本海军攻击了马里亚纳群岛而非比亚克岛，一场被美国人称为"伟人的火鸡活靶射击比赛"的大规模空战紧接着发生了。美国空军设法击沉了三艘敌军运输舰和三倍于这一数量的潜水艇，而最重要的后果是美军用微小的损失换取了日本海上空军的灭亡。对比亚克岛和塞班岛的占领，使美国处在了进攻菲律宾的有利位置。

山下奉文将军（1885～1946年）。因日本海军（不在山下奉文的指挥之下）在马尼拉所犯下的罪行，1946年美国军事占领当局绞死了山下奉文。有人怀疑对他的判决是因他对在马来亚和菲律宾的上司的工作不满，这与他的征服者形成了鲜明对比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此刻即使美国人不再为战争的剩余部分做什么，日本人也已经失败了。最初因出毛病的鱼雷和虚弱的领导能力而受到阻碍的美国潜水艇，最终进入了高速档。因为日本没有为防止海上交通线受到攻击而做任何准备，所以在大量"咒语"情报的帮助下，1943年末，美国潜水艇袭击了日本的海上贸易。战斗结束时，美军击沉了日本国际贸易商业船队的半数船只和2/3的油轮。来自荷属东印度的石油运输停止了，而输送到霍姆群岛的原材料的运输也减成了涓涓细流。

10月，麦克阿瑟和尼米兹进攻了菲律宾。当步兵在莱特岛登陆时，日本人又一次出击了。他们的舰队选取了三条不相连的路线。运输舰队从北边攻击——事实上，因为在马里亚纳群岛的损失，其甲板上已没有飞机——以转移美国主力舰的注意力。同时，在主力舰猛冲过圣贝纳迪诺海峡进攻离开莱特岛的入侵舰时，两支小型特遣部队将穿越苏里高海峡。计划几乎取得了预期效果。当美国老字号的战列舰（几只在珍珠港事件中受到破坏、被修理后再次浮起的军舰）在苏里高海峡摧毁了日本

舰队时，美国人咬上了诱饵，跟在敌人的运输舰后面向北追去。日军的主力在最初失手于美国的航空母舰和潜水艇后，在穿越圣贝纳迪诺海峡时撞上了由担任护送任务的航空母舰和驱逐舰组成的一支战斗力量较弱的海上部队。这支在数量上少于敌人、档次上低于敌人的队伍进行了一场英勇的自卫战，终于使日本的舰队司令置上司要求其进攻的命令于不顾，被迫撤退。美国此次胜利，终结了日本海军进行大型海上战斗的能力。

然而日本人仍没有放弃战斗。直到1945年5月，日本还占领着缅甸。然而也就在此时，斯里姆率领的英联邦军队收复了仰光。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征服者山下奉文将军的娴熟指挥下，日本在保卫菲律宾岛屿时比1942年的麦克阿瑟做得稍微好一些。他们在那里一直抵抗到战争结束。不过，1945年初，群岛的战略位置已在美国人的掌握中了。1944年秋天，以马里亚纳群岛做基地的B－29S轰炸机开始了针对霍姆群岛的军事行动。为了给受伤的轰炸机提供紧急起落场地，也为了夺取日本人的雷达装置，1945年2月美国海军陆战队进攻了硫磺岛。应海军陆战队要求，初步轰击应进行10天但实际仅进行了4天，这使大多数日本的防御工事没有被摧毁。两个海军陆战师以大量鲜血作代价从日本人手中夺取了硫磺岛的火山灰和碎石块。战斗结束时，6821名海军陆战队员阵亡，近2万人受伤，2.1万名日军守岛部队也极少幸免于难。

缅甸战役

陆军元帅斯里姆子爵（右边，1891～1970年）也许是二战中惟一一位声望还保持得完好无损的总司令。斯里姆来自地位较低的中产阶级家庭，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几乎不会成为一名军官。但是他在1914年自愿服役，很快得到了委任状并且表现卓越，接着被调到驻印度的军队。

二战爆发至1942年到达缅甸之前，他在东非和中东的印度军队服役。在缅甸，他使英联邦军队相对完好地撤离出来并到达印度地区。因为缅甸战场被盟国战略家们看作一潭死水，斯里姆的第14军只得到了极少的支援，但在开始收复缅甸之前，他利用时机对军队进行了适应丛林作战条件的再训练。1944年日军率先采取行动。在英帕尔自卫战中，斯里姆的军队先是击败日军，接着一路追击到仰光——这是二战中由英国将军指挥的最成功的开拓性战役。

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硫磺岛布满战争痕迹、怪诞的景色中穿越前进。像冲绳岛的成功战斗一样，在硫磺岛的战斗中看不到慈悲和宽恕：海军陆战队战斗着，直到日军无人生还，直到自己人的大多数或者死亡或者伤残。如果1945年11月盟国部队登上了九州岛、冲绳岛和硫磺岛的惨剧将会重演

接下来便是冲绳岛战役。在那里，美军第一次撞上了阵势比一个师还要大的日本部队：一支7万人的日军驻守在岛屿南部准备就绪的阵地上。4月1日，美军开始派遣陆军和海军。4月6日，日本人用“神风自杀飞机”的突然猛攻做了回答。这些飞机装满了炸药，担负着进攻美军目标的飞行任务。4月6日进攻美国舰队的飞机虽然只有700架，但半数以上是自杀飞机。攻击贯穿了整个美军的入侵过程。神风自杀飞机击沉了30艘舰艇，破坏了另外368艘，使5000名美国水兵阵亡，另外还有5000名受伤。征服冲绳岛的战斗是太平洋战争中美军伤亡最惨重的一次。如一位疲倦的海军陆战队士兵所指责的：“他们派你去一个地方……把你送进地狱……但他们又立刻把你撤了回来，跟着你便遭到杀戮。上帝呀，你留在那儿直到被杀死，否则你再也忍受不了。”最后，美军消灭了全部7万日军，这期间10万多平民直接或间接地死于战火。

投下第一枚原子弹

占领冲绳岛使美国人付出了65631人的伤亡代价——一个对霍姆群岛的攻击可能已包括的可怕预见应验了。到此时为止，美军和日军已在小环礁和其它岛屿上打了一场恶仗，这些环礁和岛屿限制了参战部队的数量，但在即将到来的入侵日本本土的战斗中，美国动用地面部队的全部力量与被集中的日本军队进行了接触，美军高级指挥部选择了1945年11月1日作为入侵日本的“奥林匹克军事行动计划”的实施日：它将包括对九州岛的一次大规模进攻，其作战规模大约是原先预定的两倍。然而，不同于诺曼底的德国人，日本希望美国人准确地在战斗发生的地点登陆。如一位参谋在战后证实的：

1945年8月9日，在长崎上空巨大的蘑菇云下面，2.5万人丧生。使用原子弹所造成的恐怖将给20世纪的剩余部分投下阴影，但也有助于消除苏联和美国之间灭绝性的冲突

> 我们期待着盟军对南部九州的入侵和稍后对东京平原的入侵。全部陆、海、空军都已自愿参加了全力以赴的神风自杀飞机防卫战，每一支队伍都拥有4000～5000架飞机……我们计划以每小时一批的速度派出[illegible]至[illegible]批。根据莱特岛和冲绳岛的经验，我们希望4架中能有1架击中目标。

“奥林匹克计划”旨在使美国和日本都遭到同等程度的伤亡。

但“奥林匹克计划”却未实施，这是科学发展的结果。在1945年春天之前，美国对日本的战略轰炸计划收效甚微，因为精确的轰击根本就触及不到霍姆群岛分散的队伍。不过，之后B-29轰炸机还是开始了地区轰炸——轰炸指挥部——作为欧洲成功标志的重复工作。3月8日夜，B-29轰炸机使东京大部分市区在爆炸引起的大火中被摧毁；到早晨时，8.3万日本人死亡，4.1万多人受伤。美军紧接着推进，一个接一个地摧毁了日本其它重要城市。到了夏天，日本整个成了孤岛，它的舰队被击沉，空军几乎瓦解，工业陷于瘫痪。但日本的最高指挥部还是对结束战争极少显示出兴趣，它宁可使自己的军官和士兵们光荣地死去。

8月6日，3架B－29轰炸机盘旋在广岛上空，其中一架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在比太阳还耀眼的火焰中9万人死去；两天后，苏联红军打破了1941年的互不侵犯条约，像波涛一样漫过满洲边境，突破了日军防线；紧接着，在8月9日，又一颗原子弹在长崎爆炸，3.5万日本人丧生。此时天皇开始干预政治进程，解决其幕僚间相持不下的僵局。他提出全面投降，这是一个需要极大勇气的决定，几个星期中形势变得一触即发，无论是否是军人，特别是下级军官，都应遵从他的命令。最后，他们终于遵从了。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在密苏里号战舰上签署了投降协定。战争结束了，日本像德国一样处于盟国的占领中。

339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把地球撕成了两半，并以各种形式实质上把每一半的每一个人卷进战争。它结束的时候，杀死了好几亿人，在实质上破坏了欧洲每一座重要城市，劫掠了中国和日本，并且造成了大规模移民、极大的痛苦和无限制的杀戮。胜利能偿付财富、生命及被破坏的损失吗？

也许只有通过观看倒过来的电影剧本——从无条件投降到与战争作斗争的选择——个人才能够判断对胜利进行估量的标准。轴心国胜利或者轴心国力量幸存的后果，解释了为什么盟国感到必须把战争进行到底。意大利的罪行录（对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利比亚等）或者日本的罪行录（对中国、朝鲜等），说明了在不受和平时期公约约束或没有战争压力的世界中，这两个强国将会做些什么。至于德国，不只它的罪行录，而且它的沿用生物种族科学再造大陆的狂妄欲望，都预示了一旦他们成功将会出现一个怎样的世界。如同1940年6月丘吉尔在号召英国人抵抗到底所做的演讲中所警告的那样：“如果我们失败了，那么整个世界，包括美国，包括所有我们关心的，将会陷入更为凶险但也许受到被曲解的科学之光保护的新的黑暗时代。”事实就是这样。这种图像解释了盟国为什么要坚持敌人的无条件投降，为什么又一心一意地对其加以保护。

第十七章 战后世界

340

日本外相重光葵在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签署投降书的仪式上。在场的有日本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将军和日本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吸取一战的教训(当时只有德国的政治首领签字)，1945年的胜利者确保了德、日两国的军事外交首领也在正式文件上签署投降声明

冷战时代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并不稳定的45年和平时期。随着轴心国的崩溃瓦解，出现了两个超级大国对世界霸权的争夺，其政府形式代表了两种差异巨大的政治经济体制。在其它任何一个时期，这样的差异和相互猜测都可能导致又一次世界大战，但因整个竞争过程处于具有毁坏性能力的原子武器的阴影中，所以最终任何一方也不敢直接向对方进行军事挑衅。广岛事件后有人预言原子武器的威胁会消灭战争本身，从美国和苏联彼此从未直接介入战争这个意义来看，他们是对的。不过战争还是发生了，尽管其中大部分反映了作为世界大战后果之一的西方殖民帝国的崩溃，但美国和苏联都插手了这些冲突，毕竟这里存在着超级大国的重要利益。回顾过去，冷战极大的讽刺之一是它带来了一段空前的稳定时期，其间，竞争者阻止了彼此间相互的颠覆活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标志着科学技术作为战争主导因素的时代的到来。战略核武器运用技术的异乎寻常的发展，反映了战后相互对立的双方在其业已显示出来的能力上的一种总的变化。不过，正如越南战争所特别表明的，技术不可能独自补偿政策、战略以至战术上的失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代最终造成了19世纪业已形成的殖民帝国的崩溃。尽管欧洲对东南亚的控制是通过大量昂贵的战争得以加强的，但欧洲武装部队在日本人手中蒙受的耻辱还是破坏了控制的合法性。一旦解放的浪潮席卷亚洲，非洲也跟随而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

当日本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舰上投降时，谁都没法预料美国要插手西半球以外的事务多久。战争期间，罗斯福曾向斯大林提出，战争结束后，美国部队留在欧洲的时间不会超过3个年头。1920年美国逃避责任的行径无疑使它对欧洲承担义务的长期承诺没做什么贡献。但不管怎样，1945年美国凭其经济实力甚至比一战后更强地控制了世界，因为只有西半球未遭受过现代武器造成的毁灭性灾难。轴心国与盟国部队结束了跨越满目疮痍的大地所进行的来来回回的战斗，中部欧洲的幸存者已精疲力尽，与此同时，联合轰炸也已经彻底毁坏了德国。法国因维希政府和被占领的经历，尤其是饱受战火摧残而四分五裂，笼罩在阴影之中。而英国则几乎不能恢复自身世界强国的地位；印度——英帝国皇冠上的宝石，正站在独立的边缘。

341

在东方，苏联已显示了对纳粹德国意识形态领域战争的胜利，但胜利的代价是难以想象的：大约有2500多万苏联士兵和平民丧生。从斯大林的观点看，更严

重的是经济损失打击了苏联经济。当苏联已获益成为一个大帝国时，这场以进步（在纳粹非法利用战争四年之后才开始）为标志的战争几乎没给东欧带来任何经济益处。联军的空中进攻也把日本带到饥饿的边缘；到1945年夏，美国已把日本的城市和工业变成了冒烟的废墟；击沉了日本的商业舰队，使日本的经济退至维持生存的水平。不过，日本也使中国从南至北遭到破坏，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沦亡中开始为被蹂躏的祖国的生存而战。

1950年7月14日，陆军上将、联合国在朝鲜部队的总司令麦克阿瑟接过了科林斯将军交给他的联合国国旗，旗帜象征着麦克阿瑟将带领多国军队在朝鲜半岛上打退北朝鲜的进攻

作为新总统，杜鲁门和他的顾问们于1945年全面研究了世界形势，承认了1920年美国撤退所造成的损害。虽然一些人意识到了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的威胁，但大多数人希望与苏联和睦相处，所以，二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最初措施是将对冲突的准备与和解的努力结合在一起的。美国人提出把援助西欧复兴的马歇尔计划延伸至苏联和东欧——这一提议被苏联考虑但加以拒绝，原因是苏联害怕美国窥视的目光会发现其被削弱的经济的弱点。另一方面，当经济虚弱迫使英国撤退时，美国于1947年将其武装部队派到了希腊和土耳其。这段时期内更具重要意义的是美国于1949年发起组织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它标志着美国将对西欧承担军事和政治上的持久义务。

不过，美国仍然希望他们拥有的核武器能使自己廉价地继续承担责任，直到1950年夏，美国才将常规军减至最小规模。如果没有朝鲜战争，军事力量的削减可能会使美国最终取消对欧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所做的承诺。但战争爆发了，它激励美国为保持核优势和保护西欧而做出一番重大的重整军备的努力。朝鲜战争（公元1950~1951年）的第一年，杜鲁门政府征召了58.5万人入伍，召回了80.6万名后备军人和国民警卫队队员。回首往昔，看来美国人高估了苏联的能力和动机，但在那时，苏联人——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无疑从各方面表明他们代表着对西方价值的直接挑战。

所以从20世纪40年代晚期起，美国的外交政策即以在其所控制的领域内遏制苏联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共产主义世界为目的。这种政策导致美国在亚洲的两次战争和为保卫欧洲而动用了相当数量的军队，以及为核武器、常规武器和传送系统升级所需要的日益复杂的技术支付巨大开支。尽管随着20世纪60年代中期北极星号潜水艇的出现，海军在遏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冷战的大多数时候，

1951年红场：苏联武装部队庆祝十月革命周年纪念。20世纪80年代，关于中央情报局对苏联军事开支的估计是精确还是过高的问题，引起了大量争论。现在清楚了，这种估计是精确的，但中央情报局对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估计却大大过高。实际上，苏联的防御开支导致其经济系统无法正常运转，最终致使自己崩溃和破产

美国还是依靠空军来遏制苏联的。

结果，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空军的注意力还保留在核任务上。无可否认，对任务重要性的强调达到了遏制苏联的目的，但也结束了空军内部的严肃思考，即空军不断改变的技术能力怎样才能在常规冲突中影响军事平衡。大多数空军军官认为他们的职责是遏制，如果他们失败了，战争就会变成简单地投下大量核武器的事务。20世纪60年代的一句格言描绘了这种心态："用核武器攻击他们，直到他们在黑暗中燃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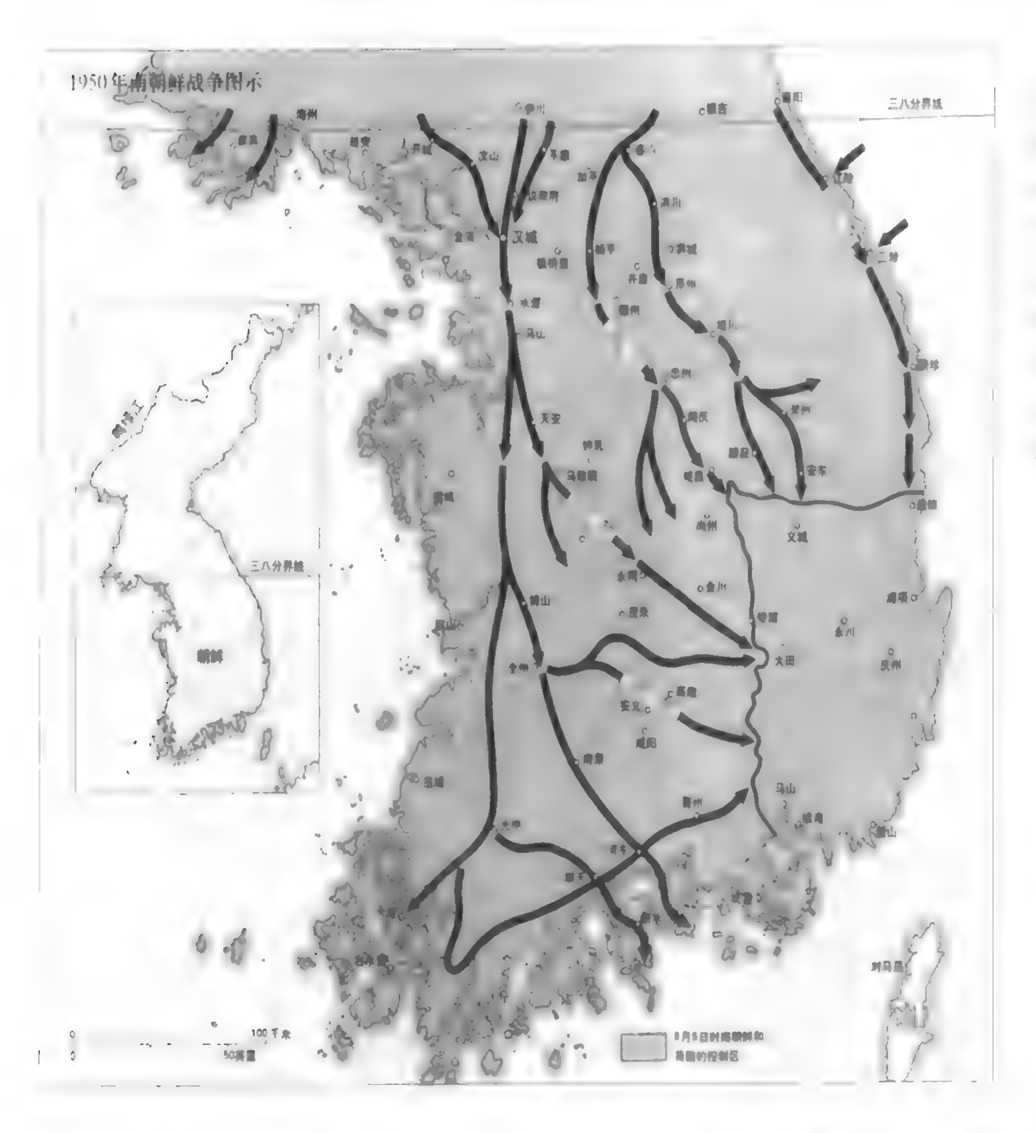
为增强自己的军事积累而由美国发动的技术革命已对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微型核武器到喷气式飞机、弹道导弹，到以难以置信的精确度击中目标的巡航导弹，美国的技术发展到了巅峰。这类技术革命并不总是让民用经济承担费用的。20世纪80年代的计算机革命就完全源于空间和军事发展方案所要求的微型化成果。但对苏联来说，技术革命证明是一场恶梦，因为技术革命没有任何方面增强中央计划经济的实力。整个冷战时代，苏联工厂虽然生产出了数以万计的坦克、大炮部件、装甲运载工具，以至喷气式飞机，但问题在于，技术日益影响着地面武器能力的发挥，这使地面武器大量报废。1991年的海湾战争表现了苏联在竞争中被拉下的距离，而且在诸如核潜艇、导引导弹和建立空间基地的能力等复杂领域内，为赶上美国而展开的竞争最终搞垮了苏联的士气和经济。

朝鲜战争

由于苏联和美国领导人在1945年未经考虑便决定解除在朝鲜投降的日本军队的武装，因此导致朝鲜半岛上出现了两个独立的政权：北方，在敌视外族的民族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者的共产主义基础上建立了以金日城为领导的政权；南方，李承晚建立了像北方一样仇视外族但没有共产主义的独裁政权。20世纪50年代初，当美国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处在最低水平时，南方在经济和政治上都陷入困境，共产主义者的游击队陶醉于某些成功。由于美国的声明使苏联产生错误判断，斯大林允许了金日成入侵南方，这是苏联独裁者所犯的最糟糕的错误之一。

343

1950年6月，北朝鲜军队打败了一些装备差的南朝鲜军队，紧跟着，开始了纯化南朝鲜未经妥善调整的阶级结构的残忍工作。共产主义的野蛮使南朝鲜团结在其政权周围，同时消灭了几代朝鲜人获得和平统一的一切机会。入侵也带来了美国的一个意料之外的反应：杜鲁门总统动用了美国军队去保卫南朝鲜。杜鲁门的行动如此令人意外，以致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联合抵制会议中，苏联没有参加关



1950年北朝鲜军队进入南朝鲜的路线图示：因苏联慷慨供给的包括坦克在内的装备，北朝鲜军队相对于它的南方敌人拥有巨大的优势。金日成的军队迅速击溃了南朝鲜军队和最初到达的美军，但美国的火力和南朝鲜的抗击使北朝鲜军队停留在了釜山港周围的环形防御地带。

于朝鲜问题的辩论，结果，美国人能够在联合国旗帜的掩护下实施了对南朝鲜的援救工作。麦克阿瑟将军匆忙地从日本将他的训练不精、准备不充分的守备队带到朝鲜，得到的是一系列耻辱的失败。到8月份，北朝鲜已把美军和剩余的南朝鲜军队赶至东南部釜山港周围一小块环形防御地带。在那儿，由于美军的凶猛火力和空中优势使进攻者所付出的惨重代价，以及对贯穿整个半岛的供应线进行的封锁，防线才得以稳固。

当残酷的战斗包围了釜山港时，麦克阿瑟添上了他辉煌成就的绝妙一笔：一面有节制地使用增援部队，一面于1950年9月派出海陆联合部队在仁川登陆。仁川的潮汐条件意味着登陆计划将是一场恶梦，而且麦克阿瑟的军事顾问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也都反对这次行动。然而，麦克阿瑟还是对了。北朝鲜没有准备，仁川陷落，紧跟着是汉城。随着连接北朝鲜供应线的南朝鲜首都的被占领，釜山周围的敌人阵地全线崩溃。那些没被抓做俘虏的人混乱地逃往北朝鲜。

对于美国人来说，问题是接下来做什么。战争初期，麦克阿瑟就主张重新武装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以便把他们送回1949年共产主义者将其赶出的大陆。杜鲁门响亮地回答说“不”。随着仁川胜利的到来，麦克阿瑟极力主张追过三八线进入北朝鲜，这点杜鲁门同意了。但麦克阿瑟高傲的个性使他没有重视共产党中国的警告，中国不会允许美国向中朝边界鸭绿江推进。美国人通过两个分离开的猛攻

美国海军陆战队穿过北朝鲜的多山地区撤退时，试图在零下气温中沿着冰封的小路休息。1950年12月朝鲜战争中中国地面部队的大规模干涉使美国正向鸭绿江挺进的先头部队处于巨大的危险之中。一度，在北朝鲜东边的海军和陆军被包围，但他们最终携带死伤人员冲出了包围圈

来继续他们对北朝鲜的推进。晚秋时节，中国终于出面干涉。在中国的进攻下，一部分美军溃败了：在西部，军队不管先后地退到南方；在东部，海军陆战队官兵与随同的陆军士兵突破了中国军队的包围，在英雄般的撤退中阵亡。而因结束了与日本人的多年战争而感到生活甜蜜的、正在前进中的中国人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忍受着最低限度的后勤供应所带来的巨大困难，迅速地越过北朝鲜的多山地带，活动在联合国军队封锁的阵地周围，并最后突破了封锁线。

在中国军队推进到汉城南部的时候，麦克阿瑟提出了两个极端建议：实施核进攻或放弃朝鲜半岛。隔膜在杜鲁门和他的将军间增长着，这当然不令人感到奇怪。身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布莱德雷着重提到麦克阿瑟关于要美国发动一场全面对华战争的建议：这将是场"发生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并同错误的敌人进行的错误的战争"。

1951年6月初，当联合国军队因二战中美国最优秀的作战将军李奇微的指挥解决了严重的士气问题，并发展了侧重以火力来对付中国军队的大规模进攻的战术时，汉城南部的局势得以稳定。此时，中国军队漫长的供应线受到猛烈的空中轰炸，随之，李奇微的军队开始反攻，不久他们收回了汉城。4月，共产主义者试图再度夺回因南朝鲜首都的丢失而丧失的一切，这次联合国军队不仅没有溃散，相反，在中国军队精疲力尽之后重新开始了反攻。面对美国人的火力，共产主义者记下了骇人的死伤人数，并且看来已处于崩溃的边缘。他们呼吁谈判，无疑暗示着自己所处的困境。但接着美国人便犯了冷战中最严重的错误之一：同意停止前进并开始和谈。当然，开始谈判没什么错误，但美国军队暂停前进却给了对方重新部署的时机，从而也就结束了其停战的需求。

美国要尽快回到和谈桌上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首先，4月份杜鲁门发现必须将麦克阿瑟将军免职，因为他坚持美国应遵循"亚洲第一"的战略——这会把战争引至中国大陆。由于对总统有异议，麦克阿瑟别无选择地离开了杜鲁门。杜鲁门同他的顾问都认为朝鲜只是苏联和美国大范围地缘政治竞争棋盘上的一个小卒；他们主要[illegible]朝鲜，是因为他们要专注于他们认为是冷战关键场所的西欧。

毫无疑问，1951年夏天，无论美国还是中国都不想再看到战争持续下去，但[illegible]美国带来相当大的负担。因此，和谈拖了两

年多，其间类似一战以堑壕作为前线的杀戮还在继续着。出于战略考虑，当空军强大的空中封锁成功地将中国对其地面部队的供应限制在只够维持的程度时，美国人一直没有增加足够的兵力去打破相持状态。相持使西方用火力同中国革命军队的主力相拼杀。

在整个朝鲜战争中，无论是以地面为基地的炮兵、空军，还是海军的炮火，联军在火力上都拥有巨大的优势。此刻，也就是1951年11月28日，英国皇家海军舰艇"贝尔法斯特号"上的六英寸口径的大炮摧毁了北朝鲜的岸上目标

如麦克阿瑟在辞职时所说的："没有什么可以替代胜利。"战争的漫长和缺乏结果使杜鲁门在美国大失人心。1952年11月艾森豪威尔当选为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竞选胜利不仅是因为他的声望，而且也因为他结束漫长战争的允诺。他使共产主义者明白，除非为和平采取实际行动，否则他可能会考虑使用核武器。斯大林在3月初逝世后，苏联新的领导人没有同他一样无情地旁观战争自动升级，加之危机又正在苏联国内酝酿，这一切决定了1953年夏停战协定的最终签署。

回顾以往，朝鲜战争是冷战的重要转折点，它把美国及其全部潜能又带回到竞争中来，使东亚的局势得以稳定。但由于美国把财力大量地投入到战争之中，日本开始逐步上升为经济超级大国。同时朝鲜战争也在美国创造了一种氛围，使运用常规部队保卫西欧的允诺成为可能。当然，朝鲜战争还是在美国煽起了反对共产主义的巫士们搜寻的激情，并且消除了可能使美国与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取得实质性和解的一切可能性。

346

三十年战争：越南，第一部分

19世纪法国扩展到了他们误认为是印度支那的地区，那里拥有三个不同的民族：老挝、柬埔寨、越南。

20世纪早些时候，法国在越南的教育正培养出一批准备根据自己的条件向法国挑战的贪婪的民族主义者，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一位最终决定以胡志明为笔名的越南人，他发动了一场先是摔败法国人后来又摔败美国人的革命运动。年轻时，他动身前往欧洲并在那里成为法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在20世纪20～30年代，通过为莫斯科的第三国际和后来为中国共产党工作，他继续自己的教育。但无论他的政治事业和他的位置怎样，胡志明始终是一个热烈的越南民族主义者。

1945年3月，日本人消灭了法国军事和殖民力量在越南的最后残余。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法国逐渐走向失败时，美国人拒绝对其提供任何帮助。6个月后日本投降了：由于法国人正从被占领状态中恢复过来，没准备好卷土重来，所以在英国人进入南部解除战败部队的武装时，中国民族主义军队占领了北方。这个空当儿，惟一遵守纪律的当地军队就是胡志明的那些队伍，即越盟。开始，法国人承认了胡志明政权，但新的第四共和国却无法使它的政治决议生效。鉴于胡志明不肯让步，在越南的法国指挥官们便命令军队投入重建法国统治的战斗中，战争

3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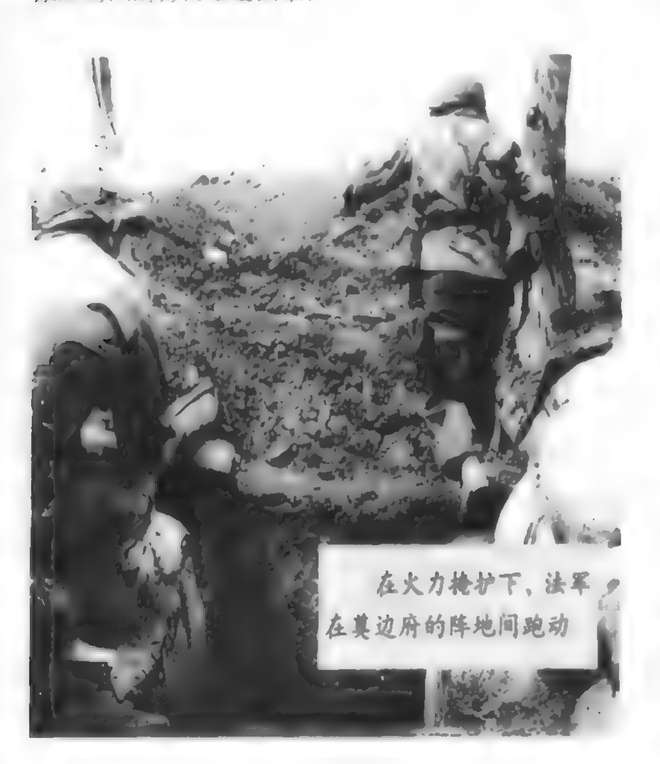
成了惟一的结果。法国人迅速重新确立了对城市的控制，不过越南人的抵抗并没有瓦解：大量的越盟游击队员成功地控制了乡村，并且发动了一场针对法军的残忍的游击战争。1949年共产主义者在中国的胜利改变了均衡状态。他们的领导人毛泽东给越盟提供了大量武器和培训方法。1950年10月，胡志明的军队沿前线给法军以一系列毁灭性打击，法国在北部越南的地位土崩瓦解了。

至此为止，美国对法国人想在东南亚重建殖民地的企图采取了明确的敌对态度，但随着朝鲜战争的进行，美国却又为法国提供了足以在红河谷进行抵抗的大量军事援助。1951年初，曾作过历史教师而在当时是胡志明军队司令官的武元甲指挥越盟部队对法国进行猛烈攻击。法军占压倒之势的火力和一流的领导能力给了武元甲和他的指挥官们一个严厉的教训：他们不可能在野外击败对手。

战争因此进入僵局。越南人控制了——尤其是在夜晚——红河谷周围地区和这个国家其余大部分地区的乡村。法国人扫荡了他们的火力和训练方法占优势的野外地区，以捕获并消灭那里的游击队。但他们的行动大多数落空：越盟只在对己有利的时候作战。尽管发动攻击的损失使战争在法国越来越不得人心，僵局还是持续了同朝鲜战争一样长的时间。1953年朝鲜战争的结束，使中国有能力向越盟提供更多的援助。为了抢先行动并阻止正在恶化的局势，法国人为武元甲在陷

奠边府战斗

到1953年末，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处境显示出严重恶化的迹象，朝鲜停战协定使中国和苏联对越盟的援助大大加强，而法国人通过发动突然袭击进入敌人领土以打败越南人的努力惨遭失败。



在火力掩护下，法军在奠边府的阵地间跑动

就在这个时候，法国人决定采用一个风险较大的行动计划，他们将派出空降部队发动一次重大袭击，占领位于通往老挝的供应线上的奠边府。法国的最高指挥部决定孤注一掷：因为，首先他们能够诱惑越南领导人派出主要兵力到城镇附近地区；其次，法军在火力、纪律和训练上的优势使防御部队能够大批地消灭进攻者（如同1951年沿红河的战斗中发生的那样）。

但法国人的推测存有危险的缝隙。首先，北部越南人证明他们能够布置比法国人预料的多得多的兵力和火力。其次，在延长了的战斗过程中，越南人能够满足这些部队的需求。1954年3月，当越盟的精锐部队猛攻保卫着奠边府特别是保卫着奠边府机场的边远阵地时，战斗开始了。借助位于高地上的炮兵，越盟拥有了一幅奠边府的鸟瞰图；几乎是瞬间，飞机场变得无用了。结果，法国的空军既不能压制越盟的榴弹炮，也无法封锁越盟的供应线。而越盟的步兵，如同十年后同美国人所发现的那样，残忍、训练有素而且遵守纪律。

尽管形势无望，但直到最后一天，法国伞兵还是继续在被包围地区内降落。虽然戍守部队的大部分作战都非常勇敢，但到5月份为止，越盟已占领整个阵地，法国人既失去了战争又失去了殖民地。

阱上设了一个诱饵：他们计划把越盟拉入一场法军火力可以发挥优势的战争中。1953年末，一场空降突击占领了奠边府，法国人认为这个位置对武元甲的后勤具有重要意义，希望越盟能就此暴露实力以使法军的精锐部队给其以毁灭性打击。然而，法国人还是大大低估了对手的老练程度、奉献精神以及能力。1954年3月，武元甲发动了进攻。在炮兵控制了法军的主要阵地的情况下，越盟的进攻摧毁了奠边府外围防御工事。并且由于越盟很快使机场处于无用状态，空降供应变得异常困难。到4月初，形成只有美国的干涉才能使局势恢复正常的局面。

奠边府预定进攻发起日：1953年12月，法国伞兵在奠边府降落。法国的进攻出其不意地捕获了越盟成员，只有山谷中的极少数骨干分子跑掉，但令人惊奇的是，这种进攻没有持续多久（这就像打人耳光后手掌也会疼一样）。

在美国，政策辩论围绕战略消费、战略意义和战场可能带来的负担展开，最后决定不值得为使越南依旧作为法国的殖民地带来的好处而做出牺牲。所以，在奠边府及其守城部队逐渐被击败时，美国采取了观望态度。当奠边府注定了法国殖民主义在东南亚的命运时，美国的拒绝援助彻底破坏了美法关系。作为日内瓦和平协定（1954年6月签署）的结果，美国在南部越南建立了一个反共政权。但是甚至在该政权的领导者也承认他们的独立应归功于胡志明的越盟时，这样一个政权怎样生存下去，这是20世纪50年代未有答案的问题之一。

348

阿尔及利亚战争

事实证明，很少有人欢迎法国军队从他们在亚洲的失败中恢复过来。但与人们的愿望相反，法国又投入了另一场战争。1954年11月1日，阿尔及利亚的反叛者越过北非进攻法军阵地，发动了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开始，他们的袭击没有完全胜利，但却达到了煽起阿拉伯人反法情绪的重要目的。阿尔及利亚庞大的欧洲移民立场坚定，不愿改变阿尔及利亚作为法属殖民地的身份。这个事实使形势变得复杂。逐渐升级的游击队活动使法国面临着他们在越南遇到过的类似问题，不同的是阿尔及利亚还存在民族解放阵线对欧洲移民的攻击。这些问题使战争恶化并使其演变成一场民族主义同宗教之间的战争。

从亚洲回来的法国军官决心不再重复他们在越南所犯的错误。他们在对革命战争和敌人本质的理解上表现出一致性。但他们使阿尔及利亚人成为法国公民的欲望，却在法国的尤其是阿尔及利亚的政治现实面前消亡了。1956年是一个转折点，法国在战争中使用了新兵，这是他们在越南从未做过的。几乎紧接着，这些

毫无经验的队伍就陷入了困境。9月份，由于民族解放阵线直接攻击法国平民，城市也燃起了战火，同时，这加重了战争的费用和残暴程度。11月，英法针对苏伊士运河采取的军事行动的失败使法国的处境更见恶化，因为这次失败大大加深了法国军官们对其政治领导人的能力的担扰。

到1956年末，民族解放阵线控制了主要城市中的阿拉伯人居住区，而它的可怕攻击已使欧洲所属的阿尔及利亚实质上处于瘫痪状态。这时候，城市的安全也只能依靠警察了，军队仅对灾难深重的农村地区发生的战争负责。但随着城市的失控，法国当局动用了军队。1957年1月，马修将军的伞兵控制了阿尔及尔，一场反对民族解放阵线的、残忍而不受任何限制的战争立即开始了。马修，一位漠视黑人公民权，甚至用严刑拷打来对付民族解放阵线的将军，使用了预防性拘留、彻底搜索以及在阿尔及尔的旧闹市区进行连续巡罗等手段。这是一场最卑鄙的战争——在电影《阿尔及尔之战》中被加以描述——最后，它打垮了民族解放阵线，但它的方式对于改善阿尔及利亚人对法国统治的态度没起丝毫作用。更重要的是，严刑拷打的做法削弱了阿尔及利亚人对宗主国法国国内冲突的支持。法国当局证明自己无力解决阿尔及利亚引发的复杂问题。1958年4月15日，它垮台了。之后37天，没有一位政治家能够召集起一个替代政府。

349

由于巴黎缺乏政治领导，阿尔及利亚军队中的愤怒情绪顿时高涨，军官指责政客们的怯懦行为，拒绝错过又一场战争。于是，5月中旬，在军队的支持下，阿尔及尔的一伙暴徒攻占了政府建筑，并要求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法国流亡政府的领导人戴高乐将军接管名誉扫地的政府。1958年6月，戴高乐在巴黎走马上任。在这以后的四年中，他对阿尔及利亚推行了一项艰难的、常常充满矛盾的政策。不清楚是什么时候，他决定放弃战争。到1959年9月，戴高乐提出“民族自决”。

同时，戴高乐却又允许法军继续进行炫耀技术的战役。通过切断民族解放阵线与其在突尼斯和摩洛哥基地的联系以及老练地使用直升飞机和机动兵团，法军在战场上歼灭了敌人。然而，戴高乐不顾军事胜利，准备撤退。这使他不得不面对许多法国官员的反对，其中一些人走得如此之远以致加入了恐怖分子的组织——秘密军队组织——这个组织计划暗杀他。但戴高乐幸免于难，而且没发动内战便使法国摆脱了阿尔及利亚。将军们可以吹嘘说他们赢得了军事竞争的胜利，尽管这样说忽视了他们在政治斗争中失利的残酷现实。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

非常规战争：英国的经历

就在法国为两场不幸战争奋斗并均告失败的地方，英国相对安然地度过了非殖民主义的过程。大的挑战要算解放印度。印度是英国靠国内政治家的才能和当地负责稳定的军事领导的配合才征服的。当然，在其它地方英国也面临着严重的军事挑战。在一些挑战中英国赢得胜利，对于另一些他们则施以巧计。1948年2月，为结束英国的统治并建立共产主义专政，马来亚的共产主义者游击队发动了一次进展顺利的战役。在以后的四年中，他们充实了力量并且改善了自己的处境。但在1952年2月，由于几个有利于作战的因素，英国对造反者发动了一次有效的猛攻。马来亚主要有两个种族：马来人和中国人。共产主义者的援助几乎都从后

者手中获得。但是马来亚与共产主义国家没有边界，结果，造反者发现进口武器和军需品越来越困难。

英国承认叛乱是一个政治问题，在开始进行镇压游击队的战役时，他们宣布其目的是在不久的将来准许马来亚独立。这样，英国通过谨慎的非官方组织的行动，使中国人与马来人和游击队发生分裂，同时也鼓励了马来亚的民族主义。最后，军事工作便落到那些比敌人更熟悉丛林的战士身上。马来亚的游击战条件使英国重建了几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表现相当好的特殊兵团——特别是特种航空军团——它们进行非常规战争的能力，将为以后发生在肯尼亚、亚丁直至厄尔斯特和福克兰群岛冲突中的英国军队受益。1954年时，马来亚共产党的最高指挥部已撤至泰国，战争逐渐停止了。英国在政治方面，尤其是军事方面获得了斗争的胜利。

350

美国的直升飞机盘旋在越南稻田上空。直升飞机是美军处理"看不见"的游击队问题的答案。诚然，飞机带来了更大的机动性，特别是在迅速增援地面正在行动中的部队方面，这点体现得尤为突出。但结果是他们不仅难以防御敌人地面火力的攻击，而且还使得美国司令官们相信他们可以专注于军事行动而忽略与非常规战争相联系的政治和社会问题。

三十年战争：越南，第二部分

1954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他的顾问们拿定主意，认为越南不值得美国付出太多生命和财富，不过美国官僚主义使决定未能转变成政策，不彻底的折中政策使美国慢慢滑进财政困难的境地。

1954年的日内瓦和平协定在越南南部建立了一个吴庭艳领导的反共独裁政权，这个政权把法国殖民主义的最坏方面和官僚统治结合在一起。虽然乡村地区极少承认它的合法性，但是吴庭艳和他的内阁依旧坚决地献身于这一信念，即只有对政权忠诚才是真正重要的。由于直到1961年，西贡还在美国战略考虑中处于次要位置，来自美国官僚统治最低水平的军事顾问和民间顾问们——其中大多数既不了解法国人也不了解越南人——便以朝鲜做范例，无原则地左右政策，努力地工作，力图建立一支能打败常规入侵的常规部队。

这个时候，胡志明和他的支持者正努力在北方建设自己版本的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天堂，结果在红河谷的农民间激起了被他们极其残酷地镇压下去的反抗。随之在1959年，由于意识到吴庭艳的弱点，他们便发动了一场渗透性的、属于政治行动并为颠覆南部越南政权提供军事和后勤援助的战役，又动手修建了一条穿过老挝和柬埔寨的道路，后来美国称之为"胡志明小道"。吴庭艳政府对正在发生的一切几乎毫无察觉，而反抗这个不得人心政权的起义却迅速蔓延开来。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1961年肯尼迪当选为总统。肯尼迪宣布美国将为打败共产主义"不惜任何代价，甘愿承担任何负担"。越南南部的局势令人恐慌地发生分化。不过，美国的举措还是提供了更多相同的东西：更多的顾问、更多的常规军和更多的社会学"妙方"。

351

美国几乎没准备去迎接"越共"（对越盟的贬称）提出的挑战。高级指挥官和参谋们认为，美国军队受过训练——换句话说，就是为反对苏联的大规模常规战争或者核战争做了准备——能够应付东南亚崎岖地形中高度政治化的游击战争。但卷入战争的整个过程证明，他们无力吸取战争的教训。而一年期的服役体制加上普遍缺乏对越南文

美军正在穿越越南的灌木地带。为保持越南人民的精神和情绪并使美国人的注意力离开战斗，北部越南人设法对美军维持足够的压力。在山峦和丛林中，北越的正规军使美国所崇拜的技术和火力优势变得无用武之地

化和语言的了解，只能使此类弱点得到强化。

肯尼迪选拔了福特汽车公司的总裁来做国防部长。罗伯特·斯特朗格·麦克纳马拉给工作带来一种小心谨慎的估价思想和一个坚定的信念，即没有什么问题是系统分析法不能解决的。他相信在资金开支方面，国防部使政府部门受到高度责任感的制约。不过，他拥有一种完全不现实的愿望，想从防御分析报告尤其是战争行为中消除所有模棱两可的词句和令人难以预料的事物。在他的指导下，美国军队将完全在统计指数的基础上在越南作战：敌人死伤数目、战斗中军队协同作战的天数、投下的炸弹的吨数、通过港口的运载货物的吨数，清单看起来没完没了，所有的一切在判断战争进程的时候实质上毫无意义。然而麦克纳马拉还是强迫美国军事在他的思想框架内思考，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他对五角大楼的影响才开始减弱。从当政的第一天起到1963年11月被暗杀，肯尼迪对越南推行了一项积极而过分自信的政策，而且稳定地加大赌注。因为热衷于迎接胡志明的挑战，总统和他的顾问们低估了对手，高估了西贡联盟。就在美国的援助和顾问们大量涌入南部的时候，南部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变得更加暗淡。新闻记者强调形势的恶化，但咨询活动的指挥者保罗·哈金斯将军，用乐观的词语向华盛顿描述了战争，对新闻界轻蔑地不加理睬。到了1962年秋天，美国才最后承认吴庭艳是个失败者。美国撤退带来的威胁最终导致越南军队发动政变，军队推翻政权并暗杀了独裁者和他的兄弟。

但继承吴庭艳的将军组成的小团体比其前任更加无能，1964年夏，南方的抵抗瓦解了。美国新总统约翰逊几乎没有使美国卷入东南亚战争的欲望，但是他拒绝承认败在他称为“蚂蚁之国”的对手手里。1964年夏，他对北部越南的海军发动了连续的空袭，据推测这是对美国在东京湾的驱逐舰遭到攻击作出的反应。约翰逊和他的顾问们希望这类攻击将会说服北部越南人停下手来。然而胡和他的同事们并不打算罢休。如同他们告诉伯纳德·福尔——一位著名的西方越南问题专家——的那样，他们不害怕美国的武力，毕竟他们已打败了法国。虽然如此，约翰逊还是凭借将其对手——参议院议员巴里·戈德华特——描绘为战争贩子的政纲参加了又一轮总统竞选。约翰逊赢了，但正如一位选举者后来评论的那样：“我被告知，如果投票选举戈德华特，我就会赢得战争，我投了戈德华特一票，正是为了已经到来的战争。”

1965年初，约翰逊批准了代号为“滚雷”的对越轰炸计划。这场战役严格限定了美国飞机攻击的目标。现在看来，那时美国的任何行动都不可能迫使北部越南人停止对南部的战争，即使是美国军队拥有发动任何进攻的行动自由。“滚雷”战役是一次完全没有成功机会的、考虑不当的行动。由此，约翰逊直接把美国地面部队推到了为越南南部而战的境地。现在，战争的指挥权落到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身上。

威斯特摩兰和其他大多数美国军事领导者一样都轻视过去的经验。例如，1964年法国意识到美国会使自己日益卷入越南的冲突中，于是为美国政府提供了现成可用的他们在越南失败的事后研究资料。这个研究资料的法文原版还保存在

国防大学的机密资料室中。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五角大楼的高级军事人员或政治领导者研究过它。因此，美国军队重复法国军队所犯的每一个错误毫不奇怪。他们也拒绝学习。由于战术和实践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在德浪河谷战役中，包括第一空中骑兵师的一个营在内的美军在实施“奥尔巴尼着陆”计划时惨遭覆亡。威斯特摩兰还拒绝接受部队指挥官向对越军事援助指挥部提出“学习国外经验教训”，以剖析美国军队在战术和作战方面的不足的请求。取而代之，整个战争过程中，拥有重火力的美国军队在破碎的农村地区把一切都搞得一团糟。

威廉姆·威斯特摩兰。自从麦克莱伦以来，还没有一个将军在回忆录中如此彻底地谴责过自己。威斯特摩兰将军着重提道，在越南服务期间，他的床边一直放着：“一本《圣经》、一本《法语语法》、一本毛泽东关于游击战理论的小型红色著作、一本关于法国与越南战争的小说——《百人队长》、福尔·伯纳德博士的几部著作——关于法国在印度支那的经历，他的写作很具权威性，能洞察和了解敌人的思想和方法，通常我都累得只能在深夜偶尔翻翻这些书。”《百人队长》实际上是关于阿尔及利亚的一部小说，只有前几章涉及了法国人在越南的失败。但将军是一个生活在他自己世界中的人，他从未超出书中所写。这就使人们无从猜想他会从别人的著作中得到更多的东西

威斯特摩兰也对改革南部越南军队表现出极少的兴趣，至少到1967年，和解还在他的优先考虑之外。对越军事援助指挥部侧重要求美国部队设法找到、盯住然后消灭敌军主力部队，以完成搜索和破坏的任务。这实际阻止了军队参与乡村的政治战争。当海军陆战队指挥官为保卫本地区内的移民着手一项小规模的、非军事的行动计划时，对越军事援助指挥部对这一工作施加了严格限制。麦克纳马拉所钟爱的统计指数支配了美国的目标。重要的是部队作战的天数和与之相应的掺假的尸体统计数字，这种记分卡做法的后果之一，是美国士兵残杀越南农民的马来大屠杀，而对越军事援助指挥部紧跟着便掩盖了这次事件，直到它在美国新闻界引起轰动。

除了搜索和破坏的任务，美国人还扫荡了整个乡村地区，使越共和北部越南人得不到农民的援助，又将人口移交到缺少设备、资源，或对重新安居方案没有兴趣的政府手中。至于其它地方，自由射击区内美国的大炮和飞机破坏着陆地风景，用可怕的伤亡人数来惩罚平民尤其是敌人。这种方式甚至比法国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但美国人施展的可怕火力却使他们幻想着“军事胜利”。

美国公众对美国军队进入越南做出热烈反应。1964年夏，参议院以88对2的差数通过了“东京湾决议”，批准了对北部越南攻击目标的空袭。1965年10月，《时代》杂志在其以显著位置刊载的文章中刊登了为美军捧场的奉迎之词：

> 仅仅在三个月前，穿着黑色宽松裤、危险而又无足轻重的人们还在南部越南四处游荡，泰然地抢劫着、残害着、杀戮着……今天，南部越南的脉搏骄傲地、有力地跳动着，以不可思议的活力活跃在夏日林阴路的幽暗景色之中……这个战争中惹人注目的转变是战争史上最迅速、最宏大的军事发展的事例之一……一批又一批穿着战靴的美国人——瘦弱、精练并且渴望着战斗——从军队运输舰上涌向陆地，不分昼夜尖叫着的喷气式飞机和徘徊着的直升飞机从多沼泽地带的敌人据点中将他们找出来……当美国火力的利刃插入共产党抵抗力量的丛林中，一度骄傲的越共猎人已变成了畏缩的被追捕者。

约翰逊非常卖力地工作，以使战争在美国一直得人心。他拒绝召集国民警备队或后备队，政府通过征兵为战争提供躯体，但是却允许“最好的和最聪明的”人免于兵役。政府发布了豁免受过教育的上流社会的男性青年的命令，并审慎地保证，除非参加反战示威游行，否则豁免保持不变。战争的负担继续落在可怜的美

国黑人和白人的肩上。此外，约翰逊和麦克纳马拉还把美国军队从世界的其余地区撤出而投入到亚洲的战争中，这同杜鲁门在朝鲜战争中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照。

（越南）春节及其后来时期

不管怎样，美国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还是避开了1965~1966年南方的失败，把可怕的伤亡留给了对手。1967年，北部越南人以北部火力较弱的海军陆战队为目标，改变了直接军事对抗的战略。1968年，他们又一次改变策略，对越南南部城市发动了大规模猛烈而突然的袭击，即“春节攻势”。武元甲估计这样的军事行动会像1951年在红河谷的攻击一样，将导致广泛的民众起义和敌人的瓦解，但他错了。从军事意义上讲，“春节攻势”和它附属的军事行动可说是北部越南人和越共的灾难。南部越南军队作战顽强，这甚至令美国顾问都感到奇怪。乡村地区没有起来造反，美国的火力打垮了进攻者。当美国和它的同盟者消灭了南方所有在响应胡志明的号召时表明自己真实立场的共产主义支持者时，武元甲在整个1968年发动的连续攻击加重了其失败的程度，败势更为明显，代价也更为惨重。

354

然而，战争远不是由统计资料相加之和组成的。在政府没有为正发生的一切提供令人信服的战略或政治上的解释时，“春节攻势”的凶险已清楚地向美国人显示了冲突的严重性。约翰逊退出了总统竞选，并且结束了针对北方的空中战役，这个战役筹划得很不周密，进行得十分拙劣。威斯特摩兰像一张破裂的唱片，只知道要求更多的东西，直到被提升为军队的参谋总长并最后被调出西贡。

威斯特摩兰的接替者艾布拉姆斯将军，在设法赢得战争时表现出了更多的想像力和政治意识。现在对越军事援助指挥部开始强调战争越南化，越南军队得到更多的关心，也得到了武器和综合训练。但是这一切来得太晚了。国内压力已达到使美国不得不从越南撤军的地步。尽管如此，残暴的杀戮还是打击了北部越南人。1968年越共争取到了一些喘息的机会，尼克松新政府同北部越南人进行了公开的和秘密的谈判。不过，在撤出美国军队的同时，尼克松继续为南部越南提供着大量的军事和政治援助，并且实施了用以改善其军事处境的作战行动。例如，在1970年5

图为1967年经过五角大楼的越南战争的抗议者与军警对峙的场面。当约翰逊总统取消了研究生院应征入伍者的缓役规定时，克里穆森在1968年发表评论道：“联合国安理会的征召训令几乎把所有的大学四年级学生和多数研究生放在了明年应征入伍行列的前面，3/4的二年级法律系学生将离开学校加入战争……昨天的训令是有点不负责任的一时之计，对于明年秋天进入研究生院的学生明显不公平。”

355

月，美国人就发动了对柬埔寨的一次大规模入侵活动，力图破坏北部越南人的后勤基地。入侵达到了军事目的，但国内的一场政治抗议风暴却突出表明，美国民众急不可待地要求脱离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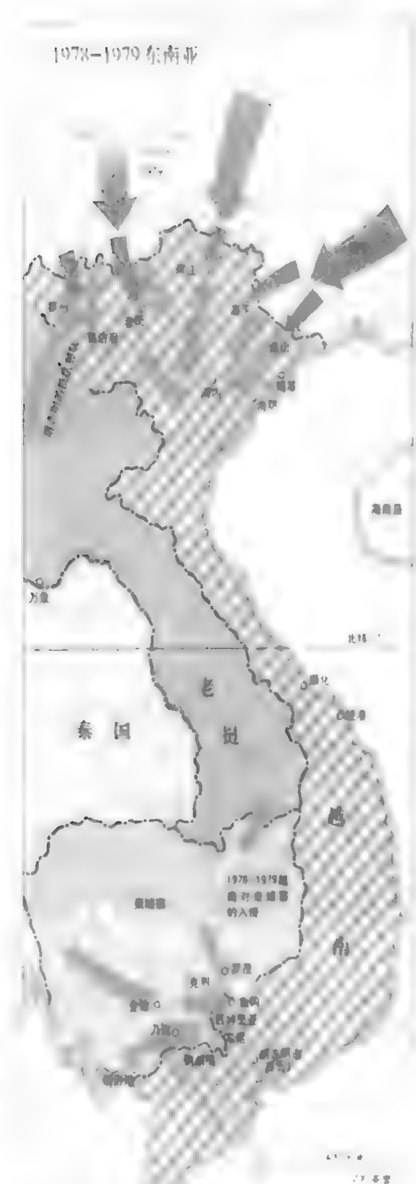
1972年，就在最后一批美国战斗部队撤离的同时，北部越南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常规进攻，力图彻底打败南部越南，他们的目的不只是要打败他们称作“走狗”的人，还要羞辱美国。他们又一次严重地判断失误：尼克松如此愤怒，以致命令其空军和海军又发动了一场针对北方的大规模空中战役。美国空军使正在前进中的北部越南人受到可怕的伤亡。装备了精确制导炸弹的美国战斗轰炸机破坏了北部越南的重要桥梁和大部分经济基础设施。

地面进攻的突然失败和家园大部分受到破坏的现实，使北部越南人回到谈判桌前。秋天，敌对双方终于苦心制定出一份使美国略有尊严地撤出的和平协定。但是，北部越南人再次试图通过在最后一刻退出协定来羞辱美国人。受自己获得1972年总统竞选压倒性胜利的鼓舞，尼克松又一次动用了美国空军。这一次甚至B−52轰炸机也参加了战斗。通盘考虑了国土被毁坏的情况后，北部越南人最后争

1968年初，一群北越军队的火箭在被孤立的溪山基地的美国海军物资堆放处爆炸。北部越南人显然希望，他们在奠边府对法国人所取得的一切也能够使用于美国在溪山的海军基地。然而，如同福尔（一位西方观察家）在1962年警告北部越南领导人的那样，美国拥有按指数加强的火力。结果，美国的空中进攻摧毁了正在进攻中的北部越南人的军队

356

运载着指向越盟阵地导弹的美国战斗轰炸机的最后检查情景(炸弹上标着"为了查利")。惊人的美国火力,使越共大片大片的丛林地带的景色变得像褐色的月球表面一样。大批越盟成员(绰号查利)被杀



1978~1979年的东南亚 1975年,被重新将越南统一于自己统治之下的成功所鼓舞,越南共产主义者又使自己卷入柬埔寨和老挝的事务中——实际上,是占领被他们看做低等民族的土地。然而中国从北方向它发动的重要攻击清楚地表明,他们的狂妄自大是不会一直无人挑战的

定主意:凭借其三流力量羞辱美国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

尽管如此,1973年的巴黎和约还是无助于结束越南战争。水门事件限制了尼克松支持南部越南的能力,同时,自以为是的国会吵吵嚷嚷,做了每一件可能削弱南部越南的事情。因此,1975年北部越南人对南部又发动了一次常规进攻,这次没有美国的补给品和空军帮助,南部越南瓦解了——尽管数以百万计的从"解放者"手中逃出的南部越南难民暗示了共产主义也许并不欣赏南方全体一致的支持。但美国1975年的表现却无疑代表着耻辱:中央情报局甚至没能毁掉它在西贡的情报档案,从而连累了几乎所有曾与美国合作过的南部越南人。

越南战争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是能让人清醒的经历。这是自1812年以来,美国第一次被对手击败。美国因不彻底的折中政策而陷在战争中挣扎。美国的军事或政治领导者从未着手做过严肃的关于对手或关于战争可能带来的政治或军事损失的战略估计。从一开始,美国军方就低估了其对手的思想信仰,麦克纳马拉及像他一样思考的人轻蔑地拒绝了这类无形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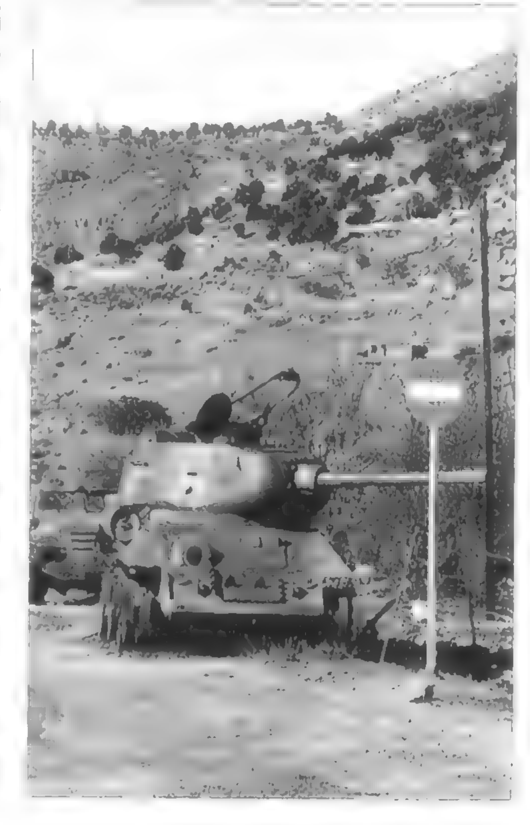
最后,美国勉强地使自己摆脱出来,但

是，美国人的价值观念和自尊心受到的损害是令人震惊的。与其相反，北部越南人达到了统一越南的目的。不过，达到目的的同时，他们也牺牲了本民族整整一代人的生命以至全民族的经济潜力。今天，当我们考虑到越南在台湾、日本、南韩、新加坡、马来亚和香港占支配地位的世界中是最贫穷的民族之一时，他们的胜利便是空洞无物的——应该感谢越南的不妥协政治理论体系和它所从事的狂热的民族解放战争。

阿拉伯—以色列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既允诺近东的阿拉伯人脱离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统治而独立，又许诺在巴勒斯坦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一个民族活动基地。超级大国的为数不多的决定已引起了更多的战争可能性。20世纪30年代，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这大部分是因为纳粹德国发生的惨痛事件——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引起了冲突。一位在二战特别军事行动中获得声望的默默无闻的英国上尉奥德·温盖特，在向犹太移居者提供新颖的战争方法时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二战期间犹太志愿者加入英国武装部队则进一步拓宽了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的军事知识。

1948年对立种族之间的战争处于回升时期，并且在双方都耗尽了资源、失去了耐心的时候，英国撤出了巴勒斯坦地区。联合国公布了两个社区的划分，但当地的阿拉伯人，尤其是邻近的阿拉伯民族拒绝这份和平协议，而且开始了反对新的以色列政府的军事行动。但是，在当地的阿拉伯人既缺少政治明智又缺少军事才能的情况下，阿拉伯人没法协同进攻。以色列从背后打乱了当地抵抗力量和入侵的军队，作为1948～1949年战争的一个结果，他们获得了联合国协议中原属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大部分领土。



一辆被毁坏的T-54叙利亚坦克和一辆装甲汽车躺在包因鄂斯村附近。在1967年6月“六日战争”结束，以色列彻底打败埃及人和约旦人之后，以色列转向了叙利亚。在也许是其军事优势最主动的展示中，以色列只在一天内便将令其烦恼的叙利亚人赶离了戈兰高地。叙利亚武装部队败得是如此惨重，就像以色列人所希望的那样，他们刚好被赶到大马士革

357

阿拉伯人没表现出要与新的以色列政府达成协议的愿望。相反，多数阿拉伯民族将他们那里的犹太少数民族驱逐到以色列，同时声称，他们的目标是消灭新政府和它的全体居民。因为曾有过遭受纳粹迫害的经历，犹太人不能淡然地接受这样的威胁。20世纪50年代初，当埃及因从苏联购进武器而被视为对以色列继续生存构成直接威胁时，犹太人面临着边境地区恐怖主义的高涨。

所以，1956年英国和法国邀请以色列参加反对刚刚单方占领苏伊士运河的埃及的军事行动时，以色列高兴地接受了。但以色列1956年军事行动的功效同英国和法国的比较起来，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由于使用了伞兵和装甲部队，以色列先是封锁了西奈半岛的米特拉要塞，接着又把埃及人打得落花流水。高水平的训练、教义的内聚力和心理上的坚定性，给以色列提供了非常有战斗力的军事系统。阿拉伯的军队征自划分阶层的阶级体制，缺少经过扎扎实实的基础训练的士兵和军官，因此无法在现代战场上对付以色列军队。

在一个星期之内，以色列已十分接近苏伊士运河，以致能观看到他们的欧洲同盟在运河区进攻埃及军队。但在这些军事行动的进

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中，一辆以色列的百人队长坦克正在向前行进。由于战争初期过度依赖坦克，以色列损失极大，尤其是在戈兰高地上。但是在战争末尾，以色列恢复了过来，并近于达到摧毁敌人军队的地步，当然代价是非常高的。阿拉伯军事上的成功，提供了双方进行谈判的政治基础。

358

行中，苏联和美国始终参与。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任何一种军事意义上都输掉了战争的埃及专政者纳赛尔，却在政治协定中获得了胜利——在整个中东他也声望雀起。作为埃及人准许他们通过蒂朗海峡的允诺的回报，以色列被迫将他们在西奈半岛的占领地交给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以后的11年中，纳赛尔舒适地享受着“苏伊士危机”所带来的荣耀，并企图把他的影响扩大到整个阿拉伯世界。他找到了苏联这个支持者和现代化军事装备的提供者。但在十年中，纳赛尔也意识到他的军队和以色列军队势均力敌的事实。

由于某些不清楚的原因，1967年中东和平破裂。5月，纳赛尔逐渐相信以色列将发动进攻，接着他便要求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离开西奈半岛，然后部署埃及军队进入这一地区，宣布封锁蒂朗海峡。约旦、叙利亚与埃及人联合了起来。多数军事分析家认为，犹太政府不太可能抵挡住阿拉伯的军事力量。当美国军队完全陷于越南问题的困境并放弃了它维持1956年协定的责任时，以色列人动员了军队。

1967年6月5日，以色列人发动了进攻。为了避免被发现，其战斗机进入地中海地区后又低空飞入埃及。以色列的战斗轰炸机在一系列清晨的袭击中破坏了埃及空军。随着敌人空军的灭亡，以色列空军开始支援地面部队。在埃及军队进入西奈半岛时，以色列军队截断了加沙地带。在西奈半岛，以色列又强行闯入、穿越并突破了埃及人的阵地，不断显示出其承受风险的惊人意志。尽管埃及人作战

勇敢，但还是没能适应以色列的推进速度。他们很快被打败。在埃及的坦克和车辆通过米特拉要塞逃向运河时，以色列空军执行了杀戮命令。四天之内，以色列已经到达了苏伊士运河，攻陷了整个西奈半岛。

以色列进攻埃及后不久，约旦加入了战争。同苏联一样，他们被埃及关于自己的空军摧毁了以色列的空军的宣传所迷惑，直到第三天，埃及失败的程度才变得清楚起来，但这太晚了。约旦人尝到了失败的滋味。战斗在耶路撒冷打响，以色列在那里部署了三个旅的兵力。在小规模的战斗中约旦人打得很好，但在军事行动的整体水平上，却无法与以色列相比。到6月7日，以色列已经控制了约旦河西岸。

随着埃及和约旦的失败，以色列开始转而对付叙利亚。此时，叙利亚已限定他们的军事行动是炮轰位于戈兰高地下的以色列移民拓居地。6月9日，以色列军队在重新部署之后进攻了高地。经过三天激烈的战斗，他们占领了戈兰高地及其背后地区，损失严重的叙利亚军队撤退到了大马士革。六天战争结束。不到一个

福克兰群岛战争

对英国外交部的一系列错误估计，使阿根廷的军事领导人相信他们能够可以免遭侵略，福克兰群岛可以免遭占领。这些领导人不仅相信英国不再有重获福克兰群岛的军事能力或欲望，而且认为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只不过是“妇女”中的一员。在这两方面，他们都犯了足以造成重大损失的错误。

尽管美国为调停做了大量努力，阿根廷人还是拒绝得到一条面包的3/4。英国人向南大西洋派出了“特遣部队”。阿根廷的舰队也出现了。英国的高级指挥部批准对阿根廷巡洋舰贝尔格拉诺号发动鱼雷攻击。这艘巡洋舰的沉没使阿根廷的海军从战争中消失。当英国军队在群岛登陆时，阿根廷对隐蔽在圣卡洛斯附近海域的英国船只发动了连续的空袭。阿根廷空军的损失同英国舰队的损失一样惨重，但撒切尔夫人依然态度坚决。

尽管在数量上没有他们的阿根廷敌人多，英国的伞兵和海军还是在陆地上一度击溃了防御者。第一次是在绿鹅，后来是在向斯坦利港前进的过程中，在同拷问和谋杀政敌比为战争做准备拥有更多的经验，并且完全适应吾入伍的未经训练的士兵的努力才获得军阶的阿根廷军官们斗争时，英国军队又一次体现了训练、纪律和准备工作的价值。在福克兰群岛的阿根廷军队投降后不久，派遣他们的政府就垮台了。

遭阿根廷空袭而爆炸的英国皇家海军舰艇“羚羊号”——阿根廷的飞机(常常运用法国制造的“飞鱼”导弹)没法击沉或破坏的几艘英国船只之一。

一架海上"鹞式"飞机从英国皇家舰艇"无敌号"上升起。装备着美国制造的响尾蛇导弹的这种"鹞式"飞机，在最初的空袭中起了出人意料的作用。在英国地面部队击溃阿根廷军队的作战中，这种飞机也起了相当的作用

星期，以色列已使三支阿拉伯陆军部队和具有较强实力的空军受到羞辱。他们的成功依赖于建立起了一支真正的西方部队——这支队伍官兵一致，团结协作，各级指挥部之间有着默契和信任。最重要的是，以色列人认识到战争需要严肃的专业人员——不仅受过艰苦训练，而且能对职业进行认真、理智的研究——特别是能专心于最新科学技术的研究。

不过，六天战争使以色列人高估了自己在战争中的优势，尤其是高估了军事行动的重要性和战术上的胜利。不同于1956年，以色列确信阿拉伯人在可预见的未来不敢发动又一场战争，所以便抓住所有被占领的土不放。以色列的不妥协也反衬出阿拉伯的不让步。埃及人沿苏伊士运河发动了一场消耗战，这几乎使以色列失去谈判情绪，而在运河区域周围发生的一系列恐怖主义的暴行更加激怒了以色列。

因此，以色列对阿拉伯人采取了强硬措施，由于谈判希望渺茫，埃及人只能考虑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作为埃及的新领导人，萨达特很少有他的前任和其他阿拉伯领导人那种自我放纵的思想倾向。1973年埃及和叙利亚一致同意对以色列的阵地发动一次出其不意的进攻，这次他们将尽可能不提供预先的警告信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都获得了许多预示阿拉伯人进攻的信号，但他们仍坚信这样的行动是不可思议的。

1973年10月6日即赎罪日，以色列终于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但他们只来得及着手动员。他们希望前线的部队能支撑几天。同一天下午2点零5分，以色列在苏伊士运河边上的前线阵地受到大规模的空袭和炮轰。随后埃及人发动了一次全面进攻，以重新收回运河，将以色列赶进荒漠；由于考虑了每一个细节，他们的攻击突破了巴勒防线，并分割了以色列的据点。运河边上的以色列后备装甲兵旅在没有步兵和炮兵支援的情况下开始反攻，但却遭受了毁灭性损失。以色列的空军试图插手，但是，由于以色列从未注意过美国在越南同苏联设计的一流空中防御设施打交道的经历，以及缺少抵抗苏联防御系统的电子设备，他们的攻击飞机也遭受了惨重损失。

以色列曾从六天战争中得出错误的教训，认为装甲部队能够独自行动而不必作为联合部队的一部分。赎罪日战争初期就突出表明了这种想法的错误。在战争中期，以色列迅速地回复到更为协调的战争形式中来，但还是为误解上次战争的

教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360

在战争之前，以色列采取的一个防卫措施是把另一支后备装甲兵旅调到戈兰高地。在北部戈兰，以色列丢失了哈蒙峰上的前哨阵地，但是7日，装甲兵旅粉碎了叙利亚两个师的进攻。在南方，叙利亚人几乎重新占领了戈兰高地。可是在北方的成功，牵制了叙利亚人，从而使以色列能把后备军集中于受到威胁的南部防区。然后以色列用一次全面反攻把叙利亚人赶到最初的防线以外，获得了向大马士革推进的可能性。

这迫使埃及人从他们的防空和反坦克防御工事中冲出来，同以色列人展开运动战。在一个空旷地带的坦克战中，以色列军队给了进攻者自30年前的库尔斯克战役以来的最大的一次重创，紧接着以色列转入反攻，越过运河，最终夺取了西岸的一个桥头堡，并从那里调出他们的全部装甲部队。在向南追击的过程中，以色列坦克消灭了埃及的防空导弹基地，并且几乎包围了埃及第三军。这时，战争宣告结束。在双方都声称获胜的基础上，加上美国令人满意的调停，埃及与以色列的和平条约终于签署了。 361

赎罪日战争使以色列措手不及，以色列的过于自信和对敌人的过于低估致使自己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但一旦重新找到了平衡，他们便显示出自己擅长应变、擅长战斗的优势。阿拉伯人作战勇敢，但因战斗组织反映了产生它们的那个社会的特征，其部队在现代战场上暴露了相当多的缺点。阶级间的巨大障碍、教育和技术技能的不足，以及职业军事文化的缺乏，导致了它们的重大失败。不过，1973年赎罪日战争的最大影响，是由石油输出国组织先是停止石油生产、继而又25%提价以支持阿拉伯军事行动的决定造成的。他们的目的是阻止西方支持以色列，但此举引发了一次世界性的商业衰退，同时戏剧性地提高了会员国的收入和政治影响——尤其是波斯湾周围的主要石油生产国。

海湾战争

美国军队在越南的失败得到的反应是郁郁寡欢的怀疑态度。麻醉品的普遍使用和几乎跌进美国政府机构内部的公开的种族纠纷的现实，加重了阴郁的情绪，这使美国人把20世纪70年代的剩余时光都消耗在恢复心境上。不过，20世纪80年代，大量因素又促成了美国军事力量的复兴。在伤痕平复之后，美国军官中的多数人开始反思战争失败的教训，而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一流译本的出版，更加重了这种自省的严肃气氛。1981年后，由里根总统激发的一场大规模军事集结给战场带来了一次技术革命。最后，一次反对加勒比海岛屿格林纳达的激进的小型军事行动又指明了美军的主要弱点——尤其是在各军种协同作战的领域中。

里根集结的目的是为美军在常规战场和核战场上对抗苏联做出准备，虽然这样的战争从未发生过。1989年苏联的解体使裁军政策出台。但那些军事力量在波斯湾找到用武之地之前，新的政策很难实施。甚至在苏联解体后，其它的国家还是带着巨大的野心相信冷战结束带来了它们兴盛的机会。 362

作为复兴社会党右翼的激进主义分子，萨达姆·侯赛因在伊拉克上台执政。他在伊拉克政治的血腥世界中幸存下来，成为这个因不稳定而四分五裂的民族的残

伊拉克空中防御设施的毁灭

得利于法国和苏联的技术，到1990年止伊拉克已建成了一套高度先进、完整的空中防御系统。但这个系统也存在重大不足，尤其是在伊拉克低估了对手的技能和技术上的先进性以后，弱点更加突出。1991年1月的第一轮攻击是由"秘密武器"F-117轰炸机和巡航导弹发动的，它们攻击了伊拉克防御系统的心脏，特别是各种各样的指挥中心，通讯中心及主要的电子系统。

盟国计划的第二阶段是派出两个大规模的飞行器组合，其中包括人为干扰发射机、无人驾驶飞机和携带着反辐射导弹的飞机，这两个组合将攻击伊拉克还在起作用的任何一种雷达装置。直到盟国的攻击已进行了半个小时，伊拉克才意识到自己遭遇了一场重大的攻击，但是第一轮攻击造成的损害已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困难。此刻，显现在雷达荧屏上的以巴格达为目标的，一场大规模的钳形，轰炸式攻击正在进行——仅仅只因为进行了"无线电联系"，这些装置便引来了大批反辐射导弹。伊拉克的空中防御设施在剩余的战斗中再也无法协调一致地发挥作用了。

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英国皇家空军中的"旋风号"飞机发射了一枚火箭。以专业技术知识和受过非常良好的训练和教育的空勤人员为基础，盟国部队对于伊拉克发射到空中的任何武器都显示出优势。因为取得了空中优势，所以盟国空军能够猛攻在科威特的伊拉克部队(如一位空军司令所描述的，驻科威特的伊拉克军队像一只被拴住的山羊)。

忍独裁者。1979年在宗教思想的倡导者们掌权后，伊朗陷入表面上的无政府状态。此时，萨达姆利用时机侵入该邻国。但在伊朗军队凶猛的反攻下，伊拉克军队逃回本土。一场残忍且看来永无止境的战争接着便发生了。战争中两个拒绝和解的政党——一个充斥着复兴社会党的思想，另一个充斥着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都以击败对手为目的。伊拉克利用了大量的苏联和西方的武器及技术，伊朗则依靠宗教狂热，派出几万名青年用双脚去清除雷区。1988年，经过一系列精心策划，伊拉克的进攻打败了伊朗，然而伊拉克是从苏联和西方获得的技术，他们的成功反映的是对手的弱点而非自身的军事才能。

对萨达姆来说，对伊朗的“胜利”提供了他控制中东经济和政治的可能性。作为复兴社会党的领导人，他的目的是重新洗刷在先前五个世纪中由西方和干涉他人事务者所加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古老冤屈。由于负担着与伊朗之间的战争所带来的债务，而且确信美国不可能使用它的军事力量，于是在1990年萨达姆攻击了弱小而富有石油的邻国科威特。入侵行动顺利，一天内科威特的抵抗便瓦解了。作为对入侵的回答，美国和他的西方同盟调动了大批军队进驻海湾。但这几乎没给伊拉克带来什么压力。他们始终不相信美国敢于攻击伊朗—伊拉克战争的胜利者，正如萨达姆1990年7月直言不讳地告诉美国大使的那样：“你们的社会是不能接受一次战斗死一万人的现实的。”更重要的是，伊拉克对技术可能在战争中起重要作用的观点嗤之以鼻。

实际上，是技术彻底打败了伊拉克。1991年1月，在战争的最初10个小时里，秘密飞行器、巡航导弹、电子战、拥有精确导向装置的炸弹合在一起，打得伊拉克复杂的空中防御系统一败涂地。接下来的几周，空中攻势粉碎了伊拉克的军事防御设施，破坏了伊拉克的地面部队，也使平民百姓受到最低程度的损失。空袭的毁坏程度引起了多国部队指挥官的大量争吵，但最后可用数量表示的措施证明是毫无价值的：多国地面部队涌入伊拉克，伊拉克做了最低限度的抵抗后投降了，因为空中进攻已击溃了他们的士气。

363

一些空军策划者坚持认为没必要进行地面战役，他们忽略了多国地面部队打败伊拉克和防止萨达姆宣传其部队还没有被打垮的政治必要性。尽管如此，正如一位退休的海军陆战队的将军在战后评论的那样：“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地面战斗支援了空中战斗。”虽然对于许多分析家来说，这场战争只是又一次验证了西方力量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技术优势。但是，技术优势仍只是组成等式的一种因素。自1945年以来，战争过程表明，重要的附加因素继续影响着现代战争的结果。但首要的是，军队的全部工作必须建立在教育、训练和组织的基础上，这是自古希腊以来西方作战方式的精髓。在伊拉克，多国部队拥有这些优势，但他们的敌人却没有。

后记 西方战争的未来

364

从古希腊装甲步兵发展到英国的鹞式飞机，战争已成为西方主宰世界的驱动力。西方的历史，无论是本国的还是海外的，都以强硬的、野心勃勃的大国们为争夺控制权而展开的竞争为中心。在竞争中，残忍者、革新者和果断者取代了自满者、模仿者和优柔寡断者。

战争的过去

西方的作战方式总是包括昂贵的代价在内。一方面，无法描绘在争夺全球统治权的过程中它所造成的死亡和苦难：1492年后对新大陆的入侵和征服，尤其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不仅仅是整个美洲土著文化和土著民族的毁灭，而且为了新大陆胜利者的需要强迫了无数的非洲人移民。另一方面，西方国家间所特有的斗争看起来常常是完全放逐了和平。三十年战争（公元1618～1648年）蹂躏了大部分德国和它的许多邻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一世进行的历次重大战争（公元1792～1815年）摧残了从里斯本直到莫斯科的整个欧洲；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几乎彻底摧毁了养育它们的文明。

这一黑暗面已招致了严厉的谴责。很早以前就已流传、后初创于公元前8世纪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便已描绘了一个将领（阿喀琉斯）对于他采取的军事行动所要付出的高昂代价而产生的苦恼；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议院根据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描述，对他们计划的西西里岛征伐可能产生的收益和损失进行了同样的权衡。塔西佗的《罗马史》记载了狂妄自大而又无能的领导者，他们因错误的原因，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滥用士兵和物资，在描写伴随着胜利的毫无同情心的兽行时，渗透出一种赤裸裸的犬儒哲学。从欧里庇得斯的《特洛伊妇女》、阿里斯托芬的《吕西斯忒拉忒》，以及威尔弗雷德和西格弗里德的令人烧灼的诗歌，或者诸如《西木卜里其西木斯历险记》、《战争与和平》、《燃烧的原野》、《第二十二条军规》等战争小说，直到像《贵妇画像》、《现代启示录》之类的电影，或者像《钢铁风暴》和《7月4日出生》等个人回忆录，西方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已习惯地认为，勇士的行为有待认真考察或（偶尔）予以嘲笑。另外，自从公元390年米兰的大主教安希罗斯迫使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为因报复而屠杀7000人进行悔罪之后，基督教堂也被认为对宣布或发动战争——至少是基督教徒之间的战争——负有责任。

365

使西方的战争制造者成为艺术、文学和宗教批评的对象已不断地激起关于目标和交战国传统做法的讨论。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进行中的讨论常常会净化或认可——而非阻碍——西方的侵略，出于为每一次进攻行动辩护的需要而引发的仔细认真的宣传战，使公众舆论沸腾并增加了对战争行动的支持率，因此，讨

论促成了战争而非减少了它的涉及面和破坏性。

西方的作战方式已体现出一些明显的时间上的连续性。这部战争史所涉及到的大多数时期，从古希腊的装甲步兵到越南战争中“美国陆军或海军陆战队的士兵”，步兵的首要地位是清晰可见的：无可否认，大炮、坦克和飞机目前已稍稍掩盖了步兵的重要性，但即便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步兵仍是必需的。不过，自古希腊以来的大多数时期，步兵最通常的活动是围攻。从公元前8500年的耶利哥城（世界上第一座用墙围住的城市）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西线战壕，西方已显示出对复杂防御工事的异常偏爱；而在部队进攻之前，用于武装攻占设防中心（无论是城堡还是城市）的装备，实际上已经支配着军事行动。而且，围攻不仅大量出现，时间也相对拖长。公元5世纪巴黎抵抗由克洛维指挥的法兰克人的进攻长达五年之久，17世纪的奥斯坦德战役和20世纪的列宁格勒战役则持续了三年，与此同时，发生在无数地方的抵抗也同样贯穿于整个战役。

保持武装力量在长时间的作战行动中的后勤供给能力，形成了西方战争的另一持续性特征。其他的军事传统也包括围攻。例如，中国军队习惯于试图攻占设防城市，但其部队的庞大规模（通常超过10万人）使进攻迅速地得出一个结果变得十分迫切，因为有这么多张嘴需要吃饭，根本没有时间花在西方司令官所偏爱的艰巨的预先轰击、挖战壕和铺设地雷上。因此大多数中国式的围攻是以集中攻击作为结果的。相对来说，在西方10万人以上的野战军到18世纪时还是稀少的；相反，大多数国家将注意力集中于军事规划，这是集中资本而不是人力。基于这一目的，如导言中所述，更多的财力通常投入到技术、训练和耐久力的发展上，而不是投入到数量的扩张上。18世纪西方工业力量一经应用于军事行动中，便显示出惊人的力量。因此，卷入二战使美国经济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最快也最持久的一次膨胀。在1941年和1945年间，它的国民总产值增加了50%，钢产量翻了一番，造船量增长了10倍，飞机产量增长了11倍。具体来说，这些年中以一天3艘船的速度计算，美国有5000万吨商业船舶下水，一些舰艇从开始制造到下水只用了四天半的时间（这至少是为了示威的目的）。同时，它还生产了总共30万架飞机，1944年其最高生产率达日产250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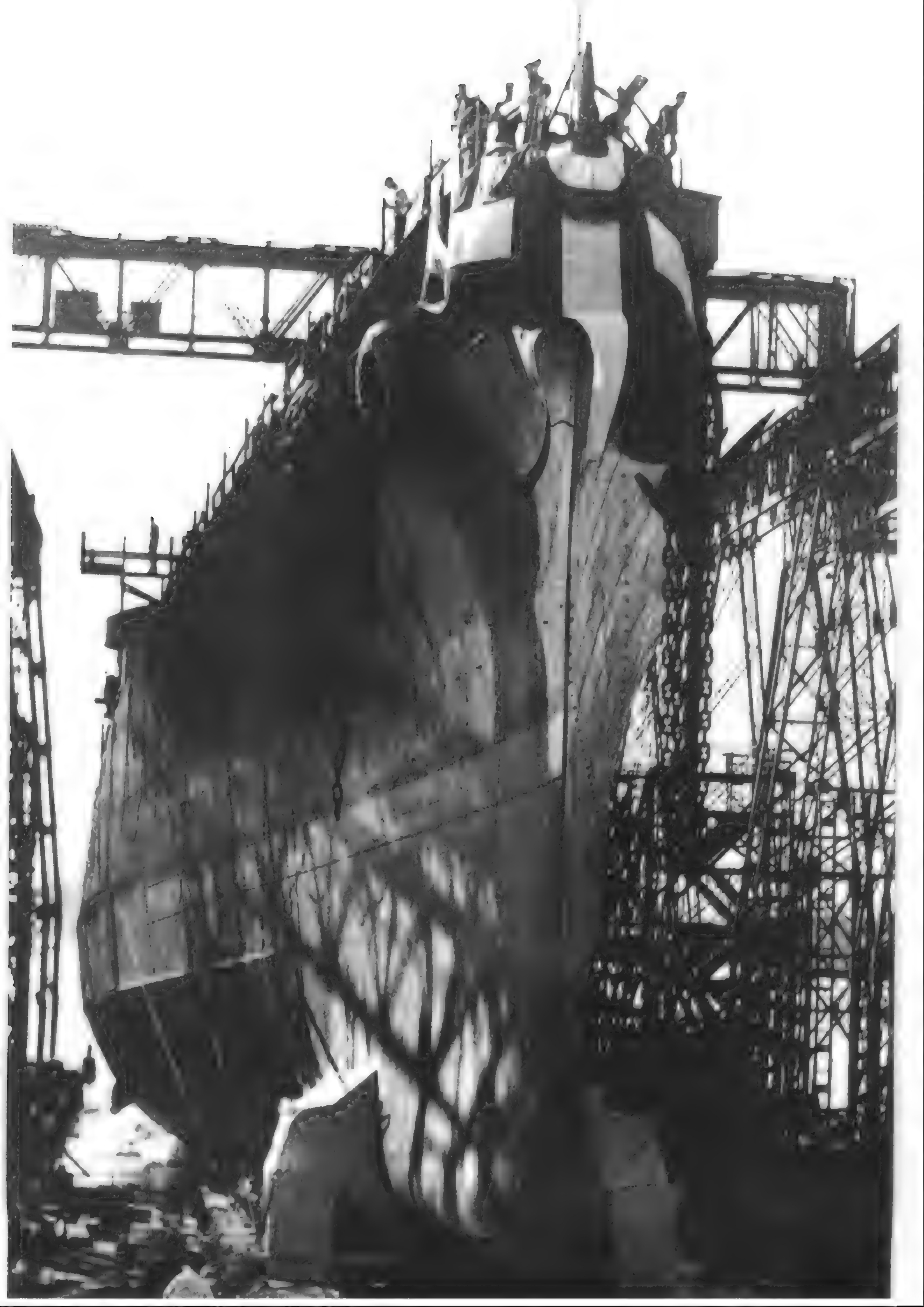
366

由美国领导人——也由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其他人——做出的为战争而调动巨大财力的战略决定，在与对手在战术和技术上的成功革新相对抗时起了主要作用。快速的发明创造被快速模仿的例子在20世纪大量存在，也许在原子技术领域最为轰动一时（美国的原子垄断达4年之久，从1945～1949年）；但同样的仿造过程也曾发生在早期。1314年在苏格兰的班诺克伯恩的战斗中，罗伯特一世希鲁斯的部队便有意采用了同样的步兵战术技巧去对抗英国公爵，这种战术技巧12年前在佛兰德斯的库尔特累，曾被弗莱明的步兵成功地用来对付法国军队。同样，在15世纪和16世纪，黑色火药武器和防御工事的每一个发展，都被迅速地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见第六章）。

367

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多数的国家已展示了从失败中吸取经验以及模仿成功对手军事方法的一些能力，西方仍在四个方面保持着不同寻常的特色。

首先，欧洲近乎永久性的政治分裂连同由武士价值观所反复灌输的侵略性思想，造成了长期而剧烈的竞争，这种竞争极大地刺激了永久性公共机构内部的改



变与革新。

第二，应部分地感谢军事变更所需的高费用，它不仅为西方打下了广阔的税收基础，而且建立了广泛的信用网，这使许多昂贵的发明以及将它们的费用分摊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成为可能。由于这些原因，一系列费用极高的技术和战术革新不断地进入西方军事历史，特别是自1400年以来：黑色火药武器、大炮堡垒、装甲战舰、装甲部队、核武器、灵敏炸弹不时出现。每一次革新都引起了其它强国的迅速反应，这些国家有能力动用必要的财政资源以及调整自身的经济，以使军事技术得到充足的支持。

第三，西方通常只依靠单一的效用标准来评判军事上的革新与创造。但是其它地方的一些文明，却以文化和宗教理由拒绝接受从逻辑上看来比自己优越的战术和技术。因此，埃及的马木路克贵族统治拒绝在战斗中使用枪炮，理由是他们不适合传统的作战方式，这直接导致1517年奥斯曼土耳其对马木路克政权的颠覆。相反，欧洲的战争制造者总是接受任何一种看来能带来好处的武器或战术。

第四，也是最后一点，尽管中国也发展了紧密队形的步兵操练，但在古典时期和16世纪，西方士兵仍通过操练培养独特的敏感，即利用“节拍形成行进中的整体”（用威廉·麦克尼尔精选的措辞来说）。修昔底德描述了公元前418年曼梯尼亚战役中不畏艰辛的人们齐步进入战斗的情景：“缓慢地合着行列中那些吹笛者的节拍……他们的步调一致，稳健地向前移动而不打乱队伍的排列。”稍后由埃利亚记录的马其顿军队的操练，成为荷兰——后来又为其它西方军队——在17世纪所采用的操练的基础。维吉提乌斯所描绘的罗马军队的战术策略编队，同样地引起了后来的模仿。久已存在的西方普遍参与战争的传统，也许会很好地解释维持操练的重要性。古希腊和罗马共和国的市民军队、中世纪的民团、自19世纪以来欧洲和美国的部队：所有这些都需要迅速地“强行进入”军事生活——而职业士兵则不必——因此，精确和谐地调遣军队便成为理想的结构方式。但是在17世纪，另一种利益又自然产生了：操练与火器使用的结合产生了炮火齐发，它在不断的演习中得到完善并被证明是西方战争的主要支柱——也是西方扩张的关键所在——对于以后的三个世纪来说。

368

对财力、技术、折中主义和训练的强调，赋予西方战争独一无二的复原力和致命性。一方面，西方国家间的战争倾向出现严重的僵局：从古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世纪的百年战争，到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美国南北战争以至两次世界大战，所有人都看到国家间的战斗要长于多数观察者（和参与者）所预计的时间。另一方面，西方与其它社会间的战斗通常是短暂而且相对廉价的，因为西方的作战方式为自己提供了决定性的优势。死于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希腊人要比死于阻止波斯人侵多得多（大约4万雅典人死在公元前415～前413年的对西西里的惟一一次远征，而在公元前490年在马拉松只死了192人）；丧生于公元前43年至公元前31年间内战的罗马军团士兵要比丧生于日耳曼地区和所有著名战祸中的人还要多。另一方面，规模不大的西方战争武士却在国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亚历山大不足5万人的大军从希腊进军印度河，在公元前334年到公元前323年间摧毁了拥有上百万人口的帝国。到1650年为止，西方军队已控制了西伯利亚、大部分美洲、部分菲律宾、通向南亚和东南亚的几座岛屿和群岛，以及亚洲和非洲海

左页：1944年8月，美国的载重1万吨的一艘轻型巡洋舰“小石城号”，沿下水滑道进入了特拉华河——这是两周内第四艘下水的战舰。它加入到大约总数为6.5万艘的舰队行列中（其总排水量超过了900万吨），这些舰艇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为美国海军建造的。美国的工业力量，一旦被应用到战争事务中，就被证明是世界第一流的。

岸附近一连串筑有防御工事的贸易点和城市。到1850年，几乎整个南亚次大陆和澳大利亚及西亚都被包括进来，而到1914年，又加进了非洲和南亚、中亚的大部分。几乎所有这些后加进的部分，都来自于一系列短促而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争中军队的操练。

战争的现状

这种模式还将继续存在吗？英国军队在福克兰群岛（1982年）和盟军在海湾战争（1991年）中的成功也许暗示了这种持续性；但是两次战争都是以西方军队被训练过的、用以抵抗常规装备的侵略者以保卫或重新占领领土的精确方式进行的。他们的工作只是将自己移至南大西洋或近东，在那里作战而非在欧洲作战。而且西方一直擅长于把军队投放到远方战场：亚历山大和恺撒战役，十字军东征和征服西半球，印度反英暴动的镇压和布尔战争、太平洋战争、海湾战争莫不如此。但是，也不能保证未来的战争会继续按西方军队自己的条件降临到他们头上。

369

实际上，最近几年没有什么战争是占主宰地位的大国使用高精尖武库带来的结果。相反，自1945年以来90%的战争行为都是运用相对简单的武器进行的内战——一种很可能发展进21世纪的模式，因为高度专业化的战争侧重艰苦的训练、大量的后勤供应和使用充足的最新型的武器，这些要求是极少数国家才能满足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运用较少先进性的武器进行的战争尤其是内战，趋向更为残忍并且导致了更为严重的民间伤亡。19世纪和20世纪初在欧洲进行的战争中，70%至80%的伤亡是军队。相反，自1945年以来，死于战争的大约5000万人中，大多数是平民——这个比率在越南战争中上升到70%或更多。而且，几乎所有人都死于廉价的、大批量生产的武器和小直径的弹药。

曾是战后中东风暴中相对平静的避难所的黎巴嫩，在1976年后走向分裂并开始了破坏性的内战。装备着一流武器的年轻的宗教狂热分子和政治党派，迅速地把贝鲁特变成了战场。

内战与低水平的技术和残酷性之间的联系是不易被打破的。乔治·格里瓦斯于20世纪50年代在塞浦路斯为自己运用游击战术对抗英军时说出了要旨所在：

> 我们的作战方式——四年中有几百人倒下，是比最具选择性还具选择性的，我是作为一个目击过尸横遍野的人来说这番话的。我们并不随便进攻，像使用轰炸机之类，我们只在英军将要开火杀死我们的情况下才向他们射击，我们射击的平民也都是些叛徒和间谍。

但是在大多数内战中，由于政治目的会使一方的军队试图消灭而非仅仅击败另一方的军队，所以几乎没人企图去区别质的战争与量的战争的差别。学者们已排列了大量的证据来暗示，1936年后西班牙民族主义政党的叛乱领袖佛朗哥故意拒绝了任何一个可能会使内战迅速结束的选择，目的就在于尽可能多地杀死共产党员。同样的模式也已成为东南亚、非洲、中美和南斯拉夫发生的内战的特征——并在较低程度上成为北爱尔兰和黎巴嫩所发生的内战的特征——因为恶行激起了报复行动并被制度化，由此导致的残暴行为使政治和解成为不可能。由于尖端的武器要求空运，所以这类战争通常不能使用这类武器加以解决。20世纪80年代苏联在阿富汗的经历证实了1965年至1973年间美国在越南的经验：消灭1万名装备着常规武器的游击队步兵是几乎不可能的事。

事实上，除了一方彻底失败外，从根本上解决内战是困难的。问题在于交战双方达成的协议，会使两者共处于同一国家中。政治权力是很难分割的，所以权利分享协议通常的维持期短暂，弱的一派由于害怕随后的报复常常不敢放下武器。只有外部力量的干涉才能安排和解，然后使规定生效，产生由于双方让步达成的和平；但是对于斯里兰卡或者黎巴嫩，停火期只是权力经纪人的部队大批地停留在原地的那段时间。

370

主权国家间的常规战争还是没有停止——印度—巴基斯坦战争、阿拉伯—以色列战争、伊拉克—伊朗战争、伊拉克—科威特战争和福克兰群岛战争就是证明。而且，许多政府在常规武器方面的投资还在继续着：中东和北非可能会出现比地球其它部分更多的士兵、飞机、导弹和其它武器，而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仅在1988年就在武器和军队上花费了将近1500亿美元，这预示着将来会有更多的战事。由于缺少单方面的无条件投降，常规战争也被证明是难以结束的。极少数政府会在交战期间进行严肃的谈判，因为这么做可能预示着软弱，可能会引起国内的批评，或者造成联盟间的不和。相反，人们会使战争逐步升级——或者通过使用新武器、新对策，或者通过进攻新目标或新战线——由此也就延长了战争。伊朗—伊拉克战争持续了八年之久，造成了成千上万人的伤亡——这为将来的洲际战争的可能性代价提供了一个可怕的警告。

战争的未来

自1945年以来，还没有人被原子弹蓄意杀死。尽管自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超级大国建立了大量兵工厂，但是70年代和80年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队对

苏联进攻欧洲的第一反应还是要求放弃战术性核武器，双方都认为核战争是“最坏的”灾祸。其它二三个拥有原子能力的国家也有此同感。

然而，随着苏联的解体，世界进入了一个较大的核武器激增的时代，每个主要地区或许会有两个、三个或者四个国家将拥有原子武器。其中一些国家会紧紧地控制他们的武装部队并统治一个人口稠密的国家；他们极其相信核力量是“终极威慑力量”。但是其他的国家，一些拥有分布广泛的人口，另一些拥有控制松散的军队，它们也许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而且，核武器不会一直作为大规模毁灭的惟一标志。几个富于侵略性的国家已显示出了发展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兴趣，这些武器费用较小而且易于运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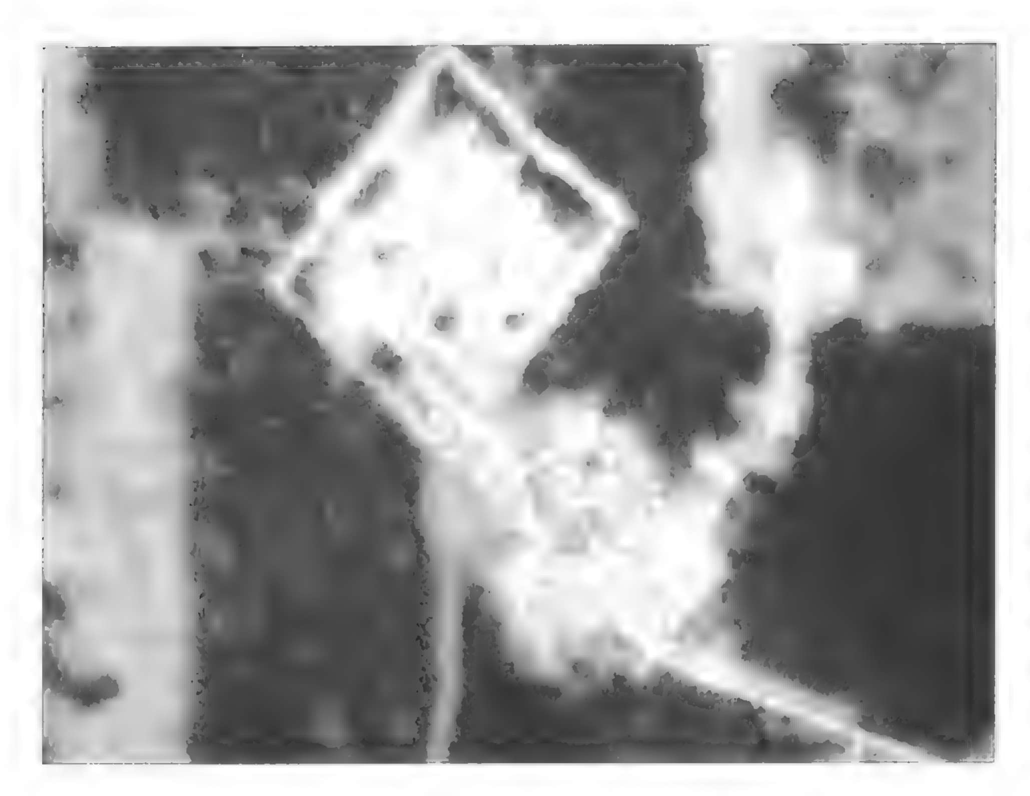
371

就军事方面而言，冷战后的世界相似于其它重大冲突后的形势：伴随着“邪恶”帝国的灭亡，西方国家由于过分自信而导致的情绪高涨为“和平分利”制造了压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府宣布，“为了拟定作战部队的数量，应该作这样的假设，在最近的十年内将不会发生重大战争”。直到1932年，这个“十年规限”才被取消，1937年被彻底废弃。对于西方领导人来说，就在20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出现的时候，推测冷战后十年或这么长的时间内不会有另一次重大的战争发生，也是十分轻率的。西方面对另一次重大军事威胁的可能性也许不会马上出现，但它不可能永久消失。

而且，西方所需要的国际安全受到威胁的机会和性质正在增长。一方面，战争的传统起因——诸如有争议的边界问题和独立斗争——还存在着。例如，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那里的殖民分界线在被确定时没有充分考虑到不同部落间的持久敌意，政府很少被看做是忠诚的核心，种族间的紧张状况在这一地区45个国家中的大多数制造了无数内战。这些内战有大规模的（像尼日利亚的1967～1970年的比拉夫战争），也有规模较小的（像卢旺达的胡图人与图西人之间的斗争，在1994年中也许有100万人因此被杀）。另一方面，新的威胁也已出现了：国际恐怖主义（这已引起了美国军队对一个有共谋嫌疑的国家——利比亚的进攻）、毒品贸易，世界上许多地区因人口数量不受控制的增加和农作物产量的减少而造成的对土地和海洋资源逐步加大的压力。任何一个对国家的繁荣昌盛、社会稳定和政治和平的挑战，都可能很快被看做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它们因此而成为导致战争的潜在因素。

诚然，在这一复杂的局面中，切实的考虑有助于西方的计划制定者（除了他们所拥有的巨大的核武器兵工厂外）。首先，如约翰·基根所指出的，过去的冲突倾向于发生在一个相对限定的区域内，而且这一状况很可能会持续下去。例如水域，其中大部分是海洋，它覆盖了大约70%的地球表面；然而几乎所有重要的海战都是发生在它的一小部分区域内，而且通常限于几公里的陆地范围。某些地方已反复多次发生过战斗：诸如北海（1340年的斯勒伊斯战斗发生地，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失败的地方，17世纪英荷战争中大约有二十场战斗发生在此处，1797年坎珀当战斗所在地，1916年日德兰战争发生地）或者中部地中海海峡（公元前31年的亚克兴战斗发生地与1517年勒班多之战发生地惊人地邻近——本身又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一场真正的海战，纳夫帕克图斯战斗发生地）。同样地，世界干燥陆地的70%对于军事行动来说，通常是太高或者太冷，或者太干旱；这些地区

372



苏联基洛夫北部，尤里亚导弹复合体的部分——这是1988年由法国侦察1号卫星传送回地球的一幅照片。在20世纪末期，监视系统成为估定核进攻和常规进攻威胁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传统的人工情报（人工情报，通常由情报人员在地面收集信息）和信号情报（信号情报，通过截获和破译消息得到）中又加入了电子情报（电子情报，通过截获和分析电磁体信号，诸如导弹控制网络获得）和图像情报（图像情报即敌人军事活动的摄影照片）

没有或者极少拥有军事历史。相反，就像海战那样，并不稳定的军事活动总是一直出现在地球的一小部分区域内。军队在一些地区反复作战——希腊底比斯附近的皮奥夏谷，就是公元前479年的布拉底（古希腊维奥提亚城——译者注）同公元前338年的海罗尼亚之间所进行的九次战斗的所在地；另外，是低陆国家；还有伦巴平原和萨克森。埃迪尔内——欧洲土耳其先前的阿德里亚堡，这里在323年到1913年间发生了15场战斗或围攻，显然保持着纪录。对这种重复频率的解释通常是地理上的——埃迪尔内位于欧洲最低的平原上，因此从西面来的入侵者在重新开始前进之前，都需要守住它和它的资源。其它经常被军队光顾的地方包括那些被山峦、森林或沙漠包围起来的肥沃平原以及通向平原的狭窄通道。自然气候也向军事活动施加了重要的影响。直到最近，成功的军事行动也很少发生在冬天；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每年3月和10月的阵雨，它们被苏联人提及时称作“rasputitsa”或“无路可通时期”，也会规律性地引起西线军事行动的停止，并被证明比有名的俄国冬天还具阻碍性。

除了军事技术的不断提高外，常规部队看来可能会同先前一样在许多相同的时间、地点展开行动（尽管福克兰群岛战争和海湾战争都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一旦需要，即便是荒凉地区也会成为战场）；而这种地理上的浓缩，戏剧性地简化了为战争制定计划的任务。但是，目前西方军队所使用的监视系统却提供了一种对抗此类意外威胁的安全保障。在海湾战争期间，侦察卫星监视着敌军的行动，精确地测定出其军事设施的位置，并且表明其遭受破坏的等级；早期的警报卫星会提前通知即将发生的攻击；通讯卫星则使总部能与各行动单位间保持不间断的联系；气象卫星能为每一次行动预报最适宜的天气条件。尽管“抵触”、“迷雾”和战争歧义总能损害这类大宗资料的使用，但对于拥有者来说，全副监视装备减少了出现战术意外的机会。

但是这些一流的系统，就像所补充的武器那样，需要巨额费用。西方作战方式的未来以及这种作战方式所保护的西方生活方式，最终依赖于两件事情：处理国际危机并阻止其演变成不可预测的武装冲突的持续能力；对不能立刻明确的危险进行防卫或付出代价的持续意志。关于第一点，主要危险在于西方（或西方化）国家会重复过去常犯的错误——本世纪犯了两次——彼此忙于采取战争行动，相互使用可怕的毁坏力。关于第二点，西方作战方式已逐渐依赖于两方面。一方面，必须有使用武力的愿望，即便不可避免地包含损失。美国对越南的入侵（公元1965～1973年）以至对索马里的入侵（公元1993～1994年）都因公众对伤亡的抵触态度而变成严重的妥协。在这些条件的约束下，即便最有力、装备最完善的军事设施也只能是虚张声势。另一方面，必须愿意为有效的、胜利的防卫机构提供资金。一位英国政治作家汉普登在1962年简洁有力地表述了此点：

大量的资金，是战争的力量源泉，也是其它事业的力量源泉。我们以高价获得的经验已教会我们：巨大的税收是维持陆军和海军所必需的，而这些海军、陆军对于我们的安全来说又是必不可少的；他们也保卫着我们的宗教权和民权。金钱使我们达到这些目的。但从长远的观点看，我们已经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对西方社会来说，在20世纪90年代，如在17世纪90年代一样，谁付出和为什么付出，同谁作战和为什么作战几乎一样重要；也许两者一致才是最重要的。西方的未来，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会十分持久地依赖于这一点。

年　表

公元前

4000　　冶金技术发展：青铜时代开始
3000　　发明文字
2500　　弓箭使用于战争
2000　　发明战车
1600　　古希腊的迈锡尼时期（到公元前1200年）
910　　亚述帝国时代（到公元前606年）
650　　三层桨（座）战船产生于希腊
600　　波斯帝国时代（到公元前330年）
600　　货币开始出现
490　　波斯第一次远征古希腊：马拉松战役；古罗马开始在意大利的扩张。
480　　波斯第二次远征：萨拉米斯战役和布拉底战役（到公元前479年）
431　　伯罗奔尼撒战争（到公元前404年）
415　　雅典人远征西西里（到公元前413年）
404　　斯巴达称霸古希腊（到公元前371年）
401　　色诺芬与小亚细亚“万人军”远征（到公元前399年）
400　　石弩和弩炮第一次用于战争
371　　底比斯人在留克特拉打败斯巴达人
371　　底比斯人在古希腊的霸权（到公元前362年）
359　　马其顿方阵的形成（到公元前338年）
338　　马其顿的腓力二世在海罗尼亚战胜希腊人
336　　亚历山大大帝成为马其顿王国
334　　亚历山大大帝入侵小亚细亚
333　　亚历山大灭亡波斯帝国（到公元前330年）
330　　亚历山大统治波斯
327　　亚历山大入侵印度的战役（到公元前325年）
323　　亚历山大去世
320　　欧几里德写成《几何原理》
300　　罗马军团开始形成（到公元前200年）
264　　第一次布匿战争（到公元前241年）
250　　阿基米德用物理学原理和围城技巧组成进攻
218　　第二次布匿战争（到公元前201年）
216　　汉尼拔在坎尼打败罗马人
190　　罗马人征服叙利亚

149　第三次布匿战争（到公元前146年）
107　马略改革罗马军队（到公元前105年）
88　苏拉成为罗马独裁者（到公元前78年）
66　庞培征服小亚细亚（到公元前61年）
58　恺撒征服高卢（到公元前51年）
53　帕提亚人在卡雷战胜罗马人
46　尤利乌斯·恺撒在罗马的独裁统治（到公元前44年）
31　屋大维取得阿克兴角海战的胜利
27　奥古斯都在罗马实行元首统治

公元

43　罗马人开始对不列颠的征服
110　阿里安写作《兵法》
122　哈德良的城墙建于不列颠：罗马帝国疆界扩张到最大范围
270　指南针开始运用于中国
293　戴克里先将罗马帝国划分为4个行政管理区
324　君士坦丁恢复罗马帝制
390　维吉蒂乌斯写作《有关军事问题》（修订于440年）
395　东西罗马最终分裂
407　日耳曼部落突破莱茵河界，大肆侵入西罗马帝国。
410　罗马帝国遭到维斯哥特人的劫掠
451　阿提拉西征
455　罗马帝国遭汪达尔人的洗劫
476　西罗马最后一个皇帝被伦巴德族人废黜
527　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的统治时期（到565年）
533　北部非洲再次被贝利撒留率领的拜占庭军队征服（到534年）
535　贝利撒留再次征服意大利（到554年）
570　穆罕默德诞生
634　穆斯林开始向外扩张
673　穆斯林进攻君士坦丁堡（到677年）
675　“希腊之火”入侵行动
700　马蹬传入西方
711　穆斯林入侵西班牙的维斯哥特王国（到715年）
737　丹麦王朝建立
768　查理大帝统治时期（到814年）
773　查理大帝征服意大利（到774年）
793　查理大帝试图建立连接莱茵河与多瑙河的运河
800　北欧海盗开始袭击行动
800　查理大帝在西罗马接受加冕
850　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和弓箭开始使用于法国

955　奥托一世在列赫河畔打败马扎尔人
962　奥托一世在西罗马加冕称帝
1060　诺曼人征服西西里（到1091年）
1066　黑斯廷斯之战：诺曼人占领英格兰
1096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到1099年）
1200　指南针传入西方
1204　拉丁人征服君士坦丁堡（到1261年）
1237　蒙古人征服俄罗斯（到1240年）
1250　铠甲的广泛采用
1302　弗莱米斯步兵在库尔特累打败法国军队
1314　罗伯特·布鲁斯在班诺克本战胜英国，确立了苏格兰的独立。
1320　火炮第一次在欧洲使用
1337　英法百年战争（到1453年）
1346　英国大弓手在克雷之战中打败法国人
1350　舰炮开始出现
1350　手持火药武器产生
1356　英国军队在普瓦捷打败法国军队
1385　葡萄牙在阿尔茹巴罗塔战斗中打败西班牙并赢得独立
1415　英国军队在阿金库尔打败法国军队
1419　胡斯战争在波希米亚爆发
1430　全帆装的船出现
1430　威力更大的火药产生
1440　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提出“追循意大利”
1450　火绳滑膛枪产生
1453　英法百年战争结束，英国在法国境内的领地仅保留加来港；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崩溃。
1455　英国爆发红白玫瑰战争（到1485年）
1462　伊凡三世继任莫斯科大公
1467　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到1477年）
1490　发明滑膛枪管
1492　哥伦布西航抵达美洲
1494　法国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
1497　瓦斯科·达·伽马环球航行到达非洲
1511　第一艘战列帆船在苏格兰下水
1515　第一个全炮位要塞建于奇维塔韦基亚
1519　科泰斯战胜阿兹特克人后墨西哥被迫与西班牙结盟（到1521年）
1519　麦哲伦环球航行（到1522年），查理五世继承西班牙王位，统治包括西班牙、尼德兰、哈布斯堡和神圣罗马帝国领地在内的广大地区。
1531　皮萨罗率领西班牙军队征服印加帝国（到1537年）
1537　尼科罗·塔尔塔格略创立弹道学

1556　西班牙腓力二世统治时期（到1598年）

1571　基督教徒的联合舰队在勒班多海战中击败土耳其

1572　荷兰人反抗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到1648年）

1588　西班牙无敌舰队远征英国失败

1590　荷兰军队开创了齐发火力和军事训练

1600　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建立

1602　荷兰东印度公司建立

1607　雅克·达·格扬出版第一部多卷本军训著作

1616　拿骚的科特·约翰在德国西部的锡根开办第一所军事学校

1618　三十年战争（到1648年）

1620　燧发滑膛枪问世

1635　法国—西班牙战争（到1659年）

1642　不列颠诸岛的内战（到1651年）

1648　蒙斯特和约结束了荷兰人的反抗；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三十年战争”。

1649　英国宣布共和（到1660年）

1659　比利牛斯和约结束了英国—西班牙战争

1667　路易十四的权力转移战争（到1668年）

1672　法国—荷兰战争（到1678年）

1678　土耳其人反对俄国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到1699年）

1683　土耳其人围困维也纳

1688　奥兰治的威廉率荷兰人入侵英国，后成为威廉三世、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国王。奥格斯堡联盟的战争（到1697年）。

1689　俄国彼得大帝执政（到1725年）

1690　套节刺刀普遍采用

1694　第一个国家银行——英国银行建立

1700　俄国与瑞典的北方战争（到1720年）

1701　西班牙王位继承权战争（到1714年）

1704　布莱尼姆之战

1706　拉米伊与都灵之战

1709　马尔普拉奎特与波尔塔瓦之战

1740　奥地利王位继承权战争（到1748年），普鲁士弗雷德里克二世的统治（到1786年）。

1744　欧洲列强和印度联盟在印度进行的卡纳蒂克战争（到1754年）

1756　七年战争（到1763年）

1757　勒森与普纳塞之战

1775　美国独立战争（到1783年）

1789　法国大革命

1792　法国革命战争（到1802年）

1794　信号电报机问世

1798　纳尔逊在尼罗河战役打败法国舰队
1799　拿破仑成为法国统治者
1803　拿破仑战争（到1815年）
1805　奥斯特利茨和特拉法尔加角之战；第一次使用水雷。
1807　佩宁苏拉战争（到1814年）；第一次汽船航行成功。
1812　拿破仑入侵俄国
1815　拿破仑在滑铁卢最终战败；维也纳会议。
1825　第一条铁路投入运行
1827　撞针枪的发明
1833　电动发报机问世
1848　巴黎、维也纳、威尼斯、柏林、米兰和帕尔马爆发革命
1853　克里米亚战争（到1856年）
1859　第一艘装有大炮的装甲快速帆船制造成功
1862　理查德·加特林制造出第一架可实际操作的动力机关枪
1863　葛底堡战役；林肯的解放黑奴宣言
1866　普奥（地利）战争
1870　普法战争（到1871年）；拿破仑三世被废黜。
1876　发明电话
1879　祖鲁人战争
1881　英国承认布尔人的独立
1882　英国征服埃及
1884　希拉姆·马克西姆发明自动机关枪
1885　第一艘海军潜水艇建成
1887　第一辆汽车制造成功
1894　日朝战争（到1895年）
1895　无线电报机问世
1896　英国征服苏丹
1899　布尔战争（到1902年）
1903　第一架飞机试飞
1904　日俄战争（到1905年）
1905　第一次俄国革命
1906　英国建成“无畏号”战舰
1914　6月28日，奥地利斐迪南大公爵遇刺；7月28日，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月4日，德国开始入侵比利时；9月5～10日，马恩河战役：德军不断向西部发动进攻，直到1918年；11月，土耳其帝国参战。
1915　4月，英国进攻达达尼尔海峡；5月，意大利参战。
1916　在战斗中第一次使用坦克；2～6月，凡尔登战役；7～11月，索姆河战役；8月，罗马尼亚参战。
1917　第一次使用飞机进行战略轰炸；2月，德国实行无限制潜艇战；2月，俄

	国发生共和政体革命；4月，美国对德宣战；10月，布尔什维克革命宣告了俄罗斯共和国的终结；11月，德国战胜罗马尼亚。
1918	3月，德国在西线开始“米加勒”进攻；3月，苏德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7月，协约国开始反攻；10月，土耳其帝国求和；11月，奥地利和德国在停战书上签字：西部前线停火。
1919	凡尔赛和约
1920	法国开始构筑马其诺防线
1926	液体燃料火箭发射
1929	纽约股票市场倒闭
1933	希特勒任德国总理，并开始重新武装德国。
1935	雷达被用于发现入侵的飞机；墨索里尼入侵并吞并埃塞俄比亚。
1936	德国莱茵河沿岸地区实行重新武装；西班牙内战（到1939年）。
1937	斯大林开始在军队中进行清洗
1938	德国入侵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被瓜分
1939	第一架直升飞机投入使用；涡轮喷气飞机试飞；3月，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8月，俄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到1941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
1940	4月，德国入侵丹麦和挪威；5月，德国进攻比利时西部，尼德兰投降；伞兵第一次使用于战斗（在荷兰）；丘吉尔成为英国首相；6月，墨索里尼向盟国宣战；法国投降；9月，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签署盟约。
1941	3月，英美租赁方案开始实施；4月，日俄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到1945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12月7日，日本轰炸珍珠港；12月11日，德国和意大利对美国宣战。
1942	5月，珊瑚岛海战；6月，米德威之战；10月，埃尔阿拉曼战役开始；首次发射V-2火箭；11月，英美联军在北非登陆；11月，原子连锁反应试验成功。
1943	2月，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军投降；7月，库尔斯克战役；盟军在西西里登陆；9月盟军攻占意大利大陆。
1944	喷气式飞机第一次使用于战斗；6月6日，诺曼底登陆；6月22日，苏联开始解放白俄罗斯的“巴格拉季昂行动计划”；7月，试图刺杀希特勒；12月，突出部战役。
1945	2月，雅尔塔会议；3月，东京遭猛烈轰炸；4月，美军占领冲绳；4月28日，墨索里尼被绞死；4月30日，希特勒自杀；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6月，联合国宪章通过；8月6日，第一枚原子弹投到广岛；8月8日，苏联向日本在满洲的阵地发起进攻；8月9日，第二枚原子弹投到长崎，日本无条件投降。
1946	第一台实用性电子计算机问世；胡志明进攻在北越的法国军队（到1955年）。
1947	印度独立
1948	5月，以色列国建立；第一次阿以战争。

1949　苏联制造出原子弹。北大西洋公约签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中国成立。

1950　6月，北朝鲜军队进入南朝鲜：朝鲜战争爆发；9月，麦克阿瑟反击；10月，中国人援助北朝鲜。

1953　3月，斯大林逝世；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字。

1954　第一艘核动力潜舰下水；5月，法军在北越奠边府战败；7月，根据日内瓦和平协定建立两个越南；11月，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

1956　第二次阿以战争；苏黎世登陆失败。

1957　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

1958　夏尔·戴高乐任法国总统（到1969年）

1960　洲际弹道导弹开始发展

1962　法国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

1965　美国增兵南越（到1973年）

1967　第三次阿以战争

1968　北越发动新年攻势

1972　第一次使用激光制导炸弹（灵敏炸弹）

1973　美国人从越南撤军

1973　第四次阿以战争

1980　巡航炸弹开始发展

1981　罗纳德·里根就任美国总统

1982　福克兰岛战争

1990　伊拉克占领科威特引发海湾战争

1991　海湾战争中首次出现使用巡航导弹的战斗

术语（词汇表）

A

amok combat　杀人狂战斗，印度尼西亚军事行动，由少数军事首领决策的单兵孤注一掷搏杀的战斗。

armada　军事舰队

armistice　停战，休战。

army group　军事集团，尤指二战时英国、美国、德国用以控制军队的各种部队指挥机关。

arquebus　火绳枪

artillery　火炮

attack in depth　纵深进攻

attrition　消耗战

Axis Powers　轴心国，1936年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联合，1940年日本加入，然后有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陆续加入。

B

B52 bomber　B52型轰炸机，50年代设计、60年代建造的美国轰炸机，以对付苏联的战略核战争；曾在越南战争和海湾战争中发挥巨大威力。

ballistic missile　弹道导弹

ballistics　弹道学

Bar Lev Line　巴尔—列夫防线，1967年阿拉伯—以色列六天战争后以色列在苏伊士运河畔建筑的防线。

bastion　棱堡

battalion　营

battlecruiser　2.5~3.5万吨吨位的装甲快速巡洋舰

battleship　吨位最大装备最齐全的战舰

bayonet　用于肉搏战的刺刀

BEF　英国远征军，一战和二战爆发时英国驻法军队。

Bf109　二战时德国的主要战斗机，梅塞施米特设计。

blockade　封锁，对诸如港口和供应线等战略要地进行阻隔。

bombard　古时使用的大口径火药炮

Bomber command　皇家空军指挥，空战指挥，指二战时阿瑟·哈里斯指挥的英国战略轰炸。

brevet major general　名誉晋级少将，美国南北战争时授予的临时全权军衔，战后联邦军队又恢复其原来的军衔。

brigade　旅或特别行动队

brigadier　旅长，特别行动队队长。

broadside　舷侧炮，偏舷齐放。

burg　堡垒，要塞（中世纪）。

C

Caisson　大型防水弹药或供应箱

Calibre　口径

Cantle　马鞍的后面弓形部分

Caravel　15 和 16 世纪用做战舰或商船的轻型帆船

carbine　卡宾枪、配有短枪管的轻型火器，用于骑兵。

carrack　14 及 15 世纪地中海地区用做战舰或商船的大帆船

casus belli　作为宣战的理由（或藉口）

catapult　弹弓（另见 torsion Catapult）

cattie　斤，一种中国计量单位约 1.33 磅。

cavalry　骑兵

centurion　（古罗马军用的）百人队队长

century　古罗马军团中最基本的构成单位（百人队）（60～170 人）

CIA　中央情报局，成立于 1947 年，负责所有的美国对外情报事务。

chassepot　蔡斯波特步枪，19 世纪后期法国的一种自动式枪机步枪。

chasseur　受训行动敏捷的法国步兵或骑兵

chasseur a pied　法国轻装步兵

chevauchee　马背上的突袭

chevaux-de-frises　棘篱刺栏(阻止骑兵等进攻的)钉有长的尖头钉的横木，在堑壕战中用于带刺的铁丝网之前

cohort　公元前 2 世纪末期古罗马最精锐步兵团，由三个支队组成，约 480 人。

Combined Bomber Offensive　联合轰炸进攻，在二战中由同盟国高级指挥部提出，但阿瑟·哈里斯拒绝合作执行。这一计划旨在将皇家空军以及美国第 8 和第 15 空军部队的力量结合起来。

Comintern　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由苏联领导共产党联合组织，后于 1943 年被斯大林解散（作为一个向二战中非共产党联盟友好的表示）。

Commission　授权，将权力授予官员的证明。

Cluster bomb　集束炸弹、集束燃烧弹，一种可发射出数个更小且密集的炸弹的炸弹。

commando umt　突击队

company　连、连队

condottiene 雇佣兵队长

conscription 征兵

corned gunpowder 一种颗粒状火药，以防其成分分解（143年发明于欧洲）。

corps 特殊兵种队

cruise missile 巡航导弹，高精密由计算机控制的导弹，可随地形按预先计划之路线击中目标，成功地运用于1991年的海湾战争。

cuirassier 穿戴着胸铠的法国骑兵

culverin 加农炮，可在远距离击中小目标。

D

defence in depth 纵深防御。相互联系的防御系统，并形成一个渐密排列的自卫防御网以阻拦攻击者的进一步前进。

depth charge 深海反潜艇炸弹

division 师，有一指挥部的3至5个旅组成的战术集团。

dragoon 龙骑兵，（古欧洲）重装骑兵。

dreadnought 无畏号战舰

drill 军事训练

dromon 由两排划手驱动的标准的拜占庭战舰

F

falconet （15到17世纪用的）小炮

feint 佯攻

fief 封地，采邑

firestorm 风暴性大火

flak 高射炮所发射的榴霰弹

flintlock musket 燧发枪，以打火石催燃火药的火枪。

FLN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在1954～1962年曾组织军队将法国军队驱出阿尔及利亚。

flower wars 15世纪及16世纪初，墨西哥谷的阿兹台克人为拯救被奴役的俘虏或祭慰牺牲者而与邻敌进行的宗教纷争。

free-fire zone 越战中南越所划定的自由射击区

frigste 护航舰

full-rigged ship 全帆船，一种大型木制帆船，以3至4根桅杆支撑一组合方型风帆来提供动力，并备有三角帆辅助侧向运动（首产于15世纪欧洲）。

G

galcass　一种16世纪的桨动船，比古代奴隶等划桨的单层甲板大帆船大而重。

galley　单层甲板大帆船。长型，单甲板，船身较低的战船，以桨和帆来驱动。

garrison　要塞驻兵

gladius　罗马人使用的双刃短剑

grapeshot　葡萄弹

grapnel　钩锚

greave　希腊、罗马步兵所佩的护胫垫甲

guerrilla　游击队员

H

halberd　戟

Harrierjet　鹞式喷气战斗机，一种可垂直升降的战斗机。英军在福克兰群岛战争中及美军在海湾战争中都曾使用过。

hastati　“长矛兵”，罗马军队中第一排持标枪、短剑的士兵。

hegemory　霸权

HellCat F6F fighter　泼妇F6F战斗机。美国海军战斗机。在二战中帮助美军在太平洋上与日军的战斗中争得制空权。

hetairoi　骑士，公元前4世纪麦瑟都尼军队中的战马上的全副武装者。

Ho Chi Minh Trail　胡志明小道（继北越领导人后，由美国人命名的），北越修建的，穿越老挝和柬埔寨的以渗透南越为目的的公路。

hoplite　装甲步兵，古希腊时，平时为农，战时为兵，并应用于密集方阵战斗中的人。

howitzer　榴弹炮

Hurricare　20世纪30年代末，为英国皇家空军制造，在不列颠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两种战斗机中的一种（又见Spitfire）。

hypaspisto　“执盾兵”。公元前4世纪麦瑟都尼步兵中的一种，位于队伍中心，并常尾随于骑兵之后。

I

impi　军队中的祖鲁战士，构成了一种军事阵式。

infantry　步兵

intelligence　为取得军事优势而获得的敌方情报

J

Jager　普鲁士轻步兵

javelin　轻细小标枪

K

kamikaze　“神风敢死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日本空军“敢死队”队员，驾驶满载炸弹的飞机去撞击轰炸目标，企图与之同归于尽。

keep　要塞（城堡的）高楼，最强固部分，一种坚固的塔形建筑。

Kriegsmarine　二战中的德国海军

L

lance　长矛

landwehr　年龄在17～40岁，不在其它军事服役的普鲁士民兵。

legion　军团，罗马军队中的主要集团单位，包括5000～6000人，并分为10个大队。

line ahead　海军战斗阵式，所有的战船以“一”字形纵向排开。

logistics　运输及补给军队的军事任务

Luftwatfe　德国空军

M

machine gun　机关枪

MACV:　美军之越南军事顾问团

“Magic”　“咒语”，日军在二战中被美军破译的海军密码代号。

Maginot Line：马奇诺防线。法国为防止德国入侵而修筑。但于1940年由于德国采用迂回战术而失去作用。

man-at-arms　中世纪晚期全副武装的骑兵

maniple　小型战术分队。人数约为200人。先是应用于罗马的密集方阵中，最后用于罗马的军团之中。

marines　海军

matchlock musket　火绳滑膛枪

meleetaltics　一系列的战船对战船的战斗

merecenary　雇佣军

militia　民兵

minie bullet　一种铅弹，底部中空，火药爆炸后推动凸缘，使子弹螺旋飞出，以提高准确度。

mortar　迫击炮

musket　滑膛枪

N

NATO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针对苏联的防御联盟势力。由1952年建立，参加国有美、英、加、法、比、荷、卢、丹、挪、冰岛、意、匈，1952年希腊、土耳其加入，1954年西德加入。

NCO　军士，如：中士、下士、上士。

needllegun　枪缺填弹步枪，可以快速填弹，首先由普鲁士军队使用。

O

OAS　一恐怖组织，致力于维护法属阿尔及利亚。

onager　投石机，石弩（古代和中世纪用的一种重型弩炮）。

ordne mince　普鲁士的一种短列阵型。18世纪时曾被法国步兵模仿使用。

ordre profonde：18世纪被法国步兵使用的一种长列阵型

P

panoply　全副甲胄

panzer division　德国装甲师

pezetairoi　步兵，公元前4世纪麦瑟都尼的正规步兵。

phalangite　古希腊密集方阵中的士兵

phalanx　方阵，步兵的一种阵式，特别是以矛为武器之时。

pike　古代步兵用的矛

pilum　罗马标枪

pistol　小型手枪

platoon　排

polis　古希腊的城邦

principes　罗马小型战术分队的第二行，装备以矛和短剑。

Pyrrhic victory　付极大代价而得到的胜利（古希腊易浦路斯国王Pyrrhus皮洛士在公元前279年在合诺克勒以极大牺牲打败罗马军队）。

Q

quarter master　后勤长官，负责军队的运输、补给及住宿。

R

RAF（皇家空军），大不列颠的皇家空降部队。

redoubt 小型防御据点

regiment 团

Reichswehr 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军队

rifled musket 复线滑膛枪，枪管内刻有螺旋槽，使子弹螺旋射出，以提高准确度。

S

salient 突出部

sapper 工兵

SAS （特种空军服务团）由上校大卫·斯特林组建的英军部队，强调隐密、突袭、智取的战术，以攻击敌军后方。

satrap 古时波斯一省的行政长官

schitron 中世纪的战斗中苏格兰执长矛的一队士兵

scutum 矩形的罗马弯盾牌

sepoy 以欧洲方式训练的印度兵（17~19世纪）

ship of the line 战列舰

sortie 出击，突击

Spitfire 喷火式战斗机，二战中英军主要的战斗机

SS 纳粹特种兵团

Stealth bomber 隐型轰炸机。一种应用多种复杂技术如计算机、特殊材料、精密设计等干扰敌方雷达系统的飞机。

storm troops 突击部队，原指1917~1918年德国的精锐部队，后指20~30年代纳粹党的准军事性组织。

Strategic Bomking Survey 关于二战间盟军的战略轰炸对德国战争经济影响的宽泛分析。

T

tercios 西班牙终生服役的步兵团，最初产生于1534年。

thetes 希腊城邦的无地贫民

torpedo 鱼雷

torsion catapult 一种靠解开绳索或其它物质产生的力量来发射弹药的弩炮。

trale italienne 依照几何图形设计的四边形堡垒，且有规律地在城墙边有凸出部分，产生于意大利，并在那儿发展成为“现代风格”。

trebuchet 中世纪的投石器

triplex acies 传统的罗马阵型，包括三个连续排列的队列，每个队列由十个分队组成，每分队由两个百人队组成。

trirari 在罗马军团中排列第三的小分队，以矛为武器。

trireme　古希腊、罗马的三层桨战舰，速度很快且备有起吊装置。

trunnions　可翘起独木舟的枢轴

U

U-boat　德国潜艇

“Ultra”　二战中盟军的情报密码代称，旨于破坏德军的高层信息、通道。

USAF　美国空军

V

V-1　二战中德军的飞弹

V-2　二战中德军的火箭

Viet Cong　对越共的贬称（西方报刊用语）

Viet Minh　50年代的越南，以游击战形式抗击法军的共产主义军事力量。

W

Waffen SS　由海尼瑞琪·西姆勒训练的德国精锐部队，战场上取胜有方，但由于对敌方的极端蔑视而成为众多罪行的煽动者。

Wagenbnrgen　车堡，由农家马车改装而成，15世纪波黑尼亚的胡斯第人曾使用过。

Wehrmacht　德国武装部队

Z

“Zero” fighter　零式战斗机、日本战斗机，二战初期它的飞行范围及空战能力使盟军惊叹不已。

参考书目

为了方便阅读和检索，以下涉及的各项内容绝大部分用英文表述，较重要的及有特殊用途的著作，均加星号标出。

在这众多总体性论述战争史的著作中，有6种较为突出：H·德尔布鲁克(Delbrück)的《在政治史框架中的战争艺术史》(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Political History (第4卷，西点出版——以下均省略“出版”二字，1975～1985)；J·F·G·富勒(Fuller)的《西方世界的军事史》(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 (第2卷，纽约，1957)；J·基根(Keegan)的《战争史》(A History of Warfare) (纽约，1993)；W·H·麦克内尔(McNeill)的《权力的追求——公元10世纪以来的技术、军队和社会》(The Pursuit of Power. Technology, Armed Force and Society Since AD 1000) (牛津，1983)；R·L·奥康奈尔(O·Connell)的《论武器和人——一部战争、兵器和侵略的历史》(Of Arms and Men. A History of War, weapons and Aggression) (牛津，1989)；还有A·瓦格斯(vogts)的《军国主义史》(A History of Militarism) (牛津，1959)。此外，M·霍华德(Howard)的《欧洲历史上的战争》(War in European History) (牛津，1976)用143页文字奇迹般地概括了作者所选的专题。

有关战争起因的综合性研究著作也非常之多。E·卢亚德(Luard)的《国际社会中的战争——关于国际社会学的研究》(War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纽约，1986)是其中最有权威性的一部。G·布莱尼(Blainey)的《战争的起因》(The Causes of Wars) (伦敦，1976)也很值得一读(虽然它只涉及1700年以后的历史时期)。R·I·罗特贝格(Rotberg)和T·K·拉布(Rabb)的《重大战争的根源和预防》)(The Origins and Prevention of Major Wars) (剑桥，1988)也囊括了范围广阔的文章，它们既有对一般理论的概述，又有对典型范例的评析。

如何备战和进行战争，有关此类著述中最著名的有E·N·勒特韦克(Luttwak)的《战略——战争与和平的逻辑》(Strategy. The logic of War and Peace) (剑桥，马萨诸塞，1987)；P·帕雷特(Parett)主编的《从马基雅维里到核时代现代战略学的创造者》(Maker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Machiavelli to the Nuclear Age) (普林斯顿，1986)；以及W·默里(Murray)、A·伯恩斯坦(Bernstein)和M·诺克斯(Knox)合编的《战略学的形成——统治者、国家和战争》(The Making of Strategy. Rulers, States and War) (剑桥，1994)。M·冯·克勒韦尔德(van Creveld)在《战争中的指挥》(Command in War) (剑桥，1985)也提出了战争对于身陷其中的人们所带来的挑战的精辟见解。J·基根撰写的《战争的真面目——阿金库特、滑铁卢和索姆河战役之研究》(The Face

of Battle. A Study of Agincourt, Waterloo and the Somme)(伦敦, 1976)就战争给那些直接参与者带来的挑战，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无可比拟的画面。最后，在M·E·霍华德（Howard)、G·安德列奥普洛斯（Andreopoulos)、以及M·R·舒尔曼（Shulman）合编的《战争的法则——西方世界中战争的强制性》(The Laws of War. Constraints on Warfare in the Western World)（纽黑文，1994）中，我们可以看到各撰稿人对规约西方战争的各种影响之研究的种种尝试。

虽然技术与军事的关系对于西方的作战方式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但直到1945年它才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且有关这方面的优秀著述，直到80年代才开始出现。此类著作中的佼佼者应首推达梅尔·R·赫德里克（Damel R·Headrick）的三部曲：《帝国的工具——技术与19世纪欧洲的帝国主义》(The Tools of Empire. Technology and European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牛津，1981)、《进步的触角——技术与帝国主义时代的转变，1850~1940年》(The Tentacles of Progress. Technology and Transfer in the Age of Imperialism, 1850~1940)（牛津，1988）以及《隐形武器：电信通讯与国际政治，1851~1945年》(The Invisible Weapon: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851~1945)（牛津，1992)。这三部曲展现了技术在西方发展中的重要贡献。另有M·冯·克雷韦尔德（van Creveld）的《从公元前2000年至当今的技术和战争》(Technology and War from 2000 BC to the present)（纽约，1989)，虽然（该书的题目）涉及广泛，但其论述的重点则在欧洲。

关于海军及海上力量的作用，可参见J·格利特（Glete）的《海军与国家——欧美的军舰、海军和国家建构，1500~1860年》(Navies and Nations. Warships, Navies and State Building in Europe and America, 1500~1860)（第2卷，斯托克霍姆，1993)；C·S·格雷（Gray）的《海上力量的影响——战争中海军的战略优势》(The leverage of Seapower. The Strategic Advantage of Navies in War)（纽约，1992)：以及G·莫德尔斯基（Modelski）和W·R·汤普森（Thompson）合著的《世界政治格局中的海上力量》(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伦敦，1998)。最后，有关战争经费的至关重要性（也是本书的主要话题)，请参阅L·尼尔（Neal）的《战争财政学》(War Finance)(第3卷，奥尔德萨特，1994)。

对本书所涉及的反映某一或若干编年段所发生的战争的著述及其撰稿人，现分列陈述如下：

第一章　步兵的起源

虽然Y·亚丁（Yadin）的图文并茂的概述《考古学研究之圣地的战争艺术》(The Art of Warfare in Biblical lands in the Light of Archaeological Study)（第2卷，伦敦，1963）写得深入浅出，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但却没有关于近东战争的综合性评述。A·费里尔（Ferrill）的《战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War)（纽约，1985）弥补了这方面的缺陷，该书包括了若干为非专业学者撰写的有关近东及埃及战争的章节。

对希腊战争史的研究在最近20年里有了重大突破，这主要得益于W·K·普里切特(Pritchett)的一部划时代意义的著作※《战争中的古希腊城邦》(The Greek State at War)(第5部分，伯克利，1971～1991）及其姊妹篇《古希腊地形之研究》(Studies in Ancient Greek Topography)（第8卷，伯克利，1965～1993)，该书则着重探讨古希腊诸战场与作战路线的问题。P·格林哈尔希（Greenhalgh）的《古希腊早期战争——荷马及远古时代的骑兵和战车》(Early Greek Warfare: Horseman and Chariots in the Homeric and Archaic Ages)（剑桥，1973），主要以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战争为主题。此外，涉及此类主题的著作还有G·阿尔伯格(Ahlberg）的《运用了古希腊几何图形艺术的陆上与海上战斗》(Fighting on Land and Sea in Greek Geometric Art)（斯德哥尔摩，1971）和J·拉塔克兹（Latacz）的《在卡利罗斯和提尔泰洛斯附近的伊利亚的战争狂热、战争描述和战争史实》(Kampfparnese, kampfdarstellung und Kampfwirklichkeit in der Ilias, bei Kallinos und Tyrtalos)（慕尼黑，1977)。

如果您想查寻关于战术、战略及战争演变的真实可信且具可读性的著述，可阅F·阿德科克（Adcock）的《古希腊与马其顿的战争艺术》(The Greek and Macedonian Art of War)（伯克利，1957)；P·迪克雷（Ducrey）的《古代希腊的战争》(Warfare in Ancient Greece)（纽约，1986)；Y·加兰（GarLan）的《古代战争》(War in the Ancient World)（纽约，1975)，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J·K·安德森（Anderson）的《色诺芬时代的军事理论与实践》(Military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Age of xenophon)※（伯克利，1970)。从以下著作您可查阅到一些关于古希腊战争的艺术再创作，以及获取一些极有价值的地图和图表，它们是J·哈克特（Hackett）所辑的《古代战争史》(A History of War in the Ancient World)（伦敦，1989)；J·沃里（Warry）的《古典时代的战争》(Warfare in the Classical World)（纽约，1980）以及P·康诺利（Connolly）的《战争中的古希腊和古罗马》(Greece and Rome at War)（伦敦，1981)。

阐述古希腊装甲步兵作战方式的发展及其演变的著作包括V·D·汉森(Hanson)的《西方的战争方式——古希腊步兵战》(The Western Way of War. Infantry Battle in Classical Greece)（纽约，1989）和他编辑的《古希腊装甲步兵：古代希腊作战的发展历程》(Hoplites: The Ancient Greek Battle Experience)（伦敦，1991)。他还著有关于古希腊战争的社会及经济问题的《古希腊的战争与农业》(Warfare and Agriculture in Classical Greece)（比萨，1983)。此类著作还有J·P·韦尔纳（vernant）编著的《古代希腊的战争问题》(Problmes de la guerre en Gr–ce ancienne)（巴黎，1968)；以及Y·加兰（Garlan）的《古希腊的攻城术研究》(Recherches de poliorctique grecque)（巴黎，1974)。对于古希腊盔甲及武器的研究，则反映在A·斯诺德格拉斯（Snodgrass）的《希腊早期的盔甲和武器》(Early Greek Armour and Weapons)（爱丁堡，1964）和《希腊的武器和盔甲》(Arms and Armour of the Greeks)（伊萨卡，1967）两部书中，而关于希腊战争中的地区性特征和专业化研究的优秀著作，则包括J·拉泽比（Lazenby）的《斯巴达的军队》(The Spartan Army)（威斯敏斯特，1985)；G·布霍（Bugh）的《雅典的骑兵》(The Horsemen of Athens)（普林

斯顿，1988）和J·贝斯特（Best）的《色雷斯人的盾牌及其对希腊战争的影响》(Thracian Peltast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Greek Warfare)(格罗宁根,1969)。D·卡根(Kagan)的《新编伯罗奔尼撒战争史》(New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第4卷，易萨卡，1969~1987）则向我们提供了简练而极其精彩的关于公元前431年至公元前404年间海上和陆上的重大战役的记叙。

第二章　从古希腊方阵到古罗马军团

关于希腊化时代的冗长复杂的战争故事，不曾留下确切而清楚的记述，但从广泛的研究著作中，我们却可挑拣组合出一个大概的轮廓。W·W·塔恩(Tarn)的《希腊化时代的军事及海军的发展(Hellenistic Military and Naval Developments)(剑桥，1930)提供了一些颇有价值并标明年代的概述。此类著作中较为翔实的还要算是H·德尔布吕克（Delbrck）的《古代战争》(Warfare in Antiquity)（西点，1975）及J·克罗迈尔（Kromaver）与G·维什（Weith）合著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军队事务和作战指挥》(Heerwesen und Kriegflhrung der Griechen und Romer)（慕尼黑，1928）以及H·洛利（Launey）的《希腊化时期军队之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armes hellnistiques)（巴黎，1949）。

在评述亚历山大大帝军事活动的诸多详尽的传记体著作中，N·G·L·哈蒙德（Hammonder）的《亚历山大大帝——国王、指挥家与政治家》(Alexander the Great：king，Commander and Statesman)（伦敦，1981）显示出作者对希腊军事的毕生研究之精华。此外，还有J·F·C 富勒（Fuller）的《亚历山大大帝的指挥才能》(The Generalship of Alexander the Great)（伦敦，1960），D·恩格斯（Engels）的《亚历山大大帝与马其顿军队的后勤》(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Logistics of the Macedoniar Army)（伯克利，1978）。近期还有一系列论及战争与战役的详尽介绍文章——A·M·迪瓦恩(Devine)撰写，发表于1983、1986年的《凤凰》(Phoenix）期刊及1985、1986、1987年的《古代世界》(Ancient World）期刊。

以雇佣军的发展为题的著作有G·T·格里菲思（Griftith）的《希腊化时代的雇佣军》(Mercenaries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剑桥，1935）及H·W·帕克（Parke）的《希腊雇佣兵》(Greek Mercenary Soldiers)（牛津，1933）。关于希腊化时代城邦国家的城防工事及坚固城墙的著作，包括A·W·劳伦斯(Lawrence)的《防御工事中希腊人的目标》(Greek Aims in Fortification)（牛津，1979）及F·E·温特（Winter）的《希腊防御工事》(Greek Fortifications)(多伦多，1971)。F·W·马斯登(Marsden)在他的两卷合集《古希腊罗马大炮》(Greek and Roman Artillery)（牛津，1969~1971）中回顾了弹弩和攻城术的发展过程。B·巴—科恰瓦Bar–kochava)的《塞琉古王族的军队》(The Seleucid Army)（剑桥，1976）是惟一一部关于王位继承人的军队的专业性著作。E·L·惠勒(Wheeler)的《计谋和军事谋略用语》(Stratagem and the vocabulary of Military Trickery)（雷顿，1988），以及D·怀特黑德（Whitehead）的《埃利阿斯兵法——如何在围困中逃生》(Aincias the Tactician：How to Survive

Under Siege) (牛津, 1960), 这两部著作都对希腊军事学发展中的各种类型进行了探讨。

关于早期古罗马军队的参考书目非常之多。其中可供非专业性查阅的概略性记述著作包括F·E·阿德科克 (Adcock) 的《共和政体下罗马的战争艺术》(The Roman Art of War under the Repulic) (牛津, 1940); E·加巴 (Gabba) 的《罗马共和国、军队和联盟》(Republican Rome, the Army, and the Allies) (牛津, 1976); L·凯佩 (keppie) 的《罗马军队的构成》(The Making of the Roman Army) (托托华, 1984); 还有H·M·D·帕克 (Parker) 的《罗马军团》(The Roman Legions) (牛津, 1971)。在共和政体下的人力和征兵等重要问题在以下著作中曾进行过论述: 有P·A·布伦特 (Brunt) 的《公元前225年至公元14年间意大利的人力资源》(Italian Manpower, 225 BC-AD14) (牛津, 1971); L·凯佩的《公元前47年至前14年意大利的殖民地化和老兵安置》(Calanisation and Veteran Settlement in Italy, 47~14 BC) (伦敦, 1983) 和C·尼科莱(Nicolet)的《罗马共和国的公民社会》(the World of the Citizen in Rpublican Rome) (伦敦, 1983)。J·A·布里森 (Brisson) 所辑的《罗马战争问题》(Problmes de la guerre Rome) (巴黎, 1969); J·苏奥拉蒂(Suolahti) 的《共和国时期罗马军队的下级军官》(The Junior Officers of the Roman Army in the Repulican Period) (赫尔辛基, 1955); 还有P·库耶荪 (Couissin) 的《罗马兵器》(Les armes romaines) (巴黎, 1926), 此书涉及了共和国政体下的军队组织和编制。

第三章 罗马战争方式

论及 (古罗马) 帝国军团的著述非常之多, 大概可供非专业人员讨论的最易查寻的要算G·韦伯斯特 (Webster) 的《罗马帝国军队》(The Roman Imperial Army) (第3版, 伦敦, 1985) 和G·R·沃森 (Watson) 的《罗马士兵》(The Roman Soldier) (伦敦, 1983) 及M·格兰特 (Grant) 的《恺撒的军队》(Armies of the Caesars) (纽约, 1974)。关于帝国的战略及军事力量的作用这类更广泛且有争议的论题, 则由以下诸位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了论述: 有E·卢特瓦克 (Luttwak) 的《罗马帝国的伟大战略》(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巴尔的摩, 1976); A·菲利尔 (Ferrill) 的《罗马帝国的衰落——军事原因》(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The Military Explanation) (伦敦, 1986); B·艾萨克(Isaac)的《帝国的局限——东部的罗马军队》(The Limits of Empire: The Roman Army in the East) (牛津, 1996) 以及C·R·惠特克 (Whittaker) 的《罗马帝国的前线》(Frortiers of the Roman Empire) (巴尔的摩, 1994)。E·惠勒 (Wheeler) 在《军事史杂志》(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第6期 (1993), 第7~41页和第215~240页中对罗马的各种重大战略方式进行了较为真实的概述。

日益突出的军队臃肿, 以及诸如职业性兵役期等实际问题, 在下列有关著作中得以论述: E·伯利(Birley)的《罗马军队——1929~1986的论文》(The Roman

Army. Papers 1929～1986)（阿姆斯特丹，1988)；R·戴维斯（Davies）的《罗马军队的兵役》(Service in the Roman Army)(纽约，1989)和J·C·曼(Mann)的《罗马帝国时期军队的征兵与老兵的安置》(Legionary Recruitment and veteran Settlement during the Principate)（伦敦，1983)。至于后期军民的矛盾问题，可见R·麦克米伦(MacMullen)的《罗马帝国末期的士兵与市民》(Soldier and civilian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剑桥，马萨诸塞，1963)。在帝国政体下，罗马的军事设备和基本设施变得越来越复杂。可参考的是A·约翰逊(Johnson)的《罗马堡垒》(Roman Forts)(伦敦，1983)；H·R·鲁宾逊(Robinson)的《罗马帝国的甲胄》(The Armour of Imperial Rome)（伦敦，1975)；M·比索普(Bishop)和J·科尔斯顿(Coulston)合著的《罗马军备》(Roman Military Equipment)（伦敦，1993)；还有V·A·马克斯菲尔德（Maxfield）的《罗马军队的军事装饰》(The Military Decorations of the Roman Army)(伦敦，1981)。至于非军团部队，可参见G·L·切斯门（Cheesman）的《罗马帝国军队中的备用部队》(The Auxilia of the Roman Imperial Army)（牛津，1914）和P·A·霍尔德（Holder）的《从奥古斯都到图拉真的罗马军队中备用部队之研究》(Studies in the Auxilia of the Roman Army from Augustus to Trajan)(牛津，1980)；而更近期的著作有D·B·塞丁顿(Saddington)的《从恺撒到韦帕芗罗马备用部队之发展》(公元前49年至公元79年)》(The Development of the Roman Auxiliary Forces from Caesar to Vespasian (49BC–AD79)（哈拉雷，1982)。

罗马连年征战，与许多顽强的敌人发生过战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有许多优秀的著作。首先是J·F·拉泽比（Lazenby）的《汉尼拔的战争》(Hannibal's War)（沃明斯特，1978）以及G·韦伯斯特（Webster）的《罗马人侵大不列颠》(The Roman Invasion of Britain)（伦敦，1980)；M·芬特雷斯（Fentress）的《努米底亚和罗马军队》(Numidia and the Roman Army)（牛津，1979)；I·罗斯（Rossi）的《图拉真的军团和达西亚战争》(Trajan's Column and the Dacian Wars)(伦敦，1971)。至于罗马的战舰和海军，请参见L·卡森(Casson)的《古代海员》(The Ancient Mariners)（伦敦，1959）和《古代的战舰和海军》(Ships and Seamanship in the Ancient World)（普林斯顿，1971)；J·鲁热(Roug）的《古代海军》(La marine dans l'antiquit)（巴黎，1975)；尤其是C·G·斯塔尔（St–arr）的《罗马帝国的海军》(The Roman Im–perial Navy)(纽约，1941)。关于古时海军之总述，J·S·莫里森（Morrison）和R·T·威廉(Williams)的《公元前900～前322年希腊的划桨船》(Greek Oared Ships 900～322BC)（剑桥，1968）一书是不可不看的。

第四章 罗马防御工事

关于中世纪的历史，读者可查寻两本并不十分可靠的书籍。第一本为菲利浦·康坦因（Philippe Contamine）的《中世纪的战争》(War in the Middle Ages)(牛津，1984)。此书代表了欧洲主要的中世纪军事史家的所有研究成果（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先于它15年已有此类研究成果)，其包括最新的军事装备之

评述的法语修订本于1992年出版。第二本是J·F·费尔布吕根（verbruggen）的《公元8世纪至1340年间西欧中世纪的战争艺术》（The Art of War in Western Europe during the Middle Ages,from the Eighth Century to 1340）（阿姆斯特丹—纽约，1977），这是一本精彩的综合性史书，但只反映了1950年以前的研究成果，而未包括原荷兰版的脚注。

一系列重要的且相对崭新的专题讨论丛书大大改变了由康坦因提出的传统看法。如J·布拉伯格（Bradburg）的《中世纪的围攻》（The Medieval Siege）（木桥，1992）和R·罗杰斯（Rogers）的《12世纪的拉丁围攻战》（Latin Siege Warfare in the twelfth Century）（牛津,1992）,还有B·S·巴克拉克(Bachrach)的《中世纪的包围战：一次实地勘察》（Medieval Siege Warfare：A Reconnaissance），（军事史期刊第七期，1994），展示了人们对中世纪军事史的认知方式之再思索的需求。K·R·迪弗里斯（Devries）的先驱作品《中世纪军事技术》（Medieval Military Technology）（彼得堡，1992）也为我们提供了再思索的领域，为中世纪军事人口统计学提供基础的是K·－F·沃纳（Werner）在《关于中世纪初期中部意大利的研究周刊》(Settimane di Studio del Centro Italiano di studi sull alto Medioevo)（第2卷，斯普莱陀，1968）的第 791～843页“10至11世纪德意志王国的军队组织与作战指挥”中所叙述的内容。

这一章有关十字军东侵以前的资料来自B·S·巴克拉克（Bachrach）的《墨洛温王朝的军事组织,481～751年》(Merovingian Military Organization,481～751)（明尼阿波利斯，1972）、《中世纪早期西方的军队和政治》（Armies and Politics in the Early Medieval West）（伦敦，1993）及《一场小规模战争的剖析：一部冈多瓦得事务的外交军事史》〔The Anatomy of a Little War：A Diplomatic and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Gundovald Affair (568～586)〕（博尔德，1994）。至于11世纪及其以后，请见J·吉林厄姆（Gillingham）的佳作《理查一世和中世纪战争学》（Richard I and the Science of War in the Middle Ages），此文章收入吉林厄姆和J·C·霍尔特（Holt）编辑的《中世纪的战争和政府——为纪念J·O·普鲁斯特韦奇而作的几篇文章》（War and Goverment in the Middle Ages. Essays in Honour of J·O·Prestwich）（木桥，1984）中的第78～91页；还有C·哈珀—比尔（Harpe—Bill）的《战争中的假威廉》（William the Bastard at War）及 C·霍尔兹沃思（Holdsworth）和J·L·纳尔逊（Nelson）所辑的《R·艾伦·布朗的中世纪史研究》（Studies in Medieval History Presented to R. Allen Brown）（木桥，1989）第 141～158页；此外，还可见P·R·克洛斯（Cross）及S·D·劳埃德（Liovd）合辑的《13世纪的英格兰》（Thirteenth Century England）（木桥，1990）第1～13页中的《威廉将军史中的战争与骑士制度》（War and Chivalry in the History of William the Marshall）。

关于英格兰的基本著述仍主要是C·沃伦·霍利斯特（Warren Hollister）的《盎格鲁—萨克森军事组织》(Anglo-Saxon Military Organization)（牛津,1962）和《诺曼英格兰的军事组织》(The Military Organization of Norman England)（牛津，1965）；而R·阿尔贝斯（Abels）的《英国盎格鲁—萨克森的贵族和军事

义务》(Lordship and Military Obligation in Anglo-Saxon England)(伯克利，1988)一书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趣的诠释。还有H·比莱尔(Beeler)的《英国战事，1066~1189年》(Warfare in England, 1066~1189)(伊萨卡，1971)是一本百科全书。至于西班牙，可详见詹姆斯·波尔(James Power)的《一个为战争而组建的社会——中世纪中期的伊比利亚城市民兵组织，1000~1284年》(A Society Organized for War: the Iberian Municipal Militias in the Central Middle Ages, 1000~1284)，而在德国则可见L·奥尔(Aner)的《关于奥图大帝和法兰克一世时期军队的研究》(Studien zum Heer der Ottonen und der ersten Salier)(919~1056)(波恩，1985)。

关于十字军的史实，R·C·斯梅尔(Smail)的《公元1097至1193年的十字军战争》(Crusading Warfare 1097~1193)(剑桥，1956)和C·马歇尔(Marshall)的《拉丁东部的战事，1192~1291年》(Warfare in the Latin East, 1192~1291)(剑桥，1992)是其中的基础性著作，而D·C·尼科尔(Nicolle)的《十字军时代的武器及装备，1050~1350年)(Arms and Armour of the Crusading Era, 1050 - 1350》(第2卷，纽约，1988)则是对它的补充，这是一部权威性著作，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十字军本身。拜占庭曾被许多科技著作加以描述，如J·霍尔登(Haldon)的《拜占庭的古罗马禁卫军》(Byzantine Practorians)(波恩，1984)；M·C·巴图希斯(Bartusis)的《晚期拜占庭军队：武器和社会，1204~1453年》(The Late Byzantine Army: Arms and society, 1204~1453)(费城，1992)和J·R·帕廷顿(Pantington)的《希腊火和火药的历史》(A History of Greek Fire and Gunpowder)(剑桥，1980)，等。

R·H·C·戴维斯(Davis)的《中世纪的战马》(The Medieval Warhorse)(伦敦，1989)虽然漏洞颇多，但确有其价值。C·吉尔默(Gillmore)在《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历史之研究》(Studies in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History)中所述的"实用骑兵制度：为比赛和战事训练马匹"，是一部对骑兵战事的基本理解性书籍。还有J·布拉德伯里(Bradbury)的《中世纪弓箭手》(The Medieval Archer)(纽约，1985)对投掷武器的研究至关重要。关于海军事务，详见R·W·安吉尔(Unger)的《中世纪经济活动中的船舶，600~1600年》(The Ship in the Medieval Economy, 600~1600)(伦敦，1980)；A·R·刘易斯(Lewis)和T·J·鲁尼恩(Runyan)合著的《欧洲海军和海运史，300~1500年》(European Naval and Maritime History, 300~1500)(布鲁明顿，1985)；以及John H·普赖尔(Pryor)的《地理、技术和战争。地中海地区海运史研究，649~1571年》(Geography, Technology and War. Studies in the Maritime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649~1571)(剑桥，1988)和J·海沃德(Hayward)的《黑暗时代的海军力量：法兰克及盎格鲁·萨克森人的航海活动之重新评价》(Dark Age Naval Power: A Reassessment of Frankish and Anglo - Saxon Seafering Activity)(伦敦，1991)，均囊括了许多参考书目提要。

关于防御方面更多的、更有用的知识信息可见J·-F·菲罗(Fin)的《中世纪的法国城堡》(Fortresses de la France mdivale)(第3版，巴黎，1977)。R·A·布朗(Brown)的《英国的城堡》(English Castles)(第3版，伦敦，1976)

和C·L·萨尔奇（Sal-ch）的《法国中世纪城堡及工事辞典》(Dictionnaire des chteauxet des fortificat-ions du Moyen Age en France)(斯特拉斯堡,1979)。然而，无论从军事史还是从战争史来说，这一主题还未被规定为一个正式的概念，可将B·S·巴克拉克（Bachrach）和R·阿里斯（Aris）合著的《技术与文化》(Tec-honology and Culture)（1990）中的第1～17卷“军事技术及驻军组织：关于盎格鲁—萨克森基于自治市赋税法的军事思想的一些观察”，同巴克拉克在《海神之子》(Albion)（1992）第301～304页所写的简短评述性文章加以比较。

第五章 新武器 新技术

除了参考书目第四章所提及的费布吕根和康坦因进行的一般性研究外，P·康坦因（Contamine）的《1337～1494年法国中世纪晚期的战争、国家和社会——法国君主军队之研究》(Guerre, Etat et socit la fin du moyen age.Etudes sur les armes des rois de France, 1337～1494)（巴黎，海牙，1972），记录了关于中世纪晚期法国的军事团体的基本研究；而他所编的论文集《14、15世纪的法国——人、精神状态，战争与社会秩序》(La France aux XIVe et XVe sicles. Hommes, mentatlits, guerre et paix)（伦敦，1981），囊括了许多对于研究那一时期战争有用的资料。至于英格兰，H·J·休伊特（Hewitt）的《爱德华三世统治下的战争组织，1338～1362》(The Organization of war under Edward Ⅲ, 1338～1362)（曼彻斯特，纽约，1966），虽写得过于狭隘，但他着重于逻辑，采用了对于研究战争来说是一种全新的方法。M·C·A·瓦莱（vale）的《中世纪末期英国、法国和勃艮第地区的战争和骑士，战事和贵族文化》(War and Chivalry,Warfare and Aristocratic Culture in England,France and Burgundy at the End of the Middle Ages)（伦敦，1981），强调并维护贵族阶层在战争中的作用。而他在C·T·奥尔曼（Allmand）所辑的《中世纪的战争、文学与政治》(War,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late Middle Ages)（利物浦，1976）第57～72页中的文章《新技术与旧理想——百年战争末期大炮对战争及骑兵的影响》，讨论了火炮的用途及影响。B·H St.J·奥尼尔（O'Neil）的《城堡与火炮》(Castles and Cannon)（牛津，1960），则将火炮的发展与建筑的发展联系起来。K·A·福勒（Fowler）编辑的《百年战争》(The Hundred Years War)（伦敦，1971），是若干学者撰稿的富有价值的论文集。其中收有C·F·里士满（Richmond）所写的《百年战争中1422至1440年间的海洋控制》(The Keeping of the Seas during the Hundred Years War: 1422～1440)（也载于《历史学刊》第18卷，1964年，第283～298页），论述了这一时期内海战的贡献与局限。C·J·罗杰斯(Rogers)的《百年战争中的军事革命》(The Military Revolutions of the Hundred Years' War)（见《军事史学刊》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lvii, 1993，第241～278页），对关于中世纪后期军事发展的论争做出了贡献。

第六章 火药革命

发生在 1500年左右的欧洲军事变革一直引人注目。这方面的资料可见G·帕克(Parker)的《军事革命,军事革新及西方之崛起,1500~1800年》(The Military Revolution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1500~1800) (剑桥, 1988, 第二修订本, 1995); J·M·布莱克 (Black) 的《一场军事革命? 军事变革及欧洲社会, 1550~1880年》(A Military Revolution?Military Change and European Society, 1550~1880) (伦敦, 1991), 还有C·J·罗杰斯 (Rosers) 编辑的《军事革命之论争》(The Military Revolution Dabate) (布尔德, 1995)。这一时期其他重要的关于军事变革的著作包括C·克里斯蒂 (Cresti)、A·法拉 (Fara) 和D·兰伯利尼 (Lamberini) 编辑的《军事建筑学——16世纪的欧洲》(Architettura militare nell' Europa del XV I secolo) (西亚那, 1988); A·吉耶尔姆 (Guillerm) 的《基石与风势——欧洲的防卫及海上活动》(La pierre et le vent · Fortlfications et marine en Occident) (巴黎, 1985); J·R·黑尔 (Hale) 的《文艺复兴战争研究》(Renaissance War Sin - dies) (伦敦, 1984) 及※S·佩珀 (Pepper) 和N·亚当斯 (Adams) 的《武器与防御——16世纪的军事建筑与围困战》(Military Archiecture and siege Warfare in Sixteenth-Century Siena) (芝加哥, 1986)。

第七章 舰队

C·M·西波拉 (Cipolla) 于30年前曾发表的创造性研究成果之一《1400~1700年间欧洲早期扩张中的枪炮与航海》(Guns and Sails in the Early phase of European Expansion 1400~1700) (伦敦, 1965), 这部书至今仍有许多新的研究价值和参考价值。A·吉耶尔姆的《基石与风势》(La pierre et le vent) 和 G·帕克的《军事革命》(The Military Revolution) 这两部书都有相关章节。但此方面的研究最成功的当属J·格莱特 (Glete) 的那部雄心勃勃的《海军和国家》(Navies and Nations) (见第385页)。有两部书在论及地中海地区军事发展情况方面十分出色: 它们是J·F·吉尔马丁 (Guilmartin) 的《火药与战舰, 16世纪的科技改进与地中海海战》(Gunpowder and Galleys·Changing Technology and Mediterranean Warfare at Se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剑桥, 1974)。还有J·H·普赖尔 (Pryor) 的《地理、技术与战争——地中海历史研究: 649~1571年》(Geography, Technology and War. Studies in the Maritime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649~1571) (剑桥, 1988)。有关英国海军的发展, 见D·M·洛德斯(Loades) 的《都铎王朝海军———部管理、政治、军事史》(The Tudor Navy. An Administrativ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History) (伦敦, 1992); B·卡普 (Capp) 的《克伦威尔时期的海军, 舰队和英国革命, 1649~1660年》(Cromwell's Navy. The Fleet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649~1660) (牛津, 1989) P·M 肯尼迪 (kennedy) 的《英国海上霸权的兴起与衰落》(The Rise and Fall of English Naval Mastery) (伦敦, 1976); 以及N·A·M·罗杰 (Rodger) 的《木头世界——乔治王朝海军的剖析》(The Wooden World. An Anatomy of the Georgian Navy) (伦敦, 1986)。有关西班牙的海军力量,

可见R·A·斯特拉德林（Stradling）的《弗兰德的舰队——西班牙的海洋政策与欧洲战争，1568～1668》）（The Armade of Flanders.Spanish Maritime Policy and European War，1568～1668）（剑桥，1992），以及C·J·M·马丁（Martin）和G·帕克（Parker）的《西班牙无敌舰队》（The Spanish Armada）（伦敦，1988）。关于再晚一些的战争冲突，是G·西姆科克斯（Symcox）的《法国海上力量的危机 1688～1697》（The Crisis of French Sea-Power 1688～1697）（海牙，1974）；J·普里查德（Pritchard）的《技术与文化——从造船主到海军缔造者：18世纪法国海军造船主的专业化历程》（From Shipwright to Naval Constructor: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Eighteenth-Century French Naval Shipbuilders',Technology and Culture）（第28卷，1987）；及J·埃尔门（Ehrman）的《1689～1697年威廉三世：战争中的海军——其状况与发展方向》（The Navy in the War of William Ⅲ 1689～1697.Its State and Direction）（剑桥，1953）。

第八章 对美洲的征服

西班牙对于新大陆的令人惊叹的征服给予了19世纪著名史学家威廉·H·普雷斯科特（William·H·Prescott）以创作灵感。他写的《墨西哥的征服》（Conquest of Mexico）（1843）和《秘鲁的征服》（Coequest of Deru）（1847），树立了经历百年考验的史书之榜样。J·赫明（Hemming）的《印加人的征服》（The Conquest of the Incas）（纽约，1970）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接近这一水平的还有H·托马斯（Thomas）的《墨西哥的征服》（The Conquest of Mexico）（伦敦，1992）。科特斯（cortés）对他的战役的描述由A·帕格登（Pagden）出色地翻译过来，译文即《墨西哥的来信》（Letters form Mexico）（纽黑文，1986）。他的上尉贝拉尔·迪亚查·德·卡斯特罗，则被描写于《新西班牙的征服》（The Conquest of New Spain）（巴尔的摩，1963）中。

至于秘鲁，加西拉索·德·拉·维加（Garcilaso de la vega）的《对印加人的忠实评价》（Royal Commentaries of the Incas）第3卷（1617，奥斯汀，1966），提供了一个西班牙上尉的私生子对那些战役的描述。对西班牙针对印加人的战争之研究，最精彩的当属J·F·吉尔马丁（Guilmartin）在K·安德里恩（Andrien）和R·阿多尔诺（Adorno）合编的文集《跨越大西洋的遭遇》（Transatlantic Enc-ounters（伯克利，1991）中的文章《尖利的边缘：对西班牙人侵及印加王国覆灭的分析，1532～1549年》（The Cutting Edge: an Analysis of the Spanish Invasion and Overthrow of the Inca Empire，1532～1549）。I·克伦丁林（Clendinnen）的《尴尬的征服者：尤卡坦的玛雅人和西班牙人：1517～1570年》（Ambivalent Conquests:Maya and Spaniard in Yucatan，1517～1570）（剑桥，1987）为尤卡坦的征服史提供了最好的英文记叙。

16世纪有几位西班牙宗教领袖批评过新大陆战争的残酷性。弗里昂·巴托罗梅·德·拉斯·加萨斯（Friar Bartolomde Las Casas）的《印第安人的悲惨境遇》（The Devastation of the Indies）（1552，巴尔的摩，1992）暗示了这种武力的滥用。其它16世纪的传教士协助当地作家撰写了贬抑战争的评论或写成带有

图画的文章，以此来揭露战争对人民生活的蹂躏。弗里昂·巴拉迪罗·德·萨阿贡（Friar Bernardio de Sahagn）曾协助他人撰写了一部名为《佛罗伦萨的抄本》(The Florentine Codex)（第12卷，桑塔菲，1950～1982）的书。弗里昂·迭戈·杜兰（Friar Diego Durn）也创作了一部作品，名为《印第安人的历史》(Historia de Las Indias)（第2卷，墨西哥，1967）。西班牙的菲利浦二世国王认为，此类作品有颠覆倾向。不管怎样，这两部作品仍得以问世于20世纪。M·莱昂—波蒂拉（Len–Portilla）的《断矛》(The Broken spears)（波士顿，1962）用易于理解的方式概括了此类著作。R·哈西格(Hassig)的《阿兹特克战事》(Aztec Warfare)（诺曼，1988）利用牧师们收集的资料探讨了当地的战争。至于巴西，J·亨明（Hemming）的《赤金——对巴西印第安人的征服》(Red Gold:The Conquest of the Brazilian Indians)（剑桥，1978）一书，也是很优秀的。

至于北美的英国人，D·利奇（leach）的《燧发枪与石斧》(Flintlock and Tomahawk)(纽约，1966)是一部虽有漏洞却可一读的书，而P·马隆（Malone）的《懦怯的战争方式》(Skulking Way of War)（兰汉姆，1991）则是一部就地采用欧洲技术的精彩记叙文。荷兰人在北美的军事经历一度被人所忽视，这是因为大多数现存的资料均是由反战者所整理收集的。F·詹姆森(Jameson)在《新荷兰人的叙述》(Narratives of New Netherland)（纽约，1909）中描写了那些战争的反对者，而J·F·拉尔(Laer)的《有关新荷兰的文献》(Documents Relating to New Netherland)（圣马利诺，1924）则对体现在曼哈顿的原始堡垒的工程学方面的详细情况进行了生动描述。

关于法国在美洲的战争描写多集中在加拿大，对加勒比地区的描写是很少的。法裔加勒比人P·布谢（Boucher）所写的《遭遇食人族》(Cannibal Encounters)(巴尔的摩，1992)是加勒比地区的一流作品。对于加勒比地区来说，哈克路伊特社团出版的这些卷本的著述是无与伦比的：K·R·安德鲁斯(Andrews)的《德雷克和豪肯斯的最后旅行》(The Last Voyage of Drake and Hawkins)（剑桥，1972，第2系列丛书，第113卷）及M·F·基勒（keeler）的《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的西印度之行，1585～1587》(Sir Francis Drake's West Indian Voyage, 1585～1587)（伦敦，1981；第2套，第17卷）。

第九章　王朝战争

C·W·C·奥曼（Oman）的优秀之作《16世纪战争艺术史》(A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伦敦，1937），尽管其方法已趋落后，但仍不失为对单个军事事件的最详尽描述。若想获取更富挑战性而勿需较多具体细节的观点，请读M·S·安德森（Arderson）的《1620～1789年间欧洲的战争与社会》(War and Society in Europe 1620～1789)（伦敦，1988）；J·R·黑尔(Hale)的《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战争与社会：1450～1620年》(War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Europe,1450～1620)（伦敦，1985）；黑尔的《文艺复兴战争研究》(Renaissance War Studies)（伦敦，1984）及F·塔利特（Tallett）的《近代欧洲的战争与社会，1495～1715年》(War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1495~1715)(伦敦, 1992)。

这一时期最激动人心也是最重要的研究新课题是军事后勤学。这方面可参看M·冯·克勒韦尔(van Grevelt)的《战争补给——从沃伦斯坦到帕顿的后勤学》(Supplying War. Logistics from Wallentein to Patton)(剑桥, 1977);J·A·林恩(Lynn)编辑的《喂养战争——从中世纪至今的西方战争后勤学》(Feeding Mars: Logistics in Westen Warfare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Present)(伯尔德, 1993)则展示了极出色的研究和新的透视成果;G·帕克的《弗兰德军队和西班牙道路——欧洲国家战争中胜利与失败的后勤学, 1567~1659年)(The Army of Flanders and the Spanish Road. The Logistics of Victory and Defeat in the low Countries' Wars, 1567~1659)(剑桥, 1972; 修订版, 1989),也是此类著作中的佳作。一些为J·A·林恩编辑的《1445~1871年间的战争工具、装备、观念及作战原则》(Tools of War, Instruments, Ideas and Institutions of Warfare 1445~1871)(厄伯那, 1989)一书撰稿的作者,突出强调了战争中改进技术的重要性。

M·马莱特(Mallett)及J·R·黑尔对意大利的战争进行了非常细致而有效的举例分析研究。他们著有《文艺复兴之城邦威尼斯的军事组织, 1400~1617年》(The Military Organization of a Renaissance State: venice, C. 1400~1617年)(剑桥, 1984),此类著作还有佩珀与亚当斯合著的《火器与防御工事》(Firearms and Fortifications)(见第六章目录)。近现代法国战争的发展并不算太好,也许是因为占主流的历史学派倾向于否定战争的重要性,此可见F·洛特(Lot)的《对法国军队在意大利及该地区的战争影响之再研究, 1494~1562年》(Recherchessur les effectifs des armes francaises des guerres d' Italie aux guerres de religion, 1494~1562)(巴黎, 1962),以及P·康坦因编辑的《1715年后的法国军事史》(Histoire militaire de la France. i. Desorigines à 1715)(巴黎, 1992)。至于西班牙,首先要阅读I·A·A·汤姆森(Thompson)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与统治, 1560~1620年》(War and Goverment in Habsburg Spain, 1560~1620)(伦敦, 1976)。至于西班牙寻求在欧洲的霸权并为此而进行的战争一节,请见G·帕克的《菲利浦二世的伟大战略》(The Grand Strategy of Philip Ⅱ)(纽黑文, 1996)、《西班牙与荷兰, 1559~1659年》(Spain and the Netherlands, 1559~1659)(伦敦, 1979; 修订本, 1991)及《荷兰反叛》(The Dutch Revolt)(伦敦, 1977; 修订版, 哈蒙斯沃恩, 1985)。关于三十年战争可见于G·帕克的《三十年战争》(The Thirty Years' War)(伦敦, 1984)及H·兰格(Langer)的《三十年战争》(The Thirty Years' War)(普尔, 1980; 此书着重论述了战争的社会历史)。J·D·凯尼恩(Kenyon)研究并描述了不列颠群岛的众多战争,为此他写了《英格兰内战》(The Civil Wars of England)(伦敦, 1988);C·卡尔顿(Carlton)也在《投入战争——不列颠内战体验, 1638~1651》(Going to the Wars. The Experience of the British Civil Wars, 1638~1651)(伦敦, 1992)中作了详尽的分析,也许该书是至今为止对战争的现代特色所做的最确切的描述。

第十章 冲突中的国家

第九章的史书文献目录介绍了近现代欧洲的战争和社会情况，现代最具综合性的对17世纪法国军队的描述是A·科维希尔（Corvisier）所写的《法兰西军事史》（Histoire militaire de France）（见第九章书目）。有少数法国传记描写了路易十四统治时期重要的军队指挥员的故事，如L·安德烈（Andr）的《米歇尔勒泰利耶》（Michel Le Tellier）（巴黎，1906）；C·鲁塞特（Rousset）的《卢瓦尔的历史》（Histoire de Louvois）（第4卷，巴黎，1862~1864）。这些记载都是经典之作。而A·科希维尔的《卢瓦尔》（Louvois）（巴黎，1983），也应列入此类作品中，此外还有J·A·林恩用英文写的《对伟大世纪中法国军队发展的再估价，1610~1715年》（Recalculating French Army Growth during the Grand Siècle，1611~1715），该文载于《法国历史研究》（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第19卷（1994）。

路易十四的战争仍有待于历史学家们的注意。但若读P·松尼诺（Sonnino）的《路易十四与荷兰战争起源》（Louis XIV and the Origins of the Dutch War）（剑桥，1989），则可了解到这位太阳王政策中的有趣观点。传记再次提供了历史研究的通行方法。比如J·贝朗热（Bérenger）的《蒂雷纳》（Turenne）（巴黎，1987）及C·C·斯特吉尔（Sturgill）的《马歇尔·维拉及西班牙的继承权战争》（Marshall Villars and the 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莱克星顿，1965）。S·巴克斯特（Baxter）在《威廉三世与欧洲的自由防御：1650~1702年》（William Ⅲ and the Defense of European liberty，1650~1702）（纽约，1966）中，描写了路易最大宿敌的生活和工作情况。路易的最后一次战争——西班牙继承权战争，为最杰出的英国战将马尔巴勒公爵提供了表演的舞台，其开拓精神毫无疑义地吸引了英国作家的极大关注，此点可见温斯顿·丘吉尔（公爵后裔）的《马尔巴勒：他的生活及他的时代》（Marlboroughn：his life and times）（第6卷，伦敦，1933）及D·钱德勒（Chandler）的《军事指挥家马尔巴勒》（Marborougy as a Military Commander）（伦敦，1973）。对于军队的描述则可见R·E·斯考勒（Scouller）的《安妮女皇的军队》（The Armies of Queen Anne）（牛津，1966）。

关于俄罗斯作为军事大国出现的记载，见C·达菲（Duffy）的《俄罗斯军事西进之路》（Russia's Militry Way to the West）（伦敦，1981），对沙皇大帝本人的描写，见V·O·克柳切夫斯基（Klyuchevsky）的《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纽约，1958）。有关崛起的普鲁士的叙述，可见G·里特（Ritter）的《弗里德里克大帝：一个历史侧面》（Frederich the Great：a Historical Profile，tr. P. Paret）（伯克利，1968）及C·达菲的《弗里德里克大帝的军事生涯》（The Military life of Frederick the Great）（纽约，1986）。这位多产作家在《玛利亚·得雷沙的军队》（Army of Maria Theresa）（纽顿阿伯特，1977）中描写了弗里德里克的奥地利对手。至于18世纪英军的情况，请见J·A·霍尔丁（Houlding）的《适应胜任服兵役：1715~1795年不列颠军队的训练》（Fit for Service：the Training of the British Army 1715~1795）（牛津，1981）。A·科希维尔

(Corvisier)在《18世纪末舒瓦瑟尔内阁时期的法国军队:士兵》(L'arme francaise de La fin du XVⅢe side an ministre de Choiseul: le soldat)(第2卷，巴黎，1964)中对法国军衔进行了最完整的统计。L·肯尼特(Kennett)在《七年战争中的法国军队》(French Armies in the Seven Year's War)(达哈姆，北卡罗莱纳，1967)中对法国军队的管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关于军队供给，可见G·佩尔杰斯(Perjs)的《17世纪下半叶的军队供给，后勤及战略》(Army Provisioning, Logistics and Strategy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载于《匈牙利历史科学院学报》(Acta Historic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第6卷(1970)；以及冯·克劳弗尔德(van Creveld)和林恩在其著作第385页中所提到的内容。关于防御这一重要的话题，C·达菲用三部书进行了细致的论述，此处所涉及的部分请见《沃班和弗里德里克大帝时代的堡垒,1660~1789年包围战》(The Fortress in the Age of Vauban and Frederick the Great,1660~1789 Siege Warfare)第2卷(伦敦，1985)。至于北美战争，见H·H·佩卡姆(Peckham)的《殖民地战争，1689~1762年》(The Colonial Wars, 1689~1762)(芝加哥，1964)中的简介及权威性的G·S·格雷厄姆(Graham)的《北大西洋的帝国：争夺北美洲的海上战争》(Empire of the North Atlantic:The Maritime Struggle for North America)(多伦多，1958)。菲利浦·梅森(Philip Mason)在《荣誉的重要：有关印度军队、军官及士兵的记述》(A Matter of Honour: an Account of the Indian Army, its Officers and Men)(伦敦，1974)中，通过对亚瑟·韦尔斯利指挥的战役的叙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有关印度战争的描写。然而，这种以大英帝国为中心的论点，必然被P·巴鲁亚(Barua)的《印度军事的发展，1760~1850年》(Military Developments in India, 1760~1850)一文所冲淡，该文载于《军事史月刊，第7卷》(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Iviii)(1994)的第599~614页。

第十一章　武装起来的国家

本章所探讨的对此时期国际关系做出最精辟论述的是P·W·施罗德(Schroeder)的《欧洲政治转变，1763~1848年》(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npean politics, 1763~1848)(牛津，1994)。P·麦克斯(Mackesy)在《为美国而战，1775~1783年》(The War for America, 1775~1783)(剑桥，马萨诸塞，1965)中，用细腻的语言讲述了美国独立战争。描写美国独立战争的还有D·希金博撒姆(Higginbotham)的《美国独立战争：军事态度、策略及实践，1763~1789年》(The War of America I ndependence: Military Attitudes. Policies, and Practice, 1763~1789)(纽约，1971)。C·罗伊斯特(Royster)在《战争中的革命者：大陆军队及美国特性，1775~1783年》(A Revolutionary People at War: the Contiental Army and American Character, 1775~1783)(查佩山，1979)中描写了公众对战争的看法的转变。关于美国在战争期间的战略，可见R·魏格利(Weigley)的《美国的战争方式》(The American Way of War)(纽约，

1973）中的精彩章节。以新颖的形式洞察这一切的作品有J·夏伊（Sky）在J·A·林恩所辑的《喂养战争：从中世纪至今的西方战争后勤学》（Feeding Mars: Logistics in Western Warfare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Present）（伯尔德，1993）中的文章《后勤的危机和美国的革命：一个假设》（Logistical Crisi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 Hypothesis）。

J·戴尔马（Delmas）所辑的《从1715年至1871年的法国军史》（Histoire militaire de France, De 1715 à 1871）（巴黎，1992）这部新作，描述了法国一段时期内的军事状况。关于革命之前改革时期的情况，请见S·魏尔金森（Wilkinson）的《拿破仑时代之前的法国军队》（The French Army before Napoleon）（牛津，1915）；还有R·昆比（Quimby）的《拿破仑战争的背景》（The Background of Napoleonic Warfare）（纽约，1957），此书的最大优点是用英文写成；还有J·科林（Colin）《18世纪的步兵：战术》（L' infanterie au XVIII e sicle:la tactique）（巴黎，1907），这是一部较为优秀且较符合史实的著作，昆比就从中取用了许多资料。关于革命时期法国军队较权威的作品应属J·—P·贝尔托（Bertaud）的《法国大革命中的军队：从市民士兵到权力工具，R·R·帕尔默时期》（The Arm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from Citizen Soldiers to Instruments of Power, tr. R. R. Palmer）（普林斯顿，1988）。S·F·司各特（Scott）的《皇家军队对法国革命的反应》（The Response of the Royal Army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牛津，1978）讨论了旧式皇家陆家的构成、行动、命运直至1793年的解体。关于战争，请看G·罗滕伯格（Rothenberg）的《拿破仑时代的战争艺术》（The Art of Warfare in the Age of Napoleon）（布鲁名敦，1978），这是一部短而精的关于这一时期的完整历史的介绍之作。至于革命中的作战方式，有J·A·林恩的《共和国的刺刀：法国革命的动力和战术，1791～1794年》（The Bayonets of the Republic:Motivation and Tactics in the Army of Revolutionary France, 1791～1794）（厄伯那，1984）。拿破仑战争是众多著作的主题。J·图拉德（Tulard）著有《拿破仑：救世主的神话》（Napoleon: the Myth of the Saviour）（伦敦，1984），这是本卓越的专家所著的现代传记。到目前为止，关于战场上的拿破仑，记述最为精彩的要算D·G·钱德勒（Chandle）的《拿破仑的战役》*（The Campaigns of Napoleon）（纽约，1966）。但这本著作需与更具批判性的O·康奈利（Connelly）的《盛极而衰——拿破仑的军事战役》（Blundering to Glory: Napoleon' s Military Campains）（布鲁名敦，1988）互为补充。关于西班牙的灾难性命运，请看D·盖茨（Gates）的《西班牙的败落：伊比利亚半岛战争史》（The Spanish Ulcer:a History of the Peninsular War）（1986）。A·W·帕尔默在《拿破仑在俄罗斯》（Napoleon in Russia）（纽约，1967）中记叙了这位帝王的最大的失败。

关于奥地利和德国的军事改革的增补性著作有G·罗滕伯格的《拿破仑的大敌：查理公爵和奥地利军队，1792～1814年》（Napleon's Great Adversaries: the Archduke Charles and the Austrian Army,1792～1814)（布鲁名敦,1982）；还有W·O·沙纳汉（Shanahan）的《1786～1813年普鲁士军事改革》（Prussian Military Reforms, 1786～1813）（纽约，1945）和P·帕莱特（Paret）的《约克

郡与普鲁士的变革时代》*（Yorck and the Era of Prussian Reform）（伯克利，1966）。E·朗福德（Longford）在《威灵敦》（Willington）（第2卷，纽约，1969～1972）中回顾了拿破仑的对手的一生。英国的海上战争的胜利记述于C·D·霍尔（Hall）的《1803～1815年拿破仑战争中的英军战略》（British Strategy in the Napoleonic War，1803～1815）（曼彻斯特，1992）一书中，还有D·沃尔特（Walder）的《纳尔逊传记》（Nelson：a Biography）（纽约，1978），这部书详细地记述了这位英军最著名的元帅的一生。D·豪沃思（Howarth）在《纳尔逊接触》（the Nelson Touch）中描述了他在特拉法尔加的最辉煌的胜利。

第十二章 战争的工业化

毫无疑问，涉及这一章所涵盖的主题的著作是相当多的。W·麦克尔威（Mcelwee）的《战争的艺术：滑铁卢到修道院》（The Art of War：Waterloo to Mons）（布鲁名敦，1974）提供了这一时期的概况。关于克里米亚战争，请见C·希伯特（Hibbert）的《雷格兰勋爵的毁灭》（The Destruction of Lord Raglan）（伦敦，1961）和C·伍德海姆·斯密斯（Woodham Smith）的《原因》（The Reason Why）（伦敦，1965）。G·克拉格（Craig）的《克里米亚之战》（The Battle of Kniggr tz）（费城，1964）描绘出这一长达七周的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仗的真实可信的场景。D·肖瓦尔特（Showalter）的《铁路和步枪：士兵、技术和德国的统一》（Railroads and Rifles：Soldiers，Technology and the unification of Germany）（海姆登，1975）精彩地描述了科技对普鲁士的影响；同时，M·霍华德（Howard）的《普法战争》（The Franco—Prussian War）（伦敦，1961）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鉴别军事史优秀与否的标准。

关于美国内战这一内容，可读性和权威性俱佳的单行本要算J·M·麦克菲森（McPherson）的《战斗呼唤自由——内战时代》（Battle Cry of Freedom，The Civil War Era）（牛津，1988）；还有两部较为出色的三卷本战争史：B·卡顿（Catton）的《内战百年史》（The Centennial History of the Civil War）（花园城，纽约，1961）和S·富特（Foote）的《内战记事》（The Civil War，A Narrative）（纽约，1958）；在诸多的战争回忆录中，尤利西斯·S·格兰特（Ulysses S·Grant）的《美国名人个人回忆录》（Personal Memoirs of U．S．Grant）（纽约，1984）可算是较为引人注目的。马克·吐温曾稍带夸张地称他们的作品是19世纪英语文学中最出色的佳作。最后，人们不会忘记M·萨拉（Shaara）的《天使凶手》（The Killer Angels）（纽约，1974），这是一部以小说形式再现匹兹堡战役的巨著，它揭示了许多历史学家都无法告诉我们的关于那次战争的史实。

第十三章 世界大战的趋势

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军队正规化进行评估的有趣著作很多，如B·邦德（Bond）的《1854～1914年间的维多利亚军队和参谋学院》（The victrian Army and the Staff College，1854～1914）（伦敦，1972），就记述了英国在做出此种

努力时所遇到的种种困难。至于法国在遭到1870～1871年毁灭性打击后军队的发展情况，可参见D·B 罗尔斯顿（Ralston）的《共和国的军队：1871～1914年法国政治变化中军队的地位》（The Army of the Republic: The Place of the Military in the Political Evolution of France: 1871～1914）（剑桥，马萨诸塞，1967）。G·里特（Ritter）的《利剑与权杖——德国军国主义的弊端》（The Sword and Scepter, The Problem of Militarism in Germany）（第2卷，迈阿密）揭示了德国方面在二战中的专横跋扈。有关当时俄国经历的背景，请看W·C·小富勒（Fuller, Jr.）的《1881～1914年俄罗斯帝国的内战》（Civil-Military Conflict, in Imperial Russia, 1881～1914）（普林斯顿，1985）。D·瓦尔德（Walder）的《短暂获胜的战争——1904～1905的日俄战争》（The Short Victorious War, The Russo-Japanese Conflict, 1904～1905）（伦敦，1973）也是一部切实可读的佳作。关于欧洲的殖民战争，最优秀的著作要算D·R·莫里斯（Morris）的《铁矛的洗礼——萨卡统治下祖鲁王国的崛起及其在1879年祖鲁战争中衰落的历史》（The Washing of the Spears, A History of the Rise of the Zulu Nation under Shaka and Its Fall in the Zulu War of 1879）（纽约，1965），以及T·帕克汉姆（Pakenham）的《布尔战争》（The Boer WarII）（纽约，1979）。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因的著述数量极大。L·阿尔贝蒂尼（Albertini）的《1914年战争的起因》（The Origins of the War of 1914）（第3卷，纽约，1952）是公认的有关这次战争爆发的权威性著述。G·里特（Ritter）的《施利芬计划：一个神话的评述》（The Schlieffen Plan: Critique of a Myth）（纽约，1958）纠正了德国总参谋部的错误假定。至于美国的作战计划，请看J·古奇（Gooch）的《1900至1916年间的战争计划，总参谋部和英国军事战略》（The Plans of War, The General Staff and British Military Strategy, 1900～1916）（纽约，1974）。有关战前总的国际背景，可参阅P·肯尼迪主编的《巨头们的作战计划，1880～1914年》（The War Plans of the Great Powers, 1880～1914）（伦敦，1979）。S·R·小威廉森（Williamson, Jr）的《大战略中的政治：1904～1914年英法备战情况》（The Politics of Grand Strategy. Britain and France Prepare for War, 1904～1914（剑桥，马萨诸塞，1969）为我们提供了对这两大强国联合作战计划的精彩评述。

第十四章 战争中的西方

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极富于理解力的研究当属C·R·M·F·克鲁特威尔（Cruttwell）的《大战的历史，1914～1918年》（A History of the Great War, 1914～1918）（牛津，1934）。但较近一阶段却缺乏与之相匹配的著作，这反映了历史学这一专业的悲哀之处。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世界危机》（The World Crisis）（纽约，1930）中多次摆脱了那些特殊的托词，其精彩的行文风格确可令读者赏心说目。L·伍德华德（Woodward）的《大英帝国和1914～1918年的战争》（Great Britain and the War of 1914～1918）（波士顿，

1967）可算是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个国家的历史活动的精品。F·菲希尔(Fischer）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目标》(Germany's Aims in the First World War I）(英译本，纽约，1967)，在那些否定1919年德国秘密军事活动的人们中间仍有争议。J·M·温特（Winter）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程》(The Experience of World War I）(牛津，1989)，用语言、图表、图画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切实关于战争的概况。

有关战争中个人轶事的有价值的论文，有B·塔奇曼（Tuchman）的《八月枪声》(The Guns of August）(纽约，1962)，尽管此书对克劳塞维茨有一些草率且不公平的指责，但却不失为一篇对大战第一个月的战况较为有趣的论述。T·卢普弗(Lupfer)的《信条的动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术原则的改变》(The Dynamice of Doctrine:The Changes in German Tactical Doctrine During World War I）(利文沃思，1981)，为战争中战术本质的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同时，蒂莫西·特拉弗斯（Timothy Travers）的最近两本书基本上更改了西线英国军队的作战画面：这两部书为《屠场——英国军队、西线和现代战争的出现，1900～1918年》(The Killing Ground. The British Army, the Western Front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Warfare, 1900～1918)（伦敦，1997)，及《如何赢得战争，1917～1918年西线英军的指挥与技术》(How the War Was Won, Command and Technology in the British Army on the Western Front 1917～1918)（伦敦，1992)。M·米德尔布鲁克（Middlebrook）的《1916年7月1日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The First Dayon the Somme, 1 July 1916)（纽约，1972)，对前线受害最深的士兵提供了透彻的一瞥。A·霍恩（Horne）的《荣誉的代价，凡尔登，1916》(The Price of Glory, Verdun, 1916)（纽约，1962）同其在恐惧效果方面堪称异曲同工。

A·J·马德(Marder)的《从无畏舰到Scapa Flowg》(From the Dreadnought to Scapa Flow（第6卷，伦敦，1961）是从英军角度评述海上战争的权威性著作。H·霍尔维格（Herwig）的《豪华舰队——德意志帝国的海军，1888～1919年》(The 'Luxury' Fleet. The Imperial German Navy, 1888～1919)（伦敦，1980）提供了对德国海军奇异行动的生动描述。至于空战，请看J·H·小莫罗（Morrow, Jr.）的空中大战：1909至1921年的军事航空（The Great War in the Air. Military Aviation from 1909 to 1921)（华盛顿，1993)。

战后，小说和回忆录层出不穷，可谓20世纪之文坛奇观，而同时美国学术界的学者和批评家也最易忽视或曲解这一段。尽管有所争议，但关于前线士兵经历的最好的小说也许是F·曼宁（manning）的《命运的中部，1916年的索姆河和安克雷》(The Middle Parts of Fortune, Somme and Aners 1916)（伦敦，1929)，而G·查普曼（Chapman）的《激情的放纵——自传片断）《A Passionate Prodigality, Fragments of Autobiography)（伦敦，1933）向我们提供了有关战争经历的最纤细也是最诚实的自传体论述。C·S·福里斯特(Forrester)的《将军》(The General)（伦敦，1936）精彩地描绘了邪恶之师统帅人物的肖像。对于人们同情的英国士兵的阵亡带来的可怕影响，V·布里坦（Brittain）的《青年人的遗嘱，1900～1925年间自传研究》(Testament of Youth. An

Autobiographical Study of the Years, 1900~1925)（伦敦，1933）展示了一幅那一代牺牲者们令人难忘的画像。英文的战争诗也是数量宏大。最值得称道的应是J·西尔金（Silkin）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诗文合集》（The Penguin Book of First World War Poetry）（伦敦，1979）。最后，我们不应忘记德国人对于战争有着截然不同的反应：E·云格尔（Junger）的《钢铁风暴》（Storm of Steel）（伦敦，1929）是一部拥有关于战争的热情洋溢的第一手论述资料的著作，笔者是Pour le Mrite的获得者，一个英雄主义者，一位在战争中受伤多次的士兵，一个对这段历史感觉颇佳的人。

第十五章　冲突中的世界及第十六章　战争中的世界

如果说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浩如烟海，那么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作品则是不计其数。G·温伯格（Weinberg）的《武装的世界——全球二战史》(A World at Arms. A Global History of World War Ⅱ)(剑桥，1994）是一部现存的有关大战的政治史及战略的最切实的记述。R·斯佩克特（Spector）的《鹰与太阳的较量——美国对日本的战争》(The Eagle Against the Sun. The American War with Japan)（纽约，1984）是一部关于太平洋战争的杰出著述。对于国家军事机构的效率及准备情况，A·R·米利特（Millett）和W·默里（Murray）编著的《军事效率》（Militaty Effectiveness）第2、3卷（伦敦，1988）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对比。G·温伯格的《德国纳粹的对外政策》（The Foreign Policy of Nazi Germany）（第2卷，芝加哥，1970~1980）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战争根源的背景。

专题性著述仍旧流行于市场。其中最好的是M·诺克斯（Knox）的《放任不羁的墨索里尼——1939~1941年法西斯意大利的最后一次战争中的政治和战略》《Mussolini Unleashed. 1939~1941, Politics and Strategy in Fascist Italy' s Last War)（剑桥，1982)，此书暗示了意大利政府和军事的虚伪和无能；C·西德诺（Sydnor）的《毁灭中的士兵们——托坦科普夫分队》（Soldiers of Destruction. The Totenkopf Division)（普林斯顿，1977)，阐述了西部前线战争中的行动与观念之间的联系；R·帕克斯登（Paxton）的《维希政府时期的政策和夸示》（Parades and Politics at Vichy）（普林斯顿，1966)，考察了法国对失败的军事反应；C·索恩（Thorne）的《一种联盟——美国、英国及对日战争，1941~1945年》（Allies of a kind.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1941~1945）（牛津，1978）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太平洋战争中英美联盟的深入翔实的调查结果。M·黑斯廷斯（Hastings）的《轰炸指挥》(Bomber Command)（伦敦，1979）则把对战略轰炸战的分析同空中作战的现实画面结合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战争的官方军事史记载达到了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精确且真实的程度。在这些记载中，英文所记载的最出色的应属对战略轰炸的研究：C·韦伯斯特（Webster）和N·弗兰克兰（Frankland）的《对德战略空中进攻》(The Strategic Air Offensive Against Germany)（第4卷，伦敦，1994)。同样值得

特别一提的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军事史办公室的《德国和二战》(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Germany and World War Ⅱ),此书的前六卷已出版，英文版也正在出版中。这一工作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表明错误的意识形态对于德国军队的参战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东部的战争。在此方面其他重要的著作还有C·斯特里特（streit）的《没有战友，1941~1945年的德国国防军和苏联战俘》(Keine Kameraden. Die Wehrmacht und die sowjetischen Kriegsgefangenen, 1941~1945)（斯图加特，1978）；O·巴托夫（Bartov）用英文撰写的《希特勒的军队——士兵、纳粹和第三帝国的战争》(Hitler's Army. soldiers,Nazis, and War in the Third Reich)（牛津，1991）和C·R·布朗宁（Browning）的《普通人——后备役101警务营及其在波兰的最终瓦解》(Ordinary Men. Reserve Police Battalion 101 and the Final Solution in Poland)（纽约，1992)。这种历史研究的新潮流表明了大多数历史学家的普遍怀疑：德国将军们战后所撰写的回忆录，即便是以典范的风格写作也是完全不可靠的，表现出智力上的不诚实。

最后，人们发现在同盟国的胜利中，情报起着重要的作用，而这一发现又极大地推动了20世纪70年代的编年史工作。有三部这类佳作不仅对历史史实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且在撰写过程中借助了大量的现实资料：R·贝内特(Bennett)的《两方的过激派——诺曼底战役，1944~1945年》(Ultra in the West. The Normandy Campain, 1944~1945)（纽约，1979)；P·比斯利（Beesley）的《极特殊的智慧——海军上将的作战情报中心的故事，1939~1945年》(Very Special Intelligence. The Story of the Admiralty's Operational Intelligence Centre, 1939~1945)（花园城，1977）和R·V·琼斯（Jones）的《秘密战争，英国科技情报，1939~1945年》(Most Secret War. British Scientific Intelligence, 1939~1945)（伦敦，1978)。最后，D·格兰兹（Glantz）的《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欺骗》(Soviet Military Deceptio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伦敦，1989）揭露了苏联如何蒙蔽视听，吹嘘其在东部战场的胜利中起了怎样至关重要作用的事实。

第十七章　战后世界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的佳作，以远远超过前几个时代的数量大批涌现出来。有关法国人在越南的经历，在伯纳德·福尔的著述中尤为引人注目：如《没有欢乐的街道——印度支那的暴乱，1946~1963年》(Street Without Joy. Insurgeney in Indochina, 1946~1963)(哈利斯堡，1963)；《弹丸之地上的地狱——奠边府围攻》(Hell in a very Small place. The Siege of Dien Bien Phu)（纽约，1967)；以及《两个越南，政治与军事分析》(The Two vietnams, A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nalysis)（纽约，1963)。S·卡诺（karnow）的《越南——一段历史》(vietnam. A History)（纽约，1983）概括了法国和美国在越南的战争经历。而有关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历史，A·霍尼（Horne）的《和平的野蛮战争，阿尔及利亚，1954~1962年》(A Savage War of Peace. Algeria, 1954~1962)

(伦敦, 1977) 是 一部极有影响的文学及史学著作。还有两部有关那次战争的优秀影片, 它们是《阿尔及尔之战》(The Battle of Algiers) 和《迷惘的指挥》(The lost Command)。在记叙英国的若干殖民战争的著作中, M · 黑斯廷斯和S · 詹金斯(Jenkins)合著的《福克兰岛之战》(Battle for the Falklands)(纽约, 1983)最值得 一提, 因为它把政治和战略背景同实战行动交织起来进行叙述。

毫无疑问, 美国极为有限的几次战争也吸引了历史学家们的注意, 但对其战略影响最大的朝鲜战争却被给予了最少的注意。T · R · 费伦巴克 (Fehrenbach) 的《此类战争》(The kind of War) (纽约, 1964) 至今仍是记载那次战争的最佳史著。因为对美国形象的损害, 越南战争吸引了更多学者的兴趣。一些极有趣的专题文章有A · F · 小克雷品韦奇 (Krepinevich, Jr.) 的《军队和越南》(The Army and vietnam) (巴尔的摩, 1986); R · H · 斯佩克特 (Spector) 的《建议与支持——在越南的早期美军, 1941~1960年》(Advice an Support. The Early Years of the VS Army in Vietnam, 1941~1960) (伦敦, 1985);《新年之后——在越南最血腥的一年》(After Tet. The Bloodiest Year in vietnam) (纽约, 1993); 以及F · 斯内普 (Snepp) 的《体面的侵略—— 一个知情者关于西贡沦陷的叙述, 由美国中央情报局主要战略分析家在越南的叙述》(Decent Interval. An Insiders's Account of Saigon's Indecent End Told by the CIA's Chief Strategy Analyst in vietnam (纽约, 1977)。但越战经历同样也使美国人在本世纪创作了一批或虚构或真实的优秀文学作品, 尤其是J · 韦伯 (Webb) 的《战火的领地》(Fields of Fire) (纽约, 1978); F · 小唐斯 (Downs, Jr.) 的《死亡地带, 我在越战中的生活》(The Killing Zone. My life in the Vietnam War) (纽约, 1978)、《再生草——一个越战士兵的归来》(Aftermath. A Soldier's Return from Vietnam) (纽约, 1984) 和J · R · 麦克多诺 (McDonough) 的《排长》(Platoon Leader) (纽约, 1985)。

在众多关于中东冲突的书中, E · 哈麦尔 (Hammel) 的《六月中的六天——以色列怎样赢得1967年阿以战争》(Six Days in June. How Israel Won the 1967 Arab-Israeli War) (纽约, 1993), 以一种有趣的风格记录了那场战争。而C · 赫卓格 (Herzog) 的《阿以战争, 从黎巴嫩独立战争以来的中东战争与和平》。(The Arab-Israeli Wars. War and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from the War of Independence through Lebanon) (纽约, 1984) 则从知情者的角度叙述了那场战争。最后, R · 阿特金森 (Atkinson) 的《讨伐运动, 海湾战争中未透露的故事》(Crusade.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Persian Gulf War) (纽约, 1993) 是一部信息极全面的佳作。

撰稿人简介

克里斯托弗·奥尔曼 (Christopher Allmand) 1958年毕业于牛津大学奥里尔学院，1963年获得博士学位，主要从事中世纪后期的欧洲历史研究。1967年曾执教于北威尔士学院，后作为历史学教授，任教于利物浦大学，现任系主任。编有《战争中的社会——百年战争中英法两国的经历》(Society at War. The Exeperience of England and France during the Hundred Years War)(1973)；《中世纪后期的战争，文学和政治》(War,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Late Middle Ages)(1976)；《1420～1436年间巴黎议会前的英国服饰》(English Suits before the Parlement of Paris, 1420～1436)（与C·A·J·阿姆斯特朗合编）；以及《1350～1550年间法国的政权、文化和宗教》(Power, Culture, and Religion in France, c. 1350～c. 1550)(1989)。他的著述有《1415至1450年间兰加斯特王朝的诺曼底：中世纪的一段侵略史》(Lancastrian Normandy, 1415～1450. The history of a Medieval Occupation)(1983)；《百年战争：战争中的英国和法国，1300～1450年》(The Hundred Years War. England and France at War, c. 1300～c. 1450)(1988，已有三种文字的译本）和《亨利五世》(Henry V)(1992)。他还是即将出版的《新剑桥中世纪史》(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最后一卷《15世纪》(The Fifteenth Century) 的编辑。

伯纳德·S·巴克拉克 (Bemard S·Bachrach) 曾就读于纽约大学城女皇学院，主攻历史，兼修古典文学，196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1962年和1966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学校分别获文学硕士和历史学博士学位。曾在女皇学院做了一年讲师，后转明尼苏达大学做助教，1971年起做副教授，1975年成为历史学教授。1993年任明尼苏达大学杰出教育奖金评选委员会委员，积极致力于科研团体的服务。他是《国际中世纪文献目录》(the International Medieval Bibiography)(1967～1968) 的编辑。1980年以来，合作创立并编辑了《中世纪传记特写》(Medieval Prosography) 半年刊；并致力于明尼苏达大学人文学专著编辑委员会的工作 (1976～1981)，编辑了中世纪知识年鉴传纪特写系列丛书；以及《历史上的战争》(War in History) 学刊。1986年到1988年作为美国中世纪研究会的成员，与美国历史学协会关系密切，并于1987年至1988年担任该协会会长。1989年被聘为西密歇根大学客座教授；1991年赴斯德哥尔摩大学和乌普萨拉大学讲学，并成为斯德哥尔摩大学中世纪研究中心的顾问。巴克拉克教授主要致力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前的历史研究，共发表300多篇（部）著述，其中包括80篇论文和10部专著。主要著作有《公元481～751年间墨洛温王朝的军事组织》(Merovingian Military Organization 481～751)(1972)、《西方阿兰人的历史》(A history of the Alans in the West)(1973)、《西欧中世纪早期犹太人的策略》(Early Medieval Jewish Policy in Western Europe (1977)、以及《福克·内拉：新罗

马的执政官（987～1040)》（Fulk Nerra：The Neo－Roman Consul，987～1040)》（1993)。他的论文集《中世纪早期西方的军队和政治》（Armies and Politics in the Early Medieval West）（1993）已出版集注本。

维克多·戴维斯·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曾就读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分校、雅典美国古典文学研究学校和斯坦福大学，1980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博士学位。他是《古希腊的战争和农业》(Warfare and Agriculture in Classical Greece）（1983）的作者，《古希腊装甲步兵：古代希腊的战争经验》（Hoplites：The Ancient Greek Battle Experience）（1991）的主编；并写有30多种有关古希腊社会、经济和历史的著述。其中《西方的战争方式》（Western Way of War）（1989）一书现已有7种版本和译本。他的有关古代土地所有制和军事生活的著作《其他希腊人》（The Other Greeks）于 1994年出版。1992年，美国哲学学会因他在 1984至1990年间于加州大学开办古典语言讲座，特授予他“杰出教育奖”。目前，他是该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的希腊语教授。

约翰·A·林恩（John A·Lynn）1973年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博士学位。1978年以来执教于伊利诺伊大学，撰写与编辑的著作有《共和国的刺刀：法国大革命中军队的动机及策略，1791～1794年》（The Bayonets of the Republic：Motivation and Tactics in the Army of Revolutionary France，1791～1794）（1984)；《战争的工具——军备、观念和战争机构，1445～1871年》(Tools of War Instrument，Ideas and Institutions of Warfare，1445～1871)（1990)；《喂养战争：中世纪至今西方战争中的后勤学》(Feeding Mars：Logistics in Western Warfare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Present)（1993)。此外，他还发表了30多篇关于1610至1815年间法国军事史的文章。

威廉林·默里（Williamson Murray）是俄亥俄州立大学欧洲军事史的教授，在耶鲁大学获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曾在美国空军服役5年，并于1992年作为中校完成了后备役义务。他是美国空军军事学院、美国军事科学院和海军军事学院的访问学者，1994～1995年间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著名访问学者。著有《1938至1939年间欧洲力量均衡的改变，毁灭之路》（The Change in the European Balance of Power，1938～1939，The Path to Ruin）（1984)；《德国空军》(luftwaffe)（1985)；《德国的军事力量》(German Military Effectiveness)（1992)。他与艾伦·米利特合编了《军事力量》（Military Effectiveness）（1998)，《预测、网络评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来临》（Calculations，Net Assessment and the Coming of World War Ⅱ）（1992）等著作，他还与他人合作编著了《战略谋划》（Making of Strategy）（1994）一书。

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生于英国诺丁汉，就读于剑桥克里斯特学院。1965年获学士学位，1968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1981年获文学博士学位。1972至1979年执教于圣安第斯大学，1979至1980年转到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1986至1993年在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尚佩恩分校任教，1989至1991年任该大学系主任，1993年后成为耶鲁大学军事与海军史教授。撰写和编辑了22部著作，主要有《1567至1659年间弗德兰军队与西班牙道路——欧洲国家战争中西班牙后勤供给的成功与失败》(The Army of Flanders and the Spanish Road

1567～1659,The Logistics of Spanish Victory and Defeat in the Low Countries' Wars）（197）；《荷兰叛乱》《The Dutch Revolt）（1997）；《三十年战争》（The Thirty Years' War）（与9位合作者编著，1984）；《1500至1800年的军事革命——军事改革和西方的兴起》（The Military Revolution 1500～1800.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1988）；《西班牙舰队》（The Spanish Armada）（与科林·马丁合著，1988）。他还发表了40多篇相关的学术论文。

帕特里夏·锡德（Patricia Seed）1980年于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获比较热带地区历史学博士学位，后执教于里斯大学历史系。她是获波尔东奖金的《殖民地时期墨西哥的爱情、荣誉和服从：婚姻选择的冲突，1564～1821年》（To Love, Honor,and Obey in Colonial Mexico：Conflicts over Marriage Choice,1564～1821）（1988）一书的作者，并撰写了18篇有关拉丁美洲历史的文章。她现在美洲从事欧洲殖民主义（包括它的战争形式）比较历史的研究。

人名索引

人名索引和各种“索引”中的页码为英文原书页码，即本书旁码。

A

B

C

D

E

F

G

H

J

K

M

N

O

P

Q

R

S

T

W

X

Y

Z

战争战役名索引

A

B

C

D

E

F

G

J

K

L

M

N

P

Q

R

S

T

W

X

Y

Z

地名索引

A

B

D

E

F

G

H

J

K

L

M

P

S

W

X

Y

Z

其他名目索引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V

W

X

Y

Z